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学通论 刘进宝著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0

Ⅰ. 刘... Ⅱ. 刘进宝 Ⅲ. 敦煌学 Ⅳ. K86

敦煌学... 刘进宝... 敦煌学... 刘进宝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责任编辑：杨翠玲 邓寒峰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王保华

敦煌学通论

刘进宝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兰州市滨河东路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2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2.00 元

目 录

序	柴剑虹	员
引言 何谓敦煌学		员
第一章 千载沧桑话敦煌		员
一、“敦煌”名称的含义		员
员援汉族名称		猿
圆援少数民族语		源
猿援与希腊人有关		苑
二、汉代对敦煌的开拓与经营		怨
员援汉代对敦煌的开拓		怨
圆援设置郡县行政区		员
猿援建立军事防御体系		员
源援移民实边与河西屯田		苑
三、华戎所交一都会		
——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		
背景		员
员援学术文化的发展		员
圆援佛教活动的兴盛		员

猿援佛教艺术之花的绽开	猿猿
四、丝绸路上的一颗明珠	
——隋与唐前期的敦煌	猿猿
员援唐前期对敦煌的统治	猿苑
圆援经济的高度发展	猿怨
猿援中西交通的兴盛	源猿
源援辉煌灿烂的莫高窟艺术	源苑
五、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	源怨
员援吐蕃占领敦煌及其民族统治 ...	缘园
圆援吐蕃对敦煌的统治形式——部 落、将制	缘苑
猿援吐蕃时期的田赋制度	缘怨
源援渐趋衰退的敦煌艺术	远猿
六、孤悬西陲的归义军	远缘
员援张议潮起义及归义军政权的建立	远缘
圆援归义军政权的沿革	苑猿
猿援归义军时期的统治政策	愿园
源援“日落西山”的莫高窟艺术	愿怨
七、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敦煌的沉寂	愿源
员援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	愿源
圆援渐趋沉寂的敦煌	愿苑
猿援已近黄昏的莫高窟艺术	愿怨
第二章 艺术瑰宝千佛洞	员员
一、莫高窟的创建与编号	员圆
员援莫高窟之名称	员圆
圆援乐僔法师与莫高窟的创建	员猿

猿研究敦煌的锁钥——莫高窟编号	猿缘
二、墙壁上的图书馆	
——敦煌壁画概述	猿苑
猿敦煌壁画的内容	猿苑
圆猿形象的历史	猿员
三、彩塑艺术的杰作	猿缘
猿丰富多彩的敦煌彩塑	猿缘
圆猿敦煌彩塑的制作方法和特点	猿怨
四、飞天新装挥舞迎	
——敦煌的飞天艺术	猿圆
猿敦煌飞天的产生	猿圆
圆猿飞天的发展变化	猿源
猿敦煌飞天的艺术风格	猿愿
五、反弹琵琶伎乐天	
——敦煌的乐舞艺术	猿圆
猿敦煌曲谱的解译	猿圆
圆猿名目繁多的乐器	猿源
猿千姿百态的舞蹈	猿苑
源令人费解的舞谱	猿圆
六、人间天国多楼台	
——敦煌的建筑艺术	猿猿
猿古建筑实物	猿猿
圆猿壁画中的古代建筑	猿缘
第三章 扼腕愤谈伤心史	
——敦煌遗书与文物被盗记	猿员

一、震惊世界的大发现	员员
员爰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员圆
圆爰土地庙遗书发现记	员缘
猿爰大胆的推测	员园
二、千古之谜谁解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	员员
员爰藏经洞原为洪 馨（音辩）影窟	
.....	员圆
圆爰藏经洞封闭之谜	员猿
三、斯坦因敦煌劫宝藏	员圆
员爰斯坦因及其第一次考察	员猿
圆爰千佛洞骗宝	员园
猿爰盗劫后的评说与英藏敦煌文书	
.....	圆猿
四、“汉学大师”取菁华	圆愿
员爰法国的“汉学”研究	圆愿
圆爰伯希和敦煌劫宝藏	圆员
猿爰菁华犹在巴黎藏	圆怨
五、姗姗来迟的橘瑞超	圆猿
员爰大谷光瑞考察团与敦煌	
吐鲁番文书的外流	圆猿
圆爰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书	圆员
六、不甘落后的鄂登堡	圆苑
员爰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	
.....	圆苑
圆爰鄂登堡与敦煌盗宝	圆愿
猿爰俄罗斯所藏敦煌文书	圆源
七、带来厄运的华尔纳	圆愿

员媛第一次盗劫	圆缘
圆媛第二次考察与哈佛燕京学社的 成立	猿猿
猿媛惨重的损失与美国所藏敦煌 文书	缘苑
八、劫余断篇又遭劫	缘怨
员媛遗书的流散	圆园
圆媛运京途中遭劫记	圆员
九、敦煌文物被盗的原因	圆元
员媛总体历史背景	圆元
圆媛具体原因的分析	圆怨
第四章 敦煌遗书	
——百科全书式的宝藏	圆缘
一、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圆缘
员媛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圆元
圆媛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	圆愿
猿媛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圆猿
二、宗教研究的新材料	圆元
员媛“佛教遗书”甲天下	圆元
圆媛道教典籍	猿圆
猿媛景教文献	猿猿
源媛摩尼教经典	猿苑
三、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	猿园
员媛对敦煌寺院“唱衣”的研究	猿员
圆媛佛教经律中的“唱衣”	猿苑
猿媛敦煌寺院中的“唱衣”	猿圆
源媛敦煌寺院“唱衣”的地域	

特色	猿苑
四、唐代地方公文的处理程式	
——敦煌吐鲁番的官文书	猿猿
猿县司机构的官文书判署	猿猿
猿州、都督府的官文书判署	猿猿
猿牒文及其处理方式	猿猿
五、通俗文学的重要一页——变文	
.....	猿苑
猿什么是变文	猿愿
猿变文的题材和内容	猿猿
猿变文的价值	猿苑
六、诗苑奇葩竞争艳	猿猿
猿敦煌诗人之作	猿猿
猿释氏道徒之作	猿猿
猿敦煌民间诗歌	猿猿
猿敦煌文人诗歌	猿远
七、天真质朴的曲子词	猿猿
猿词的起源与敦煌曲子词	猿猿
猿丰富的内容	猿猿
猿曲子词的研究	猿苑
八、科学技术的珍宝	猿源
猿丰富的天文学资料	猿源
猿雕版印刷术的实证	猿愿
九、有待发掘的医学宝库	
——敦煌医学概述	猿猿
猿古本草学的新发现	猿猿
猿丰富的医经	猿猿
猿珍贵的医方	猿愿

第五章 敦煌学研究遍天下

——敦煌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概况

.....	源愿
一、敦煌学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初步发展	源愿
员媛从史的角度考察敦煌学之产生	源愿
.....	源愿
圆媛草创阶段(员愿怨—员愿园年)	源园
猿媛艰苦创业(员愿缘—员愿源年)	源园
源媛初步发展(员愿源—员愿远年)	源猿
二、科学考察结硕果	源远
员媛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其成就	源远
圆媛敦煌考古促进了敦煌学研究	源园
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源远
员媛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书	源远
圆媛向达先生的大声疾呼	源愿
猿媛贺昌群的积极响应	源怨
源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源员
四、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源园
员媛研究队伍日渐壮大	源猿
圆媛学术活动日益频繁	源园
猿媛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源远
五、台港地区的敦煌学	源员
员媛敦煌学教学与人才培养	源员
圆媛研究机构及学术活动	源缘
猿媛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	源愿

六、法国的敦煌学研究	缘范
员援主要的敦煌学家及其著述	缘范
圆援对敦煌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	缘员
猿援对其他民族文字写卷的研究	
.....	缘原
七、敦煌学研究在日本	缘怨
员援二次大战前的研究概况	缘怨
圆援二战后至七十年代的研究概况	
.....	缘圆
猿援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情况	缘豫
八、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	缘愿
员援俄罗斯	缘愿
圆援英国	缘园
猿援美国	缘猿
源援韩国	缘缘
附录一 《敦煌学述论》后记	缘圆
附录二 台湾版序言	缘原
后 记	缘远

序

■柴剑虹

1900年 远月 圆日（农历五月廿六）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导致了一门真正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的逐渐兴起、形成和发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学最初是伴随着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的被劫掠、遭流失而产生的，因此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也伴随着伤心耻辱与发愤崛起。今天，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个结论已被世人普遍认同之时，我们尤其不应忘记数代学人为此抛洒的心血与付出的辛劳。敦煌学近百年的历史，既艰难而曲折，也充满了自豪与希望。

我们又决不能自满，因为敦煌学还必须前进和发展，许多课题亟需解决，研究队伍应该扩大，学科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要做到这些，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要更努力、更认真、更有成效地普及敦煌学知识。普及是提高的基础，这道理是一点也不错的。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要从中小学乃至幼儿教育抓起，便是这个道

理。最近，有一位作家对我说，据她在参观莫高窟时的采访，日本参观者对敦煌艺术的了解要比我们本国的观众更多更深入，态度也更为认真而虔诚。对此，我没有作过调查分析，没有发言权；但是，据我所知，近几十年来，在日本国土上举办的敦煌文物及相关艺术品的展览以及出版的普及性图书，无论在数量与规模上都是相当可观的；他们所培养的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其数量与水平也不可低估。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应当在敦煌历史文化知识与敦煌学的普及工作上花更大的气力。

我自己是在 1984 年代初到中华书局工作后才涉足敦煌学研究的，只是在审读有关书稿的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学习，也急切企盼能有更多更好的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包括中等的学术性著作）问世。为此，我曾约请一些学者编写了《敦煌文学作品选》，负责编发了《敦煌学概论》（姜亮夫著）、《敦煌史话》（胡戟、傅玫著）等书稿与《文史知识》杂志的“敦煌学专号”，组织两位年轻朋友写了《飞天史话》。也正是基于此，当刘进宝同志的《敦煌学述论》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在 1985 年底印行后，我便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积极推荐该书在台湾地区出繁体字版，也努力促成其译成朝鲜文在韩国出版。

据我所知，《敦煌学述论》出版后，广大读者的反映是好的，敦煌学界也持基本肯定的评价，因为这是一本内容较丰富、评述尚客观、文字朴实、条理清晰的普及读物。当然，也正如有人所说，敦煌学的普及读物是

最难写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涉及众多学科，涉及千百年的中外多民族的文化交流；而且也因为有许多难题尚待解答，不少疑点仍众说纷纭；更何况作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研究成果可谓日新月异，又涉及多国文字。因此，仅仅是搜集较完备的资料与较新的信息这两条，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刘进宝同志开始写作此书时，还是一名刚获得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其艰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如此，如果敦煌学界的专家学者对此书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也是不足为怪的。从该书初版至今，已有近十年的时光。其间敦煌学的发展，可谓迅猛异常；进宝同志本人，也已成长为一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教学的教授。可以说，撰写一本高质量的敦煌学普及读物的主、客观条件，都比十年前好了许多。因此，最近进宝同志趁该书重印之机，对书中原有的内容作了修订，又增写了不少新的东西，这既体现了学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作者及出版社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世界即将进入 21 世纪。我们敦煌学界在积极筹划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同时，不应忘记这也是我们普及敦煌历史文化知识、宣传敦煌学的大好时机，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好时机。就相关的出版物而言，我们不仅需要更多更好的高水平、有创新的学术著作，而且需要更多更好的准确有用、通俗易懂且价格低廉的普及读物。我们也十分清楚，广大读者最关心的

一些问题，比如藏经洞的性质及其评价，学术界至今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每年到莫高窟的中外参观者数以十万计，却至今没有一本简明有用的参观手册或说明书。我期望经过敦煌学界与出版界同仁的努力与协作（包括中外学者的进一步合作），这种状况能得到迅速的改变，一些难题（包括敦煌文物的回归）也能有圆满的答案。我当然也企盼刘进宝教授能为此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我写这篇小序的主要目的。

1995年 12月 缘日于北京

引言

何谓敦煌学

二十世纪初叶，敦煌藏经洞遗书的被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从而在世界上兴起了一门新学科——敦煌学。

敦煌学的产生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由于对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轻视，致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敦煌学的概念、含义及研究对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称为敦煌学，或称为敦煌研究，或称为敦煌文献研究。

我们认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大凡中古时代的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科技、经济、建筑、民族关系、中西交通等各门学科，都可利用敦煌学资料，或填补空白，或纠正前人的错误，或改变某些传统的说法。正是由于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十分广泛，所以有人喻之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

我们这样表述敦煌学，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因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而在中国数千上万的州郡县中，敦煌所以独特，以地名学，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正是由于在敦煌发现了五万卷左右的敦煌遗书和在敦煌保存下了以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为代表的大量石窟艺术的缘故。也正是由于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的存在，敦煌学才成了一门学科。敦煌学既然是一门学科，就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即要搞清楚敦煌学这门学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因此敦煌学理论，自然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还由于敦煌学是以地名学的一门学科，所以敦煌史地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我们这样表述敦煌学，也是由敦煌学本身的发展决定的。敦煌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通过其发生、发展的历程，也可看出我们这样表述敦煌学的缘由。

法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曾在北京给罗振玉、蒋伯斧、王国维等人看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并送给罗振玉一些敦煌遗书照片，罗据此编成《敦煌石室遗书》一书，并撰写《鸣沙山石室秘录》，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刊布和大规模研究与介绍的开始。《王国维年表》~~民国~~年载其事曰：“法国大学教授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至我国西北劫取甘肃敦煌鸣沙山莫高窟千佛洞中大批卷轴文物。八月中秋，携其所窃部分卷轴，途经北京。罗氏（即罗振玉）偕先生及蒋伯斧、董绶经往观，旋约集同好，编定其文字为《敦煌石室遗书》，以先生所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为附录，由武进董康（绶经）诵芬室刊行。”正是在罗振玉、董康、蒋伯斧等人的奔走呼告、极力呼吁下，清政府学部才于~~民国~~年愿月~~四~~日致电甘肃：“行陕甘总督，清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要求将剩余敦煌遗书全部运往北京，由学部接收。这批八千余卷的敦煌遗书，后移交京师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图书馆保存。

~~民国~~年，陈垣先生依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八千余卷，编成《敦煌劫余录》一书，它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遗书的目录书。陈寅恪先生~~民国~~年为其作序说，此书

乃“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并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使用了敦煌学这一名词。1940年，向达先生修订《唐代俗讲考》时，也沿用了这一名词，说“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由此可知，当时学术界所谓之敦煌学，仅仅是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而言，并不包含其他。

四十年代初，在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进言，大声疾呼下，国民党政府于1943年12月采纳了于右任关于设立敦煌学院的建议，教育部委派高一涵、常书鸿为正副主任，负责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工作，研究所于1944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并从重庆征聘来了史岩、李浴、苏莹辉、潘絮兹、罗寄梅等敦煌学研究者，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1945年，敦煌艺术研究所与华西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联合出版了史岩先生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此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逐渐深入，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从而使敦煌石窟艺术亦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了。因此，学术界所说之敦煌学，便包括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两个方面。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文集·前言》中说：“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敦煌石窟，……一部分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

近年来，敦煌学理论的探讨日渐受到重视，相继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这些情况表明，敦煌学理论研究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必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由于敦煌学是以地名学的一门学科，因而在探讨敦煌艺术的产生、发展各个时期，探讨藏经洞的封闭，敦煌遗书的发现、被盗等问题时，必然要涉及到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敦煌史地。可以

说，深入了解、研究敦煌史地，是全面研究敦煌学的前提之一，所以我们认为，敦煌史地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敦煌学的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经过科学地整理、归纳、分类后，都可以包含在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和敦煌史地四项之下。现将其简单叙说如下：

第一，敦煌遗书。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总数达五万卷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写本，一小部分是木刻本。刻本中有唐咸通九年（~~唐~~879年）刻的《金刚经》，首尾完整，卷首有一幅“佛说法图”，雕刻者刀法纯熟，线条细致工整，充分显示了我国雕版印刷术的精湛技术，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刻本书籍。这些书籍除用汉文书写外，还有用藏文、梵文、康居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等抄写的。藏书的内容，以佛教经典为最多，还有道教经典，经、史、子、集四部书，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域外古语言古宗教、图经、方志、医药、历书、社会经济资料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此外，还存有寺院的契约、帐簿、户籍、信札等经济历史资料。尤为可贵的是，许多写本注明了抄写年月，最早的是东晋永和九年（~~魏~~354年）抄本《佛说无常经》（藏于俄罗斯），最迟的为北宋天圣八年（~~元~~1028年）抄本《杂写》（藏于巴黎）。这些手抄的经卷、书籍时代性很强，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真实材料，也是研究我国近二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

第二，敦煌石窟艺术。我们所说的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郡境内的所有石窟，如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五个庙石窟等，共计有洞窟 ~~缘~~ 400多个，壁画约五万平方米。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窟中，以莫高窟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这些石窟的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清代，绵延 ~~元~~ 1000多年，其规模之大，乃举世无双。仅就壁画的内容而言，它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活动，如生产劳动、风俗礼仪、帝王将相、贵族妇

女、商旅往来、使者朝会、民族关系、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天文地理、医疗卫生等等。因此法国人将敦煌壁画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

以上所述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是敦煌学研究最主要的内容。这两类宝藏加在一起，真可说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内容如此丰富的敦煌文化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时，除了本土文化外，主要从西域接受了佛教文化，同时也从东面传来了中原和宋齐梁陈的写经。隋唐时期，主要从长安传来了大量写经、文献、诗词和画稿。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时期，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藩镇”，它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系，且主要是本土产生的文化。

第三，敦煌学理论。敦煌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其理论建设还不够充分，仍在不断深化和探讨中。敦煌学理论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研究对象，敦煌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目前研究敦煌学的作用和意义，敦煌学史等等。

第四，敦煌史地。我们所说的敦煌史地，就是指研究中古时代敦煌的历史和历史地理。因为敦煌艺术，乃是东传的佛教在一个具有成熟封建文化的地方的特有产物，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宗教刺激下出现的新形态。因此敦煌艺术的特点，就在于其地理条件的特殊，使它具有一个个性鲜明的差异。因此，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的敦煌史地，则是指与敦煌学其他三个主要研究对象相互关联，即与敦煌艺术的产生、发展等有密切关系的敦煌历史和敦煌历史地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以上对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的论述，只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
一孔之见，并非完美无缺的“统一”概念。我们认为对敦煌学这

门新兴的学科来说，其概念定义是很难科学界定的，正如列宁所说：“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①。”这就是说，每一个定义不过是一种质的规定性，不可能把发展中的所有质的规定性穷尽，对敦煌学这门发展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

【注释】

-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44 页。

第一章

千载沧桑话敦煌

敦煌学是以地名学的一门学科。敦煌史地既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只有深入了解敦煌史地，才能对敦煌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欲究敦煌学者，必先明敦煌学之基础与背景。”^①因此，有必要先谈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一、“敦煌”名称的含义

敦煌这个名字，是汉武帝建郡时命名的。根据古籍记载，此地古属雍州。《尚书·禹贡》篇在论述九州中的雍州时，就明确指出其西界为黑水：“黑水西河惟雍州。”《文献通考》卷一百一十四《舆地考八·古雍州条》解释说：“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翼州西故曰西河；黑水出今张掖郡鸡山，南流至今敦煌，经三危山，过今南溪郡而入南海。”又说：“汉之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其分地。”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也曾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尚书·舜典》说，在虞舜时，帝舜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许多人认为“三危”就是指

今敦煌南面的三危山。《左传》襄公十四年，晋范宣子数姜戎氏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又昭公九年，周詹桓伯辞于晋，也曾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这都是晋惠公由秦东归，迁戎于伊雒流域近于周王都城雒邑所引起的问题。允姓为阴戎之祖，也就是后来的姜戎氏。杜预解释说：“瓜州在今敦煌。”实际上，在杜预之前，杜林就已经这样认为了。《汉书·地理志》敦煌县的注文说：“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唐代颜师古更作补充说：“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其实，瓜州之戎并非就在敦煌，这一点顾颉刚先生曾提出五大理由予以驳斥。但由于杜林的说法几成定论，后魏明帝时竟于敦煌设立瓜州，经过一度改名，瓜州还是成为定称。

《禹贡》于黑水、三危之外，还提到弱水、猪野、合黎和流沙。《禹贡》述道水，是先说弱水而后才提到黑水。由此可知弱水也是一条大川，后来人们认为今张掖河相当于弱水。如果这一认识不误，合黎山和流沙也就容易解释了。今合黎山在张掖西北，张掖河绕合黎山之西而北流，正和《禹贡》所说相符合。张掖河下入居延海，其周围皆为沙漠，也恰好可以解释所谓的流沙。因此，《禹贡》的作者对于雍州的西部，也就是后来的河西，虽然不能像对当时其他诸州那样的了若指掌，基本上还是相当明了的。因为这里当时可能还是从事游牧的族类所居，和内地诸侯称雄的局面不同。^②

《史记·五帝本纪》引《括地志》曰：“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水经注》卷八《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在《元和郡县图志》卷八中，唐代李吉甫这样认为：“三危山在（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清人常钧在其《敦煌杂钞》卷下《三危山》中说：“尚书孔

安国传，三危西裔之山，舜甯三苗于三危，禹贡三危既宅是也。隋志敦煌县有三危山，括地志山在沙州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都司志三危为敦煌望山，俗名升雨山，在今城东南三十里，三峰耸峙，如危欲坠，故名。”

敦煌的含义为何？它得名于什么？历来存在分歧，至今仍然未有定论。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员援汉族名称

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

李正宇先生根据《史记》、《汉书》等关于河西及敦煌的记载，认为“在敦煌建郡之前十余年已有敦煌之名，知敦煌一名原所固有。十余年后建郡，乃因原名而名郡。‘敦煌’一名尚属汉人取自土著民族，而当地古代民族更何由用汉语名其山曰‘三危’，名其地曰瓜州？”^③

据李先生研究，应该是汉朝占领敦煌后，见敦煌东南之山，顶有三峰，次第排列，遂将《舜典》、《禹贡》中的“三危”一名移置此山。自汉武帝建郡直到西汉末，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对此名呼之既久，乃习以为常，便以为敦煌“三危”即古之“三危”。除此之外，还有心理因素的作用。第一，出于当地人自矜乡土之情。人皆欲所生乡土为自古名区，求之古典，《舜典》、《禹贡》恰有“三危”，《左传》又有“瓜州”，于是就附会渲染，形成舆论，久之，便弄假成真了。第二，出于政治之需要。敦煌建郡之后，大批移民陆续迁来，而当地固有之匈奴、乌孙及羌人遗民及其文化传统受到排挤，民族矛盾继之而起。而被汉人赶走之匈

奴、羌人政权也常想赶走汉人，夺回故地。汉人则欺匈奴及羌戎无古典可稽，而自举出《尚书》、《左传》之“三危”、“瓜州”，以证敦煌早就属尧舜旧城，三苗顽嚚，不过谪居于此，地本属我，今物归原主，名正言顺；杜林之父杜邟，成帝哀帝间为凉州刺史，青年杜林随父尝居凉州，中年遭王莽之乱时，复与弟杜成再来凉州避难，熟知当地关于“三危”之新说。东汉初杜林返回长安，授徒讲学，使用在凉州的见闻来阐释三危、瓜州。班固注《汉书》时虽引其说，而云“杜林以为”，可知班固将其仅视作一家解经之言，不作定论也。

圆援少数民族语

对于敦煌的汉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日人藤田丰八在其《西域篇》考订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 ~~敦煌郡~~ 的译音，而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的音译。

刘光华先生认为，“敦煌”一名在汉武帝设置河西郡县以前很早就出现了。《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敦煌”和后来的敦煌县、敦煌郡无关，因为它反映的史实发生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而和“祁连”连用的“敦煌”，肯定不是指敦煌县、敦煌郡，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这个汉音写名的发明权或者就是属于张骞的。至于“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就无法知道了，所以应劭从汉语之字面意义上给予解释。

刘先生说，“敦煌”这一土名，虽然后来为汉朝郡县所沿用，但其所指地区的范围可能比日后的敦煌郡为大。河西走廊可分为三个自然区域，每个自然区域又与一个较大的内陆河流域相对应。今山丹境内的大黄山以东为武威、永昌平原，属石羊河流域；大黄山以西至今嘉峪关西的黑山为酒泉、张掖平原，属黑河

流域；黑山以西至今敦煌县西境为玉门、敦煌平原，属疏勒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应是古敦煌的范围。其土著居民沿河而牧，往返活动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上，故范围较大。而后来所建立的敦煌郡则为一政治区划，其范围指今玉门、敦煌平原之西部，即安西、敦煌两县境疏勒河以南地区，这是汉朝统治者从军事、政治需要出发而规划的行政建制，与该地区上古居民依自然山川河流劳动、生息，并作为其活动范围有所不同，前者较小，后者因任自然形势，故比较大。^④

施萍婷先生也认为，对于敦煌的解释，“少数民族语的可能性要大些。”^⑤

王宗维先生认为，“敦煌”是族名，它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即吐火罗的简译。在《“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⑥一文中认为，《山海经·北山经》、《水经注笺》卷二所记载的敦薨，其范围约当今巴龙台以南，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直至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往往有地从族名的习惯，说明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民族敦薨人在此活动，时间从《山海经》一书成书的年代推测，约在中原战国时期。

多数学者认为，西部吐火罗是从东方迁去的，也就是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曾是吐火罗人的根据地，当时吐火罗人就生活在这里。根据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人译边疆地区人名、地名、族名的习惯往往取两个字简译，省去其他音节，这样，吐火罗就在《山海经》中译为“敦薨”，《大宛列传》中译作“敦煌”。因此，敦煌一名在汉代以前作敦薨，都源于吐火罗一词的第一音节，也就是说，敦煌一名是吐火罗的简译。

另外，有的学者又提出敦煌为羌语译音。在《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⑦一文中，李得贤先生认为河西走廊的庄浪，今藏语义为野牛沟，张掖的原义是野牛之乡。他说：“敦煌之为羌语

译音，盖与庄浪、张掖、删丹等相同。我曾为此遍询深通藏语文的专家，他们根据我的提示和设想，最终由索南杰同志提出‘朵航’的对音来，这在现代的藏语中是‘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含义。”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即岑仲勉先生在《释桃花石（~~敦煌~~）^⑧》一文中提出的。岑先生从东罗马作家 ~~托勒密~~（约当我国隋代人，其著作成于公元 ~~五六~~ 年）以 ~~托勒密~~ 称我国，昆莫河诸碑亦以 ~~托勒密~~ 称我国说起，认为此二称“虽译写略异，然语源同一，世无异议。”而沿用期间计六百余年中见于汉译只一次，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云：“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从而认为“桃花石”为城名。从历史上看，敦煌不仅是中西交通之咽喉，而且是国际商业之集散地，它“握北门之锁钥者，最少可六百载，其历史如是久且要，外人叩关投止，因以初到之封境为称，渐乃变成国号，固自然而然之事实矣。”岑先生还将大月氏、靺鞨、桃花石名称字母进行排比研究，指出“敦煌”为译名，而 ~~托勒密~~ 为“敦煌”之对音。至于“敦煌”这个译名，“究本自大月氏语、匈奴语或其他中亚语，今不可知；东罗马、突厥、西亚之译名，其为间接本自我国之‘敦煌’，抑直接本于以上各语，今亦不可知，辗转重译，对音之不能十分吻合，无怪其然矣。”确定“敦煌”为译名，但未推定是何种语言语词。

钱伯泉在《“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⑨一文中，从另一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敦煌的汉族居民是设郡以后由内地迁徙去的，此前的居民应是少数民族。因此，若要正确解释“敦煌”这一地名的含义，必须研究汉朝以前敦煌的土著居民。

早在商朝，渭水流域及其以西，都是氐人和羌人的居地。周族刚刚兴起时，曾经长期居住在戎狄之间。“戎狄”的“狄”，就是“氐”的异译，氐、狄实际上是指同一种类的北方民族。可见

周族兴起时，渭水以北是氐人（即狄人）的势力范围。

周人所说的“鬼戎”，商族称之为“鬼方”，其族的首领又自称“翟王”，“翟”是狄、氐的异译，可见鬼方、鬼戎实际上指的是“狄人”，又译作“氐人”，有时又被称为“戎人”。他们原是我国北方与中原农业民族最为接近的游牧民族。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在汉朝以前，他们大致居住在渭水和祁连山以北，他们的南方则是羌人的居住区。

后来，在戎狄与秦人的交战过程中，它们或归服于秦国，或西迁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阿尔金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内外。到了汉朝，河西地区便有许多以氐人命名的地区，例如张掖郡的“氐池”，敦煌郡的“氐置水”等。其中氐置水与敦煌的地名有着重要的关系。《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曰：“龙勒县，有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氐置水即今党河，“置”是“邮置”的简称，古代凡是用骑马的形式递送公文和信件的驿站，称之为“置”，汉朝又称为“骑置”。早在汉武帝统治的中期，这种骑置已设到西域的鄯善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西汉在敦煌设立郡县时，因为党河流域居住着氐人，又在河边设有骑置，所以称今党河为“氐置水”。

另外，钱伯泉先生还从音义的角度考证，姜姓、允姓之戎所居瓜州，本在姜水、雍水流域，今陕西凤翔一带。后姜、允之戎为周所迫，向西迁徙，至于敦煌。于是将“瓜州”旧名带到敦煌。同时，《禹贡》之“惇物”，《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武功县注之“敦物”即敦煌。

獫狁与希腊人有关

1981年，海风的《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⑩一文，对“敦煌”一词系匈奴语译音提出了异议，认为“敦煌”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因为历史文献

记载的大夏国，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塞种人或塞人世居于敦煌。据此可知，“希腊人是早于匈奴人在敦煌驻足的。因此敦煌这个地名的由来或与希腊人有关，而很难说是匈奴语的译音。”

与此相反，王翼青先生则认为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因为海风先生的说法有一个关键性错误，即将 ~~塞种人~~ 当作希腊人的一支。实际上，~~塞种人~~ 是从公元七世纪起活动于里海、咸海、锡尔河以北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我国译作西徐亚人、塞西安人、斯基泰人等，相当于古波斯文献中的 ~~塞种人~~ 和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塞种”或“塞人”。这个游牧民族实际上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许多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西起地中海东岸，东至我国西北地区，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后，以锡尔河为界与西徐亚人相邻。西徐亚人既不和希腊人同族，又不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臣民，在希腊人和西徐亚人之间不能划等号。正“因为西徐亚人不等于希腊人，所以汉代以前曾世居敦煌的塞种（即西徐亚人）也绝不是希腊人。‘敦煌’一名的来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与希腊人无关。”^⑪

关于“敦煌”二字的释名，李正宇先生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但根据目前占有的资料，我们认为敦煌一名，应该是少数民族语。因为在史籍记载中，敦煌与祁连是同时出现的。而“祁连”已确知是少数民族语。《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说：“昆莫父难兜靡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书·西域传》也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祁连”一词，颜师古注《汉书》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⑫司马贞《史记索引》引“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⑬。”既然“祁连”是少数民族语，那么与祁连相提并论的“敦煌”也可能是少数民族语。

二、汉代对敦煌的开拓与经营

从战国到秦，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为强大。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⑭故到了秦汉之际，活动在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的则主要是月氏和乌孙了。

员援汉代对敦煌的开拓

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河西的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占据河西及西域后，除在占领区征收赋税外，还严重地破坏和阻塞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威胁着汉朝的安全。但是，由于西汉初期汉帝国的社会经济极端残破，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因此其国势十分虚弱，无力抵御匈奴的进攻，从而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

然而，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经常侵汉边郡，杀掠人民。“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⑮“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⑯

西汉王朝在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至武帝即位之时，国力已很充实。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及经过文、景的削藩和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后，中原割据势力和大商贾的势力都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中央集权已大大加强和巩固。这样，西汉王朝就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来反击匈奴了。武帝采纳抗战派大臣的主张，开始了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 员藏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匈战争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到战争的转折点。汉对匈奴的反击战争主

要是公元前 151 年的河南之战、前 151 年的河西之战和前 151 年的漠北之战。经过河南之战，收复了“河南地”；经过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①⑦}

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51 年），青年将领霍去病率轻骑万人由陇西出发作尝试性的进攻。霍去病的具体进军路线，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因为“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①⑧}因此其进军路线既不能深入羌中与强大的西羌相遇，遭其阻击；又不能接近匈奴本部，惊动匈奴主力，陷入重围，不能自拔。当时霍去病只能在匈奴统治势力薄弱和接近西羌本部的边沿地区，即两大势力的结合部穿行而过，这样才能迅速到达河西浑邪、休屠部地，达到轻骑出击的目的。

据《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决定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以便彻底打败匈奴在河西的势力，控制河西，保护中西交通。据《汉书》记载，元狩二年夏天，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①⑨}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又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霍去病在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影响十分巨大。《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慙惜乃如此。”

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中连遭两次打击，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而匈奴单于又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②①}他们派人和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即告中央。“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

之。”^{②①}这时，休屠王反悔，不愿降汉，浑邪王杀了他，并收编了他的部众；霍去病也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匈奴降汉者“凡四万余人，号十万。”^{②②}接着霍去病派人护送浑邪王到长安，受到了汉武帝的隆重接待，武帝并封浑邪王与其亲信数人为侯。汉政府把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圆爰设置郡县行政区

敦煌地区归入汉的版图后，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开发敦煌，保护中西交通，便在敦煌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敦煌郡县的设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敦煌建郡的年代，《汉书》的记载就不一致，《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而《汉书·地理志》则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和考古新资料，对敦煌郡的设置时间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结论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夙）向达、张维华、周振鹤诸先生主张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 夙夙年）；^{②③}（圆）陈梦家先生主张建于元封四、五年间（公元前 夙夙年 夙夙年）；^{②④}（猗）吴弼驤、余尧先生主张建于元封五、六年间；^{②⑤}（源）劳干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四年（公元前 夙夙年）或稍后；^{②⑥}（缘）张春树先生主张建于天汉三年（公元前 怨愿年）；^{②⑦}（远）黄文弼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元年（公元前 夙夙年）；^{②⑧}（苑）方诗铭先生主张建于天汉二、三年后至征和二年（公元前 怨愿年）以前^{②⑨}；（愿）刘光华、王宗维先生主建

于后元元年（公元前 86 年）。^{③④}

我们认为，汉代于西北边塞凡有设置，或与重大军事行动有关，或属交通方面之必需。^{③⑤}如置酒泉郡以通西北诸国，设武威、张掖郡以隔羌胡交通。敦煌郡的设置，则与李广利伐大宛有密切关系。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③⑥}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宛失利，乃“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③⑦}李广利伐大宛为汉代出兵西域之第一次，后方必有布置，此时设置敦煌郡，既可以备军事之转输，又有利于中西交通。李广利第一次出兵伐宛在太初元年，太初二年留兵敦煌，而敦煌之名亦出现于此时。因此我们认为，敦煌郡的设置可能也在此时。

敦煌郡，再加上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就是一般所说的“河西四郡”。

汉代的敦煌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共统辖六个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当时的敦煌郡，包括今敦煌市、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兹将这六个县的具体所在分述如下：

敦煌县：郡县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常钧《敦煌杂钞》卷二沙州卫：“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冲，圯其东面。雍正三年，于故城东另筑卫城。”吕少卿《重修敦煌县志》说：“城在县西里许，滨临党河西岸，遗址尚存。其西北一角，高犹数丈。”可知现在的敦煌城在党河东面，是清代雍正三年（1726 年）所建，非汉代之敦煌县。

冥安县：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冥安以冥水得名。《元和郡

县图志》卷源载：“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即今疏勒河。其“故城疑在今小湾、双塔堡、布隆吉等处。”^{③④}据调查，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③⑤}

效谷县：敦煌遗书《敦煌录》：“效谷城本是渔泽，汉孝□帝时，崔不意教人力田得谷，因名，后为县。”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渔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其确切方位，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说：“古效谷城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据有的学者考证，位于今敦煌城东北二十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效谷城。^{③⑥}

渊泉县：因“地多泉水故以为名。”东汉时改为拼泉。《辛卯侍行记》卷缘“章怀太子注后汉张奂传云，故城在瓜州晋昌县东北，当在今州东四道沟、柳沟堡诸处。”约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

广至县：今安西县南踏实乡破城子一带。《太平寰宇记》卷源载：“常乐县，本汉广至县地……汉广至故城在今西北。”《辛卯侍行记》卷缘“北魏改大至，唐改常乐，……踏实盖大至之转音……按今踏实西北二十里有破城子，殆即汉广至。而章怀注盖勋传云，广至在常乐东，今谓之悬泉堡。”

龙勒县：即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因县南源里有龙勒山而得名。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曰：“龙勒山，县南百八十里，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龙勒，即唐代的寿昌县。《元和郡县图志》卷源载：“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因山为名。……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据调查，寿昌海，即今黄水坝水库。其

北约五公里，有一古城遗址，现遗址大半埋于沙丘中。很可能这一遗址，就是唐代寿昌城故址，也即汉龙勒县城。^⑦

犍援建立军事防御体系

河西归汉后，汉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军事防御体系便是其重要的举措之一。

第一，河西的汉长城

自从河西归入汉的版图后，西汉王朝为了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便修筑了其安全防御线——长城。

河西长城是随着边防形势的变化在几个不同时期分段修筑而成的。

令居以西至酒泉：汉筑令居以西之边塞，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元狩二年（公元前 111 年），霍去病在河西之战中打败了匈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降汉，汉始有河西之地。故知令居以西至酒泉长城的修筑，是元狩二年以后之事。

酒泉至玉门间：酒泉至玉门间这段长城，是在赵破奴、王恢破楼兰、姑师以后修筑的。按赵破奴与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事在元封五年，而《史记》记酒泉至玉门的长城之修筑，与此事并述，可知酒泉至玉门的长城，筑于元封五年。

敦煌至盐泽间：敦煌至盐泽间这段长城，是李广利伐大宛以后修筑的。《史记·大宛列传》云：“汉已伐宛，……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这里所说的盐水，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之罗布泊（又称蒲昌海）。汉自敦煌至罗布泊所筑长城，是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而李广利伐大宛，始于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终于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可知，此段长城的修筑，当在天汉年间（公元前 100 年—前 97 年）或稍

后。

以上只是河西主要的几段长城建筑情况，而整个长城防御线的修筑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公元前 111 年，汉朝收复“河南地”后，置朔方、五原郡，移民垦荒，并将秦时沿黄河的长城加以修整，这是汉武帝第一次大规模的对边防设施的加工；公元前 103 年，汉收复河西后，便把长城由朔方沿黄河往河西延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随后，汉朝政府又将长城从令居分段向西延长到玉门，所谓“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⑧以后随着匈奴势力的不断向西转移，汉朝也相应地加强了西北边防。公元前 91 年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后，汉王朝又把长城延伸到了盐泽。《汉书·西域传》曰：“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这就是河西走廊以北东西长达千余公里的边塞防御线——长城。

第二，汉代的烽燧亭障

长城在汉代又称为“塞”，由每隔五公里左右的小城堡联着，小城堡设有发放警报的“烽台”，称为“亭”或“燧”，这些小城堡按其大小派驻着几十名到一二百名戍卒，由“候长”、“燧长”管理。隔若干个“燧”有一个较大的城，叫作“障”，由“候官”统率。各候官又由都尉统率，都尉住在更大的城堡里，即郡城或县城，以故“亭”、“障”往往连用，代表着长城的防御工事。

驻在亭障的士兵要密切注视敌情，称为“斥候”，有警要放出信号，称“烽燧”。驻在亭障的戍卒，也要开垦田地，疏通水利。他们保卫着我国古代西北边疆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戍卒是征发农民中的丁壮组成的。汉制：从 16 岁至 56 岁的男子都是丁壮，他们必须先受一年的军事训练，而后还要赴边塞当一年戍卒，叫作“正卒”。边境郡县的正卒，军事训练和戍边都在边郡；内地郡县的正卒服戍边徭役时，才来边郡。

关于汉代的烽燧制度，《汉书·贾谊传》曰：“斥候（候伺）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文颖注云：“边方备胡寇作高

土橧（橧为无顶之屋），橧上作桔皋，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张晏注云：“昼举烽，夜燔燧也”。从此可以看出汉代的烽燧情形。

关于报警的信号，一是烽表，即用红布和白布缝成帆状物。在敌人入侵时，则悬挂在亭障的高竿上，按侵入者的多少、远近而增减数量，一燧挂烽，他燧照传；二是烽烟，即焚薪取烟，亭障上有烟筒，焚薪之烟通过烟筒直上天空，白天易于被远处望见，这是情况紧急时的信号；三是苜火，夜间通报情况用燃苜火取代烽表。这是将点燃的苇束，悬上高竿，也按侵入者多少、远近而增减数量；四是积薪，积薪是叠积在亭燧附近的大草垛。无论昼夜，最紧急的警报就是焚烧积薪。

以上所举四种报警信号，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汉代发放警报信号是有制度规定的，即“烽火品约”。具体规定较为复杂，这里就不谈了。

总之，汉代的烽燧亭障，实际上是军事防御线上设立的军事通讯哨所。自从烽燧制度建立后，由于“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③它为保卫河西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丝绸之路”上的来往使者、商贾们的安全，起着重大作用。

第三，建立邮驿——悬泉置

悬泉置是以地名名置者。所谓“悬泉”，是瀑布的一种名称。悬泉置所在地的悬泉，在今甘肃省西部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龙勒山上，距离两地均约有 100 余公里。悬泉下泻之水成为小河，名悬泉水，细流约一里许，潜入地下。

“置”是一种邮驿名称。在古代，步递曰邮，马递曰置。汉武帝设在悬泉附近的邮驿名“悬泉置”，是以马递为主的邮驿。

悬泉置设立的时间约在汉武帝对西域用兵的过程中。具体地

说，是在李广利西伐大宛获胜归来之后。

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是在太初元年（前 102 年），次年即大败而归。他在屯兵敦煌一带时，为解决饮水问题，发现了悬泉。《汉书·李广利传》载，李广利伐大宛，至半途已死伤惨重，被迫退归。“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十一二”。《西凉异物志》：“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利]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④①}

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是在太初三年（前 100 年），次年春，攻破大宛，广利凯旋而归。《西域传·序》：自此“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从此时开始，自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日益繁忙起来，为军事和政治服务的正规邮驿开始设立，其中包括了悬泉置的设立。由此可知，悬泉置设立的时间，应在太初四年至太始元年（前 98—前 90 年）之间。

悬泉置的行政级别相当于县级。在汉代，置不同于一般邮亭，而往往设立于两个相邻的县界上，作为重要的中转邮驿，因之其机构较大，级别较高。东汉应劭曰：“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④②}从出土汉简可知，大致是设于县城的邮驿称传舍，设于县界的邮驿称置。两县城之间相距不足百里者，中间不设置。两县城间相距在百里以上者，设置于两县界上。如酒泉郡的玉门西至沙州 80 里，中不设置；张掖郡的昭武至酒泉郡的表是 100 里，中设祁连置。^{④③}

源缘移民实边与河西屯田

第一，移民实边

河西原有居民是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族，匈奴占领河西后，主要是匈奴族人，就是在河西之战后，虽然故浑邪王地空无

人，但“空无人”并不意味着没有匈奴人及其他族人，只不过人数大大减少罢了。在本地人口不多的情况下，要设置郡县，加强河西边防，就必须从内地大量向河西地区移民。

向河西地区移民的对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其中的“关东下贫”，是绝对多数。“下贫”，就是指生活无着的农民，如元狩年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廩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④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政府“振”、“贷”都不能解决饥乏的情况下进行的，迁徙对象就是“下贫”。上面所说的“报怨过当”，就是刑事犯罪者。“背逆亡道”就是犯有叛逆罪的政治犯，这些因犯法而被迁徙的对象，也不在少数。如武帝时附和戾太子之乱的官吏、士卒，都被迁徙至敦煌郡；西汉还有所谓减死戍边的法律。当然，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到河西的，也有一些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在屯戍边县，并把家室接到其地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也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强制迁徙到了河西。

向河西地区移民，主要是在汉武帝时代。具体年代，据《汉书》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④这个“边”，可能包括河西地区在内；《资治通鉴》记载：武帝“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武帝以后，向河西的移民仍然不断。这些被迁徙的人民，屯田河西，为巩固、保卫边防作出了贡献。

汉武帝的徙民措施，直接改变着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通过徙民，使河西地区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有 25 万户，125 万多人。

从历史上看，移民实边从来就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措施，而

是作为一项以巩固边防为主，包含政治、经济内容的综合性措施，汉代向河西的移民也是如此。它为加强边防，防御匈奴入侵，发挥了重大作用，并随之将汉王朝内地实行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推行到了河西。因此我们说，向河西移民及设置郡县，是把当时内地行之有效的封建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推行到河西，从而表明河西进入了封建制。

第二，河西屯田

随着河西设郡，内地徙民源源而来。移民初期，“衣食皆仰给县官”。除徙民之外，河西地区还驻有大量的戍卒和战斗部队。徙民、戍卒与战斗部队的数量既然很庞大，则对粮食的需要量也势必增大。因此，解决河西地区军民的粮食供应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如果河西地区所需粮食不由当地生产，就必须从内地长途转输，这就需要国家付出很高的运价。因此发展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就成为建郡后的重要任务了。

在河西地区发展农业，有着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从客观方面来说，河西以南的祁连山中有广大的冰川积雪，是一个天然水库，冰雪消融能供给走廊农业和畜牧业足够的水，同时畜牧业的兴盛，又有足够的畜力用于农业生产。

从主观方面来说，由于有大量的徙民和戍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大批的徙民和戍卒，都是内地农业区的农民。他们到了河西，当然就把内地先进的耕作经验和技術带到了河西。汉武帝末年，赵过的代田法，就曾在“边郡及居延城（韦昭注，张掖县也）”推行，“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④

同时西汉政府对盐铁实行专卖，又保证了国家给生产者提供必须的铁农具；汉王朝还在河西地区大兴水利。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居延汉简记载，居延一带的许多亭隧如甲渠、临渠、水门、广渠、肩水

等，都是由水渠而命名的。在居延屯田的田卒中，就有一种专门从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这都说明了汉政府对水利的重视。

西汉“屯田”的名称虽然始于桑弘羊轮台以东《屯田奏》，但屯田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却不限于西域。关于河西屯田，《汉书·匈奴传》曰：“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平准书》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在汉简里，也可以看到屯田的种种记录，如“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驛马田官写泾渠，乃正月己酉淮阳郡”。^{④⑤}这种戍田卒，就是戍卒中的专门屯田生产者。

屯田是且田且守，亦兵亦农，军事活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措施。戍边是汉代农民负担的徭役之一，每个成年人都必须负担戍边徭役，因此汉政府便以征发戍卒的名义，把大批的农民调发到边疆及新占领的地区戍守或田耕。在屯田的名义下，他们一方面守边，一方面垦田种植，而且大部分戍卒是从事屯田。

屯田的戍卒都有一定的期限，一般是一年，到期就遣归故里。可是边郡人屯戍的时间比内地人长，因为内地人还要在本郡服一年正卒，边郡人正卒和戍卒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之这两种徭役就归并在一起执行了。

汉代在边郡的屯田规模很大，为了便于管理屯田事宜，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

屯田的组织，见于史书和汉简记载的，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候农令、劝农掾、仓长、仓左、仓曹史。而具体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的戍卒则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河渠卒等。

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边防给养，供应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而且还可向市场出售，以资调节。居延简载：“棗粟四千石，请告入县官，贵市平价，石六千得利二万四千”。^{④⑦}同时，当内地发生灾害时，还可以调拨边郡屯田积谷以救

内地之灾。可见，河西屯田对当时的国家财政和经济起了一定的良好作用。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河西屯田就其组织形式看，虽然是军事性质的，但就其直接目的来看，首先是为了巩固边防，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的困难和扩大国家直接控制的耕地面积。然而从屯田的结果来看，却使封建生产方式在河西得以推行。因为汉代的地租形态，除实物地租以外还有劳役地租，而且在几种不同名义的徭役下，劳役地租实际上是很重的。为了把这种既有的封建剥削制度在新辟的河西地区推行，就产生了以戍卒这一徭役为中心内容的屯田制度，可见屯田实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一种力役地租剥削形式。因之，屯田制在河西的推行也就是河西封建化的过程。

总之，汉代的屯田活动作为一项重要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屯田生产使得边郡粮库充足，这就大大减轻了国家组织的由内地向边塞运输粮食的沉重负担；田卒本身既是整个戍卒的组成部分，就使得汉王朝戍边的力量大大加强。如武帝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也只有在屯田的情况下，才能在边郡驻守这么多的部队；屯田活动既解决了边郡的粮草，也解决了边塞的武备，这就遏制了匈奴奴隶主骑兵的掠夺，《汉书·匈奴传》说昭帝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三、华戎所交一都会

——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敦煌佛教艺术，乃是东传的佛教在一个具有成熟的封建文化的地方的特有产物，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宗教刺激下出现的新形态。因此敦煌艺术的特点，就在于其地理条件的特殊，使它

具有一些个性鲜明的差异，从而显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④⑧}

敦煌艺术，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只有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才能正确阐述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员援学术文化的发展

由于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都偏处西北，远离中原，因而能避免诸如“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那样的兵祸之灾，保持境内长期安定的环境。正是由于河西比较稳定，使大量避难百姓流亡到此，发展了河西的经济和生产，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不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中部地区）地区的人前往河西。《后汉书·孔奋列传》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绿林军入关后，更始帝委派窦融去河北任巨鹿太守，为融谢绝，提出愿意去河西。《后汉书·窦融列传》说：“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从以上记载可知，孔奋因天下扰乱，想找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侍奉老母，遂选中了“独安”的河西；而窦融则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考虑，认为河西殷富，兵精粮足，地势险要，是乱世“自守”、“遗种”之地。

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后，凭借其祖弟“累世在河西”任职的声望，广泛结交地方官吏，联络周边羌胡民族，使“河西翕

然归之。”他和酒泉太守梁统、敦煌都尉辛彤、张掖都尉史苞、金城太守库钧、酒泉都尉竺曾等人“皆与为厚善”，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共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在他统治下的河西，“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④。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河西的确是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对据有“河西完富，地接陇蜀”的窦融也很重视，特“赐融玺书”，并“授融为凉州牧。”自此，窦融及所控制的河西地区遂归附了东汉。

曹魏统一北方之初，无暇顾及河西，到魏文帝曹丕时期，便派尹奉为敦煌太守，随后，又由仓慈继尹奉为敦煌太守。当时，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兼并土地，压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便采取措施，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从而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嚣张气焰。

另外，由于仓慈处事公平，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并鼓励胡汉通婚，从而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也有利于敦煌社会的稳定。同时，仓慈还鼓励百姓开垦荒田和从事贸易，对来敦煌贸易的西域胡商，给予多方优待，并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若胡商想去内地贸易，还及时给他们发给过所（通行证）。这些措施，得到了当地百姓和西域胡商的欢迎，也促进了敦煌贸易的发展，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

仓慈以后，王迁、赵基、皇甫隆先后任敦煌太守。皇甫隆在位时期（~~公元一四四年~~—~~公元一四五年~~），改变了敦煌妇女在穿衣方面的落后习俗，并在敦煌推广了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有利于敦煌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各民族统治者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历史进入了十六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张

氏（~~猗~~—~~猗~~年）、前秦苻氏（~~猗~~—~~猗~~年）、后凉吕氏（~~猗~~—~~猗~~年）、西凉李氏（~~源~~—~~源~~年）和北凉沮渠氏（~~源~~—~~源~~年）等五个政权。

前凉政权占据敦煌后，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张骏于公元~~猗~~年将敦煌、晋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合并为沙州，州治设在敦煌，任命杨宣为沙州刺史。杨宣在任期间，组织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如当时敦煌北部的北府渠年年被水冲坏，杨宣使用自家的储粮购买石头修治，把斗门都改成了石制结构。另如甘泉水（今党河）河槽下降，影响了敦煌南部的中渠灌溉效益，杨宣便组织人力对中渠进行了全面修整，从而使中渠的灌溉面积大大增加，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杨宣，就将中渠更名为阳（杨）开渠。阴澹任敦煌太守时期，也组织人力修建了一条~~苑~~里长的水渠，可将州城西南的水引至西北的水渠，灌溉城西的大片土地，使这一地区的百姓受益不少，安居乐业，故被称为阴安渠。

前秦时期，为经营西域，便于~~猗~~年派吕光进军龟兹。为了巩固后方基地敦煌，苻坚于~~猗~~年将江汉、中原百姓~~猗~~万余户迁到敦煌。同年，吕光率兵返回河西，随后建立了后凉。孟敏任后凉敦煌太守时期，继续兴修水利。他在州城西南修了一条水渠，引甘泉水灌溉农田，被受宜百姓称为孟授渠。当~~猗~~年后凉发生内乱时，武威、张掖等地的数千户百姓也逃到了敦煌和晋昌。

公元~~源~~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建立了西凉，敦煌第一次成了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西凉政权统治敦煌时期，建立了县、乡、里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并鼓励生产，使这里出现了五谷丰收，百姓乐业的景象。

公元~~源~~年，李暠为了全力对付东方的强敌北凉，决定迁都酒泉。与此同时，李暠还将苻坚时从江汉、中原迁来的民户、后

凉内乱时从武威、张掖逃来的民户，都从敦煌迁到了酒泉，这就大大削弱了敦煌的力量。再加上西凉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敦煌失去了其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因此当 源茂年李暠去世后，敦煌就更加衰败了。源泰年，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北凉的进攻、屠杀，使敦煌再受重创。源魏年，北魏拓跋焘攻克北凉都城姑臧，北凉灭亡。但沮渠氏的残余力量在沙州刺史沮渠无讳的率领下，仍坚持抗击魏军，直到 源固年，才率众放弃敦煌逃往西域。

沮渠无讳逃离敦煌后，西凉李暠的孙子李宝便趁机返回，并派其弟李怀达为使向北魏投降。北魏就任命李怀达为敦煌太守，封李宝为镇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源源年，李宝被北魏召往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直接控制了敦煌。

北魏控制敦煌后，仍将其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并逐渐攻破了鄯善、焉耆和龟兹，使西域的大部分都为北魏所控制，丝绸之路再次打通，西域商人纷纷前来贸易。

但好景不长，因此时柔然已日益强大，并与北魏争夺西域与河西。当柔然占领西域的一些地区后，敦煌便成了前沿阵地。对此，北魏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于 源源年便动议放弃敦煌，把边界后撤到凉州。给事中韩秀坚持保卫敦煌，否则不但凉州难以设防，就是关中恐怕也就不安宁了。韩秀的意见得到魏孝文帝的支持，敦煌不仅得以保全，而且还加强了敦煌镇的守备。

公元 缘源年，孝明帝下令改镇为州，敦煌镇因盛产美瓜，故改为瓜州。北魏为加强对瓜州的统治，于 缘缘年派明元帝的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缘缘年，元荣被封为东阳王。这时，由于爆发了关陇起义，阻断了瓜州与中原的联系。缘缘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河西属西魏，元荣又成为西魏的瓜州刺史。元荣坐镇敦煌近 圆年，直到 缘缘年去世。

北周取代西魏后，继续在敦煌设置瓜州。据《周书》记载，

韦瑱、李贤曾为瓜州刺史。尤其是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时（约缘缘—缘元年），十分崇信佛教，开展了修窟造像的活动。正如武周圣历碑所记“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乐傳、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也正是在东阳王、建平公等敦煌地方长官的带动下，莫高窟的开窟造像之风才兴盛起来。^{⑤①}

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的繁荣，是学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和土壤。

公元四世纪初，西晋王朝在经过“八王之乱”以后，遂出现了北方十六国的大分裂、大混乱。在中原扰攘不堪时，河西却比较安定，这里不仅是内地流民的避难所，而且其文化亦很繁荣。张轨所建立的前凉政权，大量依靠敦煌人士如宋配、阴充、阴澹、氾瑗等为其运筹。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帮助、辅佐，才使河西的生产有了发展，人口有所增加，也使张轨能“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在当时北方大混乱的情况下，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却大放异彩，它不仅保存了汉晋传统，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

汉晋时代，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士和能工巧匠，并将传统文化继承、保存了下来。这主要是河西地区稳定的结果。我们知道，整个十六国时代，北方处于战火弥漫、干戈不息的混乱局势下，而河西地区则“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⑤②}因此，“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⑤③}永嘉之乱时，京城士大夫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建兴之乱后，晋王司马保败亡，“其众散亡凉州者万余人。”^{⑤④}正是由于大量士庶避居河西，使河西的文人学士大为增加，并对保留中原先进文化及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

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⑤4}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个原因。另外，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定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这就给本来“多士”的凉州，扩大了“士”的范围。^{⑤5}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氾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术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存、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⑤6}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五凉统治者大都重视学术文化，遂使河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并一跃而为北方文化中心。

在河西地区的文人学士中，敦煌儒士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学术成就上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如郭瑀、刘昞、索敞、索袭、索统、索绥、张穆、张斌、张湛、宋繇、宋纤、氾腾、阚骃等，都是很有成就的敦煌学士。刘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

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⑤7} 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⑤8} 宋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⑤9} 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⑥0} 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⑥1} 宋繇“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⑥2}

河西，尤其是敦煌的文人学士，不但自己的学术成就大，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如酒泉人祁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还征拜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⑥3} 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⑥4} 郭瑀专事著书授业，著录弟子千余人；刘昉也曾开设私馆，接纳弟子五百人。^{⑥5}

河西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提倡有密切的关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⑥6} 并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求学，形成风气；西凉主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⑥7} 广泛地吸收文人学士，在文化事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刘昉一生著述颇丰，这与李暠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河西地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并在文化、教育上有重大影

响的文士学人，差不多都出自敦煌。敦煌儒士在河西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敦煌文化的历史高度。陈垣先生曾经指出：“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⑧可以说，没有汉魏以来敦煌文化的发展，便不可能孕育出像刘昫这样的儒学大师。而一些退隐或隐居的知识分子能够离开中原地区的物质文明，来到敦煌和河西各地，固然有当时政治上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的敦煌已具有了他们从事著述和讲学的物质条件。而这些都说明，汉晋文化传统在河西，尤其是在敦煌已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不仅继承了汉晋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渐趋成熟。敦煌佛教艺术，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圆爰佛教活动的兴盛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但佛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河西地区，佛教更为流行，并对南北朝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

河西地区，尤其是敦煌佛教的兴盛，固然是由于敦煌乃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我国汉族聚居区最先接触佛教的地方，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很大关系。东汉以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十六国战乱时期，政权更迭无常，统治者不仅需要寻求新的思想武器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而且其本身也需要自我麻醉，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而广大的劳动人民更是灾难深重，苦海无边，为祈求来生的幸福，便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佛教经过汉魏长时期的传播、发展，已逐渐与儒家思

想融合，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佛教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学习、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解释佛教教义，宣扬忠孝观念。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佛学遂成为河西文化的重要内容。举世闻名的敦煌佛教艺术，就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兴盛和发展繁荣起来的。

河西地区佛教的兴盛，首先表现在译经方面。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河西地区出现了不少的高僧，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与朱士行、法显一样，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了贡献。

早在西晋时期，河西地区的佛经翻译就很负盛名，如大翻译家竺法护通晓多种语言，世居敦煌，并组织了自己的译场，号称敦煌菩萨。据记载：“太康五年（~~西晋~~魏元），罽宾文士侯征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煌，月支竺法护究天竺语，又畅晋言，于此相值共演之。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法乘、月支法宝”^⑥“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知闻”。^⑦这些经记把当时敦煌的译经活动与佛教的流布情况反映得十分具体，《开元录》载其译经共 ~~六百~~ 部，~~一百~~ 卷，乃“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⑧者。

昙无讖也是一个有名的翻译家。他曾由中印度去罽宾，辗转龟兹、鄯善到敦煌。北凉攻灭西凉后，昙无讖来到姑臧，沮渠蒙逊对他“接待甚厚”。昙无讖在敦煌时就熟悉了汉语，在姑臧又积极学习。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就开始了译经工作。在译经过程中，有道俗数百人参加，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独有讖“临机释滞，清辩若流”。^⑨再加上他的文字修养很好，故其翻译工作

完成得十分出色。由昙无讖翻译的佛经共有 15 部，即《大般涅槃经》7 卷；《悲华经》1 卷；《金光明经》3 卷；《海龙王经》1 卷；《菩萨地持经》1 卷；《菩萨戒本》1 卷；《方等王虚空藏经》1 卷；《方等大集经》1 卷；《方等大云经》1 卷；《优婆塞戒》1 卷；《菩萨戒优婆塞坛文》1 卷。

昙无讖早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喜其义理，于是专攻大乘。因此，他翻译的这 15 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在这 15 部译经中，以《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讖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讖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惟恨胡本分离残缺未备耳”。^⑦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⑧

从以上叙述可知，河西的佛经翻译是很活跃的。但译者多为西域高僧，由于语言上的隔阂，所译佛经有的纯属意译，不免失去原意；有的则纯属直译，难以读通，有碍于对经文原意的理解。即使像竺法护、昙无讖、鸠摩罗什这样的高手，上述缺陷也难以避免。在佛教著作《出三藏记集》中就透露了早期佛经翻译的困难。在该书卷 1 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道安法师说，将佛经从胡语译为秦（汉）语有“五失本”：“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

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⑦⑤}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许多附有梵文原经的汉译佛经，可以利用它们纠正或补充古译本在译文上的缺点和不足。

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兴盛，还表现在开窟建寺的活动十分活跃。石窟寺是佛教活动的标志，早期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课之一是坐禅，即在石窟中静坐苦修，摒除杂念，一心向佛，以求解脱。据说只有在生前不断地坐禅苦修，才能渐渐达到寂灭的境界，死后升入天堂。因此石窟寺一般都建在远离闹市的幽僻山林中，并往往还有佛塔、佛像，以供修禅者一面观像，一面礼佛，最终达到超俗出世的境界。^{⑦⑥}

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高僧传·昙摩蜜多传》说：“昙摩蜜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下迨宋元，但其开寺建窟之始，却在十六国时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犍元年），有沙门乐傅，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⑦⑦}从早期佛教在敦煌传播的历史看，僧人崇尚开寺建窟，静坐修禅，因此选择了鸣沙山下这片流水潏洄，草木葱郁的沙漠绿洲。由于它既远离闹市，又能得到人间烟火的供应，在这

里凿窟修禅，的确是很理想的。

敦煌佛教艺术之花的绽开

敦煌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在汉末的军阀割据斗争中，敦煌由于豪族大姓的控制，相对平安。但豪强大族的兼并却愈演愈烈。三国魏明帝时期，仓慈任敦煌太守（~~公元238—248年~~）时，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西域各国商胡提供了种种方便，如签发“过所”、派人护送等，从而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都会。魏齐王时期，皇甫隆任敦煌太守（~~公元281—289年~~），他改变落后的耕作方式和穿衣习俗，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敦煌又成为丝绸路上的一处重要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地。西晋泰始十一年（~~公元271年~~）令狐丰在敦煌修建储存军粮的大型仓城——河仓城（今大方盘城），反映了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进步。由斯坦因发现的粟特商人写给康国他家乡的一封书信，据认为是西晋末年的写本，其中记载了中亚粟特商胡从敦煌前往金城（兰州）销售大麻织物和毛毡的情况，揭示了敦煌商业兴盛的景象。

敦煌佛教艺术，正是当时历史、文化的产物。早在西晋时，就有月氏后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布道。前凉时，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又在敦煌修习禅法。到了前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便在鸣沙山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敦煌佛教艺术之花从此绽开。乐僔所开之窟，现在虽无从考证，但通过对早期洞窟的比较、分析，仍能找到一组十六国晚期的石窟，如第~~四三六~~ ~~四三九~~ ~~四四一~~ ~~四四二~~ ~~四四三~~ ~~四四四~~等窟。

五世纪中叶北魏占领敦煌后，曾设敦煌镇。明帝时将敦煌镇改为瓜州，后又改为义州。庄帝即位（~~公元528年~~）后，又改为瓜州，西魏、北周因之未改。

北魏宗室元荣任敦煌太守后，被封为东阳王。在他统治敦煌

的二十年间，莫高窟的开洞建龕，都与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北魏分裂后，敦煌先后为西魏、北周所有。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曾任瓜州刺史。他和东阳王元荣一样，都为敦煌地区带去了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为莫高窟的修建做出了贡献。武周圣历碑在叙述了乐僔、法良之后说：“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根据敦煌研究院的排年整理，北魏时期的洞窟共 15 个，如第 285 窟、287 窟、289 窟、290 窟、291 窟、292 窟、293 窟、294 窟、295 窟等窟。这一时期的主要窟形为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或叫“支提”）窟。壁画多以佛本生故事和千佛为主要题材。北周时期的洞窟共 10 个，如第 401 窟、403 窟、405 窟、407 窟等窟。这一时期的壁画内容首次出现了讲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

早期的莫高窟艺术，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其艺术风格也各具特点。十六国及北魏前期，内容简单，造型朴拙，色彩淳厚，线条苍劲，人物比例适度，面相丰圆，神情庄静恬淡。在衣冠服饰上还保留着西域和印度、波斯的风习。加上凹凸晕染法所形成的立体感和土红地色所形成的温暖浑厚的色调，形成了与魏晋艺术迥然不同的静的境界和形式风格，这种风格明显地受到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因而可称为西域式风格；北魏晚期，尤其是西魏时期，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等新的内容也进入了石窟，出现了爽朗明快、生机勃勃的生动意趣。而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嫣然含笑、衣裙飞扬的人物形象的出现，更形成了潇洒飘逸的风格。由于这种风格来自内地，故称中原风格；到了北周，由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北文化的交流，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由并存而融合。在造型上，中原式秀骨清像与西域式丰圆脸型互相结合而产生了“面短而艳”的新形象。在晕染上，中原式染色法与西域式明暗法互相结合而产生了表现立体感的新晕染

法。在人物精神面貌上，淳朴庄静与潇洒飘逸相结合而产生了温婉娴雅、富于内在生命力的新形象。从整体上来说，北周时代的雕塑和壁画，使人感到了更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⑦⑧}

四、丝绸路上的一颗明珠

——隋与唐前期的敦煌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并统一南北后，结束了三百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罢天下诸郡”，^{⑦⑨}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敦煌也不例外，曾一度废郡为县。炀帝大业三年，又罢州置郡，复称敦煌郡。

隋末唐初，敦煌先由割据武威的李轨所有，后来又成为贺拔行威反叛唐朝的据点。唐王朝占领河西后，曾一度将隋代的敦煌郡改名为瓜州。武德五年（~~西魏~~年），又将瓜州分为两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在原晋昌县，领晋昌、常乐二县；西沙州治所在原敦煌县，领敦煌、寿昌二县。贞观七年（~~西魏~~年）又改西沙州为沙州。唐玄宗天宝七年（~~西魏~~年），全国都改州为郡，沙州又称为敦煌郡。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又改郡为州，敦煌仍称沙州。以后就转入吐蕃时期了。

敦煌历史上的唐前期，与唐史学界所说的唐前期略有不同。历史学家们为了研究唐史或中国古代史的方便，一般以公元 ~~西魏~~ 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为界，将唐代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不可否认，“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但因为战争没有直接波及到敦煌，故对敦煌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敦煌也没有因“安史之乱”而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我们根据敦煌历史的特点，将唐代敦煌历史划分为唐前期、吐蕃时期和归义军（前期）时期。

隋与唐前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敦煌充分显示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是丝绸之路上一颗鲜艳夺目的明珠。

员援唐前期对敦煌的统治

唐代前期，敦煌作为丝绸路上的一颗明珠，担负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并且是唐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故唐对敦煌的经营非常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强大的军事防卫力量。唐前期实行府兵制，由于唐王朝的“关中本位政策”，府兵的大部分都在关中，但从史籍文献及敦煌文书可知，当时沙州就有龙勒府、效谷府、悬泉府等，瓜州有大黄府等。可见唐王朝对敦煌地位之重视。唐太宗时期，为了便于对全国的统治，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陇右等十道，敦煌归陇右道管辖。由于监察区过大，不易巡察，更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因此到武则天时就开始将其逐渐缩小。睿宗时，就从陇右道中分出了黄河以西的地区设立了河西道，敦煌就归河西道管辖了，同时还设置了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负责河西的军事、财政与营田等方面的事务。后来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沿边设立节度使时，地方上就有军、镇、守捉。唐王朝设立的第一个节度使就是河西节度使。“其统有赤水、大斗、建康、玉门、墨离、豆卢六军，新泉守捉、甘州守捉、肃州镇守三使属焉”。^⑧

在河西除设有赤水军、墨离军、豆卢军外，唐王朝还把西域南道上的石城镇（今若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以增强敦煌的实力。

河西节度使的设立，对加强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当时“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歩兵团，主帅已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⑨到了

苑元年时，河西节度使所辖兵士已达 苑万^①人，居全国第三位；战马 苑万^②匹，占全国正在服役军马总数的四分之一。军事体系的建立，防卫力量的加强，为敦煌经济的发展、中西交通的兴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第二，加强行政管理。唐代的地方行政组织，主要是州、县、乡制。另外，乡下还设有里，据《通典》卷 猿^③载：“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作为唐王朝西北边防重镇的敦煌，其行政组织的设置自然是很严格的。但由于史籍文献的缺载，对有些具体情况不太明确，而敦煌文书中的有关记载，可帮助我们了解敦煌的基层建制情况。

大谷文书 圆^④载《武周圣历二年（^⑤苑元年）敦煌县诸乡营麦豆亩数计会帐》，虽然是一件官府会计文书，但对我们了解唐前期敦煌县乡的建制很有帮助。本件文书虽是草拟稿，却提供了圣历年间敦煌县诸乡种植麦、豆的基本数据和比例，同时也报道了此时的乡数和名称。每句分顷亩前第一字是乡名简称，池田温先生对此曾作过注释，即：

皇 越 ^⑥ 敦煌乡	高 越 ^⑦ 莫高乡	勒 越 ^⑧ 龙勒乡	神 越 ^⑨ 神沙乡
平 越 ^⑩ 平康乡	池 越 ^⑪ 洪池乡	玉 越 ^⑫ 玉关乡	效 越 ^⑬ 效谷乡
闰 越 ^⑭ 洪闰乡	泉 越 ^⑮ 悬泉乡	惠 越 ^⑯ 慈惠乡 ^⑰	

此注是准确的，这里只有 贡乡，无寿昌、从化二乡。贡乡的麦、豆作物分列相加，与总数相符，不可能是漏录。它表明在圣历以前，除永徽元年至乾封二年的 苑^⑱年外，敦煌县只有 贡乡。^⑲

此外，大谷 圆^⑳载《武周长安三年（^㉑苑元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是敦煌县为“劝课百姓营田”而下的牒文，其中有“准牒下乡，及榜示村坊，使家家知委。每季点检，有不如法者，随犯科决。……下十一乡，件状如前，今以状下乡，宜准

状”。从此文书可知，直到长安三年，敦煌仍然是 10 乡的建制。

长安以后，10 乡状况开始发生变化，敦煌石室所出《唐天宝九载（740 年）八至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长卷共 10 件，其第一件为八月廿七日史杨元晖牒文，记载了天宝九年（740 年）敦煌县各乡应纳敦煌郡仓的种子粟数。从此件文书可知，当时共有 12 个乡，比圣历二年（700 年）多了两个乡，即寿昌乡和从化乡。

关于寿昌乡，原为寿昌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卷 104《陇右道下》载，沙州有乡十三，并管县二：即敦煌和寿昌。敦煌市博物馆藏《唐地志残卷》也说：“敦煌：乡十二。寿昌：乡一”。可见，沙州原辖敦煌、寿昌二县，敦煌县有 10 个乡，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唐废寿昌县，其地入敦煌为寿昌乡，再加上此前出现的从化乡，就变成了 12 个乡，这一建制一直延续到吐蕃占领敦煌为止。

前已述及，唐代县乡基层建制下还设有里。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很难勾画出唐代里的具体情况。据陈国灿先生对敦煌文书的研究，已知唐前期敦煌县诸乡的里名有：^⑧

敦煌乡：临池里、忧洽里；龙勒乡：都乡里、常安里；
神沙乡：阳沙里、灵化里、弘远里；平康乡：洪文里、安昌里、修武里；玉关乡：丰义里；效谷乡：无穷里；洪闰乡：长沙里；悬泉乡：宜禾里；从化乡：慕道里。

唐王朝重视敦煌的乡、里基层建制，自然是为了加强统治。因为按照唐政府的规定，乡里的职责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⑨封建国家为了加强统治，首先是控制人口，征发赋税徭役。为此唐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籍帐制度：“每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据《唐会要》记载：“诸户籍

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三月三十日纳讫，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其户每以造籍年预定为九等，便注籍脚，有析生新附者，于旧户后，以次编附”。^⑧敦煌所出籍帐类文书，完全证明了唐王朝的这一规定在西北边疆地区是实行了的。

敦煌籍帐文书，包含的内容很多，也很具体，如见在户、逃户、绝户的区别，各户户主及家口的姓名、年龄、身份、应授田、已授田、欠田、退田的数额，各户田地及宅地的面积、方位、四至、水渠、户等、差役负担、纳税状况等。各级政府通过乡、里制定的户籍、计帐来“按比户口，催驱赋役”，以加强统治。

唐王朝正是通过上述县、乡、里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和完备的户籍制度对敦煌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和严密的控制。这些资料，不仅对了解敦煌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它作为重要的官府档案资料，对我们认识整个唐代社会的经济和基层政权组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圆媛经济的高度发展

包括敦煌在内的隋唐河西地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与战略地位。其经济形态是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与畜牧业并举。

（员）农业 隋代以前，敦煌的经济主要是畜牧业。隋统一后，特别是唐代前期，由于水利事业的兴修，敦煌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完全依赖于水利事业。敦煌地区干旱少雨，年降水量仅猿毫厘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 圆毫厘米，依靠天然降水，植物实难生长。敦煌绿洲的植物生长，全赖河渠维持。敦煌唐人写卷开宗明义地说：“本地，水是人血脉。”^⑨为了

有效地分配用水，管理用水，唐代的敦煌具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法规，并严格执行。孕猿猿《沙州敦煌县地方用水灌田施行细则》，就是西魏邓彦所立，迨至隋唐，一直遵守的配水法则。其中分干、支、子等各级渠道，细列行水次序，并称其为“古老相传，用为法制”，可见它与政府的其他政令具有同等效力。敦煌遗书唐开元《水部式》，更是备载各级渠道的溉田次第、造堰、斗门节水的分量、开闭时期，渠道和斗门的修缮及相应各级官员的职责等法令。

为了有效地行使这些法规，敦煌还设置了专职官员和管理人员。《水部式》载：“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浇水溉田，必须由县官亲自负责，就是一般的分水斗门，也“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为了有效地管理用水，敦煌每乡都设“渠头”一名或数名，负责各乡水利事宜；各主要渠道或分水斗门，还设有渠长或斗门长，“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由此可知，唐代的敦煌，自上而下有州、县官、前官、渠头、渠长和斗门长等多级管水人员，各司其职。对各级管理人员，还备有奖、惩条款，“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为功过附考。”

敦煌水源，主要为源自南山、流入境内的河流，有甘泉水（即今党河）、苦水、独利河（即今疏勒河）等；另外还有源自本县，滋润本土的泉泽湖泊，有用于人畜饮用及农田灌溉的宕泉、分流泉、沙井（月牙泉）、悬泉、玉女泉等淡水泉、湖和可供野生耐碱植物生长用水的东盐池、北盐池、东泉泽、大井泽、四十里泽等盐碱泽泊。^⑧

敦煌的三条河流又分为许多干、支、子渠，共有大小渠道九十多条，再加上二十多处泉泽湖泊，便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灌溉系统。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当时的人口也只有六万有余，然而水

利事业竟如此发达，其渠道堰坝配套之完备、管水配水制度之严密，的确是令人赞叹的。

水利事业的兴修，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唐初为维护丝路，河西地区军镇林立，而“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咸取决焉。”^⑧关于河西的屯田，《旧唐书·郭元振传》载：“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峡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余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唐代从高宗、武后到玄宗时期，都在河陇地区，尤其是鄯、凉、河、甘等州大兴屯田。高宗永隆元年（~~710~~元年），河源军经略使黑齿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⑨武则天时期，“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⑩到玄宗时，全国诸军州屯田共 ~~怨~~ ^源 处，河陇地区就有 ~~猿~~ ^源 处，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凉、甘、河等州又是河陇屯田的最主要部分。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唐王朝的屯田政策与其军镇的设置密切相关，它体现了唐王朝在河陇屯田的军事、政治目的：假如不开辟这样广大的屯田，唐王朝就无法在这里进行一系列较有成效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就无法保证丝路的畅通和西北政局的稳定。^⑪

在唐代河陇经济的发展繁荣中，河西的敦煌尤为突出。敦煌绿洲自西南向东北呈扇面展开，面积约 ~~猿~~ ^源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缺乏统计资料，仅大谷文书 ~~圆~~ ^源 载有武周圣历二年（~~710~~元年）前后敦煌县各乡营种麦豆亩数为“~~源~~ ^源 顷 愿亩”，这当然并非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据有的研究者推测，唐代敦煌县的耕地

面积约 10 万亩。^⑧

由于唐王朝积极推行屯田、营田事业，敦煌地区的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如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所说：“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壁画中也有许多农事活动的场面。在哥舒翰坐镇凉州时，“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⑨

（圆）畜牧业 河西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为亦农亦牧之胜地，因此其畜牧业远较内地为发达。祁连山和焉支山是河西地区的天然牧场。《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载：“祁连山在县西南二百里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又说：“删丹县本汉旧县，属张掖郡，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

唐王朝建立之初，就开始经营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⑩首先在此地设置监牧。“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⑪由于唐政府的高度重视，河西的畜牧业发展极快。“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文献通考》卷 182 作“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缗易一马”，^⑫这是唐代畜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唐王朝对畜牧业的管理十分重视，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⑬在河西国家牧场内，“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已上为中监，已下为下监。”^⑭唐王朝为便于管理，“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⑮

经过隋、唐王朝的开发，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比前代有了长

足的发展。“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阗阗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⑩

赈援中西交通的兴盛

隋王朝建立之后，即着手经营西域，以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商业贸易。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之间十来个建都长安的王朝，都注重加强西北方面的防御，尤其重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这一点早在汉代就认识得很清楚。清代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輿纪要》中说：“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合乎逻辑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隋初，危及丝路畅通的主要是吐谷浑和突厥，这两股势力呈南北夹峙，中断了丝路贸易。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说：“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⑪

隋炀帝把经营西域的事务交给裴矩。大业初，“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裴矩在河西通过胡商对西域情况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并根据其掌握的实际情况写了《西域图记》三卷，上奏朝廷，引起了炀帝的极大兴趣。当炀帝召见裴矩时，他又讲了一些西域、河西的情况及发展丝路贸易的重要性，并说吐谷浑也不难打。“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自此，隋炀帝把降服吐谷浑、突厥，“混壹戎夏”，^⑫交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定为国策。^⑬

为了打通丝绸之路，炀帝便西巡河西。大业五年（~~通鑑~~629年），炀帝由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而“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闹。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⑭对此次盛况，《隋书·炀帝纪》的记载更为详细，“壬子，高昌王鞠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

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舞剧《丝路花雨》的某些题材，就是取之于这段历史的。

炆帝的西巡，大大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早在裴矩经营西域时，就常常往来于敦煌以至西域之间。隋炆帝在接待西域使者和商人的同时，还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他们到达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得到了玛瑙杯、佛经、狮皮、火鼠毛等等。在炆帝西巡的翌年正月十五，诸蕃酋长齐集洛阳，贡献方物。大业十一年（~~远~~635年）正月，突厥等二十六国遣使朝贡，其中许多人来自西域。其后，“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并“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⑩

隋代丝绸之路的兴盛，与道路的畅通是密切相关的。隋代以前，中西交通的路线只有南北两道。随时，不仅以前的道路更加畅通，而且又增加了新的一道。这样，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即北道（又叫新北道）、中道（汉代的北道）和南道。具体来说：

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再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今地中海）。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今伊朗）。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天山南麓而至葱岭。

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若羌），经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南）、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在我国境内是大致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而至帕米尔高原。

中西交通的这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然后经伊吾、高昌、鄯善而达中亚、欧洲，“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

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⑩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唐王朝建立后，仍积极经营西域。在消灭北方的劲敌东突厥后，就转而进军西域。贞观十四年（~~贞观~~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贞观十八年又攻焉耆，二十二年破龟兹，到唐高宗显庆三年（~~贞观~~658年），终于扼制了西域地区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西域各国的宗主权也正式从西突厥转移到唐朝手中。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些活动中，敦煌除了作为唐朝进军西域的物质供应基地外，沙州刺史也曾亲自率兵参加了诸如攻取龟兹的战斗。此后，在唐朝与西突厥、吐蕃余部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沙州是协助安西都护府（驻龟兹）控制西域的重要力量。

唐朝前期，除了高宗永隆二年（~~贞观~~681年）“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和玄宗开元十五年（~~贞观~~727年）吐蕃一度攻占瓜沙外，敦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这从前述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水利灌溉系统的完善中就可得到证明。农牧业生产的进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敦煌的集市上，既有内地来的汉族客商，也有从中亚各国来的胡商。“商胡”的来源很多，如阿拉伯、非洲、东罗马帝国、波斯、印度半岛诸国等，都与唐有所谓“通贡”、“通使”的商业贸易关系。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陆续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组成的。敦煌遗书 ~~孕猿猿~~《唐天宝十载差科簿》中列举了“贰佰伍拾柒人从化乡”，从这 ~~圆四~~ 余人的姓名看，基本上都是康、安、石、曹、罗、何、米、史等昭武九姓胡人，这就赋予了从化乡以粟特族聚居乡的特点。而且乡被命名为“从化”，下设里名现知有“慕道里”，可能是取“慕道来归”、“从化内附”之义。由此可以确定，当大批粟特商人定居敦煌后，沙州官府把他们“当作慕义来归，从化内附者，在敦煌划出地域加以安置，并建乡设制，编入户籍。”^⑪

大批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珍宝、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交易，使敦煌这个中转贸易城市繁华一时，更显示了其中西交通的咽喉作用。“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⑩就是对西域胡商入贡贸易之盛况的描写。唐代九姓胡入贡贸易的路线，大体上是发轫于中亚两河流域，经碎叶川、热海道、大碛路，从敦煌入河西走廊，终抵长安。据统计，从武德七年（~~贞观~~元年）到天宝十四年（~~乾元~~元年）的 ~~贞观~~ 年间，唐代九姓胡共入贡 ~~愿~~ 次，其中康 ~~猿~~ 次、石 ~~愿~~ 次、安 ~~怨~~ 次、曹 ~~愿~~ 次、史 ~~缘~~ 次、火寻 ~~猿~~ 次、何 ~~员~~ 次。^⑪张籍的《凉州词》用“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生动诗句，反映了当年运载丝绸等货物的骆驼商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咛的驼铃声中经过敦煌，向西方前进的情景。

不论丝绸之路的路线怎样变化，敦煌都是惟一不变的重要吐纳口。所有商人、使节、僧徒的西去东来，都必须经过敦煌。贞观年间玄奘东归时，太宗就令敦煌吏民“赴流沙迎接”。敦煌以西 ~~员~~ 里的“兴胡泊”，就是专门接待胡商的。敦煌唐代壁画《维摩诘经变文殊问疾品》中的“各国王子图”，就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的形象记录。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容。沙州城内有州县两级学校，教授唐朝规定的儒家经典；大量长安宫廷写经的传入，为佛教圣城敦煌进一步灌注了汉地佛教的影响；道经的传写和道观的建立，是李唐王室尊老子为先祖的反映；从化乡的祆神祠和开元年间写的摩尼教经典，透露了粟特人的信仰、传播西亚宗教的信息。可以说，当时的敦煌凝聚了中国、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观。^⑫

源媛辉煌灿烂的莫高窟艺术

在尼姑庙里长大的隋文帝，深崇佛教，他曾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在昙延法师面前受“八戒”。仁寿元年（~~通景~~591年），隋文帝诏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即莫高窟）起塔，安放释迦舍利。隋炀帝更是“优游于大乘”的“总持菩萨”，曾直接派中使到敦煌建讲堂，在崇教寺修舍利塔。在隋朝统治者崇佛浪潮的推动下，短短三十余年中，莫高窟竟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窟。此时的佛教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

唐代前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西交通的昌盛，文化教育也有了很大进步。对于宗教，也是释道兼崇，因而两教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高祖武德年间，由于傅奕的极力辟佛，李渊曾下过《沙汰僧道诏》。李世民即位后，也曾公开表示过“至于佛教，非意所遵”。^⑪其实，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把道教摆在佛教之上，并非要废除佛教。到玄奘求法归来之后，唐太宗的态度就明显地转变了。在武德、贞观时期，佛教虽然受到了一些压抑，但并没有达到阻碍佛教传播的程度。

宗教之争常常是政治斗争的反映，初唐的释道之争也反映了武、李两族争夺政权的背景。武则天当权后，为了取代李氏王朝而自立，就大造符瑞图讖作为舆论准备。僧人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称武则天是弥勒下世。所以，当武则天登位后，立即以诏令形式规定佛在道上，并大造佛寺，广度僧尼。开元年间，凿龕造像之风仍十分兴盛。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敦煌的佛寺更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仅莫高窟现存题记中有名者，就有龙兴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寺等等。^⑫

此时的莫高窟，“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空前壮观。正如《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所说：“西连九陇坂，鸣沙飞井擅其名；东接三危峰，旻露翔云腾其美。左右形胜，前后显敞，川原

丽，物色新。仙禽瑞兽育其阿，班羽毛而百采；珍木嘉卉生其谷，绚花叶而千光。尔其镌罅开基，植端桔而概日；礲山为塔，构层台以遽天。刻石穷阿育之工，雕檀极优闾之妙。……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乎天上。”

隋朝的壁画内容，故事画减少，经变画增多，各种各样的“累世苦修”和“忍辱精神”已由“西方极乐世界”和“方便成佛”所代替。经变画的种类有《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涅槃变》、《弥勒经变》、《阿弥陀经变》等，这时候的经变画，虽然种类不多，甚至有的画面简单，画幅不大，但它是唐代大幅经变画的雏形。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无情有性”的佛教哲理已十分流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作为一种口号而正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累世苦修”才能成佛的说教，亦随之失去了作用。反映在佛教艺术上，小孩“聚沙成塔”皆可成佛的《法华经变》；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人们视金钱如粪土的《弥勒经变》；一心念佛，“九品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变》；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等等苦难皆可得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药师变》等等，相应而生。此时敦煌壁画的特点，就是通壁大型经变画的出现。它规模宏伟，人物众多，色彩绚丽，是唐前期璀璨夺目的敦煌艺术的充分反映。

隋唐时代的塑像，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的是与人等高的群像，而巨型佛像的出现，则是唐代前期莫高窟彩塑艺术的显著特点。

敦煌巨型造像的出现，是与唐前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当武则天夺得皇位宝座后，为了称帝改号，便授意法朗、薛怀义等十个和尚于载初元年（~~700~~691年）著《大云经疏》，“盛言神皇受命之事”。说弥勒菩萨为化渡众生变为女身，“作阎浮提

主”，“以继王嗣”，“当王国土”，“女王承正，威伏天下”，意指武则天应该当皇帝。

武则天收到这部《大云经》后，如获至宝，立即向全国发令，让“诸州各置大云寺”，并将《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同时改唐为周。敦煌北大像（即第 97 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孕猿窟《莫高窟记》载：“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四十尺。”这个窟大概就是敦煌写本中提到的“大云寺”。北大像的出现，是与武则天的一系列佞佛行为分不开的。它内塑 猿米高的弥勒佛一躯，后经晚唐、宋初、清末和民国的重修，其手势、衣纹、色彩均非原作，只有头部还保存着初唐丰满圆润的旧貌。如果与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相比，在规模上虽然瞠乎其后，但就其艺术而论，则不可同日而语。乐山大佛巍然屹立，气势雄伟，它以大轮廓的形式美取胜，但仅具雏形。敦煌北大像，则形象真实，塑工精湛，它以写实而富丽的风格见长。以彩塑而言，它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也是规模最大的雕塑杰作。

除北大像外，还有南大像。《莫高窟记》说：“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南大像即第 97 窟，内塑 圆米高的弥勒大像一尊。除其右手为后加者外，基本上保存原状，比例适当，躯体健壮，曲眉丰硕，神态庄静，充分显示了盛唐的风格。

敦煌南、北大像的修建，是莫高窟历史上的创举，同时也是唐代敦煌及整个国家繁荣、强盛的象征。

五、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康藏高原上。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在其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建立了

统一而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唐代初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唐中宗时，又以金城公主嫁吐蕃王尺带珠丹（即弃隶缩赞）。唐蕃和亲，不仅加强了唐王朝与吐蕃的政治联系，而且还把汉族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化艺术带到吐蕃，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唐代，唐与吐蕃虽然有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吐蕃当时仍是一个奴隶制政权，奴隶主贵族为了掠夺土地、财富和人口，不断向外扩张，并和唐王朝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早在高宗时期，吐蕃就在大非川之役中击败了唐朝大军，并占领了安西四镇。此后，唐虽一度收复了安西四镇，但唐蕃之间的战争却连绵不断，河西地区也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由于这一时期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在河西及陇右地区驻有重兵防守，因而暂时遏制了吐蕃的兵锋。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被迫将河西、陇右及安西四镇精兵东调以平叛，吐蕃乃乘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占领了整个河西、陇右地区。

关于吐蕃占据河西后，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传统史籍记载很少，无法得知具体情况。可喜的是，敦煌遗书中发现了许多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资料，从而使我们能够结合传统史籍，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有关情况进行比较详细的探讨。

员援吐蕃占领敦煌及其民族统治

吐蕃的这次进攻，其战略是先蚕食唐朝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兵锋直指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肃宗至德元年（~~756~~756年）吐蕃兵陷威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入据石堡城、百谷城、雕谷城。翌年，占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军。宝应元年（~~762~~762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

州。代宗广德元年（~~苑~~743年）又陷洮、河、兰、鄯等州。这样，吐蕃就切断了唐王朝中央与西北边境诸州的联系，整个陇右道就在吐蕃势力的威胁之下了。同年十月，吐蕃攻占了长安，代宗被迫逃往陕州。由于唐朝军民的英勇斗争，吐蕃在长安只逗留 15 天就撤出了关中。但它回过头来又觊觎河西，从 ~~苑~~749—~~苑~~751 年，先后攻占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最后终于在唐德宗建中二年（~~苑~~781 年）占领了沙州（敦煌），从而整个河西都被吐蕃所控制。

面对吐蕃的步步进逼，河西军民在与内地隔绝无援的困境中，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沙州军民的拒守尤为突出。《新唐书·吐蕃传》载：“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阎朝）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绌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它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从这条记载可知，在周围各州皆已陷蕃的情况下，沙州人民仍英勇抵抗，前后坚持了十一年之久，并在争得“毋徙它境”的条件下，才开门纳款。

吐蕃奴隶主所发动的战争，其目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和财产。他们每攻占一地，都劫夺财物，践踏农作物，焚烧房屋，屠杀老弱妇女，而把丁壮年掳去为奴。唐代沈既济说：“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①④}并根据其在河西、陇右的见闻说：“自轮海以东，神乌、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四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及霜露既

降，以为岁时，必东望啼嘘，其感故国之思如此。”^⑪

吐蕃占领河西走廊以后，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广大的新占领地区的民族关系。当时，吐蕃人、孙波人属于嫡系部队；吐谷浑人和党项人为已被吐蕃收编，但仍有相当独立指挥系统的杂牌军；此外还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区的汉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汉人是河西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当吐蕃刚开始进入河西时，奴隶主政权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横加劫掠，到处抢夺，子女玉帛，悉归帐下。当地的汉族百姓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从而造成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不安。当吐蕃统治者完全有把握控制这片新占领的地区时，便希望社会稳定，因此，吐蕃统治者在敦煌一方面采取强硬措施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即镇压反抗势力，推行蕃化政策，清查户口，重新造籍。另一方面，又重用当地唐朝旧官望族，严禁掳掠汉族百姓。并按照自己固有的习惯和制度来改造新占领区。部落制的实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例如吐蕃在占领敦煌后的第一个午年，即公元 764 年，就将敦煌地区原有汉户编成“沙州汉户部落。”在当时战乱频仍、生存权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也许当时的若干汉户是欢迎这种部落制的。在 孕 0 原 0 号汉文卷子里，就有“流沙僧俗，敢荷殊恩，百姓得入行人部落，标其籍信，皆因为申赞普，所以纶旨垂边”的赞语。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当时一般人的社会心理讲，有了固定的“主子”，总比做众人的奴仆或者任人抄掠要好一些。但是，劫掠惯了的吐蕃人，仍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汉户，就是对编入部落中的汉户，也照旧为所欲为，制造新的混乱。^⑫

吐蕃占领者的压迫和劫掠，造成了吐蕃占领敦煌初年的民族关系紧张化。沙州虽于建中二年陷于吐蕃，吐蕃统治者用“置毒靴中”的暗杀手段，处置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阎朝，但沙州人民并没有屈服，其反蕃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杂 0 原 0 号卷子有残稿 员 0 行，以前被学者拟名为《书仪》残卷，唐耕耦、陆宏

基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将其拟名为《吐蕃占领时期沙州守官某请求出家状等稿四十多件》。这卷文书中就记载了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沙州玉关驿户范国忠等人的反蕃起义。

范国忠起义带有浓郁的反民族压迫的色彩。文书中所说“戕杀蕃官”，透露出起义者似乎只杀蕃官蕃将。起义者被捕后的供词也说：“遂谋杀蕃官是实”。从这次起义的情况看，吐蕃占领敦煌初期，蕃汉民族矛盾是比较尖锐的。吐蕃统治者为了防止汉族百姓的反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甚至连铁农具也一概没收，如杂录卷四号文书说：“又缘种时，例乏耕牛。农器之间，苦无钢铁。先具申请，未有支分。冬不预为，春事难济”。正是由于汉族百姓的不满情绪较浓，蕃汉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吐蕃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便不得不改变其统治方式，争取新占领区汉族百姓，尤其是唐王朝原来的官员的支持与合作。敦煌遗书 孕猿愿号汉文卷子背录二斋文，其一就有“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的记载。这位“阎公”不是别人，正是缢杀沙州刺史周鼎，然后坚守沙州 元年，最后才与吐蕃约定“毋徙它境”而投降的阎朝。他投降后被吐蕃统治者任命为“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这个藏汉混合的称谓恰恰反映了当时的藏汉关系，说明他在唐蕃之间具有双重身份。另外，敦煌遗书 孕猿愿号卷子题为“故前释门都法律京兆杜和尚写真赞”是由“释门大蕃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智照撰”。这位“密遣判官智照”显然是以僧侣身份在吐蕃政权中任职的汉人官员。此外，孕猿愿号文书提到“蕃汉节儿”、杂录卷四号记有“杜都督”、孕猿愿有“安都督”、孕猿愿“索都督”、孕猿愿“张大都督”等。这些人在唐朝时均为敦煌地区的宦门望族。如杜氏，据 孕猿愿《祈愿文》载：“都督京兆杜公，惟愿繁祉斯乐，纤漳无遗，轩冕永昌，钟鼎传嗣。”可知京兆杜氏早已在敦煌“轩冕永昌，钟鼎传嗣”，位高权重。索氏，孕猿愿《敦煌名族志》载：“索氏，……以元鼎六年从钜

鹿南和迁于敦煌，……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杂缘园《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亦有相同记载，并载其“亡兄，前任沙州坊城使，……权职蕃时，升荣曩日。”说明敦煌索氏在吐蕃统治时期，乃不失官职，“咸累代官族”。张氏家族亦为敦煌望族，并在蕃占时期形成相当势力，后来其族人张议潮率领河西人民驱逐了吐蕃在河西的势力。据《册府元龟》卷 怨缘园《外臣部·通好》：“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又《唐李氏再修功德碑》云：“虽云流陷居戎，而不坠弓裘，暂冠蕃朝，犹以将军之列”，足见张氏在沙州世为宦门望族。此外，粟特族安都督亦为敦煌望族，敦煌文书中有安氏家族与敦煌著姓张氏、索氏通婚的记载，说明安氏家族亦不失为敦煌著姓。正是由于部分僧俗官员的配合，才使瓜沙一带的部落制逐渐被人们接受。

吐蕃统治者在拉拢其占领地区的唐旧官望族参加其统治机构的过程中，对这些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政策。一方面如前所言，镇压了占领区的反抗势力和阎朝等尚有贰心之降臣。另一方面，又以优厚待遇拉拢当地陷蕃的唐朝旧官望族。如《阴处士修功德记》记载，阴伯伦担任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后，“六亲当五康之饶，一家蠲十一之税”，“复旧来之井赋”、“利新益之园池”。又如《僧龙藏牒》载：“齐周身充将头，当户突税差科并无，官得手力一人，家中种田驱使，计功年别卅驮。”

由上述材料可知，吐蕃统治者在河西统治机构中，之所以拉拢当地陷蕃的唐朝旧官望族担任重要职务的目的，一是企图通过拉拢当地的旧官望族参加吐蕃在河西的统治机构，来消除河西人民对吐蕃的敌对情绪，二是借这些旧官望族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以扩大吐蕃的统治力量，从而达到对河西的有效统治。

吐蕃统治者在镇压河西人民反抗的同时，注意对河西人民推行蕃化政策，企图从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着手来消除民族间的隔阂，进而消除河西人民反蕃的情绪，以达到其长期的稳定统治。

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尚乞心儿便强硬推行了蕃化政策，让沙州人民改易穿着、学说蕃语、纹身、赭面。据《张淮深碑》载：“河洛沸腾，……并南蕃之化，……抚纳降和，远通盟誓，析离财产，自定桑田。赐部落之名，占行军之额。由是形遵辫发，体美织（纹）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祖宗衔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风，申屈无路。”又孕源^①《阴处士修功德记》：“熊黑（黑）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从上述材料来看，吐蕃统治者在沙州地区强硬地推行了蕃化政策，迫使沙州人民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纹身等，甚至从幼儿就已开始做起。其目的是想从语言、风俗、传统等民族间的主要差别上消除隔阂，以达到对其长期统治的目的。

吐蕃的蕃化政策，不仅限于沙州一地。吐蕃在占领河陇地区后，河陇地区蕃语、辫发、赭面、纹身、左衽而衣的吐蕃风俗已随处可见。《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了刘元鼎出使吐蕃的见闻：“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然而，吐蕃的蕃化政策，并未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据《新唐书·吐蕃传》载：“（沙）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反映了落蕃唐人怀念故国，痛恨吐蕃统治的心理。唐元稹在其《缚戎人》诗中曰：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孙子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
不知祖父皆汉民，便恐为蕃心砭砭。

白居易的《缚戎人》云：

一落蕃中四十载，身着皮裘系毛带。
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暗思幸有残筋骨，更恐年衰归不得。

上引诗作句句表达了吐蕃统治下的汉人，对国家的怀念之情及对吐蕃野蛮统治的痛恨。是知唐人反抗吐蕃统治之心，未尝稍息，吐蕃势力一旦衰弱，河西诸州则鸟飞而影从，迅速推翻了吐蕃的统治。如孕猿^①号：“太保见南蕃离乱，乘势共沙州百姓同心同意，穴白趋却节儿，即着汉家衣冠，永抛蕃丑。”总之，在吐蕃统治河西期间，吐蕃与河西汉族等民族间矛盾虽未能消除、民族差别未能同化，然蕃汉等民族间的了解及经济、文化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圆援吐蕃对敦煌的统治形式——部落、将制

吐蕃占领敦煌后，首先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职官系统（即节度使——乞利本——节儿——都督、监军——部落使——判官）来统治河西瓜沙地区，由于敦煌地区的居民成分以汉民族为主，故吐蕃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在任用吐蕃自身官员的同时，还任用汉人为辅助官吏。吐蕃统治者正是采用了这种双轨型的职官系统，才维系了其在河西地区上百年的统治。

在设置完整的职官系统的同时，吐蕃统治者还改变了河西地区的基层组织形式，即将唐王朝的乡、里制改变为吐蕃王朝的部落、将制。

我们知道，唐朝地方行政区划是道（府）、州、县三级，县

以下设有乡、里。敦煌在吐蕃占领前，属县一级政权单位，设有11个乡，即敦煌乡、莫高乡、神沙乡、龙勒乡、平康乡、玉关乡、效谷乡、洪池乡、悬泉乡、慈惠乡、洪润乡、寿昌乡、从化乡。吐蕃占领敦煌后，废除了原有的11个乡，而代之以部落制，如孕猿缘背《龙勒乡部落见在及向东人户田籍册》载：“龙勒乡部落，合当部落管见在及向东人户，总二百三十九户。”本件文书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将龙勒乡改为部落建置的确切记载，它表明一个部落辖原来的一个乡。部落的内部组织情况，仍与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其最基本的单位是千户（部落），千户之下是小千户（即五百户组织），设小千户长一人。小千户之下为百户（将），百户长称“勒曲堪”，最后是十户组织，十户长称“勒堪”。

吐蕃统治者的部落、将制，其一“将”基本上相当于百户。敦煌遗书杂猿缘范《子年百姓汜履倩等户籍手实牒》中，有“左一将”、“左二将”、“左六将”等。杂猿缘愿《夫丁修城记录》中，有“右一”到“右十”、“左七”到“左十”等将。可见敦煌地区将的设置是比较多的。

据杂猿缘愿《唐故河西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右二将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浑公甲邈真赞并序》中说，浑子盈身为“节度押衙兼百人将务”，右二将头被说成“百人将务”，表明将头所统不过百人上下。由此可知，吐蕃时期部落下面将的规模大约是百户，即十个户团。

众所周知，唐代是“百户为里”，那么，吐蕃时代的“将”，则相当于唐代的“里”，将头即相当于里正了。孕猿缘源《僧龙藏牒》中自述他出家前充当将头的待遇是：“当户突税差科并无，官得手力一人，家中种田驱使。”即担任将头可以豁免本户赋税、徭役，并配给一个仆役。可见将头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个半官半民的身份。由此推断，可得到以下结论：将级机构并非一级政

权，将头也不是政府编制内的官员，只不过是部落下面办理一方差事的高级差役，同里正一样，都是不入品流之辈。^{⑪⑦}

吐蕃占领敦煌后，其部落、将的设置并非一次完成，它首先设置了苑个部落，即僧尼部落、行人部落、丝绵部落、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和中元部落。从其编制情况看，这种部落应是非军事性的。九世纪二十年代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吐蕃在敦煌又相继编创了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人军事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并把敦煌汉人及其他民族的人也纳入自己的军事组织中，以符合对征服地区作长期统治的政策。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被吐蕃统治的敦煌百姓的地位较初期有所提高。同时，吐蕃统治者虽然以“部落——将”制代替了以前敦煌的乡里、邻保制，但由于这种部落组织基本上和唐代乡里制相似，加之它的基层官更多由汉人担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吐蕃的“部落——将”制还起着唐朝地方行政组织的作用。^{⑪⑧}

总之，吐蕃占领河西后，用“部落——将”制代替了唐代的乡里制。其统治形式的变化，虽然是为了加强对河西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的军事因素。但从其内部组织结构着眼，仍可看出其重要的经济因素，即为了征收“突税差科”，因此，吐蕃在河西实行的“部落——将”制，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机构，乃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组织系统，即官府户籍制度。这正如姜伯勤先生所说：吐蕃控制河西以后，其“户籍制度适应着乡里体制的变化而改变。”^{⑪⑨}如敦煌本《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就是一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擘三部落左二将五户百姓的户口状，系各户主对户口异动情况的申报，相当于唐代之手实。如索宪忠户户籍：

户索宪忠，妻阴，男远远，男顺顺、女妃娘（出度）、女金娘（出嫁与同部落吴通下邓道）、婢目目。

午年擘三部落已后新生口，男性奴（出度）、女瞻娘（嫁与丝绵部落张□）、下张清清、女意娘（出度）、男再佛（出度）、远远妻（娶同部落吴通下鄯石奴妹美娘）、男迁迁，妻（娶本将程弟奴女）。

右通前件新旧口并皆依实，如后有人纠告，括检不同，求受偷人条教，请处分。

件如前，谨状。

子年五月 日百姓索宪忠

从索宪忠户户籍可知，其户口登记是非常详细的，家庭人员（包括奴婢）的死亡、出家为尼、嫁娶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其它各户的记载也基本一致。该卷文书中之“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是指午年户口调查造籍所注人口，“午年擘三部落新生口”，则是指该次调查后的新生人口。从而可知，吐蕃统治者占领河西后，具有相当严密的官府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当时也称为“牌子”。

獫狁吐蕃时期的田赋制度

众所周知，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吐蕃占领河西后，改变了唐王朝的授田制度，而实行了突田制。关于突田制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透过敦煌文书，我们仍可以找到实行突田制的有关痕迹。如杂~~国~~文~~卷~~《吐蕃西年沙州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牒》曰：

城南七里神农河母，两勒汎水，游淤沙坑，空地两段共叁突（东至碛，西至贺英倩，南道口，北至神农河北马国清）。

右南沙灌进渠用水百姓李进评等，为已前移灌进口，向五石口前逐便取水。本无过水渠道，遂凭刘屯子边，卖合行

人地壹突用水。今刘屯子言：是行人突地，依籍我收，地一任渠人别运为。进评等，今见前件沙淤空闲地，拟欲起畔耕犁，将填还刘屯子渠道地替溉灌，得一渠百姓田地不废。庄园今拟开耕，恐后无凭，乞给公验处分。

本件文书中提到“空地两段共叁突”、“卖合行人地一突用水”，由此可见，“突”是土地计量单位。另外，其他卷子中也有一些记载，如孕猿源《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中有“无穷地两突，延康地两突”；孕圆愿号背《酉年二月十二日索海朝租地贴》中有“城西阴安渠地两突”；杂源远号文书第一行有“八突”字样，其后则是明细的亩数记录，这些记载也可证明“突”是土地计量单位。

从以上的研究可知，吐蕃在河西实行的是突田制。那么，作为土地计量单位，一突是多少？其授田方式如何？敦煌遗书杂怨缘和杂源愿两件吐蕃时代的《沙州诸户口数地亩计簿》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较好的素材，据杂怨缘号文书提供的材料，如果我们将每条总计突数与各地段的明细亩数加以换算，就可得知突与亩的换算标准。如武朝副两户九口，共有地九突一亩，其中都乡渠一突一亩，双树渠半突一亩，宜秋西支渠七突四亩。这三段的土地加起来总共为八突半又六亩，而八突半六亩等于九突一亩。再如元琮户，共有土地十二突，分布在六条渠道上，分别为五突半一亩、一突三亩、二亩、三突半、半突四亩，半突，合计起来恰好十一突十亩，而总计为十二突。可知十一突十亩等于十二突。又如李进益七口，应授田七突，而该户下只写“七十亩十三畦”，可见七突等于七十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突等于十亩，半突等于五亩。^{①②}

那么，突田制时代的授田标准如何呢？我们通过对上引敦煌遗书中每户家口数与地亩数的排比分析可知，大体上是每人 圆

亩，即一人一突。敦煌文书共记载家口地亩 164 户，其中 151 户是一人一突，如元琮户十二口，授田十二突，辛兴国户九口，授田九突，侯文奴户四口，授田四突，只有 13 户虽非一人一突，但差额甚少。由此可知，吐蕃王朝控制时期，实行的是计口授田制度，其标准为每人一突，即十亩。^{①②}

吐蕃实行的计口授田制，与其赋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突田制下，以“突”作为土地计量单位，那么，本时期的土地税在汉文文书中也就称之为“突田”，交纳“突田”称为“纳突”。从简牒看，吐蕃在新占领区所实行的赋税制度，除部分保留旧有的奴隶制成分外，主要吸收唐朝及所占领地区的赋税制度，并设有“税务官”、“税吏”等来执行其任务。但由于简牒的记载比较简略，很难窥见“纳突”的具体内容。而敦煌遗书的记载则比较丰富、详细，如 P. 2846 号背《吐蕃寅年沙州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有详细记载：

张逸（常乐一驮半二斗，瓜州一驮，寅□百尺一驮，汜弁三驮怙倮，常乐一驮）

索荣（常乐一驮半二斗，汜弁下青一驮半，小三驮半，又小半驮，瓜州自送一驮）

王瀚（常乐一驮半二斗，一千人苏面一驮，瓜州一驮，十二月廿九日杜平纳一驮半，李延一驮六斗，小五斗，寅八月纳青一驮二斗，小一驮半二斗）

（以下从略）

本件“突田历”中的“历”即是帐目。唐代俗称收支帐为入破历，“突田历”即指据土地征收税收的帐目，通过对本件文书的分析，可略知此时期的纳税制度：

（员）本件文书所载左三将所属 164 户中，张进卿户注明“不

合纳”，张寺加户注明“不纳”，王什德户注明“不合纳”。该三户仅交纳了一驮或稍多的粮食，从而可知突田制下有纳突户和“不合纳”即减免户的区别。

（圆）各户一般均向常乐（地名）交纳一驮半，交瓜州一驮。其余数目则分别交往蚕坊、寺院，另一些数目则由本“将”中的人户氾弁等经收。当时的寺院一般都收取官府的布施（“徭”即布施），这种官徭有时由纳税户直接交给寺院，然后将该数额在该户应交纳税额中扣除。交纳的物品有小麦、青麦、布、油等。^⑫

（猿）虽然当时的纳突与计口授田有关，但突税并非按口（即按地亩）或按丁交纳，而是按户交纳。据有的学者研究，其税额是每户愿驮上下。当时的一驮等于二石，半驮等于一石，若此，则每户每年需纳突 员远—圆石。^⑬

从敦煌遗书中可知，突田制下百姓除了纳突以外，还有差科，在吐蕃管辖时期的河西，“差科”是指官府的徭役。如 孕猿源号《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⑭曰：

齐周身充将头，当户突税差科并无。官得手力一人，家中种田驱使，计功年别卅驮。从分部落午年至昨亥年，计卅年，计突课九百驮，尽在家中使用。

大兄初番和之日，齐周□父脚下，附作奴。后至金弁使上析出为户，便有差税身役；直至于今。自齐周勾当之时，突田大家输纳。其身役、知更、远使，并不曾料。

从此件文书可知，差科包括身役、知更（守夜）、远使（派往远处当差）等。

总之，吐蕃统治者占领敦煌后，虽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改善民族关系，发展当地经济，力图长期占领这一地区。但

我们通过对其占领时期统治敦煌之历史实际的探讨，得知此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和汉代及唐前期相比，是敦煌开发史上的一个倒退。

源渐趋衰退的敦煌艺术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中国封建社会也由强盛走向衰弱。与这种形势相一致，敦煌莫高窟艺术也从其顶峰滑落下来。

吐蕃占领敦煌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也任用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为各级官吏，利用敦煌世家豪族统治沙州地方，到后期甚至将敦煌地方的部分政权、军权和税收管理权也都交给了豪强大族，从而使吐蕃的统治得以维持六十余年。^⑫

吐蕃奴隶主很信佛，可黎可足赞普等在敦煌大兴佛事，广度僧尼，当时仅 犍 万人的沙州便有上千僧尼；在吐蕃统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经济也空前繁荣，当时有 苑 大寺、苑 大寺之称。这些寺院和内地一样，都有寺户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辖，享有种种特权。吐蕃奴隶主还把僧侣的地位抬得很高，甚至让一些高僧直接参与政事。如悟真的师父洪 誓，吐蕃时代就是“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张议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僧妙牟，常在吐蕃赞普左右参与政事，兼“临坛供奉”。此时期敦煌的名僧辈出，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长安高僧昙 旷，传授禅宗的摩诃衍，做了“蕃大德”的法成、悟真等，都与洪 誓一样，是当地有名的高僧。同时，吐蕃统治者还遣使到长安，“求沙门之善讲者”至蕃地讲经。“至是（建中二年），遣僧良 琇、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⑬吐蕃统治者曾不断向中原求取佛经，加以翻译，如名僧摩诃衍就曾将许多汉藏文佛经相互翻译，流行于当时。

由于吐蕃统治者的崇佛，再加上在吐蕃统治下，敦煌躲过了会昌灭佛（~~845—848~~）年），致使莫高窟艺术不仅未遭破坏，反而

不断修建。现存吐蕃时期新开的洞窟 15 个，并有重修前期的洞窟 15 个，共 30 窟。其中有明确建窟纪年的洞窟只有两个，即 171 窟和 172 窟。第 171 窟旧称七佛堂，为沙门洪誓于 844—848 年所建。172 窟为阴嘉政于 848 年所建。通过对这些洞窟的分析、探讨，可以明显地看到，此时的莫高窟，已失去了盛唐时期那种气势和光彩，艺术水平也渐趋衰落了。

吐蕃统治时期的佛教艺术，在与唐前期一脉相承的大前提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如在壁画中，根据佛经需要，凡有“国王”出场的地方，吐蕃赞普就会在侍从的前呼后拥下站在“大王小王”之前，171 窟 172 窟维摩诘像下面的听法图，171 窟大涅槃像北壁的举哀图都是如此。从内容方面看，凡是唐前期的题材，吐蕃时期一样不少，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经变画。

吐蕃时期壁画的特点是经变画增多，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天请问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等。这时的经变画，虽然种类增多，但已走向程式化，画面堆砌，一味想表现经变画的热闹场景，实际效果反而单调乏味。盛唐的活泼气氛与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都在壁画中消失了。每种经变的布局基本相似，也可说完全一样；通壁大画已很少见，而是一壁画几幅经变，因此一窟可画好几种经变，最多可达 15 种（171 窟）。

吐蕃时期的彩塑被毁较多，只有在离地面 10 多米高崖上的几个窟保存较好，尤其是 171 窟全长 15 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像保存很好。佛面呈一种舒适的睡态，毫无痛苦地“右胁而卧”，进入不生不死的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其艺术造型也很卓越，脸庞丰腴，比例适度，通肩袈裟的衣纹随身体的起伏而变化，圆润流畅。这在敦煌大型彩塑佛像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而整个 171 窟，又是以壁画和彩塑相结合的方式，显示了敦煌《涅槃变》的最高水平。在大卧佛背后墙上，西壁画诸天龙诸学人等举哀，南壁画十大弟子举哀；由于人物身份不同，其形象、动态和神情也

各有特点，无一雷同。它描绘了许多具有个性和独特内心世界的人物群象；同时，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场面，又完全服务于一个统一的主题、需要；众人的狂热悲痛与卧佛的沉静安详形成了鲜明对照，相反相成，表现了佛入涅槃的崇高境界。整个洞窟则反映了“涅槃为乐”这一中心思想。^{①⑦}

六、孤悬西陲的归义军

自从张议潮于大中二年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后，便在敦煌建立了以汉人为主的政权。大中五年（~~唐~~大中五年）唐王朝在敦煌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从此，直到宋仁宗景祐三年（~~元祐~~景祐三年）为西夏所灭，除张承奉一度称金山国和敦煌国外，瓜沙归义军在张、曹两世家的统治下，共存在了 ~~元祐~~ 余年。

张议潮起义及归义军政权的建立

张议潮，甘肃敦煌（沙州）人，其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张议潮出生时，吐蕃已占领了敦煌。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吐蕃的残暴统治，在青少年时代便忧国爱民。他有感于吐蕃统治下民不聊生的凋敝景象，深深同情人民的疾苦，十分崇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诚陷害的著名将领封常清，曾亲笔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闻》。宪宗元和十年（~~元祐~~元和十年），~~元祐~~ 岁的张议潮曾抄下一首《无名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
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

.....

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
君不见城外空墙框，将军只是栽花竹。

君看城外恹惶处，段段芋花如柳絮。
海燕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在以后的岁月里，张议潮时刻在考虑着出路问题。

唐武宗会昌二年（~~848~~年），吐蕃赞普郎达磨遇刺身亡。达磨无子，佞臣立其妃琳氏三岁的侄儿乞离胡为赞普，许多人都不服，甚至离叛，从而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乱。吐蕃本部称作“邦金洛”的奴隶平民也乘机起义。藏文史书说，这次起义“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⑫吐蕃原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即论恐热）亦叛，并篡夺了吐蕃大权，自称为宰相，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更加深了河西人民的灾难。尚恐热“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剽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⑬尚恐热在河西的暴虐行径，不仅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且还使他的部下怨望不平，“皆欲图之”。^⑭正在这时，吐蕃国内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河陇各地吐蕃守将思想混乱，兵防空虚。唐王朝乘此机会，决心收复河湟地区。会昌四年（~~854~~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⑮大中元年（~~851~~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次年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珣奏“破吐蕃，克清水”，^⑯并一举收复了原州（宁夏固原）、石门等六关和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唐王朝的军事胜利给河陇人民带来了希望和鼓舞，也为张议潮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时机。据敦煌文献《张淮深碑》载：张议潮“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铃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便举起了起义大旗。

张议潮在沙州（敦煌）起义，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自大

历元年（~~苑~~延元）河西节度杨休明由凉州徙镇沙州后，汉族军民也纷纷来到敦煌，沙州遂成为当时河西地区汉人的聚集地。当吐蕃攻取沙州时，沙州人民坚持斗争，固守达十一年之久。后因弹尽粮绝，才在“毋徙它境”的条件下出城投降。这样就使沙州的汉人得以聚存，并将唐朝的思想文化、风俗民情等延续下来，这就是张议潮首举义旗的社会基础。

张议潮沙州起义，其骨干力量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敦煌的名门望族。如张氏、索氏、李氏等，都是沙州一带举足轻重的家族，在起义和收复河西的过程中，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释门教首及僧徒。如洪誓虽在吐蕃“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但他“远怀故国，愿被皇风”，所以尽力帮助张议潮收复沙州。敦煌乃中西交通要冲，佛教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释门教首及僧徒在百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三，豪杰义士。如副使安景旻、部落使阎英达等都是当地豪杰。^⑬

张议潮正是在这些人的鼎力相助下，才明确提出了“归国”的口号，并广泛地组织、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当条件成熟时，他毅然“募兵”集众，发动起义。大中二年（~~愿~~延元）“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议潮遂摄州事”。^⑭当然，张议潮起义并非像《通鉴》记载的这么简单、容易，而是经过浴血奋战，并采取了许多战略战术，如“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才“破吐蕃之围。”在短兵相接之际，“白刃交锋，横尸遍野，残烬星散，雾卷南奔。”^⑮经过一场血肉鏖战后，一举收复了沙州。据《张淮深碑》载：“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紆道驰函（原注：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载遂差押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已献天子。）上达天闻。”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欣然赞叹：“关西出将，岂虚也哉。”

当张议潮收复沙州时，河西其他州县仍在吐蕃统治之下。为

了及时向唐王朝告捷，并确保表文送到长安，他便派遣了十队使者，携带十份同样的表文，分十路赴长安。其中还有由和尚组成的一支，这是因为吐蕃奴隶主也信奉佛教，和尚借游方化缘，易于通行。敦煌莫高窟的大和尚悟真就是当时的信使之一，因为他送信有功，被唐王朝于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封为“京城临坛大德”。在十队使者中，只有走东北道的一路，经过千辛万苦，才在天德军（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于大中四年抵京。在这两年中，张议潮一方面把沙州作为根据地，整饬军队，发展生产，“缮甲兵，耕且战”。另一方面以沙州为根据地，继续进军，和吐蕃奴隶主展开了进一步的斗争，到大中五年（~~855~~856年）又相继收复了邻近的肃、甘、伊等州。为了实现“归国”之目的，张议潮于大中五年八月又派其兄议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 ~~四~~人奉十一州（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图籍入长安告捷。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故地复归唐王朝所有。

唐宣宗接到瓜、沙十一州图籍和张议潮的捷报后，特下诏表扬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⑬⑭} 八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十一州，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

随着瓜、沙、肃、甘诸州的收复及沙州归义军的建立，吐蕃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集中于姑臧（即凉州）。凉州是北朝、隋唐以来的河西重镇，唐朝前期一直是横断吐蕃和突厥的河西节度使所在地。吐蕃统治时期，又是统辖河西东部的大军镇驻地。如果凉州仍在吐蕃手里，张议潮对河西东部及陇右数郡的控制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张议潮为了有效地控制河陇，便从大中十二年八月开始了他东征凉州吐蕃的壮举。^⑮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咸通二年，张议潮终于率蕃汉兵七千人，一举攻克了凉州。《张淮深碑》

记其事曰：

姑臧虽众，勅寇坚营。忽见神兵动地而至，无心掉战，有意逃形，奔投星宿岭南，苟偷生于海畔，我军乘胜逼逐，虏群畜以川量；掠其郊野，兵粮足而有剩。生擒数百，使乞命于戈前，魁首斩腰，疆尸染于蓁莽。

张议潮收复凉州后，即表奏朝廷。于是，“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⑬咸通四年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这对于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归义军政权的建立，并非意味着唐王朝有效地控制了河西地区。自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政治腐败，国力衰微，除置军设使，并以官爵羁縻张议潮外，已没有经营河西的军事能力了。史称张议潮以瓜沙等“十一州来归，而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⑭而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其身兼节度、管内观察、营田支度等使，握有军事、行政、财经大权，经营河西地区的重任也自然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当时，河西地区的形势十分复杂：南面的吐蕃还在伺机卷土重来；北面的回鹘也在觊觎着河西这块富庶之地。另外，吐蕃的奴部唃末，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⑮他们纠合在一起，大肆劫掠河西各地。

张议潮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河西的险恶处境。他不得不在没有唐王朝帮助的情况下，领导河西人民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长期的斗争。《张议潮变文》直接记述了大中十年至十一年间的

三次战役：第一次是吐谷浑王进犯沙州，张议潮出兵讨伐，乘胜追击，并大获全胜。“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即张议潮）：‘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袭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凿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决战一阵，蕃军大败。……生口细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夺得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而归军幕”；第二次是纳职县回鹘、吐蕃抄掠伊州，张议潮统兵讨伐，大获全胜。《变文》说：“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回鹘大败……收夺驼马之类一万头匹。我军大胜，匹骑不输。遂即收兵，即望沙州而返”；第三次是叛乱回鹘劫夺唐朝册立回鹘使王端章，张议潮闻知大怒。由于下文残缺不全，不知结局如何。《变文》说：“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瑞（端）章持节而赴单于……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逆回鹘一千余骑，当被劫夺国册及诸敕信。……仆射闻言，心生大怒”，准备出兵征讨。由此可知，张议潮为了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骚扰、劫掠，仍然进行着非常艰巨的斗争。《张议潮变文》中所说议潮“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

咸通七年（~~咸通~~元年）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⑭其余众逃奔秦州，途中又遭到尚延心的袭击，“吐蕃自是衰绝”。河陇肃清，使唐王朝无西顾之忧。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⑮唐王朝的势力，已达陇右诸地。

正是张议潮领导的沙州起义及其战果的不断扩大，河西地区才得以克复，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遗黎，悉出汤火”。^⑭对于他在河西重振大唐声威的业绩，人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到阶前而拜舞。北方猱狖，款少骏之馭蹄，南吐蕃浑，献昆岗之白璧”。^⑮堪称英雄盖世之功！

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其战果的不断扩大，对唐王朝来说既喜且忧，喜的是陷于吐蕃百年之久的河陇地区复归唐王朝所有；忧的是在唐末藩镇割据、内弱外强的形势下，唐王朝怕张议潮及其张氏家族尾大不掉，成为与唐廷抗衡的第二个“吐蕃”。因此唐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阻止张议潮势力的扩张。如在张议潮起义不久，其兄张议谭便“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⑮以“人质”的方式留在了长安。咸通八年（~~867~~867年），~~23~~23岁的张议潮也“束身归阙”，留居京师，和其兄长一样，成了唐朝廷的变相人质。

张议潮入朝时，将河西归义军事务总委其侄张淮深管理。唐朝廷任命议潮为左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第，可以说给了很高的礼遇，其目的显然是把张议潮留在京师。咸通十三年八月张议潮卒于长安，享年 ~~70~~70岁。

圆援归义军政权的沿革

（员）张氏政权的艰难统治

自大中五年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张议潮率众和回鹘进行了几次战争，于咸通二年（~~861~~861年）收复了凉州，咸通七年彻底摧垮了尚恐热。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

河西全部收复后，张议潮激流勇退，于咸通八年（~~867~~867年）入朝，被唐王朝授司徒之职，兼授左神武统军，官居一品。张议潮入朝后，由其侄张淮深执掌河西归义军事务。“太保（张议潮）

咸通八年归阙之日，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侄男淮深，令守蕃垣^{①46}。早在大中七年（~~咸通~~八年），张淮深便继其父议谭职，任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后，唐王朝加授淮深御史中丞，而其本人则自称节度留后，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并在咸通十三年议潮去世前，多次遣使唐朝，请求皇帝颁赐旌节，但唐王朝并未马上将节度使称号授予他。淮深因向朝廷求节不成，便自称为河西节度兼户部尚书。乾符年间（~~咸通~~—~~乾符~~年）唐王朝才加授淮深为归义军节度使。至迟到光启三年（~~乾符~~年）他又进称尚书左仆射。文德元年（~~乾符~~年），唐派押节大夫宋光庭，朔方押牙康元诚等赴沙州，授予张淮深旌节。^{①47}大顺元年（~~乾符~~年）被杀后，朝廷追赠为司徒。

《张淮深墓志铭》说：“公以大顺元年二月廿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葬于漠高乡漠高里之南原，礼也。兼夫人颖川郡陈氏，六子：长曰延晖，次延礼，次延寿，次延镠，次延信，次延武等，并连坟一茔，以防陵谷之变。”

关于张淮深之死，向达先生说：“盖在大顺元年沙州骤乱，变生肘腋，淮深猝未及防，举室殒毙。作乱者即索勋其人也。索勋既杀淮深兄弟，遂自立为节度使，故再修功德记并无嗣立之辞”。^{①48}

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与公布，特别是《伯希和笔记》的出版，学术界对张淮深之死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末尾，张淮深之弟张淮□，被议潮婿李明振题为：“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西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见~~1905年法国出版的《伯希和笔记·敦煌洞窟题记》中亦载其录文，而“张淮□”为“张淮鼎”。据有的学者研究，“议谭辈只两兄弟，即议谭、议潮，而议谭仅只淮深一子，则淮鼎当为议潮子无疑”。淮鼎为了和淮深争权夺利，便发动兵变，杀死了淮深。^{①49}

张淮鼎于大顺元年二月杀害淮深夫妇及六子后，即成为归义军统治者，但他在位时间不长，至迟在景福元年（~~892~~893年）去世，死前托孤于索勋。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动呢？这是因为淮鼎杀淮深之事极端隐秘，索、李两家似乎都未参与其事，但索勋并不一定赞成淮鼎之所为，所以他收养了淮深遗女。淮鼎去世时，承奉年幼，不能独掌政权，所以才有“托孤”之说。由于这时李明振已死，李氏家族除议潮十四女外，均为晚辈，而索家乃沙州望族，索勋一直握有瓜州军政大权，又是张、索、李三家独存的长辈，故而其地位优于李氏。因此，由索勋辅佐张承奉执政，也就为大家所接受。李氏三子则分占瓜沙军使、刺史之位，掌握实权，相互牵制。景福元年，索勋见承奉年幼，有机可乘，便向唐朝廷请封节度使。~~893~~894年秋天，朝廷即遣使沙州，正式授予索勋归义军节度使之职，遂独揽了归义军大权。

索勋掌有归义军政权后，即引起了李氏家族的不满与妒忌。~~894~~895年，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第十四女率张、李家族推翻了索勋的统治，立侄男张承奉为节度使。但李氏三子分别任沙、瓜、甘州刺史，实际掌握了归义军实权，到了~~896~~897年底，李氏家族的势力达到了极盛，并排挤了张承奉而独揽归义军大权。李氏家族的所作所为，必然引起瓜沙一些大族势力的反对，于是在沙州出现了一场倒李扶张的政变。到了~~897~~898年初，李氏的统治终于被瓜沙一些大族推翻，张承奉得以重新执政。^{①⑤0}

张承奉掌有归义军政权后，任归义军节度副使，曾与回鹘进行多次战斗。到光化三年（~~900~~901年），唐王朝正式授予张承奉节度使称号。《旧唐书》载：光化三年八月“己巳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①⑤1}。朱温取代唐朝后，张承奉即脱离了中原王朝之控制，于~~901~~902年建立了

西汉金山国。

综观张氏统治归义军的历史，真可谓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归义军建立之初，张氏曾企图控制整个河陇及西域东部地区。这一企图一方面与唐王朝发生矛盾，另一方面，旧有的吐蕃、退浑、龙家和新来的回鹘等民族，也乘吐蕃王国崩溃之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特别是位于归义军东西的两支回鹘力量的兴起，终于将归义军钳制在瓜沙一隅。再加上张氏统治者自议潮到承奉，皆好大喜功，但军力不济，终归失败。^⑮

（圆）西汉金山国与敦煌国

在瓜沙归义军时期，曾经出现了一个以敦煌为中心的西汉金山国和敦煌国。它上承张氏，下启曹家，“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⑯，是归义军时代的一个间断，具有一定的历史重要性。然而，正史只有二十字的记载，《旧五代史·吐蕃传》云：“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五代史·吐蕃传》同）从这些简略记载中，很难窥见金山国的具体情况。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十多卷有关金山国的材料，特别是《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的发现，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使“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⑰

敦煌遗书发现后，王重民先生利用有关资料，撰写了《金山国坠事零拾》，基本搞清了金山国的轮廓，“千载坠史，一旦重逢，其快乐有不能言喻者”。近年来，随着敦煌遗书资料整理、研究的进展，不仅对金山国的有关问题愈益明确，而且还发现张承奉时代敦煌地区尚有一个敦煌国存在。李正宇先生《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⑱一文，是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成果，基本搞清了金山国和敦煌国的有关问题。

金山国的全称是“西汉金山国”，“西”乃是指其国所居之方位，它是以中国为坐标的；“汉”乃是言其国民族之属性。“西

汉”连用，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即今甘、青、新三省交界处之阿尔金山。杂缘原《敦煌录》说：“金鞍山在沙山西南，经夏常有雪，山中有神祠甚灵，人不敢近”。孕猿猿《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也说：“沙州本是善国神乡，福德之地……东有三危大圣，西有金鞍毒龙”。

张承奉祖孙三代，都把精力倾注于统一河西，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安定之区。金山国的建立，就是在唐代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河西失控的形势下，归义军节度使重整河西之志的集中体现。它的建国，其矛头是对准回鹘、吐蕃、羌浑等周围民族的。“东取河兰广武郡，西取天山瀚海军，扫定燕然□岭镇，南尽戎羌逻莎（拉萨）平”^①，就是金山国战略宏图的概括反映。从《龙泉神剑歌》的多次强调“打却甘州坐五凉”、“兼拔瀚海以（与）西州”的叙述看，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回鹘势力的。

西汉金山国，是作为中原王朝藩镇之一的瓜沙归义军自己建立的王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建立，是脱离中原王朝的分裂割据行动。但是，它的矛头并不是针对中原王朝的，而是对黄巢起义以来，中原王朝自顾不暇，根本无法顾及河西的安危，而任其日益混乱的局势下，张氏政权奋起自振的行动，它是张氏先人“破却吐蕃收旧国”，“赖得将军开旧路”之志的继续。当金山国建立之时，张承奉仍然着意突出一个“汉”字，甚至在后来被回鹘打败，发出实同降表的《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中，仍继续强调“沙州本是大唐州郡”，“太保……归唐……承恩至重”，“太保……趁却节儿，却着汉家衣冠”，表明了其归顺中原王朝之心的坚定不移。

众所周知，在金山国建立之时，周围民族不断对敦煌地区进行蚕食，并阻断了敦煌与中原、西域的正常交往。朱全忠杀害唐昭宗，排除异己，加紧了篡唐活动。而中原王朝自顾不暇，听任河西扰乱，使敦煌陷于“四面六蕃围”的孤岛状态中。正是在这

种局势下，张承奉才建立了西汉金山国，以图自存。

金山国建立短短几年，就于 848 年 苑月宣告终结，并为敦煌国所代替。其原因何在呢？

众所周知，金山国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都与回鹘之间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张议潮时期，归义军统有瓜、沙、伊、西等十一州之地，到金山国建国前后，就只剩八州了，所失三州为甘、伊、西。其中甘州为河西回鹘占据，伊、西两州为高昌回鹘占据。就是所存八州，也不断受到回鹘的骚扰和蚕食。张承奉为了维持瓜、沙的安全，保证八州的完整，并试图恢复祖父的十一州版图，就不得不讨伐回鹘。而回鹘在河西重建政权后，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生存和扩大势力范围，与金山国争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敦煌，也就屡次兴兵攻打金山国。

早在张承奉任归义军节度使初期，大约在光化年间（890—895 年），回鹘人就曾打到敦煌近郊，焚烧了金光明寺的佛殿。金山国建立的当年，回鹘更是多次攻击，企图把金山国扼杀在摇篮里。有一次，敦煌东界的防线被突破，回鹘军队长驱直入，直抵敦煌城东安营扎寨。结果金山国天子亲自披甲上阵，著名将领阴仁贵、宋中丞、张舍人等奋力应战，才把入侵的回鹘赶回甘州。

850 年，回鹘又大举进攻金山国，“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两刃交锋，各自伤损，口云索和”。金山国因连年战争，国衰力微，“百姓不安，多□煞伤，沿路州镇迤邐破散，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遂不得不与回鹘求和，条件是“可汗是父，天子是子”^[57]。从此，张承奉被迫取消“西汉金山国”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并在甘州回鹘的恩准下，屈尊降格而改建了诸侯郡国——敦煌国。

敦煌国是在金山国的基础上改制而诞生的，它称甘州回鹘可汗为“父”，自称为“子”，同甘州回鹘结成了父子之国。从其名

号来看，它是甘州回鹘的属邦。其原有地盘之一的肃州被割去，新的封疆只有瓜沙二州，即古敦煌郡的范围，以其地名其邦，故改名敦煌国。

（獯 曹氏的继续统治瓜沙

当张承奉臣服回鹘，与其结成“父子”关系，建立敦煌国后，便丧失了瓜沙地区的威望。怨元年张承奉卒后，就由曹仁贵（即曹议金）取代张承奉重建了归义军政权，开始了曹氏政权对瓜沙的统治^{⑤⑧}。

曹议金执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保持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东面结好甘州回鹘，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又嫁女给甘州回鹘可汗为妻。在西边，他很重视和于阗的友好关系，嫁女给于阗王李圣天。在他的一些发愿文中，一再求佛保佑“于阗使人，往来无滞。”而于阗来瓜、沙的使者也络绎不绝。据曹氏时期的一残酒账单记载，在半年之内，于阗曾四次遣使者到沙州，而且居住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正是由于曹议金采取了上述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措施，才使瓜、沙这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曹议金的统治相对稳定后，就上表给中原王朝，求授旌节。“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守沙州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议金为检校司空，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瓜沙与吐蕃杂居，自帝行郊礼，议金间道贡方物，乞授西边都护，故有是命。”^{⑤⑨}至此，曹议金政权才正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承认。

清泰二年（怨缘年）二月十日曹议金死后，由曹元德执掌归义军政权。曹元德继位后，不断遣使于辽，与其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但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其使臣甚至卑躬屈膝地向辽主“作本俗舞”，这固然是很不光彩的，但也从反面说明了瓜沙曹氏与中原

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这也是曹元德所搞的多边外交，他企图借助辽的势力，牵制回鹘。曹议金执政时期，迫于回鹘的压力，曾低声下气地称回鹘可汗为“父大王”。曹元德继位后，力图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清泰四年（~~936~~年）他出巡甘州，与回鹘顺化可汗商议“所有社稷久远之事”，“平稳以讫”。在商议过程中，他与回鹘可汗平起平坐，以兄弟相称。曹元德面对强大的回鹘，敢于改变两者的关系，说明了曹氏势力渐趋强盛。^{①⑥①}

大约在天福五年（~~940~~年）初，曹元德去世，曹元深继位。不久，曹元深即于天福七年自称“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①⑥②}同年五月，曹元深派出的使臣“附于闐使刘再升”朝贡于后晋。次年正月十一日，后晋皇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沙州留后曹元深加检校太傅，充沙州归义军节度使。”^{①⑥③}

天福九年（~~944~~年）三月九日，曹元深卒，弟元忠即位。元忠即位之初，后晋只给了他一个“沙州留后”的职衔，而他在瓜沙却自称“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显德二年（~~957~~年），曹元忠遣使朝贡，后周“世宗命以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铸印赐之。”^{①⑥④}不久他又自称“敦煌王”。

曹元忠在瓜沙的统治长达三十年，是归义军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其时也是曹氏政权的鼎盛期。在其统治时期，继续保持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不断遣使朝贡。尤其是北宋统一中原之后，他与北宋的关系更加密切。他还继续加强与于闐的友好关系，曾致书于闐王，以甥舅相称。

开宝七年（~~962~~年）六月六日曹元忠卒，由其侄曹延恭充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其子曹延禄充归义军节度副使。开宝九年（~~968~~年）曹延恭去世后，便由延禄任归义军节度使。

瓜沙曹氏政权在曹元忠执政时期达到了鼎盛，但由于曹元忠及其夫人浚阳翟氏十分佞佛，在莫高、榆林诸石窟中大肆开窟造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这种劳民伤财之举，势必加重各族人

民的负担，激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到了曹延禄执政时期，这些矛盾已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回鹘、达恒及肃州家相合，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向西行兵。”^{①64}咸平二年（~~991~~年）十二月沙州蕃族首领单独朝贡于宋，也从侧面反映了曹延禄统治之不稳。到了咸平五年（~~1014~~年）终因“当道二州八镇军民，自前数有冤屈，备受艰辛”，发生政变。他们内外合势，围攻节度使府第，“延禄等知其力屈，寻自尽。”^{①65}

咸平五年曹延禄死后，由其族子曹宗寿执掌瓜沙归义军政权。有的学者通过对俄藏敦煌写本《曹宗寿造帙疏》的研究，认为曹延禄之所谓“自尽”，很可能是被曹宗寿搞政变杀害。曹宗寿篡权之后，就将政变之事报告了北宋王朝，把曹延禄的被杀写成“自尽”。^{①66}而北宋王朝认为瓜沙地区远离中原，“本羁縻而世荷王命，岁修职责，乃授宗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封谯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竭诚奉化功臣。”^{①67}曹宗寿执政时期，继续保持与北宋王朝的朝贡关系，并请求北宋派遣铸匠及善藏珠者，到瓜沙传授技术。与此同时，还与辽有朝贡关系，如景德三年（~~1034~~年），遣使向辽贡大食马、美玉等，辽则以对衣、银器赐之。

大中祥符七年（~~1015~~年）四月曹宗寿子曹贤顺继任归义军节度使。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以归义军兵马留后曹贤顺为本军节度使。弟贤惠为检校刑部尚书、知瓜州归义军掌书记。”曹贤顺继位后，在曹宗寿和宋、辽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联系，尤其注意加强和辽的关系。他曾多次遣使辽朝，甚至还亲自入辽，受到了辽的宠遇。其统治一直持续到景祐三年（~~1033~~年）西夏占领沙州。

综观曹氏时期的归义军，其辖地虽然只有二州（瓜、沙）六镇（紫亭、悬泉、雍归、石城、新城、常乐），人口不过万数，

势单力弱，但却在中原政权的变幻、交替中，在河西地区支撑了一个多世纪。其主要原因是：曹氏统治者吸取张氏政权失败的教训，更加注意文治，大兴佛事，在千佛洞不遗余力地开洞修龕，利用宗教的力量作为政权的精神支柱，从而使以佛教为主体的沙州文化在这一地区居于首位，由此来博得周围各民族的尊崇；同时，曹氏统治者接受张承奉割据称帝、尽失人心的教训，去帝号，奉中原王朝正朔，恢复归义军节度使旧称，努力争取中原王朝的承认。曹氏历任节度使注意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在西北诸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曲子词“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就道出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立国的基本国策。此外，曹氏还强调民族意识，作为立国之本。并与东西回鹘和于阗和亲，使之互相牵制，以图自存。

獭归义军时期的统治政策

归义军政权建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其统治。在对外关系方面，如前所述，张议潮主要以瓜沙为根据地，对外征讨，扩大战果，巩固归义军政权对河西的统治。内政方面，主要是恢复或改变旧制。

（员）重建乡里制

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即取消了吐蕃时期的部落、将制，恢复重建唐前期在这里实行过的州县乡里制。当然，开始恢复的并不是 员个乡，而是 员个乡，另外新出现了一个赤心乡，共 员个乡。如 杂 圆 怨 《敦煌诸寺比丘尼姓名年龄籍贯表》^① 在记录女尼的原来籍贯时，提到了敦煌乡、莫高乡、神沙乡、平康乡、龙勒乡、玉关乡、洪池乡、洪润乡、效谷乡、赤心乡、慈惠乡。孕 圆 怨 卷提到的也是这 员个乡。

原来的寿昌乡，又升格为县，乡名自然就没有了。从化、悬

泉二乡则消失了。对于从化乡消失，池田温先生认为，到了愿世纪中叶，作为从化乡主体的粟特居民就在显著减少，吐蕃占领后，一些下层居民沦为寺院的寺户，而一些有势力者则四处逃散，“有的归还了本国，有的散入回鹘势力圈内或其他地方，剩下的一些粟特人后裔则依附于汉人的寺院，结果最终被汉人社会所淹没”。因此，当归义军政权“在敦煌重新施行乡里制的时候，尽管其他各乡又全都复置，可是惟有从化乡却再未出现，说明它已经消亡”。⁽¹⁶⁹⁾

悬泉乡消失了，却出现了赤心乡。对此，陈国灿先生指出，赤心乡的乡名，具有赤胆忠心，赤心为国之意，或许与张议潮起兵，以悬泉乡为基地，以该大族为基干，擎举反蕃义旗，赤心向国有关。原悬泉乡偏处敦煌县东，是索、张、赵、李、令狐、阴、曹诸大族较多的乡，这些家族正是后来归义军政权的基础，而以此乡作基地来组织反蕃起义的可能性也最大。因此，张议潮收复敦煌后，就改乡名为赤心，可能是对本乡赤心向国义举的表彰。另外，在归义军统治下的瓜州还有“悬泉镇”，它与敦煌县的悬泉乡同名而异地。为了避免混同而改乡名，可能也是当时考虑的一个因素。⁽¹⁷⁰⁾

以上所述只是归义军前期敦煌县诸乡的基本情况，实际上，归义军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更为复杂。尤其是归义军统治敦煌长达八十余年，其间由于中原王朝形势的不断变化，各民族的分散聚合，归义军本身统治力量的消长起落，都可能为敦煌县乡的演变产生某种影响。如通颊乡和退浑乡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第一，通颊乡的出现

敦煌背《己亥年安定昌雇工契》曰：“己亥年六月五日立契，通颊乡百姓安定昌家内欠少人力，遂于赤心乡百姓曹愿通面上（以下空白）。”

这是有关通颊乡的最明显证据。

杂_愿源_愿号《甲辰年——丁未年（_愿源_愿—_愿范_愿年？）李闾梨出便黄麻麦名目》^⑪有“通颊孔曹子便黄麻玖斗，至秋一石三斗五升；通颊孟庆郎便麦两硕，至秋叁硕；洪池宋猗奴便黄麻一斗，至秋一斗五升；洪池龙什德便黄麻三斗，至秋四斗五升”。这里的洪池，显然是指洪池乡。那么，通颊也应该是通颊乡。

孕_愿愿_愿号背《便粟历》^⑫中有“敦煌张佛宁、平康任瘦子、洪池汜察察、慈惠石通子、洪润索温子、赤心张粉堆、通颊龙磨骨悉鸡”等人的便粟帐目。这里的敦煌、平康、洪池、慈惠、洪润、赤心、通颊，显然都是敦煌县的乡名。

孕_愿愿_愿号背《孔再成等贷麦豆本历》中也有“玉关孔再成、神沙郭佛奴、龙勒蒋保住、慈惠索骨子、效谷令狐阿、洪池李残子、洪润梁清子、通颊宋宋监儿、赤心裴憨子”的记载。这里的玉关、神沙、龙勒、慈惠、效谷、洪池、洪润、通颊、赤心，显然也是敦煌县的乡名。

上引文书中的杂_愿愿_愿号背之己亥年，池田温先生疑为_愿愿_愿年，已基本上为学界接受；孕_愿愿_愿号背《便粟历》虽然没有纪年题衔，但文中出现的郭酒司、张粉堆二人，在孕_愿愿_愿号背《甲辰年（_愿愿_愿年）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文书中也有记载，由此唐耕耦先生估计，这二件文书的年代可能相近；孕_愿愿_愿号背《孔再成等贷麦豆本历》也没有纪年，唐耕耦等先生将其定为九世纪后期，^⑬似乎不妥，因为据杂_愿愿_愿号背《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记载，十世纪初通颊还是部落。

根据目前已知资料，有关通颊乡的最早文书，是公元_愿愿_愿年。由此荣新江先生推断：“大概在十世纪三十年代，敦煌地区正式成立了通颊乡。”^⑭从现有资料看，这个推断是正确的。由此也可证明，孕_愿愿_愿号背《孔再成等贷麦豆本历》不应定为九世纪后期，而应定为十世纪中后期。

第二，退浑乡的探讨

孕_愿题背《甲子乙丑年（_愿源—_愿缘年）翟法律出便与人名目》，共存_愿原行，是洪池张佛奴、龙勒高衍鸡、神沙安集子、效谷贺弘子、平康索再全、赤心张惠通、慈惠王再员等人借麦、豆等的帐目。本件文书中的洪池、龙勒、神沙、效谷、平康、赤心、慈惠，显然是敦煌县的乡名。值得注意的是，该件文书三次提到退浑，即退浑程憨多、退浑何员定、退浑王再昌，并且将退浑与上述_愿乡一并排列，故我们怀疑这里的退浑就是退浑乡。

我们说，本件文书中的“退浑”可能是退浑乡，在_愿原袁号《甲辰年—丁未年（_愿源—_愿源年？）李阁梨出便黄麻麦名目》中也能得到少许反映。该件文书中有“通颊孔曹子，便黄麻玖斗，至秋一石三斗五升；退浑慕容略罗，便麦肆硕五斗，秋陆硕柒斗五升；洪池龙什德，便黄麻三斗，至秋四斗五升”的记载。上面已经提及，文书中的洪池、通颊，系指洪池乡和通颊乡。那么，与洪池、通颊并列的退浑，就应该也是退浑乡了。

如果说上列文书中的“退浑”就是退浑乡，那么，退浑乡的出现有何历史背景呢？

吐谷浑进入河西的时间较早。在吐蕃时期，吐谷浑就是河西的主要民族之一。归义军统治河西时，居住于河陇的主要有汉、吐蕃、吐谷浑、回鹘、羌、唃末、龙家等族。这时的吐谷浑，依然依附于吐蕃，并和归义军政权相抗衡，如《张议潮变文》中就记述了大中十年吐谷浑欲劫掠沙州，被张议潮率军打败的事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袭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鏖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直到退浑国内，方始尔夫”。

归义军政权建立初期，不仅回鹘、吐蕃等大部族，就是较小的退浑、唃末、羌、龙家等，也乘着空虚混乱的机会，在西北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并扩充自己的势力。被斯坦因劫去的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记载说：“河西诸州，蕃、浑、

嘼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①⑥}敦煌文书《张淮深碑》中“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嘼末，雷威慑伏”的记载，也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反映。

经过三十多年民族间的分散聚合，退浑便完全为归义军所控制。杂徭~~号~~《肃州防戍都上归义军节度使状》文书中记载说：“又今月七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其退浑王拨乞狸，妻则牵驮，夫则遮驱，眷属细小等廿已来随往，极其苦切，余者百姓奴客，并不听去。”据唐长孺先生研究，本件文书的年代为中和四年（~~唐僖宗~~原年），^{①⑦}这一看法已基本上为学界接受。由此可知，到九世纪后半期，当回鹘人大举进攻甘州之时，退浑人并没有随着其旧主人吐蕃南入藏地，而是逃到肃州，进入了归义军节度使的管辖范围。^{①⑧}

归义军统有退浑人后，并没有立即将其编入敦煌的乡管百姓中，而是保持了其民族的整体性，仍然以部落的形式加以统治。属于归义军曹氏政权初期的杂徭~~号~~《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中“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的记载，就是明证。

退浑部落在归义军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在与当地乡管百姓的共同生活中，逐渐适应了当地的定居农牧业，其部落制已逐渐向乡里制演变。大约在通颊乡出现的前后，即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敦煌地区正式出现了退浑乡。

以上我们对归义军时期乡的建置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与唐前期不同的是，归义军在乡一级设置了知乡官，负责全乡的政务。乡下虽仍设里，但因里正的许多职权被收到知乡官手里，使里正在基层政权中的作用比以前下降了。这种将基层政权集中于乡的变化，是对唐代乡里制的一种发展。与此同时，在敦煌城

中，归义军还恢复了唐前期实行过的城坊制度和坊巷的称谓。张议潮还仿照内地的军政体制，设置了与中原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恢复了相应的一套文书、行政制度。

（圆）土地制度的调整

归义军政权建立初期，由于刚刚推翻吐蕃统治，旧的统治秩序和生产关系被摧毁，出现了许多荒地，这正如《文献通考》所言：河西“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日之殷富繁华矣”。^{①⑧}这些荒田闲地，按惯例是属国家所有，只不过在瓜沙地区，是由唐王朝的特殊藩镇——归义军政权掌握罢了。因此归义军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调查人口、土地，分配无主荒田。如杂_通原背《唐大中六年（愿_通元年）四月沙州都营田李安定牒》、杂_通原背《唐大中六年（愿_通元年）十月令狐安子状》、杂_通原背《唐大中六年十一月唐君盈申报户口田地状》、孕_通原背《沙州安善进等户口田地状》等，就是归义军政权初期的户籍田地手实，其形制与唐前期实行均田制时的户籍手实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废除了吐蕃时期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重新登记了户口、土地。为了得到唐王朝的承认和支持，尽可能地恢复唐制。

众所周知，唐中叶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买卖逐渐频繁，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即晚唐五代宋初。这一阶段，在敦煌历史上正属归义军时期。

从敦煌文书可知，归义军时期的私有土地包括官僚地主的占田、寺田和小自耕农的民田。尤其是地主和小自耕农的私田，其数量、规模，从唐后期至五代宋初，都在不断扩大之中。张氏归义军时期，一般民户的土地大多是几十亩，虽有百亩以上者，但毕竟是少数。而到曹氏归义军时期，其土地达到百亩以上者就比较普遍了。如属于曹元忠时代的孕_通原背号《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①⑨}，共载纳布人苑_通人，其中罗山胡苑_通亩，罗友

友 员伍亩，张友全 员伍亩，唐粉子 员伍亩，张友子 员伍亩，汜盈达 员伍亩，邓像通 员伍亩，王清升 员伍亩，刘再松 员伍亩，康保清 员伍亩，黑善兴 员伍亩，赵索二 员伍亩，贺清儿 员伍亩，罗安定 员伍亩，张辛德 员伍亩，李保山 员伍亩，李再住 员伍亩。上列土地上百亩的 苑人，约占 孕猿号文书所载 苑人的四分之一强。另外还有约 苑人的土地都在 苑亩以上。当然这些并不是他们所占土地的全部，因为归义军政权实行的是据地纳税的政策，本件文书就是一件据地征收布匹的《官布籍》。为了使纳布整齐，都是 圆亩纳布一匹，即将几个人相邻的几畦土地合为 圆亩，由土地拥有者向政府纳布一匹。因此本件文书所载的土地数，只是他们所占土地中的一畦，根据一般土地占有、分布的原则，完全有可能还有第二、第三畦，甚至第四、第五畦。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才说曹氏归义军时期土地占有百亩以上者比较普遍。

另外，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 远缘—远页所载《宋端拱三年（怨年）沙州户邓守存等户口受田簿》上，有“归义军节度使之印”，自然也属于归义军时期的文书。该文书所载邓守存户“都受田贰顷”，陈长晟户“都受田肆顷柒拾亩”，其土地占有量也是比较多的。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私有土地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请射和买卖两个途径实现的。现主要依据敦煌文书，将其分述如下：

第一，请射

归义军政权继承了唐前期的有关制度，对于无主荒田、逃户土地允许民户请射承佃。请射的土地，虽曰“承佃”，实际上就变成了私田，即“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充为永业”。^①可见请射是私有土地发展的一条途径。从敦煌文书可知，归义军时期民户请射的田土大致有三类：

①绝户地。指该户土地已无人继承，自然就成了无主田土，

允许民户请射。②不办承料户田土。因归义军政权实行的是据地出税的政策，谁种地，就由谁承担赋税徭役。因此，不论何种原因，只要土地拥有者不承担政府的赋税徭役，政府也就不承认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允许民户请射。③官荒地。关于官荒地的请射，《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载：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这里的射，就是请射，即在宽乡可以指定地点地段请授。指定地点地段的请授，就是请射，犹如射箭中的一样。指物而取曰射。这里的物自然就是地。因此，敦煌文书中凡指明地段四至的请地牒、辞，都属于请射田土。

第二，买卖

众所周知，土地买卖在唐前期是受到国家诸多限制干预的，到了唐后期，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据地而税，即谁耕种土地就由谁纳税。而对土地的买卖，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则不做过多的干预，基本上是“人从私契”，即私契在土地买卖中具有合法的地位，并起决定作用。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史籍文献记载不多，而敦煌所出归义军时期的土地买卖文书则为我们提供了客观而生动的依据。如孕源苑《出卖口分地契》后有“或有恩敕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两共对面平章为定，更不许休悔。如若先悔者，罚上马壹匹。恐人无信，故立私契，用为后凭”；杂图缘《阴国政卖地契》后为“天倾地陷，一定已后，更不许翻悔，如有再生翻悔。罚麦玖硕，充入不悔之人。恐人无信，两共对面平章，故立私契，用为后凭。”

从敦煌土地买卖文书可知，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土地买卖已排除了交易双方之外的各种干预，不再受国家的制约，也不需要官府审核和裁决。买卖双方完全可以根据个人意志自由买卖土地，确认私契的决定作用，“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已为社会所公认。私契的公开和合法，正是土地私有化的反映。不仅如此，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卖地契已和卖宅舍契、卖牛契的形式一样，如 杂律疏苑《唐乾宁四年（~~愿~~乾宁四年）张义全卖宅舍地基契》后有“或有恩敕敕书行下，亦不在论理之限。一定已后，两不休悔，如有先悔者，罚麦叁拾驮，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两共对面平章，故勒此契，各各亲自押署，用后凭验”；孕律疏苑《丙辰岁宋欺中卖宅舍契》后有“中间或有恩敕，亦不在论限，人从私契。一买已后，更不许翻悔，如先悔，罚黄金叁两，充入官家。恐后无凭，故立此契，用为验耳”；杂律疏苑《后唐清泰三年（~~愿~~清泰三年）杨忽律哺卖宅舍地基契》后有“中间如遇恩敕大赦流行，亦不许论理。两共对面平章，准法不许休悔。如先悔者，罚青麦壹拾伍驮，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立此文书，用为后凭”。另如 杂律疏苑和 杂律疏苑拼合之《卖牛契》后有“立契后有人先悔者，罚麦三石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为记”；杂律疏苑《令狐宠卖牛契》后有“依契为定，不许休悔。如先悔者，罚麦伍硕，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书指为记”。由上引卖宅舍契、卖牛契的限制条件说明，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土地已和宅舍、牛一样，成为人户的私有财产，土地拥有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支配土地。

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土地进一步私有化的另一标志，是土地拥有者之间可以任意对换土地。如 孕律疏苑《唐大中六年（~~愿~~大中六年）僧张月光、吕智通易地契》曰：“官有处分，许回博田地，各取稳变。”“已博已后，各自收地，入官措案为定，永为主记”。对于百姓之间的对换土地，归义军政权不加干预，“入官措案为定”，也只是为了便于赋税征收的管理。由此可知，晚唐五代，封建国家对土地的占有状况并不重视，其关注的焦点是据地出税，如宣宗大中四年正月制：“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敕令，累有申明”。^{①81}“地既属人”，即土地已归私人所有，国家不再限制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只是据地征税罢

了。

总而言之，建中元年两税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土地所有制——均田制的瓦解。从此以后，“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①82}即放弃了国家对土地的干预，默认了私家的兼并。因此，两税法推行才猿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①83}这一政策，一直贯穿于晚唐五代。到了宋初，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之际，公然鼓励石守信等拥兵将领“市田宅以遗子孙。”让他们交出兵权后，“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①84}正是在宋初“不抑兼并”政策的指导下，到了北宋中叶，作为土地所有制主要形态的，已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了，为了适应这一土地所有制的转化，当时还出现了由政府制作的“官板契纸”。民间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的说法，正是土地私有制日益发展和土地加速卷入流通过程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①85}

（猿 赋税制度

在重新登记人口和调整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归义军政权还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根据敦煌文书记载，归义军实行的是据地出税的制度，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项。

地子是地税的重要内容，因为地税的范围比地子广，即地税包括地子、布、柴草等。由此可知，归义军时期的地子，虽与两税法时期的地税有密切关系，但地子并不等于地税，地子只是地税中交纳粮食（斛斗）的部分。地子的征纳方式是据地出税，即不论何种情况，谁耕种土地，就由谁交纳地子。

至于地子的税率，由于两税法时期的田亩税在全国没有统一的税额，作为田亩税重要内容的地子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税率。但从敦煌文书得知，“地子”的征纳的确是有一定税率的，大约是每亩地约纳粮猿缘升，甚至更高或更低。这种税率不一的情况，可能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税率，它与统治者的政策，耕地的

面积，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战争、对外交往等，都有一定的关系。^{①86}

至于官布的征收，也是按地征纳的。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原苏联列宁格勒）的敦煌文献中，有一件交纳布匹的残文书，即 ~~Ⅱ 曾 Ⅱ 曾~~ 号。该件文书现残存 ~~行~~，是属于 ~~怨~~ 世纪末 ~~元~~ 世纪初，即张氏归义军末期或曹氏归义军初期的文书。从本件文书的内容可知，当时据地出税的布匹，是每叁顷地造布壹匹，即每 ~~猿~~ 亩土地纳布一匹。另外，属于曹元忠时代的 ~~孕~~ 号《壬申年（~~怨~~ 年）三月十九日敦煌乡官布籍》，对交纳官布的记载更为详细具体。从本件文书可知，每 ~~圆~~ 亩土地纳官布一匹。

为什么地税中既有地子，又有官布和柴草呢？我们知道，两税法不但要征收钱，而且还要征收绢布和柴草等。因为早在建中初年制定两税法时，已是“钱轻物重”，于是中央政府就“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①87} 这里“折钱纳物”的“物”，自然是封建社会农工合一家庭的产品——谷和绢、布帛等等。后来，随着“钱轻物重”向“物轻钱重”的变化，封建政府为了征纳更多的赋税，便于元和十五年规定：“悉以布帛丝绵，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①88} 官布这一税目的出现，可以说是均田制下调布的延续，但和调布又不完全相同，它是特殊时期特殊地方的特殊税种，也是“折钱纳物”或“不征见钱”的一个具体反映。它与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没有实行货币经济有关。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实行的是部落——将制，^{①89} 唐王朝的货币被废除，主要实行物物交换，交换的媒介是实物。归义军政权建立后，由于货币极缺，人们在买卖、雇工、典当、借贷时仍以麦、绢帛、布匹等实物计价。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时期货币不是普遍的交换媒介，唐末五代归义军政权才将唐朝赋税制度中应交现钱的那一部分税

改为征布，因此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一些征收官布的记载。

源媛“日落西山”的莫高窟艺术

在张氏家族统治瓜沙的近六十年中，对佛教的提倡是不遗余力的。他们笃信佛教，尊礼名僧。汉僧洪誓、慧苑、吐蕃僧法成等，都受到优待。张氏统治者不仅控制了政权，而且还控制了神权。因此，在张氏家族统治时期，必然会大量兴建石窟。当时兴建的洞窟有六七十个之多。

在张议潮领导的逐蕃战争中，张、索、李等世家豪族都因立有战功而获得了不同的勋位，执掌了河西地区的政权，因此他们都致力于保护和扩大世家豪族与各大寺院的利益。这时的莫高窟艺术，从总体上看，在形式和内容上没有重大的变化，主要是世家豪族纷纷以“报恩”、“庆寺”为名，营建了不少洞窟，如第332窟、第333窟、第334窟、第335窟等窟。但个别洞窟还是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特别是张、索、李三姓与三个僧统在莫高窟开的大窟，反映出河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比吐蕃时期有所加强。

这一时期的敦煌艺术，在内容上还是有一些突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彩塑中出现了新题材，即高僧塑像。如第332窟中的禅僧像，尤其是第333窟中的洪誓禅定像，面如俗人，神采奕奕，是彩塑肖像艺术中的杰作。其身后北壁上画菩提双树，树上挂经包、水瓶，树下侍女及比丘尼手中各执团扇，分侍左右。其二是供养人画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与豪门世家的统治息息相关的。当时的河西地区，张、宋、李、索、曹等高门大族，互为姻亲，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统治集团。他们不仅控制了政权，而且还把持了神权。他们不仅自己出资造窟，图其形于窟中，而且有些僧侣也为他们歌功颂德，开窟画像。如第334窟张议潮像，第335窟的索勋像等。

此时的供养人画像，并非一人一家，大都是家族式的大排

列。有的祖宗三代，甚至姻亲眷属都依次排列在一起。如第 154 窟，就画有张议潮一家，其兄张议谭一家和他们的父母，以及僧尼等等；第 155 窟中，张承奉夫妇，以及媳妇、侄女、孙子和出家为尼的妹妹等，都并列一窟。这些供养人画像，其意义不仅仅是向佛表示虔诚供养，而是列家序谱，光耀门第，并显示出封建社会的尊卑贵贱之别。

第 154 窟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是唐代供养人画像中最杰出的两幅作品。每幅画中人物一百有余，场面宏伟，结构严谨，充分反映了张议潮夫妇出行时的历史场面和人物风貌，突出了出行的主题思想。^{①90}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艺术，在风格上也有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在壁画内容上，由于俗讲流行，变文的发展，故往往以变文作为依据；其中一些经变的内容，还多超过了佛经原有的内容。

在人物造型上也逐渐比例适度，拟于真人。其身姿手式自然和谐，人物面相形成了一种新的鬓角无花饰的浑圆脸型，从而显得朴实无华。

在线描上，继承了吐蕃晚期的余绪。起稿多用淡墨或土红线，神灵形象和俗人形象，线的色彩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佛、菩萨多用土红线，俗人则用淡墨线。由于线的色彩不同，形象的整体色感也就不一样。从整个壁画的色彩上看，由于多数以泥壁为底，温暖淳和，使整个色调温润、醇厚、调和、典雅，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总之，归义军张氏时期的莫高窟艺术，在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已失去了唐代前期气势磅礴的精神。但在中原文化和佛教艺术的影响下，仍然保持着唐代统一的风貌，并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①91}

在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 15 年（848—863 年）中，由于一直保持着中原的制度和他文化，并与回鹘、于阗联姻结盟，从而

使河西地区出现了一度的稳定与繁荣。曹氏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提倡佛教。曹议金视佛教为“圣力”，认为社会要安定，就必须“虔诚佛理，仰仗慈门”，因此他邀请僧侣“开贝叶之金文，诵真言之宝偈。”^{〔19〕}曹议金死后，其子元德、元深、元忠亦“广荣释教，固谒灵岩，舍珍财于万像之前，炳金灯于千龕之内。”^{〔20〕}正是由于曹氏的大力提倡佛教，故五代、北宋时期，敦煌境内寺院林立。见于敦煌遗书和供养人题记的就有：圣光寺、龙兴寺、普光寺、报恩寺、显德寺、三界寺、乾元寺、金光明寺、安国寺、灵修寺、净土寺、开元寺、相国寺、灵图寺、大云寺、大乘寺、莲台寺、奉唐寺、高妙宝龕寺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小型的“兰若”，如“马家兰若”、“索家兰若”等等属于名门大族的寺院。

曹氏统治者为了加强其统治，通过加官晋爵等方式来笼络瓜沙望族和大小地主，因而曹氏时期的归义军节度衙门，官员数目庞大，而曹氏的权势也扩大到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仅就宗教而言，不仅都僧统、僧统、临坛大德、僧正等僧官要由归义军节度使任免，而且僧官、尼主也都为曹氏的贵戚姻亲所把持，就连一般僧尼的度牒都由节度使批授。这样，曹氏的政治、经济实力就比较雄厚，也就有条件 and 资本大量地修窟造龕了。

为了营造寺院和石窟，就需要有一批从事开窟、造像和绘画的专门人才。为此，曹氏政权仿照中原的方式设立了画院。从莫高、榆林诸窟中的供养人画像题记可知，当时画院里包括了石匠、塑匠、画师和管理画院的“都勾当画院使”，对于这些匠师在生活上还有一定的优待。

正因为有一批技艺纯熟的匠师统一规划、集体制作，才使五代、北宋时期开凿的洞窟具有独特而又统一的风格。

现存曹氏政权时期的洞窟 缘个。通过对这些洞窟的排比分析可知，归义军曹氏时期的敦煌艺术，是晚唐艺术的继续。但艺

术表现的程式化逐渐严重起来，壁画的构图和人物形象日趋公式化。榜题的增多不但使画面显得支离，而且榜题文字大多采用变文形式，也使壁画的图解性质日益增强。因此，艺术境界的创造已被冲淡，艺术感染力也因而降低。^{①④}正是从这个总体意义上说，它自然不能与唐代相提并论，但如果用“夕阳无限好”来形容，则无疑是恰当的。

这时的敦煌艺术，虽然程式化日趋严重，但仍然出现了一些新题材，如《刘萨诃变相》、《五台山图》和《新样文殊》等，反映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并和儒、道思想相结合的过程。在画面上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场面，为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45窟中的《五台山图》，是敦煌壁画中最大的山水画面，它把现实与想象进一步结合起来，用鸟瞰式透视法将重峦叠嶂、绵延千里的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汇集于一壁，气势磅礴，人物情节真实生动。《五台山图》的出现，不仅使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写意情趣已见端倪，而且还进一步取得了山水画的独立地位。

七、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敦煌的沉寂

唐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原因，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了，到了元明时期，丝绸之路更趋衰落，敦煌也随之失去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此时的莫高窟，则是敦煌艺术的“回光返照”，已是近黄昏了。

员援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

陆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兴盛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

第一，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已逐渐南移，到了宋

代，中国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了南方。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一统的政治重心也被打破。此时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淮一带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经济十分繁荣，从而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为了便于南方产品的外销，自然是以就近的海上交通最为适宜，而不会选择远处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古以来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可是，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却不断得到发展。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北方地区直接经受着战乱，黄河流域一带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此时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淮地区的经济却发展较快。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南方的江浙地区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19〕}的局面。

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引起了政治重心的变化。唐代以前，虽然有些王朝曾在南方建都，但大部分王朝都建都于北方，特别是关中的长安。全国的政治重心在西北。封建王朝为了保持其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必然加强西北的建设与巩固边防的工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兴盛。唐代以后，在南方建都的王朝逐渐增多，尤其是南宋王朝建都于临安（杭州），更使中国的政治重心移到了南方。此后，虽然元、明、清各朝都曾建都于北京，但再也没有哪一个王朝建都于西北的长安了，从而对丝路的经营逐渐轻视，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衰落了。

第二，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唐宋时期的对外输出品有关。此时的对外贸易中，除了丝绸外，外销的大宗商品是瓷器。

瓷器的外销始于唐而盛于宋。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已远销海外，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宋朝时期，瓷器生产更为发达，并已远销到东西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为了运输上的方便和减少运送途中的损失，自然会选择海上交通。从而说明陆上丝路的衰落

与当时瓷器的输出有关。

第三，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还与唐宋时期的输入物品，尤其是各类香药的进口有关。

古代所谓“香药”，包括的范围和用途都很广泛，它可作药物、化妆、熏衣、制炬等等。从唐代开始，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中，对进口的各类香药发生了浓厚兴趣。到了宋代，对各类香药的需求量更大，进口的各类香药数量也十分惊人。而香药的生产地除了大食外，南海各地也在大量生产。为了加强和南海的香药贸易，必然促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陆上丝路的渐趋衰落。

第四，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还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中西交往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前期，由于中国领土辽阔，其西部边疆已远越葱岭，丝绸之路所经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唐政府直接控制和管辖下。因而东西交通空前繁荣，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可说到了“黄金时期”。然而，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西北边兵东调长安。自此以后，葱岭以西的中亚河中地区（指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为大食完全占据，葱岭以东的陇右，则为吐蕃所控制。不久，回鹘政权又割据于天山以北。当时的大食和吐蕃、吐蕃与回鹘之间矛盾重重，争斗不休，其结果使中国内地和西北边疆“道路梗绝，往来不通^{〔19〕}”，终于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到了宋代，由于长期和西夏、辽、金、元对立，对外陆上交通几乎断绝，陆上丝路更加衰落。元明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就彻底衰落了。

第五，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还与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有关。

我国的造船业到唐代时已十分发达，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能造船，所造船舶之巨大、坚固以及载重量之大，都是当时的外国船所无法比拟的。到了宋代，造船业更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

尤以广州、泉州、明州等地所造的船舶最大。据成书于十二世纪初叶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其时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197〕}

伴随着造船业的发展，我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其标志是宋代已开始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事业中。如《萍洲可谈》一书中记载说：“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有“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的记载，这些都是指漂浮的水针。以后，便逐渐用罗盘指示航向了。如《梦粱录》载曰：“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宋代指南针的运用，引起了航海技术的重大进步，使我国的海上交通逐渐繁荣与兴盛，从而客观上加速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198〕}

此外，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还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唐代以后，虽然对外关系更加频繁、复杂和密切，但对外交往的国家则比以前更加集中。除了加强与远东、南海一些岛国间的往来外，在西方主要是通过大食与世界各地发生关系。但不论是远东、南海，还是大食，都希望通过海上交通与中国发生联系，从而使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和荒凉了。

圆 渐趋沉寂的敦煌

宋仁宗景祐三年（~~景德~~四年），西夏占领敦煌后，设瓜州西平监军司管辖。西夏的地方行政组织也分州（府、军）、县（城、堡）二级制，敦煌仍称沙州。当时的西夏，主要是东向与宋、辽争战，无暇西顾，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沙州地方首领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并曾向宋朝“七贡方物”。~~景德~~四年以后，西夏惠宗为了征发沙州百姓进攻宋朝，开始加强对瓜、沙二州的控制，结果使敦煌更加衰落。~~景德~~五年，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人民流亡他乡。此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及陆上丝路的衰落，敦

煌失去了丝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从 1209 年开始，蒙古逐渐进入河西，1227 年终于攻破沙州，西夏也随之灭亡。蒙古攻占敦煌后，废弃了沙州建置，将其给予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作为封地。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将敦煌纳入其直接管辖范围。1261 年蒙古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行中书省制度。地方行政组织有省、路、府、州、县各级，又正式设立沙州，属肃州路管辖。1284 年，又升为沙州路总管府，下辖瓜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说：“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即拔都）。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年升为沙州路总管府，瓜州隶焉”。其下注曰：“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白之肃州，然后给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元成宗时，为开发河西，曾在敦煌等地实行屯田，大德七年（1303 年）“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①99}屯田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未能恢复敦煌昔日的光辉。此外，元初直接统辖的西部边境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与和田，其版图比汉唐王朝都大，敦煌已失去了往日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再加上从中亚到蒙古的北方草原之路的频繁使用，也使敦煌失去了西域门户的地位。

明朝建国后，宋国公冯胜出兵西征，划嘉峪关而守，未曾经营敦煌地区，从而使敦煌成为边外荒凉之地。明成祖永乐以后，曾先后设置了沙州卫与罕东左卫，以经营敦煌，但很快被蒙古部落取代，后来又为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吐鲁番王国占领。从明初划嘉峪关为界后，中原与中亚的往来干线，就直接由嘉峪关而达哈密了，从而使敦煌更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

清朝建立并在中原立足后，康熙便发兵西征，开始经营关外

之地，在今安西、玉门一带设立赤金、靖逆二卫。1663年，雍正帝复置沙州所，1684年升为沙州卫，并因原沙州卫城受党河水侵蚀，东墙坍塌，在党河东新筑卫城，即今市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隶属安肃道。从雍正到乾隆，清王朝通过移民、屯田、垦荒等措施，使敦煌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经济也逐渐走向恢复。

猎猿已近黄昏的莫高窟艺术

西夏统治者占领敦煌后，在武力征服的同时，还大力提倡佛教。西夏立国者李元昊，既“通蕃汉文字”，又“晓佛图学”，甚至提出以“佛图安疆”的口号。西夏统治者曾多次向宋朝请购《大藏经》，并广建佛塔寺院，贮存经藏，还延请各族僧人翻译经文，广为刊行。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西夏的佛教十分兴盛，到处兴修石窟寺，如西夏首府今银川附近的须弥山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北五个庙以及内蒙古一些地区，都有西夏兴建或重修的石窟。作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是所有西夏石窟中数量最多、最集中并比较成系统的代表。

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二百年间，莫高窟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品。但是，它新开的洞窟很少，大部分都是覆盖前代洞窟而成。在西夏新开的洞窟中，只有第196窟窟顶是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其余都是覆斗形顶或平顶。但西夏在开窟修龕时，和宋代一样，往往同时在窟前营造木构建筑，有的甚至发展为殿堂，如重修第196窟时，窟前修建的殿堂遗址1984年进行了发掘，殿堂阔五间15.5米，进深四间12.5米，地面全用西夏时流行的莲花云头纹方砖铺盖，相当壮观。

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因为大部分是利用前代旧窟加以修改，在洞窟形制上很少有西夏时代的特点。同时，壁画和塑像内容也

都承袭北宋格局，表现上愈趋程式化、简单化。

西夏时期的经变画比前代少了，题材也简单多了，好些经变画只有楼台亭阁、佛说法、天人围绕、莲花、水池、化生，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竟不知所画为何名。在重修盛唐的莫高窟时，也只是重描几幅普贤变、文殊变、阿弥陀经变。大部分壁画只画些垂幔花卉、团花图案、千佛菩萨、供养器、说法图和一些男女供养人，其内容贫乏，简直分辨不出是何题材。从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方面看，源因窟的回鹘装西夏男女供养人和窟顶红地团花图案、圆拱窟东壁的文殊普贤变、莫高窟窟顶的团龙藻井及飞天，可以作为西夏时期的代表作。

公元1227年蒙古占领沙州后，在佛教圣地敦煌，既宣扬儒家思想，又重视道教，大搞所谓“三教平心”，“以佛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②00}同时，还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也都兼收并蓄。在佛教中，又特别尊崇喇嘛教。元朝统治者还将西藏名僧八思巴请来，并封为国师，赐给玉印，让他掌管全国的佛教，实际上是做了元朝中央政府的顾问。因此，萨迦派密宗在全国十分流行，河西也不例外。马可波罗路过河西时，见到甘州的佛像“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皆佳，外敷以金。”并说敦煌的“偶像教徒（指佛教徒）自有其语言。”^{②01}元顺帝至正八年（1350年）莫高窟的速来蛮六字真言碑刻石上，有汉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敦煌，各族人民和佛教徒聚居共事的情况。此碑的施主为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他们不仅在莫高窟重修了皇庆寺，而且还开凿了洞窟。正是由于密教萨迦派在元代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在千佛洞的元代洞窟中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西藏式密教艺术。

莫高窟现存元代洞窟5个，它新开的洞窟形制有三：一是方形覆斗顶窟，二是主室长方形后部有中心柱的窟，三是主室方

形有中心圆坛的窟。其中后者为敦煌藏密洞窟的典型形式，其坛上塑像，四壁绘满密宗图像。

元代的密宗壁画，既有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系统，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藏密画派作品。莫高窟第 3 窟是“汉密”壁画的代表，全窟画满了大大小小的观音，尤其是南北两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神色庄重，画工精绝，是少有的佳作。其面部端庄慈祥，千臂珠圆玉润，素装无华，婷婷玉立。这一切，都出自艺术家的一条“线”，由于使用“兰叶描”线条，顿挫转折，劲利自然，兼以铁线描、折芦描、行云流水描等多种笔法，将肉体、须发、锦、绢、绵、麻各种不同质感的東西都表现得恰到好处。美术家们普遍认为，此画创作者的线描功夫，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第 94 窟可以说是“藏密”的代表。其中心圆坛上的塑像已毁，“四壁上部画‘明王像’，下部画织布、养鸭、牧牛、制陶、驯虎、制皮、踏碓等六十多幅人物画，每幅画的侧面，都用纸笺写出画的内容，上半截是藏文语音，下半截是汉语。”^①敦煌莫高窟的藏式密教图像，具有明显的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影响，又有较多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成分，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②

元代以后，莫高窟的营建即告中辍。明代的莫高窟孤悬关外，长期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其“佛像屡遭毁坏，龕亦为沙所埋”。^③清王朝时期，又曾一度增补和重修过莫高窟，但内容混杂，技艺低劣，徒然破坏了旧有的艺术效果。就敦煌艺术的发展而言，为数很少的元代洞窟正是莫高窟艺术的尾声。

【注释】

① 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载《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 1 期。

② 参阅史念海《河西与敦煌（上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 1 辑。

③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 猿-猿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员愿年出版。

④参阅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第 猿集。

⑤施萍婷《敦煌随笔之一·“敦煌”二解》,载《敦煌研究》第 猿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⑥《新疆社会科学》员愿年第 员期。

⑦《青海社会科学》员愿年第 缘期。

⑧《东方杂志》第 猿卷第 圆号(员愿年)。

⑨《敦煌研究》员愿年第 员期。

⑩《光明日报》员愿年 员月 圆日。

⑪王冀青《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载《地名知识》员愿年第 源期。

⑫《汉书》卷 缘《卫青霍去病传》注。

⑬《史记》卷 员《卫将军骠骑列传》索引。

⑭《汉书》卷 愿《西域传》。

⑮《盐铁论》卷 愿第 猿《结和》。

⑯《盐铁论》卷 愿第 源《和亲》。

⑰《汉书》卷 愿《匈奴传》。

⑱《汉书》卷 愿《张骞传》。

⑲《汉书》卷 缘《霍去病传》。

⑳《汉书》卷 愿《匈奴传》。

㉑《汉书》卷 缘《霍去病传》。

㉒《汉书》卷 愿《匈奴传》。

②③向达《两关杂考》,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员缘年出版;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员愿年 圆卷;周振鹤《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载《西北史地》员愿年 员期。

②④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载《汉简缀述》,中华书局 员愿年出版。

②⑤吴初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载《西北师院学报》员愿年 圆期。

②⑥劳干《居延汉简考证》,员缘年台湾版。

②⑦张春树《汉代河西四郡的建立年代与开拓过程的推测》,载《汉代边

疆史论集》。

②⑧黄文弼《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②⑨方诗铭《玉门位置辨》，载《西北通讯》创刊号。

③⑩刘光华《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辨》，载《秦汉史论丛》第 8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载《西北史地》1985 年第 1 期。

③⑪参阅黄文弼《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

③⑫《史记》卷 96《大宛列传》。

③⑬《史记》卷 96《大宛列传》。

③⑭《重修敦煌县志》卷 8《冥安废县》。

③⑮吴初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

③⑯梁尉英《汉代效谷城考》，载《1985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③⑰吴初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载《西北师院学报》1986 年第 1 期。

③⑱《汉书》卷 96《西域传》。

③⑲《汉书》卷 96《匈奴传》。

④⑩孕 1985 年《沙州都督府图经》“悬泉水”条引。

④⑪《后汉书》卷 88《郭符许别传》附《王柔传》注引《风俗通》。

④⑫参阅张传玺《悬泉置、效谷县、鱼泽障的设与废》，载《张维华纪念文集》，齐鲁书社 1986 年出版。

④⑬《汉书》卷 96《食货志》。

④⑭《汉书》卷 96《武帝纪》。

④⑮《汉书》卷 96《食货志》。

④⑯《居延汉简释文》卷 1

④⑰《居延汉简释文》卷 1 第 1 页。

④⑱参阅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载《敦煌研究》试刊第 1 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④⑲《后汉书》卷 96《窦融列传》。

⑤⑩参阅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第 1 卷 1 页，新华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⑤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四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出版。

⑤②《晋书》卷 八《张轨传》。

⑤③《晋书》卷 八《张轨传》。

⑤④《资治通鉴》卷 一百六十五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

⑤⑤参阅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载《西北史地》一九八〇年 四期。

⑤⑥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四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出版。

⑤⑦《魏书》卷 一百一《刘昶传》。

⑤⑧《魏书》卷 一百一《阚骃传》。

⑤⑨《晋书》卷 九《隐逸·宋纤传》。

⑥⑩《晋书》卷 九《隐逸·郭瑀传》。

⑥⑪《晋书》卷 九《隐逸·索袭传》。

⑥⑫《魏书》卷 一百一《宋繇传》。

⑥⑬《晋书》卷 九《隐逸·祁嘉传》。

⑥⑭《晋书》卷 九《隐逸·宋纤传》。

⑥⑮《魏书》卷 一百一《刘昶传》。

⑥⑯《晋书》卷 八《张轨传》。

⑥⑰《晋书》卷 八《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⑥⑱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见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出版。

⑥⑲《修行道地经后记》，转引自宿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文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出版。

⑦⑩《出三藏记集》卷 苑

⑦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四页，中华书局 一九八〇年出版。

⑦⑫《高僧传·昙无讖传》。

⑦⑬释道朗《大般涅槃经序》，见任继愈《佛教经籍选编》四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出版。

⑦⑭参阅齐陈骏等《五凉史略》四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出版。

⑦⑮《出三藏记集》四页，中华书局 一九八〇年出版。

⑦⑯参阅齐陈骏等《五凉史略》四页。

⑦⑦《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

⑦⑧参阅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⑦⑨《隋书》卷 源《杨尚希传》。

⑧⑩《唐六典》卷 缘《尚书兵部》。

⑧⑪《唐六典》卷 缘《尚书兵部》。

⑧⑫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第 猿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1983 年出版。

⑧⑬参阅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载《敦煌研究》1985 年猿期。

⑧⑭参阅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载《敦煌研究》1985 年猿期。

⑧⑮《通典》卷 猿《食货三·乡党》。

⑧⑯《唐会要》卷 愿《籍帐》。

⑧⑰杂缘源《渠规残卷》。

⑧⑱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载《敦煌研究》1985 年源期。

⑧⑲《旧唐书》卷 源《职官志·屯田员外郎》。

⑧⑳《旧唐书》卷 员《黑齿常之传》。

⑧㉑《文苑英华》卷 忽《张说《唐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

⑧㉒参阅钮海燕《唐代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载《历史教学》1985 年员期。

⑧㉓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

⑧㉔《太平广记》卷 源《东城老父传》。

⑧㉕《全唐文》卷 圆《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⑧㉖《旧唐书》卷 员《张茂宗传》。

⑧㉗《全唐文》卷 圆《张说《陇右监牧颂德碑》》。

⑧㉘详见《新唐书》卷 缘《兵志》。

⑧㉙《唐六典》卷 苑《太仆寺》。

⑧㉚《旧唐书》卷 员《张茂宗传》。

⑧㉛《通鉴》卷 圆《玄宗天宝十二载条》。

⑩² 《隋书》卷 远苑《裴矩传》。

⑩³ 《通鉴》卷 愿园杨帝大业三年条。

⑩⁴ 参阅胡戟《炆帝西巡》，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 愿愿年出版。

⑩⁵ 《隋书》卷 远苑《裴矩传》。

⑩⁶ 《隋书》卷 远苑《裴矩传》。

⑩⁷ 《隋书》卷 远苑《裴矩传》。

⑩⁸ 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载《敦煌研究》愿愿年猿期。

⑩⁹ 鲍防《杂感》，见《全唐诗》卷 猿苑。

⑩¹⁰ 参阅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载《文史》猿辑，中华书局愿愿年出版。

⑩¹¹ 参阅荣新江《敦煌的兴衰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文史知识》愿愿年愿期。

⑩¹² 《全唐文》卷 愿太宗《贬萧瑀手诏》。

⑩¹³ 参阅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

⑩¹⁴ 《通鉴》卷 愿近唐德宗建中元年四月条引《通鉴考异》。

⑩¹⁵ 《沈下贤文集》卷 愿。

⑩¹⁶ 参阅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孕栽愿愿藏 愿愿缘号研究》，载《历史研究》愿愿年缘期。

⑩¹⁷ 参阅李正宇《吐蕃子年（公元愿愿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户手实残卷研究》，载《愿愿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愿愿年出版。

⑩¹⁸ 参阅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载《西北史地》愿愿年愿期。

⑩¹⁹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 愿页，中华书局愿愿年出版。

⑩²⁰ 参阅姜伯勤《突地考》，载《敦煌学辑刊》愿愿年愿期。

⑩²¹ 参阅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载《社会科学》（甘肃）愿愿年愿期。

⑩²² 参阅姜伯勤《突地考》，载《敦煌学辑刊》愿愿年愿期。

⑩²³ 参阅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载《社会科学》（甘肃）

贞观元年。《通鉴》卷一百一十五唐玄宗开元三年七月丁酉条载：“驴载曰驮，每驮一百斤。”

①24 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 108 卷 108 页。

①25 参阅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见《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附录，文物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①26 《唐会要》卷 97《吐蕃》。

①27 参阅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①28 刘立千编译《续藏史鉴》，成都华西大学 1983 年出版。

①29 《通鉴》卷 196 唐宣宗大中四年九月条。

①30 《新唐书》卷 197《吐蕃传下》。

①31 《通鉴》卷 197 唐武宗会昌四年三月条。

①32 《通鉴》卷 198 唐宣宗大中二年十二月条。

①33 参阅谭蝉雪《统一河西的功臣——张议潮》，载《文史知识》1985 年 1 期。

①34 《通鉴》卷 199 唐宣宗大中五年正月条。

①35 敦煌写本《张淮深碑》。

①36 杜牧《樊川文集》卷 10《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①37 参阅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载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1986 年出版。

①38 《通鉴考异》卷 100

①39 《新唐书》卷 199《地理志》。

①40 《通鉴》卷 200 唐懿宗咸通三年。

①41 《通鉴》卷 201 唐懿宗咸通七年十月条。

①42 敦煌写本《张淮深碑》。

①43 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见兰州大学编《敦煌学论文选》。

①44 敦煌写本《张淮深碑》。

①45 敦煌写本《张淮深碑》。

①46 敦煌写本《张淮深碑》。

①47 参阅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 10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

版。

⑭⑩向达《罗叔言 补唐书张义潮传 补正》，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 1959年出版。

⑭⑪李永宁《竖牛作孽 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载《敦煌研究》1989年 1期。

⑭⑫参阅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载《文献》1989年 1期。

⑭⑬《旧唐书》卷 100《昭宗纪》。

⑭⑭参阅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 1期。

⑭⑮孕①②源《白雀歌》。

⑭⑯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见《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⑭⑰《西北史地》1989年 1期。

⑭⑱《龙泉神剑歌》。

⑭⑲孕①③④《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

⑭⑳参阅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载《敦煌研究》1989年 1期；贺世哲《试论曹仁贵即曹议金》，载《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 1期；荣新江《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载《敦煌研究》1989年 1期。

⑭㉑《册府元龟》卷 140《帝王部·来远门》。

⑭㉒参阅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年出版。

⑭㉓孕①④⑤《天福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曹元深回向疏》。

⑭㉔《旧五代史》卷 100《晋少帝纪》。

⑭㉕（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五》1989册，第141页，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

⑭㉖孕①⑤⑥《太平兴国六年安再胜等牒》。

⑭㉗《宋会要辑稿·蕃夷五》1989册，第141页。

⑭㉘参阅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

⑭㉙《宋会要辑稿·蕃夷五》，1989册，第141页。

①68 见《敦煌资料》第 1 辑 104—105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藤枝晃将本件文书的年代定为 832—834 年。

①69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汉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9 卷《民族交通卷》，中华书局 1993 年出版。

①70 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载《敦煌研究》1993 年 1 期。

①71 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 104—105 页。

①72 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 104 页。

①73 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 104 页。

①74 荣新江《通颊考》，载《文史》1987 辑，中华书局 1989 年出版。

①75 转引自〔日〕羽田亨《唐光启元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见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出版。

①76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1 辑。

①77 参阅荣新江《通颊考》，载《文史》1987 辑，中华书局 1989 年出版。

①78 《文献通考》卷 180《舆地八》。

①79 关于本件文书的录文及时代，见刘进宝《孕 180 号 壬申年官布籍时代考》，载《西北师大学报》1983 年 1 期。

①80 《五代会要》卷 103《逃户》。

①81 《唐会要》卷 103《租税下》。

①82 《文献通考》卷 180《田赋三》。

①83 《全唐文》卷 235 李翱《进士策问》。

①8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0《建隆二年七月》；《宋史·石守信传》。

①85 参阅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 前言》，载《中国史研究》1985 年 1 期。

①86 详见刘进宝《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载《历史研究》1983 年 1 期。

①87 陆贽《陆宣公集》卷 10《均节赋税恤百姓》。

①88 《唐会要》卷 103《租税下》。

①89 详见刘进宝《关于吐蕃统治经营河西地区的若干问题》，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9年1期。

①90 参阅段文杰《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

①91 参阅段文杰《张议潮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载《敦煌学辑刊》第1辑。

①92 孕圆图《曹议金礼佛疏》。

①93 杂源图《造佛窟功德记》。

①94 参阅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

①95 《宋史》卷147《范祖禹传》。

①96 《全唐文》卷147陆贽《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

①97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4“客舟条”。

①98 参阅杨建新、芦苇《丝绸之路》141—14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99 《元史》卷101《成宗纪》。

②00 (元)刘谧《三教平心论》，转引自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

②01 《马可·波罗游记》。

②02 施萍婷《敦煌与莫高窟》。

②03 参阅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

②04 《敦煌县志》。

第二章

艺术瑰宝千佛洞

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郡境内的所有石窟，如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等，共计有洞窟 缘园多个，壁画约 缘万平方米。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窟中，以莫高窟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据《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记载，它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猿元年），到唐代时已有“窟龕千余”。历经千余年来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仍保存着十六国到元代的洞窟 源园个（据《兰州晚报》圆园园年 圆月 愿日、《光明日报》圆园园年 圆月 圆猿日报道，从 愿年代末开始的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又发掘出洞窟 圆猿个。这些洞窟比较狭小，由于风沙侵蚀，几乎全部被黄沙、石子所掩埋；也没有发现壁画。专家们认为这里极可能是当时僧人们的起居室。北区出土的经文有汉、西夏、回纥等 愿种文字，其中的叙利亚文字是首次发现，弥足珍贵），壁画 源园园余平方米，塑像 圆猿园余身，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是世界上现存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员愿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

一、莫高窟的创建与编号

莫高窟之名称

莫高窟的“莫高”二字，是唐代以来在敦煌城沙漠附近流行的一种乡、坊里和山的名称。孕園原《张淮深墓志铭》载：“公以大顺元年（~~愿~~元年）二月廿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葬于漠高乡漠高里之南原，礼也。”

又孕園原《阴善雄墓志铭》曰：“（善雄）当清泰四年丁酉岁（~~愿~~元年）八月十四日寿卒于钦贤坊之私第。春秋五十，以其月二十日权葬于州东漠高里之原也。”

同卷《罗盈达墓志铭并序》云：“府君讳盈达，……即以天福八年，岁次癸卯九月……十六日葬于莫高里扬开河北原之礼也。”

又《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中说：“将就莫高山为当今圣主，及七代凿窟龕一所，远垂不朽，用记将来。”

至于“莫高窟”一名，在杂缘原《敦煌录》中就已经出现了。《敦煌录》说：“（沙）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途石碛带山坡，至坡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中有自南流水，名之宕泉，古寺僧舍绝多。”

“莫高乡”是唐代沙州十三乡之一，“莫高里”是“莫高乡”下辖的一个里名。据有的学者研究，今敦煌城东南七、八公里，去莫高窟中途有佛爷庙，庙东就是戈壁，其地势比佛爷庙高出很多，戈壁上荒冢累累，可能就是莫高里之原。而阴处士在莫高山开凿的窟龕，应当就是今天的莫高窟了。既然敦煌有莫高乡、莫高里，那么附近的原和山，也就有可能称为莫高原、莫高山。因而在这里开凿的石窟也就叫做“莫高窟”。由此可知，“莫高”二

字，一定是与高出绿洲的戈壁沙漠有直接关系的。^①

对此，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或认为这个石窟建造在鸣沙山崖壁上，而鸣沙山较之周围地形又高，沙漠的“漠”字与莫高窟的“莫”字，古语可以通用，在沙漠高处开凿的洞窟，即叫莫高窟；或认为最初开凿洞窟的乐僔和尚，道行高超，后莫能及，故以他所开凿的石窟称为莫高窟；或认为“莫高”是译音，即突厥语沙碛的意思，莫高窟就是指在沙碛里开凿的洞窟。

至于“千佛洞”一名，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为“千佛洞”是一切刻有佛像的崖洞的通名，如山西大同的云冈、河南洛阳的龙门、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新疆的吐鲁番、鄯善等，都有“千佛洞”之名。即以敦煌一地而论，也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等。但自斯坦因将其在敦煌劫夺的全部艺术品汇集成书，取名《千佛洞》后，“千佛洞”一名，也就为莫高窟所专有了。^②

乐僔法师与莫高窟的创建

关于乐僔法师及其创建莫高窟的文字资料，据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

(员) 武周圣历元年(远愿年)五月十四日立《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简称《圣历碑》。碑文中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猿元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龕。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这是我们所见最早记述创建莫高窟的资料。

(圆) 敦煌遗书 孕猿圆《莫高窟记》：“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中，有沙门乐僔，杖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

金光如千佛之状，遂凿空镌岩，大造龕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傅师龕侧又造一龕。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末署“时咸通六年（~~隋~~ ~~唐~~）正月十五日记。”比《圣历碑》晚 ~~隋~~ ~~唐~~ 年。

（~~猿~~ 莫高窟第 ~~窟~~ 窟前室北壁左上方墨书《莫高窟记》题记曰：“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之世，有沙门乐傅，仗锡西游至此，巡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岩，大造龕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傅师龕侧又造一龕。伽蓝之□肇于二僧……。”末署“□□□□□□通六年正月十五日记。”据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认为，此壁题记乃是据孕猿~~窟~~卷子本抄录的，孕猿~~窟~~《莫高窟记》为此题记的底本。

有的学者通过对上述三种资料摘句比较、排列分析后认为，后两件《莫高窟记》中的重要记述和主要词句都是从《圣历碑》抄录或略加改动而来的。因此《圣历碑》应该是我们目前所见关于乐傅、法良事迹和莫高窟创建的最早而且是惟一权威性的资料。关于乐傅法师与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无疑应以《圣历碑》所载为准。^③

由以上探讨可知，莫高窟创建于苻秦建元二年（~~猿~~ ~~元~~年），其开创者为乐傅法师。这一年的某一天，乐傅法师杖锡林野，游方到了敦煌的三危山下。这时天已傍晚，时近黄昏，太阳即将沉落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之中。乐傅蓦然抬头，奇景在他眼前出现了：对面的三危山一派金光耀眼，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虔诚的乐傅法师被这奇景炫惑了，认为这是一块圣地，就立誓在这里开窟塑像，兴建庙宇。于是他就到处化缘，募集了许多钱，请来了工匠，在这块沙漠上开起石窟来。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于 ~~元~~ ~~唐~~ 多年前便在这块“圣地”上出现了。

从科学的角度看，乐傅当时所见的金光千佛，自然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奇景，我们今天在莫高窟仍可看到。因为莫高窟对面

的三危山，是剥蚀残山，山上无草木，岩石为黯红色，其中含有石英、云母等矿物质。夕阳反射，常灿烂若金光。电影《海市蜃楼》的开头，就采用了这种原理。当然，乐僔对这奇妙的自然景象无法理解，就完全归之于“佛”了。

不久，乐僔法师又去云游了。许多年之后，法良禅师又从东方到此，他朝拜了这个地方，并在乐僔的窟旁开凿了一个窟。此后信佛的人逐渐增多，石窟也慢慢多了起来。

不仅仅是和尚，还有王公贵族，地方上的大小官吏，有钱的商人，普通的市民，手工业者，一直到从良的妓女，都在这个地方修建了大大小小的佛窟。

有的窟是一个人独造的，有的则是一家、一族、一个团体中许多人集资合造的，他们根据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作不同的布施功德，都不断地增加着莫高窟的艺术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的创始者乐僔是敦煌本地人，法良也是“从东届此”，这就说明敦煌艺术并不是西来的，而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反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猿猴研究敦煌的锁钥——莫高窟编号

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 492 个，最早的一组北凉窟聚集在崖面中段，距现今地表约十几米。北魏、西魏窟基本上是紧挨这组窟向南、北横向发展。北周、隋、唐窟也基本上按此规律开凿。五代以后的洞窟主要集中于崖面下层及南北两头。另外，由于崖面有限，有些洞窟是“见缝插针”，有的甚至破坏前代洞窟而再修。由于各个时代的洞窟交错分布，若按时代编号的话，不便检索。因此，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各种编号都按现存各窟分布位置，以南北、上下方向为序编号。

莫高窟编号主要有六种，即伯希和编号、敦煌县官厅编号、高良佐编号、张大千编号、史岩编号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其

中以伯希和编号（以大写字母“孕”为标志）、张大千编号（以大写字母“悦”为标志）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以大写字母“粤”为标志）影响最大，至今仍在沿用。

现以各家编号时间为序，分别介绍如下：^④

（员）伯希和编号：员愿年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时，由其助手努埃特拍摄了莫高窟的大量图片，并首次对千佛洞进行了编号。据伯希和《敦煌图录》计算共员愿号，其编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摄影记录方便，因此有时十几个洞窟被编作一号，大方向是自南往北，但有时方向不定，上下纷杂，查找困难，弊端甚多。但是，由于伯氏编号配有大量图版照片和立面图，并出版了图集，所以影响较大。

（圆）敦煌县官厅编号：员愿年，敦煌县衙统领周炳南命营部司书会同敦煌县署警察对莫高窟进行调查编号。此编号与伯希和编号方向正好相反，从北向南，共猿猿号，但其中有空号七个（即员缘 员远 员苑 员愿 员怨 圆远 圆苑号）。由于此编号既无立面图，又无摄影图版，故影响不大。

（猿）高良佐编号：员愿年，高良佐随国民党政府要员邵元冲来西北视察，历时四个月，写成《西北随轺记》。在有关莫高窟部分，记载伯希和与敦煌官厅编号，当时“皆已湮没，未能按号游览”，“因重加编号，自洞之北首下层起至三层止，共得二百零七号”。这个编号与敦煌县官厅编号类似，也无多大参考价值。

（源）张大千编号：员愿年，张大千先生来敦煌临摹壁画，为了临摹工作的需要，他对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水峡口石窟进行了编号。张大千的莫高窟编号，开始从南向北，而后由北往南，再从南到北，呈“之”字形，共猿怨号。与以前各家编号相比，张氏编号更为全面规范，而且作了初步的断代分期。张氏将窟号与时代同书于洞口或洞内侧壁，粉底墨书，比较醒目，再加上使用方便，所以影响较大。谢稚柳编《敦煌艺

术叙录》时就采用了此编号。

(缘 史岩编号：缘缘至缘缘年，史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由于不满意伯希和与张大千的编号，遂在伯、张编号的基础上，“舍短就长，折中两者之间，遂成一种新编号法”，共缘缘号，在《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中附有此编号的立面图。史岩编号只在他自己的著述中应用过，无多大影响。

(远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缘缘年，《文物参考资料》圆卷 缘期所附《敦煌千佛洞各家编号对照表》中，正式公布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编号，共计 源缘号。以后又有增补，最后定为 源园号。此编号顺序是先由北至南，然后由南往北，再从北到南，呈“之”字形，正好与张大千编号方向相反。实际上这个编号在解放前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就已编好使用，缘缘年在南京、上海举办“敦煌艺展”时，其目录就使用这个编号。

虽然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也有其不足之处，但它与张大千编号相比较，对洞窟的关系区分更细致、更系统，断代分期也更准确一些。可以说，它是目前莫高窟各家编号中最好、最科学、使用范围最广的编号。解放后的敦煌学研究者及出版部门，多以此编号为标准。

二、墙壁上的图书馆

——敦煌壁画概述

敦煌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莫高窟现存壁画缘缘平方米，其内容非常丰富，是一座博大精美的民族壁画艺术宫殿，所以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

缘缘敦煌壁画的内容

敦煌壁画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七类：

(员) 佛像画。即佛陀、菩萨等供奉神灵的形像，其中既有释迦牟尼佛、三世佛、七世佛、十方诸佛、贤劫千佛等佛像画，也有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弥勒、地藏等菩萨像，还有天王、龙王、药叉、乾闥婆（飞天）等天龙八部。据统计，现存各种佛像 ~~员圆愿身~~，还有说法图 ~~怨猿幅~~。它描绘的都是佛教崇拜的各种神像。

据佛经里讲，佛、菩萨都为男像，但到中国之后，由于对女性之美及其温柔性格的爱慕，特别是对母爱的崇敬，到了唐代，菩萨逐渐变为女性。虽然有的嘴上还画有蝌蚪胡子，但其中丰腴的面庞，舞蹈式婀娜的姿态，温柔娴静的表情，却是对女性美的典型反映。画师们也多以宫廷美女作为描绘菩萨的蓝本，从而充分表现了女性美。

(圆) 故事画。是指以佛经故事为依据而作的连环画。由于故事委婉曲折，有头有尾，对观众有较强的吸引力。我国古代的民间画师及佛教僧侣在创作故事画时，充分发挥了他们丰富的想像力和艺术天才，所画内容丰富多彩，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厚，具有诱人的魅力。由于故事性质不同，可划分为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比喻故事四类。

佛传故事是描绘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故事传说。只不过佛经中和壁画上的佛传故事，是经过神化，用宗教色彩修饰过的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故事。经过佛教徒若干世纪的加工渲染，已把许多古代印度和东南亚优美的神话故事、民间故事附会到释迦牟尼的身上，可信的史实已经很少了。现存的佛传故事画实际上是一部佛教神话传奇文学。

敦煌早期壁画中，一般没有完整的佛传故事画，只有乘象入胎、夜半逾城两个代表性的场面。北周时才出现了多幅完整、连环画式的佛传故事画。如 ~~圆愿窟~~ 六条并列的佛传故事画，长达 ~~圆缘~~ 米，描写了 ~~愿~~ 个场面，前后衔接，贯通一气，这是我国现存早

期最完整的传记性连环画。五代宋初曹氏画院时期，佛传故事画以屏风形式出现，描写了 ~~几个~~ 多个场面，并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使佛传故事的内容更为丰富，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本生故事画是描写释迦牟尼前生各种善行的连环画，如九色鹿舍己救人、萨埵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等，虽然已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印度民间故事的本色。依据佛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思想，释迦前生只有经过无数次的善行转世，才能最后成佛。因此佛教徒便把释迦的前生描绘为与众行善的国王、王子、贤者、良士，或是动物中的鹿王、猴王、象王、狮王等。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把释迦说得神圣高大、不比常人，从而把许多优美的神话、童话和民间故事都附会到了释迦身上，并在这些故事的前后加上几句话，把其中善良的角色说成是佛的菩萨之身或其先祖、亲属及追随佛的弟子，而把邪恶的角色说成是佛的宿敌或外道师徒。

因缘故事是描绘佛陀度化众生的连环画。它和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本人前生故事，而因缘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生或今世之事。如沙弥守戒自杀、五百强盗成佛、犁耆弥七子娶妇、金财双手献金钱、波斯匿王丑女变美等。有些内容离奇，情节曲折，颇有戏剧性，是敦煌壁画中最引人入胜的内容。

比喻故事是释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佛门弟子、善男信女讲解佛教教义所列举的故事。敦煌壁画中的比喻故事画不多，主要有饿狼守戒、鹿母子、鬼子母、象护等。这些比喻故事画中虽有佛教的说教成分，但故事的寓意却十分深刻。其中许多故事在释迦降生以前就已由人民创作，在民间口头流传。只不过经释迦的口述改编，又被佛教徒结集记录，保存至今。所以《比喻经》、《百喻经》、《杂喻经》、《法句比喻经》、《杂宝藏经》等，实际上也是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寓言、童话故事集。

（猿 神怪画（即民族传统神话题材）。是指北魏晚期出现的

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汉晋以来体现传统的道家神仙思想的神话题材。如第9窟窟顶壁画，就是很典型的道教题材画面。这类具有神仙思想的绘画题材突然闯进石窟，虽然与佛教题材不太合拍，但却大大丰富了石窟艺术的内容，而且出现了崭新的意境和中国风格。

道教题材的闯入石窟，乃是流行于北方的佛学禅定思想与道家虚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是佛教思想和艺术中国化过程中突破性的表现。这类题材随着佛教思想与道家、儒家思想的结合而进入石窟，与佛教题材交织在一起，到了唐初才逐渐消失。

（源 经变画。一切以佛经为依据的绘画，都可以称为经变或变相。这里是指按一部经绘成一幅画的巨型经变。莫高窟中的主要经变有《维摩诘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观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宝雨经变》、《报恩经变》等二十余种。每一经变又包含许多故事情节，如维摩变 愿品，以文殊问疾为主体，展现了维摩居士的神通变化，反映了当时帝王出行和各国王子使者赴会的场面。

经变画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独创形式，莫高窟的经变画始于隋、盛于唐，五代以后逐渐衰落，据统计有 愿种 愿幅之多。唐代前期的各种经变，形式多样，主题突出，含蓄地反映了唐代前期的历史风貌。到了唐代晚期，便出现了公式化倾向，而后每况愈下，渐趋衰落。

（缘 佛教史迹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描绘佛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佛教圣迹及感应故事、戒律画、瑞像图等画面。其中既有真人真事，也有想象虚构，甚至宗教幻想，据统计有 愿处 愿种之多。初唐时期的 愿窟，是绘制佛教史迹故事最多的一个洞窟，其主室南北两壁绘有 愿个佛教史迹故事，即张骞出使西域图、释迦浣衣晒衣石、佛图澄变现神异、阿育王拜塔感应事，唐僧会建康献舍利、朱应吴松江迎石佛、高悝扬都得金像、

隋文帝请昙延祈雨。

佛教史迹画多属本土自造，也有西域乃至印度的，尽管真假混杂，有些已被佛教徒神化，宗教色彩较浓，但也有不少史实，是研究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远 供养人画像。即为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所画的功德像，属于肖像画。画像的内容有王公大臣、地方官吏、贵族妇女、各族施主、歌舞妓女、官私奴婢等。画面大小不等，既有二、三十厘米的小像，也有高如等身或超过真人的大像。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现实人物的肖像，如《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张议潮夫人宋氏出行图》、《回鹘公主出行图》等，就是真实历史人物的画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现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于供养人来说，追求的主要是对佛的虔诚，并不要求肖似。所以供养人像往往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只有唐宋时代的供养人像，既写实而又有个性，是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之佼佼者。

（苑 装饰图案。即建造洞窟的建筑装饰，有藻井、平棋、龕楣、圆光、宝座、地毡、桌围、冠服和器物等，其中以藻井和平棋最为突出。装饰花纹随时代变化而各异，主要有植物纹、动物纹、规矩纹、天象纹、人物纹等。装饰图案中的许多纹样并非单一不变，而是经过变形的，特别是一些结合纹样，如忍冬与莲花结合，动物与植物结合等，都是画师们高度想象力的反映。

以上我们从七个方面概略地展示了敦煌壁画无比丰富的内容，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又是洞窟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显示了我国各族画师卓越的创造才能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圆媛形象的历史

敦煌壁画虽然是根据佛典和佛徒的要求创作的，但画工在进行创作时，总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并从各个角度对现实社会有所反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敦煌壁画是一部形象化

的历史。

从总体上说，敦煌壁画是通过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反映现实社会的。

所谓间接反映现实社会，是指通过壁画画面的表象探究其内在含意，发掘它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如第17窟的“宝雨经变”（初唐武则天时期）是根据《宝雨经》绘制的。《宝雨经》是一部戒律典籍，早有译本，但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达摩流支重译时，则加入了“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曰月光，……（佛告之曰）我涅槃后……（汝）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此所谓日月光天子当现女身入主摩诃支那国（中国），当然是指武则天了。在第17窟经变上方绘日月，在薄伽梵说法处画一双手合十拜谢释迦的女王，显然是说武则天乃日月光天子，当入主支那国，登基称帝。为了武则天称帝的需要，和尚法朗、薛怀义等还撰《大云经疏》，说武则天是弥勒菩萨降世，当为女皇。武则天看后非常高兴，于是颁令天下遍造大云寺，塑弥勒佛像，供奉《大云经》。第13窟高达15米的弥勒佛像就是为适应这种形势而建造的。

其他如“药师经变”、“观音经变”、“法华经变”、“弥勒经变”等，都反映了现实社会人们希望消除社会痼疾，免遭自然灾害和向往美好社会的心理状态。

所谓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是指壁画中有许多表现生产、生活、历史、风俗的图画。这些壁画的内容很多，既有风俗、风情画，也有生产、交通、商业活动、建筑画，还有歌舞、百戏、体育、服饰画。例如表现农业生产的“耕获图”，就是一部很形象的历史。它将犁地、播种、收割、运输、打场、扬场到入仓等生产过程都绘入画面。还有许多生产工具，如犁、镰、芟草扫帚、木杈、木铎、槌枷、簸箕等等，都是具有北方地区生产特点的工具，有些还可看出是西北地区就地取材的产品。特别是第9窟（盛唐）的“耕获图”，画面上的曲辕犁，是我们了解唐

代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形象资料。这种犁把直辕改为曲辕，改进犁头，使之能左右转动，优点很多。唐陆龟蒙在《耒耜经》中对此犁有文字记载，但无其形，故对其功用很难具体领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依据敦煌壁画之形和《耒耜经》之文进行实物复原，才对此犁的多种功能和较高耕作效率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又如“弥勒变”的“耕获图”中，既有农民交粮、堆粮的场面，也有管事收帐计筹的场面。而“佛传”中的“耕获图”则画了城主高坐宫内，官员雁列两旁的场面。殿下除有交粮者外，还有一人裸身跪于地，一人执鞭撻笞，显然是一幅活生生的逼租画面。

另外，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它们描绘的是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壁画上不仅图画其仪容，而且还有供养人题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供养人情况，直接地反映着现实人物及其活动，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有些甚至可以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

莫高窟北壁上有西魏大统四年、大统五年发愿文题记，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纪年题记。在这个题记下面，有成排的男女供养人画像。其中一组，画一高鼻长髯长者，头裹幅巾；身后数身均为青年，头戴卷沿毡帽；另有一身，头后垂小辫，身着圆领小袖褶，白布裤，乌皮履。墨书题记为“清信士阴安归所供养……”

阴氏及同窟的贺氏、滑氏，可能是北朝胡姓，褶裤是鲜卑族常服，脑后垂小辫是鲜卑族索头部的风俗，即历史上所谓“索头鲜卑”。从这些画像和题记，不仅可以判断此窟是鲜卑族出资建造，而且对于探讨河西鲜卑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在莫高窟门上，画一男供养人，戴幞头，穿窄袖袍，乌靴。此窟底层初唐壁画于贞观年间被剥出，根据题记可知此窟乃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的翟家窟。莫高窟的题记很多，在“贞观十

有六年敬造”题记中有“弟子昭武校尉柏堡镇将……玄迈敬造”等语。唐代初年在河西设置了许多军镇防戍，大者曰军，小者曰守捉。昭武校尉柏堡镇将，大约属于守捉一类武官，是河西边防军之一。这类题记其他洞窟中也有，它为探讨河西军镇防戍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材料。

建于中、晚唐时代的莫高窟东壁上，有一女供养人画像，身着汉装，拱手而立。其题记为“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如祥弟一心供养。”“仓曹参军”为正八品下小官。所谓蕃任，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在吐蕃统治机构中做官的汉人的自称。大虫皮即虎皮，吐蕃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⑤后来成为吐蕃官制。在莫高窟等窟壁画中都有虎皮服装。这类壁画和题记说明，吐蕃政权的官制是唐蕃混合制，它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河西政治形势的形象反映。

这些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对于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并非仅仅是上面介绍的这些，而是成千上万，保存到现在有题名结衔的就达一千余条，它反映了河西地区中古时代各民族的活动情况。上自官僚贵族、高官显宦，下至妓女奴婢，特别是敦煌本地的豪门贵族，如李、张、阴、索、翟、曹等氏族及其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敦煌壁画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是研究西北地方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敦煌壁画中不仅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而且还有许多出行图，如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张淮深夫妇出行图、曹议金与回鹘公主出行图、慕容归盈夫妇出行图等。这些出行图，都是表现当时当地历史人物活动的壁画，而且有名有姓，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本身内容与宗教无关。其中以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时代最早，作于唐懿宗咸通六年（875年），其榜题全文是“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出行图”。对研

究西北地方史及归义军历史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除此而外，敦煌壁画中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画面很多，如“弥勒下生经变”中的“婚礼图”，是唐宋时期婚礼习俗的真实写照；壁画中的宫殿一类建筑，虽绘于佛国净土之中，实际上却是人间帝王贵族宫殿建筑的真实反映。

总而言之，敦煌壁画尽管披上了层层圣光，但古代画工在其创作时，仍然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并按照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体验来反映现实生活，或发挥想像力创造心目中的佛国世界，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敦煌壁画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现实社会的画面。

三、彩塑艺术的杰作

莫高窟彩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一千多年以后，现在还保存着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清时期的塑像两千余身，此外还有影塑一千余身。像敦煌莫高窟这样，保存古代彩塑的数量之多，延续时代之长，塑绘艺术又很高的石窟，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它既是我国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异彩丰富多彩的敦煌彩塑

敦煌彩塑的主要题材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它们是石窟里的主体，被布置在显著地位，并在周围以绚丽多彩的壁画相衬托。

佛像是佛教艺术最主要的崇拜偶像，有弥勒佛、阿弥陀佛、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等。另外还有与佛传故事有关的形象，如表现释迦牟尼在树林里苦修的形象，传布教义的说法像和

坐在菩提树下的降魔像等等。对于佛像的塑造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此外，对于菩萨、弟子、天王、力士们的高低大小和排列次序也有一定的规定。当然，在实际制作中，对造像只能规定一些比较明显的外形特征，对于其内在精神的表现是很难严格规定的，其中关于比例的规定是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演变的。莫高窟彩塑题材范围虽然比较狭窄，但古代匠师们在千余年的制作过程中，并非千篇一律，而是继承了我国悠久的民族艺术传统，并吸收外来因素，不断创新，从而塑造了各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

根据敦煌彩塑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发展期）包括北魏、西魏、北周；中期（极盛期）包括隋唐两代；晚期（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元朝。

莫高窟早期塑像，在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前，人物面相一般是丰圆或者丰满而略长，鼻梁高隆直通额际，眉长眼鼓，肩宽胸平。佛像穿右袒式或通肩式赤布僧伽梨（红色大衣），有着密集的装饰性衣纹，给人以薄纱透体之感，史称“曹衣出水”。如莫高窟的北魏坐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艺术的整体风格来看，此时的塑像体态健美，神情庄重，色彩明快，造型厚重，手法简朴，从中既可以看到中原地区传统雕塑艺术的影响，又能领略西域佛教艺术的优美风采。

太和改制以后，中原汉式衣冠在敦煌流行，南方“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也传到了敦煌。从西魏开始，彩塑的主要形象是面貌清瘦，眉目疏朗，身体扁平，眼小唇薄。西魏莫高窟的禅僧就是这种形象的具体表现。此时塑像反映的内容比以前有所增多，性格的类型化逐渐明显。如佛的庄严慈祥，菩萨的清秀恬淡，飞天的飘逸闲畅，力士的威猛粗犷等，都有了各自的表现形式。

从早期彩塑艺术看，佛教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虽然是外来的，但是传入中国后，通过融化、改造，逐渐地反映了华夏民族的风度、气质和审美意识，民族形式和华夏传统便逐渐在佛教艺术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隋代彩塑虽然是前代的继续，但并没有因循套用前代的程式，从而在艺术实践上有了卓越的成就。

隋窟的中型和小型彩塑大都比例适度，为标准的东方型人体形，但也出现了一些头大体壮下肢粗短而形成大型彩塑的新造型。有的塑像高达四、五米，由于窟顶高度及引伸距离的局限，作者有意识加大了头部体积及上肢的比重，兼有自上而下的倾斜度，使匍伏于地的朝拜者仰视佛面时，有一种庄严肃穆感。这样既渲染了宗教气氛，又强化了大型雕塑的表现力。特别是天王力士像，头大如斗，躯干及两臂夸张到生理解剖限度之外，但丝毫不损其威武雄猛之势。**源窟**是隋代规模最大的洞窟，全窟共有塑像 **圆身**。人物造型表现了隋代塑像在外形上的显著特征，即头大、体壮、腿短。

莫高窟的唐代彩塑，无论其规模、数量，还是题材的广度和艺术成就都是空前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身大佛像，即北大像和南大像。

涅槃像是唐代规模最大的群像。**员窟**中，李太宾建于大历十一年（**苑年**）的涅槃像长达 **员米**，右胁而卧，围佛侍立的“七十二弟子”中，有菩萨、天龙八部、十大弟子和各国各族徒众。**员窟**吐蕃时期的涅槃像，在规模上与 **员窟**相当，长约 **员米**，但周围徒众均绘成壁画。这尊涅槃像造型端正，睡态安详，全无濒死前的痛苦和恋世之感，完全是一副睡美人的神态。

隋唐时代的塑像，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的是与人等高的群像。在一铺像中，佛是最高统治者，是石窟里的主尊，形体最大，居中位。其次是观音、势至等大菩萨和天王。迦叶、阿难虽

是佛的近侍，但由于道行等级不高，形体比菩萨小些。乱跪在莲座上的供养菩萨，等级更低，形体更小。

唐代的彩塑佛像一般七身一铺，多则十一身，形成完备的整体。在这些整体塑像中，至高无上的主尊，深睿智慧的弟子，沉静安谧的菩萨，威严无敌的天王、力士以及温厚虔诚的供养菩萨等，都按其职位等级有次序地安置在形同殿堂的龕坛上。同时，匠师们凭借其天才和智慧，把未塑像的八弟子、诸菩萨以及天龙八部绘制在佛像后面的龕壁上，由此衬托并弥补了由建筑的局限而造成塑像空间深度的不足，从而使局限的佛龕化为相对无限，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艺术建筑、雕塑、绘画三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传统特点。

唐代僧侣的社会地位很高。敦煌彩塑中也有少数高僧的肖像，如第 5窟（藏经洞）中的洪誓像，是莫高窟现存数身高僧肖像中最好的一身。他身披通肩袈裟，作禅定状，坚毅自信，端庄持重。作者以含蓄的眼神、紧闭的嘴唇以及细微的面部皱纹，表现了这位高僧深沉的内心境界。

莫高窟唐代塑像的艺术风格，是在隋代不断探索与创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例如迦叶像是北周时代开始出现的，到了隋代，其面相和体形已有了不少发展和变化，直到唐代，才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老成持重”的典型。菩萨像也是如此。唐代的菩萨像，在体形、面相、神态上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具有“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的共同特征。如第 4窟的“游戏座”菩萨，虽然色彩已变，肢体已残，但从其丰满的身躯，自然倾斜的姿态，以及富有装饰性的锦裙褶纹里，都表现出唐代艺术所普遍崇尚的“浓丽丰厚”的时代风格。

晚唐、五代时期，莫高窟艺术已呈现出明显的衰颓迹象，造像之风远不及隋和唐前期之盛。此时的彩塑，虽丰腴华丽，但神情呆板，缺乏个性，许多作品坠入程式化。不过偶尔也有几尊塑

像，继承了盛唐风格，虽功力犹存，但气派不足，只不过是盛唐艺术的回光返照罢了。

由于五代宋初的洞窟多在崖面下层，因此破坏较大，现存塑像已不多。在曹元忠建造的缘窟里，还保存着一铺完整的宋塑，有佛、菩萨、弟子、天王、金刚力士等十余身。其形象衣饰仍保持着唐代遗风，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唐代。

宋代、西夏、元、清各期的彩塑保存不多，佛像大都呆板迟滞，缺少活力，尤其是清代塑像，俗不可耐，根本不能和隋唐塑像相提并论。

莫高窟的彩塑艺术，虽然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宣扬宗教迷信思想的，但是作为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它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宝贵艺术遗产。

圆援敦煌彩塑的制作方法和特点

由于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不能雕刻，因此一开始就采用了传统的泥塑方法。古代的匠师们用捏、塑、贴、压、削、刻等传统泥塑技法，塑出简洁明快的形体后，再用点、染、刷、涂、描等绘画技法敷彩，以润饰皮肤，画出细节，体现质感。

（员）泥塑的制作技巧和敷彩

从一些已经残破的彩塑上，我们可以了解到泥塑骨架制作的奥妙。小型彩塑一般是用木头削制成人物的大体结构，表面塑上薄薄一层细泥。那些木胎本身已经可以看出人物的大体造型和动态。一些比较大型的彩塑骨架，一般都用圆木根据塑像姿势的需要扎制。现已发现古代匠师巧妙地按照塑像动态选用适当弯曲的木料，如员窟前室的力士像，就用了一根粗大而弯曲的圆木，仅仅在脖子位置砍细了一些，由此就能清楚地看出力士仰头挺胸的生动神态。有的塑像用木板制作手掌，用戈壁滩上的红柳枝

条做手指，然后敷泥，第 15 窟的佛像就是这样制做的。一些高达二三十米的泥塑，是不用木制骨架的，而是在开凿洞窟时预留塑像石胎，然后在石胎上凿孔插桩，再于表层敷泥塑成。

用圆木搭制的骨架，上泥前需用茭草或芦苇捆扎成人物的大体结构，这样既省泥又可减轻圆木立柱的负重。另外，在骨架上还有一些横向的木桩楔入背后壁上凿出的孔里，把塑像固定起来。

敦煌彩塑用泥都是当地河床沉淀的一层泥土，即澄板土，它质细而无胶性，制泥时需加入适量的细砂和纤维。根据加入的纤维不同，大体分为两种，即粗泥和细泥。粗泥用澄板土加麦秸，以塑人物大样。细泥用澄板土七成、细砂三成，再加麻刀或棉花合成，以塑造人物表层及五官、衣褶、佩饰等细部。由于古代匠师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制泥和塑造经验，使泥塑完成后收缩小，不开裂，保存久远。从已残破的敦煌泥塑中可以看出，塑泥有明显的层次，每层表面都留有抹泥的指纹，这说明泥塑是分层敷泥的，并且每敷一层都不能过厚，而是待其水分适当挥发后再敷。最后加工表层的细泥，一般较薄，在其干燥过程中，需用塑刀反复按压收紧，从而使泥塑完成后不再变形和开裂。

同时，古代匠师们还广泛使用了泥范（即泥制的模具），用以制作中心柱或窟壁上的浮雕和圆雕人物身上的璎珞、串珠和花冠等装饰。此外，还采用了预制头部、手指、脚趾等局部的方法。这样既节省工时，又考虑到了细部装饰及指、趾容易损坏的情况。

敦煌彩塑在敷彩上，各时代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敷彩比较简朴沉稳，主要用土红、石绿、石青、白、黑等几种颜色。佛像大都用土红色大面积平涂通肩袈裟。菩萨像一般用石青、石绿等描绘裳、裙及飘带的形体转折变化。面部及

手、脚，则用白色或肉色。隋唐两代，敦煌彩塑的敷彩发展到了辉煌灿烂的时期。隋代塑像上出现了许多织锦图案和五光十色的璎珞装饰。唐代的敷彩更加绚丽，除了描绘丰富多彩外，许多地方还有装金，至今仍闪烁着光彩。五代以后，在敷彩上逐渐演变为比较清雅的色调，装銮技艺已不能和唐代同日而语了。

（圆）塑造上的特点

敦煌彩塑在塑造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雕塑的结合。泥塑与石雕，都是立体造型艺术，具有共同特点。为了稳固，雕塑必须靠山崖或背屏，并与山崖背屏相连接。其雕凿工艺一般是先雕出大的体积，然后逐渐加工细刻。泥塑则是先制作骨架，再以非常柔软的砂泥逐步分层塑制，这样既易于表现大的动态和飞舞的飘带，又易于表现细部更加细微的变化，达到生动活泼的效果。雕刻和泥塑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制作技艺，但在可能的范围内又往往相互影响、吸收、借取。敦煌彩塑就具有泥塑比较生动活泼、刻画细腻等特征，又在不少地方运用了石雕的表现手法，这在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如第196窟圆雕等窟中心柱四周的菩萨像，其头部前倾，身体紧靠中心柱，体积扁平。而靠近身体的一只手却平贴在身上，这些都是借用了浮雕的处理方法。

第二，绘塑结合。敦煌彩塑一般都在大型龕中或须弥坛上，塑像的造型、着色都与四周壁画统一协调，相得益彰，在金碧辉煌的色彩中，更能衬托出塑像在窟中的主体地位。

绘塑结合常常用来处理大形与细部的关系。如唐代天王像，铠甲只塑出大体外形，甲的细部鱼鳞、锁子等，多以金箔装饰和青绿彩绘。塑像的颜面和肢体敷以重色，菩萨像涂白色，以表现皮肤的洁白莹润。弟子、天王涂肉红色，或赭红色。人物的眼、眉、须、发以黑线或赭红线描画，同时以浓墨点睛，朱红涂唇。色彩上的夸张有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从而收到了泥塑不易达到

的效果。由于绘塑的巧妙结合，大大增强了佛像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现实性。敦煌彩塑属佛教艺术的范畴，但它并没有严格遵守佛教造像的清规戒律，而是普遍运用了“夸饰”的手法。如彩塑菩萨，一般都长眉入鬓，嘴角深陷，项下加三级，加长手指等等。这些虽然都违反生理现象，但由于“夸而有节，饰而不诬”^⑥，不仅无损于形象的真实性的，反而更好地表现了菩萨的女性特征，增强了形象的典型性和艺术魅力。

敦煌彩塑能够获得高度的艺术成就，正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佛教造像的清规戒律，并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大胆地以“妓女”、“宫娃”、“胡商”、“梵僧”、“将军”等现实人物为蓝本，并加以夸张、想象、概括、提炼，才塑造了富有社会生活气息的宗教人物形象。

四、飞天新装挥舞迎

——敦煌的飞天艺术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最生动活泼的形象，是佛经中的乾闥婆（天歌神）与紧那罗（天乐神）的合称。她们的职能是侍奉佛陀和天帝释，因能歌善舞，周身还散发着香气，所以又叫香音神。

敦煌飞天的产生

乾闥婆，乃汉译佛经八部众之一的乐神，原来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群神之一。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以及《薄伽梵往世书》的神话传说，他是天神和阿修罗从乳海中搅出来的。

紧那罗，乃印度古神话中的神。据唐慧琳《音义》载：“真陀罗，古作紧那罗，音乐天也。有微妙音响，能作歌舞。男则马首人身能歌，女则端正能舞。次此天女，多与乾闥婆为妻室也。”后来逐渐演变为佛教八部众之一。

在印度、中国以及中亚的石窟艺术中，飞天是常见的形象。至于“飞天”一词，就目前所知，最早见于《洛阳伽蓝记》。该书卷四载：“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杨衒之所记乃公元六世纪初的情况，其金像辇上的“飞天伎乐”到底是什么样子，目前已无法见到了。但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却有幸看到了南朝“天人”的形象。

“天人”形象，是1955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省丹阳县胡桥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出土的两座南朝萧齐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其中的砖纹壁画《羽人戏龙图》和《羽人戏虎图》特别引人注目。在龙和虎前都刻一羽人，羽人腰束飘带，衣袖、裤管作羽翼状。在龙、虎上方，各有三“天人”（据砖文自铭）凌空飞翔。^⑦对这铭刻有“天人”的形象，或称之为“飞仙”，或称之为“飞天”。

“天人”也称为“天众”、“天部”（复数），大凡佛传中降生、出家、说法、涅槃等场合，以及佛本生故事中行善业之际，依其场合与情节的不同，天人（或天众、天部）或以歌舞供养，散花祝愿，表示对佛的礼赞歌颂出现于空中；或以佛的侍从、护法的身份出现于空中。因此，在绘画和雕塑中也就创作了飞行空中的天神形象。

上述南朝墓葬中的“天人”形象，并非佛涅槃时的最后供养，而是陪伴和引导墓主人乘龙乘虎以升天的。这里的“天”，已不完全是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原有的仙山之上的“天”，而是带有佛教“西方净土”的意味了。因为这时佛教已在江南广为流传，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传统的羽人飞仙与佛教天人熔为一炉，画出中国化的“天人”形象，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古代中国，“飞仙”似有两个系统：一是中国固有的，另一是印度传来的。中国固有的飞仙，就是指羽人，是神仙家思想

的产物。南朝墓葬中的天人没有长羽毛，这和甘肃酒泉丁家闸 缘号墓壁画中的羽人不同。丁家闸 缘号墓的羽人，虽然也是飞仙模样，但保留了双肩背后的羽翼，没有天人的成分和形象。南朝大墓中的戏龙、戏虎图，都是羽人和天人并存于同一画面上。这种情况，似已说明“天人”已不完全属于中国固有的飞仙，而属于源于印度而中国化了的飞天。这种羽人和飞天并存的情况，在敦煌也有发现。如莫高窟第 90窟壁画、第 94窟残塑等，都是羽人和飞天共存。由此可知，羽人进入了佛窟，天人进入了陵墓，它们相互交起了朋友。这种情况，既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又反映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

飞天出自印度，公元前二世纪的雕刻和壁画中就已出现了飞天形象。随着佛教的东渐，飞天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但是，印度飞天并不是直接进入莫高窟的，而是飞越千山万水，途经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不断吸收、融合当地的艺术后，才辗转传入中国的。它首先经阿富汗，特别是犍陀罗，吸收了希腊、罗马和波斯的艺术之后，便形成了最早雕刻佛陀形象的犍陀罗艺术，然后又进入西域，在龟兹诸石窟和寺院安家。到十六国时期，又从西域继续东传，飞越玉门关、阳关，才在莫高窟落户。

由以上叙述可知，敦煌飞天，既不是印度飞天的翻版，也不是中国羽人的完全继承。而是以歌舞伎为蓝本，并大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促进传统艺术的改变，从而创造出的表达中国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思想的中国飞天。

飞天的发展变化

从佛经的描述看，飞天的形象似人非人，头上长角，并不美。但经过艺术家之手，却都成了形貌俊美的天男天女，还精于幻术，能作宫殿楼阁，其中还有行人出入。

敦煌壁画和塑像中的飞天，与莫高窟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

始，跨越了十几个朝代，历时近千年。直到元末，随着莫高窟的停建而消逝。现存飞天六七千身。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政权的更替，历史的发展变化，飞天的形象、姿态以及意境、情趣、风格等，都在不断发展变化。

十六国时代的飞天，大多出现在本生故事画中。其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或结队旋绕，向佛陀歌舞飞翔，或挥手起舞，自由舒展。有的还在波状形的动律中袅袅上升，呈现出无声的节奏感。

十六国的飞天，身材粗短，上身半裸，腰裹长裙，头顶大髻，并涂有白眼珠、白鼻梁，和西域石窟尤其是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形象、姿态、色彩、线描和绘制过程都相似，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基本特征仍与龟兹飞天相同，故可称为西域式飞天。

北魏时期的飞天，虽然还保留着西域飞天的鲜明特点，但在具体形象上却有了显著变化。其脸型已由椭圆变为条长而丰满，五官匀称谐调，身材比例逐渐修长。姿态也多种多样，或对面私语，或横游太空，或振臂腾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飞天起落处，彩云飘扬，天花乱坠，颇有诗意。这些变化，显然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敦煌地区魏晋十六国壁画造型的影响。因此，这时的敦煌飞天，本土特色已经形成。

北魏晚期，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他将中原的文化艺术带到了河西，同时还带来了南朝秀骨清像派飞天，从而改变了佛教艺术的流向。从此开始，受到南朝神仙思想和艺术影响的中原佛教艺术向西传播。因此，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在壁画中出现了道教题材和佛教题材同窟表演，竞相争辉的局面。在同一石窟中，既有佛教天人，也有道教神仙。出现了道教的羽人、飞仙和佛教的飞天以各自独特的风姿，同欢共乐在一个洞窟的艺术现象。这种现象是佛道思想相互融合在飞天形象上的反映。

鲜卑族建立的北周，既吸收中原文化，又加强和西域的联

系。特别是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时，不仅保留了西魏秀骨清像飞天和北魏本土型飞天，而且还从东面接受了中原面短而艳的新型飞天，同时还从西域迎来了龟兹旧式飞天，从而使各种风格的飞天共居一窟，竞相争艳，各展风姿。

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裸体飞天。她们全身裸露，挥臂扭腰，脚尖指地，其激烈有力的舞姿，与潇洒飘逸的西魏中原式飞天迥然不同。

北周以前，乾闥婆与紧那罗虽然同时出现，但她们都有各自的活动领域和职能。乾闥婆比较自由，到处都有其活动场所，而紧那罗则被禁闭在天宫楼阁里，无法自由翱翔。到了北周，紧那罗冲破了天宫楼阁的束缚，与乾闥婆相会，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伎乐队伍。

隋统一南北后，中国封建社会又走上了大一统的局面。与此相适应，佛教乃至佛教艺术不同的流派也逐渐趋于一致，各种飞天也逐渐融合为一，并呈现出大一统的时代风格。隋代飞天有清秀型和条丰型两种脸型。人体比例适度，既有不同的衣裙和发髻，也有不同的表现方法，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探索中形成统一的时代风格。

隋代是飞天最多、流行最广的时代，不仅寺院、石窟里画飞天，而且还在帝王的宫廷里雕刻飞天。隋炀帝的宫廷图书馆巧设机关，以两身木雕飞天自动上下飞翔，为炀帝卷帘开道，侍奉人间帝王。

唐代是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也是飞天发展的最高峰。唐代飞天多以个体单独活动，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双手抱头，从空中俯冲而下，势若流星；有的昂首挥臂，蛙游太空；有的并肩遨游，窃窃私语，舞带随风悠悠漫卷；有的围绕宝盖，相互追逐，形成了圆环旋转形式。但也出现了双飞天，她们一个在前面飞，一个在后面追，舞带彩云随风飘荡，前者回首呼应，扬

手散花。可以看出，唐代飞天创造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境界，正如李白咏仙女诗的《古风》中所描写的那样：“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

唐前期的敦煌飞天，和前代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丰满”上。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多灾多难之秋。为了适应这种社会现实，佛教强调“苦修”，为争取来世的幸福而忍耐。此时的飞天，面容瘦削，形体修长，和唐代的飞天相比，表现了一种“清秀”的风格。到了唐代前期，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为了适应这种社会现实，佛教不再强调“苦修”，而是主张诵经即可成佛，并竭力宣扬“极乐世界”，以“极乐”引人。这时的飞天形象，一方面吸收了伊朗萨珊王朝（~~西元一世纪~~）的细密工致、色彩绚丽的的手法，使装饰风格日趋浓厚；另一方面又吸取了印度笈多时期的丰满特征，从而形成了体态丰满的唐代美人风格。

中晚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文化艺术也渐趋衰退，这时期的飞天，也从浓丽丰厚的风格，走向清雅逸丽。虽然其中仍有一些别具风采的佳作，但从总体上说，她已开始渐趋衰落，极乐国里的飞天已经黯然失色。

五代宋初，曹氏画院的匠师们继承了唐代余绪，但在飞天的造型上，逐渐出现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倾向，渐渐失去了艺术生命力。

回鹘、西夏时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飞天，她们一部分沿袭宋式，一部分具有西夏的独特风格。头饰珠翠，世俗性较浓。但舞带短而身量沉重，飘浮飞动感不强。

元代流行密教，飞天很少。有一类飞天，作女童形象，眼视前方，情态含蓄。虽然缺少轻盈飘渺的动感，但却具有另一种意趣。

总之，敦煌的飞天艺术，经历了千年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

代特色和民族风格，其中许多优美的形象，欢乐的境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给人以美的享受。

敦煌飞天的艺术风格

敦煌飞天，虽然是外来艺术，却是在中国大地上盛开的花朵。为了适应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理想，她必然不断发生变化。到隋唐时期，达到了飞天艺术发展的高峰，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体现中国审美理想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第一，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

敦煌飞天的创作方法，与敦煌壁画总的创作方法一样，经历了一系列的形象思维过程，即现实——想象——意象——艺术形象。所谓现实，就是百戏和歌舞伎。所谓想象，就是无翼而飞。它体现了中国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寓形寄意”、“立象以尽意”，甚至“得意忘象”等等重意象、重意境的特色。因此，敦煌飞天是古代画师根据现实生活形象，加上主观想象（包括联想、迁想、幻想）并倾注思想感情，熔铸而成的意象的显现。她具有中国人的风貌和神采，不长翅膀，不生羽毛，非男非女。借助云彩而不依托云彩，仅仅凭借一条舞带凌空腾飞。这就是隋唐时代审美理想的体现。高度的想像力，赋予了飞天以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敦煌飞天的表现技巧，主要突出在线描造型上。中国的毛笔，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在描线时，运笔、运力、运情三者融为一体。使线本身及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富有生气和音乐般的韵律感，这是中国线描独具的特色。

飞天的线，不仅在于造型，更重要的是表意，特别是蜿蜒曲折的长线所表现的舒展与和谐的意趣，与“极乐世界”中“天人合一”、幸福愉快的境界是吻合的。

第二，飞天艺术的主要特征——飞动之美

与整个敦煌艺术的发展相适应，敦煌飞天经历了兴、盛、衰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表现，主要在飞动之美的消长上。

敦煌飞天是在中原传统的羽人、南朝的飞天和西域式飞天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来的。因此她体现了古代中国和印度美术中的一些特色，尤其是飞动之感，如跳跃、悬腾、浮游、翻飞等姿势。

敦煌飞天的飞动特色，主要表现在翻飞的升腾和俯冲姿势上，尤其是俯冲的姿态特别优美，它也是敦煌飞天与印度飞天在形象上的显著区别之一。当你在千佛洞漫步欣赏时，就会看到各种姿态的飞天，或像飞鸟从高空直下，或斜掠疾扫，变化无穷。虽然有的姿态看似惊险，但却无失坠之感。

敦煌飞天的飞动之美，除了表现在本身外，还以飘带衣裙和云气飞花为辅助和补充。正是飘带衣裙和云气飞花的作用，才解决了体重问题。由于人体的动势和衣带、云气、飞花的相互映衬，才使飞天俊美的面相和体形得到了充分表现，从而开阔了敦煌飞天飞动之美的新天地。

第三，飞天艺术的美学思想

在敦煌飞天的艺术风格中，还体现了独特的美学思想。

由于敦煌飞天并非直接来自印度，而是经过阿富汗、新疆龟兹石窟辗转传入敦煌，并与中原飞天和南朝羽人相融合。因此敦煌飞天是多种艺术因素的合成形象。尽管如此，但她仍然显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

敦煌飞天的出现，反映了古代艺术家们的丰富想像力。在现实生活中，人当然是不会飞的。但是，不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绘画中，飞翔的人物却是经常出现的。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中就有“嫦娥奔月”，山东武梁祠的汉画中也有飞翔的“羽人”。敦煌飞天，虽然没有张开的翅膀，但通过那迎风飘摆，流

动如飞的风带的衬托，同样给人以飞舞飘动之感。

西方臂生鸟翼的天使，中国身长绿毛的羽人，都没有得到发展普及。然而由于敦煌飞天充分运用了想像力，并以抽象充实意象，却创造了不生双翼，不长绿毛，非男非女，亦男亦女的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和全部敦煌艺术一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在中国传统艺术基础上吸收并融合了外来艺术营养而发展起来的。她打破了儒家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和乡土人情，大胆地吸收人体解剖原理和人体美的表现方法，以及变形造形、五官和手脚的夸饰等手法，使人物的自然形态化为理想的艺术形象。同时，还从佛教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因素，创造了没有男女生理特征的艺术形象，使人们在艺术欣赏中进入超人境界，使佛教的净化与艺术美的净化作用结合起来了。

五、反弹琵琶伎乐天

——敦煌的乐舞艺术

在敦煌艺术中，独具一格的乐舞艺术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壁画及遗书中，有大量的乐舞资料，如壁画中千姿百态的舞蹈，名目繁多的乐器，遗书中的曲谱、舞谱等等，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敦煌曲谱的解译

在敦煌遗书 S.561v《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的背面，发现了二十五首曲谱，包括《品弄》、《倾杯乐》、《伊州》、《水鼓子》、《西江月》、《瀛府》、《长沙女引》、《撒金砂》、《心事子》、《胡相问》及《急曲子》、《慢曲子》、《又曲子》等。对这些

曲谱，或称为“工尺谱”，或称为“敦煌琵琶谱”，我们暂称为“敦煌曲谱”。

据有的学者考证，“敦煌曲谱”的抄写年代是公元 868 年闰正月，抄写地点是洛阳，抄写人是被后唐敕封为“僧政、临坛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梁幸德的三位助手^⑧。从而可知，这些乐曲的存在年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由于这些乐曲早已失传，记录乐曲的记谱法已被遗忘，解译敦煌曲谱便成为难题了。

1908 年，日本学者林谦三、平出久雄开始了对敦煌曲谱的研究。1915 年发表了他们的《琵琶古谱之研究》，这是当今世界上敦煌曲谱的最先解译者。后来，林谦三在其《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⑨一书之“跋”中曾追忆说：“开始知道有《敦煌琵琶谱》是 1908 年初夏，在某处偶然见到了这乐谱的几张照片，就决意要把它解释明白，要把它读通。于是由于友人平出久雄的协助，和《天平琵琶谱》合并在一起，作了一篇解读的试论发表了，这就是《琵琶古谱研究》。其所论的核心和今日所考虑的并无大差，不过暗中摸索的繁缛冗长的考察及其反面推论之未熟的地方却不少。”

1934 年，任二北先生在《敦煌曲初探》一书中指出，敦煌曲谱里有“板眼”记号：“口”是“板”，“·”是“眼”；由此更进一步得知，敦煌曲谱如配上相应的歌词来唱，由于“声多辞少”，便决不可能“一字一音”，进而作出结论：唐至五代的“曲子词”与“声诗”决不可能“一字一音”呆板地唱，应当有流畅、完美、动人的曲调。任先生虽不是专业音乐工作者，也未能将敦煌曲谱译为现代曲谱，但他的“两论”，即“板眼论”和“非一字一音论”，却是值得重视的论点。

日人林谦三虽然首创用琵琶来解释敦煌曲谱，但他最初依据的仅仅是日本古籍《三五要录》、《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调定弦

法》等及今天日本雅乐“乐琵琶”的“二十字记谱法”，并无更直接的敦煌学材料为证，故他自觉依据不足。

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 ~~孕猿猿~~ ~~猿猿~~《佛本行集经忧波离品次》写卷背面，发现了二十个谱字。从谱字旁的文字来看，这二十个谱字正好合于唐代四弦四柱琵琶上的二十个音位，所以现在就称之为“琵琶二十谱字”。“琵琶二十谱字”对谱字音位记载得十分明确，如果将敦煌曲谱二十五曲所有的音高谱字归并起来，也正好是二十个，而且其谱字形态，亦和现存几种琵琶谱字基本相同。由此可知，用琵琶来解译敦煌曲谱可以说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并被认为是解译敦煌曲谱的第一把钥匙。^⑩

~~猿猿~~年，赵元任先生之女、哈佛大学赵如兰博士赴日参加音乐会期间，将赵元任先生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翻拍的“琵琶二十谱字”照片送给了正在致力于探索敦煌曲谱解译的林谦三。林氏见此照片后，如获至宝，于 ~~猿猿~~年发表在他的《正仓院乐器之研究》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他以往用琵琶解译敦煌曲谱的正确性。

八十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叶栋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曲谱又进行了更加细致、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突破。~~猿猿~~年 ~~猿月~~，在山东音协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叶栋先生宣读了《敦煌曲谱研究》的论文。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猿猿~~年第 ~~猿期~~正式发表了叶栋先生的论文《敦煌曲谱研究》。~~猿猿~~年 ~~猿月~~，在《上海之春》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叶栋先生又以“琵琶二十谱字”作为用琵琶解译敦煌曲谱的重要论据，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补充。

叶栋先生对敦煌曲谱的研究，虽然是在林谦三和任二北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但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对二十五曲的节拍节奏形式的解释与林氏的译谱大不相同，认为敦煌曲谱二十五首是“由一系列不同分曲组成的唐大曲”，“全曲由三种音阶

——燕乐音阶、清乐音阶和古音阶（一称雅乐音阶）组成”；认为敦煌曲谱“全曲兼具词曲音乐联套的特点”，“该套曲谱同曲辞与声乐”的关系“密切”。并列表将二十五曲与大曲曲式作了比较。

《敦煌曲谱研究》发表后，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汇报》（圆月 圆日）、《新民晚报》（圆月 圆日）、《上海音讯》（员圆年 圆期）、《解放日报》（缘月 员日）、《音乐爱好者》（员圆年 圆期）、《上海画报》（员圆年 猿期）、《光明日报》（缘月 员日）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等都相继对叶栋先生研究敦煌曲谱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并一致给以肯定性的评价。认为叶栋先生对敦煌曲谱“破译成功”，使“绝响千年的唐乐重新变成音响”。

对于叶栋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看法，但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评价。何苍伶先生说：“叶栋同志于 员圆年发表的《敦煌乐谱》的五线谱译稿，第一次将 员圆年林谦三的见解与 员圆年任二北的发现结合了起来，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⑪ 林友仁、孙克仁、应有勤、夏飞云先生说：“《敦煌曲谱研究》虽然只是提纲挈领地阐述叶栋同志的研究成果，但我们透过字里行间，仍可窥见他如何在前人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探索方法和缜密认真的求证手段，将这些成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将从叶栋的研究方法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而它所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决不亚于解读《敦煌曲谱》本身的价值。”^⑫

员圆年，席臻贯对敦煌曲谱的破译获得成功，并在兰州等地作了演奏尝试。同年，他关于敦煌曲谱破译的新成果——《敦煌古乐——敦煌乐谱新译》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和甘肃音像出版社联合推出。它不仅包括作者对乐谱 员首（古谱、五线谱对照）和敦煌古谱歌曲 员首（古谱、五线谱、词对照）的破译，而且

还有根据新译乐谱录制的三盒盒式录音带，与书配套发行。众所周知，敦煌乐谱破译的关键是节拍，此书（含录音带）对敦煌古谱的破译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得到了敦煌学界和音乐学界的重视。其后，又到香港等地进行了演奏，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圆 名目繁多的乐器

莫高窟壁画中有大量的古代乐器图像。它反映了历史时期各种乐器的形制和演变、演奏方法、组合形式以及当时的社会音乐风尚，从而为我们研究乐器史及中国音乐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依据。

据有的学者调查、考证，莫高窟壁画中现有各种乐器 源四四 余件，共有 源源 种，即：

（员）气鸣乐器：横笛、风笛、异形笛、竖笛、篳篥、排箫、笙、角、画角、铜角、贝、埙；

（圆）弦鸣乐器：琵琶、五弦、葫芦琴、阮、弯颈琴、琴、箏、箜篌、凤首箜篌、胡琴；

（猿）打击乐器：腰鼓、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羯鼓、节鼓、檐鼓、齐鼓、鼗鼓、鸡娄鼓、大鼓、军鼓、手鼓、扁鼓、方响、铙、钹、柏板、钟、铎、串铃、金刚铃。^⑬

现将其要者介绍如下：

横笛：即今日流行之竹笛，乃吹管乐器中之主要者。在壁画中的数量很多，仅莫高窟统计，就绘有 缘四 余只。敦煌所绘横笛，始见于北凉，历代延续不断，直至宋元。从其形制挖孔及演奏方法看，都与今日之横笛基本一致。壁画中横笛的主要特征是不用笛膜。

篳篥：属管乐类乐器，自西域传入，用竹管作成，形状粗短，上口安装芦簧即哨子发出声音，竖式吹奏。后又在下端加一喇叭，就成了现在的“唢呐”。敦煌所绘篳篥，大多出现在壁画

伎乐里。

排箫：古代编管乐器。敦煌壁画中的排箫位置显著，造型华丽，极富仙乐幻觉的意境。莫高窟绘有排箫 ~~猿~~ 十余只，形态不尽相同，根据其竹管的长短，分为底箫和洞箫两种。壁画中的排箫始自北魏，直到元代，大部分伎乐里都有排箫，可见其在当时乐队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笙：是竹制簧管类乐器，由斗子、簧管、吹嘴三部分组成。大的称竽，小的叫笙，是中原旧有乐器。笙在壁画中很普遍，莫高窟共绘有 ~~猿~~ 十余只，从北魏出现一直延续不断。壁画上的笙，早期只具轮廓，不易辨别细部，唐以后逐渐具体，形制也趋向一致，但其大小长短比例和管数却很悬殊。莫高窟 ~~莫~~ 西壁中唐所绘《文殊变》中，有一吹笙伎乐，神态极为逼真。

角：也叫胡角，用牛角或羊角制成，是一种最简单的原始乐器。游牧民族擅长吹奏，它也最先出现于游牧民族。由于它发音宏大，高亢凌厉，适于远传声音，所以为古代军营所使用。

从敦煌壁画中，能够很清晰地看出角的演变过程，即角——画角——铜角。角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就有绘制，如北魏 ~~莫~~ 北壁有两个吹大角的供养乐伎。兽角在早期天宫伎乐、药叉伎乐中也多有所见，如北魏 ~~莫~~ ~~莫~~ 窟。此后，角在壁画中便逐渐消失，这可能是因其发音单调粗犷，只能发一音，不适于参加乐队。

琵琶：为弦鸣类乐器中的弹弦乐器，又称“曲项琵琶”、“龟兹琵琶”。其杆长头细，近似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甫。自西域传入，多用木拨子弹奏，也有用手指弹奏的。琵琶在古代诗词中反映最多，在壁画伎乐中也广泛运用，几乎每组伎乐中都有琵琶。在敦煌壁画中，琵琶的图形最多，仅莫高窟就绘有 ~~苑~~ 十余只，居所绘乐器之首位。凡画有音乐形象处必有琵琶，具有音乐的象征意义。如天宫伎乐中就有大量的琵琶飞天，以及反弹琵琶者。从

而可知琵琶在当时是主要乐器，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古代音乐家还为它专门创作了琵琶谱。

五弦：是一种比琵琶多一条弦的琵琶，也称“五弦琵琶”。五弦与琵琶同时在壁画中出现，为姊妹乐器。据文献记载，五弦出现于北朝之后，隋唐时期盛行。

阮：又称阮咸，因晋代竹林七贤之阮咸善弹此器而得名。唐武则天以后，才有阮的名称。其形态为正圆形共鸣箱，长柄，十二品柱，四弦（或五弦），与琵琶十分近似。

箜篌：古代框箱弹弦乐器。箜篌可能源于西方，但在中国也有千余年的流传历史，并被逐渐改造，成为中国的民族乐器了。敦煌壁画中的箜篌相当多，仅莫高窟就绘有 400 余只。早期画得简单，形体小，一手持，一手弹，弦数也较少。唐以后的箜篌，多为大型彩绘，华丽壮观，边框饰有团花、团龙、团凤等纹样。

腰鼓：其特征为细腰，形状如两个碗，底部对接而成，两端张以皮革，以绳收束，使皮膜绷紧，敲击发音。腰鼓的演奏方式是系于腰间，或置于面前，踞地演奏，用手拍或杖击发音。敦煌壁画中的腰鼓，从北凉到元代，一贯始终，从未间断，而且形类繁多，几乎每一只，都有其特色。在经变画中，常有腰鼓独舞者，或与反弹琵琶合组的双人舞蹈场面。它不仅出现于乐队中，而且是舞伎表演的重要道具，是一种具有高度工艺水平的装潢性乐器。

方响：古代有音律的打击乐器。文献记载始于南北朝之梁代，在莫高窟 400 窟伎乐图中可见此乐器。通常用十六枚大小不同、厚薄不一的长方形铁片组成，并分为两排，悬在架上，用小铁槌击奏。其状似编磬，古代雅乐和俗乐都将方响列入编制，是隋唐燕乐中常用之乐器，多用于宫廷，民间很少使用。

铎：铎为一扁平之圆盘，古时也曾称为钲、铜铎、沙铎。在千佛洞 400 窟《东方药师变》乐队中，有两个乐伎演奏铜铎，表

演奏姿态特殊，击响后抛入空中。另外，在飞天乐伎画中也有钹。

千姿百态的舞蹈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图像，数量极多，姿态各异。尤其是各种各样的乐伎，出现于壁画的各个角落，别开生面地展现了一幅幅古代乐舞活动的场景。它通过浪漫的艺术想象，把人们带到一个绚丽多彩、扑朔迷离的极乐世界，早已摆脱和超越了原有的宗教内容。

据有的学者考察、研究，敦煌壁画中的乐伎分为伎乐天 and 伎乐人两大类，其中伎乐天又分为天宫乐伎、飞天乐伎、化生乐伎、护法神乐伎、迦陵鸟乐伎、经变画乐伎。现依据郑汝中先生的研究成果，将其依次简要介绍如下：^{①④}

天宫乐伎：据佛经讲，凡佛国上界，一切从事乐舞活动的菩萨、神众，都可称之为天宫乐伎。就敦煌壁画而言，天宫乐伎是指窟顶与四壁交界处，环窟四周，绘有带状之宫门栏墙，绘无数并列之方格，从而呈天宫圆券城门洞形。在每个门洞之中，踞一奏乐或舞蹈之天人，这些天人，就是所说的天宫乐伎。

天宫乐伎是敦煌早期壁画的一种固定形式，从北凉开始一直延续到隋代，此后，这种形式逐渐消失，被飞天乐伎所取代。

天宫乐伎的造型生动、质朴，无固定模式。其姿态也不断变化，各不相同，或持各种乐器，或持彩带、花环，或以手势及身体的扭动呈歌舞状。在安排上，似无一定规律，有的洞窟以奏乐者为主，有的则以舞蹈者为主，一般为乐舞相间。

敦煌的天宫乐伎是音乐舞蹈图形在壁画中最初期的形式，以后逐渐扩散，在壁画的各个角落都相继出现，使洞窟不仅肃穆，而且充满欢乐气氛。

飞天乐伎：敦煌莫高窟有大量的飞天艺术，其中飞天乐伎（持乐器的飞天）就有 ~~近百~~ 余身。

早期洞窟中的飞天，为男性特征，所持乐器品种不多，而且画得简陋，看不出演奏细节。隋代飞天，身体逐渐灵活，人物形态变化明显，由男性逐渐转为女性。进入唐代后逐渐丰富，乃至高潮。后期飞天乐伎，已进入程式化的衰落阶段，但所持乐器品种增多，如胡琴、手鼓、铎等，都是在乐队中未曾绘制的乐器。而且随着画技的提高，在描绘演奏状态时也有所突破，充分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水平。

化生乐伎：化生为佛教常用术语，即莲花中所生。化生乐伎和天宫乐伎、飞天乐伎一样，是对佛的礼赞和奉献，它的特点是分散，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出现。敦煌壁画中的化生乐伎表现得最为丰富，变化纷繁，形式多样，凡是在莲花上的乐伎都可称为化生乐伎。

护法神乐伎：护法神，即护持佛法之神，它是佛国的警卫系统。凡护法神中持乐器或作舞者，皆称为护法神乐伎。敦煌壁画中的护法神乐伎可分为天王乐伎、金刚乐伎和药叉乐伎三种。如金刚乐伎，就是指持乐器的金刚力士。莫高窟壁画中的金刚力士很多，特别是密宗洞窟，一般手持金刚杵及金刚铃。在莫高窟，有一手持乐器之六臂金刚，其六臂持三种乐器：即金刚铃、横笛和琵琶，作同时演奏状。

伽陵鸟乐伎：在敦煌壁画中，有一种鸟身人首的图形，身体类似仙鹤，翅膀张开，两腿细长，头为童子或戴冠之菩萨首状。这种人首鸟身的图形，在壁画中被称为伽陵频伽鸟，其中有部分持乐器或作舞者，称为伽陵鸟乐伎。

经变画乐伎：敦煌经变画中，绘有乐舞内容的佛经有《药师经变》，其中最多的是《药师经变》，莫高窟绘有《药师经变》。其次为《观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即西方净土变），《阿弥陀经变》。

经变画中的乐队，最早见于隋代。隋以前的音乐演奏，都是单身独奏的形式。从隋代开始就有了小型乐队的合奏。到了唐

代，便出现了大型乐队的经变画，如第 445 窟，即有 15 人的乐队，中间舞伎 9 人。这个乐队是敦煌经变画中人数最多的一组，而且乐器的品种也最多，绘制得十分精细。

敦煌经变画中，佛殿前沿两边排列的乐队，称为礼佛乐队。由于经变画大小不等，礼佛乐队的规模、阵容也各不相同，一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的乐队为每边 15 人以上者，小的多为一边 5 至 9 人。中间舞蹈者，有 1 人、3 人或 9 人者不等。

有的大型经变画，多达三层乐队。两侧乐队席地而坐，中间有舞伎表演，有的空手而舞，有的则反弹琵琶或持腰鼓。从敦煌壁画乐、舞伎的排列形式和乐器使用范围来看，它基本上是隋唐燕乐的编制，经变画就是以此为模式进行绘制的。

伎乐人：在壁画中，凡是描绘人间世俗的活动，其中奏乐作舞者，都是伎乐人。伎乐人也称“供养乐伎”。伎乐人在壁画中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世俗乐舞，现实性较强。

敦煌壁画中的伎乐人有供养人、出行图乐伎和宴饮图乐伎三种。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图像，除了大量的乐伎外，还有许多乐舞细节的描绘。^⑮如 445 窟西壁佛龕北侧的文殊变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文殊菩萨前的吹笙者，全神贯注地演奏着乐器。他耷拉着眼皮，思维已全部沉浸在所奏乐曲的境界中。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是静中有动的。他正在默默地按着节拍，但并非摇晃着身子，也没有摆动头部，而是用右脚脚趾的翘动来按拍的。另如 445 窟南壁有反弹琵琶舞者，在其伴奏的左方乐队中，有一伎乐菩萨执鼗击鸡娄鼓，与北壁报恩经变中演奏相同乐器的伎乐菩萨的动作形成有趣的对比，其击鼓的右手不是紧握成拳，而是散开五指轻轻拍击，由此可知，这种反弹琵琶的舞蹈，动作轻盈，节奏平静徐缓。

舞者反弹琵琶的场面，莫高窟中有许多反映。除 45窟外，45窟南壁、195窟南壁、3窟北壁西侧、130窟南壁西侧等都有。尤其是 130窟，因反弹琵琶作舞的伎乐菩萨背向我们，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右手所持的斧刃形拨子。我们知道，唐代琵琶有两种弹法：一种用拨子弹奏，为拨弹；另一种用手指弹奏，为掐弹。拨弹在前，掐弹在后。据文献记载，掐弹大约出现于七世纪初。莫高窟中的这一画面印证了史籍的记载。

敦煌壁画中这种舞者同时奏乐的舞蹈形象，既是民间固有舞蹈形式的反映，又可能接受了西域乐舞的影响，所以除了唐代经变中反弹琵琶、击腰鼓作舞的形象外，早在北朝的洞窟中，奏乐作舞兼于一身的形象在天宫伎乐和药叉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瀛岭人费解的舞谱

敦煌遗书中除了曲谱和“琵琶二十字谱”外，还发现了两个舞谱残卷。一为 3窟残卷，刘半农先生编入《敦煌掇瑣》，开始用“舞谱”命名，至今仍在沿用。该卷系一长卷，中无断裂，前无总题，起自《遐方远》谱，止于《风归云》谱，末端残阙，共存六名十四谱，即《遐方远》五谱、《南歌子》一谱、《南乡子》一谱、《双燕子》一谱、《浣溪沙》三谱、《风归云》三谱；二为 195窟残卷。该卷原拟为一蝶装小册，共十六面（七整页，首尾两半页），舞谱抄在第七至十五面，前接《波罗蜜多心经》写本，亦无总题。由于该册中背上部被撕去了一些，所以舞谱文字也有残阙。共存十谱，依次为：阙名二谱、《蓦山溪》二谱、《南歌子》二谱、《双燕子》二谱、阙名二谱。

以上两个舞谱残卷共录舞曲名七种，舞谱二十四篇。通过对这些舞谱的整理分析，可以明白其抄写格式及内容，即开头标明该谱所用的曲调名称（谱名）；中间为序词，它是一段提纲挈领的说明性文字，简练地说明该谱的节奏、节拍；最后为字组，它

是由“合”、“舞”、“掇”、“据”等谱字按一定的节拍、节奏要求排列组合而成的字谱。

敦煌发现的这些舞谱残卷，究竟是唐人打令谱，还是大曲谱，或者是宗教活动的舞谱？学者们虽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仍然是众说不一，均无确证。

现依据柴剑虹先生的研究成果，将这些舞谱残卷简要介绍如下。^{①⑥}

（员）《遐方远》谱

“遐方远”调名不见于史籍记载，唐崔令钦《教坊记》“曲名”下有“遐方怨”名（古代“远”、“怨”通用）。敦煌舞谱残卷中标明为《遐方远》的共有五谱，均抄于孕猿卷。原卷在抄写上颇不规则，序词部分较为复杂，字组部分出现的谱字也最多。

（圆）《南歌子》谱

“南歌子”调名见于《教坊记》“曲名”，《全唐诗》卷愿员收有温庭筠《南歌子》词七首；敦煌遗书中也有《南歌子》曲子词（孕猿卷）。敦煌舞谱残卷中的《南歌子》舞谱共有三个，其中孕猿卷写本中一个，另两个在杂缘卷写本中。

（猿）《双燕子》谱

“双燕子”调名不见《教坊记》记载，敦煌舞谱残卷中的《双燕子》共有三谱，其中孕猿卷一谱，杂缘卷二谱。

（源）《南乡子》谱

“南乡子”，《教坊记》“曲名”中有记载，《全唐诗》卷愿远也收有欧阳炯《南乡子》词八首。舞谱残卷中标明为《南乡子》的仅一谱，抄录在孕猿卷内。

（缘）《浣溪沙》谱

“浣溪沙”一名最早见于《教坊记》所列“曲名”中。《全唐诗》卷愿怨—愿苑收有李璟、韩偓、张曙、韦庄、孙光宪等所作

《浣溪沙》~~苑~~首，均属晚唐五代作品。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中收有《浣溪沙》九首，《云谣集杂曲子》中亦有《浣溪沙》二首。舞谱残卷中的《浣溪沙》共有三谱，全部在孕猿~~猿~~写卷内，另外，杂缘~~猿~~写卷内有阙名二谱，其节奏组合与此《浣溪沙》谱相同，极有可能也为《浣溪沙》谱。

（远《风归云》谱

“风归云”调名始见于《教坊记》“曲名”中。《云谣集杂曲子》中有四首《风归云》词。舞谱残卷中的《风归云》共有三谱，都抄在孕猿~~猿~~《浣溪沙》谱后，因已是该卷写本的末尾部分，故末端有残阙。

（苑《蓦山溪》谱

“蓦山溪”调名《教坊记》中无载。舞谱残卷中的《蓦山溪》共有两谱，都在杂缘~~猿~~写卷内，其中一谱序词完整，字组部分有残阙；而另一谱则序词部分残阙，但字组部分完整。两谱可相互补充。

（愿 不知名谱 粤

此卷抄录在杂缘~~猿~~写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后，是该卷十个舞谱的开头两谱，因写卷残破，故开头序词部分残阙，无谱名，现拟名为“不知名谱 粤”。通过对该谱的整理与分析可知，该谱可能是与《浣溪沙》谱相应的舞谱。

（愿 不知名谱 月

此谱抄录在杂缘~~猿~~写卷不知名谱 粤之后，因写卷残损，所以谱名阙佚。通过对该谱的整理、分析可知，该谱与孕猿~~猿~~卷《浣溪沙》三谱相同，因此，极有可能也是《浣溪沙》谱。

虽然敦煌的曲谱、舞谱还无法完全解译，也不能全部运用于现代音乐、舞蹈中，但我国的乐舞工作者经过努力，已将敦煌壁画舞姿运用于舞台艺术实践中。早在二十年代，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就创作了《天女散花》，五十年代，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创作

了双人舞《飞天》。尤其是甘肃省歌舞团创作演出的敦煌舞剧《丝路花雨》，更使敦煌乐舞大放光彩。《丝路花雨》的出现，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外，更大的意义是为复活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其演出开始，敦煌乐舞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外，海政文工团创作的《敦煌彩塑》也在吸取、融化敦煌壁画和彩塑舞姿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紧接着，甘肃省艺术学校在高金荣校长的主持下，制定了《敦煌舞基本训练教学大纲》，在舞蹈班开设了敦煌舞，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敦煌流派的新舞种——敦煌舞。“因为人们把敦煌文物的研究叫做‘敦煌学’，相应地就把这种展现敦煌壁画的新颖别致、独树一帜的舞蹈艺术称为‘敦煌舞’”。^{①⑦}我们坚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敦煌的音乐、舞蹈艺术一定会作到“古为今用”，走进千家万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六、人间天国多楼台

——敦煌的建筑艺术

莫高窟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宝库，除了壁画和彩塑外，还有大量的古建筑资料；洞窟内外保存有五座唐宋木构窟檐和一些宋元土木古塔；壁画中有大量的各个时代的古建筑形象，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极其珍贵的形象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莫高窟建筑实物

莫高窟现在的外观是六十年代洞窟加固之后的面貌。现在窟崖上仅保存着五座唐宋窟檐，从这些窟檐建筑可以想见，千百年前人们出于宗教动机建造的几百座窟檐殿堂，檐翼相接，画柱雕梁，的确十分壮观。

现存唐末宋初的木构窟檐共五座，其中完整的四座，另一座残缺。完整的四座是：第 109 窟窟檐建于宋初开宝三年（970 年），第 108 窟窟檐建于宋初开宝九年（978 年），第 107 窟窟檐建于太平兴国五年（975 年），第 106 窟窟檐虽无纪年，但其结构形式与邻近的第 109 窟、第 107 窟窟檐相比较，时代是接近的。残缺的一座是 105 窟窟檐，它上部残毁，仅存四根檐柱及梁枋构件，造于晚唐末期，窟檐与洞窟是同时建造的。

以上几座窟檐，虽然在规模尺度上稍有差别，但其结构和形式则基本相似，它们都是三间四柱，深约一间，正中一间开门，左右两间开窗。所有的梁柱都为八边形，柱上有斗拱，柱下无柱础，柱立于地袱之上，枋下有挑出岩体的悬臂梁，梁间铺设木板即成为洞窟之间的往来栈道。

现存各窟窟檐的外观形制古朴，斗拱的风格以及八边形柱与中原同期古建筑的风格有较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敦煌地处边陲，在建筑技术上保存了较多的古老传统。如 109 窟窟檐的木结构梁柱额、枋、斗拱、椽、檩等构件都保存完整。其六铺斗拱，制作准确。檐下圆椽一层，飞头一层。檐端平直，两翼不翘飞，与壁画中所画建筑的形象相同。这些窟檐虽是小型木构建筑，但年代确切，保存完好，内部彩画如新。

第 105 窟外层的九层楼，是一座形式特殊的高大窟檐，楼总高 15 米，建于 10 世纪。窟檐九层，下面七层依山靠岩而建，上两层是保护 15 米高的弥勒像头部的顶盖。整个楼身的建造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势，白壁丹楹，宏伟而秀丽，为莫高窟增添了光彩。

在莫高窟窟前园林中，还有一座小巧的亭阁式塔，木檐土身，单檐八角攒尖顶，上有覆钵相轮的塔刹。塔身正面有门，门额上墨书“慈氏之塔”。门内有方形小室，各壁及穹窿顶均有壁画。此塔小巧精致，比例适度，是难得的古建筑小品。这种亭阁

式的土心木檐的小塔，是我国遗存至今的惟一孤例。根据塔形和结构特点分析，此塔可能建于宋初，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此塔原在三危山中，为了便于保护，~~1955~~1956年迁建于莫高窟园内。迁移时，对塔刹及檐部作了复原处理。

另外，莫高窟周围和大泉河两岸有几十座佛塔和墓塔。现在塔身已经残破斑驳，但幢幢古塔屹立在沙丘之中，它们古老的身影为莫高窟悠久的艺术生命力更增添了庄重、古朴的风姿。

四 壁画中的古代建筑

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建筑物形象，其中有宫殿、阙、佛寺、塔、城垣、住宅，还有监狱、坟墓、高台、草庵、穹庐、帐帷以及桥梁、栈道等等，有许多还是以完整的组群形式出现的，可以明确地显示出建筑的群体构图。“礼失而求诸野”，在实物例证如此缺乏的情况下，敦煌壁画无疑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材料。

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形象，上起十六国，下迄唐宋，各个时代的都有，其中尤以唐代的最多，表现最充分。唐代敦煌地区的佛教净土宗比较流行，洞窟内普遍有《西方净土变》、《观无量寿经变》、《弥勒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等经变画。这些大幅经变画，比较集中地描绘了建筑群的组合和各种类型的单体建筑物形象，内容极其丰富。佛国天堂的景象就是人间宫室、寺院的影子。净土世界中殿阁、楼台、宝池、栏杆等形式多样、结构精巧的建筑，就是唐代建筑水平的反映。

（员）殿堂：殿堂是壁画中最的一种建筑形象，一般来说，殿与堂没有多大的区别，高大的堂就是殿。凡宫室、寺院、道观中的主要建筑都可以称为殿。殿下有台基，大都是砖砌素平台基。唐代中期发展为装饰华丽的须弥座台基，正中设台阶，也有设左右双台阶的；台基边沿有栏杆；台上殿堂面阔三开间或五开

间，也有七开间的；殿身上覆单檐庑殿顶，也有极少数作歇山顶。如第 105 窟（西魏）“五百强盗成佛”故事中的大殿为单檐歇山顶，殿身上部有一组类似现代结构的桁架，上下桁条之间有人字形的支撑，形成一组横向的承重结构，这是其特殊之处。又如第 196 窟（隋）的“兜率天宫”中有一座大殿，其两侧各有三层的楼阁。大殿面阔五间六柱，下部为砖砌的素平台基。两侧的楼阁画得极其概括，与汉画像石中常见的一殿两阁的平面格局相似。

对于宫殿的内部情况，壁画中表现的不多。这是因为敦煌壁画是宗教画，意在宣传佛教，若非必需，一般并不表现宫殿。另外，当时一般的画家恐怕也不能经常出入于宫殿朝堂之间，无法窥其究竟。只在《观无量寿经变》画中，画出了频沙王被阿闍世太子囚禁的未生怨故事，对宫殿的内部情景有部分表现。盛唐第 171 窟的未生怨图，把国王被囚、王后探视、太子肆虐和国王冥想、佛为现身说法等情节都画了出来，从中可以窥见宫殿内部的少许景象。

（圆）宅第：古敦煌民间对修建家宅十分重视，他们有一种牢固的风俗观，认为“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盛”。^⑬民间对住宅有诸多考究，要求避免“五虚”，符合“五实”，“宅小六畜多”。古敦煌对六畜早有规定，杂 105 卷说是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畜多与人丁兴旺有密切关系，六畜多即意味五谷多，养活的人口多，是家庭兴旺的象征。

在修建房屋时，要在梁上、内壁和院墙上，雕刻绘画，进行工艺美术的装饰。他们把中国民间吉祥的象征物——龙凤，带入外来的佛寺中。在堂阁上绘画，与在梁上雕龙描凤，出于同一种建筑风俗，这在莫高窟第 103 窟（北周）福田经变的“画堂阁”壁画中有反映。唐代壁画里的住宅以晚唐第 196 窟为代表，这是《法华经变》中的一座住宅。它为方形院落，以廊庑分为前后二

院，正面为二层楼阁式的大门。前院横长，后院方阔，其中心有一楼，似为主人住处。四周不仅有廊庑，同时也有住房。宅的左侧附建畜厩，也分为前后院，向外一面有大门，门内一小院，有一人躺卧在地上。后院畜厩内有马匹及奴仆。宅外有农夫耕作，表明这是一座地主宅院。

（猿 塔：塔是随佛教传入我国的一种建筑物，具有宗教纪念的性质。但它的造型，由现存成熟期的塔形来看，都是以中国固有的重楼为基本要素，上加印度覆钵式塔作为刹部融合而成的，并且完全中国化了。它往往和名山大川相结合，成为风景名胜的景观。莫高窟壁画中的塔有楼阁式、亭阁式、窣堵婆式、金刚宝座式等，造型多样，结构奇巧。

窟东顶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故事中，有埋藏萨埵那尸骨的舍利塔一座。塔下有简单素方基台，塔身正面有半圆券门，顶具受花、覆钵、相轮、宝珠。

窟南壁沙门守戒自杀品画面中，绘埋藏沙门遗骨的单层墓塔一座。此塔的基座，作直线组成的须弥座式，束腰部分较高。座正面设斜道，塔身平面方形，正面开半圆龕，上覆单檐庑殿顶，绘出瓦垅，出檐深远，从形体色彩上看，屋顶似为木构，其余则砖石建造。

窟西壁画“金刚宝座”式塔一组，由五座方塔组成，中央一塔比较高，下设两层成阶梯状的素平基台，上为基座，基座本身又以平座栏杆隔为二段，下段中央辟半圆门，由此可以进入塔内，上段正面绘四个力士。塔身两层，覆钵上为相轮基座。

（源 城和城楼：壁画中有宫城、州城、县城，其布局大同小异。城一般都作方形，按轴线对称布置，四周有夯土城墙，两面或四面有城门。门上有单层或重层的城楼，城转角处大多有角楼，是防御性和装饰性相结合的建筑。如北周第 窟中画须阇提故事中的王城，此城为方形，前后两侧有城门，门上有三间城

楼，后侧两转角处，有突出墙体的台。城内轴线上有国王的殿堂，面阔三间，下有台基，台基一周及台阶边沿设栏杆。殿堂后方有不甚对称的院落状房屋。此图中的城门、宫殿等建筑基本上沿轴线对称布局，反映了隋唐以前城市规划已注意到了对称、均齐的特点。

另外还有晚唐第 185 窟《维摩诘经变》中毗耶离城的城楼。其下层是突出城墙的城台。开三门，门首作梯形，周边有木构架支撑。正中一门可以看到半开的门扇，上有九行门钉。门洞上小下大，显得高耸狭窄。城台表面有菱形图案，可能表示一种装饰性的面砖，城楼面宽五间，深三间，门楼一周设平座栏杆。

上面仅仅介绍了壁画中主要的几种建筑形象，实际上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形象很多，内容极其丰富。除了以上介绍的外，还有楼阁、台榭、阙等等。并且还有一些建筑图，如初唐 170 窟《宝雨经变》中就有一幅施工图，此图画一座正在施工即将建成的房屋，房屋三开间，檐柱不施斗拱。双扇大门不在中间，而在右侧。中间有一工匠正在用抹子往墙上抹泥，另有一人在后协助。屋顶也有工匠在劳作。所有工匠都赤裸上身。这类施工场面在壁画中是很少见的。

总之，莫高窟的建筑延续千余年，表现了人间天国的建筑风俗及要求，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水平。壁画中所反映的古代建筑形式，虽然与古代建筑实物有一定距离，但它提供了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大量形象资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注释】

①参阅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载《文物》1982年第1期。

②参阅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2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

社 1982 年出版。

③李正宇《乐府史事纂诂》，载《敦煌研究》第 1 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④详见宁强《敦煌莫高窟各家编号述评》，载《敦煌学辑刊》1982 年 1 期。

⑤《新唐书》卷 192《吐蕃传》。

⑥《文心雕龙·夸饰篇》。

⑦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载《文物》1982 年 1 期。

⑧何昌林《敦煌琵琶谱的来龙去脉》，载《阳关》1983 年 1 期。

⑨潘怀素译，上海音乐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⑩参阅陈应时《解译敦煌曲谱的第一把钥匙——“琵琶二十谱字”介绍》，载《中国音乐》1982 年 1 期。

⑪何苍伶《研究敦煌乐谱的新进展》，载《音乐文摘》第 1 辑，1982 年 1 月出版。

⑫林友仁等《敦煌曲谱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载《人民音乐》1982 年 1 期。

⑬详见郑汝中《敦煌壁画分类乐器考略》，载《敦煌研究》1982 年 1 期。

⑭详见郑汝中《敦煌壁画乐伎》，载《敦煌研究》1982 年 1 期。

⑮详见费秉勋《敦煌壁画与古代舞蹈》，载《阳关》1983 年 1 期。

⑯详见柴剑虹《敦煌舞谱的整理与分析》，载《敦煌研究》1982 年 1 期，1983 年 1 期。

⑰高金荣《敦煌舞风格浅探》，载《阳关》1983 年 1 期。

⑱孕猿缘《宅经》。

【主要参考资料】

段文杰先生《敦煌壁画概述》、《形象的历史——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道教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的》，以上均见《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段文杰先生《敦煌艺术概观》、李永宁先生《敦煌壁画的世俗性》、谢

生保先生《敦煌壁画中的佛教故事画》，以上均见《文史知识》~~1985~~1986年愿期。

孙纪元先生《谈谈敦煌彩塑的制作》，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1985年出版；《略论敦煌彩塑及其制作》，载《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4~~1985年出版。

段文杰先生《敦煌彩塑艺术》，载《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

杜永卫先生《莫高窟彩塑艺术（敦煌艺术小丛书之十六）》，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1985年出版。

段文杰先生《飞天在人间》，载《文史知识》~~1985~~1986年愿期；《飞天——乾闥婆与紧那罗》，载《敦煌研究》~~1985~~1986年愿期。

谭树桐先生《敦煌飞天艺术初探》，载《~~1985~~1986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986年出版。

刘凌沧先生《敦煌飞天》，载《文物天地》~~1984~~1985年愿期。

孙儒侗先生《莫高窟壁画中的古建筑（敦煌艺术小丛书之十五）》，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1985年出版。

萧默先生《唐代建筑风貌——从敦煌壁画看到和想到的》，载《文艺研究》~~1984~~1985年源期。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的建筑》，载《考古》~~1984~~1985年愿期。

高国藩先生《古敦煌民间建筑风俗》，载《文史知识》~~1985~~1986年愿期。

第三章

扼腕愤谈伤心史

——敦煌遗书与文物被盗记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不幸的是，敦煌遗书发现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时代，许多遗书都被各国的“学者”、“考察团”劫去，部分为国内官僚地主及私人收藏，造成了我国学术文化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早在1904年，爱国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沉痛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①现将敦煌遗书之发现及各国“学者”、“考察团”的劫掠情况，分别叙述于后。

一、震惊世界的大发现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有些已失佚不传；有些还遗存于地下，或密藏于洞窟山岩。可能有一天，它们将被发现而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一部分。

在古代，曾有两次文物典籍的发现，即汉代的孔壁古文和晋

代的汲冢竹书，都与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我国的典籍文物，又有几次大的发现，即河南安阳殷墟甲骨、西陲汉晋简册、明清两代的内阁大库档案、敦煌千佛洞遗书。这些文物典籍的发现，尤其是敦煌遗书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并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学科——敦煌学。

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距今刚刚一百年。但由于现存记载相互矛盾，更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其发现时间及过程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据王道士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记载，藏经洞发现于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 1899 年。王道士墓志是民国二十年（1931 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圆箓去世百日而立。墓志嵌于莫高窟对岸王圆箓墓塔上，为木质阴刻，面南，高 1.5 厘米、宽 1.5 厘米。碑首中央篆刻“功垂百世”四字，其两旁各刻一龙。据墓志记载，王道士“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

《墓志》所说的太清宫，俗称下寺，与藏经洞所在的 161 号窟，近在咫尺，东西毗邻，原为王道士的法堂及居室。

立《墓志》者乃王道士的徒子徒孙，并且距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已有三十年之久。《墓志》中所述情节与实际又不完全相符，内有虚构、浮夸之词。所以此说虽有根据，但未必准确，学术界鲜有附会其说者。

另一说发现于光绪二十六年，是年为庚子年，即公元 1900 年，此说目前为学术界所公认。庚子发现说，最早见于叶昌炽

《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日记》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鐃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三年，比较可信。

发现说也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碑为木质阴刻，立于光绪三十二年（~~发现~~年）。碑嵌于三层楼下层洞窟、今编 ~~发现~~号窟甬道南壁。碑高 ~~发现~~厘米，宽 ~~发现~~厘米。据《功德碑记》记载：“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银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誓立。”

此碑所记“庚子孟夏”发现说，有可能源于王道士之口，因为王道士曾亲自参与三层楼修建之事，所以其说比较可信。

发现说，还见于王道士的《催募经款草册》（又名《王道士荐疏》）。此件为梅红纸墨书，现存敦煌研究院。《草册》是以王道士名义写出，上报催拨经款的。《草册》说：②

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箴，敬叩，伏祈叩恩

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

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覆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

《草册》对藏经洞的发现时间说得十分具体，即 1894 年 远月 10 日，与庚子孟夏之说吻合。而且还提到贝希和、司代诺（即伯希和、斯坦因）二人“请”去佛经万卷之事，故此件应写于 1894 年之后不久，应当说是可信的。

此外，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都说藏经洞发现于 1894 年，他们二人必亲闻之于王道士，所以与庚子发现说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即王圆箓做了道士，来到敦煌后，生活无着，投宿于莫高窟。此时的千佛洞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惟独王圆箓能诵道经，说中原语言，所以人们大都求他礼忏。其生活因此渐渐好了起来，于是就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在第 15 窟甬道中置一桌案，经常在此伏案写经。抄经休息时，常以茈茈草点旱烟吸之，也经常把燃余之草插在墙壁裂缝中。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杨某又在此伏案写经，这次他与往常一样，吸完烟后就把燃剩的茈茈草插在背后墙壁裂缝中。奇怪的是这次却草插而不可止，用手击之，发现内中是空的，因而甚感惊异。杨某把此事报告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合力破其壁，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入内为一复洞，由此发现了藏经洞。此说没有旁证，也近于传奇，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圆觉土地庙遗书发现记

敦煌遗书，主要是指 1900 年藏经洞发现的大批遗书而言。除此之外，还应包括 1900 年土地庙残塑中发现的少量遗书。

1900 年 7 月初，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建职工宿舍，准备拆除中寺后院中的土地庙，先将庙内土地、山神、牛王、马王、药王等五尊残塑像搬出，放置在土地庙外西墙根下。8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警长）窦占彪打破其中三尊残塑，发现残塑体内中心支柱上缠裹着一些经卷，当即由警长窦占彪和泥工秦司等将这些经卷持送到所长常书鸿同志的办公室。常书鸿同志让研究人员苏莹辉、刘荣曾共同检视包封。下午四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常书鸿、董希文、李浴、张琳英、陈芝秀、邵芳、苏莹辉、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等留所全体同志，在考古组启封检点，“并敦请中研院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夏作铭（鼐）、向觉明（达）、阎述祖（文儒）三先生莅场监视，以昭郑重”^③由苏莹辉、李浴、刘荣曾记录登记。

关于土地庙遗书的发现，最早最基本的记录是当时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之报告：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於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现藏经初步检验报告

本所因修建职员宿舍，於八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在后园土地祠（该庙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残塑中发现六朝残经多卷，当经鸿召集全体职员并邀请现正在千佛洞工作之西北考察团考古组向达、夏鼐、阎文儒三先生参加检验，详细记录。计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其中有题记年号者，计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罪过

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页三种。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页，均甚名贵，现经匆促编造初次查验目录。该项残页现妥存本所，此次发现，实为史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闻，本所成立于盗窃俱空之际，有此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之“敦煌学”又增加若干研究资料，亦中国文化之幸也。

常书鸿谨志于莫高窟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

参加检验本所职员：常书鸿 张琳英 刘荣曾 李 浴
陈延儒 苏莹辉 邵 芳 陈芝秀
董希文 辛普德

监验人：向 达 夏 鼐 阎文儒

纪 录：苏莹辉 李 浴 刘荣曾^④

另外，著名敦煌学家、当时作为监验人之向达先生，在同年就发表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⑤一文，对此也有简单记述：“……难为王道士当时除隐匿不少外，并将经卷任意置于新塑佛像府（腹）中。最近国立敦煌研究所于八月三十日所经（得）六朝残经，即王道士藏于佛像腹中者也。

研究所后园原有一土地庙，中杂置土地及龙王像。研究所近将土地庙改为工人住室，工人遂于弃置外间之新塑二残像中发现残经一大捆。此间塑像，显以二木杆缚成十字，于木杆上缠以芦苇或茭草，然后再敷以泥土，加以搏捏。今此发现残经之塑像，即以经卷替代芦苇，是以外敷之泥土破裂，经卷即赫然外露。研究所予以初步点查，计编六十八号，凡七十余段”。

愿月 猿日，窦占彪又持来经卷一包，说此乃研究所临时雇员泥瓦工马志华、秦志和将另两尊残塑打破，从土块夹缝中获得

的。

1950年愿月猿日和猿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五尊残塑中所获经卷，经过检查清点，计有佛家经、咒、疏等 苑件，编为 远个目录号。孝经 圆件一个编号，诗经、记帐单、北朝幢将花名册、抄经起讫记录等各一件，各占一个编号。此外，尚有写卷碎片 猿件，分做两包，各占一个编号，由苏莹辉整理编目。

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当时即引起了学术界重视。中央社为此发的《六朝藏经敦煌发现》^⑥的消息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八月三十日修建职员宿舍，于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六朝藏经杂文共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此种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学者之‘敦煌学’，更增加若干资料”。苏莹辉当即介绍了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始末，并很快发表了藏经目录。^⑦

土地庙发现的遗书，共 远卷，除苏莹辉所编目录之第 员号《诗经残卷》，1950年在首都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携至北京，一直为故宫博物院保存外，其余 远卷均藏敦煌研究院。1956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公布了施萍婷、刘忠贵整理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该目录包括土地庙遗书。为了与藏经洞遗书相区别，在每卷卷名末尾注一“土”字，混编于馆藏目录之中。

关于土地庙遗书的性质，即是否为藏经洞遗书的组成部分？由于 1950年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王道士私藏了一部分，1950年初，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曾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一些；1950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从王道士手中骗购去 远多卷。因此，当时一些学者即认为土地庙遗书是王道士藏匿的藏经洞出土文书。如前引向达先生文中即持此说。另外，当时西北考察团考古组成员、土地庙遗书监验人阎文儒先生也说：“1950年愿月猿日，我们在莫高窟住的时候，国立敦煌文物研究所（应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因建职工宿舍，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

像内，发现了六朝残经六十七卷，残片一包……这像是王道士所造的，在塑像时为修功德，他特将许多石室中的卷子，缠在像的中心柱内。在百劫之余，又出现于人世”。^⑧傅振伦先生在《敦煌千佛洞文物发现的经过》^⑨一文中也持同样的看法，即光绪元年“还在清末王道士所造的泥塑佛像身中，发现了六十九卷的写经”。从上引向达、阎文儒、傅振伦先生的论述可知，他们都认为出土经卷的土地庙残塑像，乃是王道士所造，由此便意味着土地庙遗书原为藏经洞旧物，是藏经洞遗书的组成部分。

最近，施萍婷先生研究指出，土地庙出土经卷与解放后在民间零星收购的藏经洞经卷散篇可以缀合，一些虽不能直接缀合，但经品、纸质、界栏、字等完全相同；日人青山庆示捐品中可与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藏零星收集品及土地庙出土品相缀合者有三件，因此可以断定：土地庙残卷原为藏经洞出土经卷。^⑩

但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庙经卷并非藏经洞遗书。光绪元年愿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为探明这一疑案，专门走访了土地庙遗书出土时的两位当事人——窦占彪和常书鸿。

窦占彪“告诉笔者，他听当年上寺主持喇嘛易昌恕和中寺主持杨和尚说，他们的师祖师父讲，土地庙的五尊塑像，原在今莫高窟画店西侧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庙里，此庙年久倾圮，清代修建中寺才把那五尊塑像搬到中寺后园，另建土地庙予以安置供养”。“常书鸿先生告诉笔者，他听易喇嘛说土地庙是道光十七年修建的”。

李正宇先生根据访问的有关情况总结：“参酌窦、常二位先生转述的口碑资料，我们大概知道，土地庙建于道光间，而土地庙中的五尊残塑，则是从别处搬来的，其塑造的时间又当在道光十七年之前很久”。并结合有关材料判断：“土地庙不是王道士所修，五尊残塑中所出经卷也不是王道士藏纳的。当然这宗遗书也不是藏经洞散出之物”。^⑪

对敦煌遗书研究有素的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也对土地庙遗书进行了详细探讨，他认为土地庙遗书皆属五世纪中叶，其内容多样而全为断片。如果王道士要挑选数十件残卷装入塑像的话，为什么他只挑选北魏中期的卷子，而且还都是零碎断片呢？因此，池田温先生“断定土地庙遗书之来源一定不由藏经洞遗书”。并根据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推测：“五世纪写经之类，除敦煌以外吐鲁番及龟兹地方均曾有发现。其内容及形式大概相似，并无明记钞写人地之跋文，弁别颇为困难。土地庙遗书之制作地，固然敦煌地方可能性大，但是未得明证以前，尚应考虑其他地域为妥”^⑫。

既然土地庙遗书并非藏经洞旧物，那么作为整个敦煌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藏经洞遗书相比，有何特点呢？

根据学者们对土地庙遗书的考察、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员）时代：土地庙遗书都是唐以前的早期写本，它上起北魏，下至隋代，绝大部分属北魏中叶。而藏经洞遗书则以唐五代写本为主，北魏的资料比较缺乏，因此从时代上看，土地庙遗书具有较大的价值。

（圆）内容：土地庙遗书中没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经典，意味着这批遗书收藏之日，道教、景教、摩尼教在敦煌尚未盛行，表明在北朝时期莫高窟还仅仅是一座佛教圣地。到了唐代，莫高窟不仅是佛教圣地，而且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各种学术文化荟萃之地。因此，土地庙遗书品种单调、范围有限，不像藏经洞遗书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另外，土地庙遗书全是汉文文书，没有一件西域文字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写卷。而藏经洞遗书除以汉文文书为主外，还有梵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等各种民族文字的写卷。

（猿）形式：藏经洞遗书除写卷外，还有印本、拓本，而土地

庙遗书无一印本、拓本，装帧形式单一，它表明在北魏时代，拓印、印刷和装帧尚不发达，至少表明新的装帧技术尚未传到敦煌。^⑬

猿援大胆的推测

除了藏经洞遗书和土地庙遗书外，敦煌是否还有其他的批量遗书发现？早在伯希和的敦煌笔记中，就已经对此作了初步探讨。在伯编 员愿号窟，即敦编 源源号窟中，伯希和有这样的记录：

该洞部分地被废物碎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了。我们于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在元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刊经厂。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⑭

从伯希和 员愿年的考察笔记可以看出，当时就已在敦编 源源窟中发现了部分文书。但由于伯希和笔记一直没有公布，因此，伯希和的这一记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 源源窟中出土的文书却已流散开来。

员愿年 员月，日本龙谷大学百济康义先生曾赴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回鹘文写本，对该馆所藏回鹘文写本进行了编目、定名等整理研究。此后百济先生又几次访学斯德哥尔摩，并对日本各家所藏回鹘文写本与瑞典藏本进行了对比，从中发现一些写本出自敦煌，但并非藏经洞（即第 员号窟）所出，因为它晚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

员愿年，百济先生又根据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 员愿

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源洞窟》）出土资料，得知一批写本（主要是回鹘文写本）确实出在《源洞窟》，而且其中一部分与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为同一写本。这批回鹘文写本有：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藏《源》件；日本藤井有邻馆藏西域古语资料《源》件；羽田亨氏藏西域古语摄影资料《源》件（下落不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均收藏若干件。由此推断，这批写本估计同出于敦煌蒙古期（元代）建造的窟中，书写年代在《源》—《源》世纪。由于伯希和在资料中明确说得自他编号的《源》窟，从而可知，这批资料出自敦编第《源》窟。

这批回鹘文经典既有写本，也有印刷本，时间在《源》—《源》世纪间。其书写者是蒙古人，而使用的语言却仍是沙州回鹘语。其中继速来蛮西宁王之后，其子阿速歹、速丹沙、养阿沙仍崇信佛教，书写印刷佛典。速来蛮西宁王之后坐镇沙州的后继人史无明载，从这批资料可知为速丹沙，从而证明西宁王之王统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

《源》窟为元代重修，其东壁门南、北有回鹘文题记。该窟的封闭时间，从回鹘文文献年代看，最早应是明代初年。这批写本的发现和开始流失应在《源》年间斯坦因到敦煌时，伯希和也劫走了《源》窟的一些回鹘文文献。其后，瑞典人似亦涉足敦煌，窃走一部分回鹘文写本，至于日本各家所藏，除天理图书馆的藏品乃张大千先生赠送外，其他情况都不清楚。^⑮

二、千古之谜谁解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

敦煌藏经洞，即莫高窟第《源》窟。由于在该窟发现了约五万卷遗书而得名，并震动世界，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然而藏经洞的情况如何？其封闭于何时？原因何

在？近百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员援藏经洞原为洪誓（音辩）影窟

洪誓其人，正史中少有记载。根据 孕源~~源~~《吴僧统碑》、孕~~源~~《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和敦煌研究院藏《唐敕河西都僧统洪誓告身碑》及其他有关资料，可略知其生平。

洪誓，俗姓吴，即吴和尚、吴僧统。祖籍不详，但并非敦煌旧族。其父吴绪芝，曾任建康军使，后戍军甘、肃两州之间。吐蕃占领凉州后，河西节度使杨休明移镇沙州，并于唐代宗大历元年（~~苑~~元）发建康军戍镇沙州。吴绪芝及其子也随军移驻敦煌。

唐德宗建中二年（~~苑~~元），吐蕃攻占沙州，吴绪芝隐居不出，“糜践公门”、“曲肱处于仁里”，拒不出任吐蕃官职。誓之长兄滔，早逝。次兄季连，曾任“试太子家令”，后辞官归里，笃信佛教。

洪誓“童子出家”，以“约法化人，盛于佛事”。由于其悉心研读汉经梵典，兼习番文藏语，成为出色的译经僧，故被吐蕃赞普委任为“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十数年，后又“迁知释门教授”，主持译场寺院中贵族子弟学校的文化教育及其他宗教事务工作。

洪誓虽“栖心释氏”，但终不负父辈之重望，积极参加敦煌人民的抗蕃斗争。张议潮大中起事后，誓即遣弟子悟真随议潮所派入朝使同赴长安。唐宣宗赞其“惟孝与忠，斯谓兼美”，于大中五年（~~愿~~大中）敕授洪誓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及“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赐紫衣及各色信物，并亲示诏书，勉辞委婉、问慰“夏热”，恩宠殊异。^{①⑥}

唐懿宗咸通三年（~~愿~~咸通），洪誓“掷钵腾飞”，逝于沙州。

洪誓去世后，其下属僧徒或吴姓本家，改寺庙“廩室”（存放粮食的地方）为影堂（洪誓的纪念室）。这个影堂就是敦煌研究院今编第 151 窟，即藏经洞。

藏经洞是凿于第 151 窟甬道北壁上的一个小窟。它面积不大，窟内地面近于方形，地面四边的长度是：东壁 2.84 米，北壁 2.84 米，西壁 2.84 米，南壁 2.84 米。由于四壁向窟内略倾，故四壁顶部的长度较地面处为短：东壁 2.84 米，北壁 2.84 米，西壁 2.84 米，南壁 2.84 米。各壁的高度也略有参差。窟内除去低坛占去的空间不计外，它可利用的空间只有 1.5 立方米略多一点。

藏经洞原为洪誓的纪念室，自然有一番布置。首先是塑了一尊洪誓的真容，然后在北壁中部画有两棵枝叶交接的菩提树。东侧树枝上悬挂一个净水瓶，西侧树枝上挂着一个挎带。树东侧画比丘尼一身，着袈裟，双手捧持绘有对凤图案的团扇一柄。树西侧画执杖的侍女。壁画中的物品和人物，与僧人生活和供奉僧人有关。

西壁壁龛内，嵌有石碑一通，即洪誓告身敕牒碑。1900 年发现藏经洞时，此碑即在窟内，斯坦因、伯希和劫经时碑尚立于该窟。后被王道士移至第 151 窟甬道南壁，1909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复将此碑移入藏经洞，嵌于壁龛原处。碑高 1.5 米，宽 40 厘米。碑文三段，从上而下是：洪誓告身、敕牒诏书、敕赐衣物录本。

藏经洞塑洪誓像，画有关他的生活场面壁面，刻告身碑等，其用意是为了“标范奉祀”。碑文前特别注明：“当家告身依本镌石”和“诏书本”，就在于显示唐王朝对洪誓的器重和褒奖，“庶使万岁千秋不朽不坏”，以作永久性纪念。^{①⑦}

圆寂藏经洞封闭之谜

洪誓的影窟为什么变成了藏经洞？它是何时封闭的，其原因

何在？由于没有发现可信的文字记载，它的封闭时间及原因，就成了一桩历史公案。中外学者根据各种旁证材料，提出了许多假说，试图解开这一千古之谜。现将争论情况介绍如下：

（一）避难说

（员）宋初避西夏之乱说

最早论及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者，是法国人伯希和。他在《敦煌石室访书记》^⑮中说：藏经洞中的“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忽远~~—~~忽远~~年）及至道（~~忽远~~—~~忽远~~年），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 ~~忽远~~年西夏侵占西陲是也。洞中藏弃，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缣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此后，我国学者罗振玉、姜亮夫等皆持此说。

~~忽远~~年，阎文儒先生发表了《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⑯一文，更全面地阐述了这一论点。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应注意到统治敦煌的民族和洞内的藏经。敦煌曾受到非汉族的统治多年，在洞内仍然保存着吐蕃人应用的藏文经，但另一少数民族西夏同样也统治了这一地区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民族是有自己文字的，而且也信奉佛教，但洞中却看不到西夏文字的经卷。这是因为 ~~忽远~~年西夏占领瓜、沙时，藏经洞已被封闭了。

公元 ~~忽远~~年，即宋仁宗景祐二年，亦即西夏入侵敦煌时，当地的人们不可能知道这个民族也信仰佛教，仓促之间，将各寺的写经，都集中起来，收藏在洪晋的影堂内，并且将窟门封闭，重绘了 ~~忽远~~号窟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西夏洞窟的调查与排年，~~忽远~~号窟应该属于西夏早期的创作。因此，人们只能认为藏经洞是为避乱而封闭的。同时，按人情事理来推论，这种封闭一

定是由于一个大的政治变乱而引起，而这个变乱，根据敦煌历史，最大的应是西夏占据瓜、沙、肃诸州，故藏经洞也封闭于此时，即 **景德** 年。

毕素娟先生《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敦煌遗书 **孕圆缘** 研究》^② 一文，对此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据她研究，抄有辽僧诠明著《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卷第二》的 **孕圆缘** 号文书，虽无纪年，但其传入敦煌的时间为辽和二十四年至开泰九年（**景德**—**景德** 年），它晚于白滨所说的 **景德** 年，是敦煌遗书下限的内证，说明曹宗寿，特别是曹贤顺时藏经洞尚未封闭。

毕素娟说：“关于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我认为在曹贤顺表示降夏后到西夏正式占领敦煌之间（**景德**—**景德** 年）。”当时西夏日益强大，攻下甘州，大有侵吞全部河西走廊之势，敦煌虽在千里之遥，可其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西夏匹敌。敦煌王曹贤顺出于某种考虑，率千骑去向李德明请降归顺，李德明“纳之”。李德明接受请降，并未派兵去占领，第二年就死了。李元昊即位后先忙父丧，继又挥戈东进，无暇顾及瓜沙一带。这个时候，敦煌还是曹氏天下，但既然已向西夏请降，大势已去，迟早是要被占领的。当然会利用这段空隙时间作好应变准备，组织僧众亲信把文书经卷放入洪誓影窟，封堵洞口抹墙泥，再绘甬道南北壁全部壁画，天衣无缝不留痕迹，可见是经过精心策划、着意安排的，时间也是充裕的。所以只能是天圣八年（**景德** 年）请降到 **景德** 年西夏占领前由曹氏家族封闭的，壁画当然也是曹氏晚期所绘。

（圆）宋绍圣说

景德 年，殷晴先生在《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③ 一文中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东传有关。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大肆毁坏佛教艺术。宋绍圣（**景德**—**景德** 年）中，“他们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许”。他推测“这一消息

在佛教徒中所引起的恐慌，因而采取了封闭藏经洞的保护措施”。谭真先生在《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②一文中说：“敦煌遗书孕猿藏《呼吸静功妙诀》后，有养生神仙粥食方，其中山药一名，于探讨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颇有益。”并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

山药，原名薯蓣。宋人顾文荐撰《负暄杂录》云：“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故宋英宗之后医药方书改薯蓣为山药。”既然有山药名称的遗卷在藏经洞出土，那么藏经洞封闭很可能在宋英宗登基（~~公元~~ 1048年）以后。并认为藏经洞“封闭上限 ~~公元~~ 1048年，下限 ~~公元~~ 1054年，~~公元~~ 1056—~~公元~~ 1060年间可能性较大。”关于洞窟封闭之原因，谭真也认为“与伊斯兰教东传而躲避异教焚掠有关。”

（猿 避黑韩王朝说

荣新江先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③一文，通过对国内外所藏敦煌文书、绢画的考察，认为“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 ~~公元~~ 1048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

众所周知，俄藏 ~~敦煌~~ 记有“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汜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咸平五年（~~公元~~ 1054年）的这篇施入记是目前所知最晚的一件藏经洞出土文书，此前的纪年写本大体上持续不断，而此后有年代的写本迄今尚未发现（某些被认为是藏经洞出土的晚于 ~~公元~~ 1054年的材料，大多可以指出它们的其他来源或误解之处）。从现存写本年代的累计，可知藏经洞的封闭应在 ~~公元~~ 1054年以后不久，不应晚到伯希和提出的 ~~公元~~ 1060年西夏的到来。

从 ~~公元~~ 1048年往后，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首先就是 ~~公元~~ 1048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因为于阗与沙州的姻亲关系，~~公元~~ 1048年于阗国王曾致函其舅归义军节度使曹

元忠，请求发兵援助抵抗黑韩王朝。当于阗陷没后，大批于阗人东逃沙州。于阗僧人所带来的伊斯兰教东进的消息，要比信佛的西夏人到来的消息可怕得多，因为黑韩王朝是经过近 140 年的血战才攻下于阗的，他们对于阗佛教毁灭性的打击，应当是促使三界寺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神圣的物品封存洞中的直接原因。而由于黑韩王朝并未马上东进，所以，封存活动是主动而有秩序地进行的，并且在封好的门前用壁画做必要的掩饰，以致当事者离开人世后被人们长期遗忘。

（源 宋皇祐之后（~~元祐~~ 年）说

持此说者为陈垣先生，他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

~~元祐~~ 年，马世长先生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中也持此说，并对伯希和的西夏侵扰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种种迹象和材料表明，“藏经洞的封闭不在西夏占据敦煌之前，而是在西夏占据敦煌之后的某个时期。其相对的大致年代，陈垣先生推断在皇祐之后的意见，可能较为切近实际，而封藏遗书的原因，则一时还难于肯定。估计或许与西夏对瓜、沙等州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曹氏家族彻底失去对此地的统治有关”。

（缘 曹氏封闭说

白滨先生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②④}一文中力主此说。认为从现有情况可知，敦煌遗书纪年最晚者是宋咸平五年（~~元祐~~ 年），这只能说明到咸平年或稍后的年代藏经洞已被封闭了。“所以我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当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是比较合理的”。

白文还说，许多论者都认为 ~~元祐~~ 号窟北壁壁画是西夏早期的作品，其实，曹家晚期洞窟与西夏早期洞窟壁画，如无供养人题

记与可靠记载是很难区分的。那么，第 5 窟北壁重绘壁画有什么可靠证据可以确认为西夏早期壁画而不是曹家晚期重绘呢？“我认为第 5 窟重绘壁画应定为曹家晚期，即在西夏占领瓜沙之前，上限为咸平之后，曹宗寿或其子曹贤顺初期所为。”

贺世哲先生在《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②一文中，从另一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据刘玉权的分期，缘个西夏洞窟中，包括 5 窟和 5 窟。可知 5 窟现存表层壁画与第 5 窟甬道表层壁画大致上属于同一历史时期重绘的。据伯希和 1908 年记录，第 5 窟主室东壁南侧表层壁画中有供养人题名：“故叔敕谒（竭）诚□（奉）化功臣河西一十（下缺）。”在瓜沙曹氏中有“竭诚奉化功臣”头衔者，只有曹延禄与曹宗寿两人。而第 5 窟的“竭诚奉化功臣”是曹延禄。它是曹宗寿当权时期（1041—1048 年）重绘并题名的，所以称“故叔”。那么第 5 窟甬道表层壁画重绘时间大体上也应在此时期或稍后。因此，“被这层壁画覆盖着的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亦应在此稍前或同时。”

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贺世哲认为是东边甘州回鹘政权与西边于阗李氏政权相继被消灭或即将灭亡，等于切断了瓜沙曹氏政权的左右臂，构成了东西夹击的威胁（主要是东边西夏的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瓜沙曹氏政权对于可能即将临头的战争危机，不得不有所准备，其中也包括密藏佛教典籍、画卷。在密藏佛教典籍、画卷时，顺便把官府与寺院的一些社会文书收藏进去，也是合乎情理的。

（远）元初说

关百益在《敦煌石室考略》^③一文中说：“石室地址，为元朝以前之大佛寺，经历年之搜集，宝藏甚富。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其军师道士丘处机，最为信任，与佛教为仇，道经敦煌之先，到处毁坏佛寺，迫僧徒蓄发，改易道装，寺中沙弥，早有所闻，预将所有贵重古物，作石室以封固之，免遭浩劫。及元太祖

师次敦煌，即逐僧毁寺，改为道观，直至前清末之能改。至伯希和等闻石室之名，前往发掘时，仍须商得观中道士同意也。”此说既没有联系藏经洞中之遗物，又没有从藏经洞封堵之实况出发，纯为臆断，故鲜有附和其说者。

（苑 元明之际说

张维在《陇右金石录》中，论及《重修皇庆寺记》时提出此说。《重修皇庆寺记》石碑立于元至正八年（~~元统~~1350年），为僧守朗立石，奢蓝令旃刻。张氏认为“元末兵乱，瓜沙沦没……石室闭扃，其时盖即在元明之间，或即为守朗、奢蓝合楠及其徒众所为。”此说与事实相去甚远，无人赞同附会。

（二）废弃说

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斯坦因根据他在洞中所藏一些包裹皮中发现的一批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以及包皮、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藏经洞就是堆放它们的处所。这一看法，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废弃说”。斯坦因还根据其所见写本和绢画题记最晚者为十世纪末的情况，推测洞窟的封闭是在十一世纪初叶。“废弃说”的代表人物是方广钊先生，他在《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⑦一文中，认为“避难说”实难自圆其说。这是因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之废卷与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元祐~~1101—1103年），敦煌已向内地乞求配齐了藏经，也曾从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系避难，它们理应珍藏其中。为何整部大藏未被收藏，所藏的反而是残部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避难，而是在于“这一批文书对当时的敦煌僧众来说已完全失去了实用价值，故而废弃”。提出“废弃说”的理由是：

第一，中国人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在古代，纸张比较珍贵，对地处西陲的敦煌来说更是如此。据敦煌遗书中的抄经记录记载，当抄经时，每人所领纸张均要记帐，如果抄错，必须凭废纸换好纸。废纸并不抛弃，而是留待他用。

第二，佛经经过长期使用之后，难免会破损，但对这种不堪再使用下去的经典是不允许抛弃的，而是另行收藏。

第三，从现存遗书可以知道，敦煌寺庙经常清点寺内的佛典及各类藏书，查看有无借出而没有归还的，或有无残破而不堪使用的。

第四，宋代，四川的刻本经典传到敦煌，朝廷又颁赐了金银字藏，敦煌的经典大为丰富。大概在曹宗寿当政时期，敦煌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大规模的寺藏图书清点活动，将清理出来的一大批无用的另部残卷和各种无用的文书与废纸，挑选了一个不太重要的洞窟，统统封存进去，然后在外面重新画上壁画。由于是一堆无用的东西，自然不会有人把它们放在心上，年深日久，也就被遗忘了。

在《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②一文中，方广锬更全面地论证了“废弃说”。认为到了五代时，由于内地战乱，敦煌又偏处一隅，经典的来源是很困难的。进入北宋后，随着对外交通的发展及敦煌地区自身经济的发展，纸张紧张的状况想必已大大缓解。经典来源的充裕产生了淘汰残旧经卷的需要，纸张状况的缓解又使人们不再想到其背面可资利用的价值。于是，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在曹氏政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清点后，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与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起来，封存到第 465 窟中。由于它们被认为是一堆废物，年深日久，就逐渐被人们遗忘。至于洞外抹的墙泥、绘的壁画，也许与这一封存活动直接有关，也许与这封存活动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其后

若干年的另一次宗教活动的结果。”

关于洞窟封闭的时间，方广钊先生在《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兼论“敦煌文献”与“藏经洞文献”之界定》^④一文中，仍然从废弃说的前提出发，指出“就现有材料而言，把藏经洞的封闭年代暂且定在曹宗寿统治时期（~~公元1004—1008~~）是适宜的。”因为既然是废弃，所藏的自然都是一些已经无用的东西。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用或还起作用的东西，当然不会抛弃。所以，藏经洞封闭之前的诸如契约文书、新抄的经典等，都不会放入。这样，藏经洞封闭之前，即 ~~公元1004~~ 年后的文献出现的几率就非常小了。此外，藏经洞外的壁画，我们还不能排除画于曹氏归义军后期的可能。即使画于西夏早期，由于藏经洞因废弃而封闭，因此，藏东西与画壁画完全可以是不同时期的两件事情。既然如此，壁画画于西夏时期与藏经洞于曹宗寿时期封闭也并不矛盾。

对于“废弃说”，施萍婷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她在《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⑤一文中说：“有的学者认为，藏经洞内存放的那么多的古写本是‘废纸’，本人不敢苟同”。并以道真在三界寺的写经生涯为据，探讨了 ~~公元1004—1008~~ 年间敦煌的写经活动，进而指出：“藏经洞有年代题记的古写本，学术界目前公论的最晚为 ~~公元1004~~ 年，因而笔者认为，~~公元10~~ 世纪末孜孜以求的佛经，~~公元10~~ 世纪初叶绝对不会那么快就成为‘废纸’。”

关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施萍婷先生非常谨慎，只根据掌握的有关材料，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猜想：公元 ~~公元1004~~ 年，道真可能 ~~公元1004~~ 岁，如果他当时健在，那么在这一时期，如果发生什么威胁佛经存在的危急情况，道真以其身份、地位主持将佛经封存，是完全可能而合乎情理之举。”

（三）书库改造说

在 ~~公元1908~~ 年巴黎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藤枝晃提

出了“书库改造说”。他在《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①一文中认为，大约在公元 1000 年左右，折叶式的刊本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此，必须改变藏书室的位置，故将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一直分散的杂物一并封入石窟。

何昌林先生在《敦煌“藏经洞”之谜》^②一文中同意此说。认为改造书库，就需把废弃的卷轴式佛经“藏”起来，以便腾出地方来存放折叶式佛经。莫高窟每年有多次庙会和佛教节日，四面八方的来客很多，人多手杂。为了防止入藏的卷轴式佛经被人拿走，每次庙会或节日都得派出一人看守“藏经洞”，而庙里的人手又少。入藏者毕竟是古物，对于后世僧侣们来说，许多东西都是很神圣的，少了哪一件也不行，因此，就干脆砌上墙，封起来了。

以上对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的研究情况作了简单介绍。从以上所述可知，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这一千古之谜究竟由谁来解？我们期待着、盼望着早日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三、斯坦因敦煌劫宝藏

1894 年 6 月 15 日，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里。洗礼后起名叫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当时，犹太人是受迫害的民族，依照当时的法律，犹太人被限制居住在“盖特欧”（源于威尼斯的犹太人居住区，该区四周围着高墙，其居民日落以后和星期天都被锁在里面，严禁外出）之内，不能上学，更不能上大学和从事各种专业工作，并且毫无法律地位。为了不因宗教问题而受打击，许多人都采用接受新教

(基督教)洗礼这种方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著名人物就是海涅和亚伯拉罕·门德尔松。海涅于1813年某个早上接受洗礼，当天下午就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斯坦因开始上学时，马扎尔语已成为匈牙利的官方语言。如果说讲德语是他今后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同时也是他与家人往来通信的语言，那么，对于斯坦因来说，马扎尔语还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象征，也是他入学以前那欢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的写照。那时他是全家的中心，年迈的父母，比他大12岁、时刻照顾着他的哥哥厄恩斯特，还有博学并有声望的伊格内斯舅舅，全都宠爱着他。因此，在斯坦因幼小的心灵中，他有三个父亲——亲生父亲、舅舅、哥哥。

员爱斯坦因及其第一次考察

1814岁那一年，斯坦因被送到遥远的德累斯顿，进入有名的克罗施勒学校。由于远离亲人，与家里的联系就只有靠信件了。这倒培养了一个好习惯——写信。斯坦因在以后的考察活动中，写下了许许多多信件，详细描述了其考察所得所遇及见闻，为我们今天研究其考察活动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宝贵文献。

还在克罗施勒上学时，斯坦因终生的宏伟蓝图就已形成了。年轻时，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成为他崇拜的偶像，激励他潜心致力于希腊罗马历史，后来又精通了印度、波斯古代语言和历史。他曾多次沿马其顿人东征的道路探险，试图考证重大战役发生的确切地址。

当斯坦因成为研究生后，又有两个人对他的宏伟蓝图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是七世纪的中国僧人玄奘，其巨著《大唐西域记》，由于资料丰富，记述精确，对于认识古代印度地理的指导价值为世人所公认，以致于斯坦因将他称为自己的佛教保塞尼奥斯(弗雷泽爵士在保塞尼奥斯译本的导言中称：“没有此人，希

腊的遗迹将是一座没有线索的迷宫，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斯坦因第一次在中国探险期间，佛教的保塞尼奥斯——玄奘，简直就成了他的守护神。

另一位是十三世纪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对世界认识东方，尤其是中国，有很大参考价值。亚历山大、玄奘、马可·波罗三人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其各边联结了古代与中世纪，东方与西方，国际商道与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佛教。斯坦因的作用就是领会他们的内在联系，通过自己毕生的工作，通过多次考古探索去印证、考释文献记述和实物，进而为将来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斯坦因为什么要从匈牙利、英国到印度去探险呢？其直接的因素有二，一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中欧学者对语言学的重视。现代人们所说的比较语言学，诞生于 1858 年印度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已为该学科打下了基础的威廉·琼斯断言：“无论梵语有多么古老，其谨严的语言结构仍比希腊语完整，比拉丁语丰富，比它们两者都优雅，并与两者有密切联系。”^③从此以后，梵语和波斯语就成为打开印欧史前历史的一把钥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与关注。

另一个促使斯坦因前往印度的因素便是匈牙利人乔玛的经历和工作。匈牙利人的摇篮据说是在中亚，人们深信他们与匈奴人有关。正是怀着一种渴望找到原始的中亚大匈牙利的梦想，1845 年，当乔玛 14 岁时，开始了他的旅行。他经土耳其、埃及和波斯行抵布哈拉，随之又经喀布尔和拉合尔到克什米尔，并发现了长期不为欧洲人所知的藏文献。乔玛传奇般的经历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最终刺激起国民对于东方学研究的兴趣。他传奇式的旅行，最后死于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下，激动了不止一个匈牙利人的想像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前往东方。后来，当斯坦因前往中亚的路途中，他不仅从爱国者的角度，而且

还以一位教授的身份声明了自己与乔玛的关系。他们两人都为了理想而离开故乡，而且心甘情愿地接受孤独。只不过斯坦因比乔玛更幸运罢了。

斯坦因在克罗施勒小学毕业后，便返回家乡进入语言学校，为上大学做准备，并开始了东方学的研究。他曾翻遍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中有关印度、波斯和中亚的藏书，特别是熟读了地理学家洛克齐的东亚探险报告，其中谈到敦煌莫高窟。中学毕业后，依照中欧学生们的习惯，他去不同大学听东方学家们的讲演，从中挑选将来从师的教授。

有两个人曾指导过斯坦因的学业，一个是蒂宾根大学印欧语言学和宗教史教授鲁道夫·冯·罗特，另一个是维也纳大学印度语言学和古代史教授、印度古文字学方面的权威乔治·比勒。他们不仅传授给斯坦因深奥的学识和当代最先进的知识，启发他在相互关联的学问里发现问题，而且还帮助他确定了研究方向。^[1]1908年，斯坦因在蒂宾根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08年斯坦因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鲁道夫·冯·罗特的赞赏，斯坦因从匈牙利政府获得了在伦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事二年（^[2]1909—1910年）有关东方语言和考古的博士后研究津贴，并立即前往英国。

1909年，由于强制性的军事训练，斯坦因返回布达佩斯，中断了在伦敦的学习。在匈牙利，斯坦因被安排在卢德维卡学院、匈牙利军事测绘学院参加军训一年。他的导师卡罗里·库斯上校是一位杰出的地形测量专家，教给他们当时进行军事测量的最先进方法。斯坦因在军训中学到的地形测绘技术在以后的中亚探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年的军训结束后，斯坦因立即返回英国，继续从事其研究工作。由于斯坦因的学业已近结束，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罗林森向印度理事会提出，这位年轻的匈牙利人有资格充当旁遮普

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负责人。由于另一东方学家亨利·玉尔的认可，这个建议很快生效并付诸实行，随之，斯坦因便踏上了去印度的路程。

斯坦因在旁遮普大学就任注册员和东方学院负责人共 15 年。在这 15 年间，他逐渐放弃了当教授的目标，而是要像亨利和罗林森那样创造自己的知识王国。

1891 年可以看作是斯坦因对未来生涯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在这以前，他一直在努力争取立足之地，即想在欧洲得到一教授职位。而从现在开始，他要致力于地理学，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亚内陆，曾在犍陀罗地区建立王朝的贵霜·塞人等部落的故乡，以及中国取经的僧人们前往印度的高原道路。随后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新疆地区，到了 1894 年，他已在考虑前往中国新疆进行“考古探索”。

正在这时，古文字学家 粤云鲁道夫·霍恩宁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了他数年来致力于抄本残片研究的情况，这些文书据说都发现于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阗附近，其文字是印度婆罗谜文，但语言却是人们还不知道的一种非印度语言。这些文书几乎都是由当地的觅宝人发现的。他们不能提供有关文书的任何信息，有些文书甚至被分割后流入不同国家的收藏机构。

这些古文字文书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学者的极大兴趣，但许多人对其真伪却无法确定，因此对发现地区，即中国新疆和阗及其附近的考察，就成为确定其真伪的最可靠方法了。这些争论，更坚定了斯坦因前往中国新疆考察的决心。

经过斯坦因的积极奔走和不断努力，在英国和印度政府尤其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大力支持下，斯坦因的计划得到了批准。至此，斯坦因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开始了第一次中亚探险。

斯坦因第一次考察始于 1900 年 5 月，其目的之一，便是探明用未知文字书写的“古书”的真相，因此在到达和阗的前一站——皮山，就开始了古文物的调查。自 1902 年以来，这些奇异的“古书”就已开始在西方收藏，而来源则主要是和阗的“寻宝人”伊斯兰阿洪。伊斯兰阿洪说他的“古书”大多是在皮山、和阗之间沙漠中的古代遗址中发现的，其中有个喀拉库尔麻扎即黑湖墓葬群。斯坦因在这里进行了初步考察，但一无所获，接着就进入了和阗。在和阗，斯坦因还是想澄清那些可疑文字的真相。他虽然没有亲自找到“古书”，但在和阗，寻宝已是当地的时尚，尤其是穷人们，更将其作为发财致富的一条途径。有一天，一个俄国亚美尼亚人带来一本古书：残剩的 15 页桦树皮纸，写着不认识的文字。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中，斯坦因写道：“我一眼就看出桦树皮树页未经我在克什米尔所见古代桦树皮文书全都做过的那种处理，伪造者也没想制造在桦树皮上写字需要的那种特殊墨水。因此当我做‘水洗试验’时，只要一个湿指头就可以抹去那些奇异的‘未识文字’。”这个伪造的古书与加尔各答霍恩宁藏品中的一些木板印刷品极其相似。随后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斯坦因得知，将抄本卖给亚美尼亚人的“卖主”与伊斯兰阿洪有关，这更加深了斯坦因对古书的怀疑。

在和阗，斯坦因还仔细研究了巴得奥迪汗派遣寻宝人找回的资料，并见到了富有经验的寻宝人吐尔地。吐尔地曾带回一些上面写有印度婆罗谜文字的壁画，还有佛像浮雕的残片以及一些用中亚婆罗谜草体写成的纸文书残片。正是吐尔地带回的样品，曾引起了斯文赫定对塔克拉玛干古代城市的考察。为了确定斯文·赫定当年所“发现”的遗址是否即为丹丹乌里克，斯坦因便于 1901 年 7 月 20 日向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进发了。

在尼雅，斯坦因偶然见到了二块佉卢文木牍。这使他非常惊奇，因为当时佉卢文虽已在中亚发现，但只是在早期的于阗钱币

上，惟一的一份桦树皮抄本为法国旅行家杜特依兰于 1884 年所获。所以斯坦因就急忙前往发现木牍的地方，并对其进行了清理，结果发现了一百多枚木牍。从其用途和外表特征估计，似乎是一些信件，但其数量则与此之前印度国内外保存的所有用于研究的佉卢文资料的总数相等。随后又在另一建筑物中发现了 200 枚木牍，其内容大都是备忘录、帐簿及便笺之类。

在和阗期间，斯坦因还查清了过去那些“古书”的真伪。在斯坦因掌握的为数众多的佉卢文、印度文、于阗文（中亚婆罗谜文）、藏文和汉文抄本中，没有一种是“未知文字”，更进一步讲，就是在皮山之类地方根本没有见到据说曾出土过那种文书。1894—1895 年间以印度政府名义购买的许多抄本可能都与和阗寻宝人伊斯兰阿洪有关。

伊斯兰阿洪在当地也算是一位有知识有心计的人，作为一个小商人，专门从和阗乡村收集古钱币、印章等古物。在与阿富汗商人交易时他得知，印度人十分珍视抄本，即便是从丹丹乌里克发现的小纸片也很贵重。商人的冒险性和获利性使他对此十分感兴趣，但又不愿从事艰辛的寻宝生活，便开始了“制作”抄本的冒险活动。刚开始时，他还企图仿制真正的抄本，但很快就意识到，无论真假，反正那些欧洲的主顾们都看不懂，因此并不值得辛辛苦苦地仿制。当他卖出所有的仿制品时，又建立了一所作坊专门从事“未知文字”的制作，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但在当时世界的寻宝热中，这种随意书写的速度还是显得太慢、太累赘，因此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木板”上，即用“木板”印刷。其工序是首先将纸染一下，使它看起来很脏。印刷之后，将纸放到壁炉中用烟熏，使人有一种很古的感觉。然后胡乱模仿欧洲书籍的装订法将其装订。最后他们就在抄本上洒些沙子，以证明埋藏了很长时间。

斯坦因回到伦敦后，专门拜访了霍恩宁。斯坦因与霍恩宁都

是学者，在探求古物和追求学术真理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斯坦因向霍恩宁说明伊斯兰阿洪伪造文书一事，霍恩宁非常失望，但他对斯坦因带来的写本十分感兴趣。作为一名有声望的印度学家，霍恩宁因解读伪造的文书而浪费了大量时间，为此他心中很懊恼。但当斯坦因给他带来大量用未知文字写成的真文书时，他的心理才得到平衡，并重新开始解读，给久已失传的古于阗语以生命，他最终断定，这是用印度字母书写的一种古伊朗语。

斯坦因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于 1906 年 7 月在伦敦结束。他“很满意地把从沙漠中出土的古代文物，临时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这个安全的休憩之地。不论这些文物还是我的 100 余块拍摄好的玻璃底片，在长途跋涉中毫无损坏”。“由于我胜利带回的大量古文物急需整理和编写目录，原来印度政府委派在英国从事这项工作的 1 个星期远远不够，于是负责印度事务的国务秘书又给我延长了 1 个星期，我对此深表谢意。……才能按期顺利地完成了对这次搜集到的古文物的整理工作，并为撰写‘初步报告’作好了准备”。^③随后，斯坦因写了三本书来叙述他的第一次探险：一是《中国新疆考古：地理探险旅行初步报告》，是 1906 年回到伦敦后不久写成的；二是两年后出版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个人笔记》；三是 1907 年问世的两卷本巨著《古代和阗》。三本书虽然记述的是同一次探险，但侧重点不同。第一部是探险的简报。第二部“个人旅行笔记”则由日记、现场记录、给家人朋友的信函组成，其中讲述了全部情节：计划和日程、障碍、得到的教训、挫折和成功、当天的冒险和荒漠的艰难等，相当于给骨架（简报）添上血肉。《古代和阗》是一部学术著作，详细记述了遗址发掘的情况，并附有大量文物图片。另外，《古代和阗》还有 1 个附录：（1）《丹丹乌里克、尼雅、安得悦遗址所出汉文文书》；（2）《安得悦所出藏文手稿及陶器》；（3）《丹丹乌里克所出犹太

—波斯文书》；(源)《出土、收买钱币目录》；(缘)《和阗藏文资料选辑》；(远)《和阗遗址所出古代灰泥样本笔记》；(苑)《和阗地区沙粒、黄土样本笔记》。

圆援千佛洞骗宝

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早在 员愿怨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地质期间，偶然看到了敦煌石窟艺术，使他惊讶万分，赞不绝口。员愿圆年，斯坦因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大会作出决议，赞扬了斯坦因的中亚考察工作。同时，洛克齐在会上报告说，敦煌千佛洞艺术，博大优美。他的报告，大大地促进了斯坦因前往敦煌考察之决心。这正如斯坦因自己所说：“在第一次中亚探险队以后几年，我便计划从事第二次的探险，并很想将这一次的探险扩展到中国西北边界上的甘肃省去。我的朋友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故洛克齐教授曾同我说及敦煌东南的千佛洞佛教石窟寺，因此更大大地促进了我的愿望”。^⑤

从 员愿源年初斯坦因就开始策划第二次考察，并力争想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他曾给威尔逊的一封信中说：“在我的旅行取得成功的极大影响下，德国政府现已派遣格伦威德尔教授前往吐鲁番。我还得知他们已为该地区的发掘新拨款 猿圆万镑。俄国政府尽管面临困境（俄日战争），也正筹备由著名印度学家鄂登堡教授率领，对库车进行考古探险。我在和阗的探险是对新疆进行的最早一次系统的考古工作。”^⑥

德国和俄国拟派考察团确有此事，斯坦因提出来，则主要是为了引起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的重视。员愿源年 怨月 源日，斯坦因向政府提交了考察的详细计划书，即赴和阗—罗布淖尔—沙州探险考察，政府有关部门对计划书进行了讨论，并表达了各自

的意见。

外交部：“斯坦因继续对中国新疆进行研究，其巨大价值从科学观点看是毫无疑义的，也没有哪一位权威会像斯坦因这样胜任该项目的进一步实施，……所需费用据他估计为 圆四四四卢比，该帐目细则亦无可挑剔，但对于政府而言，该数额并非全部开销……我们要支付斯坦因博士两年的薪水——这就使开支总额涨至 缘四四四卢比。这还不是最终开支：斯坦因博士正拟尽快放弃他现在的工作（以为探险作准备）——这又要另花 缘四四四卢比，这还不是最终花销，他预算的总额中仅包括返回喀什噶尔的费用，而根据他上次旅行的经验，他此次将从喀什去往欧洲……这样又有进一步要求，利用最后一次机会，要求派驻伦敦为其回程做准备，返回印度后还会要求空闲时间编写报告”。

外交部一一列举了斯坦因所需费用，实际上隐含着不满，并从其他方面提出问题，基本上不支持斯坦因的考察。而外交部意见的最后，有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但是我们对跨国界探索感兴趣”。

税务和农业部门这样估算开支：“大英博物馆允诺购买部分斯坦因博士发掘出土的文物，并负担总开支的大部分，他们并希望在此事上进行协商……大臣反对开支由各省资金支持（孟加拉省与旁遮普省）。作为对印度税收提供开支的偿付，拉合尔及加尔各答博物馆应得到斯坦因（从前）搜集文物的一部分，……我以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确定，各项费用总额将不超过 愿四四四卢比”。①

另外，财政部、印度考古调查部和印度总督寇松均发表了意见。经过各部的讨论协调，斯坦因第二次赴中亚探险的计划于 愿四四四年底被批准。

愿四四四年 源月 四日，由 愿人组成的斯坦因考察团从印度出发，他们穿越帕米尔高原。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

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他们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于愿月份到达第一次考察过的和阗，然后对昆仑山的地形进行了勘测。怨月份，找到了一个遗址，挖掘出婆罗谜木简、保存完好的汉文文书（一卷长达 圆缘英尺）和包括桦树皮文书在内的多种梵文文书。斯坦因在这个遗址得到了满满 远大箱壁画残片，真可谓“旗开得胜”，但他还是感到着急、紧张和不安，因为伯希和考察团已到了喀什噶尔。他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地是楼兰和敦煌，因此绝不愿意让伯希和在他前面赶到敦煌。

在若羌当地官员的帮助下，斯坦因雇了 猿个工人和 圆个曾跟随过斯文赫定的猎人做向导，并备足了能维持到敦煌的补给品。路上又挖掘了楼兰遗址，清理出了 猿园一件藏文文书；发现了米兰壁画。

愿园年 猿月 愿日，斯坦因到达敦煌。当时他还不知道千佛洞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只在敦煌呆 愿天，简单地考察一下千佛洞，并在敦煌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然后就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但到达敦煌不久，他就从一位定居在敦煌的乌鲁木齐穆斯林商人扎依德·贝格那里，听到了几年前王圆箎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遗书之事。他认为藏经洞发现的“这种宝物很值得去努力侦察一番”，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向千佛洞跑去。

猿月 愿日，斯坦因到了千佛洞。当时，藏经洞已装上了门锁，钥匙由千佛洞主持道士王圆箎亲自掌管。而此时王道士带着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只有一位小和尚在千佛洞。斯坦因进不了藏经洞，只得暂时离去。他拜见了敦煌的地方官王某及驻军首领林某后，就去敦煌附近考察。

斯坦因考察了敦煌附近的汉长城，并发现了 愿园多枚汉简。

缘月 缘日，斯坦因再次返回敦煌，由于此时千佛洞正值庙会，香客很多。为不引人注目，更怕众怒难犯，未敢下手。斯坦因只得在县城多呆几天，他的解释是：“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

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③“恐伤人民之情”仅仅是斯坦因对中国人的表白。真正的原因，正如他在《沙漠契丹废址记》中所说：“通过谨慎的思考，我在壁画、塑像方面的考古活动必须限制在以拍照和绘图等手段对艺术遗存进行研究的范围内，简言之，不能引起民愤”。^④可见，怕“引起民愤”，从而影响他对敦煌文书的劫夺，才是斯坦因没有破坏壁画、塑像的真正原因。

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说服王道士，斯坦因进行了划分：壁画和塑像属于宗教崇拜，文书则完全属于学术范围。

缘月 圆日，斯坦因带着考察队，再次来到千佛洞。据斯坦因说，这时“王道士已在那里等候。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甚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捉摸。……要想急于接近那一大屋藏书是不容易的”。^⑤因为斯坦因第一次参观千佛洞时，藏经洞还用粗糙的木门锁着，而这次则完全用砖砌了起来，王道士解释说封砌洞窟是为了阻止香客们的好奇心。实际上斯坦因心里十分清楚，这是为了提防他。因此，斯坦因说他是来千佛洞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的事，只让其中国翻译蒋孝琬去和王道士周旋。当蒋师爷与王道士初步接触时获悉，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已报告给了肃州的最高长官，并通过该途径报告给了甘肃的总督。蒋师爷猜想，甘肃的总督可能已下达了运送样本和安全保管整个收藏品的命令。如果官方已列出了卷子的目录，就会危及到交易的进行。随后又从王道士处得知，确实将几卷汉文佛教文书呈交给了兰州的总督衙门，但并未开列目录。所有文书可以装满 苑车，但省会的官员们对它们并不十分感兴趣，尤其不愿承担运输的费用，因此这些手稿便未被触动地留了下一

来，由王道士负责管理。

蒋师爷在王道士处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周旋后，回来向斯坦因说，他要求王道士让斯坦因看一些写经，但王不置可否。当蒋提出斯坦因愿慷慨地捐一笔功德钱时，王便同意斯坦因看部分卷子。当蒋暗示说斯坦因实际上想买一些卷子时，王一下子就变得焦躁不安，刚才同意让斯坦因看一部分卷子的事也几乎泡汤。正如斯坦因自己所说：“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或者两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⑪

金钱没有打开藏经洞之门，斯坦因只得再想他策。当他请王道士领着参观洞窟及其维修工程时，王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斯坦因提到圣僧玄奘时，引起了王道士的共鸣。斯坦因一看有机可乘，便大讲特讲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⑫这样王道士特意把斯坦因领到画有唐僧故事的壁画面前，给他进行热情讲解。在王道士请人画的这些壁画中，有一幅对斯坦因特别有利。画面上，玄奘站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他的坐骑驮着佛经站在旁边，一只大龟向着玄奘游去，要去帮助他把佛经驮过河去。

谈完玄奘的话题后，蒋师爷单独留下来，其目的是想早些从王道士手中弄到写本，但一谈到写本，王道士又变得胆怯起来，一直用含糊的方法应付。直到深夜，“蒋暗自高兴地带来了王道士刚刚偷偷借给他的一捆汉文卷子摸进我的帐篷，他小心地把第一次答应的一卷子‘样本’藏在宽松的黑长袍下面。就书写和纸张而论，卷子清楚地显示出很古老，也许是佛教经典，但蒋需要时间来确认它们的属性”。^⑬因此，蒋师爷就把一小捆经卷带回他自己的小屋，连夜进行识别研究。

第二天天刚亮，蒋孝琬面带惊愕的神色向斯坦因报告，有些经卷上有题署，有的题署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亲自从梵文译为汉文的。听了这一消息，斯坦因也很惊讶，并让蒋师爷去报告王道士。王道士听后更是惊愕不已。蒋孝琬说，只有一种解释才说得过去，即阴曹地府的玄奘亲自选定这一时辰，把这些神圣的佛经展示在斯坦因面前，以便这位来自遥远印度的虔诚信徒和弟子能把它们带回印度老家去。在蒋孝琬这种半神话的影响下，王道士终于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斯坦因说：“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的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呎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呎。小室约有九呎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④④}

洞子太小太黑，不便翻检，甚至要将这些写本搬出去都很困难，再加上王道士害怕被其他人发现，所以很难在藏经洞内阅读。对斯坦因来说，幸运的是王道士在藏经洞旁修了一个小侧室。侧室有门和纸糊的窗户，这里可以遮挡任何好奇者的目光。因此，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在侧室内翻检卷子。而他则把卷子一捆一捆地搬到侧室里让斯坦因、蒋孝琬研究。第一捆是“约一英尺高的厚厚的纸卷——保存完好，纸、书式和其它情况都明白无误地表明其年代已很久远。异常结实的光滑的黄色纸张呈条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些卷子被阅读过和触摸过；常常为防止外面折叠用来包裹卷捆的绸带已被扯掉。这些套上的折子未触动的地方，蒋就易于读出佛经的经名和卷号等。……蒋的阅读很快让我确信第一捆的标题全都不一样，所以这里所发现的只是与现代西藏和其它地方佛教完全相同经典复制品的担忧逐渐消失了”。^{④⑤}

斯坦因翻检的卷子既有汉文、藏文的，也有梵文和中亚婆罗谜文的，另外还有用“未知”语言写成的，内容极其丰富。“我

过去发现的婆罗谜文文书在这方面或妥善保藏方面没有一件比得上它们。因此第一天蒋和我自己没有间断地工作到很晚”。^{④6}

由于卷子越来越多，所以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卷子编目的计划。洞中除了佛经外，还有许多绢画和帛画。斯坦因自己说：“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警，……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④7}

王道士对“经”很重视，对佛画则兴趣不大。“所以我迅速地擅自将最好的丝、亚麻或纸画放在一边供进一步考察，……仅在第一捆里就有一打之多——甚至在残片里也有精美的画面，而且每一丝片都有收藏和艺术价值。……对这种遗物道士似不感兴趣，内心希望用这些东西把我的注意从珍贵的经文卷轴上引开——他现在更殷勤地寻找并拿出那些已明显被他归入废物一类的东西”。^{④8}

斯坦因和蒋孝琬一面阅读，一面迎合王道士的心理说一些恭维话，又许诺捐纳一大批功德钱。斯坦因把挑选出来的一些佛经和佛画放在旁边，王道士看见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当天，他们三人一直干到天黑。离开洞窟时，斯坦因又和王道士进行了长谈。他们走到画有唐僧牵马驮经从印度返回的壁画前面时，斯坦因故意停住，以便再次引起王道士对该画的注意。蒋孝琬竭尽说客之能事，并再次强调，斯坦因将会给寺庙捐献非常可观的功德钱（在此之前，斯坦因已经给寺院捐奉过若干银两）。但王道士仍然犹豫不决，斯坦因明白，最好的办法是让蒋师爷一人去采取行动。

在蒋孝琬的一再劝说和欺骗下，王道士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要求。“到了半夜，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来到我的帐篷之内，那都是第一天所选出来的，我真高兴极了。他已经同

道士约定，我未离中国国土以前，这些‘发见品’的来历，除我们三人之外，不能更让别人知道。于是此后单由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东西愈来愈重，后来不能不用车辆运载了”。^{④⑨}

这时王道士越来越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害怕失去那些他认为十分神圣的卷子。因而向斯坦因宣称，要把这些“经”交给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经”如果缺少的话，施主肯定会发现，所以他必须去和施主们商量商量，在此之前，不得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当晚王道士就把甬道上的经卷全部搬进藏经洞，并锁上了门。这使斯坦因大吃一惊，但感到庆幸的是，他已经到手的那些为数众多的珍贵绘画、非汉文写卷及其他文物仍在自己手里。在《沙埋契丹废址记》中，斯坦因这样写到：“我们所具有的优势是已经掌握有大量的手写稿和古文物，而且道士明显的愿望是获得数目可观的款项，所以我有理由宣称在这次外交斗争中我取得了基本成功。除了我从各种各样的包捆中挑选出的珍品外，他还同意给我 ~~缘因~~ 非常完好的汉经文卷轴和 ~~缘因~~ 吐蕃文的东西。为换得所有这些物品，约相当于 ~~缘因~~ 卢比的 ~~源块~~ 马蹄银递到了道士手中”。^{⑤①} 他们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将已经到手的宝藏从密室中搬到了斯坦因的帐篷里。

得到这许多宝藏后，斯坦因就开始打包，准备运走，由于要精心地装箱，共用了一周的时间。这时，王道士又该去敦煌绿洲化缘了，否则就会引起施主们的怀疑。另外，他也想到外面去探探风声。一周之后王道士返回千佛洞，由于其秘密仍未泄露，王道士的声誉也一如既往，所以王道士也不再胆小怕事了。斯坦因乘机欺骗王道士说：把这些经卷幽闭在这里，迟早是会散失的，我把它救出，以供西洋学者研究，是很虔诚的举动。并且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 ~~圆~~ 个卷轴。随后，他们双方立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⑤②}

斯坦因在藏经洞骗得的宝藏，数量庞大，仅文书就装满了 苑箱，绘画和刺绣品共 猿园多幅，装满了 缘箱。

正在这时，斯坦因的信使吐尔迪从于阗来到千佛洞，给他带来了大批的邮件，包括 员园封信，都需他处理。另外，敦煌的地方官告诉斯坦因，兰州的总督来了命令，指示地方官奉劝斯坦因在考古发掘中一定要注意外交礼节。再加上斯坦因在敦煌呆的时间过长，已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因此斯坦因决定离开敦煌。远月 员日，他率领由骆驼、马匹以及新增加的五辆马车所组成的浩荡队伍，满载着敦煌宝藏，离开了千佛洞，向安西进发。

斯坦因将盗劫的敦煌文物存放在安西，然后用两天时间走到万佛峡千佛洞，拍了两天照后，就向肃州（酒泉）进发了。因为他有一笔钱（圆万卢比）托付给那里的道台保管。两周后，他到了肃州，考察了嘉峪关长城，并开始准备去新疆考察。

愿月 愿日他到了甘州（张掖），这是他所走的最东界线。在甘州呆了五天后，他又于 怨月 缘日回到安西。当斯坦因回到安西后，便给艾伦写信说：“非常高兴地完好收到了我六月份寄放在安西衙门的 员箱古代手稿等”。^⑫ 由于斯坦因在敦煌的骗盗行为没有泄露，他便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地去了一次千佛洞。从王道士处得到了 圆园捆手稿，其中包括 猿园件经文。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斯坦因说，这一次，王道士“还慨允蒋师爷代我所请，送给我很多的中文同西藏文写本，以供泰西学术上之需。十六个月以后，所有装满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裹很仔细的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上的遗物，平安的安置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我到那时才真正的如释重负”。“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⑬

员园年 员月斯坦因又诈骗了一批敦煌文物后，就率领他的考察队，满载着敦煌文物和其他丝路上盗掘的文物，走上了从哈密直通喀什噶尔的大路，而他本人则抄近路向吐鲁番进发，想在

吐鲁番再有收获。

岁月 圆日到达吐鲁番，他大概勘测了一下吐鲁番的遗址后，认为“好像靠近繁荣地方的吐鲁番的主要遗址都被德国人挖掘过了，除非难以接近的地方才逃过厄运”。^{⑤4}

关于吐鲁番遗址，斯坦因说，这些遗址“德国人曾以独特的方式挖掘过，并且所有地方都挖掘得很彻底。……大寺院、庙宇都是用学术盗宝者的方式挖掘的，简直没有使用任何考古学周密仔细的方法。凡最可能出土‘发现物’的地方都遭到这种挖掘”。因此，斯坦因估计，在吐鲁番不可能有大的收获，因为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已将吐鲁番挖遍了。但“天意和运气”引导着斯坦因去了离吐鲁番盆地盐湖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组未被德国人染指的小寺院。他“在这里挖掘出土了一些好的壁画、塑像碎块和注有日期的汉文、吐蕃文、回鹘文手稿”。^{⑤5}

斯坦因在吐鲁番呆了 愿天，然后走了 愿天的商路到达焉耆。愿愿年 员月 员日他抵达库车。“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我并不指望有很多工作机会，但为了得到‘迅速的启示’，我急于参观石窟和其他遗址。……石窟让人失望，其壁画被那些道貌岸然的摧残艺术者和收藏家们破坏得残缺不全，这些毁坏的寺院和庙宇都受到潮湿空气的侵蚀，以至于日本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以得到残片为满足。去年伯希和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至少在一个遗址里发现了重要的手稿”。^{⑤6}由于斯坦因来晚了一步，库车已没有什么油水了。

猿月，斯坦因在和阗又开始挖掘寻找，他找到了一个小遗址，“我们全部清理了在古代已遭受许多苦难的 源座佛寺，出土了属于唐代的木简等”。主要的收益是挖掘到了一些漂亮的壁画，“像和阗这样的地方，每一件画片都有价值”。^{⑤7}

在回国前返回和阗，是斯坦因早就计划好了的。当他还在敦煌时，就于 猿月 猿日写信给英国朋友要求其代购礼品，其中有

一件织锦是准备送给潘大人的，一块表是计划送给蒋师爷的，并在盖子里面刻了字：“~~愿~~ 粤 斯坦因博士将它作为对 ~~愿~~ 愿 年为探险献身的学术贡献的感激和真诚敬重的纪念品赠予蒋师爷”。^{④⑧}

在斯坦因眼里，潘大人——潘震作为一名中国的地方官，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学术活动的支持者，因此他专门去了一次阿克苏拜访潘大人。当然他不仅仅是为了去感谢潘大人，而是还有所求。~~愿~~ 愿 年 远月 怨日在给艾伦的信中就说：“得到我诚实的蒋奋斗了 ~~愿~~ 愿 年的官府雇用的机会，……所以我拟就了蒋的服务和我全部帮助的详细报告，呈递给乌鲁木齐的都督。潘大人认真地考虑了蒋的打算，并不怕麻烦地彻底修改信的内容和风格，他也同意用自己的名义和信封呈递给最高当局以明显表示支持”。^{④⑨}由此可见，斯坦因对帮他盗劫敦煌文物的蒋师爷是多么感激、关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蒋孝琬是敦煌文物外流的“关键人物”之一，如果没有他的大力帮助，斯坦因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地诈骗、盗劫去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

斯坦因去阿克苏，一方面是为了拜访潘震，另一方面是考察。当 源月 愿日到达麻扎塔格时，找到了一个遗址，“在堆积的麦草和难闻的垃圾层里，意外地出现了藏文木简和文书、汉文和古于阗文文书，甚至还有几件钵罗钵语（中世纪古波斯语）和回鹘文文书。总数达到 ~~愿~~ 愿 件，……烂文书是常见的，但文书、过境通行证、征用令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保存得相当完好。钱币和带有日期的文书，表明吐蕃人公元 愿世纪曾作为一个边境守卫要塞占领过这个地方”。^{④⑩}在麻扎塔格挖掘后，斯坦因便于 缘月 员日赶到了阿克苏。

在阿克苏办完事后，斯坦因用 缘天时间到了莎车，然后于 远月 怨日到达和阗，他要在这里对其“发现物”编目、装箱，并在箱子上包马口铁。每一件“发现物”他都得登记、包装，每一块

嵌板都要小心地“加固”，每一张易损的绢画都要谨慎地卷在棉胎里，而蒋孝琬则对文书按“题署”进行登记。到了苑月中旬，“包装已全部完成，整个古物箱子凑成了 源个相当重的马驮子。所有珍贵些的箱子包了锡皮。我希望它能够防水。猿只箱子装满了手稿和其他木简等。蒋只完成了 员册的千佛洞文书”。^⑪

装箱工作结束后，斯坦因于 愿月 员日离开和阗回国，此时，蒋孝琬已被马继业任命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中文秘书了。回国途中于 愿月 猿日到达列城，由于斯坦因的脚趾被冻坏， 愿月 猿日在列城做了手术，左脚脚趾上的皮肤虽然部分冻坏了，但不会留下痼疾，右脚脚趾已开始变成坏疽，因此不得不将右脚两个中间的指头和其余指头前面的关节全部截去。大夫向斯坦因保证，留下 猿个指头的大部分，完全可以行走和爬山。在列城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斯坦因于 愿月底回到了印度。

在印度，斯坦因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欢迎。有一天，皇家亚洲学会孟买分会通知斯坦因：新近刚为纪念约翰·坎贝尔爵士而设立的东方研究金质奖章，第一次将颁发给他。

员愿年 员月初，斯坦因离开印度，他先到维也纳看望嫂子，几天后到达“故乡”布达佩斯，最后经巴黎于 员月下旬回到伦敦。这时他考古的“发现物”已运到伦敦，保藏于大英博物馆。这样斯坦因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考察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回到伦敦后，斯坦因拜访了外交部秘书，请求印度政府向中国官员表示感谢他们的帮助：

“如果中国各地方官——没有在运输、供应、发掘工人等各方面向我提供最有效的支持”，那就不可能“获得我有幸在内务部向印度政府报告的那些考古地理成果”。他列举出乌鲁木齐的新疆巡抚、兰州府的甘肃总督、阿克苏道尹潘大人、肃州县官、敦煌县尹等人，“我确信对他们的贡献予以适当评价，会对这些行政官员有利，同时间接地也有利于将来的英国旅行者”。^⑫

第二次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 1907 年 1 月写出了这次考察的个人笔记——两卷本的《沙埋契丹废址记》，1908 年在伦敦出版；其正式的考古报告是《西域考古图记》，又译为《塞林提亚》，副题为《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共 3 卷，于 1909 年在牛津出版。

1909 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时，于 7 月 1 日再次来到千佛洞，仍然受到了王道士“亲切、友好的接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曾这样记述：“王道士欢迎我有如老施主一般，……王道士曾乘便将他的帐目给我看，上面载明我所有施给寺院的银钱总数”。同时王道士还向斯坦因出示了其募化和接受捐赠的所有款项的开支帐目，由此帐目可知，“当日得之于余者，皆已作修葺庙宇之用。彼以马蹄银在洞庙前所筑之新佛堂及香客下院，已骈列成排，一一为余指示，有自得之意”。^③王道士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他仅仅将斯坦因作为施主来对待，让他看捐赠银两的用途。

斯坦因这次来敦煌，没有蒋师爷的帮助，使他痛感失去了蒋师爷那种愉快、亲切、打动人心的能力。而接替蒋师爷的李师爷，在斯坦因看来，是一个冷峻、粗暴、毫无趣味的人，还不如王道士友好和善谈。因此斯坦因不得不直接面对王道士。当他又向王道士提出卷子要求时，王道士说，伯希和来后一年，北京下令交出剩下的东西，他和寺院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1909 年 1 月 1 日，斯坦因给艾伦写信说道：王道士“足够聪明，当转交北京的命令下达时，私自藏下了不少纪念品。从中，我获得整整一箱文书。当然，这需要好一阵讨价还价，但即使不幸没有蒋师爷的帮助，最终我还是成功了”。^④

斯坦因这次所得卷子，大部分是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王道士密藏起来未交者。少部分是当地官僚窃去和散佚在民间的，当时就已经有人在出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说：“一整捆的唐代

佛经卷子，在 1895 年即曾有人拿来向我兜售过。我到甘州去的途中以及在新疆沿途便收到不少从石室散出的卷子”。斯坦因这次所窃卷子的数量，在其自述中说：“我第二次巡礼此地的结果，许我带去的还足足装满五大箱，有六百多卷佛经，——自然，又得布施相当的数目”。^⑤

猿援盗劫后的评说与英藏敦煌文书

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实惠与极高的声誉。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发现者金质勋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德国则给他一笔巨额的现金以祝贺他的成就；在布达佩斯，他被奉为立了大功的好儿子。当他重访“故里”时，布达佩斯沸腾起来，“午餐、宴会，还有晚餐应接不暇”。比利时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并且成为“亚平宁俱乐部”的成员。1903 年 10 月 10 日，他给艾伦写信说：“听说，与我同获此殊荣的有 10 个人，其中包括约瑟夫·胡克尔爵士（皇家植物园创始人）、南森（北极探险家、海洋学家、人道主义者）、杨哈思本、柯曾等，全都是些令我望尘莫及的名字”。^⑥另外，还使他高兴的是，那个为他帮了大忙，对盗劫敦煌文物立了殊勋的蒋师爷——蒋孝琬，也由于斯坦因的积极推荐，得到了他本人所渴望得到的奖励，当上了喀什英国领事馆的汉文秘书。

当然，对斯坦因来说，最高兴的是终于加入了英国国籍，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最使他高兴和出乎意料的是得到了官方的承认：1904 年 1 月斯坦因被授予“印度帝国骑士”称号。咨勋局专门给他发了通知，并说明了在皇家觐见厅接受陛下封爵时的礼仪、穿戴等问题。斯坦因绝对没有想到，在中国敦煌所窃得的宝藏，会把他带进了皇家觐见厅参加崇高、庄严的受封仪式。

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得到了欧洲学术界的极力赞扬。中亚细亚旅行家和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教授曾经把斯坦因称

作是“他的同时代人当中的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铀元素的发现者伦纳德·伍利爵士把斯坦因在中国西北的探险，说成是“一个考古学家对古老世界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胆和最冒险的突击”。^{⑥7}并说斯坦因对敦煌遗书的劫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宣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⑥8}

然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对斯坦因的劫夺，却有正确的看法，并表示极大的愤慨。早在 1908 年，英国埃里克·泰克曼爵士就在其《土耳其斯坦旅行记》一书中说：“运输队把中国土耳其斯坦（即我国新疆地区）的寺院、石窟、坟墓和废墟中的无价之宝，一批一批地运往外国的博物馆，从而使中国永远地失去了这些珍宝。对此，中国人无不怨声载道，而外国人也无法加以否认。”^{⑥9}英国东方学专家阿瑟·韦利对于斯坦因的劫夺，“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无异是对‘敦煌书库的劫掠’行为”。并说要了解中国人民对敦煌遗书被盗的情感，其“最好方法是去设想一下，假使一个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内，发现了中古时代文书的一个窖藏。他贿赂这里的看守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运到北京去，那时我们将作何感想”。^{⑦0}

众所周知，敦煌遗书发现不久，甘肃学政叶昌炽就建议当局全部运到兰州保管。后因运费无力筹措，才于 1909 年命令敦煌县府先行检封，并由王道士就地保管。“从法理上说，从那时开始，这批文物已是中国政府的财产，王道士是无权出卖的。斯坦因若不知底细，误买了，乃是买了赃物，事发之后，仍应交出。何况斯坦因不仅明了王道士无权卖，实际上根本是他和蒋孝琬‘说服’王道士演出这幕‘监守自盗’的”。^{⑦1}

当然，斯坦因是付了一些钱，但并非是他自称的那样“公平”，因为他只付了 400 两银子。斯坦因明白，这是低得近乎荒

谬的价钱，在把东西运抵安西后，他就得意地给朋友写信说，这批文物只花了 150 英镑，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和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⑦

斯坦因在中国所窃去的全部收藏品，按照资助他的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之间在其出发前所签署的分配方案，写本部分，凡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和回鹘文书写者，归英国博物馆保存；凡用于阗文、龟兹文、藏文书写者，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存；梵文写本，用佉卢文书写者归前者，用婆罗谜文书写者归后者。其他发现品如钱币、绘画等，在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但斯坦因回国后却改变了分配办法：为了研究方便，文书部分归大英博物馆收藏，印度方面只取若干样品；图画部分归印度博物馆所有，大英博物馆只取若干作样品。据有的学者检视两地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窃文物，“发觉大英博物馆所谓的留取若干，实际上是尽取菁华；印度博物馆的留取若干，则无论质量，都无足轻重”。^⑧ 1907 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与英国博物馆分立，保存在原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中的斯坦因所获文献，移入了新建的英国图书馆藏书楼保存。

关于英国所藏敦煌遗书，长时间不知其详细情况和数量。因为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献，刚开始编号时，仅仅按照语言和出土地点大体上作了一些归类，就被编为 韵、则、愿、园、愿、园三个总号之中。韵、则、愿、园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汉文写本和印本，后来就缩写为 杂。1907 年，英国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将所藏敦煌卷子制成缩微胶卷公开出售，这套胶卷共收录了 2400 个卷子，即杂、愿、园它不仅未包括古藏文及其他民族文字的卷子，就是汉文卷子也是不完全的。1909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斯坦因劫经录》，就是我国学者刘铭恕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新收到的缩微胶卷编制的。当时还有两千多件没有编目。1924 年翟理斯编成了《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

记目录》，该目录共收录了 54 个敦煌汉文卷子，但并没有完全反映英国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的收藏情况。近年来，英国图书馆修复部又陆续从敦煌绢画、写经、经帙等已编号文物或文献上揭出许多残片，在总编号后顺序增加，目前已编到 54 号。^⑦ 杂号 54 号敦煌写本，不论长短，一纸一号。从总体上看，杂号 54 号以前的写本比较完整，有不少长达 5 米以上者，缩微胶卷和台湾黄永武先生编的《敦煌宝藏》已将它们全部收录。而杂号 54 号以后的写本，主要揭自经帙或绢画，残片较多，大多数为一两尺长，还有许多只有巴掌大小，因此在一个号下，各残片又细分为粤、月、悦、……，如杂号 54 粤，杂号 54 月等。

1955 年，英国图书馆邀请北京大学荣新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广钐赴伦敦进行杂号 54 号—54 号的编目工作，由荣新江负责非佛教文献，方广钐负责佛教文献。其中荣新江所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杂号 54 号—54 号）》一书，已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 1989 年 7 月出版。由于荣新江先生学识渊博，尤精于敦煌文献，故该书是目前敦煌文献目录方面比较适用、权威的一部工具书。该目录除标题外，还包括对写本外观、内容、专有名词、题记、朱笔、印鉴、杂写、年代及与其他写本关联情况的提要，凡能找到的有关该号写本研究的文献和图版，亦作了著录说明。

为了使英藏敦煌文献早日公布，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共同编辑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英藏敦煌文献》共 5 卷，收录了杂号 54 号中所有的汉文佛经以外的文献，由于图版是根据原卷拍照的底片制成，较为清晰。该书自 1990 年开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了 5 卷，最后一卷是目录索引等，正在编辑之中。

杂号 54 号主要是斯坦因第一次考察所获文献，但

也有一部分是第二次考察时所获敦煌汉简等。这一组文献，除了韵则愿园编一猿愿园这种博物馆编号外，还有斯坦因根据文书来源而标的原始编号，如栽编号指在敦煌长城烽燧所获汉简，晕表示尼雅出土佉卢文文书，酝栽表示麻扎塔格出土文献，蕴粤或蕴·月指楼兰遗址所获文献等等。

韵则愿园编一猿愿园是民族语言或民族语言文字混在一起的文书，其中有梵文、佉卢文、藏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突厥文、回鹘文和汉文，出土地点则有敦煌藏经洞、敦煌长城烽燧、吐鲁番、和阗等地。韵则愿园编一猿愿园为预留空号，迄今未用。韵则愿园编一猿愿园是木简或纸本汉文文书。韵则愿园编一猿愿园以下，是汉文或其他语言文字残片。

如前所述，根据斯坦因考察前提供经费的多少而签订的协议，其中一部分文献文物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有。该馆原是英国占领印度后，由东印度公司设立的，员愿源年印度独立后，便归英联邦对外关系部所属，后来又划归英国图书馆参考部管理。员愿缘年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合并为东方与印度事务收集品部。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梵文、于阗文、藏文、吐火罗文等语言文书，大多收藏在这里，其中包括敦煌藏经洞文书，如斯坦因所获敦煌藏文文书的大部分就收藏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斯坦因所劫夺的敦煌文物，主要收藏在英国博物馆。早在员愿源年，斯坦因就选取了其中的精美绢画源幅，编成《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在伦敦出版。后来，韦陀对英国博物馆所藏美术品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选取了其中的精品，编成三卷《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于员愿园—员愿源年由英国博物馆和日本讲谈社用英、日两种文本在东京联合出版。

敦煌文物与文献一样，都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资料。绢画上的题记、纸画旁边或背面的文字，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我们

应当将他们与藏经洞遗书一样对待，给予应有的重视。

四、“汉学大师”取菁华

斯坦因捷足先登后，紧接着来了法国人伯希和。由于伯希和是世界上著名的汉学家（“汉学”又称“中国学”），所以盗去了敦煌遗书中最菁华的部分。

员爱法国的“汉学”研究

保罗·伯希和于 员愿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商人，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三，中学毕业后入法国汉学中心之一的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并成为法国中国学权威沙畹的高足和追随者，投身于中国学研究的行列。员愿年被选拔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委员会的寄宿生，到了河内，从此，便踏上了其漫长的汉学征途。员愿年，该会改为法兰西远东学院，伯希和成了该院的首批成员。员愿年 圆月，他被派来我国北京，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藏书。“据传闻，当时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正被义和团的一支部队所围困，后者正准备纵火焚烧。许多法国人隐身于一堵枪眼密布的墙壁后面，荷枪负弹，准备弹压和抵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伯希和挺身而出，开始对将公使馆团团围定的义和团将士喊话。团兵们非常敬佩，未敢纵火而自动撤离，由于伯希和表现出如此勇敢的精神，所以带膺法国荣誉勋章”。^⑦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我国北京的混乱时期，伯希和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骗购了一批我国古籍和文物。

“员愿年，伯希和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同年六月，他抵达河内，从中国带回了一套精致绝伦的青铜器、景泰蓝和雕刻品，尤其是一批他所搜集的汉文、藏文和蒙文典籍珍本。员愿年，这批珍贵的刊本与写本存入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而他所搜罗

的绘画则入藏卢浮宫。在伯希和所搜集的珍本中，包括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图书集成》的最初版本，还有明代出版的一部道教经典《道藏》的残卷，这两部书至今仍是欧洲的孤本。除此之外，还有十八世纪出版的藏文红字本的《丹珠尔》和《甘珠尔》以及蒙古文的《甘珠尔》等文献”。^⑦

1905年，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院教授时，年仅 35 岁。当他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还潜心于汉籍目录版本，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

1905年，伯希和回到法国，不久又返回河内。这时，欧洲及俄国的一些“考察家”、“探险家”纷纷涌入我国西北地区，连续发现了许多古代遗址，并窃走了我国大量的稀世珍宝。对此，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十分眼红，也不甘落后。于是由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以及亚细亚学会出面，组织了一个“考察”我国西北地区的法国考察团，伯希和被选拔为这个考察团的团长。

法国组织考察团，并派伯希和来我国西北地区“考察”，是与法国国内中国学的发展分不开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最早来自于《马可波罗游记》。到了十六世纪后半叶，葡萄牙、西班牙人相继来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进行其所谓“商业”活动的同时，写了许多有关我国的著作，如《中华大帝国史》、《中国耶稣基督教的起源》、《鞑靼史》、《中国新地志》、《中国最早期的历史》等等。这些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很快在欧洲流行起来，引起了欧洲人研究中国的极大兴趣，对欧洲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著作在欧洲被译为各种文字，很快传播开来，其中尤以法文译本出版最快、最全。早在 1685 年，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

米凯莱·戴·蒙泰涅在校阅《中华大帝国史》的法文译本时，就曾写道：“尽管我们没有接触中国，也不了解它，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⑦十七世纪，法国有人把孔丘奉为“哲学之王”。由此可知，法国的知识分子一接触中国，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此，到了十七世纪末，欧洲的汉学中心就由意大利移到了法国。

十九世纪，法国的汉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自从 1802 年 10 月 15 日在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座之后，法国汉学研究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它不仅对法国的汉学研究，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汉学研究都有决定意义，这是西方高等院校第一次把汉学列为正式学科（俄国于 1804 年设立汉学课程，英国于 1807 年设立，其他欧洲国家更晚，美国是最后一个）。

法兰西学院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可以“自由地确定研究领域，自由地选择各自领域中最有才能的人员，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听课，无需交付学费，无需经过考试。教授们的惟一任务就是介绍他们年复一年地进行的研究；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在法兰西学院里重弹老调。比如，如果在天文学和数学等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果某位杰出的学者有能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就可以在其中的某一位因故出缺时把他选进来。科学领域里各个讲座的主持人就是通过这种程序不断得到更新，当然其他讲座的主持人也是这样产生的”。“在整个十九世纪，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惟一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和文明的学术机构，到二十世纪，它在这些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⑧

法兰西学院中国学讲座的第一个主持者是雷慕沙，当时他年仅 26 岁，其代表作是对法显《佛国记》的译注。1815 年，沙畹

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主持中国学讲座。这件事不但可以被看作法国汉学、而且是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以后，法国的汉学研究更是大放异彩。沙畹的研究领域很广泛，诸如考古、碑文、图画、艺术、唐代中国与中亚的交往、中国的宗教等，他是第一位应用欧洲的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的学者。沙畹一生中培养了许多汉学专家，其中三位成绩最为卓著，即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

由此可知，在近代国际“汉学”界，法国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25年 12月，张元济在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讲道：“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最为有功”。^{⑦⑨} 傅斯年曾这样介绍法国的汉学：“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而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个人物的贡献建设出来中国学上之巴黎学派。这三个人物者，最早一位是菇里安，此君之翻译《大唐西域记》及其对于汉语等之贡献，在同时在后人是具有绝大影响的。最后一位是沙畹，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其译诸史外国传，今日在中国已生影响。最后一位，同时是更伟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们诚不可以中国学之范围概括伯先生，因为他在中亚各语学无不精绝。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今且及于中国”。^{⑧⑩} 以上张元济与傅斯年的言论，都或在伯希和当面所讲，或为伯希和而看，因此，不可避免地有过誉之处，但客观上仍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

圆援伯希和敦煌劫宝藏

伯希和的“考察团”只有三个人。路易·瓦扬博士分管地形、地质、植物、动物，伯希和负责考古、语言和历史，另一个是远

征队的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

1906年 7月 13日，伯希和率领的考察团离开巴黎，搭上火车经由莫斯科和奥伦堡，十天之后抵达塔什干，然后经俄国中亚进入我国。路途中伯希和学会了突厥文，熟练了俄语。

同年 8月底，伯希和到达我国喀什。在喀什，他们居住在俄国的总领事馆内，同时，还对当地官员进行了外交上和礼节上的拜访与问候。由于伯希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库车绿洲中的佛教石窟。因此，他在喀什短暂逗留后，便向库车进发。六个星期后，他们到达库车，考察了这里的几座佛教石窟。

伯希和考察团在库车共进行了八个月的考察，虽然那里的石窟在几个月前已经被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考察团勘探过，伯希和只是考察了一些“次要的遗址”，如库木吐拉附近的都勒都尔——阿护尔、苏巴什寺庙和夏尔特朗遗址。但伯希和的收获仍然不小，“他在那里发现了目前保存在伯希和库车收集品和伯希和梵文收集品内的几乎全部的文献资料”。^⑪

伯希和在库车的收获，具体说来：“在托姆疏克村，他首战告捷，第一次获得了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在那里发掘出了一座巨大佛寺。他还搜集了一些希腊佛教艺术品，如小雕像和小浮雕等，这些发掘物证明了当地曾深受希腊和印度文化的双重影响。在库车以东的马槽地，他发掘了一批梵文和古代龟兹文写本，还有一批龟兹文木简和商队通行证等”。^⑫库车考察之后，他们就转移到乌鲁木齐，以便补充生活必需品，准备越过沙漠前往敦煌。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敦煌藏经洞发现遗书之事，更没有听说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只是计划去敦煌进行拍照，并研究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

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伯希和得到了敦煌发现藏经的消息。当他们在乌鲁木齐停留时，伯希和偶然遇见了清朝官员载澜。此人原是北京警察总监，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北京与伯希和等外国侵

略者相互为敌，后来被终生流放到乌鲁木齐。伯希和后来写道：“在 1906 年，我们彼此之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宿怨已早冰释，我们借着饮酒谈心，重温旧谊”。^{⑧③}这个时候，伯希和在乌鲁木齐街头已听到了传说，在千佛洞发现了一个藏着手稿的秘密洞窟。这个被流放的官员拿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敦煌的手稿让他看，“伯希和刚一打开这个卷子，他就认出了这是八世纪以前的东西”。^{⑧④}伯希和见到这个卷子后，大为惊喜，于是放弃了考察吐鲁番的计划，急迫地离开了乌鲁木齐，马不停蹄地兼程东行，往敦煌飞跑而去。

1906 年 4 月 10 日，伯希和一行终于到达敦煌。这时藏经洞的门紧紧锁着，王道士不在千佛洞。但伯希和不甘于在寂寞中等待，他“请瓦扬（即瓦兰）绘制地形图，请努埃特照相，他自己细心抄录作为断代鉴定主要根据的题识，描绘每个石窟内的壁画”。^{⑧⑤}过了不久，伯希和就在市镇上找到了王道士。这时，伯希和还不知道斯坦因已在一年以前从这里盗走了大量经卷，所以根本没有提到斯坦因。这对王道士来说，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明斯坦因是信守誓言的。“他发现这些‘洋鬼子’对于这项秘密，都能守口如瓶，使他感到非常放心。而且他已经开始用斯坦因的捐献来进行他的修复工作。当前，无疑是他寻找另外一笔捐助的时候了”。^{⑧⑥}

经过 10 多天的努力，王道士才允许伯希和进入密室。当然，和斯坦因相比，伯希和已很顺利了。4 月 11 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据他粗略地估计，洞内的手稿大约在一万五千至二万之间。伯希和在其《敦煌石室访书记》^{⑧⑦}中说：“（1906 年）4 月 11 日侵（清）晨，入此扃秘千年之宝库。发露迄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藏弃之数，意必大减。迨入洞扉，令人警愕！洞之三隅，积累之深达二迈当又五十，高过人身。卷本二三大堆，至巨大之藏文写本，则以版挟之，堆置洞

隅”。如果要每个卷子都打开，并进行适当翻阅的话，至少也得花六个月时间。伯希和自己说：“余私自忖度：洞中藏弃，尽加展览，其事至繁，将万五千卷至二万卷，自首至尾展览一过，六阅月乃能藏事，非余所能胜任也，然欲悉其内涵，考其关系之重轻，又不得不每卷展开”。因此他并没有犹豫，立即作出决定：“一定要把整个书库检查一下，哪怕是粗略的检查也好”。“至少我必须打开每一件，认识一下它的性质，同时看一看，它是否提供过任何新的东西”。^⑧

伯希和在藏经洞进行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挑选。在挑选中，他把卷子分为两堆，一堆是其中的菁华，不论多么艰难，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另一堆为凡品，也是需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挑选中，他还经常偷拿其中的精品。瓦扬说：“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最喜欢的手稿……。有一天晚上，他拿给我们看的是一份圣约翰斯托里福音；另一次，他拿来一份有八百年历史的描写一个奇异小湖的文稿。该湖位于敦煌之南的很高的沙丘上。再一次是一份有关这个寺院的帐目”。^⑨经过每天大约一千份的紧张挑选，他基本上将石室遗书检查一过。伯希和在敦煌期间，曾将重要的发现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后来这些书信编为《甘肃发现的中世纪书库》一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八卷上，陆翔译为《敦煌石室访书记》。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伯希和说：“余之展览虽极神速，然历时亦在三星期以上。开始十日，日阅千卷，自诧以为神奇，盖蛰居岩洞，每小时阅百卷，浏览典籍之速，堪与行程中之汽车比拟矣。迨十日后，而进行稍缓，盖精神困疲，尘埃塞喉，且接洽购买，耗时颇多，猛进之后，宜稍舒徐，此亦事理之常，无足怪者。然余亦不敢轻心从事，每遇一卷，即破碎不堪者，亦不率尔放过，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决其无有”。在别的场合，他还说：“我并没

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断片碎页……”^⑩

在藏经洞的 20 多天中，伯希和将洞中藏品全部翻阅一遍。凭借其对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丰富知识，伯希和选取文书的重点是：佛教大藏经未收的佛教文献，带有年代的文书，非汉语文书。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伯希和还在莫高窟北区的第 17 窟（敦煌 17 窟）的积沙中，发现了许多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文献。缘月 14 日，伯希和考察队带着丰富的宝藏离开了莫高窟。^⑪

挑选工作结束后，伯希和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征得王道士的同意，把挑选出来的手稿卖给他。为此，伯希和与王道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多次会谈。瓦扬在回忆中说：“会谈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必须在极端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才能提到有关发现书库的事，即使在我们的信件里也必须如此。”^⑫在伯希和保守秘密的前提下，王道士最后同意了这笔交易，其代价是伯希和仅仅付给他五百两白银（约 800 磅）。伯希和将所得到的文物仔细包装后，就用船舶运往法国。“只是当努埃特带着满装我们的选品的箱子上了轮船之后，伯希和才公开地谈到这些东西，并携带着一箱手稿的样品前往北京”。^⑬

除了写本以外，伯希和还劫去了一部分艺术品，《敦煌石室访书记》载：“余在乌鲁木齐，即闻千佛洞自写本外，尚有画轴。……余获画若干幅：纸本、绢本、麻本、著色胶漆本无不具备，考其笔致似皆匠者为之，而非芝士所致，盖名画绝不流至西陲也。自画轴外，又有著色之画卷，余得其二，皆《地狱变相图》”。1908 年 5 月，当伯希和收集品运回巴黎后，其艺术品便于 1909 年入藏卢浮宫博物馆，共有 200 多幅绘画品、10 件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随后，便将部分艺术品转存于集美博物馆。1910 年，伯希和所获艺术品全部转归集美博物馆收藏，

并由此建成 猿个大展览室，放置敦煌和新疆发现的画卷和画幡。^⑭

光緒廿年 庚子月 庚子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大演讲厅内为伯希和举行的隆重欢迎会上，他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诸位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心灵受到何等的震撼，我面对的是最了不起的中国手稿大发现，这在远东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从今以后，欧洲汉学家可以像历史学家那样，根据文献进行研究工作……。”^⑮

伯希和得到敦煌宝藏后，显然不敢掉以轻心。他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 光緒廿年 庚子月 缘日抵达北京，在这里他将所获藏品运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于 光緒廿年 庚子月中旬返回河内。光緒廿年 缘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于 愿月中旬抵达北京。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伯希和对劫获敦煌宝藏之事仍秘而不宣，并不想告知中国学者，因为其行为的确是不光彩的盗劫。然而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准备启程回国之际，伯希和在“敦煌得宝之风”，已开始在北京学术界传扬，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⑯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⑰

伯希和至北京时，“行篋尚存秘籍数种”，“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谈谈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⑱首先知道此事者，乃是与端方、缪荃孙等关系密切的董康，经他介绍，罗振玉、王国维等赴伯希和住处拜访参观，同时还影印伯氏所携文书 愿种，传抄一种。并与伯希和协商，准备将其已运回巴黎的敦煌经卷全部照相印刷。怨月 源日，北京的部分学者及官员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招待会的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翰、京师大学堂教授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

康、蒋黻、吴寅臣等。罗振玉因病未能参加。在招待会上，恽毓鼎举杯致辞，并希望伯希和“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伯希和随即表示：“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下公器，其希望摄影誊写者，自可照办”。

在伯希和盗劫藏经洞遗书的同时，还让努埃特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给莫高窟当时已发现的所有洞子都照了相，共 猿远 幅。考虑到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伯希和坚持要把它们首先公布，因为对没有去过千佛洞的人来说，只有利用照片对其进行感性认识，并结合照片，才能对敦煌文书进行较深入地研究。“对于这些文书的考释需要自由地互相参阅。但只有到所有图片都发表之后方可以这样作……，对各个石窟的描述、时代考证、各个画面的鉴定和对题识的解读等等，这一切今后不久就可以开始”。^⑨因此，努埃特拍摄的这些照片，便以《伯希和考察团档案》第一卷《敦煌石窟》为名，分为 远册，于 员愿园—员愿园 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关于敦煌佛教艺术图录的最早出版物，对我们今天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是因为在伯希和离开敦煌几年之后，当白俄士兵被拘留在那里时，千佛洞的石窟艺术曾遭到严重的破坏。

另外，伯希和还详细查看了千佛洞的洞窟，对每个石窟都作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中的壁画题记。“他沿着石窟的内壁反复察看，清理了全部可以解读的题识，并且还仔细研究了全部画面”。在他的考察笔记里，“除了记载有关每个石窟的位置及其在整个石窟地区的分布方位外，还指出了每条题识、每幅画面、每尊彩塑和每座石碑的具体位置。对洞壁和洞顶的内容也常常进行考证。有时候，某些内容无法进行精确的考证，则可借助于题识来进行解释。当遇到复杂的组成情况时，作者还画了草图以说明画像的布局，这种周密的考虑大大方便了后人对各种场面的理解”。^⑩

伯希和除了对壁画的描述之外，还很详细地记录了洞窟中的各种题识，如带有各种神像名称的题识、佛经或变文中的摘录以及用不同文字（蒙古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所刻写的题识。众所周知，伯希和是第一个对敦煌石窟作全面描述的人，他在笔记中对当时参观过的 154 个石窟（有的洞中又附有一个或几个耳室）都作了全方位描述。如果我们与史岩、谢稚柳以及敦煌研究院对敦煌石窟内容及题识而作的记录相比较，就会发现伯希和的记录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另外，长期以来，由于莫高窟不断遭受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洞窟中的许多题记已模糊不清，甚至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伯希和的这些记录就成了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敦煌学，特别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伯希和敦煌石窟考察笔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908 年伯希和去世后，他的全部笔记都交给了吉美博物馆保存。笔记共两本，全是活页簿，有单页的，也有数页的。当时，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埃斯特·列维曾经看过这本手稿并将其全部仔细精确地复制了下来。1924 年日本的秋山光和得到了该笔记本的复制件，并在其论著里引用了有关资料。

后来，法国方面指定韩百诗负责出版伯希和考察团的成果，为此，吉美博物馆将伯希和手稿和埃斯特·列维的手稿复制本都交给了他。但由于韩百诗繁重的行政、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他 1925 年去世时，伯希和笔记还未能整理出版，但已做好了许多的前期工作。随后，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资助，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于 1925 年开始，以《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名分六卷陆续出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每卷开始部分都是旺迪埃——尼古拉写的序言和莫尼克·玛雅尔夫人写的前言，并附有伯希和、张大千、史岩和敦煌艺术研究所各家对敦煌石窟的编号对照表及其时代。每卷笔记的第

一部分都是整理后的排印文字，第二部分是手稿的影印件，最后附一批伯希和当时拍摄的千佛洞外貌及各洞壁画的大幅照片图版。

为了给国内敦煌学研究者提供资料，耿昇、唐健宾翻译了法国出版的笔记，以《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 1982 年出版了中文本。中文本前面是莫尼克·玛雅尔的前言、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的序言、译者的话，最后还附有伯希和、张大千、史岩、敦煌艺术研究所所编敦煌石窟各家编号对照表。

猿援菁华犹在巴黎藏

伯希和回巴黎后，其考察团携带回去的文物分别归几个机构所得。自然历史博物馆得到了“岩石标本，~~愿国~~种草木标本，~~国国~~头鸟，还有哺乳动物和昆虫。”考古文物和考察沿途发现与搜集的数千枚钱币几乎全部交给卢浮宫博物馆；在庫车绿洲克里希发现的一百来枚钱币则入藏于国家图书馆钱币、纪念章、古玩部。国家图书馆抄本部（写本部）在 1954 年 9 月 15 日得到了东方收藏品中最丰富的一次赠藏，即伯希和所获的敦煌文献。^{①①}

根据目前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现将伯希和搜集品的编号和数量简介如下：

猿援汉文 以“伯希和汉文”编号，从 ~~国国~~—~~国国~~号，中间有多段空号，还有少量失号（“失号”往往与拼合、改编等有关，不一定是真正遗失），实存 ~~国国~~号。

猿援藏文 由马赛尔·拉露整理，以“伯希和藏文”编号，~~国国~~—~~国国~~，实存 ~~国国~~号；未经整理的文献暂编号为 ~~猿国~~—~~猿国~~ 共计 ~~猿猿~~号。

猿援梵文 敦煌所得 ~~猿猿~~件；又有得自新疆地区的梵文文献，总计约 ~~猿国~~余件。

源援焉耆——龟兹语 总计近 5000件。

缘援于阗文 共计 500件。

远援粟特文 共计 500件。

苑援回鹘文 500件。另有从 500号窟（敦编 500 发现的回鹘文文书 500号。

愿援西夏文 出自伯希和编第 500 500号窟，共计 500件。

怨援希伯来文 500件。

员援伯希和新疆都勒都尔·阿护尔汉文文献 500件。^{⑩2}

综上所述，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共约 5000件，其中敦煌文献约 5000件。

伯希和来敦煌盗劫文书，虽然比斯坦因晚一年，但比斯坦因有着更优越的条件。他懂得汉文、俄文、藏文、突厥文等十多种文字，特别是他多次来中国，并于 500—500年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对汉文尤为熟悉，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正是由于伯希和的汉学知识渊博，所以，他窃去的敦煌遗书，在数量上虽然没有斯坦因多，甚至没有俄国人盗走的多，但却是敦煌遗书中最菁华的部分，其中有许多孤本。

敦煌遗书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却大部分为伯希和所得。据有的学者统计，在伯希和原编的 500号草目中，标有年月的有 500件，占 500，即将近五分之一；斯坦因所窃部分，有年月的卷子占 500，不到伯希和的四分之一；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仅占 500，是伯希和的三十二分之一；俄罗斯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为 500，是伯希和的十四分之一。“人所共知，卷子上的年月记载完整多半表示卷子的首尾较少残缺，有纪年的卷子对于科研的价值自然大为增高。只此一端，人们也可以体会巴黎所藏卷子的重要性”。^{⑩3}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卷子约占 500以上，所以有人称敦煌遗书为佛教遗书。世俗文书，即直接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非佛教经

典，数量很少，但伯希和盗去的卷子中这部分的比重却很大。目前法国所藏的世俗文书数量最多，研究价值最大。据统计，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愿缘~~以上为佛经卷子；英国所藏的佛经卷子约为 ~~愿缘~~；俄罗斯所藏的佛经卷子也为 ~~愿缘~~；而在巴黎所藏的 ~~猿四~~卷汉文卷子中，佛经仅占 ~~远缘~~左右，约为 ~~圆缘~~卷。^⑩由此可知，伯希和所盗的敦煌遗书中，佛经的数量最少，世俗文书的数量最多。

伯希和最后于 ~~员四~~年 ~~元~~月 ~~圆~~日回到巴黎，其后他立即与老师沙畹等共同研究他所带回的文书。并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了《甘肃发现的一座中古书库》，详细介绍了其盗劫敦煌遗书的经过。同时，伯希和还着手编写所窃敦煌遗书的目录。二十年代初他就把其中的一部分编成了一本目录，共著录了 ~~员猿~~个汉文卷子，即从 ~~圆四~~—~~猿~~号，以及从 ~~源四~~—~~猿~~号，在六十年代以前，这个目录一直是参考巴黎敦煌遗书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为什么伯希和的目录从 ~~圆四~~号开始呢？这是因为他所窃遗书中有许多藏文卷子，当时估计有二千卷。故 ~~圆四~~号以前的序号是他生前留给藏文卷子的估计数字。

事实上，藏文手稿不止 ~~圆四~~号，因此法国国家图书馆在后来的编目中，便采用了写本部通行的原则，即以收藏品的文种分类。为了保持总体的统一性，每种前都冠以伯希和的姓氏，即孕

在编目工作中发现，有一部分文献是用两种文字书写的，通常正面是汉文，背面是藏文。在为伯希和藏文收集品编目时，改动了编在汉文收集品中藏文文献的原来编号，使这些文献归入藏文收集品中。

其他文字如粟特文、于阗文或回鹘文文献，数量不多，很早就编在 ~~猿四~~号以后了。因为当时伯希和认为，有 ~~员四~~个编号就足够汉文文献使用了，所以就将 ~~圆四~~—~~猿~~号留给了汉文文献。

目前，法国国家图书馆正在集中力量，对伯希和收藏品全面整理编号，并与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名，从 1982 年开始，陆续出版法国所藏敦煌西域文献。

除了文献外，伯希和还携去了一部分艺术品，包括 1000 余幅图画、100 尊木雕、丝绸和其他纺织品残片。由于伯希和窃去的文书都是精品，价值极大。而艺术品数量少，价值也没有斯坦因盗去的大，因此人们对法藏敦煌艺术品都不大留意。实际上，伯希和所获艺术品虽然数量不多，但也不乏珍品。如吉美博物馆中有两幅关于阿弥陀天堂的画和许多断片，其中一幅可能是最古老的可移动的图画，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内一幅出自八世纪的佛说法画十分相似。吉美博物馆的这幅画，堪与日本奈良法隆寺正殿内的画媲美，是现存敦煌唐代绘画中最美丽的作品之一。另外，法藏水月观音、救苦救难观音、降魔变等画和一些木刻、木雕像，也是很有艺术价值的。^{①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希和应征入伍，整理、研究敦煌遗书的工作暂时停顿。大战期间他曾出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1915 年回到西伯利亚。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巴黎，在法兰西学院工作，该院专为伯希和开设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1916 年 12 月 20 日，被选为法国碑铭与古文字学院院士。1917 年，巴黎大学成立高等汉语学院，伯希和被任命为中国语言学、文字与艺术教研室教授。从 1917 年起，伯希和又负责主持关于远东研究的重要刊物——《通报》。1923 年，他又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并担任前苏联列宁格勒科学院的院士。1928 年，被聘请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支持盟军，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于 1945 年 12 月 10 日因患癌症去世。

1923 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不仅世界的反法西斯战

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法国汉学史上也是发生了巨变的一年。在这一年前后，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最杰出的三位汉学家先后去世。除了伯希和外，葛兰言死于1939年，马伯乐也于1940年惨死在德国的集中营里。

五、姗姗来迟的橘瑞超

当英国人、法国人都来敦煌盗宝时，日本人也不甘落后，便组织了大谷光瑞考察队，来我国西北盗劫文物。

大谷光瑞考察团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外流

早在1909年的罗马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中亚细亚探险的国际组织。1910年，在德国汉堡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到会者有英、法、德、俄等国学者。斯坦因报告了在中国西北和发掘的经过及取得的成绩，各国会员决定成立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总会，由各国派遣探险团体到中亚及远东各地探险。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许多国家的学者还公布了中亚考察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而使我国西北地区更加成为东方学家和探险家们注目的地方。各国组织的考察队，不断来我国西北地区，由此形成了一股争相考察中国西北的热潮。对此，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便由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大谷光瑞组织考察队，来我国西北进行考古发掘。

当时来中国西北考察由于路途遥远，沙漠戈壁，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有时甚至骆驼也无法行走，因此一般都需要的时间较长，大多是几年。这样长时间的野外考察，没有相当的财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欧洲各国的考察队都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资助、支持下进行的。与此不同，大谷光瑞考察团则是京都西本愿寺第14代宗主大谷光瑞（1868—1940年）个人的事业。当时，

他作为西本愿寺法主明如上人的嗣子（后又接任法主职位），有近一千万信徒施舍财物为基础，不存在经费问题，便组织了三次赴中国西北考察的探险队，所以我们一般将日本考察团称为大谷光瑞考察队。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门开放，与外界的交往日渐增多，随着对外界的了解和认识逐渐深入，日本佛教界对欧美基督教的传播感到不安。同时，十九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界利用梵文、巴利文、藏文原典研究佛教的成绩，对建立在汉文佛典基础之上的日本佛教界，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为了应付这种形势，西本愿寺于 1884 年派高楠顺次郎到伦敦，从马克斯缪勒学习梵文；1885 年，第 10 代宗主大谷光尊派其子大谷光瑞前往伦敦等地，考察各国的宗教情形。当时的欧洲，伦敦、巴黎、柏林信息灵通，特别是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是世界地理学上的一个情报中心。大谷光瑞不仅可以看到梵文学家霍恩宁于 1858 年在加尔各答刊布的梵文佛典《鲍威尔写本》，而且，1867 年巴黎出版的杜特雷依·德兰斯《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1846—1848）》、1880 年伦敦出版的斯文·赫定的《穿越亚洲》，1885 年斯坦因发表的《关于新疆考古学与地理学探险旅行的初步报告》等最新的考察收获，也会极大地吸引大谷光瑞的注意力。而大谷光瑞到伦敦时，正是斯文·赫定、斯坦因考察成功，大出风头之时，这也会大大地刺激他。正是由于这许多因素的组合，1885 年 1 月，当大谷光瑞从伦敦回日本的时候，便决定亲历西域，利用归途在中亚考察，从而揭开了日本考察中国西北的序幕。

大谷光瑞在伦敦停留的 1885 年，京都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小川琢治作为地质调查所成员也在欧洲旅行、访学。当“小川琢治在伦敦访问光瑞的时候，西本愿寺的留学生正计划通过中央亚细亚回国，这时候小川琢治也想同行，但由于他系官费旅行有时间的限制，未能成行。大谷光瑞、渡边哲信、堀贤雄，意气风发，

如果地理学者小川琢治参加了中央亚细亚的旅行，见到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一定能够为当时的日本获得更详细的资料。实在遗憾！”⁽¹⁰⁶⁾

光緒二十六年 閏月 癸卯日，大谷光瑞率领随行人员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自伦敦出发，经柏林、莫斯科，乘火车东南行，然后越帕米尔，于 閏月 癸卯日到达喀什噶尔。在这里他们决定分兵两路，渡边哲信和堀贤雄留在新疆，在西域考察，光瑞、井上弘圆、本多惠隆三人去印度考察佛教遗迹。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到塔什库尔干为光瑞等送行，得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帮助。当时英国为了与俄国争霸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为了能够对新疆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开拓了纯粹的军用道路，外国人不得涉足。恰好 光緒二十六年 閏月 癸卯日缔结了日英同盟，光瑞由于和皇室的特殊关系（其妻筹子是贞明皇后之姐），便通过皇家获得了由此通过的特别许可。⁽¹⁰⁷⁾随后光瑞得到了父亲光尊逝去的讣告，急忙回国，继任为西本愿寺第 四代 宗主。而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则继续进行西域考察，因此，大谷光瑞考察团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是渡边哲信和堀贤雄进行的。

渡边哲信和堀贤雄送走光瑞等人后，便于 光緒二十六年 閏月 癸卯日到达和阗，然后又北上阿克苏，癸卯月到达古迹众多的库车，对其周边克孜尔、库木吐拉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苏巴什等古遗址，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考古调查。癸卯月 癸卯日到达吐鲁番，发掘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据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记载：“考察高昌故城，为西域所见最大城址。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博士在这里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遗址内有一座大塔，周围规整地排列着许多小塔，我们拍摄了照片。……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了一块残石碑”。“出吐鲁番城西门西行，……也有一座大的故城遗址，佛寺废墟很多，可见千古佛教三宝之隆盛。……河谷断崖上保存有石窟，是往古的千佛洞之一。根据地理方位判断，这里就

是《西域图志》中所记招哈和屯，故城遗址是汉代的交河城无疑”。^⑩渡边的日记虽然没有注明他们在库车、吐鲁番的收获物，但从日本所藏大谷探险队劫获的文物可知，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考察吐鲁番后，他们于 1908 年 缘月到达乌鲁木齐，再经哈密、兰州、西安，于 1909 年 缘月携带收集品回国，从而结束了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中亚考察（1908—1909 年）。

西本愿寺的第二次西域探险，开始于 1908 年，这次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前往中国西北。他们于 1908 年 远月 缘日从北京出发，出张家口，北越戈壁，进入外蒙古，考察了鄂尔浑河畔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的遗迹。然后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南下鄂尔多斯，越阿尔泰山，考察了天山北麓的唐王朝北庭都护府遗址。1909 年 缘月 缘日，考察队进入乌鲁木齐，1909 年 月初到达吐鲁番，他们对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木头沟、伯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等古代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劫获了丰富的宝藏。

1909 年 缘月，他们两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下罗布泊，考查了楼兰古城，然后沿南道西行，到达喀什噶尔。野村荣三郎则沿着北道，经库车、阿克苏，于 苑月到达喀什噶尔，与橘瑞超会合。然后他们在叶城和莎车做了些零星的发掘后，于 怨月 猿日离开莎车前往印度。1910 年 缘月 缘日翻越喀喇昆仑山，1910 年 缘月 缘日到达列城，1910 年 缘月 缘日在斯利那加与在克什米尔访问的大谷光瑞会合后便返回日本，从而结束了大谷光瑞考察队的第二次中亚探险（1908—1910 年）。

第二次中亚考察是日本三次西域探险收获最大的一次，但由于橘瑞超的旅行日记在发表之前失火烧毁了，而其演讲稿《新疆探险记》则没有描述详细的发掘情况。幸运的是，野村荣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记》由于收入《新西域记》而保存了下来，从而使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了解他们在吐鲁番地区的考察活动。

大谷光瑞考察团第二次中亚探险，除了吐鲁番地区的考古活动外，还有一重要的活动，即橘瑞超在楼兰的考古发掘。

吐鲁番考察结束后，他们于 圆月 圆日到达库尔勒，然后野村沿着天山南麓，沿途发掘、调查，前往喀什噶尔，而橘瑞超则向南横穿罗布沙漠，寻找楼兰。为什么橘瑞超的目的如此明确，一定要去楼兰呢？

当时的楼兰，还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斯文·赫定在其报告中说古代楼兰王国是信奉佛教的，法显的《佛国记》中也讲到楼兰（鄯善国）有四千多僧人，全是小乘教。但其信仰的是哪宗的佛教？其艺术形式如何？却不得而知，作为佛教组织的西本愿寺，自然想知道得更清楚一些，因此，大谷光瑞便指示橘瑞超前往楼兰，更加详细地调查佛教遗迹。

众所周知，国外最早提到楼兰，是在斯文·赫定的考古报告中，他于 员圆年 猿月发现了楼兰。后来斯文·赫定将其游记《中央亚细亚与西藏》员圆年的英译本寄赠给大谷光瑞，光瑞特意复信感谢。后来斯文·赫定又给光瑞寄赠了其学术报告《中央亚细亚旅行的科学报告》（员圆—员圆年）第一卷《塔里木河》。但有关楼兰的一些问题仍然是大体的推测，仅仅根据旅行记来判断其正确位置是很困难的。因此光瑞很想通过赫定了解详细情况。

员圆年秋，大谷光瑞听说赫定结束西藏探险后到了印度，他便致电祝贺并劝说赫定来日本一游，大谷光瑞的邀请得到了东京地理学会和文部省的支持。斯文·赫定也接受了这一邀请，于 员圆年 员月到日本访问。 员月 圆日赫定到了京都，受到了西本愿寺的热情接待。当晚赫定就住在了西本愿寺。橘瑞超的学生金子民雄认为，当赫定住在西本愿寺的这一天，光瑞必定要向斯文·赫定谈到，现在 员愿岁的橘瑞超正在中亚旅行，想让他进入楼兰，怎么才能到达那里？当时除斯文·赫定外，斯坦因也于 员圆年进入楼兰，并在他们的报告中报道了这一情况，因此楼兰已经

不是秘密了，于是斯文·赫定便仔细回答了光瑞提出的问题。赫定在京都共逗留了十天，于 1908 年 10 月 10 日离开京都，赫定离开的第二天，即 1908 年 10 月 11 日，光瑞就给在吐鲁番的橘瑞超拍了电报，告诉他楼兰的位置：东经 89 度，北纬 39 度。^{①09}

橘瑞超在楼兰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探险，获取了一批极为重要的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柏文书》。关于“李柏”，《晋书》卷 87《张轨列传》曰：“咸和初，……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犍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此事在《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卷》中也有记载，并且将“咸和初”具体记为“咸和三年”（公元 332 年）。张轨原为西晋的凉州刺史，西晋灭亡后，张轨为了表示对西晋的效忠，仍使用西晋愍帝的建兴年号，而不用东晋的建武年号。张轨死后，其子张寔、张茂一直占有凉州，到其孙张骏于公元 346 年掌握政权后，便称凉王，史称前凉。李柏原为西晋西域长史，后归属前凉，赵贞为西晋戊己校尉，驻古高昌地。橘瑞超所发现的“李柏文书”，正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两纸首尾基本完整的信稿及与信稿有关的断片。

大谷光瑞探险队第三次中亚探险，开始于 1908 年，结束于 1909 年，是西本愿寺的最后一次远征。第二次探险结束后，橘瑞超便随大谷光瑞游览了埃及、罗马、伦敦。在欧洲，他会见了斯坦因，受到了不少教益；访问了瑞典，会见了斯文·赫定；又从法兰西的伯希和、德意志的勒柯克等人那里得到了各种有关中亚的最新情况和知识。1909 年 1 月，橘瑞超携雇佣的仆人、英国人霍·布斯，经圣彼得堡、西伯利亚进入我国新疆，他首先到吐鲁番，进行了一个月的发掘。到了 1 月上旬，他便让霍·布斯携带吐鲁番的发掘品前往库车等自己，而橘瑞超本人则又去上一次发现“李柏文书”的楼兰，剥取了米兰遗址壁画。1909 年 2 月

月，他从且末出发，从南往北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历时 16 天，到达塔里木河畔。原计划在库车与吐鲁番分手的英国青年霍·布斯相会。到达库车后，得知霍·布斯患天花死去，遗体运到喀什，寄放在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里。橘瑞超便赶往喀什，埋葬了霍·布斯。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了日本来的电报，得知大谷光瑞法主的夫人筹子去世了。“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此时此地，接到这封悲伤的电报。刚刚失去了霍·布斯，现在贵夫人又去世了”。^⑩在喀什呆了二十多天后，他便于 1906 年 1 月前往和阗发掘古物。1906 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国内局势比较混乱，同时，已较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有些焦急，便于同年年初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汉口、兰州，于 1906 年 10 月 20 日到达敦煌，拍摄了敦煌千佛洞的部分洞窟。这时，橘瑞超装扮成维吾尔人也正由若羌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上了一个从敦煌回来的维吾尔人。那人说：“敦煌有一个日本人，滞留三四个月了。说罗布方面有一个日本人要来”，“另外一个日本人是从若羌方面来的”，“我带着那位日本人的一封信”。由于橘瑞超扮作维吾尔人，并用维语和他交谈，故维吾尔人不知道橘瑞超是日本人。橘瑞超接过信一看，信封上是中国若羌官府、背面署名吉川小一郎。便对那人说：“我知道他们正找的那个日本人，过二三天带着骆驼队也顺着这条路来，我就是那个日本人雇的先遣人员，让我把这封信转交本人吧。交给若羌官员的话，本人已经不在在了”。那个维吾尔人走后，“我立即打开信，我深入西藏高原的时候，中国发生了革命，法主大谷光瑞师担心我处境危险，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于是向驻在新疆的各国领事馆打电报，委托北京政府，做了各种努力寻找我的踪迹，由于我生死不明，特意派吉川小一郎来中国寻找”。^⑪

得到这一信息后，橘瑞超便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向敦煌赶去。1906 年 11 月 15 日，在敦煌与吉川小一郎相会。12 月中旬，

橘瑞超参观了千佛洞，但敦煌遗书经斯坦因、伯希和盗劫后，中国政府又将剩余部分运到了北京，这样敦煌就没有大批遗书供他们搜集了。“我和吉川君一起搜集古物，发掘古城址等，由于时间关系而未充分获得研究资料，是很遗憾的”。“我搜集斯坦因博士拿剩的东西，以及寺僧们隐藏放置的东西，先后带回国来”。^⑪

在敦煌时，大谷光瑞就已命橘瑞超回国。“根据法主的命令，中国处于革命动乱中，经北京回国是很危险的，要取天山北路到俄国鄂木斯克，从那里坐火车走西伯利亚干线火速回国”。但橘瑞超不甘心随意放弃在中国的探险，他让吉川先去吐鲁番，自己则想“由安西沿北纬 40 度经阿拉善蒙古到鄂尔多斯的归化城附近探险”。当他到安西时，又收到了两份电报：“如果到达安西，应中止在中国内地的旅行，立即回日本”。^⑫这样，橘瑞超便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就赶上吉川小一郎，一起经哈密到了吐鲁番。他们在吐鲁番发掘了一些古物后，决定吉川继续留在吐鲁番工作，橘瑞超则到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的俄国领事馆里，俄国领事对橘瑞超说：“我国驻东京大使，受大谷光瑞伯爵的委托，搜索你的消息；日本驻俄国的本野大使也委托我国外交部，寻找你的行踪。一直得不到消息，听说安西出现一个日本青年，我想可能是你，立即发去了电报。中国现在发生革命动乱，在内地旅行是很危险的，大谷伯爵希望你尽快平安回国。由乌鲁木齐立即北上取道西伯利亚干线回国，路费由本领事馆为你准备”。^⑬这样，橘瑞超便经西伯利亚铁路回了日本。^{大谷光瑞} 1906 年 4 月，吉川小一郎也离开吐鲁番，经焉耆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遗址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肃州等地，于 1906 年 5 月回到北京。从而结束了日本第三次中亚探险（1904—1906 年）。

与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斯文·赫定等考察团不同的是，大谷光瑞考察团既不是由博物馆等学术团体资助派遣，其成员本

身也不是学者，尤其是他们的考察范围很广，似乎不像他们所标榜的仅仅是为了考察佛教遗址。因此，有人将日本的西域考察称为“间谍探险”，英国情报机关把橘瑞超看成间谍。甚至日本也有传闻说大谷探险队兼搞军事情报。对此，《大谷光瑞》一书的作者杉森久英说：“因为关系到当时的军事机密，所以公文书、证据等都没有留下。从光瑞先生不断的对亚洲问题的发言来看，从他和军人接触的办法等来看，那样的事实可以说当然是有的，没有的话才怪呢”？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说：“日俄战争（~~光瑞~~）前两年那种紧张状况中，带着大批行李要在俄国领土上旅行，被怀疑也是没有办法的”。^⑪

橘瑞超是否为日本的间谍？其中亚的考察是否应称为“间谍探险”？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比较可靠的材料。但从当时俄、英、日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野心，我们也还不能完全否定英国将其称为“间谍活动”的说法。

圆援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书

由于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多是一些年轻的僧人，没有受过基本的考古学训练。同时，虽然他们写有一些日记或旅行记，却没有出土文物的详细记录，从而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尤其是日本的收藏，特别分散，其收集的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已相混淆，不大容易分别，再加上日本本身的整理工作不尽如人意，因而其数量一直模糊不清。下面我们主要以荣新江先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为线索，结合陈国灿、施萍婷等先生在日本走访、整理的有关内容和资料，综合叙述如下。

大谷光瑞考察团第二、三次劫获的文物，主要放在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六甲的别墅二乐庄（二乐庄，~~光瑞~~—~~光瑞~~年在六甲山麓营建的大谷家别墅，其中设有英国、中国、阿拉伯、埃及等室。~~光瑞~~—~~光瑞~~年作为寺院子弟教育机关附设武库中学），并曾

邀请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等学者参观研究。1910—1911年，橘瑞超首先编辑刊印了《二乐丛书》1—10号，当然以佛经为主。1911年 12月，曾在二乐庄举办“中亚发掘物之展览”，国学大师罗振玉由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时正亡命于日本，他也曾前去参观，并从橘瑞超处抄得其所编《敦煌将来藏经目录》，题为《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发表于《国学丛刊》卷九上。1912年 12月，香川默识将大谷探险队三次所获文物、文书，选出一些有代表性者，编为《西域考古图谱》一书，刊布了敦煌吐鲁番文书 1—10号，这是大谷探险队所获社会历史文献的首次公布。

1912年 12月，由于西本愿寺内财政问题，以及别墅二乐庄的建筑，武库中学的经营被指为浪费，大谷光瑞被迫辞去西本愿寺的法主职位，决意外游。他曾到过上海、旅顺、大连、台湾、南洋等地，从事讲演和著述活动，大谷收集品也随之陆续分散到中、日、韩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1912年 12月，随着二乐庄的住宅出售给久原房之助，一部分文物也归久原氏所有。随后不久，久原氏就将这批文物赠给了同乡、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因此便移存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即今汉城博物馆。

大谷探险队劫获的文献资料，大概是由于大谷光瑞本人以后长住大连的原因，而运到了旅顺。1912年，由“满铁”将这批资料交给了将于 1912年 12月开馆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保存。1912年 12月，“满蒙”物产馆更名为关东都督府博物馆；1913年 12月，又改称关东厅博物馆，1914年 12月，又改称旅顺博物馆。《新西域记》下卷（1912年 12月出版）附录收录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著录了敦煌汉藏文写经 1—10件，还有部分新疆出土的文物文献。这个目录反映了 1912年以前旅顺博物馆收藏大谷文书的基本情况。

旅顺博物馆所藏敦煌西域文物，在 1945 年日本战败，前苏联红军接管该馆之前，就有相当一部分被运回日本。1945 年 9 月，前苏联将旅顺博物馆交中国政府接管后，便更名为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1950 年 1 月，文化部将该馆所藏敦煌汉藏文写经 2000 件上调，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只留下 200 件敦煌写经供展览之用，而西域文献和文物资料，仍由旅顺博物馆保管。

日本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最多者，当推京都的龙谷大学。由于这批文献来自大谷探险队而习惯上称之为“大谷文书”。随着大谷光瑞辞去法主职务，虽然一部分敦煌吐鲁番文书流散出来，但大部分还是收藏在西本愿寺的书库中。1950 年 10 月大谷光瑞去世后，在西本愿寺整理其遗物时，从仓库中发现了两个大木箱，上有“大连关东别院光寿会”字样，其中装有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吐鲁番文书、木简、绢画等。1951 年春，按照大谷光照门主“希望对古文书进行综合性调查研究”的嘱咐，将这批材料移交给西本愿寺办的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为此，龙谷大学图书馆于 1951 年建成了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书库——“龙谷藏”。“龙谷藏”室内有三大柜，每柜由上到下有若干小抽屉，按顺序每个屉内放有文书，它们都是按一件或数件装入玻璃纸袋后，再装入牛皮纸袋的，藏室安全干燥。现在“龙谷藏”中的大谷文书，已全部附上了整理号码，即从 1001—1000 号，这中间还有若干空号。全部文书分为五组：第一组是汉文及回鹘文资料，编号为 1001—1000 号；第二组是藏文书写的残片，编号为 1001—1000 号（1001—1000 号为空号）；第三组文书全是西域古代文字断片，其中大部分也是回鹘文资料，编号为 1001—1000 号（1001—1000 号为空号）；第四组是胡、汉两种文字的文献，这些文书都是在纸的正面用汉文书写（几乎全是佛经），纸的背面用回鹘文、梵文、佉卢文、突厥文、粟特文书写，编号为 1001—1000 号（1001—1000 号为空号）；第五组是《西域考古图谱》所

发表文书的一部分，编号为 愿四—愿五号（愿六—愿四号为空号）。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组文书的 愿四—愿五号的 猿件文书，皆为李柏尺牒稿残片。

“龙谷藏”除以上主体部分外，还收藏有：（员）“橘文书”，橘瑞超本人曾把部分存放在旅顺的收集品带在自己身边，后来也交给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这些文书被统称为“橘文书”。其内容由佛经 圆件、汉文文书 猿件、西域文字文书 猿件共 缘件组成。（圆）吉川小一郎曾将一些佛经残片共 猿片贴成一本取名为“流沙残阙”，后来也送给了“龙谷藏”。（猿）大谷残片，是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中残剩下的一些极小的碎片，约有 远片。

当龙谷大学得到大谷文书后，便于 愿缘年 员月组成了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并接受了文部省拨发的研究经费。研究会由龙谷大学校外二十几名研究人员组成，分为佛教、历史、胡语、美术四个部门，从而推动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愿缘—愿源年间，陆续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六卷七册，即 愿缘年出版的第一卷《敦煌佛教资料》；愿缘年出版的第二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愿源年出版的第三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愿源年出版的第四卷《中央亚细亚古代语文文献》；愿源年出版的第五卷《中央亚细亚佛教美术》；愿源年出版的第六卷《历史与美术诸问题》。这套书收集了数十位日本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是对大谷光瑞探险队三次考察活动在佛学、历史、考古、地理、文化、美术等方面最早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汇编，被学术界誉为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其中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论文，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织翻译为汉文，编为《敦煌学译文集》，作为敦煌吐鲁番学译丛之一，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 愿缘年出版。

综上所述，《西域文化研究》大量刊布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同时还对一些相关连、内容相近的文书经专家之手作了许多拼接

整理。然而，这些成果仅仅是对易于归类成组的文书作的专题研究，并非是对大谷文书全面的整理研究。1949年，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决定编纂出版“龙谷大学善本丛书”，由小田义久教授承担大谷文书中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他全面吸收了此前学术界对大谷文书研究的成果，按编号逐一对文书作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录文，并给以标题，同时系统刊布了文书的图版，1950年出版了《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收集了 551号—600号文书；1951年出版了《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收集了 601号—650号文书。正在编辑中的第三卷，将收入 651号—699号中的汉文文书。

除龙谷大学外，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藤井有邻馆、三井文库、唐招提寺、大谷大学、宁乐美术馆、静嘉堂文库、天理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法隆寺等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其中不乏珍品，如藤井有邻馆第 154号“唐敦煌杂写一卷”内有“旌节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文中的宋光庭即 孕圆猿《张淮深墓志铭》中提到的“中使宋光廷”。荣新江先生已利用这一记载，探明了唐朝授予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旌节的年代，解决了归义军政治史上的一大疑难问题。^⑪另如第 551号文书《唐金满县牒上孔目司为开元十六年税钱事》是存世极少的唐北庭都护府所属金满县的文书。原件共存 缘行，上有“金满县印”，内有“合当县管百姓行客兴胡总壹阡柒佰陆拾人”，它把百姓、行客、兴胡列举为当县所管人口的三个组成部分，对我们更进一步探讨唐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地方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的启发。

六、不甘落后的鄂登堡

当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都来敦煌盗宝时，俄国人也不甘落后，积极筹措，前来“分享”珍宝。事实上，早在 1886 年沙俄军官出身的普尔热瓦斯基在第三次中亚探查行纪中，就已经提到千佛洞；罗波洛夫斯基在 1894—1895 年探查报告中也简略提到了千佛洞，而沙皇俄国劫掠敦煌遗书的代表人物则是鄂登堡。

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

鄂登堡对敦煌遗书的劫夺，是在所谓的“俄国委员会”^⑪主持下进行的。

“俄国委员会”是号称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的简称。十九世纪后半，西方各国的考察家、探险家已多次涉足中国的西北地区。其中俄国考察家曾来敦煌考察的就有：1885 年 勾·晕·普尔热瓦斯基考察团和 1894 年罗波洛夫斯基考察团。它们对敦煌石窟作了考察，并在报告中作了简单的描述，但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兴趣。

1895 年，由于 悦·鄂登堡的建议，俄国考古协会东方分会向俄国驻喀什噶尔^⑫领事 勾·彼得罗夫斯基询问有关西域（新疆）存有古代文书事宜。彼得罗夫斯基回答说：他已在多处发现佛教艺术古代文物，因而必须立即派遣俄国考察团对那些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区域进行考察。1896 年，俄国地理协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向东亚派出了由克列门兹率领的第一支科学考察团，并获得了许多考察成果，它给彼得堡带回了古代文物、公元一世纪佛教艺术以及汉文、藏文与梵文经卷样品。鄂登堡便根据彼得罗夫斯基和克列门兹所获材料，提请沙皇政府组织一支西域（新疆）

综合科学考察团。可是沙皇政府并未立即答复。^⑪ 1890年 5月在罗马举行了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俄国东方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盗掘活动和劫走的文书，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垂涎，会上一些人“吁请”俄国政府及有关机构继续进行克列门兹的工作，拉德洛夫遂向大会提出了建立一个国际协会的提议。他的提案被通过，于是决定成立“中亚和远东^⑫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而以彼得堡俄国委员会为协会的中心委员会，俄国学者受委托拟订协会的章程草案。1891年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东方学家大会审查批准了这一章程草案，并由拉德洛夫和鄂登堡负责筹组俄国中心委员会。1891年 6月，俄国委员会的章程草案经沙皇批准生效，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遂告成立，并由俄国财政部拨款五千卢布作为经费。

“协会”以及它的“俄国委员会”的出现，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早在十九世纪中期，英、俄帝国主义者利用新疆境内发生的少数民族起义，企图进一步阴谋染指我国西北边陲，因此就需要了解我国西北部的地理和历史，而沙俄军队对伊犁地区的侵占，则有助于俄国学者、商人、军官、旅行家自由进入这一地区。其他经过中亚和中俄边境前往中国西北部的外国人也都需要得到俄国方面的协作，而俄国也需要外国学者的研究作为交流，这就是成立国际中亚和远东协会及其俄国中心委员会的背景。正如日本敦煌学家金冈照光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南进要求海港”，英国也向中亚挺进，“以与俄国对抗”，“这种中亚探查的流行，是十九世纪后半列强政治意图的结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⑬ 于是沙俄政府以“科学考察的赞助者”的姿态出现，协助其他各国学者到中国西北考察。沙皇政府的眼前目的，显然就是“与学术界分享资料”。^⑭ 这样，所谓“俄国委员会”就成为沙俄政府插手的在中国西北等地窃取科学情报的前哨组织。

“俄国委员会”是这样—个组织，即会章所声明的宗旨：“团结研究远东和中亚的俄国学术机关的代表们和（政府）各部的代表们。从而比负有更广泛任务的其他学术机构更能积极地从事有关中亚和东亚的研究工作”。就是广泛利用有学术兴趣的学者们的力量以组织一支专门队伍为帝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完成学术研究的任务。会章第一条规定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现存古迹，向当地人士和机构探明，首先应该研究那些古迹，在不远的将来应对那些民族作语言学和民族学方面的研究，以便进行“科学上的抢救”。所谓“抢救”，实质上就是盗掘、抢劫由于气候特殊而保存下来的古代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稀世文物和刺探各种情报。委员会的人员组织也十分明显地证明它是帝俄政府一手策划的以学术为幌子的殖民主义先遣队。会章规定，委员会由科学院、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考古委员会、地理学会、俄国考古学会及宫廷事务部、外交部、陆军部、财政部、国民教育部、内务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并置于外交部的直接管辖之下，外交大臣有权确定委员会成员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两名秘书的人选，委员会成员中宫廷事务部的代表是俄国殖民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陆军部的代表是总参谋部亚洲处主任瓦西里耶夫少将，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主任茹科夫斯基，秘书为巴托尔德院士和民族学家施坦贝格，重要的俄国东方学家都参加了委员会。

“俄国委员会”从 1908 年成立到 1915 年结束，其实质性活动是派遣个人和考察队进行考察，它策划了一系列在我国的“探查”活动，委员会发起人之一鄂登堡的两次中国西北之行，也是由它派遣的。

鄂登堡与敦煌盗宝

鄂登堡（1858—1920 年），是沙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

士的门徒。他 1883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研究梵文和佛学，1895 年成为沙俄科学院院士，1896 年起任科学院常务秘书，1897 年任亚洲博物馆馆长，^⑫ 1897 年又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中当过“教育部长”，他是劫夺中国敦煌遗书的主谋者和急先锋。^⑬ 早在 1894 年 5 月 1 日，协会就接受了鄂登堡“关于装备克列门兹领导的吐鲁番、库车考古考察队的建议”，政府也赞同这一决定，并拨出一项专款用于考察，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俄国大规模的中亚考察未能实现。

1895 年，协会在皇室乡间行宫举办了一次有关东土耳其斯坦的展览，向展览会提供的艺术品和考古文物是俄国协会从边疆运抵的。这次展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乃决定拨出专款用以组织到东土耳其斯坦进行新的考察，并委托鄂登堡制定一个更大范围和规模的考察计划。1895 年 5 月 1 日，俄国协会就鄂登堡报告中拟定的研究计划和预算，决定组织一个以拉德洛夫为首其中包括维谢洛夫斯基、克列门兹、鄂登堡、什切恩别尔格在内的筹备小组，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讨。然后决定拨款 10000 卢布进行为期二年的考察。“而 1896 年只能拨出 5000 卢布，指派鄂登堡偕同杜丁和一个考古学家进行八个月的考察，第二年再派一个大一点的考察队，并预先从中国史料中收集有关古代地区的文献资料”，在 1896 年 4 月 1 日俄国协会的会议上，正式宣告政府同意这一计划。

1896 年 2 月 2 日，以鄂登堡为队长的俄国考察队正式从彼得堡出发，其队员有画家兼照相师杜丁、矿业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考古学家卡缅斯基、考古学家助手彼特连柯。当考察队于 2 月 20 日到达楚古恰克后，鄂登堡又雇了一名翻译——霍托，^⑭ 他们考察了喀什、吐鲁番和库车地区的古代遗存，盗掘劫走了大量考古文物，还进行了地形测量和绘图。鄂登堡就其考察结果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的一次会议上作了简单报告。这次

考察所劫取的文物和资料分存于爱尔米塔什博物馆^⑫和东方学研究所档案馆。

这次考察结束后，鄂登堡于 1894 年 9 月 24 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对考察工作进行了总结。会议遂决定：（1）在协会的《消息报》上刊登总结材料；（2）以协会的名义对考察队的全体成员以及给予帮助的人士致以谢意；（3）考察队运来的材料协会保有所有权。在 10 月 24 日的会议上，鄂登堡就搜集书籍、抄本、古物和民族学方面的文物情况作了演讲，并出示了考察队研究过的四本照片图册和古建筑的平面图图册。1895 年，鄂登堡公开发表了考察的初步研究成果报告，这个报告作为科学著作被俄国考古协会授予最高奖赏——一枚大金质奖章。

由于鄂登堡在新疆考察中劫获了非常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使沙俄更加垂涎中国西北的宝藏。再加上英、德、法、瑞典等国考察队都相继来到中国西北盗窃劫掠，沙俄政府绝不愿居人之下，便对俄国委员会的拨款骤增，到 1895 年竟达十万卢布。1895 年初，鄂登堡在俄国中亚与东亚委员会会议上，正式宣读了关于对中央亚细亚考察的方法。在 1895 年 10 月 24 日委员会会议备忘录上曾有如下记载：“鄂登堡指出，有些旅行——考察者的破坏性活动，根本无法谈及对历史文物与古代文献的研究，而是对其科学价值的破坏。他还提出，今后的考察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这些无与伦比的历史文物与古文献。根据 悦·鄂登堡的建议，选举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一个任务是……根据上述内容，起草告中亚与东亚研究国际协会各地方委员会书。”^⑬因此，委员会于 1895 年 9 月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考察队。

沙俄第二次考察队仍以鄂登堡为领队，成员除杜丁和斯米尔诺夫外，还有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及十名辅助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考察的地点是敦煌石窟。这是因为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人都在敦煌劫获了大量珍贵文书，鄂登堡怎甘落

伍呢？还在第一次新疆考察劫掠时，鄂登堡就对柯兹洛夫表示，他有前往敦煌的“宿愿”，现在得到了政府十万卢布的拨款，不是能够如愿以偿了吗？因此鄂登堡便于 1909 年 5 月率考察队来到我国敦煌考察劫掠。

鄂登堡到敦煌考察的借口是寻找对中国西北地区佛教艺术遗迹进行断代的可靠依据，其真实目的是劫夺千佛洞的稀世珍宝。为了窃夺、考察千佛洞，俄国协会组织了第二次赴中国西北的考察队。1909 年 7 月 10 日，协会同意了由鄂登堡制定的为时一年的考察莫高窟方案。这次考察的基本目的在于全面彻底研究古老的敦煌洞窟。为此，考察团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离开彼得堡之前，就制定了各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准确地绘制洞窟总体平面图、层次平面图、剖面图与正面图，确定了摄影对象，对特别重要的东西还要进行复描，并根据原定计划，尽可能详尽地进行洞窟描述。考察团的行进路线是：塔城——奇台——乌鲁木齐——安西——哈密——敦煌千佛洞，然后绕过敦煌，经红柳园返回哈密。^⑫而后，在完成预定任务的情况下，再前往吐鲁番绿洲，在那里一直考察到春天。^⑬俄国协会的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始于 1909 年 5 月 1 日，终于 1910 年 9 月底。在考察期间，俄国协会不时收到考察队在旅途和考察地寄来的工作情况报告。鄂登堡也定期给协会写信。他在 1909 年 12 月 10 日从楚古恰克寄给协会的信中，附有两件维吾尔抄本的片断。12 月 15 日，信寄自乌鲁木齐，12 月 19 日寄自哈密，12 月 24 日寄自安西，12 月 28 日和 1910 年 1 月 10 日寄自敦煌，最后一封信谈的研究结果。从 12 月 28 日到 1910 年 1 月 10 日，鄂登堡致卢德涅夫的所有信件和电报都谈到了考察队的工作和队员动身出发时的情况，这些信件和电报都在 1909 年 12 月 15 日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

考察队是 1909 年 12 月 10 日到达千佛洞的，鄂登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2 月 10 日与 悦 酏 杜金（即杜丁）到达千佛洞，

顺便看了看洞窟。源点两轮车来。全都参观了，印象颇深”。到达的前三天是总的参观，只是预备性地粗略地观看了一下洞窟，以便确定工作的全部进程。当时决定不再为洞窟另行编号，而是照着伯希和的编号编下去，结果只是对伯希和编号中未曾编入的洞窟作了补充。又发现了三个洞窟，分别用 粤 月 悦作了标志。而后绘制平面图，制作壁画残片和记述洞窟情况、拍照。根据考察，他们确认“古代洞窟的凿成时间是 员缘园 多年以前，壁画保存至今是由于气候干燥之故。”千佛洞的考察一直持续到 员缘缘 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关中国参战的消息，令他们恐慌不安，考察团只得匆匆结束考察，于 员缘缘 年 员月 圆日启程回返。他们在敦煌期间，偷绘了 源 个洞窟的正面图，拍摄了二千多帧照片，劫走了多种壁画（片断）、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和写本。

在敦煌考察期间，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的装饰壁画，进行摄影、复描、绘画及其他工作。鄂登堡交给杜丁一份摄影清单，所列均为他认为必需拍摄之物，而杜丁在其行程日记中写道：“详细内容基本由我自己选定，此外还补充了若干题目，均悉我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地确定洞窟彩画风格的。”另外，杜丁对时间不足，无法对壁画艺术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感到遗憾。^⑬

鄂登堡考察结束后，于 员缘缘 年 缘月 圆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出示了照片资料、部分平面草图，在洞窟发现的供印刷用的维吾尔活字，随后报告了研究结果。就在这次会议上，协会还接受了鄂登堡提出的建议，决定奖励那些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考察队队员，在 员缘缘 年 员月 圆日的会议上，鄂登堡向协会提交了由罗姆贝格在考察期间、主要是在千佛洞中所完成的彩色图画，这些画还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在莫高窟考察期间，考察团成员还对千佛洞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如塑像、窟檐、顶部、四壁和底部等，都力争用数字与字

母标明。鄂登堡和他的助手们所编的目录，与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可以互相补充。从总体上看，鄂登堡的目录详尽些，谢稚柳的《叙录》完整些。但有一点应该注意，即自 1908 年鄂登堡考察团离开敦煌后，无人看管的石窟继续成为外国人和邻近村落居民寻觅古董的目标，如美国人华尔纳就在 1908 年偷剥了一些壁画，运走了一身塑像；白俄士兵还在洞窟中住宿，使许多壁画被严重熏黑。再加上自然的破坏，石窟的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正是从这个角度说，鄂登堡的目录与伯希和的石窟笔记和照片一样，具有特殊的价值，即可以看到本世纪初的原貌。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说，鄂登堡在敦煌盗窃的遗书，是其“借助于现代科学方法，在发掘 1908 年已经以为是空了的莫高窟藏书室时，发现了这些写本，并于 1909—1910 年俄国进行的土耳其斯坦考察中，合法地运了来。”⁽¹³¹⁾所谓“发掘”，这是违背敦煌遗书之发现基本常识的。前苏联另一学者蒙西科夫说：鄂登堡“成功地从当地居民中间搜集了许多写本”，他认为发掘工作在鄂登堡的搜集中很可能仅占无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写本是从敦煌地区居民的手里所获取的。⁽¹³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前苏联所藏敦煌遗书，为什么大部分是碎片，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 1908 年北京政府运走敦煌文书时，把许多文献，主要是一些碎小的遗书都遗弃而留下来了。另外，政府当局对藏文文献毫无兴趣，也没有收集运走，就在当地遗留了大量的藏文文献，从而使鄂登堡也劫获了一部分藏文文书。⁽¹³³⁾

鄂登堡考察团在敦煌的考察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员) 鄂登堡旅行日记和其他考察人员笔记两本。

(圆) 关于莫高窟洞窟的著录，共著录洞窟 员苑个。著录笔记共 远本。

(猿) 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用描图纸作的线描图。

(源) 杜丁关于敦煌壁画的笔记。

(缘 全部摄影黑白图片资料约 圆张。

(远 实测图和平面图。^⑬

鄂登堡考察团返回彼得堡后，他们的资料分成两部分：写卷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藏；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等存放到俄国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各博物馆，后来几经搬迁，现全部收藏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宫殿沿岸街 獠号，是俄罗斯最大的一座国家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该馆现设七个部：俄罗斯文化部、文化和艺术品部、东方文化和艺术品部（简称东方部）、原始社会文化和艺术品部、希腊罗马文化和艺术品部、科学教育部、修复保护部。东方部成立于 员年，成立初期称伊斯兰东方部。员年，古代东方部和拜占庭部与之合并，成为前苏联研究东方文化史的重要中心之一。^⑭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敦煌文物收藏品，包括雕塑、壁画、绢画、纸画和麻布画以及丝织品残片等。其中佛旗幡与麻布画幡 远件；绢画佛像残卷 员件；纸画佛像残卷 源件；壁画 员幅；大塑像 源尊；小塑像 圆尊；织物样品 缘件；写卷残卷 愿件；摹图、照片近 圆张。^⑮

俄罗斯所藏敦煌文书

俄罗斯所藏敦煌写本情况，很久不为世人所知，这主要是鄂登堡及其“考察团”成员的旅行记和工作日志，都藏在前苏联科学院档案库，一直没有公布。

员年，鄂登堡所劫遗书运抵彼得格勒。员年，交给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现在文物部分收藏于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写本部分则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敦煌特藏”中，实际上，“敦煌特藏”中的一部分文书，

并非来自敦煌，而是从新疆等地搜劫的。

1951年，阿列克谢也夫的《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汉文和朝鲜文藏卷》、⁽¹³⁷⁾ 1951年鄂登堡的《千佛洞》⁽¹³⁸⁾ 都只透露了点滴情况，1957年日人矢吹庆辉、1957年法人伯希和对其稍有接触，但也只是简单地提及和介绍过其中的几卷写本。三十年代，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弗鲁格为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编了部分简目，即《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文写本（非佛经之部）简报》、⁽¹³⁹⁾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文佛经古写本简目》。⁽¹⁴⁰⁾ 由于弗鲁格于 1934年饿死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编目工作中断，前苏联所藏敦煌卷子也再次销踪匿迹。

1957年，郑振铎在前苏联访问期间，曾看过部分敦煌文献。由于郑振铎在 1958年 5月遇难，没有来得及公开发表其见闻，只在写给徐森玉先生的一封信中有些反映。这封信写于 1957年 5月 5日晚上，信中说：“我于前天到了列宁格勒，立刻开始工作。莫斯科的人告诉我，在列宁格勒有一万卷以上的敦煌卷子 and 一万多卷的西夏文佛经。所以，我很急于到这里来，在莫斯科的工作一结束，当夜就乘夜车赶来。上午九时半到，休息了一会儿，十二时就到东方研究所去看敦煌卷子，因为时间不多，只将他们放在手边的几十卷翻阅了一下，就发现有‘维摩诘经变文’二卷，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昨天是礼拜天，不能去续看……今天上午，又到了东方研究所，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下午……急忙忙地看，又看了二百卷左右，都是他们事前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像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一首。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一首），孝经二卷，论语子路第十三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至八十章一卷，还有王梵志诗，五更转，十二时等等，目不暇给手不停钞，可惜已经到了他们下班之时，

天色已经黑了，只好‘留以有待’。”^{①①}由于这封信直到 1957 年才公开发表，所以此前世人对这些情况都不知道。

真正引起学术界震动是在六十年代初，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期间，前苏联宣布了有关敦煌卷子的消息，并由列宁格勒分所陈列了敦煌文书若干件，供与会各国学者参观。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一文中说：“1956 年 8 月 1 日，来自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位多年研究敦煌写本的汉学家，一个日本人，一个法国人，共同登上位于涅瓦河畔豪华建筑台阶的巨大楼梯。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前东方研究所）就设在那里。当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大堆特意为他们准备的敦煌写本时，显得多么惊讶而不知所措呀！因为他们不仅根本就不知道此处还存在有这类写本，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汉学家们实际上都对这批写本一无所知。”至此，国际上才知道前苏联还藏有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但具体情况和内容、数量都不大清楚。

1956 年和 1957 年，前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孟列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两册，著录了 1000 号文书。据编者称，这两册目录所著录的写本约当总数的三分之一弱。由此推知，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书约有一万件左右，孟列夫本人也撰文说：鄂登堡在敦煌所劫文物，包括“1000 万卷写本，还有许多艺术品以及代表着物质文明的物品”。^{①②}但由于苏联所藏敦煌资料公布很少，目录也只出版了两册，所以直到八十年代，其确切情况也不得而知。法国敦煌学专家戴密微曾说：“当鄂登堡于 1908—1909 年在突厥斯坦探险时，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搜集到手一批敦煌汉文写本。在数量方面甚至可以同伦敦、巴黎和北京的那批藏卷相媲美，因为人们声称列宁格勒共藏有 1 万多卷，但具体数目却始终没有弄清楚。”^{①③}

1958 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的吴其昱先生奉法国国立科

学研究所之派遣，前往列宁格勒访问前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东方学研究所，阅读了所藏部分敦煌写本，并尽十日之力，对前苏联所藏敦煌写本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⑮1952年，吴其昱先生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他提交会议的论文是《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⑯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前苏联收藏品的基本情况，从此文并结合其他材料，可以了解苏藏敦煌写本的大致情况。

另外，鄂登堡曾到莫高窟各洞搜劫遗书，所获来源非一，故苏藏敦煌写本并非全部出于藏经洞（即第465号窟）。其所劫文书在起讫年代上也很值得注意。在苏藏一万多号文书中，纪年最早的是北凉缘禾三年（即北魏延和三年，公元461年）《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较晚的有“大宋咸平五年”即公元994年写本。

1955年缘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代表团沙知、柴剑虹、齐陈骏一行三人，应邀前往列宁格勒访问，了解俄藏敦煌文书的收藏情况。据当时从事敦煌文书研究工作的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介绍，俄藏敦煌文书比以前所说的5000号要多，可能有5000号之多。^⑰1956年，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施萍婷、李正宇等先生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敦煌文物的收藏、保存和研究情况。据李正宇先生介绍，俄藏敦煌文献“目前编号已达5000号，另外还有一些碎片尚待编号”。^⑱

至于俄藏敦煌文献的价值，原先人们认为多为碎片，价值不大。施萍婷先生考察后指出，俄藏敦煌文献是藏经洞出土物的缩影。敦煌文献中常见的佛教典籍、道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敦煌文学……应有尽有。伦敦、巴黎、北京的收藏各有其独一无二之物，圣彼得堡的收藏也是如此。^⑲由此可知，圣彼得堡与北京、伦敦、巴黎一起，成了世界上敦煌文献收藏的四大中心。

目前，俄藏敦煌文献经中俄双方学者共同整理编辑，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

七、带来厄运的华尔纳

敦煌遗书发现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都曾来敦煌盗宝。自从斯坦因于 1907 年最后离开中国后，近十年来，再没有一个外国“考察家”从中国的西北盗走任何东西。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所有外国人都停止了他们新的远征。另外，1919 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通过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想在中国获得部分利益，并各自扶持一派代表自己利益的军阀，如英国支持的直系军阀，日本支持的皖系和奉系军阀等。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各地方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相互混战；尤其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日益激烈。“所以那时在全国范围内，法律和秩序已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但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决心要碰碰运气”。^{①49} 于是在 1920 年，便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再加上翻译员王秘书和四辆简陋的双轮马车，组成了第一次到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

第一次盗劫

1920 年初，华尔纳辞去了宾夕法尼亚博物馆馆长的职务，回到哈佛大学，任职于美术系和福格博物馆。“当时负责掌管福格博物馆和美术系的爱德华·佛比斯和保罗·萨克斯两人，在发展他们的东方艺术品和鼓励对远东艺术和考古进行更深层的研究上，有着浓厚的兴趣”。^{①49} 而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洛维尔又对中国西北美术品颇感兴趣。因此，当爱德华·佛比斯和保罗·萨克斯两人提出发展福格博物馆收藏品的建议时，便得到了校方的大力支

持。由于当时霍尔基金会给了哈佛大学大笔的捐赠，经费便不存在任何问题。关于人选，当时最适合的莫过于华尔纳了。早在1904年，当“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作为拉斐尔·庞泼莱的地质学和考古学远征队的成员，旅行到俄属中亚细亚。在那里，访问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撒玛尔罕和布哈拉，同时还访问了当时仍然是独立的基辅汗国。他是涉足此地的第一个美国人”。^⑮1905年，华尔纳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06年又在朝鲜、日本调查佛教美术一年。1907年，在哈佛大学由他首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1908年来华为新成立的克里夫兰美术馆搜集中国文物。由于华尔纳的这些丰富经历，再加上其学识和胆魄，使他成为赴中国西北考察的最合适人选。此外，华尔纳还与敦煌吐鲁番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04年，他曾受美国垄断资本家兼东方艺术品收藏家查尔斯·费利尔的委托，曾来中国商谈，想以河内的法国远东学校相类似的方式方法，在北京建立一所美国考古学校。费利尔在北京开办美国考古学校的梦想，虽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但却给了华尔纳一个畅游中国和接触敦煌吐鲁番文化的机会。途经伦敦时，他拜访了大英博物院中亚佛教美术史专家罗伦斯·宾雍。在巴黎，他拜访了沙畹与伯希和。在柏林，他参观了勒考克从吐鲁番高昌故城发掘的唐代壁画、纺织品、雕塑等文物。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他曾多次参观柯兹洛夫从哈拉库图（黑城）和新疆劫获的艺术品。所有这些，都使他对中国西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特别想去中国进行一次实地的考古发掘。此外，对于华尔纳来说，还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即他是第10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门的乘龙快婿，^⑯这一身份对他从事有关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并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同时，华尔纳读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后，更加向往中国的西北，便决定去中国西北考古。^⑰

在第一次远征中，虽然华尔纳和杰恩决不愿空手而回，但并不打算大量搬走艺术品，引用华尔纳的话来说，这是一次“侦察性的旅行”，也就是去看一看那些经过六个国家的“考察者”所已发掘过的遗址和已盗走的文物之后，如果还有剩下的话，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同时他们还希望解答艺术史上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要在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下，弄清唐朝壁画名家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颜料以及这些颜料是从何处得来的”。^⑮

1906年 苑月，华尔纳和杰恩到达北京，在此找了一个名叫王近仁的翻译。华尔纳的考察得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与帮助，因此，中国当局曾派了一支武装的护卫队把华尔纳的远征队一直从北京护送到古城西安。1906年 怨月 源日，当华尔纳在西安向武装护送的十个人告别后，这次远征就正式开始了。华尔纳后来在叙述其这次旅行时所写的《在中国的漫长古道上》一书中说：“从印度来的圣徒们越过世界的屋脊……蒙古的游牧部落。皇帝的使臣，从印度来的绿宝石，从中国来的丝毛织品，马贩、乞丐——在旅行中所见到的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壮丽景象、污秽肮脏、呻吟痛苦以及辉煌成就——凡此种种都是不可否认的，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的”。^⑯

由西安西行，华尔纳首先来到甘肃泾川，发现了王母宫石窟（华尔纳称之为“象洞”），进行了挖掘。

华尔纳远征队的第一个目标是黑城哈拉库图。他们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兰州、肃州，最后于 1906年 12月 12日到达了目的地——哈拉库图，即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纳。

在华尔纳到达哈拉库图之前，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已来过这里，并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搬走了当时能发现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所有的壁画在内。华尔纳的远征队在这里虽然发现了一些小物品，其中包括几件壁画残片，但与柯兹洛夫和斯坦因相比，其结果却使华尔纳失望，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次额济纳的

远征已经证明了，除非用大量的劳力和进行长时间的挖掘，否则，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希望再找到更多的东西。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已经把这个地方挖掘得那样干净，使后来的人简直无物可挖了”。⁽¹⁵⁵⁾

在额济纳挖掘后，华尔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敦煌。敦煌壮丽的艺术风格，他们从伯希和考察团成员——努埃特所拍摄的照片中，早已洞悉无遗。他们鉴于在额济纳的失望，同时又知道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和橘瑞超都已经到过敦煌，而且还盗走了他们所能下手的每一样东西，因此去不去敦煌，他们也犹豫不决。然而，华尔纳毕竟是一个艺术史家，而不是一个语言学家，因此对于手稿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艺术学家，他极想去看一看只有很少几个东方学家才见到的这个世界艺术画廊。“况且，哈佛大学的各实验室还很希望能得到即使不是整幅的壁画，就是一些碎片也好，以便为他们作实验之用。这个远征队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野心更大的冒险铺平道路”。⁽¹⁵⁶⁾

在额济纳前往敦煌的路上，由于寒冷和疾病，杰恩再也无法在戈壁沙漠中前进了，便不得不告别华尔纳，带着在哈拉库图挖掘的文物，慢慢地返回北京。

当华尔纳于 1908 年 1 月到达敦煌千佛洞时，王道士又外出了，但这并没有妨碍华尔纳，他直接进入了那些有壁画的洞窟里。一连十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外，他很少离开洞窟。《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在这些烦恼的日子里，蹒跚地走在我的马车旁边”。千佛洞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把华尔纳惊得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到这里来原是为了核对古物年代，是为了能轻易地驳倒那些学者教授们，并且也是为了发现艺术影响的。现在我站在一所佛堂中央，双手插在衣袋里，陷入了沉思之中”。⁽¹⁵⁷⁾

华尔纳经过沉思之后，决心要剥夺这里的优美壁画和彩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是安然无恙的，但在当前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¹⁵⁸⁾

在华尔纳给了王道士相当多的礼物后，王道士也就同意华尔纳剥走一些壁画。但当华尔纳又提出要一些塑像时，他却显得非常倔强，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知道，华尔纳并不是要他新的、光辉灿烂的彩色塑像时，他就同意分给华尔纳一尊古老陈旧的、三尺高的一只腿跪着的唐代圣像。这是今天在福格博物馆的藏品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华尔纳用来剥离壁画的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溶液。然而当时敦煌正值隆冬，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每当华尔纳爬上梯子，将固定剂用刷子涂在壁画上，溶液还没有渗入并凝结在灰泥以前时，就已经结成了固体；同样，那些浸透了胶水的纱布还未粘附在壁画上，就已经冻硬了。尽管条件如此艰难，但他盗劫敦煌壁画的野心不死。经过五天的盗剥，华尔纳终于移下了十二件壁画。这“是极可宝贵的珍品。我们在美国还从未见过与此类似的东西。同时这些东西和德国人从土耳其斯坦的灰泥墙壁上锯下来的变成了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忌妒”。⁽¹⁵⁹⁾

华尔纳盗劫壁画后，于 1908 年 1 月从兰州、北京返回美国。由于他领导的第一次美国福格考察团劫回了极其珍贵的敦煌壁画和其他艺术品，深受佛比斯、萨克斯及哈佛大学校方的重视。“第一次考察被佛比斯、萨克斯和主要支持者认为是成功的。那些从哈拉库图和敦煌所得到的雕塑、陶瓷碎片、拓本和壁画残片，各个洞的照片、还有新发现的象洞，所有这一切，都开创了一个值得赞美和庆贺的时刻。……由于有着扩大这种特殊收藏品的强烈愿望，所以在组织另一次规模更大的考察队时毫不费

力”。^{①60}

华尔纳盗劫敦煌壁画，使他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同时哈佛大学的福格收藏所也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品而永久闻名于世界。尽管如此，华尔纳并不满足，其野心越来越大，他决定带一支更大的队伍，在敦煌盗劫更多的壁画，华尔纳自己说：“在（千佛洞）那些墙壁上，我们应当找出中国的绘画风格的起源，亦即风景画学派的起源。在这方面中国大概已经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用半年的时间对那些原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仔细而深入的研究，一定可以找到敦煌艺术大师们在绘画上的秘诀。并且，要是幸运的话，下一次远征还可能给福格这个小收藏所再添加许多中亚的珍宝”。^{①61}然而等待华尔纳的到底是什么呢？

第二次考察与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华尔纳率领的第二次美国福格考察团由 远个人组成：华尔纳、杰恩、丹尼尔·汤普森（负责剥离壁画）、阿兰·普列斯特、霍拉斯·史汀生（负责测量）和查理德·斯达尔（负责摄影）。

华尔纳第二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用胶布将敦煌莫高窟第 窟（西魏）壁画全部剥离运回美国，因此，他不仅带有剥离壁画的“胶水桶”，而且还请了配制这种“胶水”，并在前一年告诉他如何使用固定剂的一个年轻壁画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华尔纳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为避免配制剂再次发生冻结的危险，他把这次远征安排在春天进行。“这一次不但要研究石窟中的艺术史，而且还要挽救（即盗窃）更多的敦煌壁画”。^{①62}

此外，华尔纳还有一附带的任务，即代表哈佛大学和霍尔基金会在中国物色一姊妹学校以共同研究中国文化。1928年，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在临终遗嘱中将其遗产的三分之一用于中国文化研究，其方法是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组成联合研究机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计划未能实行。战争结束后，霍

尔遗嘱执行团于 1905 年在美国选中哈佛大学，华尔纳两次考察的经费即来源于此。

当时司徒雷登任职于燕京大学，他为了解决办学经费，几乎每年都回美国去募钱。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这个消息，本来他想争取燕京大学作为中方大学入选以得到这笔款项，但由于燕大刚刚成立，远不及北京大学的影响和声望，所以，霍尔遗嘱执行团便在中国相中了北京大学。因此，当华尔纳第二次福格考察团于 1905 年初到达北京后，华尔纳便留在北京商谈合作之事，并要求北京大学偕同前往敦煌“考古”。这样，就由杰恩率队西行，同行的还有两个中国人，即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和第一次考察时的翻译王近仁。正是由于有两校合作计划，北京大学的陈万里便代表北大国学门，参加了哈佛大学福格考察团，前往敦煌考古。正如沈兼士先生在为陈万里《西行日记》所作的序言中说：“余以敦煌近二十年来，外人已屡至其地，顾我国学者，以考古为目的而往者，此殆为嚆矢”。

当华尔纳到达北京时，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迅猛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在考虑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一事上非常谨慎，而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也坚决反接受美元。“在中国方面，北京大学已表现出不愿意合作的迹象。伴随着强烈的排外成份，一股新的民族主义风潮开始刮了起来。即使像胡适这样著名和开明的学者，他是完全能够理解与哈佛大学联合这个愿望的，也指出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财力上，他所在的大学都不可能担负起这一任务”。^{①⑤}因此，两校合作之事只好搁浅。这样华尔纳便于 1905 年底离开北京，动身西行，向敦煌进发。

缘月 18 日，华尔纳的“考察团”到了敦煌后，翟荫（即杰尼）等人即去县府接洽，杨县长态度很坚决，不允许他们在千佛洞住宿，并于当日下午召集开会商议此事。出席会议的除翟荫外，还有各界代表七、八人。翟荫在会上首先说明来意：“此来

本拟剥离一部分壁画，运赴北京陈列，以便中外人士，得就近研究，曾以此意商之陆省长，未蒙许可，嗣后即一意摄影，希望能得各界谅解，予以充分时间”。⁽¹⁶⁴⁾ 翟荫虽竭尽欺骗、说谎之能事，但觉醒了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大家一致表示：前年华尔纳剥去千佛洞壁画二十多块，地方人民曾向县知事提出质问。当年庙会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王道士责问，所以这次到千佛洞考察，无论如何，时间不能太长，而且要制定详细的具体规定。

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敦煌人民和地方当局对华尔纳的“考察团”作了如下规定：（员）华尔纳及所谓“考察团”的团员不准留宿千佛洞。（圆）所谓“考察团”的团员全体去参观千佛洞时，必须受人民的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城。（猿）不准触毁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¹⁶⁵⁾ 华尔纳在给他妻子的信中也说：“翟荫从敦煌赶来见我。在莫高窟他们一直是在严密的监视之下，每天晚上强迫他们回城，每次在客店门外都有一个愤怒的市民。他们不让我们在洞窟留宿，也不许带闪光灯”。⁽¹⁶⁶⁾ 我们知道，千佛洞离敦煌县城四十多里，牛车往返要走八小时，这样华尔纳及“考察团”每天“参观”千佛洞的时间就很少了，再加上经常有人监视，无法下手盗窃壁画，因此，他们在千佛洞浏览了三天，即缘月圆—圆猿日，就离开了敦煌。华尔纳这次来到敦煌，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华尔纳自己说：“情况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十多个村民放下他们日常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哩之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并且他们使用一切手段诱使我们触犯他们的规定，以便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我们“一个不注意的错误，即使是一次愤怒的表情，也可能使他们倾巢出动，骂不绝口，甚至置我们于死地”。⁽¹⁶⁷⁾ 英国人彼得·霍普科克也说：对于华尔纳的这次远征，北京“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可是这些美国人现在突然发现他们每走一步，不但受到怀有敌意的民众的阻挠，而且还受到地方当局的刁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

好放弃对千佛洞所怀抱的希望，放弃搬走任何东西的意图”。^{①68}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敦煌人民团结了起来，将华尔纳及其“考察团”驱逐出境，使华尔纳大规模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

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失败后，华尔纳和杰恩便决定去另一个“具有希望的地方”——万佛峡（即榆林窟）。~~1924年~~1925年远月圆日，华尔纳、杰恩和王近仁同去县府商量考察万佛峡。最后商定“先去一星期，如一星期后认为尚有摄影工作应须继续者，再行磋商”。^{①69}这时，由于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并由此掀起了反帝排外的高潮。由于这一原因，北大校长蒋梦麟最终决定不与哈佛大学合作，并于远月苑日电令陈万里与考察团决裂，提前返校。“而华尔纳也在路上听说了在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以致使华尔纳和其队员的安全都成问题。华尔纳他们的美国朋友从北京发来电报，强烈要求他们空手回来，不要因进行研究而受到伤害，要他们‘拥抱你们的祖国和你们的大学’。”^{①70}这样，华尔纳便不得不解散其考察团，于~~1924年~~1925年愿月回到哈佛大学。

关于第二次福格考察，“华尔纳不得不承认，第二次福格中国考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惨败。所带回的惟一有形的东西是那些图片，大部分是那些远不如敦煌莫高窟的很不出名的洞窟的图片。……至于无形的东西，可以用‘经历’这个词总结”。^{①71}

至于霍尔基金会选定的哈佛和北大合作一事，前已述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非常巧合的是，华尔纳考察团的翻译王近仁乃燕京大学学生，当华尔纳第二次考察失败，王近仁返校复学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从其口中了解到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考古失败的情形之后，大作文章。辗转将此事告之中国教育部次长秦汾，后由教育部知会外交部，以华尔纳违反国际法为由，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事情虽被美国政府敷衍过去，

但哈佛大学觉得太丢面子，既迁怒于华尔纳，也不满意北京大学。司徒雷登乘此机会积极活动，于 1951 年赶回美国，以燕京大学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协商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结果大功告成。1955 年春，哈佛燕京学社于兹正式成立”。⁽¹⁷⁾

哈佛燕京学社是两校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其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在北平设立办事处。1937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燕京大学被迫于 1941 年迁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学社继续在成都活动。1945 年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回迁北平，学社也在北平恢复了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 1952 年春改为公立。1954 年随着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亦随之撤销。而设在哈佛大学的学社总部则延缓至今。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是国际著名汉学家、美籍华人杜维明教授。

惨重的损失与美国所藏敦煌文书

华尔纳对千佛洞壁画的盗劫与破坏，造成了敦煌艺术不可弥补的损失。1908 年冬天，华尔纳第一次来到千佛洞，计划用钢片铲刀窃取壁画，但因为千佛洞壁画是画在砾崖基础上搪泥的墙壁上，泥墙与石壁之间又呈现着起伏不平的表面，所以他在毁坏了几方壁画后，发现无法达到其很快盗窃壁画的企图，便改用了胶布贴粘的办法。

关于华尔纳盗窃壁画的具体数量，《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说有“十二幅中型的壁画”。这里说的十二幅，实际上是十二件，其中一件刚拿到美国就弄坏了。目前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藏九件，其中日常陈列的有五件，另外四件在地下仓库保管，其余两件至今下落不明。从技术上说华尔纳的剥离方法是失败的，残片大半图像不清，补笔补彩部分也不少，其损失是令人痛心的。⁽¹⁸⁾陈万里先生《西行日记》愿页说：“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

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二十余幅”。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①①}对华尔纳盗窃、破坏壁画的罪行，也有部分反映和揭露。该书 页 第 窟说：南壁“上画千佛，中画佛教史迹画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东晋杨都出金像（大部被美国人华尔纳盗窃破坏）”；东壁“门北画佛教戒律画（部分被美国人华尔纳盗窃破坏）”。 页 第 窟说：北壁“画弥勒经变一铺（被美国人华尔纳盗走二方）。” 页 第 窟说：南壁“画千佛，中央阿弥陀经变一铺（ 年被美国人华尔纳盗劫两方）”。据敦煌文物研究所调查资料表明，华尔纳在第 窟 窟 窟 窟 窟 窟 窟 窟等窟盗窃精美的壁画二十六方，共计 平方厘米。^{①②}

据王冀青和美国学者莫洛索斯基调查，目前，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共收藏有敦煌壁画 方，其中 方原属 窟， 方原属 窟， 方原属 窟， 方原属 窟， 方原属 窟， 方原属 窟。^{①③}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还收藏有二件敦煌彩塑，也是华尔纳第一次福格中国考察团劫去的，其中原属 窟西壁斜顶敞口龕外南侧台的一膝跪地供养菩萨，高 厘米，是属于初唐时期的作品，它被认为是华尔纳搜集到的最重要的一件艺术品和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另一件是原属 窟（北魏）中心塔柱侧面的模制天人像，由于其体积较小（ 厘米），一直不太引人注目。

华尔纳率领的第一次福格考察团的收集品，还有哈拉浩特（黑城）壁画 方，收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泾川王母宫石窟石雕 件，也收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国内对这批石雕鲜有报道。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华尔纳称为“象

洞”；陈万里在《西行日记》中注曰：“有石象及浅雕石刻绝美，同行者遂名此洞为象洞”；哈拉浩特（黑城）泥塑 员件，是华尔纳第二次福格考察团所获，现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此外，美国还收藏有 圆幅敦煌绢画，其中一幅为“水月观音”，绢画下部有纪年题记：“于是乾德六年（开宝元年）岁次戊辰五月癸午朔十五日丁酉题记”，相当于公元 怨愿年 远月 员猿日。该“水月观音”画正是 员源年敦煌县令汪宗翰从王道士处索要的敦煌藏经洞文物之一，员源年 愿月，汪宗翰将此绢画赠送给甘肃学台叶昌炽，叶氏《缘督庐日记》中有关于该画的记录。这幅画后来又归南林蒋氏所有，王国维《观堂集林》中的《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一文，实际上就是对这幅画的跋文和首次研究。该画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至于该画如何流到美国，现仍不清楚。

另一幅为“十二头观音”画，现藏于哈佛大学联合艺术博物馆。

美国收藏的敦煌遗书，由于数量太少，长期不大引人注目，其来源等也不清楚。目前已知，美国藏有敦煌遗书 圆卷，其中哈佛大学收藏 圆卷，是华尔纳第一次福格考察团在路途中购买的。另外，国会图书馆收藏 怨卷；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收藏 猿卷；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收藏 猿卷；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 猿卷；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收藏 员卷；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 员卷。^{①⑦}

八、劫余断篇又遭劫

自从斯坦因、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中国政府便将劫余部分共 愿圆余卷，运送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既然如此，为何橘瑞超、鄂登堡还能盗去大量遗书呢？斯坦因于

1909年来敦煌时，又能从王道士处骗购 还有余卷呢？在运京途中及入藏京师图书馆前，又有许多散失呢？因此，探讨敦煌遗书之流失和被盗劫，不仅要研究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华尔纳等外国“考察家”、“探险家”的劫夺，而且要分析国内官僚地主及一些权势人物对敦煌遗书的盗劫，从而使一部分珍贵文物流散出去，造成了我国学术文化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①78}

敦煌书的流散

敦煌遗书发现后，即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遗书发现之初，王道士就请城中绅士来参观。绅士们不知其可贵，只认为这些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都叮嘱王道士仍藏洞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时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将回国，来谒廷栋，临行，廷栋出数卷赠之。此比国人行过新疆，复谒长庚将军（亦满人）及道台潘某。相与道敦煌事，复以经卷分赠长庚和潘道台”。^{①79}

1909年，敦煌知县汪宗瀚把王圆箓送给自己的部分敦煌遗书、遗画和拓片等，转送给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深知这些文物的重要价值，立即建议甘肃省当局，要求将藏经洞全部文物运送兰州保管，而政府当局则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1909年 猿月，甘肃省藩台令敦煌知县汪宗瀚对藏经洞出土文物进行清点并封存。汪宗瀚乘机择其精品，送给了新疆、甘肃等一些地方官员。敦煌遗书从此开始在外界流传。

斯坦因、伯希和盗劫遗书后，藏经洞文物才开始为人们所知，并引起政府的重视。1908年，清朝政府责令敦煌知县并王圆箎“将此项经卷，妥为保存，毋再遗失私卖，致于咎戾”。⁽¹⁸⁰⁾于是将残存卷子分装两大木箱，名为“转经筒”，藏于第17窟。但狡诈的王道士还是私藏了不少经卷，偷偷出售。当1908年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由于王道士做了手脚，并没有全部运完，因此1909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从王道士手中买去五六百卷。当时在新疆一带也不时有人向外国人兜售。后来又在莫高窟发现了一批藏文佛经，甘肃省教育厅便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¹⁸¹⁾并派人会同敦煌县地方政府共同清理查验，共清理出藏文经卷127捆，重190余斤；带夹板经书16打，重190斤。这些藏文经卷由敦煌劝学所、莫高窟寺院和甘肃省图书馆保存。

王圆箎运京途中遭劫记

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于1908年缘月从敦煌出发往东，途经西安并停留了一个月，再经郑州、北京，于1908年10月10日到达了河内。

1908年伯希和又来北京，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买汉文古籍。这次他于缘月10日从河内出发，夏天到达北京。经田中庆太郎（东京文求堂店主）介绍，罗振玉等人于中秋节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寓所。伯希和出示所带敦煌遗书《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十余种，并送给罗振玉一些敦煌文献照片。

关于伯希和在北京及敦煌遗书的流传情况，田中庆太郎也有记载，可以使我们了解得更详细一些。田中用教堂生这个笔名将当时的见闻题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发表在北京日侨主办的《燕尘》杂志1卷1号（1908年10月1日出版），文章说：

佛兰西东方考古学校教授伯希和氏获得藏在甘肃省境敦煌县石室中的经卷古书。得知归国途中在北京停留，立即赴八宝胡同旅舍通名片求见。未曾有过什么交往的伯氏把我让进了客厅。伯氏系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绅士，颇有学者风度。虽然是西方人，却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伯氏怀研究中国西陲地理古迹的目的，一年前从本国出发，经俄属中亚细亚进入新疆省，在库车停留八个月，在乌鲁木齐停留二个月，在吐鲁番又停留数周，连续地考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长将军，得知敦煌石室的消息，随即取道巴里坤、哈密，出安西，在安西知州某人以一卷古写本相赠，立即可以确定这是唐写本。去年冬天离开敦煌县三个多月，弄到了藏在当地三危山下石室之中的写经和别的文物。

虽说大部分已被送往本国，还是出示了随身携带的几十件。全是炫人眼目的珍品，如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刻的经文、唐拓本等，纸质有黄麻、白麻、楮纸三种。其中《老子化胡经》不次于最好的《太平经》，《尚书·顾命》残片文字雄健，的确是唐人书法。……听说伯氏带来奇书，不但北京士大夫中的学者，就连对古书怀有兴趣的人也都相继往访他的寓所，见到带来的珍品，无不惊讶。

九月四日，北京学者主办的伯氏欢迎会在豪华的大饭店举行了。当天出席者有：宝侍郎（宝熙）、刘少卿、徐祭酒（徐枋）、柯经科监督（柯劭忞）、恽学士、江参事（江翰）、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董康）等十余人，成了名流齐集的盛会，遗憾的是罗叔言氏因感冒而缺席。……伯氏把摄影誊写的要求一一允承下来。伯氏与北京士大夫应酬之后，于九月十一日晚，乘坐前门开出的列车经西伯利亚归国。约定以后发表各种整理报告。^{①82}

罗振玉在伯希和处见到敦煌遗书后，大为惊奇，如获至宝。立即就伯氏所带的部分卷子写了一份提要——《鸣沙山石室秘录》，刊入《国粹学报》。又约其他同志一道影照残卷十余种，编为《敦煌石室遗书》一书，由武进董康诵芬室刊行。

当与伯希和会晤时，伯希和说敦煌石室中尚有卷轴八千余卷，其中以佛经为多，可早日购归，以免再为人夺去。罗振玉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请学部发电报致护陕甘总督毛实君（庆蕃），托其将劫余敦煌卷子购送学部，并拟好电文上呈堂官，电文中说明购买卷子的经费先请垫付，由学部偿还。堂官允许发电，独把“还款”语删掉。^{①83}这样，愿月 國日学部致电甘肃：“行陕甘总督，请飭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①84}电报发出一月后，甘肃省就复电学部和大学，说已购妥，共八千卷，三千元。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学部发给甘肃的电报没有“还款”二字，罗振玉考虑到甘肃比较贫穷，未必能予垫款。于是提议大学出款，大学总监督刘幼云（廷琛）也推说无款。罗振玉说，大学如无款，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不然，可将我个人俸给全部捐出。罗当时任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总监督（相当于后来的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由于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再坚持，堂官才没有再明确反对。^{①85}这一点罗振玉《鸣沙石室遗书序》中也有反映：“往者伯君告余，石室卷轴取携之余，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学部，移牒甘陇，乃当道惜金，濡滞未决，予时备官大学，护陕总督者适为毛实君方伯（庆蕃），予之姻旧，总监督刘幼云京卿（廷琛），与同乡里，与议购存大学。既有成说，学部争之”。当时学部“惜金”，恐怕价格昂贵，不肯购买。及知仅三千元时，“学部争之”，决定留部，不给大学。^{①86}

从甘肃敦煌押解经卷至北京，学部委托新疆巡抚何秋辇（彦昇）担任接受和押解，押解差官是江西人傅某。当载经大车到北

京打磨巷时，何彦昇之子何震彝（鬯威）先将大车接至其家，约同其岳父李盛铎（木斋）及刘廷琛、方尔谦等，就其家偷选，将残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窃取。而后又把卷子中较长者，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以充八千之数。^{①87}

为什么由新疆巡抚何彦昇担任押解任务呢？对此问题一直不得其解，有关论著或避而不谈，或云不知什么原因。最近我有幸拜读了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 1946 年写的一篇文章《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①88}一文，从中得知：“何彦昇于宣统二年（1910 年）官甘肃藩司，代理巡抚，当其任内，适学部咨陕甘总督调取敦煌经卷，着何氏收购到京。抵京后何氏先交其子鬯威。时官中册数，报有卷数而无名称及行款字数，故一卷得分为二三，以符报清册之卷数。何鬯威为李木斋盛铎之婿，故菁英多归李氏及何氏”。

叶遐庵云：“刘（廷琛）、李（盛铎）、何（彦昇）三人所得敦煌残卷，何早卒，除其生前赠友者外，闻亦归李氏。余知李、刘二氏多佛经以外之典籍，偶露鳞爪，难窥其秘也。近年李、刘皆去世，所藏始分别散出”。^{①89}现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敦煌遗书，绝大部分为何氏旧藏，其目录首题即为：“何彦昇秋辇中丞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六十六种”。其中还有一块原来用着夹存文书册的木夹版版面，上有：“新疆布政使何彦昇旧藏：敦煌石室唐人秘笈（五拾九种）目录、歌曲册”。这批文书上有许多收藏家印，多者为三方，即“何彦昇家藏唐人秘笈”、“合肥孔氏珍藏”、“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从所记目录及文书印记看，知是经何氏、孔氏之手才转归李氏所藏”。^{①90}由此可知，“何氏之物，后归于李氏凡将阁，藤井氏所藏，非迳得于何，乃得自李氏者。有邻馆所藏此批敦煌残卷，虽为数不多，惟其为何彦昇旧藏，正可据以考查当时经卷遗失之情形”。^{①91}从何彦昇所获敦煌遗书及其散失，就可见当时敦煌残卷流散的一般情况。

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残卷序》亦记其事曰：“江西李君与某同乡，乃先截留于其寓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刘君、其婿何君及扬州方君，拔其尤者二三百卷，而以其余归部。李君者富藏书，故选择尤精，半以贻其婿，秘不示人；方君则选唐经生书迹之精者，时时截去数十行鬻诸市”。当时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的卷子是 原 23 号，民国十八年（1929 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增为 忽 51 号。

官僚世宦窃取敦煌遗书之事，当时社会上就有了一些传闻。罗振玉《鸣沙石室遗书序》所说：“比至运京，复经盗窃”即指此而言。此事也“为学部侍郎满人宝熙所悉，谋上章参奏，会武昌起义，事遂寝”。^{①92}宝熙上奏，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没有查问。但这毕竟是一桩大案，学部为掩人耳目，只把押解员傅某扣留，最后还是经人说情而释放。吴昌绶《松邻书札》中致张祖廉一札云：“顷鬯威（何震彝）同年来，谓访公未值，有言托为代致，甘省解经之傅委员，淹留已久，其事既无佐证，又系风流罪过，今穷不得归，日乞鬯威为道地。弟闻前事已了，堂宪本不深求，可否仰仗鼎言，转恳主掌诸君，给札放行，其札即由公交鬯威亦可，渠既相嘱，特为奉致，望径复之”。^{①93}将这样大的盗窃公案，以“风流罪过”，巧于开脱。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

被窃卷子当时就流到了市场上，罗振玉说：“遗书窃取，颇留都市，然或行剪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①94}如方尔谦所盗窃的遗书，当时就拿到市场上出售，“故予筐中所储，方所售外，无有也”。^{①95}李盛铎所窃，光绪 28 年一次就卖给了日本人四百多卷。

九、敦煌文物被盗的原因

以上我们对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华尔纳等考察家、探险家来我国西北考察、探险的背景、条件、过程及对敦煌文物的劫夺、破坏等进行了个案探讨。下面我们再从总体上对敦煌文物被盗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总体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西北是一个政治敏感的地区。当时印度和阿富汗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而沙皇俄国的势力也已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扩展到了里海，因此当中国人从清朝闭关锁国的状态下醒来时，才猛然发现在中国的西北大门口，已站着两个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大国——英国和沙俄，它们正在为争夺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而跃跃欲试。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亚洲中部出现了探险活动的热潮，各种名目的探险队、测量队和考察队，纷纷闯入这一地区。据统计，仅从 1847 年到 1909 年间到达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队就有 140 个之多，这些探险队，既有沙俄的、英国的、德国的，也有法国的、日本的和瑞典的。当时这些探险队在亚洲中部、中国的西北地区，不断有惊人的发现，从而轰动了世界。人们没有想到，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竟然会埋藏有千年之久的人类古代文明：这里有已无人认识的死文字，有无与伦比的佛教石窟壁画，有中国古代的漆器、铜镜，有精美艳丽的丝绸、绢画，还有古罗马金币、贵霜钱币、波斯银币等等。中国西部丝路沿线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闪烁着光辉。许多探险家、考察家，都是由于在这里有惊人的发现而闻名世界的。他们的探险考察活动，虽然发现并使世人认识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文化瑰宝，以致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尤其

是丝路文化的研究。但不可否认，这些探险考察活动，也破坏了中国的文物古迹，致使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被盗劫，造成了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

为什么敦煌文物发现后即被大规模盗劫呢？众所周知，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大其既得利益，纷纷在中国割占领土，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这种侵略活动，除了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华南广大地区外，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也成了帝国主义、特别是俄英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之一。如俄国不但派兵于1864年强占了伊犁地区，而且为了把我国新疆地区从地理、文化上割裂出去，便称其为“东土耳其斯坦”，妄图达到分裂中国、侵占我国新疆地区的罪恶企图。

当时，俄国觊觎吞并我国新疆西部的绿洲地区，而英国则把新疆西南部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力阻挠沙俄势力的进入。作为英国政治代表的马继业，和沙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噶尔的明争暗斗，就是这一复杂形势的缩影。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各国探险家、考察家也纷纷涌入我国西北地区。他们的涌入，既有学术目的，也有政治和军事目的，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就认为，考察中国的北部边疆不仅有很大的科学价值，而且还可以搜集到当时中国正在爆发的回民起义的“准确情报”。

另如，斯坦因的考察之所以得到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测绘那一地区路径和地形的实际需要。”

正是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西方列强都把中国视为可以任人宰割的羔羊，认为中国西北边疆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可以随便去“探险”、“开垦”。

由此可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家、考察家在

中国的考察活动，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西方列强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矛盾。西方各国的探险家、考察家们的活动，既然是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因此他们的学术考察活动，也往往打上了政治或军事的烙印，他们也像帝国主义军事侵略者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界一样，在文化侵略中也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如斯坦因认为：“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都把眼睛盯着衰落的中华帝国”。^{①96}对此，自认为是“英国公民”的斯坦因也不甘落后，遂向政府提出了对中国新疆和阗地区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察计划。为什么要选择和阗地区呢？斯坦因的理由是：“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阗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来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等的发现已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①97}如前所述，当时印度不仅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还是英帝国向东扩张的前哨基地，斯坦因提出的理由不是可以“古为今用”吗？对此，斯坦因直率地说：“我敢肯定，和阗和中国新疆南部是英国考察的适当范围。用现代术语说来，它按理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我们也不该让外人夺去本应属于我们的荣誉……我认为，进行此事正是为了印度，争取这项荣誉也正是为了印度政府。”^{①98}

不仅如此，斯坦因为了使其计划得到政府的重视，还把国家间的竞争变成了自己的理由。他在报告中说：“我还想进一步指出，自我的计划初步形成以来，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已经宣布，他们准备派出三位学者考察（中国突厥斯坦南部的）吐鲁番，那里也曾发现过古代文书。另外我还得知，斯文·赫定博士的考察也很可能要重新开始”。^{①99}再如日本在中国西北的考察，也曾引起了正在争夺中国新疆、西藏的俄、英帝国主义的关注，故将橘瑞超的考察称为“间谍探险”。

敦煌文物正是在这一总的历史背景下被盗的。

具体原因的分析

敦煌文物的被盗，主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历史悲剧。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体原因。

第一，中国政府的昏聩无能。当时，虽然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政府对于外国的侵略不可能进行强有力的抵抗，但在内部的统治还是有效的。外国考察家在中国的盗劫活动，还是尽量要取得合法的身份，即得到中国有关当局的认可，才能如愿以偿。如斯坦因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说：“我还请求印度政府通过外交部与中国政府联系，为我获取在中国突厥斯坦旅行必须的护照或允许”。“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和阗地方当局的支持，对于计划中的考察成功与否至为关键。因而希望印度政府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争取中国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能给和阗的办事大臣发去指示，证实我已获准勘察或考察他辖区中所有古代遗址，在这类遗址上进行发掘，拥有其中出土的文物，如有人出售，还可购买这类文物。”^{②00}

英一千九百零二年 缘月，斯坦因收到了去中国新疆的护照。护照的内容为：

总理衙门发此照予英国学者斯坦因。

兹据 匀月 酝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奏报，称斯坦因博士拟携仆从若干自印度前往新疆和阗一带，请发护照云云。

因备此照，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盖印发出。

仰沿途各地官吏随时验核斯坦因博士之护照，并据约予以保护，不得稍有留难。

本护照事毕交回，遗失无效。^{②01}

另如 1908 年，当美国人华尔纳来敦煌盗劫壁画时，正赶上军阀混战，局势极不稳定。为了保证华尔纳等人的安全，中国当局还派了 100 名武装的士兵，将他们从北京护送到西安。再如 1908 年 8 月，当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还能在北京向中国的学者夸示其所得、所见、所闻。

以上事实说明，敦煌文物的被盗，与政府的昏聩无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洋枪洋炮和兵舰，任意进出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淫威下，上自皇帝大臣，下至一般官吏，对“洋大人”都是毕恭毕敬，有求必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探险家、考察家才能在中国取得所谓“合法”的身份，才能得到中国有关当局的关照和保护，从而将中国的许多文物古迹“合法”地运走了，造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吏及下层人士，由于思想麻痹和愚昧而上当受骗。如斯坦因常常提到的“潘大人”——潘震，曾给了斯坦因很大的帮助。当斯坦因到达和阗后，由于有中央政府的护照及指示，再加上斯坦因向潘震讲述了当年玄奘去印度所走的路线及和阗当年的佛教文化，使科举出身的潘震很感兴趣，答应将在职权范围内尽力给予帮助。正是由于潘震等人的帮助，使斯坦因获得了极大的便利，使其在各地的“考察”犹如入了无人之境，从而将中国的大批文物盗劫而去。斯坦因曾坦率地承认：“没有他的热心帮助，也就没有沙漠中的考察，更不可能完成那之前在山里的测量。”^[20]

综观潘震的一生，很难认定他是一个自觉的“卖国者”。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连中央政府对洋人都惧怕三分，作为地方官的潘震，一方面是执行中央政府的指示，另一方面对斯坦因有好感，包括其献身精神。潘震对斯坦因的所做所为，仅仅是不理解、不明白，并没有将其作为“盗贼”而为虎作伥。

就是道士王圆箎，当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人从他手里骗去大批敦煌宝藏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扮演了一个“卖国者”的角色。因为不论斯坦因，还是伯希和、华尔纳，都没有能用金钱从王道士手中买走宝藏，而是利用了王道士的愚昧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无知。至于斯坦因等人所付的一点点钱，在王道士的眼中只是他们“布施”的“功德钱”，而绝不是购买敦煌宝藏的“交易费”。否则，王道士绝不敢在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说：“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②04}可见，贝希和、司代诺（即伯希和、斯坦因）“请去佛经万卷”之事，王道士并不认为是不可告人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光绪元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后，王道士还主动将斯坦因当年（光绪元年）“捐助”圆箎两银子的用途帐给他看。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募化者对施主的义务。

综上所述，当时的一些地方官吏，乃至一些帮助外国人劫夺丝路文物的普通百姓，包括道士王圆箎，真正的“卖国贼”有几个？绝大多数都是由于知识贫乏，甚至没有知识，不懂得文物艺术及其价值，无意中成了盗劫敦煌文物的“帮凶”。多么悲哀！多么可怕！

第三，由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及官吏的愚昧无知，造成了大批敦煌文物的被盗。如敦煌文书发现后，甘肃学台叶昌炽曾建议甘肃当局将敦煌文物全部运到省会兰州保管，后因需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作罢，只在光绪元年猿月命敦煌县令检点封存，由王道士就地保管。从而为以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盗劫埋下了祸根。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将所有敦煌文物全部运到兰州保管，也许以后的被盗事件就会得以幸免。

另如，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在北京给罗振玉等人透露了有关消息。罗当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由于他下了最大

的决心，一再坚持，才将劫余敦煌遗书八千余卷运至北京，由京师图书馆保存，从而构成了今天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可以断言，如果不是罗振玉的坚持，如果没有学部 and 京师大学堂的努力，将劫余遗书运至北京保管，这部分文物必然被橘瑞超、斯坦因、鄂登堡盗劫而去。

第四，外国考察家、探险家的个人素质，包括他们吃苦耐劳、不怕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如斯坦因在第二次考察时，由于天气太冷，差点将脚冻掉了。由于有了这次的遇险，第三次考察前就立下了遗嘱。再如瑞典人斯文·赫定，也和斯坦因一样，将科学考察作为他们一生追求的事业，并将其一生都献给了这一事业，为此他们终身都未结婚。正是考察家本人这种为了自己的追求，为国家 and 个人的“事业”而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才使大批的丝路文物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生活、交通条件下，一批批地运到了西方。

当然，这些考察家、探险家的学术考察活动，也离不开当时政治的影响。他们的悲剧（或教训）在于：经费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殖民主义的“先行者”；另外，在他们的意识上，也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即损人利己，无视所在国的主权。

第五，整个社会缺乏文物的主权意识。我国境内的所有文物，应该归国家所有，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在当时，自上而下，整个社会都缺乏对文物重要性的了解，缺乏文物的主权意识。如潘震只是不明白中国的古文书为什么要运到西方去？但他绝对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的文物，应由中国保管。当斯坦因到敦煌时，汪宗翰认为他是去发掘废址，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还设宴招待。他们误认为地下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谁挖到就归谁。道士王圆篆更是如此，综观他处理敦煌文书的态度，除了个人目的外，他对外国人和中国人，甚至中国政府都基本上是一个

态度，即谁为寺院给予“布施”，谁就可以“请去佛经”。

与此相反，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商品意识已较浓厚的西方国家，却已有了文物的主权意识。如斯坦因 1905 年 12 月 16 日给印度政府的报告中说：“我还请求印度政府通过外交部与中国政府联系……证实我已获准勘察或考察他辖区中（和阗）所有古代遗址，在这类遗址上进行发掘，拥有其中出土的文物。如有人出售，还可购买这类文物。”⁽²⁰⁴⁾由此可见，斯坦因非常清楚，中国的文物，不论是地下埋藏的，还是公私收藏的，都属于中国所有。要进行发掘或购买，一定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同意。当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给了王道士一点点银子时，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将敦煌文书运到外国去，还可以向中国人夸示其所得。这种行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文物是花钱购买的，即“合法”获得的，至于价格是否公道，那只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了。

与此相同，当美国人华尔纳第二次来华，计划大规模盗劫敦煌壁画的阴谋失败后，哈佛大学就想到了斯坦因，建议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资两万英镑，请他组织前往新疆“考古”。1906 年 1 月底，斯坦因到达南京，透过英美两国的外交人员向中国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由于有了 1906 年的中瑞协议，因此南京政府立法院于 1906 年 2 月 10 日制定了《古物保存法》第 1 条，规定古物保管委员会是全国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最高专司机构，无该委员会与教育、内政两部合颁之发掘护照而掘古者以盗窃论罪。⁽²⁰⁵⁾所有外国考古队来华活动，必须有中国考古学家为共同领队，还必须要有中国学者参加，考察所得文物也不能携离中国。虽然在英美的压力下，斯坦因拿到了中国政府发的通行证，但通行证上没有说明他可以做什么。因此，当他在新疆偷挖文物后，中国政府便取消了其通行证，并没收了盗挖的文物，斯坦因只好半路折回。⁽²⁰⁶⁾

《古物保存法》是我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保护文物、维护文物主权的法规，它的颁布，标志着全社会文物主权意识的强化。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被盗事件。

【注释】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②《草册》原文引自子青《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载《西北日报》1937 年 7 月 15 日。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附录也录有此《草册》。

③苏莹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北魏写经颠末记》，载《西北日报》1937 年 7 月 15 日。

④该报告见苏莹辉《敦煌学概要》，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37 年 7 月。

⑤原载《图书季刊》新 7 卷 1 期（1937 年 7 月出版）。又见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⑥《西北日报》1937 年 7 月 15 日。

⑦苏莹辉《记本所新发见北魏写经（附录）》，载《西北日报》1937 年 7 月 15 日、7 月 16 日。

⑧阎文儒《莫高窟与敦煌》，载向达等著《敦煌》，学习书店 1937 年出版。

⑨载《文物参考资料》第 1 卷第 1 期，1937 年 7 月出版。

⑩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写本源自藏经洞》，载《敦煌研究》1982 年 1 期。施萍婷即施娉婷、施萍亭，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⑪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第 1 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⑫池田温《1982 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1982 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

⑬参阅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第 1 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池田温《1982 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1982 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

⑭ [法] 伯希和著, 耿昇、唐健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猿猿~~页, 甘肃人民出版社 ~~猿猿~~年出版。

⑮参阅刘永曾《回鹘文写本与莫高窟第二藏经洞》, 载《敦煌研究》~~猿猿~~年 源期。

⑯参阅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 载《敦煌研究》试刊第 员期, 甘肃人民出版社 ~~猿猿~~年出版。

⑰参阅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 载《文物》~~猿猿~~年 员期。

⑱载《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 愿卷, ~~猿猿~~年安南出版。陆翔译文见 ~~猿猿~~年《北平图书馆馆刊》怨卷 缘号。

⑲载《文物》~~猿猿~~年 远期。

⑳载《~~猿猿~~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猿猿~~年版。

㉑载《文物》~~猿猿~~年 怨期。

㉒载《敦煌研究》~~猿猿~~年 源期。

㉓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圆卷, 北京大学出版 ~~猿猿~~年出版。

㉔载《~~猿猿~~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 甘肃人民出版社 ~~猿猿~~年出版。

㉕载《西北史地》~~猿猿~~年 猿期。

㉖载《河南博物馆馆刊》第 员集, 转引自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

㉗载《文史知识》~~猿猿~~年 员期。

㉘载《中国社会科学》~~猿猿~~年 缘期。

㉙“第 猿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会议敦煌组论文”, ~~猿猿~~年 愿月香港。

㉚载《~~猿猿~~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猿猿~~年出版。

㉛译文载《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 ~~猿猿~~年 员月出版。

㉜载《阳关》~~猿猿~~年 圆期。

㉝加兰·坎在《东方仲斯》第 员页, 伦敦亚洲出版社 ~~猿猿~~年版, 转引自 [英] 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 考古与探险》第 圆页,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猿猿~~年出版。

③④斯坦因著、殷晴等译《沙埋和阗废墟记》~~第171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③⑤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1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8年~~联合出版。

③⑥转引自[英]珍妮特·米斯基著、田卫疆等译《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③⑦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172页~~。

③⑧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载《王国维遗书》第~~171~~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

③⑨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④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1页~~。

④②《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1页~~。

④③《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1页~~。

④④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④⑤《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1页~~。

④⑥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④⑦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④⑧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

④⑨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④⑩《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1页~~。

⑤①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⑤②《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71页~~。

⑤③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⑤④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

⑤⑤《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⑤⑥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⑤⑦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172页~~。

⑤⑧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172页~~。

⑤⑨见《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⑤⑩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⑥①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171页~~。

⑥1 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猿猿页。

⑥2 《外交部卷（员愿年 远月，愿—愿号）》，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猿猿页。

⑥3 斯坦因著、王竹书译《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怨卷第 缘号。

⑥4 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猿猿页。

⑥5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员愿页。

⑥6 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猿猿页。

⑥7 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猿猿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⑥8 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员缘页。

⑥9 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作者前言。

⑦0 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员缘页。

⑦1 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载《汉学研究》员愿年第 源卷 圆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

⑦2 员愿年 源月 员日斯坦因致艾伦函，参阅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

⑦3 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

⑦4 关于英藏敦煌文献文物的编目、收藏情况，详见荣新江先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 员章“英国收藏品”，江西人民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⑦5 〔法〕酝 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员愿年 愿期。

⑦6 〔法〕酝 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员愿年 愿期。

⑦7 《戴密微汉学论文选》，员愿年荷兰莱顿出版，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员愿年 员期。

⑦8 〔法〕谢和耐《二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员愿年 猿期。

⑦9 见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张元济诗文》第 圆卷—圆原页，员愿年版。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员愿年 缘期。

⑧⑩《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见1937年1月15日《北平晨报》，转引自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1996年1期。

⑧⑪郭恩《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⑧⑫[法] 酡 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1期。

⑧⑬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5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⑧⑭转引自〔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5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⑧⑮郭恩《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序言》。

⑧⑯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55页。

⑧⑰陆翔译文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9卷第1号。

⑧⑱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55页。

⑧⑲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55页。

⑧⑳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55页。

⑧㉑参阅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151—15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⑧㉒《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55页。

⑧㉓《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55页。

⑧㉔参阅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15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⑧㉕芳若望《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前言》。

⑧㉖沈绂译《伯希和氏演说》，罗振玉辑《流沙访古记》。

⑧㉗参阅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1996年1期。

⑧㉘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

⑧㉙《敦煌石窟》第一卷前言，转引自〔法〕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⑧㉚〔法〕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一卷序言，耿昇译文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年1期。

⑧㉛参阅郭恩《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序言》。

⑩²参阅李伟国《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导言》。

⑩³张广达《国外近年对敦煌写本的编目工作》，载《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九八二年~~期。

⑩⁴参阅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载《敦煌学辑刊》~~一九八二年~~期。

⑩⁵参阅〔法〕苏合·福奇兀著、杨汉章译《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载《敦煌研究》~~一九八二年~~源期。

⑩⁶〔日〕金子民雄《橘瑞超 中亚探险 前言》，见〔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译《中亚探险》，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

⑩⁷参阅〔日〕金子民雄《橘瑞超 中亚探险 前言》。

⑩⁸转引自〔日〕小笠原宣秀《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探险队带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综述》，见《中亚探险·附录》。

⑩⁹以上参阅〔日〕金子民雄《橘瑞超 中亚探险 前言》。

⑩¹⁰《中亚探险》~~猿猿—猿源~~页。

⑩¹¹《中亚探险》~~猿猿~~页。

⑩¹²《中亚探险》~~猿源~~页。

⑩¹³《中亚探险》~~猿猿~~页。

⑩¹⁴《中亚探险》~~猿猿~~页。

⑩¹⁵〔日〕杉森久英、藤枝晃《有关大谷探险队的答问》，载《敦煌研究》~~一九八二年~~源期。

⑩¹⁶参阅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载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一九八二年~~；又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猿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

⑩¹⁷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猿怨—猿圆~~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载《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猿期。

⑩¹⁸喀什噶尔，即喀什。维吾尔语称喀什噶尔。

⑩¹⁹参阅〔俄〕孟列夫《~~猿源—猿缘~~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猿~~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

⑩²⁰远东，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最东部地区的称呼，以后广泛流行。一般指中国、朝鲜、日本和前苏联太平洋地区。

⑩²¹〔日〕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猿~~页，转引自姜

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⑫²²达布斯《中国土耳其斯坦探查发现史》，黄振华译为《新疆探查史》。

⑫²³亚洲博物馆成立于 1855 年，是今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前身，1856 年 缘月，在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东方学家委员会和突厥语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该东方学研究所 1859—1860 年曾改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1860 年东方学研究所迁至莫斯科时在列宁格勒设立了分所。该分所于 1863 年在原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手稿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⑫²⁴参阅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⑫²⁵〔苏〕纳季洛娃《谢·菲·奥里登堡对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北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续建宜译文载《西北民族研究》1985 年 四期。

⑫²⁶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成立于 1764 年，所属东方部成立于 1806 年，鄂登堡对东方部的建立给予过积极支持。该部主要收采、整理和研究东方文物、绘画及其他文献资料。

⑫²⁷《俄国中亚与东亚研究委员会备忘录》，转引自〔俄〕Л·耘斯卡奇科夫《1859—1860 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缘辑。

⑫²⁸参阅〔俄〕Л·耘斯卡奇科夫《1859—1860 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

⑫²⁹参阅〔苏〕纳季洛娃《谢·菲·奥里登堡对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

⑫³⁰参阅〔俄〕Л·耘斯卡奇科夫《1859—1860 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

⑫³¹费德林《敦煌写本（论文学的相互关系）》，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56 年 缘期。耿昇译文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⑫³²蒙西科夫（即孟列夫）《论古代中国的写本文献》，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56 年 缘期。

⑫³³参阅〔日〕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论》，耿昇译文载《敦煌译丛》。

⑫³⁴参阅张惠明《1859 年至 1860 年俄国人在中国丝路探险与中国佛教艺术品的流失》，载《敦煌研究》1986 年 1 期。

⑬参阅王克孝《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敦煌文物收藏品概况》，载《敦煌研究》~~1982~~年源期。

⑭〔俄〕孟列夫《~~1959—1960~~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⑮载圣彼得堡出版的《科学通报》。

⑯载《东方学杂志》圆卷。

⑰载《东方目录学》~~1982~~年苑期。

⑱载《东方目录学》~~1982~~年愿—怨期。

⑲徐文堪《郑振铎与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献——记西谛先生的一通手札》，载《读书》~~1982~~年庚期。

⑳蒙西科夫（即孟列夫）《论古代中国的写本文献》，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82~~年缘期。

㉑〔法〕戴密微《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耿昇译文载《敦煌译丛》。

㉒《汉学研究》~~1982~~年源卷圆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

㉓参阅沙虹骏《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代表团应邀访苏》，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2~~年圆期。

㉔李正宇《俄藏中国西北文物经眼记》，载《敦煌研究》~~1982~~年猿期。

㉕参阅施萍婷《俄藏敦煌文献（~~1959—1960~~）之研究》，载《敦煌研究》~~1982~~年第猿期。

㉖〔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98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㉗《兰登·华尔纳》一书第六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载《西北史地》~~1982~~年源期。

㉘《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982~~页。

㉙参阅王冀青《昆廷·罗斯福的敦煌壁画摄影计划》，载《丝绸之路》~~1982~~年猿期。

㉚参阅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载《西北史地》~~1982~~年源期。

㉛《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982~~页。

㉜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982~~页。

⑮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⑯《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⑰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⑱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⑲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⑳《兰登·华尔纳》一书第 远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㉑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㉒《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㉓《兰登·华尔纳》一书第六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㉔陈万里《西行日记》。

㉕参阅常书鸿《控诉美国强盗盗窃敦煌文物罪行》，载《光明日报》~~1956~~¹⁹⁵⁷年 源月 缘日。

㉖《兰登·华尔纳》一书第六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㉗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㉘《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04~~¹⁰⁵页。

㉙陈万里《西行日记》。

㉚《兰登·华尔纳》一书第 远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㉛《兰登·华尔纳》一书第 远章《福格两次中国考察》，转引自董念清《华尔纳与两次福格中国考察述论》。

㉜徐威《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载《中华读书报》~~1985~~¹⁹⁸⁶年 圆月 缘日。

㉝参阅〔日〕秋山光和《敦煌壁画研究新资料》，载《敦煌研究》试刊第 员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¹⁹⁸⁵年出版。

㉞文物出版社 ~~1984~~¹⁹⁸⁵年出版。

㉟见潘洁兹《敦煌莫高窟艺术》~~146~~¹⁴⁷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¹⁹⁵⁶年出版。

㊱见王冀青、〔美〕莫洛斯基《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载《敦煌学辑刊》~~1985~~¹⁹⁸⁶年 员期。

①77参阅王冀青、[美]莫洛索斯基《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1期。

①78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原载1945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4分册。又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①79谢稚柳《鉴余杂稿·敦煌石室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①80转引自卢秀文《敦煌学编年》，载《敦煌研究》1985年1期。

①81转引自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198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①82转引自[日]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

①83参阅罗继祖《庭闻忆略》194页，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辑出版。

①84见《学部官报》1911期，转引自姜亮夫《莫高窟年表》2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①85参阅罗继祖《庭闻忆略》194—195页。

①86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旧称，创建于1902年，是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现代综合性大学。1902年5月，京师大学堂上折奏请开办分科大学（相当于后来的专科学院）。经朝廷准奏，京师大学堂原定八个分科大学中的七个即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于1902年7月1日开学。原定的医科大学因监督屈永秋未到任，无人主持筹办，而未同时开办。监督相当于校长。农科监督相当于农学院院长。

①87参阅谢稚柳《鉴余杂稿·敦煌石室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①88原载《金匱论古综合刊》第1期，后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下，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①89寄传庵《敦煌目录序》，转引自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

①90[日]藤枝晃《长行马》，载《墨美》15号（1952年12月），转引自陈国灿《东访吐鲁番文书记要（一）》，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0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①91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

①92谢稚柳《鉴余杂稿·敦煌石室记》。

①93转引自罗继祖《敦煌藏卷劫余小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 圆辑，该文为“给批放行”。罗继祖《庭闻忆略》改为“给札放行”，今依后书改。

①94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

①95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序》。

①96参阅《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 237页。

①97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 愿—愿页。

①98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 愿页。

①99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 愿页。

②00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 愿页。

②01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 愿页。

②02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 愿页。

②03王圆箎《催募经款草册》，原件现藏敦煌研究院。

②04转引自《斯坦因：考古与探险》第 愿页。

②05参阅王冀青《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发现的文物》，载《九州学刊》远卷 源期（愿缘年 猿月）。

②06参阅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第 愿—愿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愿缘年出版。

第四章

敦煌遗书

——百科全书式的宝藏

敦煌遗书发现后，即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除了其本身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外，还在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原始记录，未经后人的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被称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乃至宋初，官府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敦煌所出社会生活文书，虽然大部分残缺不全，但却是这一时期仅存下来的官府档案，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必然会使我们对魏晋隋唐五代及宋初的历史有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获得新进展。

一、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敦煌遗书中的历史学资料极为丰富，有的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籍之讹误，特别是一些有关西北边陲史地研究的资料，尤为可贵，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的史学材料包括法制文书、官府文书、田制文书、户籍、手实、差科簿及与计帐有关的资料、赋役制文书、寺院经济资料、各种契约以及有关公廨钱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例如律、令、格、式是唐代法制文书的主体。唐律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但令、格、式却大多都散失了。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因而无法了解唐代令、格、式的详细情况。而敦煌遗书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格、式，如《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孕·源₁源₂杂·员₁源₂杂·猿₁猿₂杂·员₁源₂）、孕·圆₁源₂《开元公式令残卷》、孕·猿₁猿₂和杂·源₁源₂《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杂·员₁源₂《开元户部格残卷》、周字₁缘₂号《开元职方格断片》、孕·源₁源₂《开元兵部选格断片》、孕·源₁源₂《贞观吏部式断片》、孕·圆₁源₂《开元水部式残卷》、孕·圆₁源₂《天宝令式表残卷》等等，虽然都有残缺，但却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这些令、格、式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唐代官制、法制及水利灌溉多方面的原始史料，可补一般文献史籍之不足。^①

《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虽然首部和中部残缺甚多，但还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宫诸府的职员分布及职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令的一些具体情况。如东宫“司经局：洗马二人（掌经史图籍，判局事），书令史二人（掌行署文案。余局书令史准此），书史四人（掌同书令史），校书四人（掌雠校经籍），正字二人（掌刊正文字），典书二人（掌四部经籍，行署校写功程料度文案），装书生四人（掌装潢经籍），楷书令史卅人（掌写经籍），掌固四人。典膳局：典膳监二人（掌监膳食，进食先

尝，判局事），丞二人（掌检校局事。若监并无，则一人判局事。余准此），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主食六人（掌调和鼎味之食），典食二百人（掌造膳食及器皿之事），掌固四人。药藏局：药藏监二人（掌合和药，判局事），丞二人，书令史一人，书吏二人，侍医四人（掌和药、诊候），典药九人（掌供进药），药童十二人（掌捣节诸药），掌固六人”。这卷文书共 10 行，钤有多方“凉州都督府之印”，卷首并有“沙州写律令典赵元简初校”、“典田怀悟再校”及“凉州法曹参军王义”等字样，这说明此卷唐令残卷乃凉州都督府作为正式文书保存之官写本，其权威性无可置疑。^②

在赋役、田制方面，敦煌遗书的价值也是如此。如 杂·S.465v《西凉建初十二年（源元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是目前所知留存下来的十六国时代惟一的一件户籍，该写本前残后缺，只保留有兵裴晟、散阴怀、兵裴保、散吕沾石、兵吕德年、大府吏隋嵩、散隋杨、散唐黄等八户的户籍。从这八户户主前的称谓可知，当时将户分为兵、散、大府吏等类，每户的人口又据年龄性别区分为丁男、次男、小男、女几种，这基本上是西晋户调式的延续，但在丁、次的标准上又略有变通。《晋书·食货志》载：“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少。”但在西凉户籍残卷中，女口不分丁、次，吕沾石和吕德年 16 岁的男子都为小男，裴晟 15 岁的男子仍为次男，与晋初的情况不同。这或许与当时敦煌国泰民安、人口较多有关。即使这样，这份户籍残卷对我们了解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户籍制的演变，还是十分重要的。

再如 杂·S.465v《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残卷》，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赋役制度的惟一出土文书。由于北朝均田制的情况，文献记载过于简略，致使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因

此，文书残卷乃成为深入研究北朝均田制度的宝贵资料。此件文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关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如田制就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等内容；丁户有老、丁、女、贱、婢等等；纳税量词有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等。通过对这件文书的多角度和各个侧面的研究，可以了解北朝田制及赋税制度的许多问题，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

圆媛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

敦煌遗书的发现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纠正或补充了一些课题的已有结论，并使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如关于唐代均田制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探讨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唐代的均田制是否实行？其实行的情况与唐田令的规定是否一致？对此学术界进行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但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通过对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研究，从而证明唐代均田制确实实行了，并基本上是按照唐田令的规定实行的。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初武德七年田令规定：“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③

唐开元七年田令规定：“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若应收受（应作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历，十一月，县令亲自给授，十二月内毕”。^④

这两次田令中规定的“收田”（从受田农民方面讲就是“退田”）、“授田”，也就是“给田”（从受田农民方面讲就是“受田”），是实行均田制的两个重要环节。因此，要了解均田制是否真的实行以及实行的具体情况，就要找到关于退田、给田以及欠田的具体记录，然而这样的具体记录在一般文献中是找不到

的。而保留至今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退田文书、给田文书和欠田文书恰好是当时的具体记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材料。^⑤

敦煌文书 孕·~~国~~源《唐先天二年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孕·~~国~~源《开元四年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孕·~~国~~源《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孕·~~国~~源《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莫高乡籍》、孕·~~国~~源《天宝三载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杂·~~国~~源《天宝三载敦煌县效谷乡□□里籍》、《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孕·~~国~~源 猿·~~国~~源等）、杂·~~国~~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等等，都有许多有关实行均田制的具体记载。如孕·猿·~~国~~源《武则天圣历三年帐后沙州敦煌县效谷乡户籍残卷》所载某户田籍：

摇摇摇摇贰拾捌亩已受
合应受田捌拾壹亩
五十三亩未受
一段拾贰亩永业（四至略）
一段五亩永业
一段五亩（三亩永业，二亩口分）
一段六亩口分

同卷所載常辨才戶田籍：

摇摇摇摇十八亩永业
摇摇摇摇拾捌亩已受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摇摇一亩居住园宅
摇摇摇摇一顷一十三亩未受

上引文书将每户应受田数、已受田数、未受田数、已受永业田和口分田总数，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其他文书中还有许多有关退田、欠田的记载。通过对这些文书的整理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均田制确实实行了。至于授田亩数严重不足等，则是均田制实行过程中的问题。

另如玄武门之变，乃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能夺取玄武门的控制权？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何能杀建成、元吉，夺取皇帝的宝座？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文献记载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终不得其解。可喜的是，敦煌文书的有关资料，为我们了解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提供了一把锁钥。

《通鉴》卷一百一十五高祖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六月一日）条载：

摇摇摇摇尉迟敬德曰：王（太宗）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德已乎！

庚申（六月四日），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

由此可知，此时世民与建成、元吉的矛盾到了你死我活的最后时刻。在这种危急关头，太宗居然能够把亲兵八百人执枪披甲地遣入宫内，并在六月四日亲自率长孙无忌埋伏到宫廷要地——玄武门。其原因何在呢？

从史料记载双方的激战可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以玄武门宿卫兵及世民秦府兵为一方，以建成东宫兵及元吉齐府兵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战斗情况看，太宗的情势是很危险的，因此，常何及其所领宿卫兵是否忠于太宗，则是关系到世民成败的关键。由此可知玄武门事变中太宗之成功，主要是由于玄

武门之宿卫常何及其部下转向太宗。同时说明，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建立了重大功勋。

我们知道，在六月四日事件中，玄武门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建成、元吉为何不加防备？太宗死党为何能事先占据此要害之地？这都须从当时玄武门守将常何处寻找答案。

常何，乃隋末唐初的一个重要人物。但由于《隋书》中未提到常何，两唐书只在《马周传》、《东夷传·高丽》、《李密传》和《太宗本纪》中简略提及，且语焉不详。因此长期以来对常何的研究甚少。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卷李义府撰《常何墓碑》，从而为我们研究常何其人及隋末唐初的政治史提供了宝贵材料。^⑥

据 孕·~~圆~~《常何墓碑》载：

摇摇摇摇太宗文皇帝出讨东都，以公为左右骁骑。……令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勣穷追员朗……（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从《墓碑》记载可知，在玄武门事变之前，常何曾于武德四年随李世民出讨东都，一年后又从建成讨平河北。之后又成为李勣的部下。与世民、建成本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更不是他们的心腹亲随。而这正是太宗能够用重金收买常何及其部下的有利条件，而建成也因常何是其旧部而不怀疑。正由于此故，所以“太宗能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预伏其徒党于玄武门，而守卫将士亦竟不之发觉。建成、元吉虽先有警告，而不以为意者，殆必以常何辈守卫玄武门之将士至少非太宗之党徒也”。^⑦

太宗收买常何后，将其安插在玄武门驻守，帮助其发动事变，争夺皇位。《墓碑》所说“趋奉藩朝，参闻霸略”，即指此而言。

关于太宗杀兄夺位之事，杂·~~圆~~《唐太宗入冥记》中也有曲折的反映。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在唐代是讳莫能言的，但《唐太宗入冥记》则巧妙地让冤魂在冥司诉讼。它将人世间的行私舞弊丑剧，移在地狱演出，让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向司命判官营私行贿。

《唐太宗入冥记》在叙述太宗到了地狱冥司的种种心态后，接着写道：

摇摇摇摇皇帝遂依崔子玉所请，进步而行。崔子玉前，皇帝随后，入得屏墙内东面，见有廿所已来，皇帝问从者：“第六曹司内有两人哭为何事？得尔许哀”。崔子玉奏曰：“不是余人，建成、元吉二太子。”皇帝闻之，□□语崔子玉曰：“朕不因卿追来到此，凭何得见兄弟□？”崔子玉奏曰：“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对直。称诉冤屈，词状颇切，所以追到陛下对直。陛下若不见兄弟，臣与陛下作计校有路；陛下若入曹司，与二太子相见，恰是冤家相逢，臣亦无门救得陛下，应不得却归长安。惟陛下不用看去，甚将稳便。”帝闻此语，更不敢多问，遂匆匆上厅而坐……（崔子玉对皇帝）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七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唐太宗入冥记》虽然属于小说家言，其主要内容也不是讲玄武门之变，但它与敦煌写本《黄仕强传》一样，“都是中国化了的富有民族特色、带有浓烈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它们一定要反映某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

也曲折、隐晦地反映了玄武门事变的部分真相。

敦煌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敦煌遗书的发现，填补了历史研究、尤其是晚唐五代西北史地研究的空白。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西，中断了河西与长安的联络。此后，史籍文献对河西地区的情况鲜有记载，即使某些零散记述，也多属传闻，不太准确。幸而敦煌遗书中有许多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文书，使河西地区的历史借此得以明了。

《元和郡县图志》卷源载：“沙州，建中二年陷于西蕃”。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也说“建中初陷吐蕃”。至于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统治者，收复沙州的时间，史籍文献均载在大中五年（~~愿~~源年），而敦煌遗书则载为大中二年，如杂·~~愿~~源《沙州图经》曰：“建中初陷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孕·~~源~~源《辛未年七月西汉金山国文件》载：“沙州本是大唐州郡，去天宝年中，安禄山作乱，河西一道，因兹陷没一百余年，名管蕃中。至大中三年，本使太保起敦甲兵，□却吐蕃，再有收复”；杂·~~源~~源《张氏修功德记》曰：“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紆道驰函（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载，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上献天子），上达天闻。”

从以上敦煌文书的记载可知，沙州收复在大中二年，然而由于河西阻隔，表文无法顺利到达长安，故在大中五年使者才将表文送达朝廷，故史书均载为五年。由此看出，唐实录及诸史所记地方事，常以消息或表奏到达朝廷日为准，而当时当地实物所记则最为可靠。

吐蕃占领沙州六十余年，其推行的制度是什么？这是学术界一直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据杂·~~源~~源背《子年汜履倩等户手实》、杂·~~源~~源《辰年三月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等文书内容可知，吐蕃占领沙州后不久，约在~~源~~源年即派出“莫使”进行了勘查

户口的活动，~~雍熙~~年又将基层居民分成部落制形式来管理。据两件《吐蕃沙州诸户口数地亩簿》（~~杂·源元~~ ~~杂·怨缘~~）分析，吐蕃在沙州实行了按户计口授给“突田”的突田制，不分男女老少，每人一突即十亩。^⑨

杂·~~源元~~《酉年沙州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牒》曰：

摇摇城南七里神农河母，两勒泛水，游淤沙坑，空地两段共叁突。右南沙灌进渠用水百姓李进评等，为已前移灌进口，向五石口前逐便取水。本无过水渠道，遂凭刘屯子边，卖合行人地壹突用水。今刘屯子言：是行人突地，依籍我收，地一任渠人别运。……

文书中提到“空地两段共叁突”。可见空地可以用“突”来计量。从李进评等从刘屯子边买得“行人地壹突用水”亦可知，“突”是土地计量单位。另外，~~杂·源元~~文书第一行有“八突”字样，其后则有明细的亩数记录。另如 ~~孕·獠源~~《崇恩析产牒》源至 缘行有“无穷地两突，延康地两突”等，都是以“突”作为土地计量单位的。

作为土地计量单位的“突”，一突是多少呢？通过对《沙州诸户口数地亩簿》的分析可知，一突等于唐制十亩，半突等于五亩。

通过对以上文书的分析探讨，使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吐蕃奴隶主在管辖河西地区的同时，其奴隶制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其中如大规模杀掠、徙民政策转变为丈量土地、收取赋税。吐蕃为了对沙州进行有效地统治，曾进行过地亩清查和登记户口、田亩的工作，并适应汉人地区的情况将一“突”换算为唐制十亩，向土地耕作者收取赋税——突税，依附农民还要向土地占有者提供地租——突课。^⑩

大中二年（~~愿~~愿年），张议潮收复沙州后，被唐廷敕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八年，议潮东入长安，由其侄淮深代行归义军事务。大顺元年，淮深全家暴卒，由淮鼎继为归义军统治者，紧接着又由议潮婿索勋继任。到了~~愿~~愿年初，张承奉又掌归义军之权。这期间归义军的权力交替变故情况，文献史料基本上空白。幸赖《张淮深墓志铭》、《张氏勋德记》、《索勋纪德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诸文书及莫高窟题记才得以明了，然其中的细节过程还不十分清楚，隐伏的问题还不少，仍有待于史学界与敦煌学界的深入探讨。

新旧《五代史·吐蕃传》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这是史籍上对金山国及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的惟一记载，更多的情况却无从得知。而敦煌遗书~~孕·~~孕·~~愿~~愿原背《张永进上金山天子白雀歌》、~~孕·~~孕·~~愿~~愿原背《龙泉神剑歌》、~~孕·~~孕·~~愿~~愿原背《辛未年七月沙州百姓万人上回鹘天可汗书》、~~孕·~~孕·~~愿~~愿原背《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等文书却具体记述了这部分历史，从而使“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反映归义军时期人民生活的各种文书，如租佃、质典、买卖、雇佣、便粮油历、社司转帖以及民间各种诉状、辞牒等，都是研究唐末五代及宋初这一地区人民生活的宝贵材料。其中的寺院经济文书，是研究唐五代寺院经济的绝好材料；再如民间俗文学作品，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都反映了当时人物的经历和事件，是研究河西历史值得参考的重要资料。

敦煌遗书中还有许多地方志材料，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城土境》、《沙州地志》、《寿昌县地境》、《沙州伊州地志》、《西州图经》、《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敦煌录》等等，均是研究西北史，尤其是敦煌史地的宝贵材料。通过对其挖

掘、整理、探讨，可以填补地方史研究的空白。其中尤以《沙州都督府图经》最为重要。

《沙州都督府图经》为历来官私目录所未著录，也未为类书、史书、史注所证引。这卷文书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地理、自然资源以及中西交通方面如水渠、泊泽、池堰、古城、驿站、学校、殿堂、祥瑞、歌谣等史料，其内容极为丰富，对汉唐丝路研究及古城考证，极有价值。

综上所述，敦煌遗书直接补充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如果将文书与史籍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钩沉稽佚，层层深入，并由微观到宏观作出分析认识，必将会促进历史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会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

二、宗教研究的新材料

敦煌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咽喉，中西交通的一大都会，是最先接受外来思想的地方，也是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佛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是经敦煌传入中原地区的，因而敦煌遗书中有关宗教的卷子特别多，通过对其挖掘、整理，可以为宗教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员援“佛教遗书”甲天下

在敦煌遗书中，大约 忽圆像 以上的卷子都是佛教文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将敦煌遗书称为“佛教遗书”。

从敦煌遗书纪年题记看，佛教卷子最早的是日本中村不折氏藏《譬喻经》（散 苑 苑），该卷尾端有“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中写迄”题记。此甘露乃前秦苻坚年号，即公元猿怨年。其次为杂· 苑 苑《十诵比丘戒本》，其尾题有“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戊时，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县戒”题

记，可知此卷乃西凉李暠建初元年抄卷，即公元439年写本。最晚者为北图收字源号《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门戒品》，该经有“至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灵图寺”题记，可知乃公元925年写本。其次，俄藏《曹宗寿造帙疏》有“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题记，可知此卷为公元995年写本。

敦煌佛教卷子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地流传而来。中原的帝王将相、世家豪族，不乏崇信佛教者。他们常常做这种“写经功德”，将写经分送全国各大寺院“供养”。张、曹归义军时期，每当向中原朝廷进贡时，还附带“请经”，而朝廷的回赐物中，也常常有佛经。如杂·圆源《沙州乞经状》曰：“沙州先得帝王恩赐藏经，即今遗失旧本，无可寻觅欠数，却于上都乞求者”。另外，求法的僧侣、东西往来的商人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一些佛经。二是本地的译经、疏释、著录及刻写本。从现有题记可知，敦煌早就有了自己的译场，从北魏开始就有了专门的写经生。这些写经生靠替施主抄写佛经而生活。除此之外，还有僧众学习用的佛经和注解，有敦煌州县学校讲给学生听的课本和学生听讲诵习记下来的笔记等等。^⑪

敦煌佛经的内容十分庞杂，根据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律、论类，即佛教的“三藏”。敦煌遗书中，佛教各宗派的卷子都有，有些甚至很多，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维摩诘经》等，多则几千号，少则也有数百号。尤为宝贵的是不少经卷附有题记，如北图藏生字圆源号和闰字怨远号《净名经关于释抄》的题记说：“此经翻传，总有六译：第一后汉刘氏灵帝代临淮清信士严佛调，于洛阳白马寺译两卷《维摩诘经》。第二吴朝孙氏大皇帝月氏国优婆塞支谦于武康译三卷，名《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第三西晋司马氏武帝沙门竺法护，西域人，解三十六

国语，于洛阳译一卷，名《维摩诘所说法门经》。第四东晋惠帝西域沙门竺叔兰，元康六年洛阳译三卷，名《毗摩罗诘经》。第五后秦姚兴弘始八年三藏沙门鸠摩罗什于长安大寺译三卷，名《维摩诘所说经》，即今所译之本是也。第六大唐朝三藏沙门玄奘贞观二十一年于长安大慈恩寺译六卷，名《无垢称经》。”这条题记，将《维摩诘经》的翻译情况交待得清清楚楚，其对佛教翻译史的研究甚有意义。又如孕·~~国~~源《金刚经》前有抄经者所加的《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其尾题云：“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此经赞验功德记，添之流布，后为信士兼往亡灵及见在父母合邑等，福同春草，恶若秋苗，必定当来俱发佛会”。《金刚经》后记云：“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钞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别也。”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此经的流传过程。再如杂·~~国~~愿《宝雨经》残卷，乃达摩流支于则天长寿二年所译该经的第三个译本，与前两个译本相比，它多了一段武则天为自己称帝而造舆论的所谓“佛授记”，卷末题记中有许多武周新字，而领衔的是“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说明这一佛记的出笼与薛怀义关系密切，于唐代政治史的研究甚有价值。此外，敦煌佛经上还有一些私人题记，写明某人为了某功德而敬造某经典，是我们研究当时佛教现状及佛典崇拜、功德思想的重要资料。

（圆）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的佛经。按照我国的传统，凡属翻译的域外佛教典籍，一般都应入藏。那为什么会有许多藏外佚经呢？这是由于唐末五代时，我国各地寺庙逐渐以《开元录·入藏录》所著录的~~国~~部~~缘~~愿卷佛典为大藏的标准数目，并以此组织本地大藏。而一些《开元录·入藏录》未著录的佛典便被排除在外。就敦煌而言，曾有一个陷蕃时期，当时的高僧法成翻译了一批著作，仅在敦煌流传，未被编入《开元录》，后又被藏入藏经洞。^⑫

敦煌藏外佚经发现后，即引起了佛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当1909年清学部将劫余敦煌遗书移交京师图书馆后，我国佛学专家李翊灼迅速对其通检一遍，将未入“藏”的佛经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疑伪外道目录附）》一卷，著录了154种藏外佛经。在李目的影响下，日本的佛学团体和佛学家，利用英、法、日所藏，又校订出近1000种藏外佛经，辑入1924年至1926年编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内的《古逸部》和《疑伪部》中。

敦煌藏外佛经的发现，为佛教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其中有些经典署名为马鸣、龙树、世亲著，他们都是古印度佛教大师。这些典籍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印度佛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汉藏佛教的交流，印度佛学大师的生平、著作及影响都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獭）疑伪经。一般说来，佛经是由印度梵文、巴利文，或中亚古语言文字翻译成汉文的佛教典籍。所谓“疑经”，是指真伪未判的经典；所谓“伪经”，是指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实际上，中国人撰述的经、律、论、章、疏，反映了中国的佛教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材料。但历代政府在组织编制《一切经》或《大藏经》时，一般不把这种所谓“疑伪经”编入，有的甚至禁止在《大藏经》内附“疑伪经”目录。因此，这类经典不仅为《大藏经》所未收，而且在内地也保存极少。^⑬敦煌佛经中，则保存有丰富的疑伪经，据初步整理，已有20余种。

（源）各种目录。敦煌遗书中各类佛经目录的数量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它全面反映了敦煌僧众围绕佛经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其中有许多珍贵资料，如《人集录都目》，是现存关于三阶教经典的最完整目录；《某寺历年配

补藏经录》，为我们解开佛教帙号这一千古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⑭尤其是《众经别录》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古典目录学，特别是佛经目录，提供了宝贵材料。

以上只是介绍了佛教遗书的几个主要方面，此外还有历史、寺院文书、音韵文学、逻辑（因明）学等方面的资料，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敦煌佛经在佛学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在校勘上的价值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足以校勘唐代以后开雕的各藏。敦煌写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所用底本多是最好的本子，而且书写后，由校勘人多次校正，错讹情况较少。如 杂· 通志《勘经僧名签》上有“李涓写，勘了；义泉勘了；王昌像海勘两遍了；常海慧炬勘了。” 杂· 源流《壬寅年三月二十九日再勘写经人及校字人数》载：“小马正书错画点，茂字、着字、本字、幼、旦、捐。王法律易。刘法律错书囊、波、疑……”。由此可知，其写经态度一丝不苟，是校勘上的最佳品。

第二，梵汉对照佛经。在敦煌佛经中，有一部分附有梵文原经，如 孕· 国缘 国愿《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孕· 国德《大智度论》，孕· 国近《金光明最胜王经》，孕· 国德《妙法莲花经》等，均附有梵文原经。而这些梵文原本，在印度本土也早已散佚了。现在就有可能利用这批梵文本再移译，修正古译本在译文上的缺点和不足，更正确地认识这些佛经的宗旨。^⑮

圆觉道教典籍

敦煌的道教，是隋炀帝时传入的。大业年间，炀帝在令裴矩主持张掖互市的同时，还于大业五年（~~通志~~ 609年）西巡河西陇右。在炀帝到达河西时，西域诸国纷纷前来朝贺，而炀帝本人也是佛道兼崇。“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

之四道场”。“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⑩帝王的提倡，道教本身的发展兴盛，丝绸之路河西段的再次开通，就为敦煌道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这许多因素的有机结合，也正是隋代敦煌道教发展的历史背景。

敦煌的道教文献约有缘万件，其来源有二：

一是外地流入者，如杂·员·缘《一切道经序》、杂·员·缘《金真玉光八景飞经》、孕·圆·缘《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孕·圆·缘《十戒经》、孕·圆·缘《阅紫录仪三年一说》、孕·圆·缘《老子道德经》、孕·圆·缘《通玄真经》、孕·圆·缘《太上大道玉清经》、日本京都博物馆藏《太上业报因缘经》等。根据这些道教经文的题记就可知道，它们或直接出于宫廷，或为京城道观所写，然后辗转流入了敦煌。如孕·圆·缘《通玄真经》中“开元圣文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的题记，就是出于宫廷的明证。

二是敦煌道教徒外出请经、抄经得来的。每一种宗教，其信徒都是十分虔诚的，他们为了自己所信仰宗教的发展，可以尽最大的努力来弘扬或布道。从有关记载可知，敦煌的道教徒也曾不辞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外出请经、抄经。如罗振玉旧藏《本际经》卷缘有题记为：“冲虚观主宋妙仙入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今为写此经”。另如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第员·缘号有题记曰：“大周长寿二年（缘·缘年）九月一日，沙州神泉观道士索□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正是敦煌道教徒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才使许多道教经典能够从京城传到敦煌，并继续在本土抄写流传。

不论哪种来源都可看到，敦煌道教直接受京城道教的影响，所以敦煌道教典籍用纸之品质、书法之工整、品式之考究等，都在其他许多写本之上。遗憾的是，道教在敦煌发展的规模和时间

均有限，道经也自然遭受到了严重损坏，其背面多为佛教写经或学郎习字之用。

伴随着敦煌道教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道教经典，而且还出现了道教徒的活动场所——道观。从现有资料可知，敦煌的道观共有缘座，即神泉观、开元观、冲虚观、灵图观和龙兴观。

敦煌道教的发展历程，既与全国道教的发展有一致之处，又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从敦煌道教文献的流传及写经题记可知，唐前期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吐蕃占领敦煌后，由于吐蕃统治者只崇信佛教，敦煌的道教在至德以后便逐渐衰落了，再加上敦煌在地理位置上与西域的接触更为密切，受佛教影响更深，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直接。因此，直到晚唐五代北宋时期，敦煌道教仍然无法恢复到唐前期的鼎盛状态。^{①7}

《道德经》乃敦煌遗书中的主要道教典籍，在道教研究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一定的价值。今本《道德经》二卷，乃唐以前的定本。但在唐以前也有以《道经》为下卷，《德经》为上卷者，却不为学人所习闻。敦煌遗书中则有明确的反映，如孕·
 圆缘 圆缘 圆缘，皆题曰《道经下》或《老子道经下》，孕·
 圆原 圆精 圆精皆题曰《老子德经上》。灵·
 圆年山东银雀山发现的
 的本子也是《德经》上，《道经》下。由此可知，以“德”、“道”
 为上下是战国以来就存在的，唐写本还保存了旧本，这是很宝贵的。^⑮

敦煌《道德经》主要是河上公注本。自后汉以来，《道德经》就流传着两种注本：一是王弼注本，主要讲《道德经》的理论，是给读书人看的；另一是河上公注本，是给道士看的。河上公注本往往把道教的许多东西，如《洞玄经》等，都放在《道德经》后面。

敦煌另一主要道教典籍为《老子化胡经》。自佛教传入中国

后，就与道教、儒教发生了关系，并相互批评、攻击。道家反对佛教的东西，最重要的莫过于《老子化胡经》。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老子化胡经》的缘个卷子（孕·~~四四源~~ ~~四四范~~ ~~猿猿源~~ 杂·~~猿猿范~~ ~~猿猿源~~），通过对其整理、校勘，可知大概情况。^①《老子化胡经》说，老聃曾经到西藏、印度去讲学，结果把胡人都感化了，都从了老子的道，甚至还说释迦牟尼佛是老子的弟子。另外，道家的寺观里有三清殿，所谓老子一气化三清，就是中间老子，左边释迦牟尼，右边孔子。

《本际经》也是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一重要道教文献，它全称《太玄真一本际经》或《太玄真一本际妙经》，是隋唐时期出现的道教文献。据有关材料可知，隋朝道士刘进喜写出《本际经》五卷，初唐道士李仲卿又续成十卷。“安史之乱”后，该经已大部分散佚，明代《正统道藏》中所收《本际经》已经是非常少的一点零卷断篇。现行本《道藏》失收。

敦煌遗书中的《本际经》写本多达 ~~四四~~ 余件，几乎占已发现敦煌道教写经总数的四分之一，今散藏于世界各地。除法藏最多外（~~猿猿~~件），伦敦、圣彼得堡、北京均有一定数量的收藏。此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这些敦煌写本的发现，既可以弥补现行《道藏》的缺失，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这部中古道家经典。

《本际经》表现了隋唐道教所达到的极高水平，反映了中国人对理性智慧和生命理想的不懈追求，因此，它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极大重视。其后的道教类书及其他典籍都曾大量征引其内容，唐高宗、武则天在为其亡太子李弘所写的道经中就包括《本际经》。唐玄宗时，更两次敕令天下道观转写《本际经》经文，从敦煌写本《本际经》的题记来看，也多写于盛唐时期。^②

援景教文献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是以聂斯脱利命名的所谓“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是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大主教。公元451年，在以弗所举行的一次教会主教会议上，他被指控为主张所谓“二位二性”神学的“异端”而被革了职，后被流放致死。从此以后，凡是同情和支持他的人都被称为“聂斯脱利派”。

在唐朝太宗时期，聂派传教士就把基督教传入中国。但在7世纪以前，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史实，直到明代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们才知道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传教士确实在太宗贞观九年来到了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建立的，它是景教传入中国最有力的物证。但由于景教文献很少，因而我们无法对其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可喜的是，在景教碑于1625年出土后，又过了近三百年，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七种有关唐朝景教的文献，丰富了景教研究的内容。^②这些文献都为黄麻纸卷轴的手抄本，现将其简介如下：

摇摇（员）《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被伯希和劫往巴黎，编号为孕·猿苑这是教会普遍使用的“荣归主颂”的叙利亚版的唐代译本，带有佛教语气。所谓“三威”，就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严；“蒙度”就是得蒙救赎的意思。从其内容可知，此件写成于公元八世纪，有的学者推测其为景教碑碑文的作者景净译出的。

这篇景教颂文，就其重要性而言，仅次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有些方面则比它更有意义。敦煌本《大秦景教

《三威蒙度赞》无残缺，共分三段，第一段为《三威蒙度赞》，第二段是圣徒名单和圣经目录，第三段是历史简述。我国教会员于1904年出版的《普天颂赞》曾将它放在第二首，为礼拜时会众歌颂之用。

(圆)《尊经》，此卷亦为伯希和劫往法国，其开头为“敬礼妙身皇父阿罗诃，应身皇子弥施诃。证身卢诃宁俱沙。已上三身同归一体。”然后列举了 圆位圣徒，其名字多由叙利亚文译音而来，其中能辨认的有 员位，多系《新约》、《旧约》中的人名，如瑜罕难即约翰、庐伽即路加、摩矩辞即马可、明泰即马太、牟世即摩西、宝路即保罗等。^②其后列举有《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牟世法王经》等 猿部经书，其中多由叙利亚文译音或译意而来，能辨认的很少。

《尊经》的最后有一段附录，颇有史料价值：“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部五百卅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叶夹，犹未翻译。”从其提到景净可知，《尊经》的著作时间当在他撰景教碑文的建中二年前后，即阿罗本来长安后约 员愿年之事。在这 员愿年中，景教诸经总共有 缘部，当时已经译成中文的只有 猿部，其他仍在贝叶皮夹中，尚未译出。在《尊经》所列举的 猿部中，有三种并非景教文献，而是属于摩尼教的。在现在已经发现的几种经中，只有《三威蒙度赞》是译作，其他多是用中文解释景教教义之作。

(猿)《志玄安乐经》，原为李盛铎收藏，现下落不明。最先研究此经的是日本羽田亨教授，他于 员愿年秋和杉村勇造氏同到天津向李氏请求借阅并准予抄录进行研究，翌年三月在《东洋学报》第 员愿卷第 员号发表《志玄安乐经》全文并加考释。

《志玄安乐经》共一千多句，据羽田亨说，本经是写在敦煌

经卷常用的黄麻纸上，细栏界上下和行间，首行前面和尾行后面，均有《志玄安乐经》题字，足见其首尾完整，但最初九行的下半截残缺。字体和《三威蒙度赞》很相近，为晚唐之物。

《志玄安乐经》是景净编撰的一本宗教小册子，它采取对话体形式，首先叙述弥施诃（即耶稣基督）和岑稳僧伽（西门彼得）以及其他群众在约旦河边某圣殿里集会。西门彼得问耶稣基督说：如何能得安乐道？耶稣回答说：通过“四法”（即无欲、无为、无德、无证）就可以得到安乐道。此外，对人间事物的认识，必须用十观法，即十种观点，否则就达不到目的。^{②③}

（源）《序听迷诗所经》，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梵文教授高楠顺次郎于 1904 年所得。据羽田亨研究，所谓“序听”即“序聪”，唐音读耶稣。“迷诗所”当为“迷诗诃”，即弥赛亚（基督）的音译，今可译作“耶稣基督经”。全经共有 14 行，每行约 16 字。其经文字聱牙难读，可能是景教经书中最古的一种。全文内容，始于迷诗所向众说法，作者在经文开头部分首先谈到上帝无人得见而又无所不在，然后谈人对上帝的依靠及偶像崇拜的兴起，如何区别干净食物与不干净食物，接着谈到人的三大义务（事天尊、事圣上、事父母），最后叙述了迷诗所的一生行事。该经字体与《一神论》相似，而且均不见《尊经》经目。据学者们推测，此经为早期译作，是阿罗本及其徒众翻译的。

（缘）《一神论》，此经为日本京都大学的富冈谦藏于 1905 年所得。它是由《喻第二》、《一天论第一》、《世尊布施论第三》三个小卷集合而成。此经首部残缺，现存 14 行。文字艰涩难读，断句都很困难，估计是景教早期的文献。原本的顺序被倒置了，《喻第二》反列为首卷，《一天论》却被列为第二，这可能是抄写人大意所致。此件的错字、别字、漏字也很多。至于内容，《一天论》主要讲景教的神学和哲学，《喻第二》则用种种比喻来说明惟一神的种性，《世尊布施论》引用《圣经》最多，

约 苑四 字，主要是述说《新约·马太福音》第 远 苑章的前半，只删去了“主祷文”。其中提到的“六百四十一年”，当指公元 远 苑 年，即景教第一个传教士阿罗本来华的第六年。另外，它与《序听迷诗所经》的体裁、纸幅与书体均颇相似，估计也是景教早期作品，可能出于阿罗本等人之手。

（远）《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即《尊经》所列的《宣元至本经》，在诸经目录中占第二位。可惜只留有断简残篇。此残卷初由天津李盛铎收藏。前 远 行由罗振玉公布于《敦煌遗书》四册内，标题为《宣元本经》。 远 苑 年，日本小岛靖君从李盛铎遗物中发现此经的后 猿 行，并拍成照片，寄佐伯好郎。原件为小岛靖君藏。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佐伯好郎说，他于 远 苑 年获得该经的前面 远 行， 远 苑 年又获得卷末 猿 行，均载入 远 苑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有关中国景教文献与遗迹》。该经最后有“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题记。可知作于公元 苑 苑 年。其文字也和景教碑文相似，可能也是由景净写作的。

（苑）《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即《尊经》所列的《通真经》。此卷原为李盛铎收藏， 远 苑 年为小岛靖君所得。 远 苑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小岛从天津撤退，其所藏原件于此时遗失，现藏何处不得而知。日本的佐伯好郎声称， 远 苑 年末，小岛靖君曾给他寄去《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全文的照片。这是一首关于耶稣上了高山后，在门徒面前改变形象的颂辞。全文不到 圆 四 字，最后有“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开元八年五月二日”题记。

以上 苑 种敦煌本景教文献的第 远 苑 种，即《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都是由日本小岛靖君从罗振玉处获得的，属“小岛文书”。但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这两种景教文献全为伪作，详细辨伪情况，请参阅林悟殊、荣新

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②④}陈怀宇《所谓唐代景教文献两种辨伪补说》。^{②⑤}

源流摩尼教经典

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个宗教。在现代世界中，它已没有什么信徒了。但在古代中世纪的一千余年中，摩尼教却曾在伊朗、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细亚以及中国内地广为流传。其经典也曾由古叙利亚文先后译成拉丁文、希腊文、科普特文、亚美尼亚文、中古波斯文、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回鹘文、阿拉伯文等十余种文字。摩尼教是古代历史中的一个世界性宗教，在其所到之处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在中亚，它曾形成独立的教团；在唐王朝时的中国内地，它曾广为传播，并影响到唐以后的多次农民运动。

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前，主要是依靠间接资料，即依靠古代与摩尼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记载；而摩尼教本身，由于屡遭迫害，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和资料。因此，学者们对摩尼教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直到本世纪初，才为敦煌、吐鲁番及其他考古的大量新发现所打破。

敦煌发现的摩尼教重要文献，主要是三种汉文摩尼教残卷。^{②⑥}它们均被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缘源卷，现将其简要介绍如下：

（员）《摩尼教残经一》，现藏北京图书馆，编号为宇字缘远。该残卷最早由罗振玉以《波斯教残经》为名，刊于员愿年的《国学丛刊》第二册。罗氏为刊布该经而写了按语，并将此册《丛刊》赠与日本学者羽田亨，羽田亨遂于次年在《东洋学报》上发表论文，考定该经乃为摩尼教残经。与此同时，法国的沙

畹、伯希和也发表了《中国发见的摩尼教经典》一文，专门研究中国的摩尼教。1908年，陈垣先生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②7}文中提及这部经，并疑其为延载元年波斯摩尼僧献给武后的《二宗经》。1938年，林悟殊先生发表了《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②8}一文，详细论证了该残卷的有关问题。以为《残经一》并非《二宗经》，而是本自摩尼本人的著作。并得出结论：“《残经一》的原名很可能就是《仪略》所提及的摩尼第五部经典《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

（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该写本由两截残卷组成，前半截被斯坦因劫往伦敦，编号为 杂· 犍· 残· 卷· 一，后半截被伯希和劫往巴黎，编号为 孕· 犍· 残· 卷· 一。前半截卷首题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卷”。1938年，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发表《敦煌发见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 中的若干词语》一文，首先宣称两半截残经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并就其中的一些用词作了考证。同年，伯希和也发表文章，肯定 杂· 犍· 残· 卷· 一残卷是 孕· 犍· 残· 卷· 一的前半截。

《仪略》卷首题目之下署有“开元十九年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题记，因此许多论者都认为它是公元 731 年在华摩尼教传教士奉诏翻译的。但林悟殊先生认为，汉文《仪略》并非译作，而是著作。由于唐玄宗自始对摩尼教不感兴趣，便于开元二十年七月下诏敕禁摩尼教：“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②9}在敕禁之前，“很可能是朝野对原来武后优容摩尼教的政策持有异议，玄宗为了弄清摩尼教的真面目，以便对它采取必要的措施，故下诏辨清摩尼教，令在京城的大德拂多诞到集贤院去书面奏闻其教的真实情况；大德拂多诞为了应付皇帝的要求，便撰写了《仪略》”。^{③0}

敦煌本《仪略》残卷共约 1500 余字，除末两行因残缺不全无法确定内容外，其余所述很完整。它共分为六章，每章各有题

目。《托化国主名号宗教第一》介绍教主摩尼创教的历史；《形相仪第二》是描述教主摩尼的神圣光辉形象；《经图仪第三》是列举摩尼的主要典籍；《五级仪第四》专述摩尼教团的组织结构；《寺宇仪第五》专谈摩尼教寺院制度；《出家仪第六》专言该教出家僧侣应掌握的基本教义，即二宗三际论。由此可知，它是相当全面的。是了解摩尼教整个概况的重要著作。

（獭）《下部赞》，该卷被斯坦因劫往伦敦，编号为 杂·四·四九。敦煌本《下部赞》基本完整，只有开头部分稍有损缺：计有七言诗 四句，还有少量四言和五言诗，此外，尚有音译文字三段和其他一些说明。据林悟殊先生考证，《下部赞》并非中国摩尼教徒自己撰写的经典，而是唐代后期的一篇译作。它是中国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赞美诗，在现存各种文字的摩尼教赞美诗中，数它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下部赞》是研究摩尼教教义、宗教仪式及其在中国变化的重要资料。

三、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

敦煌石窟是佛教石窟，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敦煌文书也是以有关佛教的内容为主。因此，佛教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在敦煌找到材料，或弥补不足或填补空白。如佛教寺院的僧尼生活、寺院经济等，在《大藏经》、敦煌文书、房山云居寺石经及各地所藏碑石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学术界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如姜伯勤先生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③①}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③②}何兹全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③③}唐耕耦先生的《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③④}张弓先生的《汉唐佛寺文化史》、^{③⑤}郝春文先生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③⑥}等，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突出成绩。下面，我们仅仅以

学术界研究较薄弱的—个侧面，即佛教寺院的“唱衣”为例，来探讨佛教寺院的僧人生活，进而使我们对敦煌的寺院生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员媛对敦煌寺院“唱衣”的研究

关于敦煌寺院的“唱衣”，以孕·愿愿号《后唐清泰三年沙州係司教授福集等状》的记载最为详细。该件文书共愿愿行，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方便，现将前愿愿行移录如下：^③

摇摇员媛摇摇係司教授福集，法律金光定、法律愿清等状
摇摇愿媛摇摇摇摇右奉处分，令执掌大众係利，从癸巳年六
摇摇猿媛月一日已后，至丙申年六月一日已前，中间三年，
应

摇摇源媛所有官施、私施、疾病死亡僧尼散施及车
摇摇缘媛头、斋係、兼前係回残，所得绫锦绵绫绢縠褐布
摇摇远媛衣物盘碗卧具什物等，请诸寺僧首、禅律、老宿
摇摇苑媛等，就净土寺算会，逐年破除兼支給以应管僧尼
愿媛一一出唱，具名如左：

愿媛巳年：官施衣物唱得布貳阡叁伯貳拾尺，阴僧
员媛统和尚衣物唱得布玖阡叁拾貳尺，贾法律衣物唱
员媛得布叁伯陆拾叁尺，阴家夫人临旷衣物唱得
员媛布捌伯叁拾尺。甲午年：官施衣物唱得布貳阡叁
摇摇员媛伯貳拾尺，又壹件衣物唱得布肆阡捌伯壹拾尺，又
摇摇员媛壹件衣物唱得布伍阡伍伯捌拾尺，龙张僧政衣
员媛物唱得布肆阡柒伯柒拾陆尺，普精进衣物唱
员媛得布貳阡玖伯壹拾捌尺。乙未年：曹仆射临旷衣物
员媛唱得布叁阡伍伯肆拾尺，大王临旷衣物唱
员媛得布捌阡叁伯貳拾尺，梁马步临旷衣物唱得

𐰽𐰺𐰍布伍伯壹拾尺，国无染衣物唱得布叁阡肆伯
𐰽𐰺𐰍柒拾伍尺，普祥能衣物唱（得）布贰阡伍伯捌拾
𐰽𐰺𐰍尺，天公主花罗裙唱得布捌伯尺，王僧统
𐰽𐰺𐰍和尚衣物唱得布陆阡叁伯捌拾贰尺，孙法律衣
𐰽𐰺𐰍物唱得布贰阡贰伯陆拾陆尺。
𐰽𐰺𐰍摇摇摇摇上件应出唱衣物，计得布伍
𐰽𐰺𐰍摇摇摇摇万捌阡伍伯贰尺。

这件文书，多次出现了有关“唱”的词，如“出唱”、“唱得布”，其中“唱得布”出现 𐰽𐰺 次。这里的“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唱”与“布”紧密相连？

对于“唱”的探讨，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认识过程。众所周知，由于敦煌文献的大部分被劫往国外，早期的敦煌学者，除极个别学者有条件亲赴伦敦、巴黎阅读有关敦煌文献外，绝大部分学者仅能利用北京图书馆所藏“劫余”敦煌遗书，因此，最早对“唱”的探讨，也是从北图成字 𐰽𐰺 号《目连救母变文》背面的一段文字开始的。本件文书共 𐰽 行，现移录如下：^③

𐰽𐰺 法律德荣唱紫罗鞋两，得布伍伯捌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

𐰽𐰺 乘延定真一百五十尺，支乘政会一百五十尺，支图福
𐰽𐰺 盈一百五十尺，余二十尺。

（中空约 远行）

𐰽𐰺 法律保宣旧肆阡捌伯玖拾尺。

（中空 圆行）

𐰽𐰺 僧政愿清唱绯绵绦被得布壹阡伍伯贰拾尺，旧係壹阡尺。

𐰽𐰺 支图海朗一百五十尺，支图愿护一百五十尺，支智全一
百

支图福盈一百五十尺，
支图应求一百五十尺，支图愿德一百五十尺，支图法兴
支图大应一百五十尺，支图应祥一百五
支图应庆一百五十尺，支图大进一百五十尺，
支图大愿一百五十尺，支图谈济一百五十尺，支图广
支图进一百五十尺。

支图金刚唱扇得布伍拾伍尺。支本分壹百五十尺，余九十五尺。

支图道成唱白绫袜得布壹伯柒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普

支图愿法一百五十尺，余壹百叁十尺。

支图道明旧参伯玖拾尺。

支图法律道英唱白绫袜得布叁伯尺，又唱黄画帔子得布伍伯尺。

支图道明一百五十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图祥定一百五十

尺，支图谈宣一百五十尺，支图谈惠一百五十尺，支图戒

支图云一百五十尺，支云贤惠一百五十尺，支云祥通一百五十

摇摇摇摇（后摇摇缺）

由于早期敦煌文书刊布较少，影响了人们对其性质的认识，认为它是“僧人书在外唱小曲所得帐目”，“僧人唱曲帐目”，“僧人唱曲得酬”等。

由于国外所藏敦煌文献逐渐被有的学者介绍、引用，学者们的见闻逐渐广泛，对于“唱”的认识也就更趋深入和正确。1984年，杨联陞教授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佛教寺院

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③⑨}一文，结合佛教寺院的有关规定，利用北图成字 怨_远号文书和 孕_圆 怨_远号文书，对“唱”进行了初步探讨：

摇摇这两件文书都是佛教寺院的财务帐目。就我所知，在此之前尚无人能对“唱”字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就眼前所呈现的，“唱”可能就是“唱衣”，即拍卖的简写。

杨先生此文，将“唱”与“唱衣”相结合，对“唱”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遗憾的是杨先生此文用英文发表，再加上共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学者难得见到，也未见引用和介绍。

贞_观元年，法国学者谢和耐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首次公布了 孕_圆 怨_远号文书，并引用了北图成字 怨_远号文书，也对“唱衣”进行了探讨：

摇摇在中国佛教团体的生活中，为唱由寺院作为布施物或遗产而获得的衣物、织物和其他那些微小物品的大型庙会该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并由此指出：

摇摇“唱衣”在中国早就流行了，而且是根据《敕修百丈清规》中所描述的一种非常具体的仪规进行的。^{④⑩}

在 贞_观元年本书汉译本出版之前，由于语言的隔阂等原因，除个别学者外，国内能利用此书，或了解此书的学者很少。

贞_观元年，张永言先生发表了《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④①}一文，利用 孕_圆 怨_远和 孕_圆 怨_远《僧人析唱帐》、孕_猿 怨_远

《各寺布施及僧人亡殁后唱衣历》、孕·猿缘背《唱衣历》等文书，对北图成字怨号文书中的“唱”进行了正确的阐释：

摇摇这个资料里的“唱”并不是一般“唱歌”、“唱曲”的唱，而是当时佛寺特殊用语“唱衣”或“估唱”的唱；“紫罗鞋两”等并不是和尚们歌唱的曲子，而是他们唱卖的具体的实物。

并进一步指出：

摇摇在唐代寺院里，有所谓“分卖”衣物的制度……因为在分卖的时候要唱出所买物品的名目，而所卖的物品主要是衣着之类，所以叫做“唱衣”。

员苑年，陈祚龙发表了《关于敦煌古抄“唱衣历”》^⑫一文，对张永言先生的论文进行了批评：

摇摇我觉得，单从张氏的这一篇文章之中，我们皆必可以看出：

就像他这样专门研讨此种所谓“显学”——敦煌学的“文士”，虽然似已懂得厉行“批判”与“辩证”往日某些有关“行家”，对于某些敦煌卷、册文字所作的一些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但至少他自己似乎仍不知道：就像他所加以“批”、“辩”的“玩意”，事实上，早即均经国内、海外的其他有关学者，作了一番更为缜密周详的“宣演”！譬如：张氏只知对于向达、全汉昇、任二北诸人，分别在其著述：《敦煌丛钞》和《唐代俗讲考》、《中古自然经济》、《敦煌曲初探》和《唐戏弄》之中，引用那一份现仍藏于北

京图书馆的敦煌卷子（成字九六号）背面所有之文字，皆因失察，而相继造成的一些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但他并不晓得，就像这一份卷子背面原经古人抄存的全部文字，至少早即已由我的法籍同学、同道老朋友——谢和耐教授，在其巨制……之中，作了一番诚可够称精当、完美的考释与译注！谢教授对于向、全、任诸人的有关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当时固已悉予“摒弃”不谈，另外，他还特将有关学术的一些问题，演绎得至为清楚。换言之，我怕张氏述“学”、求“真”，迄今实际似犹未能做到“博瞻中外”与“会通东西”的有关研究成果，而也许照常受了环境的限制，不得不继行“坐井观天”与“闭门造车”！

众所周知，在八十年代以前，由于中国特殊的学术环境，当时国际交往、学术交流之路不畅，国内学者很难见到杨联陞、谢和耐的论著。就是陈祚龙先生本人，也没有提到杨联陞教授的论文，可见要真正做到“博瞻中外”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应尽量做到“博瞻中外”、“会通东西”。另外，从作文的角度看，张永言先生也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唱衣”进行了探讨，并非从敦煌学或文书学方面对该文书进行全面研究，怎能要求他的一篇小文将所有问题都谈透或解决呢？

近年来，随着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刊布，促进了敦煌学向专精的方向发展，林聪明、郝春文先生在其论著中，也对此问题有所涉及。^⑬谢重光先生在探讨敦煌寺院中的执事僧时说：

摇摇敦煌寺院属于禅林体系，在怀海改革教规之后，其执事僧的设置情况及诸执事僧的地位、职权应与《龟镜文》中所述内地禅寺的情况大体相同。因此，我们既可以敦煌遗书的资料补文献记载之缺佚，也可以文献中关于执事僧的记载

作为分析同一时期敦煌寺院执事僧的参考。^{④④}

既然敦煌寺院属于禅林体系，那我们就以禅门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敦煌文献的有关资料，对“唱衣”作进一步的探讨。

圆寂佛教经律中的“唱衣”

敦煌文献中的“唱衣”制度，应该是来源于佛教律藏的有关规定，因为“释门的‘律’，犹如世俗社会的‘礼’和‘法’一样，是要规范僧尼的思想和行为，使之整饬有序，合于释门理念”。^{④⑤}从早期佛教律典可知，僧侣圆寂后，其衣物等便分给别的僧众。但在唐初由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中可知，在印度，拍卖是用来处分这些私人所有物的办法。

“唱衣”制何时在中国寺院中施行，目前还无法得知具体的时间，但在唐初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④⑥}中，已有了分僧物的记载：

摇摇分比丘物者，先将亡去者，藏已送丧，僧还来至寺，取亡人物著僧前，然后如上，依法集僧分之。

将亡人轻重之物，并集僧中，若不胜举床瓮屋舍园林牛奴等，并须历帐，对僧明读，令知其多少。……后鸣钟遍召，一同僧式，不得闭门限客，假托昏夜，意遮十方。……次定轻重讫，如上分之，重者一处依名抄记，轻物一处依名抄之。^{④⑦}

若在私庄寺致死，或作僧使，在庄检校而死，若有家人及比丘守者，重物入亡者本寺，轻物随现分之，亦不得尼众分也。纵令近僧来摄重物，亦不须与。^{④⑧}

由此可知，僧人圆寂后，其遗物分为轻重两部分，床、瓮、屋

舍、园林、牛、奴等重物归寺院所有，一切轻物，主要是衣物等生活用品，便由僧尼分配。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虽然没有说到唱衣之法，但估计此时已有了唱卖的例证，或者说唱卖已经在寺院中实行了。因为当僧尼分配亡者轻物时，若遇分配不均，可能就采取竞卖的办法，将亡僧的轻物变卖，然后由僧尼均分钱财。道宣曾对其进行谴责：

摇摇律无卖物分法，今时分卖，非法非律，至时喧笑，一何颜厚。佛令分付，为息贪情，令各自省，今反乐笑。^{④⑨}

由此可见，当时寺院中已出现了“分卖”现象，只不过还未得到律藏的许可。历史上许许多多的规章制度，大多是先在民间传布、流行，然后才逐渐得到官府的默许、认可，最后才以制度、规章的形式来规范、约束。“唱衣”之起源，可能也走过了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即先在“非法非律”的状态下在某些寺院中流行，然后得到内律的认可，最后才将其进行规范。

唐代中叶以后，伴随着禅宗的勃兴，怀海制定了《百丈清规》。“《清规》的产生是禅林制度确立的标志”。^{⑤⑩}可惜的是《百丈清规》在宋代就已失传了，南宋宗颐所编《禅苑清规》和元代德辉重编的《敕修百丈清规》，虽非怀海原貌，但它们毕竟是唐宋间寺院及其僧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唱衣制的一些情况。

寺院唱卖的衣物，绝大部分是亡僧生前财产。僧人的财产，分为两部分，即重物和轻物。所谓重物，主要是指田宅、园林、奴婢、牲畜、金银等等，按内律规定，这些应入常住，即归寺院所有。对于常住之物，不仅内律规定不可侵夺，而且敦煌文书中也有一些具体的反映，如 孕·圆苑号《河西都僧统悟真处分常

住榜》^①曰：

摇摇应诸管内寺宇，盖是先帝敕置，或是贤哲修成。内外舍宅、庄田，因乃信心施入，用为僧饭资粮；应是户口家人，坛（檀）越将持奉献，永充寺舍居业。世人共荐共扬，不合侵陵，就加添助，资益崇修，不陷不倾，号曰常住。

所谓“常住”，本指恒久不变的意思，转意指僧伽的共有财产。从本件敦煌文书可知，由官府施入或一般檀越（施主）施入的地产和人户，就构成了称为“常住”的这种所有权。^②凡属寺院的常住，内律都给予保护，不许任何人侵占：

摇摇凡是常住之物，上至一针，下至一草，兼及人户，老至已小，不许倚形恃势之人，妄生侵夺，及知典卖。或有不依此式，仍仰所由具状申官。^③

所谓轻物，主要是指那些“可随身资道”的，即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其中以衣物为主。“由于禅林中没有个人不动产，《清规》只对亡僧衣物处理做规定”。^④这些衣物应由众僧均分。由于分配不均，才进行唱卖，然后均分唱卖后的钱财。

按照禅门规范，当僧人病重时，便有“病僧念诵法”。当然首先念诵的是佛经，但同时还要对自己的衣物做出承诺，以便死后由寺院唱卖。由于这一规定是禅门僧徒必须进行的一道程序，故为了便于众僧，就制定了专门的念诵式样：

摇摇抱病僧某。右某本贯某州某姓，几岁给到某处度牒为僧。某年到某寺挂搭。今来抱病，恐风火不定，所有随身行李合烦公界抄札，死后望依丛林清规津送。

摇摇摇摇摇摇年摇摇月摇摇日抱病僧摇摇某甲口词。⁵⁵

这一念诵样式，相当于唐代之书仪，可见它具有普遍性。

所有唱卖的衣物，在亡僧病重或临死之前，都要进行清点、估价、封存。僧人有遗嘱者，还要考虑处理方式。《禅苑清规》卷七《亡僧》条载：

摇摇如僧人病势稍困，堂主计会维那、监院、首座、藏主、书记、知客，同共抄札口辞，收祠部。并衣物入堂司收掌，首座封押并收掌钥匙。

僧人圆寂后，就对已入帐的衣物进行估价，为唱卖做准备。从《敕修百丈清规》的记载可知，唱衣前的估唱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需要对亡僧的衣物进行一件件估价贴签，做好唱卖的准备。对此，《百丈清规证义记》的记载更为具体：

摇摇入塔后，库房齐集两序执事、监院、维那、知客、值岁、库头、知浴、衣钵等，将亡者行李（除遗命赠人物），请监院维那，每件估价（照时价七折算），书记上簿，知客编号已，值岁点数，酌留一二件犒劳看病之人。凡衣具被帐等，有四角者，应归常住，余者即写号条，第几号某件价若干，缚于本件之上，俱定价登簿已（若余人，则应白主持），客堂挂牌，牌云估唱。⁵⁶

可见，估唱主要由寺院的执事僧，如执事、监院、维那、知客、值岁、库头、知浴等进行，他们对亡僧的衣物进行清点、登记、编号、估价，并写好标签，注明某件为某某号，价多少，贴在衣物上，以便唱衣。

唱衣的程序比较严密，规定比较详细。对于每件衣物的价格，由于先已估价，因此也比较合理。主持唱衣的维那，本来就是参与估价者，他应知道每件衣物的新旧程度及价值，因此戒律规定：

摇摇维那唱衣须知所唱衣物价例高低，新即言新，旧即言旧，破即言破，声定钱陌（或足或省或是依除），如大众不肯添钱，虽贱亦须打与，如添钱太过，维那即云，更须子细，后悔难追。^{⑤7}

对于唱衣的有关细节及操作情况，《百丈清规证义记》的记载更为具体：

摇摇维那……遂举佛号百声，鸣磬收佛号已，白云：“今白大众，唱衣之法，用表常规，新旧短长，各宜照顾，领物缴价，各照号条，磬声断后，不许反悔”。白已，监院照号取号条。唱一件价，维那鸣磬一下，要者称名收号条。书记填某号某甲收，知客僧值照应。或当时钱物两交，副寺照号收钱，知客给物，或另日往库房缴钱取物。^{⑤8}

从《敕修百丈清规》的记载可知，寺院唱衣，从估价的~~开始~~起唱，僧众应价后再唱，一直唱到估价，然后鸣磬为定。若唱到估价后，还有两人以上应价，还可加价再唱，上不封顶。这种唱衣之法，与现代的拍卖非常相似。

摇摇凡僧亡以其所有衣物，对众估唱惩贪积也。估唱得钱必照板帐，支用外其钱作三七，抽分归常住（百贯抽三十贯，不满百贯则不抽分），余则均俵僧众。^{⑤9}

即丧葬支出以外的余额，~~猿~~归寺院，~~苑~~作为酬金，分给参加佛事、唱衣等劳作的三纲、知事僧、知客僧、行者等人。^⑩明乎此，我们就能正确理解 ~~孕~~·~~圆~~文书第 ~~远~~·~~远~~行的支出了。这些支出，正是对参加~~係~~司唱衣的各类僧人的酬劳，如“赏监~~係~~和尚”、“赏支~~係~~大德”、“赏都司三判官”、“支大众维那”、“给算日供主用”等。

猿援敦煌寺院中的“唱衣”

我们探讨了唱衣的有关戒律规定及具体情况后，再来看敦煌文书中的唱衣资料。前述 ~~孕~~·~~圆~~文书中涉及的人名，荣新江、郑炳林先生已做了部分考定。^⑪其中第 ~~圆~~笔的阴僧统和尚即阴海晏，是“河西应管内外都僧统”；第 ~~员~~笔的曹仆射，乃瓜沙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之兄曹良才（仁裕）；第 ~~员~~笔之大王，乃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去世于清泰三年；第 ~~圆~~笔之梁马步，乃是归义军政权中左马步都虞候梁幸德；第 ~~员~~笔之天公主，乃指曹议金的回鹘夫人。

本件文书有确切的纪年，即后唐清泰三年（公元 ~~怨~~年）。其所唱卖的全是衣物，只不过来源不一，并非像戒律所说是僧人圆寂后唱卖其轻物。从内律的有关规定及敦煌文献可知，在唱卖中，还包括布施物。如杂 ~~圆~~·~~愿~~《亥年（~~愿~~）十月一日已后诸家散施入经物历》：

摇摇亥年十月一日已后，应诸家散施入经物，一一具色目如后：僧伯明施三岁特子壹头，出唱得经纸叁拾帖。杜都督施红单绢裙壹并腰带，出唱得布壹伯叁拾尺，又施麦五斗。子年五月廿一日，僧灵修施经纸伍帖，计贰伯肆拾捌张。

另外，僧人圆寂后，其轻物也并非全由寺院唱卖，僧人若生前有遗嘱者，若符合内律，还要按遗嘱赠人等。

从我们前引《释氏要览》、《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百丈清规证义记》可知，各寺院在唱衣时，应集合全体僧尼，并可相互竞价。从孕·圆·愿号《清泰三年沙州係司教授福集等状》亦可知，係司唱衣所得布及其他施入物品，其用途是比较广泛的。如本件文书第源·远·行所载：

摇摇源·援·出破数：楼机绫壹疋，寄上于闾皇后用。

源·援·楼机壹疋，赎鞍上官家用。大绫壹疋，

源·援·上司空用。又楼机绫壹疋，沿大众所用。生

源·援·绢贰疋，大云、永安庆寺人事用。又生绢

源·援·贰疋，郎君小娘子会亲人事用。又生绢壹

源·援·疋，贺官鞍价用。生绢壹疋，买粗縑

源·援·玖疋，沿大众用。生绢壹疋，二月八日赏法师

源·援·用。生绢壹疋，天公主上梁人事用。绢捌

缘·援·尺，归文寄信用。绵绫壹疋，圣光寺庆钟用。

缘·援·绵绫壹疋，开元寺南殿上梁用。绵绫壹疋，安

缘·援·国庆寺人事用。绵绫壹疋，甘州天公主满

缘·援·月人事用。绵绫壹疋，二月八日赏法师用。

缘·援·绵绫壹疋，于闾僧靴衣用。绵黄绫袄子壹领，

缘·援·三界、净土赏法事用。细縑壹拾柒疋，天公

缘·援·主满月及三年中间诸处人事等用。粗縑

缘·援·伍拾柒疋，三年中间诸处人事、七月十五日

缘·援·赏乐人、二月八日赏法师禅僧衣直、诸寺

缘·援·兰若庆阳等用。布贰阡柒伯壹拾尺，三

远·援·年中间沿僧门、八日法师、七月十五日设乐

远·援·三窟禅僧衣直布萨庆阳吊孝等用。

远愿贰伯壹拾尺，申年修开永支布萨法师用。

远愿捌拾尺，赏监徭和尚用。壹伯伍拾尺，赏支

远愿徭大德三人用。玖拾尺，赏都司三判官等用。

远愿贰拾尺，支大众维那用。肆伯尺，给算日供主

远愿用。贰伯肆拾尺，折送路漆椀叁枚用。

第源愿缘行“上梁”，乃指建造房屋时架梁，有专门用以表示颂祝的文体——上梁文。无论民间还是寺院，在建筑时必择吉日上梁，亲朋宾客前来道贺，同时还要犒劳匠人。目前西北农村还有这一风俗。

第缘行之“归文”，乃定州（今河北省定县）开元寺僧，他于同光元年（怨愿年）奉敕西行取经，但失败而归。翌年又与德全等一起西行求法。杂愿保存有归文的牒文远件，都是西行途中他分别寄给或在当地上给沿途所经之地的和尚、令公、评事、尚书等僧俗官人的。归文到达沙州的时间不得而知，但从本件文书可知，怨愿—怨愿年间他仍在沙州。^⑥

第源愿缘缘远行之“二月八日”、“八日”，指佛诞日。关于佛诞日，有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二说。从全国情况看，以四月八日说的影响更大。但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则只有二月八日纪念日，如孕猿缘号《二月八日文》曰：“法王降诞，为拯生灵。八相欢宜（怡），三身利乐”。二月八日行像日，僧俗官员齐集道场，法师、百姓临街瞻仰、散施祈福，当日还有“踏歌”、“赛天王”等活动助兴。纪念佛诞日的法事活动，要有法师主持，结束后还要赏赐出力师僧，故文书中有几笔开支为“二月八日赏法师用”。^⑦

第缘远行之“七月十五日”，指盂兰盆节。从敦煌文书可知，唐末五代敦煌寺院与民间均有盂兰盆节。敦煌寺院的盆节行事主要有三项：（员）造佛盆供养。由“煮盆博士”用白面和

麻油，或炸（即“煮”）或烤，制成各种面点食品，装饰为供养佛盆。（圆）讲唱“盂兰盆经”。（猿）节毕“破盆”。敦煌以七月十七日、十八日两天为“供养僧破盆日”，即在盆节过后，酒食犒劳为盆节出力的僧俗人等。敦煌的盆节活动，是由地方官府或都僧统司统一安排布置的，各寺照例“七月奉处分，当寺置道场”，作为盆节期间接待信众、供养、讲经的场所。^④在盂兰盆节（七月十五日）的活动中，为了增加喜庆的成分，要请乐人演奏，故在文书中有“七月十五日赏乐人”，“七月十五日设乐”等记载。

第缘远行之“庆阳”可能指“庆阳节”。据《唐会要》卷四《节日》载：开成五年四月：

摇摇中书门下奏请，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休假二日，著于令式。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便令以素食宴乐，惟许饮酒及用脯醢等。京城内，宰臣与百官就诣大寺，共设僧一千人斋，仍望田里借教坊乐官，充行香庆赞，各移本厨，兼下令京兆府别置歌舞，依奏。（原注：是年，文宗崩，武宗篡嗣，以诞庆日为庆阳节。）

会昌元年

摇摇六月，中书门下奏，庆阳节准敕，其日设斋钱。

会昌二年

摇摇五月敕，今年庆阳节，宜准例，中书门下等，并于慈恩寺设斋，行香后，以素食合宴。

既然庆阳节要行香设斋，歌舞庆贺，并以素食宴乐，同时宰相还要到京城佛寺——慈恩寺设斋行香，那么，作为佛教寺院的莫高窟，祝贺庆阳节也就很正常了。因此本件文书中在记载寺院开支时，就有“庆阳等用”。

除了这许许多多的各种支出（出破数）外，僚司唱卖所得布的最主要支出，乃是寺院内部僧尼的分配，即本件文书第苑—苑行所记：

摇摇苑援应管诸寺合得僚僧计叁伯伍拾陆人，
苑援沙弥壹伯陆拾叁人合全捌拾壹人半，合得
苑援僚大戒式叉尼计叁伯柒拾玖人，尼沙弥计
苑援柒拾壹人，合全叁拾伍人半。上件僧尼，通
苑援计捌伯伍拾贰人，人各支布陆拾尺，僧尼沙
苑援弥各支布叁拾尺。

以上合得僚之僧、沙弥、大戒式叉尼、尼沙弥共计 愿 人，所分僚布都是平均的，即僧和大戒式叉尼每人 愿 尺，沙弥和尼沙弥为一半，即每人 愿 尺。

从平均分配僚布这一信息出发，我们就可以比较正确地理解前引北图成字 愿 号背面文书的内容了。该件文书的唱卖人——法律德荣、僧政愿清、金刚、道成、法律道英，他们在寺院唱卖时，在竞价中获胜，得到了寺院出唱的物品。他们应付给寺院的货币等价物——布疋，也与前引 愿 号文书所载僚司分配僚布的情况一样，由寺院僧尼平均分配，即每人 愿 尺。

本件文书所载僚布的分配方式，郝春文先生已正确指出：“僚司施物的唱卖者并不是将应出布（对僚司来说是所得布）直接交给僚司，由僚司进行分配，而是依据应出布的数量，分别分发给僧人”。由于“僚司施物唱卖者自身应得僚利的份额，一般

是从其应出布数额中扣出，即所谓‘支本分’。”^{⑥5}

源媛敦煌寺院“唱衣”的地域特色

《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记载的“唱衣”情况，都是一个寺院的活动。而敦煌文书记载的敦煌寺院，其“唱衣”等活动虽然遵从了律藏的规定，但又与《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的记载不完全一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如“唱衣”就不是在某一个寺院中进行，而是整个敦煌教团的集体行动。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寺院比较多，杂·源媛文书中就有“（归义军）管内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D·X·源媛文书也有“应管壹拾陆寺僧尼籍”的记载。据李正宇先生考证，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境内敕建有尼寺五所及僧寺十一所，总称十六寺。^{⑥6}另外还有一些窟、佛刹、佛龕、佛堂和兰若等。“站在这个庞大的教团势力顶端的，仍然是‘都司’即都僧统司。……‘都司’下设立掌管布施收入和分配的‘徭司’，由‘徭司教授’及‘徭司法律’掌管”。^{⑥7}由此可见，徭司主持的“唱衣”，并非单个寺院的单独活动，而是整个敦煌教团的集体行动。

现在，我们再来看孕·源媛文书提到的寺院：源媛行“龙”即龙兴寺，源媛行、源媛行“普”即普光寺，源媛行“国”即安国寺（缘媛行也有安国寺），源媛行的大云寺、永安寺（源媛行的“永”即永安寺），缘媛行的圣光寺，缘媛行的开元寺（源媛行的“开”即开元寺），缘媛行的三界寺、净土寺，源媛行的“修”即灵修寺。以上共提到寺院源媛个，另外，源媛行的“三窟”指的是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缘媛行、缘媛行的“诸寺兰若”则是对敦煌寺院兰若的泛称。

本件文书是沙州徭司的状稿，而徭司又是都僧统司的下属机构，由此也可看出，“沙州僧团是超越于一个寺院的组织”。^{⑥8}而本件文书上又钤有几颗“河西都僧统印”，可见所谓“右奉处分

令执掌大众徭利”，也是奉河西都僧统的处分。它也证明 孕·
 圆·德号文书中徭司的“唱衣”行动，是由“河西都僧统”领导下的整个敦煌教团组织的集体行动，并非像《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记载的那样，只是一个寺院的活动。

敦煌的佛寺，虽不能说全是禅寺，但具有禅宗的内容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虽是禅门寺院的规范，但它又是在总结、继承整个佛教寺院行为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故在非禅宗寺院中也可以看到许多与《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相似的内容。关于佛教寺院的“唱衣”活动，在中原及南方寺院中是否存在，因笔者对佛教不熟悉，阅读文献及佛典十分有限，故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敦煌寺院的“唱衣”可知，它与《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的记载不大一致，打上了当时当地的烙印。这也许是因为《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的规定是佛教僧徒的最高理想，属于佛教的法规，而敦煌文书中反映的“唱衣”，则是一般僧人的活动，虽以佛教法规为指导，但又具有一定的世俗性。

从唐代开始，僧务的管理权就一直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常设官署，如鸿胪寺、祠部等，不再设专门的僧务机构了。在僧务管理上，表现为一种僧官与俗官混存共管的情况。^{⑥9}而敦煌归义军政权，虽奉中原王朝正朔，但基本上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在僧务管理上也是如此。如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河西都僧统悟真，从形式上看，由朝廷任命，但实际上是由归义军节度使决定的。到“西汉金山国”及曹氏归义军时期，则干脆自行任命，有时仅仅加上一个“大唐敕授”的名义罢了。^{⑦0}

正因为敦煌教团僧官的任命权在归义军节度使，故僧官在大政方针上必须与归义军政权保持一致，甚至听命于归义军节度使。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其统辖的地盘已大不如前，并不断受到

外来的侵扰，故必须加强内部统治。再加上敦煌的寺院，一般规模比较小，自不能与中原、南方的一些大寺相提并论。因此敦煌佛寺的活动，并不是一个寺院的单独行动，而是由都僧统领导下的整个敦煌教团的集体行动。如根据 杂·图·愿·号 缀合之《天福二年（~~忽~~藏元年）二月十九日河西都僧统龙辩榜》^①上有“河西都僧统印”三颗，是沙州报恩寺为举办方等道场，由“河西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龙辩”所发之榜文，其目的是要求都僧统司下属之僧官以及敦煌十一个僧寺的禅律大德、律师等参加诸司的管理工作。本件文书中的“恩”即报恩寺，“莲”即莲台寺，“图”即灵图寺，“乾”即乾元寺，“云”即大云寺，“龙”即龙兴寺，“开”即开元寺，“永”即永安寺，“金”即金光明寺，“界”即三界寺，“土”即净土寺。这十一个僧寺名称与李正宇先生的考定相同。^②但本件文书第 远行有一“圆”，第 员苑行有两个“圆”，从整件文书看，似为某一寺院之简称，故唐耕耦先生解释为“圆”即灵圆寺，而缺“图”（灵图寺），不知何故。

从本件文书可知，敦煌佛寺的活动，是沙州教团的集体行动。作为佛寺活动内容之一的“唱衣”，也不是各个寺院的单独行动。

前已述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共有十六寺、三窟及若干兰若等，但在 孕·圆·愿·号 文书中只出现了十寺、三窟，为何不是全部寺院的活动呢？对此郝春文先生认为，在当时的沙州，亡故僧尼的衣物并非全部“散施”给 徕司，也不是每个疾病死亡僧尼都向 徕司“散施”物品。因为僧尼施入各个寺院和“入法事”的物品都不能归入 徕司，所以 徕司所执掌的大众 徕利似乎只是施主明言施入“合城大众”或“大众”的部分。由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 孕·圆·愿·号 文书“收入部分”所记布施衣物的人次较少了。^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还有一种可能，即 徕司每次主持的

“唱衣”及徕物分配，只是有关的寺院参加，并不包括所有的寺院。

除孕·愿号文书的记载外，北图成字·愿号背面的文书，由于前后残缺，参加“唱衣”的全部寺院也不得而知，但从仅存的愿行可知，共有四个寺院，即第愿行的“乘”即大乘寺，多次出现的“图”即灵图寺，第愿行的“普”即普光寺，第愿行的“云”即大云寺。

另外，孕·愿号背面的文书，“很可能就是徕司的徕状”。^⑭它共愿行，从其内容看，是乾元寺、龙兴寺、开元寺、永安寺、金光明寺等寺的“唱衣历”。本件文书除出现上述五寺外，第愿·愿·愿·愿等行的“图”即灵图寺，第愿·愿等行的“修”即灵修寺，第愿·愿·愿行的“乘”即大乘寺。由此可知，参加“唱衣”的寺院共有愿个。

另外，根据内律规定，寺院唱衣，所收一般是钱，如：

摇摇估唱得钱必照板帐，支用外其钱作三七。抽分归常住（百贯抽三十贯，不满百贯则不抽分），余则均徕僧众。^⑮

同时还列有各种收支帐目的样式。《百丈清规证义记》卷五《估唱》条亦曰：

摇摇唱一件价，维那鸣磬一下，要者称名收号条，书记填某号某甲收，知客僧值照应，或当时钱物两交，副寺照号收钱，知客给物，或另日往库房缴钱取物。

而敦煌文书中的唱衣历，其唱卖所得都是实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布，另有少部分麦、粟等，总之都是实物，目前还未发现使用货币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众所周知，自从“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中心也逐渐南移。再加上指南针的发明，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等等，中国的对外交往也就逐渐以南方海路为主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了。作为丝路明珠的敦煌，伴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也逐渐沉寂，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风采。

中唐以后，吐蕃占领了敦煌，并将其本部的一些行政、军事、经济政策在敦煌实行，如部落、将制、突田制等，唐王朝的货币被废除，主要实行物物交换，交换的媒介是实物。

归义军政权作为一个特殊的藩镇，虽然在绝大部分时间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但由于当时唐王朝自顾不暇，再加上交通的阻隔等各种原因，归义军政权实际上处于一个地方政权状态，无法得到唐王朝的有力支持，当然也就无法得到、使用唐王朝的货币。而它又是在推翻吐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也没有货币供其继承，而归义军政权本身没有铸造货币。因此，在整个归义军时期，都很难见到使用货币的记载，人们在买卖、雇工、典当、借贷时，便以麦粟、绢帛、布疋等实物计价。尤其是布疋，在当时当地便替代了货币的功能，具有价格和价值的尺度，是实物货币的主要形态。

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寺院，也自然受这一大环境和前提的影响、左右，在唱衣时，其所得也就以布疋为主了。

四、唐代地方公文的处理程式

——敦煌吐鲁番的官文书

摇摇关于唐代官文书的范围及处理程式，以《唐六典》与《通典》的记载最为详细。如《唐六典》卷员《尚书都省》曰：

摇摇凡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牒、辞（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以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辞）。诸司自相质问，其义有三，曰：关、刺、移（关谓关通其事，刺谓刺举之，移谓移其事于他司。移则通判之官皆连署）。凡内外百司所受之事皆印其发日，为之程限：一日受，二日报（其事速及送囚徒，随至即付）。小事五日（谓不须检覆者），中事十日（谓须检覆前案及有所勘问者），大事二十日（谓计算大簿帐及须咨询者），狱案三十日（为徒已上办定须断结者），其急务者不与焉。……凡制、敕施行，京师诸司有符、移、关、牒下诸州者，必由于都省以遣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或差缪，然后印之；必书于历，每月终纳诸库（其印，每至夜，在京诸司付直官掌；在外者，送当处长官掌）。

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的公文书式是很严格的，但由于《唐六典》及《通典》的体例及材料限制，没有详细的具体内容。可喜的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一些官文书，保留了最基本的，尤其是州、县一级的公文书式，为我们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可靠的素材。

关于唐代官文书的处理程式及有关问题，日本学者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研究》^⑦、我国学者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⑧、向群《敦煌吐鲁番文书中

所见唐官文书“行判”的几个问题》^⑧，已做了比较详细地探讨。现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出土文书与文献典籍作一简单介绍。

员援县司机构的官文书判署

大谷 〇〇〇号文书《甘凉瓜肃所居停沙州逃户》^⑨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件文书，其 员怨一源行为：

员怨长安三年三月摇日典阴永牒

员怨付司。辩示。

员怨摇摇十六日

员怨三月十六日录事摇受

员怨摇摇尉摄主簿摇付司户

员怨摇摇检案。泽白。

员怨摇摇十六日

员怨摇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员怨摇摇三月十摇日史汜艺牒

员怨以状牒上括逃御史

员怨谕。泽白。

猿怨摇摇十六日

猿怨摇依判。仍牒上凉甘肃

猿怨瓜等州，准状。辩示。

猿怨摇摇十六日

猿怨摇牒上括逃御史。件状如前。今以状牒。牒至准

猿怨状。谨牒。

猿怨摇牒上凉甘肃瓜等州。件状如前，今以状牒。

猿怨摇牒至准状。谨牒。

猿怨摇摇长安三年三月十六日

源摇摇摇摇摇佐

源摇尉

源摇摇摇摇史范艺

源摇摇摇三月十六日受牒。即日行判，无稽。

源摇录事摇摇摇检无稽失。

源摇尉摄主簿摇自判

源摇牒。为括逃使牒、请牒上御史，并牒凉甘肃瓜等州事。

这是一件敦煌县判署的官文书。据《元和郡县图志》卷源《陇右道下》记载，敦煌县属上县。唐代上县的官员设置及级别，《唐六典》卷猿载：

摇摇诸州上县，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一人，从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从九品上；录事二人，史三人；司户佐四人，史七人，帐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典狱十人；问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帅二人，仓督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

摇摇上引大谷源号文书是一件由敦煌县判署的官文书，通过对这一判署形式的考察，可以明了唐代县级机构的公文处理情况。

本件文书第源行的“典阴永牒”是什么意思呢？通过对唐代地方官制系统的考察，可知“典”为小官吏，一般是州、县中办理文案的。“阴永”是人名，这里的“牒”即报告。这是指敦煌县收到中央政府的指示后，由办理文案的官吏阴永将其上报县令，请批示如何处理。相当于现代有些部门接到上级的文件

后，由办公室附来文登录簿，上有来文机关、内容等，请领导批示。

第 100 行的“付司”之“付”为交付的意思，“司”指有关部门。“辩”是当时敦煌县令的人名简写，据《唐六典》卷 100 载：“若籍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示”乃是公文签署形式，具有自上而下的“指示”或“教导”的意味。

第 100 行的“录事”也是县上的官吏，诸州上县置录事二人，其职责是“掌受事发辰，勾检稽失”，^⑧这与第 100 行“录事检无稽失”的记载是一致的，这里的“稽”指稽迟、延稽，是批示公文或处理事务误时之意；“失”的本意为过失、失误，这里主要指公文内容不合法定制。

第 100 行的“尉”指县尉。诸州上县置尉二人，《唐六典》卷 100 载：“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主簿”乃是县主簿，其职掌为：“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⑨。据《通典》卷 100《职官一·总序》曰：“于是遂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之官（原注：摄者，言敕摄，非州府版署之命……皆是诏除，而非正命。）”可见所谓“摄”乃指非经“版署之命”正式任命的官员，而是由皇帝或上级临时指派兼任的官职。这里的“摄”为兼职，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可知，由低职兼高职为“摄”。这与“守”有些相似。《通典》载：“凡正官，皆称行、守，其阶高而官卑者称行，阶卑而官高者称守，官阶同者，并无行、守字”^⑩。在上县，主簿为正九品下，尉为从九品上；在中县、中下县和下县，主簿为从九品上，尉为从九品下，可知主簿比尉高一级。由低一级的“尉”兼高一级的“主簿”，故曰“摄”。第 100 行的“泽”是一官名，他应是“尉摄主簿”者。

“白”是唐代官文书中以下达上的一种签署形式，在唐代官

文书案卷中，常常见到“某某白”的判署，其含义一方面是受理官员对案卷陈述、分析及处理意见，另一方面则有禀白、请示的意味，带有某种下属对上级官员尊敬与谦卑的色彩。因为“白”事的一方，其身份相对受理的一方，往往处于阶卑位轻的地位。因此，“某某白”这一习见的特定判署格式在唐代的官文书案卷中，最终便被定位为下级官员“以下达上”的一种固定形式。^⑧

第④行的“检案连如前”。“检”即经过自己的检查，“连”即将有关案卷粘连起来，“连”是牒文处理的一种临时措施，即把同类的牒文粘连起来留待以后一并加以处理的方法。当然，“连”的过程也是公文处理的形式之一，因为到一定的时候，主典就要对前面已“连”的几个牒文内容归纳整理，作出一个总结性的牒文来。“牒”即上报。

第⑤行的“史”，应是司户史，因④—⑤行为“付司户检案”。各县除司户史外，还有司法史。“范艺”为人名。即县上作为“司户史”的官吏范艺。

第⑥行的“谘”本来指谘请、谘谋，原无严格的身份、地位限定，但到了唐代，尤其在官文书的处置过程中，已演变为一种特定的公文用语，往往含有向上级官员请示、上陈之意。

第⑦行的“佐”也应指司户佐，其设置与“史”相似。

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上引大谷④—⑦号官文书的判署形式了。即敦煌县接到上级的指示后，由管文案的“典”阴永将其上报县令“辩”，辩批给有关部门，“录事”接到这一批示后，便请尉摄主簿“泽”提出处理意见，作为县司主要佐官的主簿，要对有关情况清楚明白，故他批示“付司户检案”。司户史检查以前有关的案卷后，一同再上报主簿，主簿便做出拟判：“以状牒上括逃御史”。由于县尉摄主簿“泽”是县司的主要佐官，他的判署只是一初步意见，还要将其禀白、谘陈于县司

行政长官，故在其判署后，便使用了与其身份、地位相适应的“谿，泽白”。县令“辩”接到“泽”的判署后，同意这一意见，便最后签署：“依判，辩示”。完成了整个案卷的处置和行判。为了慎重起见，再由佐、尉、史、录事进行了一次“勾检”，经核查“检无稽失”。

另如大谷 0847 号文书《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⑧也是武则天时期敦煌县的一件文书，该文书愿一行：

愿长安三年三月录事董文彻牒。

愿付司辩示。

愿一日

愿三月一日录事受。 愿

愿尉摄主簿付司户。

愿 检案泽白。

愿 愿一日

愿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愿 三月录事史范艺牒。

愿准牒下乡，及榜示村

愿坊，使家家知委。每季

愿点检，有不如法者，随犯科

愿决。谿，泽白。

愿 愿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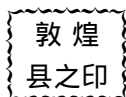
愿 依判。谿，余示。

愿 愿二日

愿 依判。辩示。

愿 愿二日

愿下十一乡，件状如前。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到奉行。



愿 摇摇长安三年三月二日
 愿 摇摇摇摇佐
 猿 尉
 猿 摇摇摇摇史汜艺
 猿 摇三月一日受牒，二日行判，无稽
 猿 录事张摇摇检无稽失。
 猿 尉摄主簿自判
 猿 摇摇牒，为录事董彻牒，劝课百姓营田判下乡事。

本件文书的判署形式和上引大谷 愿缘号的判署基本一样，仅在第 愿行多了“依判，谿、余示”。这里署名“余”的官员应是县丞。因为每县除县令外，还有“县丞为之贰”。故本案卷由尉摄主簿“泽”拟判后上报行政长官，因为县丞为“令”之副贰，负有“通判县事”的职责，在“令”正常居位视事的情况下，他仍须将案卷通判连署后，谿转、请示于“令”，故其判署为“依判，谿、余示”。最后由县令“辩”通判总押。^⑤

由上介绍可知，唐代县司机构判署官文书时，其职权处置与官员的设置相同。据《通典》卷 猿猿《职官十五·总论县佐》载：“大唐县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制。丞为副贰（如州上佐），主簿上辖（如录事参军，其曹谓之录事司，并司功以下六曹，总之为七司），尉分理诸曹（如州判司），录事省受符历，佐史行其簿书”。从上引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判署中，就能看到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录事、佐、史等各级官员的行判情况。虽然杜佑将县与州府衙司的职权作了比附，但我们根据史籍与出土文书，仍可看出县级机构的特殊之处：

首先，唐代县一级机构，只有京兆、河南、太原诸县有司功、司仓、司户、司法诸曹。其他各县只有司户、司法二曹。所以我们看到敦煌吐鲁番所出官文书的判署中，只有司户佐、史，

司法佐、史，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其次，诸县司户、司法佐、史，均为流外官，无品秩。从有关案卷的处理情形看，流外佐吏是无权决事主判、撰写判语的，这与州府诸曹司的情况又不同。

再次，县丞的地位虽与州之上佐一样，在形式上皆为“令”之副贰，但实际上却有很大不同，如州之上佐往往“备员而已”，没有实际权力，但县丞则能够参与县司的行政事务，是有实际职权的。

圆媛州、都督府的官文书判署

唐代实行州、县、乡制，其地方行政组织的构成以州、县二级为主。同时，还在边疆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置都督府、都护府等，以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在设都督府的地区，都督府一般都与州一级的行政单位基本相似。如西州为中都督府，据《新唐书》卷源怨下《百官四下》载：

摇摇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别驾一人，正四品下；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下；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田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土曹参军事各一人，从七品上；参军事四人，从八品上；市令一人，从九品上；文学一人，从八品上；医学博士一人，正九品上。

下面，我们以西州都督府处理官文书的有关案卷为例，对都督府（州）的行判系统作一介绍。

阿斯塔那缘怨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⑧是一组有关过所的长文书，共

愿行。我们引用其中的部分判署：

（前缺）

员瑶户曹参军元

圆瑶瑶瑶瑶瑶瑶瑶史

猿瑶瑶瑶瑶正月廿四日受，廿五日行判。

源瑶瑶瑶瑶录事元宵检无稽失。

缘瑶瑶瑶瑶功曹摄录事参军瑶思瑶勾讞。

远瑶下高昌县为勘鞠嘉琰去后何人承后上事。

这一判文中第圆行的“史”，应是户曹参军史。因据《唐六典》卷猿园记载，中都督府的功曹、户曹、仓曹、兵曹、法曹、士曹除参军事外，还有“府”、“史”各若干人，此外，户曹还有“帐史”员人。

第缘行“功曹摄录事参军思”，应是署名“思”的这一官员为功曹参军事，由于功曹参军事为从七品上，录事参军事为正七品下，由下兼上，故曰“摄”。

另外，该组文书第员猿—员远行所载蒋化明请过所判辞：

员猿瑶瑶瑶谘，元璟瑶白。

员源瑶瑶瑶瑶瑶五日。

员缘瑶瑶瑶依判，谘，齐晏示。

员远瑶瑶瑶瑶瑶五日。

员猿瑶瑶瑶依判，谘，崇示。

员源瑶瑶瑶瑶瑶五日。

员缘瑶瑶瑶依判，斛斯示。

员远瑶瑶瑶瑶瑶五日。

这一申请过所的案卷先由“元璟”判署，此“元璟”为当时的西州户曹参军事梁元璟，由他主判本案，因为“户曹、司户参军掌户籍、计帐，道路、逆旅、田畴、六畜、过所、蠲符之事，而剖断人之诉竞”，^{⑧7}案成后还要呈请上级官员批示，故在其判尾署“谿，元璟白”。元璟的判署上报后，有三个官员通判连署本案，即“依判，谿，齐晏示”，“依判，谿，崇示”，“依判，斛斯示”。这里的“斛斯”即当时的西州都督王斛斯，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理应由他总押案卷。而王斛斯之前的判署官员“齐宴”、“崇”，应是西州都督的副手，身份为别驾、司马一类的主要佐官。

通过对以上官文书的判署形式分析，可看出唐代州府处理官文书的一些特点：

首先，从其行判过程可知，几乎所有的官员（包括佐、史、府等小吏）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案卷的处置，但真正具有行判资格的乃是州府中的职事官，如长官、上佐、录事参军、判司诸曹官员（流内官）等，只不过其作用与权力不尽相同罢了。

其次，判司六曹在处理案卷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般而言，判司官员担负着检案主判的职责，他们的意见往往对案卷的最后处理具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即使是行政长官，如无明确理由，从制度上来说，也不能轻易更改判司的判辞。

再次，行判过程中各级、各司官员，如录事参军、功曹、法曹参军、州府上佐、长官及佐、史、府等小吏，其职责明确，权限清楚。据《唐律疏议》卷一百四《职制律·事直代判署》载：“诸公文有本案，事直而代官司署者，杖八十；代判者，徒一年。亡失案而代者，各加一等”。疏议曰：“‘公文’，谓在官文书。有本案，事直，唯须依行。或奏、状及符、移、关、解、刺、牒等，其有非应判、署之人，代官司署案及署应行文书者，杖八十。若代判者，徒一年”。^{⑧8}从上引敦煌吐鲁番文书案卷中多

次出现的“摄”、“判”等官称来看，唐代律令对官员职守的严格规定在地方是实行的。

另外，作为“掌贰府、州之事，以纪纲众务，通判列曹”^⑧的别驾、长史、司马，作为州府的上佐，虽规定有职责，但往往被视为闲员，并无具体职掌。他们虽有通判之名，而无判署之实。只不过在案卷上画“依”罢了，有时甚至连这一形式也省略了。由此可知，在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上，上佐的地位与作用是无足轻重的，这与作为“令之副贰”的县丞则大不一样。

猿援牒文及其处理方式

从前面的介绍可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唐代州县官文书使用最多者乃是“牒”。因此，下面我们专门以“牒”为例，对唐代官文书的处理情况加以介绍。

在出土文书中，许多唐代的牒都写作“𦍋”，这可能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的缘故。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由于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世改为代，或为系，从世之字改从云，或改从曳。民改为人，或为𡵓，从民之字改从氏”。^⑨“𦍋”字可能正是“从世之字改从云”之一例。如大谷 𦍋𦍋𦍋号文书：

𦍋𦍋豆卢军𦍋𦍋𦍋𦍋敦煌县

𦍋𦍋军司，死官马内钱叁阡柒伯捌拾文

𦍋𦍋𦍋𦍋𦍋𦍋（中略）

愿𦍋𦍋，被检校兵马使𦍋𦍋称件状如前者。

怨𦍋欠者，𦍋敦煌县请征，便付玉门军，仍

𦍋𦍋𦍋玉门军便请受领者。此已𦍋玉门

𦍋𦍋𦍋。今以状𦍋，𦍋至准状。故𦍋。

𦍋𦍋𦍋𦍋𦍋𦍋𦍋长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曹画怀𦍋

员遥 摇摇判官郭意
 员源 十二月十五日录事彻受
 员缘 尉摄主簿摇付司兵
 员远 检案摇摇泽白
 员愿 十六日
 员怨 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员怨 十二月十六日郭怀牒
 员圆 帖追，泽白。
 员圆 十七日。

摇摇摇摇摇（以下余白）

本件文书前 员袁行 钤有七方“豆卢军兵马使之印”，第 员源 员缘行 钤有一方“敦煌县之印”。可见前 员袁行 是豆卢军的牒文。员源—员缘行 是敦煌县的判文。因豆卢军与敦煌县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豆卢军的级别比敦煌县高，故豆卢军下敦煌县的牒文称“故牒”（员袁行），而敦煌县上豆卢军的牒文称“谨牒”（员愿行）。由此件文书再结合其他资料可以得知，以“故牒”形式结尾的牒文，反映的是“上施下”而又不直接统属的关系，以“谨牒”形式结尾的牒文，反映的是“下达上”，而且其运用范围要比“上施下”普遍，即使有直接关系，也可用牒文报告情况。^①

一般来说，牒文的处理程式有六个环节，即署名、受付、判案、执行、勾稽、抄目。如伯 猿源背《唐高宗总章二年敦煌县传马坊文书》有：

摇摇摇摇摇摇摇（前略）

员圆 前件驴被差送帛练往伊州，今还至县，请定
 员袁 肤第。谨牒。

原摇摇摇摇总章二年八月廿一日前校尉杨迪牒

缘摇摇摇摇付司，迁示。

原摇摇摇摇廿一日。

录摇摇摇摇八月廿一日录事令孤顺受

愿主簿敬摇付司法

怨连，行蒸白

愿廿一日

(中略)

怨愿右件人驴频追不到。

怨摇牒，件勘如前，谨牒。

怨原八月廿摇日佐赵信牒。

怨缘程师惠等五人使往伊

怨摇州，计程各违贰日，论

怨摇情不得无责。据职制律：

怨愿诸公使应行而稽留者，

怨摇壹日答叁拾，叁日加壹

愿摇等。计师惠等所犯，合

愿摇答叁拾，并将身咨注。

愿摇其不违程者记；其张

愿摇才智频追不到，牒坊

愿原到日，将迫其新备驴

愿缘及今月廿一日所阅马驴，

愿摇并长官检阅讫记。咨。

愿摇行蒸白。

愿愿摇摇廿五日。

愿怨依判，迁示，

愿愿摇摇廿五日。

愿愿马坊，件状如前，牒至准状，故牒。

员缘摇 总章二年八月廿五日
 员缘摇 佐摇赵信
 员缘摇 尉“行蒸”
 员缘摇 摇摇史
 员缘摇 八月廿一日、廿五日行判无稽
 员缘摇 前官杨迪牒，为夏惠等马送使还，请定肤第，
 员缘摇 总章二年八月廿摇日传驴□张德意等辞。
 摇摇摇摇摇摇（下略）

文书的处理是从署名开始的，本件文书中第 员缘—员远行的“付司，迁示，廿一日”就是长官署名的一种形式。从大量的敦煌吐鲁番官文书可知，署名的格式一般都是“付司，某示，某日”。

“付司”的意思就是把牒文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这是长官下达的指示。当然，也有长官立即判署的，即省略了其他步骤，直接批示。如大谷 缘猿月《河西市司使米真陀请纸笔牒》中的长官“付司”项为：“付司，检令式。河西节度买马，不是别敕令市。计不合请纸笔。处分过，楚珪示，廿九日”。

文书处理的第二个环节是“受付”，如上引文书 员苑—员愿行的“八月廿一日录事令狐顺受，主簿敬付司法”就是明证。据《唐六典》卷 猿园载，主簿还负有“监印”之责，因此，“受付”之际钤上印鉴也自然就是主簿的职责之一了。

“判案”是文书处理程式的第三个环节，也是最主要、最复杂的环节，因此人们常常把整个公文处理程式叫做“判案”。如上引文书第 员怨—员园行的“连，行蒸白，廿一日”，第 员怨—员园行的“依判，迁示，廿五日”就是“判案”的内容。另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 猿员—猿页所载《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其第

员—员行为唐益谦的上牒，员—员行为判案，缘行是“史”谢忠的牒文，其内容是对所“连”的前几件文书作出的总结报告，以供判官作“判”。

除“连”外，还有一种方法，即判官向主典发出“检案”的指示。“检案”就是判官指示属下检覆案文的意思，而主典（即主事、令史、书令史一类的办事人员）在检覆案文后便作出“牒，检案，连如前”这样的答复。主典所说的“检案”是指已经检覆了案文（这与判官所说的“检案”不同）。“连如前”则是指把牒文和前面的案文粘连起来的意思。

经过这些程序后，“判案”仍未结束，还需同职官员连署，即判官的“判文”还需通判官、长官的最后裁定。据《唐律疏议》卷缘《名例律·同职犯公坐》条：

摇摇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若通判官以上异判有失者，止坐异判以上之官）。

疏议曰：

摇摇同职者，谓连署之官。公坐，谓无私曲。假如大理寺断事有违，即大卿是长官，少卿及正是通判官，丞是判官，府史是主典，是为四等。各以所由为首者，若主典检请有失，即主典为首，丞为第二从，少卿、二正为第三从，大卿为第四从，即主簿、录事亦为第四从；若由丞判断有失，以丞为首，少卿、二正为第二从，大卿为第三从，典为第四从，主簿、录事当同第四从。^⑫

从敦煌吐鲁番官文书的判文可知，通判官的判决只是提出自己的

意见，故在他们同意判官的判决后都写了“依判，谕，某示”的判署。最后的裁决权当在长官。因此，他们都写了“依判，某示”。这样才算是最终的断案。

从判案中的署名也可看出官员的级别和职权。一般情况下，长官和通判官署名、署字。当判官向下属下判时，一般都署字，而当向上谕白时，则多署名。主典吏员则署姓名（有时也省略中间一字）。在判署的用词上，判官用“谕”、“白”，通判官用“谕”、“示”，长官只用“示”，主典用“牒”。

“执行”是判案后的一个程序，它一般由判官实施。“执行”的依据就是长官的最后“判案”，或发牒，或下符，或存案。如大谷 0842 号文书第 0842 行行的“下十一乡，件状如前，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到奉行”，就是下符执行的例证。另如大谷 0843 号 粤文书第 0843 行行的“案，为兵曹、法曹等司请黄纸准数分付事”，就是存案“执行”的例证。

“勾稽”是官文书处理程式的第五个环节。勾官“勾稽”的内容不仅仅是粘连在一起的牒文，更重要的是核对发给别一单位的公文。如果没有差错，就在公文上钤上印鉴。

判案的最后程式为“抄目”，它也是勾官的职责。一般情况下，“抄目”由三部分组成，即发文性质；来文性质、内容；处理意见、结果。如大谷 0844 号文书的抄目是：“牒，为括逃使牒，请牒上御史，并牒凉甘肃瓜等州事”。从此“抄目”可知，其公文性质为“牒”，来文是“括逃使牒”，内容为“请牒上御史”。另如大谷 0845 号文书的抄目是：“案为兵曹、法曹等司请黄纸，准数分付事”。从此“抄目”可知，其公文性质为“案”，来文内容是“兵曹、法曹等司请黄纸”，处理意见是“准数分付”。

经过这样六道程序后，一件牒文才算正式处理完毕了。

五、通俗文学的重要一页——变文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在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新兴文体。通过对变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说唱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还可以回答文学史上曾长期不能解决的宋、元、明、清民间文学的渊源问题。

什么是变文

1909年 源月，王国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在王氏所称之“通俗诗”、“通俗小说”中，有“季布歌”、“孝子董永传”、“目连救母”、“李陵降虏”及“唐太宗入冥小说”、“伍员入吴小说”等多种。后来人们才知道，其中的多数乃是我国失传已久的变文。

但由于当时大部分敦煌遗书都没有公布，人们对变文的认识尚属初级阶段，因此对这种失传已久的文体难免会产生种种隔阂。1910年，罗振玉辑印《敦煌零拾》，其中有“佛曲三种”，这是国内外最早刊布的敦煌变文作品。但因这三种敦煌写本都首尾残缺，罗氏不知其原名，只好名之曰“佛曲”。以后，随着变文作品的不断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人们对变文的认识也逐渐明确。1924年，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③一文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后来郑氏编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④、《中国俗文学史》^⑤，又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变文”加以阐述。在郑氏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大力倡导下，“变文”之名便逐渐流行，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但是，什么是变文？它是如何得名的？却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学术界的难题。八十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现在倾向性的意见是：变文和另一种叫做变相的图画有关，变文之“变”，即变相之“变”，大约是变化、变现、变异之义；变相是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画，变文本是变相的文字说明，后来变文脱离变相而独立，便演变成为一种通俗文学体裁。如白化文先生明确指出：“变文是配合一种故事性图画演出的。这种图画称为‘变相’。现在我们见到的‘变相’，主要是佛教故事画，如莫高窟中的‘维摩变’、‘劳度叉斗圣变’等。变文配合变相演出，大致是边说边唱边引导观看图画。因此可以说，变文是一种供对听众（也是观众）演出的说唱文学底本。有材料说明，变文常在专门开设的‘变场’演出”^⑥。

近年来，姜伯勤先生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即隋代三论宗吉藏《中观论疏》中的“变文易体”、孕·源^⑦《敦煌唱导法匠兼毗尼藏主广平宋律伯彩真赞》中的“唱导法将”入手，对变文的起源和内容、体裁进行了探讨，指出：

摇摇“变文”二字是一个文体学的概念，也是一个关于变易了的演唱宣讲方式的文本的概念。变文是对经文的变易了的文体，是以变态方式宣唱经文及事缘的文本。由于《高僧传》“经师”传论及“唱导”传论都提及“变态”，因而使我们相信早期变文既见于经师讲经中，也见于导师唱导中，因而早期广义的“变文”一词既涵盖了经师讲经时变易经文文体的通俗讲经文本，更涵盖了导师在授戒及各种法会中引用原属律藏的本生、譬语及原属经藏的经变故事。用相对于三藏经典的变易了的通俗文体，用于讲经及在法会唱导中咏唱事缘，这样，至迟在兴皇法朗所处的南朝梁陈之世，就产生了早期广义的变文。而它的产生，又缘自东晋时

慧远对唱导的革新。^①

在敦煌遗书中，明确标名为“变文”或“变”的作品，现知有以下愿种：

(员)《破魔变》一卷(孕·愿尾题)；

(圆)《降魔变文》一卷(杂·缘首题)；

《降魔变》一卷(杂·源首题)；

(猿)《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孕·猿首题，又杂·愿首题)；

《大目犍连变文》一卷(杂·愿尾题，又北图藏盈字苑号尾题、孕·猿尾题)；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孕·愿首题、又孕·猿首题)；

(源)《八相变》(北图藏云字愿号卷背题)；

(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杂·猿首题)；

(远)《汉将王陵变》(杂·缘首题，又北大图书馆藏本封面题)；

(苑)《舜子变》(杂·源首题)；

《舜子至孝变文》一卷(孕·愿尾题)；

(愿)《刘家太子变》一卷(孕·猿尾题)。

这些变文作品，一般都不知道其创作年代，我们只能从某些作品的题记和涉及到的事件、人物、官制、地理沿革、文物制度等方面，来考察其大致年代。其中《降魔变文》为唐玄宗天宝年间的作品，是现存变文中所知年代最早的一种；而《舜子变》为五代后晋天福十五年(944年)抄本，是现存变文写本中有明确纪年最晚的一篇。

以上愿种有关变文的原始材料，每种至少有一件是明确标题

为“变文”或“变”的。我们探讨变文，应该以它们为讨论基础^⑧。通过对以上作品的研究可知，它们在体制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特点：

第一，散韵组合，说唱兼行。说是表白讲述，即艺人以第三人称口吻铺陈情节，敷演故事。唱是行腔咏唱，用来叙述故事，抒发感情。前者是散文，后者是韵文，二者相互配合。当然也有全用韵文歌唱，不用散文讲述的，或全用散文讲述，不用韵文歌唱的。但一般都是散韵相间，由韵文和散文交互组合而成。如《八相变》云：

摇摇……太子既生之下，感得九龙吐水，沐浴一身。举左手而指天，垂右臂而于地，东西徐步，起足莲花。凡人观此皆殊祥，遇者顾瞻之异端。当尔之时，何道言语：

九龙吐水浴身胎，八部神光曜殿台。

希奇瑞相头中现，菡萏莲花足下开。

第二，有习用的过阶提示语。完整的变文写卷，其结构形式都是散韵相间，在由散文说白变为韵文歌唱之际，必然存在着某些表示衔接过渡的惯用句式。它们是“……处”、“看……处，若为……”、“遂为陈说”、“当尔之时，道何言语”等，如《汉将王陵变》：

二将斫营处，谨为陈说……

说其本情处，若为陈说……

又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看目连深山坐禅之处，若为……

即至五道将军坐所，问阿娘消息处……

再如《降魔变文》：

舍利弗共长者商度处，若为……

且看诘问事由，若为陈说……

而《八相变》却是：

当尔之时，道何言语……

于此之时，有何言语……

由以上例句可知，这些惯用句式都是用来向听众表示即将由白转唱，并有指点听众在听的同时“看”的意图。“由此可以推论出，变文是配合变相图演出的，大致是边说边唱引导观看图画。说白叙述故事，唱词加深印象。变文是一种供对听众（也是观众）演出的说唱文学底本”^⑨。

第三，由以上叙述可知，演唱变文，往往配合图画。这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标题中就可看出。虽然此图没有保存下来，但原卷有图则是毋庸置疑的。孕·猿图范《汉将王陵变》尾题标作《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文中又有“从此一铺，便是变初”的话句，而所谓“铺”，正是一幅或多幅佛像图画的意思。尤其是孕·猿图范《降魔变文》，不仅有图远幅，而且卷背还抄录着与画图内容相应的唱词，更是变文配合画图的实物。

根据变文的这些特点，对敦煌遗书中已失去标题的说唱作品进行研究探讨，可知伍子胥故事、李陵故事、王昭君故事、张议潮故事、张淮深故事等都属于变文作品。

圆媛变文的题材和内容

现存的敦煌变文，从内容上看，其题材大体有三类：

一是历史故事类。如《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李陵变》、《王昭君变文》等，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还有一些作品则写了当代的历史事件，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就是以当时当地的英雄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它们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历史事件中的轶事趣闻，再吸收些民间传说，进行加工渲染而创造的。这类作品，不但形象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面貌，而且几乎成为人民褒忠贬奸、评价历史的“教科书”。如《伍子胥变文》现存 ~~员~~ 多字，除卷尾残去伍子胥遇难的内容外，是一篇故事情节基本完整的变文。它与《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记载相比，既以史籍记载为依据，又不为史书记载所局限，而是适当增加了某些细节描写，从而提高和丰富了故事的真实感。在记载伍子胥逃亡吴国的经过时，《史记》说：“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夫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于吴”^⑩。变文作者则以伍子胥逃亡为主线，增加了打纱女赠食自沉，伍子胥见妻遇姐，外甥追舅以及渔人救渡后覆舟自尽等情节，把伍子胥历经艰危、壮怀激烈的命运同人民的真诚相助联系在一起，反映出打纱女、渔父等人不贪富贵和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伍子胥变文》远远超出了史籍记载的范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流传^⑪。

再如《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虽残缺过甚，但仍

可看出当时民间艺人如何通过变文说唱，热情讴歌张氏叔侄领导敦煌地区人民抵御外族入侵，保境安民的英雄业绩。然而两唐书却未为他们立传，只在其他传记中有简略记载，因而这两篇变文作品便成了补充晚唐西北边陲历史的极好史料。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变文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经过适当的提炼和概括，集中描写了张议潮领导归义军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三次战斗，展现了其威武壮烈的战斗场面：“展旗帜，动鸣鼙，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拽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张淮深变文》描写归义军与回鹘的战斗场面说：“先锋远探，后骑相催，铁□千队，战马云飞。分兵十道，齐突穹庐。鞞鼓大震，白刃交麾，匈奴丧胆，獐窜周诸。头随剑落，满路僵石。回鹘大败。”表现了归义军将士勇敢无畏的精神和“生死大唐好”的爱国热情，这种以现实为依据的描写手法，为变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是民间传说类。如《孟姜女变文》、《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等，它们讲述的是与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社会习俗等有关的故事。如《舜子变》虽宣扬了愚孝思想，但通过舜几番机智地逃脱后母的陷害，反映了封建社会家庭内部的矛盾斗争。后母之狠毒、瞽叟之昏聩、舜子之机智至孝等都描写得比较突出。变文叙事采用反复手法，质朴单纯；又用传统的三灾三难的“三迭式”结构，均具民间讲故事的趣味。

又如《孟姜女变文》，则以想象夸张和真实描绘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铺叙了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故事，抨击了封建社会繁重的兵役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比起佛寺禅门的空幻说教要具体、深刻得多。变文作者为了突出主题，便巧妙安

排了游魂陈诉、哭倒长城、指血验骨、众魂相托等情节，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

其妻闻之大哭叫：不知吾在长城天。
既云骸骨筑城中，妾亦更知何所道？
姜女自扑哭皇天，只恨贤夫亡太早。
妇人激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长城倒。

髑髅既蒙问事意，已得传言达故里。
魂灵答应杞梁妻：我等并是名家子。
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
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里。
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

这些血泪斑斑的控诉，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力，并且它奇特的想象，也使悲剧的意义更加深化了。

三是宗教类。如《太子成道经》、《八相变》、《降魔变文》、《破魔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等。它们主要讲述释迦精心修道、断绝苦因、追求佛家最高理想的故事和佛法战胜邪道的故事。其宗旨虽在于弘扬佛教，无多大意义，但有些故事还是曲折地反映了人间现实生活的一些侧影。如根据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第四十一》演绎的《降魔变文》，主要描写了舍卫国大臣须达，在赴王舍城为子求媳时，偶然遇见了释迦，于是悟性顿开，皈依佛法。他为了请释迦亲临舍卫国说法，便出重金购太子祇陀园地起精舍，以作道场。六师外道听到这一消息后，依仗国王的支持，便要求与舍利弗斗法，并约定：若舍利弗胜，则外道皈依佛祖；若外道胜，则不仅不能起精舍说

法，而且太子、须达亦将“受诛”。劳度叉与舍利弗先后六次分别变化成高山、金刚；水牛、狮子；宝池、大象；毒龙、金翅鸟；黄头鬼、毗沙门天王；树、风。激烈拼斗，在争斗中舍利弗节节胜利，最后以大风席卷劳度叉阵营而获全胜，变文也以外道皈依佛法而告终。其主旨虽在于宣扬佛法宏大，威力无边，只有归心向佛，才能解脱，自不足取。但故事写得相当热闹生动，又多次设置悬念，因而极富戏剧趣味。如描写舍利弗与劳度叉最后两次变化拼斗说：

六师自道无般比，化出两个黄头鬼。
头脑异种丑尸骸，惊恐四边令怖畏。
舍利弗举念暂思维，毗沙天王而自至。
天王回顾震睛看，二鬼迷闷而擗地。
外道是日破魔军，六师胆慑尽亡魂。
赖得慈悲舍利弗，通容忍耐尽威神。
驴骡负重登长路，方知可得比龙鳞？
只为心迷邪小径，化遣归依大法门。

六师虽五度输失，尚不归降。……忽于众中化出大树，婆娑枝叶，蔽日干云，耸干芳条，高盈万仞。……于时见者，莫不惊嗟。舍利弗忽于众里化出风神，叉手向前，启言和尚：“三千大千世界，须臾吹却不难；况此小树纤毫，敢能当我风道！”出言已讫，解袋即吹。于是地卷如棉，石同尘碎，枝条迸散他方，茎干莫知所在。外道无地容身，四众一时唱快处若为：

摇摇六师频□输五度，更向王前化出树，
摇摇高下可有数由旬，枝条蓊蔚而滋茂。
摇摇舍利弗道力不思议，神通变现甚希奇，

摇摇辞佛故来降外道，次第总遣大风吹。
摇摇神王叫声如电吼，长蛇□树不残枝，
摇摇瞬息中间消散尽，外道飘飘无所依。
摇摇六师被吹脚距地，香炉宝子逐风飞，
摇摇宝座倾危而欲倒，外道怕急总扶之，
摇摇两两平章六师弱，芥子可得类须弥！

作者将他们的拼斗场面描写得幻化多变，诙谐幽默，使人们自然会想起后世《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之类的小说，从而使我们知道敦煌变文怎样在精神上哺育了后代神魔小说。

猿援变文的价值

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是：

第一，它在历史上是民间说唱的俗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开辟的一个文学园地。它利用各种各样的题材，在民间说唱，拥有众多的听众和读者，可以说变文是我国历史上真正的人民文学。通过对变文的内容分析可知，它完全是由人民大众创作的文学，其故事内容，都在民间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变文中的人物，都是通过人民大众的爱憎而陶铸出来的典型。只有正确认识变文的人民性，才能真正认识它的价值及其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①②}

第二，变文内集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的通俗性语言——民间口语。在我国古代，口语体著作非常少见，正统文人在他们的创作中，很少有采用民间口语的。由于变文是真正的民间说唱文学，它大量采用的是民间口语，也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多、最古老的民间口语，因而对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

第三，变文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宋代话本、明代“三

言”、“二拍”，以及明清以来的弹词宝卷、鼓词的由来，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敦煌变文的发现，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早在六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就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①③}

变文散韵相间的组合体制，当时就曾影响到传奇小说的形式，如唐代武则天时张鷟的《游仙窟》，其体裁也是由诗、文排列而成，这在唐以前是根本没有的，却与变文散韵相间的形式完全一样。里面的虚字、语助词和辅助说明时间转变的联系词如“少时”、“于是”、“余时”、“当时”、“于时”等等，也和变文中的“尔时”、“是时”等相同。再如《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莺莺歌》与《莺莺传》、《李娃行》与《李娃传》、《冯燕歌》与《冯燕传》等等，都是散文传奇与叙事相互组合。它们写作的具体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变文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宋元以后的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弹词、宝卷等各类说唱文学以及戏剧文学，尽管其名称和体制各有差异，它们的发展道路和时代先后也各不相同，然而若追溯其渊源，却都与变文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就连藏

族的民间曲艺拉麻玛尼，据说也是受变文的影响而形成的。

宋代话本是唐代俗讲和变文的直接延续和发展，有了变文才有可能产生话本，有了话本才有“三言”、“二拍”和以后的弹词、宝卷等。如宋代以后宝卷、戏曲中的《目连救母》本子，就是由敦煌本《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演化而来的。过去研究我国说唱文学的历史，只能看到宋代的话本，宋以前的情况则不得而知。敦煌变文的发现，大大填补了这个空白，使文学史家们在六朝小说、唐人传奇与宋元明说唱文学、戏剧等文体之间，找到了中间环节，理出了承上启下，继承创新的衔接关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由此得到了填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六、诗苑奇葩竞争艳

敦煌诗歌，是敦煌遗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主要指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诗人专集、唐代诗文选集、唐人选唐诗以及流传于敦煌地区僧俗人士的诗歌残卷，还包括某些即情应世、针砭时弊、感慨悲怀的敦煌民间诗歌，据张锡厚先生研究统计，其总数可达三千首左右。^{⑩④}而项楚先生则对敦煌诗歌的概念界定中，将原来列入诗歌范畴的某些曲词、俗赋、佛佛教的偈颂等排除在外，这样敦煌遗书中存在的诗歌约有二千首以上^{⑩⑤}，其中大多数是《全唐诗》不载的佚诗，是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诗歌繁荣的真实写照。通过对敦煌诗歌的搜集整理，既可补《全唐诗》之不足，又可为研究唐五代及敦煌文化作出宝贵的贡献。

现依据敦煌诗歌的特点，将其分类介绍如下：

员援敦煌诗人之作

所谓“敦煌诗人之作”，是指从敦煌诗歌抄卷中，可以明显

判为敦煌地区的诗人文士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从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直接反映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时事之作

唐代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西北边境空虚，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逐渐侵吞河陇大片土地。驻守边塞的军民陷入了异常悲苦的境地，一些边地城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甚至被夷为平地。对于这段历史，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无法知其详情，而敦煌写本 孕· 圆缘《唐人诗集残卷》的发现，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生动而又形象的材料。^⑩如《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云：

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
回首见城郭，黯然林树间。
野烟暝村墅，初日惨寒山。
步步减愁色，迢迢惟梦还。

又如《冬日书情》曰：

殊乡寂寞使人悲，异域留连不暇归。
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
寒天落景光阴促，雪海穹庐物色稀。
为客终朝长下泣，谁怜晓夕老容仪。

再如《闻城哭声有作》说：

昨闻河畔哭哀哀，见说分离凡几回。
昔别长男居异域，今殇小子瘞泉台。
羁愁对此肠堪断，客舍闻之心转摧。

漂泊自然无限苦，况复存亡有去来。

另如《夏日非所书情》写道：

自从去岁别流沙，犹恨今秋归望赊。
将谓西南穷地角，谁言东北到天涯。
山河远近多穹帐，戎俗追观少物华。
六月尚闻飞雪片，三春岂见有烟花。
凌晨倏闪奔雷电，薄暮斯须敛霁霞。
傍时崇山形屹屹，前临巨壑势呀呀，
昨来羁思忧如捣，即日愁肠乱似麻。
为客已遭~~地~~否事，不知何计得还家。

从这些诗歌中不难看出，由于吐蕃统治者的侵扰破坏，给河陇各地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与痛苦。

唐宣宗大中二年，张议潮率众起义，推翻了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并渐次收复了其他各州。为了加强对河西的统治，唐王朝建立归义军。到了唐昭宗、哀宗时期（~~愿国~~—~~愿国~~年），归义军内部争权夺利，战乱频仍，张承奉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西汉金山国。当时因白雀之瑞，“三楚渔人臣张永进上”《白雀歌》（~~孕·愿国~~ ~~愿国~~ ~~愿国~~）。诗中利用讖纬之说，侈陈瑞验，以明天命所归，因此可视为金山国之开国史。诗云：

白雀飞来过白亭，鼓翅翻身入帝城。
深向后宫呈宝瑞，玉楼高处送嘉声。
白衣白~~鞞~~白纱巾，白马银鞍佩白缨。
自古不闻书不载，一剑能却百万兵。

.....

我王自有如神将，沙南委付宋中丞。
白屋藏金镇国丰，进达偏能报虏戎。
楼兰献捷千人喜，敕赐红袍与上功。
文通守节如白银，出入王宫洁一身。
每向三危修令得，唯祈宝寿荐明君。
填词陈白未能休，笔势相催白汗流。
愿见金山明圣主，延龄沧海万千秋。

另如 孕·猿·猿号《龙泉神剑歌》曰：

龙泉宝剑出丰城，彩气冲天上接辰。
不独汉朝今亦有，金鞍出下是长津。
天符下降到龙沙，便有明君膺紫霞。
天子由来是天补，横截河西作一家。
堂堂美貌实天颜，□德昂藏镇玉关。
国号金山白衣帝，应须早筑拜天坛。

……

东取河兰广武城，西取天山翰海军。
北归燕然□岭镇，南当戎羌逻莎平。
□□军壮甲马兴，万里横行河湟清。
结亲只为图长国，永霸龙沙截海鲸。
我常威雄人未知，叱咤风云自有时。
祁连山下留名迹，破却甘州必□迟。

……

第二，敦煌人士所献贺诗及酬赠奉答之作

这一类诗篇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除具有一定的艺术情趣外，更注重诗歌的实用价值。

贺诗方面的代表作有 杂·~~元稹~~《白鹰歌》，作者以白鹰的异瑞呈祥，歌颂秉节龙沙的尚书。诗云：

奇哉白晶灵圣峰，所感呈祥世不同。
尚书德备三边静，八方四海尽归从。
白鹰异俊今来现，雪羽新成力更雄。
平原狡兔深藏影，争能路上出其踪。

在敦煌诗歌中，酬赠奉答之作也较为习见，其中有些诗篇比较真切，充满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如 孕·~~国缘~~《赠邓郎四弟》诗云：

把袂相迎意最浓，十年言笑得朋从。
怜君节操曾无易，只是青山一树松。

某些赠释氏佛徒之作，又别有一番情趣，或描述高山窟龕，远离尘世；或刻画清夜月色，洗尽浮埃；或叙写寂寞苦乐，莫可言说。如 杂·~~国元~~《赠道清和尚诗》就是抒发对恩师的无限感激之情，诗云：

身到敦煌有多时，每无管领接括希。
寂寞如今不清说，苦乐如斯各自知。
思量乡井我心悲，未曾一日展开眉。
奈得清师频管领，似逢亲识是人□。

第三，描写和颂赞敦煌地区名胜古迹之作

这一类作品主要有《敦煌二十咏》，每首均为五言律诗，所咏景物依次为：三危山、白龙堆、莫高窟、贰师泉、渥洼池天

马、阳关戍、水精堂、玉女泉、瑟瑟监、李庙、贞女台、安城祆、墨池、半壁树、三攒草、贺拔堂、望京门、相思树、凿壁井、分流泉等。

《敦煌二十咏》主要是运用写实的手法，充分展现敦煌风物独具异彩的粗犷景观和极其难得的美丽风光，从而激发人们热爱家国、热爱乡土的情怀，故能得到广泛的传诵。如《贰师泉咏》曰：

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
路指三危回，山连万里枯。
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
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苏。

又《李庙咏》曰：

昔时兴圣帝，遗庙在敦煌。
叱咤雄千里，英威静一方。
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傍。
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在敦煌写景诗中还有《题隐士咏》、《寿昌》及佚题诗残卷，它们分别选取特定的自然景物和历史环境，予以恰如其分的描写，从而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如孕·缘田佚题诗云：

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
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扬柳花。
仕女尚□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
雄军往往施鼙鼓，斗将徒劳獫狁夸。

谈到敦煌胜迹，自然以莫高窟为最。因此在敦煌诗歌中，也有一些歌咏莫高窟的诗篇，从中不仅能看到当时莫高窟的繁盛，又可以反映出当地人士对莫高窟的爱护与虔敬。由于这类诗歌较少，且大多在佛经发愿文及题记中，多不为人们所注意，现摘引几首。如孕·圆背是有关莫高窟的杂文，其中有佚名氏的《南大像北边古窟得观音院主释道真修葺竣功题壁》曰：

人生四大总是空，何个不觅出樊龙。
造罪人多作福少，所以众生长受穷。
坚修苦行仍本分，禁戒奢华并不同。
今生努力勤精练，冥路不溺苦海中。
逐日持经强发愿，佛道回去莫难逢。
唯报往来游礼者，这回巡谒一层层。

同卷还有这样一首诗：

白壁从来好丹青，无知个个乱题名。
三涂地狱交谁忍，十八口铜灌一瓶。
镌龕必定添福利，凿壁多层证无主。
唯报往来游睹者，辄莫于此骋书题。

圆释氏道徒之作

敦煌乃丝绸之路的要冲，是汉族聚居区最先接触佛教的地方。作为佛教文化兴盛的标志，除佛教典籍得到大量传抄、讲经传道深入民心之外，释氏佛徒创作的诗歌作品也逐渐为人们重视，并广为传抄，其中亦不乏佳作，并可补《全唐诗》之不足。

敦煌诗歌中的释氏作品，大都佚去作者姓氏，留有撰者姓名的诗作为数不多，其中主要有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的诗作。杂记原真诗残卷所载“诗序”云：“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年逾七十，风疾相兼，动静往来，半身不遂。思忆一生，所作所为实事，难竟寸阴，无为理中，功行阙少。犹被习气，系在轮回，自责身心，裁诗十首。虽非佳妙，狂简斐然，散虑摅怀，暂时解闷。鉴识君子，矜勿诮焉。”从此序及诗文内容可知，这是悟真回首往事、追忆一生而写的自省诗。其语言通俗，明白如话，叙事说理，即情而发，虽然算不上名篇佳作，但也表现出释氏佛门追求口语体白话诗的倾向。

此外，还有洞山和尚《神剑歌》、丹遐和尚《玩珠吟》（孕·猿·猿）、融禅师《定后吟》（杂·猿·猿）、青判和尚《诚后学铭》（孕·猿·猿）等，也都值得一读。

敦煌释氏诗中，佚去作者姓氏的诗歌很多，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揣摩人生，嗟叹凡迷之作。作者利用某些习见的人生现象，力图说明人皆易老，俄成聚尘的生灭道理。如《述凡情》诗曰：

圣意空无我，凡情计有身。
缘身起分别，五行益迷津。
触境怀颠倒，逢缘妄受熏。
既迷生灭果，宁识去来因。
日日贪财物，朝朝长我人。
本期千载活，俄成一聚尘。

第二，演绎生死，弘扬佛法之作。有的取材于佛经，铺叙成诗，以成生死之相，如杂诗第四首《九相观诗》云：

色醉明神暗，贪迷达识昏。
情尘交触境，冥阴托灵魂。
孕气成珠貌，倾生路报分。
宠怜膝下育，娇爱掌中存。
肝胆非为此，珍财岂足敦。
宁知是虚幻，聚散等浮云。

（婴孩相第一）

另如 杂·圆缘号卷中的一首诗偈曰：

身生智未生，智生身已老。
身恨智生迟，智恨身生早。
身智不相逢，曾经数度老。
身智若相逢，便得成佛道。

这首诗的“智”是指悟解佛法的智慧。若要修行成佛，须在有生之年（身），悟解佛法（智），两者遇合，方得成佛。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二者总是互相错过。这首诗就是表现一个立志修行成佛者对这种现象的深深的遗憾。^{⑩⑦}

第三，劝诫修行，参禅悟道之作。释氏佛门为了控制和约束僧徒道众的言行，往往以诗歌形式宣传各种戒规，谁若犯戒，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和菩萨戒文》^{⑩⑧}首，就历述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沽酒、自说、毁他、多慳、多嗔、谤三宝”等十戒，详细描述地狱的凄惨可怖景象，以警僧众道徒，切不可犯戒。

释氏劝人修道成佛之作，以 杂·圆缘和 杂·猿远两卷所载《心海集》为集大成者。如：

迷子念佛声切哀，勤苦长斋劝善哉。
万恶丝毫不肯改，凭贤求理觅菩提。

（《执迷篇》）

解悟成佛绝不难，调炼身心出世间。
蠲除想念攀缘尽，如空独秀迥亦然。

（《解悟篇》）

勤苦穿凿菩提道，昼夜镌雕心路门。
功深若能开阖得，无端掩闭作梁津。

（《勤苦篇》）

另如北图海字 缘号利涉法师《劝善文》曰：

先亡父母报男女：我今受罪知不知？
都为前生养汝等，委（畏）汝不活造诸非。
大斗小秤求他利，虚言诳语觅便宜。
身口意业都不善，高心我慢镇长为。
缘此将身入地狱，镬汤炉炭岂离。
或作猪羊常被煞，或作驴马被乘骑。
或作豺狼生旷野，或作鱼鳖在陂池。
或作虫蚁生衢路，或作虻虱在人衣。
自作恶业还自受，长劫偿他无了期。
恐汝隔生不相识，对面相见不相知。
为报后代诸人等，垂心救护不思议。

从其内容看，这首题名为《劝善文》的诗歌，主要是针对世俗民众的，因此便托言先亡父母告诫儿女，以亡后所受之恶报现身说法，以此劝诫俗人之心，别用“大斗小秤”、“诳语”等方法

来“觅便宜”。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释氏作品中，还有数量最多、内容丰富的《王梵志诗集》，据有的学者调查统计，王梵志诗已达 400 个卷子，加上唐宋以来诗话笔记所存王梵志佚诗，共得诗 1400 余首。然是否都为王梵志之作，目前尚有不同意见。

王梵志诗有着和同时代诗人迥然不同的特点。他善于把通俗的语言、自由的章法引入诗歌领域，既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又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如：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他家笑吾贫，吾贫极快乐。
无牛亦无马，不愁贼抄掠。
你富户役高，差科并用却。
吾无呼唤处，饱吃长展脚。
你富披锦袍，寻常被缠缚。
穷苦无烦恼，草衣随体着。

如《富饶田舍儿》曰：

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
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
槽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
牛羊共成群，满圈养豚子。
窑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
里正追役来，坐著南厅里。
广设好饮食，多酒劝遣醉。

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马。
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
索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
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
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
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

王梵志创作的某些描摹社会，直接反映贫富对立的诗篇，以及揭露封建官场种种弊端的诗篇，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水平。如其诗中的“里正追庸调”、“租调无处出”、“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广种如屯田”，“仍更买奴婢”、“里正追役来”、“和市亦不避”等，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史料价值。

敦煌遗书中除大量的释氏佛徒之作外，还有一些道教诗歌，其数量虽不多，但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如《老子化胡经·玄歌》和李翔《涉道诗》等。

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共五卷，其中前四卷为文，第五卷为《玄歌》，内容全系五言诗，计有《化胡歌》愿首，《尹喜哀叹》缘首，《太上皇老君哀歌》苑首，《老子十六变词》愿首，共计猿愿首，如《化胡歌》一首曰：

我昔化胡时，西登太白山。
修身岩石里，四向集诸仙。
玉女擔浆酪，仙人歌玉文。
天龙翼从后，白虎口驰断。
玄武负钟鼓，朱雀持幢幡。
化胡成佛道，丈六金刚身。
时与决口教，后当存经文。

吾升九天后，剋木作吾身。

孕·猿号李翔《涉道歌》诗集，共有七言律诗 15 首。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即游览道教胜迹者；吟咏道教神话者；道友赠答唱合者。如《许真君铁柱》云：

深恐老蛟重作患，独埋铁柱至如今。
根老直下蟠江底，势壮长流镇郡心。
神鬼每闻趁夜后，风雷不敢犯塘阴。
无因更有横泉窟，压断祁精气永沉。

另如《题金泉山谢自然传后》曰：

蜚谪归天固有程，虚皇还召赴三清。
箫歌近向峰头合，羽驾低临洞口迎。
自换玉衣朝上帝，岂关金格注生名。
门人未得随师去，云外空闻好住声。

猿援敦煌民间诗歌

敦煌诗歌中有大量的民间诗歌，它们多为敦煌地方人士之作，除个别留下作者姓名外，绝大多数为佚名之作。这类诗歌通常是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创作，用来向民众普及教育、传播知识，表现民众的情感，娱乐民众的生活。这些民间的诗歌作品大部分为《全唐诗》所不载，只是由于敦煌藏经洞的保存而重现。从历史上看，民间一直流传着许许多多通俗的诗歌、民谣等。只是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绝大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失传了，而没有保存下来罢了。敦煌藏经洞的

发现，使我们有幸看到千年前流传在敦煌民间的诗歌，感受到当时民众的生活气氛和思想情绪。这些诗歌作品，或抄在写卷背面，或写于其他文字夹行之间。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劝善修道的诗歌

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宣扬业道因缘、轮回报应和劝善修道之作，便应运而生，如卫元嵩的《十二因缘六字歌词》（孕·~~源~~·~~因~~·~~缘~~·~~果~~·~~报~~），就是宣扬佛门种种因缘观念的诗句。诗云：

百病酸疼苦切，四肢急如绳结。
悲啼叫唤耶娘，顿悟声嘶呜咽。
两手摸空撩乱，九孔不净脓血。
寄语诸徒览者，学道大宜志节。

（《十二老死缘》）

还有些以家教世训为内容的诗句，在敦煌民间广为流行，如《崔氏夫人训女文》（孕·~~源~~·~~因~~·~~缘~~·~~果~~·~~报~~），语句通俗浅近，音韵谐和流畅，故而成为晚唐五代颇受民间欢迎的通俗读物。诗云：

香车宝马竞争辉，少女堂前哭正悲。
吾今劝女不须哭，三日拜堂还得归。
教汝前头行妇礼，但依吾语莫相违。

.....

路上逢人须敛手，尊卑回避莫汤前。
外言莫向家中说，家语莫向外人传。

.....

若能一一依吾语，何得翁婆不爱怜。
故留此法相教示，千秋万古共流传。

第二，反映民间风习之作

这类诗歌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有的以时令节候为题，如《卢相公咏廿四节气诗》（孕·~~圆~~原），共有~~圆~~原首五言律诗，诗题依次咏“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等廿四节气，如《咏惊蛰二月节》云：

阴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
桃花开蜀锦，鹰老化春鸠。
时候争催迫，萌芽护短修。
人间务生事，耕种满田畴。

描写敦煌民间嫁娶为题的新婚诗，主要见于《下女夫词》卷内可以独立成章的五七言诗，如：

一花却去一花新，前花是假后花真。
假花上有衔花鸟，真花更有采花人。
神仙本自好容华，多事傍人更插花。
天汉坐看星月晓，纷纷只恐入云霞。

敦煌人民不仅把诗歌用于姻丧嫁娶，有时连生老病死也借助于诗歌表达自己的愿望，如杂~~缘~~缘《康大娘遗书》诗曰：

日落西山昏，孤男留一群。
剪刀并柳尺，贱妾且随身。
盒今残妆粉，留且与后人。
有情怜男女，无情亦任君。
黄钱无用时，徒劳作微尘。

第三，感叹抒怀之作

敦煌民间流传的《少年老翁相问叹诗》（杂·~~五言~~ 孕·~~五言~~），就是感叹诗的代表作。诗云：

少儿答老翁曰：

余因游赏往东西，陌上春游逢一翁。
其翁皓发面无色，策杖微微怨无力。
侧耳听言听不闻，注目看人竟不识。
是时余乃叹其翁，谁教发白面无红。
何不双肩学春柳，飘摇两鬓骋秋蓬。

老翁答少儿曰：

翁乃其时闻此语，含笑叹言如且住。
体瘦皮疏吾不将，暗昧昏迷留与汝。
吾嗟三五少年时，神清美貌呈芳姿。
莫言我独今如此，汝等须臾还若斯。

诗中通过少儿与老翁的问答，尤其是老翁的感叹，生动地说明了人所共知的人生短暂、终须衰老的道理，很耐人寻味。为了避免发出“老之将至”的慨叹，那就要从少年时代勤苦学习，以求成名立身，如杂·~~五言~~薛言俊诗曰：

童儿学业初殷勤，累习积圣德人钦。
但似如今常寻诵，意智逸出盈金银。
不乐利润须成道，君子烦道不忧贫。
数年读诵何拙晓，孝养师父求立身。

在有些敦煌写卷的尾部，还保留着一些抄写人的随手题诗。这些诗大都是即兴之作，以抒发个人抑郁不满的情怀，其中也有调侃戏谑之作，口语俚词皆入诗中。虽然格调特殊，却也反映出当地抄书人的真实情怀。如 杂 图~~愿~~学仕郎安友盛诗云：

今日写书了，合得五升麦。
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

再如 孕~~猿~~三界寺学仕郎张富诗曰：

计写两卷文书，心里些些不疑。
自要身心恳切，更要师父阁梨。

另如北图宿字 怨~~愿~~号也有书手题诗：

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
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敦煌的学郎和其他时代、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活泼而又顽皮，因而也留下了一些玩笑诗，如 杂 图~~愿~~《社司转帖》后有诗曰：

学郎大歌（哥）张富千，一下赶到《孝经》边。
《太公家教》多不残，摇~~猿~~猱儿口实乡偏。

这首诗后有“李再昌”题字，可见这是他挖苦同学张富千的。《孝经》、《太公家教》就是这些学郎的课本，这首诗歌就取材于

学郎们的身边之事。^{①08}

敦煌诗歌中还有以“重出字”构思而成的诗，它以重出之字，巧妙为对，寓意于中，实为难得。这种类似游戏之作，虽格调不高，但其包含的旨趣，还是耐人寻味的。如孕猿魏范诗僧抄写的残诗内有：

春日春风动，春来春草生。
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

高僧高高高入云，真僧真真真是人。
清水清清清见底，长安长长长有君。

源媛敦煌文人诗歌

我们所说的敦煌“文人诗歌”，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中原文人创作的诗歌。自从张骞通西域，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后，敦煌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就一直比较密切。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唐代全盛时期，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文化曾经源源不断地涌进敦煌地区，推动着敦煌地区文化的同步发展。中原诗人精美绝伦的诗篇也在敦煌地区广泛传播，受到敦煌民众的喜爱，哺育着敦煌诗人的成长。就是在吐蕃占领敦煌及其后来的一段时间，虽然敦煌和中原地区曾一度隔绝，但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并没有中断。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中原文人诗歌，虽然只是当时在敦煌地区流传的中原文人诗歌的很少一部分，但已经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这些文人诗歌的发现，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尤其是某些久已失传的名篇佳作以及唐人抄写唐诗选本的发现，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

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唐代诗人作品，有专集、选集、名篇珍

本、残诗断卷等，它的发现，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尤其是某些久已失传的名篇佳作以及唐人抄写唐诗选本的发现，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

第一，唐人诗集

敦煌发现的唐人诗集，除前面已经提到的《王梵志诗集》外，主要有《李峤杂咏注》、《高适诗集》、《白香山诗集》等。《李峤杂咏注》有两种抄本（杂·~~圆缘~~ 孕·~~猿猿~~），诗注为张庭芳所撰。经比较对勘，两卷所存诗句与佚存本、全唐诗本略有差异，这是迄今发现敦煌唐人诗集的惟一注本，非常可贵。

《高适诗集》，敦煌有四种抄本，即 孕·~~猿圆~~，首尾俱残，有诗 猿题、~~源~~首，与今本相校获佚诗 猿首：《双六头赋送李参军》、《过崔二有别》、《奉献平原颜太守》；杂·~~圆猿~~，存残诗 远行，又 圆残行；孕·~~圆缘~~与 孕·~~圆苑~~，共存高适诗 缘首，内两题不见今本：《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事即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同李司仓宴睢阳东亭》。

《白香山诗集》，敦煌存两种写本，即 孕·~~圆缘~~，折叶装本，今存八叶半。首为《寄元九微之》，下署“白乐天”，附元稹《和乐天韵同前》，以下存白居易“新乐府” 远首；孕·~~猿苑~~，存诗 猿首：《蒲桃架诗》、《夜归》、《柘枝妓》，本为寺僧所写，卷末题记“乾符四年（~~愿苑~~）二月二十日灵图寺僧某”，距白居易下世（~~愿苑~~）仅 猿年，是极为难得的珍本。

第二，唐人选唐诗

敦煌所见唐人抄写的唐诗选集卷帙较多，有的还夹抄有文、赋、词等作品。如 孕·~~圆缘~~，有诗 远首、词 苑首、文 圆篇、赋 圆篇，是一部十分丰富的唐人诗文选集残卷。其中有很多诗篇为《全唐诗》所未载，是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

在唐人选唐诗抄卷中，题为《珠英学士集》的抄本最引人注目。《新唐书·艺文志》曰：“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五后

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亦有著录，说明宋代犹存。其后，该集散佚失传。今从敦煌本复得此集残卷两种，即 孕·猿_残，存元希声诗 圆首、房元阳诗 圆首、杨齐哲诗 圆首、胡皓诗 苑首、乔备诗 源首；杂·圆_残，题有“《珠英集》第五”一行，存沈佺期诗 苑首、李适诗 猿首、崔湜诗 怨首、刘知几诗 猿首、王无竞诗 苑首、马吉甫诗 猿首。两卷共得诗 缘首，与《全唐诗》相校，可得佚诗 圆首。

其他“唐人选唐诗”卷中较为重要的有孕·圆卷，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中有影印本，其序曰：“诗选残卷，共存者凡六家。前三首撰人名在断损处，不可见，今据《全唐诗》知为李昂。其名存者，曰王昌龄、曰邱为、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适。都计诗数，完者殒篇，残者圆篇。”

第三，唐人名篇佚存

敦煌诗歌中保存的唐人名篇佳作，以韦庄的《秦妇吟》最为著名。该诗的抄本较多（如孕·猿园孕·猿园孕·猿园孕·猿园杂·猿园杂·猿园杂·猿园等），根据题记，写本年代最早的是“天复五年乙丑岁（怨缘）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该写本上距作者诗中述及的时间“中和癸卯”（愿愿）只有圆年，当属最接近原诗而又真实可靠的写本。该本原题“秦妇吟一卷，右补阙韦庄撰”。该诗久已失传，仅《北梦琐言》载其佚句，该书卷六云：“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称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及也。”由于敦煌写本的发现，该诗方得重现于世，并以其深刻的艺术魅力，引起人们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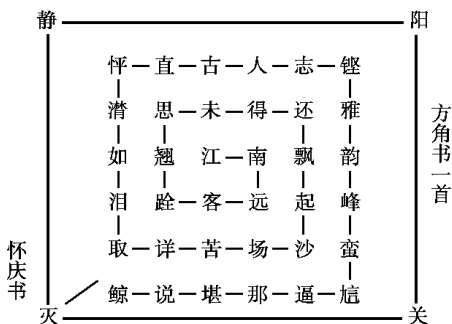
《秦妇吟》长达五百四十二句，是古典诗歌中少有的巨制。诗人亲自经历了黄巢起义的动荡年代，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以高

度概括的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反映了唐末农民起义冲击下唐代社会的真实情况。《秦妇吟》的主要倾向当然是反对农民起义，但它在客观上却表现了起义军的高贵品质和惊天动地的伟大气势，这是诗人始料不及的。诗成之后，不胫而走，远及边塞西陲。

曾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的还有《古贤集》（杂·~~国~~怨 杂·~~远~~怨 孕·~~国~~怨 孕·~~猿~~猿 孕·~~猿~~猿 孕·~~猿~~怨 孕·~~猿~~怨 孕·~~源~~怨 俄藏 ~~国~~怨），该卷虽以集名，实为一首叙述历代先贤事迹的七言长诗，共 苑句。

杂·~~国~~怨《读史编年诗》也是以咏古人事迹为主的诗作，其序曰：“编年者，十三代史间，自初生至百岁，赋其诗以编纪古人百年之迹。其有不尽举一年之事，而复杂以释老者，盖为诗句之所在。七言八句，凡百一十。”由此可知，全诗应为 苑首，然今本尾残，仅存 猿首。分别赞颂窦武、汉成帝、谢安、卫玠、钟繇、陆云、谢庄、诸葛亮等人的事迹，借以激励后人。

此外，敦煌唐人佚诗残卷中还保存有某些特殊的抄本，如杂·~~缘~~源，原题为“方角书一首”，它的抄写方法是由中心向外回还发散，字与字间标以直线，如果由中心依线的标向读去，便是一首五言律诗。原卷见下。



原诗应读作：

江南远客跼，翘思未得还。

飘起沙场苦，详取泪如潸。

怍直古人志，铿雅韵峰蛮。

尙逼那堪说，鲸灭静阳关。

另如，杂 猿猿号卷背载有奇特的诗图 源幅，现照录如下：

昌
樓 望
出
沒 雲
思
遠 客
問
貞 人
足
法 用
寬
地 之
人

(1)

泉
當 路
柴
在 深
忘
記 憶
要
人 尋

(2)

裴
醋 大
呂
秀 才
皂
罪 過
弄
人 子

(3)

曼
不 善
悲
慈 深
全
法 用
會
言 語
崔
夫 子

(4)

这种诗图究竟怎样解读，长期以来不得而知。而孕猿苑号文书却提供了答案，该卷文书有一首诗曰：

日日昌楼望，山山出没云。

田心思远客，问（门）口问贞人。

这首诗就是第一幅诗图的前几句，两相对照，可知诗图写的是离合诗，即一种拆离和拼合字形的诗。诗图中间一行是每句首字，先离之为二，再合之为—。例如“昌”字，先离为“日日”两字，再合为“昌”字，一字三用，据此可将以上诗图解读为：

日日昌（倡）楼望，山山出没云。

田（填）心思远客，门口问贞（征）人。

口之（知）足法用，不见觅之人。

白水泉当路，此木柴在深。
亡心忘记忆，而女要人寻。

非衣裴措大，口口吕秀才。
白匕皂（造）罪过，王^廿弄人子。

且之（知）是不善，非心悲慈深。
人王全法用，人曾会言语。
山佳崔人正。

这些诗图的有些句子不甚可解，给人以勉强生硬、生拼硬添的感觉。如果从另一角度考虑，这些诗图也可以这样解读，即每三字为一句：

昌（倡）楼望，出没云。思远客，问贞（征）人。
足法用，觅之人（原图衍一“地”），

泉当路，柴在深。忘记忆，要人寻。

裴措大，吕秀才。皂（造）罪过，弄人子。
是不善，悲慈深。全法用，会言语，崔人征。^⑩

七、天真质朴的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是指唐五代时流传于西北地区的民间歌辞，曾有“敦煌歌辞”、“敦煌曲”、“俗曲”、“小曲”、“词”等名称。这是配合音乐歌唱的一类作品。它虽然包含的范围较广，但最主

要的还是词，其次才是俚曲小调、佛曲等，故我们通称为曲子词。

词的起源与敦煌曲子词

诗的形式在盛唐以后开始有所突破，这就是曲子词。曲子词也简称为词，它是起源于民间，萌芽于六朝，发展于中唐以后，至五代、宋而蔚为大观的一种新诗体。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解决了我国文学史上长期难以解释清楚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词的起源问题。在敦煌曲子词发现以前，关于词的产生与来龙去脉，人们往往只就《花间集》、《尊前集》等文人词进行分析，并以为《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词选集。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很多曲子词抄卷，其中较为完整的选集有《云谣集》^{〔1〕}，从而使词的起源问题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说明。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此所谓曲子，就是指隋唐时期流行的西域音乐——燕乐（即宴乐）。曲子词主要是用来配合燕乐的，词是这种新兴的曲子词的简称。我们知道，词是用于歌唱的，它和音乐，甚至和舞蹈有密切关系。用于宴会和饮酒作乐的歌舞，古时通称为燕（即宴）乐。隋唐时期，因和西域交往的频繁，大量的西域乐舞传入中原，燕乐就是以这种大量传入的西域胡乐为主体的新乐，其中自然也含着一部分民间音乐的成分。歌唱是音乐的主要成分，就是舞蹈，有时也要边舞边唱。唱就得有唱词，这种唱词就是词。俗语一般把乐调叫曲子，所以唱词也可叫曲子或曲子词。

在中国古典音乐史上，雅乐、清乐、燕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各自划分了一个音乐时代。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这就是说，以先秦的古乐为雅乐，以汉魏六朝的音乐为清乐，隋唐

之际，则以燕乐为乐坛主流。所谓“燕乐”，也就是宴饮时所用之乐。隋文帝时奏七部乐，炀帝时增为九部，即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唐初沿隋旧制，太宗时又加燕乐、高昌乐，删除礼毕乐，从而成为十部乐，并以燕乐为第一部。在十部乐中，燕乐作为一部，乃狭义的燕乐，同时，十部乐的总名又称为燕乐，以区别于传统的雅乐。由此可见，燕乐正是中外音乐融合的产物，并在唐前期已经很成熟了。那么，配合燕乐而唱的词成熟，自然晚于燕乐，亦即晚于唐代前期。从中国音乐史可知，很多词调名称是由玄宗时教坊曲演变而成，就是首先以《竹枝》、《杨柳枝》、《渔歌子》等词调作词的人刘禹锡、白居易、张志和等，也都是中唐人，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词的正式成熟，当在中唐时期。^⑩

敦煌曲子词，虽然并非全是最初的曲词，有些可能还是较多的文人参与写词以后产生的作品，但它们却基本是民间曲词，保存了词的最早形态。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种诗体的兴起，多是萌于民间，然后才为文士所摄取，并渐臻完善、成熟，四言、五言、七言，莫不如此。燕乐之于隋唐，已不限于宫廷及豪门贵族，而是作为流行音乐普及于民间，成了雅乐之外俗乐的总称，民间便以长短句句式的里巷歌谣来配燕乐演唱。敦煌曲子词中的民间制作，便显露出这种初级形态的痕迹。如《菩萨蛮》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石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这首民间词，原始质朴，非常明显地表达出了早期民间词的特点。由此我们说，唐宋词应该来源于民间小调和民间词（它们通过燕乐表现出来），敦煌曲子词式的民间词是唐宋词的最早形态。

敦煌曲子词是由民间兴创的，在早期并没有被一般作家所接受，所以在唐五代作家中很少看到有这类作品。敦煌曲子词大半

随便写在卷子后面或背面，也有写在卷子夹缝部位的，其句法、文意多具有民间爽直而富有感情的特色，可以断定这是民间作家的作品。敦煌本曲子词汇集在一起的只有一部，即《云谣集》（杂 员源首 孕 圆猿首）。这类曲子词大概是配合乐器歌唱的，所以都有一定的曲牌，如《菩萨蛮》、《更漏长》、《破阵子》、《倾杯乐》等。

《云谣集》原题作“《云谣集》杂曲子”，是晚唐时代编选的一本规模较大的词集，早于《花间集》、《尊前集》诸书。《云谣集》有两卷，共存猿园首。朱孝臧据董康手录伦敦本 员愿首，刻入《彊村丛书》；刘复手录巴黎本 员源首，刻入《敦煌掇琐》。龙沐勋合校二本，除去重复者 圆首，适得 猿园首，刻入《彊村遗书》，并作《校记》一卷，王重民据以录入《敦煌曲子词集》。

由于敦煌曲子词在不断地发现、辑佚和整理，因而其数量一时还无法确定。员缘年出版了王重民编的《敦煌曲子词集》，收词 员圆首（再版时增至 员源首），它是敦煌遗书发现后的第一部较为详备的曲子词集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人。该书的出版“一方面给我们拓展了文学的领域，一方面给了我们许多研究文学史的启示和印证”。员缘年，任二北编《敦煌曲校录》出版，收入 缘缘首。员源年，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编选、法国戴密微解说的《敦煌曲》在巴黎出版，收 猿愿首。但辑佚工作并没有结束，员源年周绍良的《补敦煌曲子词》，就是从庄严勘所藏《维摩诘经》背面辑录词 员猿首而来。此外，任二北编《敦煌歌辞总编》，收 员圆余首，已于 员愿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敦煌曲子词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敦煌曲子词绝大多数是流传民间的作品，有的或许经过集体润色，有的也可能曾经文人加工。至于作者，大多数已无法考证，只有少数留下了姓名，如：

温庭筠一首，《更漏长》（孕 猿愿首）

欧阳炯二首，《更漏长》和《菩萨蛮》（孕·猿怨）

唐昭宗（李晔）二首，《菩萨蛮》（杂·圆怨韵）

法照一首，《归来去》（孕·圆怨韵）

圆丰富的内容

敦煌曲子词的内容极其丰富，正如王重民先生所说，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闺情与花柳”^⑩等等。这和当时内容较狭的文人词相较，自然有天壤之别。而具有这些内容的题材，又都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表现了他们的真实感情。在艺术表现上，现实主义精神是其主要特征，如保家爱国之情，赋役的沉重，士子客商的情怀，人民的不满和喜悦等等，无不充满真情实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次，它语言天真质朴，自然浑厚。敦煌曲子词中的大部分都是近于白描的口语，不加修饰，表现了一种真实的自然美。再次，敦煌词也与文人词一样，普遍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如夸张、比喻、衬托、影射、借景写情、借物写人等，都精妙确切，运用自如。另外，敦煌词用韵比较随便，每调字数、句数的多少均无具体的规定，四声格律同样无所谓定格。

以上我们从总的方面谈了敦煌曲子词的有关情况，下面再按内容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描写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中描写普通劳动人民的词很多，许多都不知作者。有描写劳动场面的，如《浪涛沙》一首（孕·猿怨韵 杂·圆怨韵）就是专门描写船工生活的，词文曰：

摇摇五里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轻。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这是一首极好的描写船夫水上作业的敦煌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中关于妇女问题的描写很多，作者勇敢地冲破许多封建文人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为各阶层妇女经受的种种痛苦和不幸遭遇鸣不平。一首首饱含同情，激昂慷慨的曲子词或托物寓意，或触景生情，倾诉着征妇情思、怨妇悲愤和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以及对始终不渝、纯洁无瑕爱情的追求和向往，这些内容都是同时代诗歌里不多见的。

敦煌曲子词中的闺怨题材，绝大多数率直地表达征妇对出征丈夫的思念。他们“相思夜夜到边庭”，毫不掩饰自己“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的感情，如《风归云》曰：

摇摇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起，塞雁南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扬。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奈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

再如：

绿窗独坐，修得为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你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碛里，只凭三尺，勇战单于。

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卿回归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

（《云谣集·风归云》之二）

悲雁随阳，解引秋光，寒蛩响夜夜堪伤。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飘荡，捣衣嘹亮。

懒寄回文先往，战袍待稳，絮重更熏香。殷勤凭驿使追防。愿四塞来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

（《云谣集·洞仙歌》之二）

敦煌曲子词中还有描写最下层的妓女生活，如《忆江南》（孕·猿₅猿₅ 孕·圆₅圆₅）一首：

摇摇莫攀我，攀我太偏心。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这首词出自妓女之手，写出了她们受人践踏蹂躏的悲惨命运，字字似血泪。

第二，歌颂爱国志士的曲子词

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国力渐衰，再加上外族上层统治者的搅扰，我国西北边陲纷纷沦陷。唐德宗建中二年，吐蕃占领河湟一带，统治敦煌达七十年之久。敦煌地区人民在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率领下，奋起反抗，为保卫祖国西部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在曹氏的统治下，又为坚守祖国边疆建立了“殊勋”。因此，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些歌颂反抗外族压迫的爱国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中有关爱国题材的词篇虽然都以忠君、忠于中原王朝为内容，但却融合着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感情，体现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可贵精神。如《菩萨蛮》（孕·猿₅猿₅）一首：

摇摇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

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愿难伸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又如《望江南》（孕·猿·愿）二首：

摇摇曹公德，为国拓西关。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

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

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

新恩降，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

这三首曲子词反映了敦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张、曹二氏忠于大朝的耿耿丹心。《菩萨蛮》词，抒发了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驱逐吐蕃后，决心光复河西及对唐王朝的无限忠诚。“只恨隔蕃部，情愿难伸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的誓言和信念，又是对张议潮一生煊赫武功的生动记录 and 对其忠君爱国思想的充分体现。《望江南》二首，颂扬了曹氏父子心向中原王朝、安定河西的勋业。其中第一首反映了曹氏在河湟地区的雄威和深受人民的拥戴，“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第二首反映了河湟地区民族关系的紧张事态及在这种紧张局势下，曹氏仍对瓜沙诸州实行着有效统治，因而得到了中原王朝的关怀和恩降。词中“新恩降”和“若不远仗天威力”句，直接流露了对中原王朝加封、宣诏的感激与颂扬之情。

还有些曲子词歌颂了边防战士为国忘身和以保家卫国为己任

的爱国思想，如：

摇摇大丈夫汉，为国莫思身。单枪匹马盘阵。尘飞草动便须去，无复进家门。两阵壁，隐隈处，莫潜身。腰间四围十三指，龙泉宝剑靖妖氛。手将来，献明君。

（《补敦煌曲子词集》第愿首）

平夜秋风凜凜高，长城侠客逞雄豪。手执钢刀亮如雪，腰间恒垂可吹毛。

（杂 缘 苑《何满子》）

少年将军佐圣朝，为国扫荡狂妖。弯弓如月射双雕，马蹄到处阵云消。休寰海，罢枪刀，银鸾驾□上超霄。行人南北尽歌谣，莫把尧舜比今朝。

（孕 源 苑《望远行》）

第三，反映民族关系的曲子词

敦煌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又是各民族相互交往的主要场所和聚居地，因而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反映民族关系的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在描述兄弟民族“相向共朝天”的热烈场面时，是那樣的真诚感人，正如一位兄弟民族将领唱道：“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因为他们看到“中华好”，要“学唐化”，才“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并下定决心：“弃毡帐与弓箭，不归边地”，由衷地赞颂“生死大唐好”。这些曲子词虽然有美化封建帝王，遮掩他们实行民族压迫的一面，然而就其主要方面看，却是对各民族相互友好关系的真实反映，如《献忠心》（孕 源 苑）二首：

摇摇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到丹阙，御龙楼。弃毡帐与弓剑，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

见中华好，与舜日同钦。垂衣理，菊花浓。臣遐方无珍宝，愿公千秋住。感皇泽，垂珠泪，献忠心。

募却多少山水，直至如今。涉离山阻，意难任。早晚来到唐国里，朝圣明主。望丹阙，步步泪，满衣襟。

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仙音。各将向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千秋岁，献忠心。

《献忠心》二首，是写少数民族朝觐献忠唐王朝，据此词内容推知可能作于初中唐时代。当时唐王朝为世界上之一大帝国，对边疆民族实行友好政策，唐太宗曾被称为“天可汗”，到武则天时期，对睦邻各族更是和平相处，所以威加海内，臣服四方。“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见中华好，与舜日同钦”，“生死大唐好”，“早晚来到唐国里，朝圣明主”，就是对这一时代历史的真实写照。另外，《献忠心》中有武则天所造新字，据此亦可判断该词的写作时代。

又如杂 远缘范《何满子》曰：

摇摇城旁猎骑各翩翩，侧坐金鞍调马鞭。胡言汉语真难会，听取胡歌甚可怜。

再如杂 圆园范《赞普子》曰：

摇摇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夏日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为抛沙塞，无因拜玉

楼。

第四，分时联章体曲子词

在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些以时间为顺序的联章体曲子词。它们是以五更、十二时辰、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的形式，来分时歌唱的。

《五更转》是以夜间五个更火为时间单位，分别作成的一首首互相关联的歌词，它基本上由五章组成，每章是一首，也可以是几首。

《五更转》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以反映太子入山修道成佛事和唐代佛教各宗（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的写本为多。也有征妇怀念出征丈夫的，还有悲叹未读书、不识字之苦的，如《叹五更》：

摇摇一更初，自恨长养枉生躯，耶娘小来不教授，如今争识文与书。

二更深，孝经一卷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

三更半，到处被他笔头算，纵然身达得官职，公事文书争处断。

四更长，昼夜常如面向墙，男儿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经读一行。

五更晓，作人已来都未了，东西南北被驱使，恰如盲人不见道。

这是一首悲叹未读书、不识字之苦的《五更转》。未能读书识字者的悲苦心情流露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十二时》是以我国古老的十二地支的记时方法，将一天分

成 员 时段而分别作成 员 章歌辞的民间曲词。其内容与《五更转》极为相似，以佛教劝善歌为多，也有写工农劳苦、持家俭约、儿女亲情等世俗性的，如《发愤》：

摇摇平旦寅，少年勤学莫辞贫，君不见朱未得贵，犹自行歌背负薪。

日出卯，人生在世须死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食时辰，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足珍。

隅中巳，专心发愤寻诗史，每忆贤人羊角哀，求学山中并粮死。

日南午，读书不得辞辛苦，如今圣主召贤才，去耳中华长用武。

日昃未，暂时贫贱何羞耻，昔时相如未遇时，悽惶卖卜于廛市。

晡时申，悬头刺股是苏秦，贫病即令妻嫂弃，衣锦还乡争拜秦。

日入酉，金罍多泻蒲桃酒，劝君莫弃失途人，结交承己须朋友。

黄昏戌，琴书独坐茅庵室，天子不将印信迎，誓隐山林终不出。

人定亥，君子虽贫礼尚在，松柏纵然经岁寒，一片贞心常不改。

夜半子，莫言屈滞长如此，鸿鸟只思羽翼齐，点翅飞腾千万里。

鸡鸣丑，莫昔黄金结朋友，蓬蒿岂得久荣华，飘飘万里随风走。

此曲子词还有上文，上文有诗曰：“自从塞北起烟尘，礼乐诗书总不存。不见父兮子不子，不见君兮臣不臣。暮闻战鼓雷天动，晓看带甲似鱼鳞。只是偷生时暂过，谁知久后不成身！愿得再逢尧舜日，胜朝偃武却修文。勤学不辞贫与贱，发愤长歌十二时辰。”所以取“发愤”二字为之题。

《十二月》是按照十二个月的顺序连续歌唱的联章体裁，每月一首；有增加闰月一首的，便有十三首。这种按月咏唱的联章体歌辞由来已久，比《五更转》、《十二时》歌辞要早。

敦煌所出《十二月》歌辞大都散佚了，保存完整者很少。只有一篇拟题为《边使戎衣》的，是描写征妇对出征丈夫的怀念之作，残缺较少，现移录如下：

《十二月（边使戎衣）》（孕·猿·圆）

摇摇正月孟春春渐暄，一别狂夫经数年。□□□□□□□，
遣妾寻常独自眠。

二月仲春春盛暄，深闺独坐绿窗前。□□□□□□□，
教儿夫婿远防边。

三月季春春极暄，花开处处竞争鲜。花□□□□□□笑，
贱妾看花双泪流。

四月孟夏夏初热，为忆狂夫难可彻。□□□□□□□秦箏，
更取瑶琴对明月。

五月仲夏夏盛热，狂夫归否问时节。庭□□□□□□□，
□见莺啼声更咽。

六月季夏夏共同，妾心恨如对秋风。□□□□□□□改，
教儿憔悴只缘公。

七月孟秋秋渐凉，教儿独寝守空房。君在寻常嫌夜短，
君无恒觉夜能长。

八月仲秋秋已凉，寒雁南飞数万行。贱妾忧存旧日意，君何无幸不还乡。

九月季秋秋欲末，狂夫一去独难活。愿营方便觅归□，使妾愁心暂时豁。

十月孟冬冬渐寒，为君捣练不辞难。莫怪裁衣不开领，愁君肌瘦恐嫌宽。

十一月仲冬冬雪寒，戎衣造得数般般。见今专访巡边使，寄向君边着后看。

十二月季冬冬已极，寒衣欲送愁情逼。莫怪裁缝针脚粗，为忆啼多竟无力。

这是一首唐代的《十二月》歌辞。初、盛唐 开元 多年中，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征夫远戍边地，长期不得归返，闺中征妇怀念征人，苦闷哀怨由衷而起。这首《十二月》辞与敦煌曲子词中其他描写征妇怨的词，如《风归云·征夫数载》等所表达的感情是一样的。

《百岁篇》是把人的一生按百岁计算，以 开元 年为单位加以歌咏的民间曲词。从其内容和分题看，主要有缙门、丈夫、女人三类作品。《缙门百岁篇》是写出家人虔心事佛的，是借用《百岁篇》曲调而写的佛曲；《丈夫百岁篇》是写男人经历的；《女人百岁篇》是写女人一生的。不论何种《百岁篇》，都是用 开元 章歌辞咏唱的，如《丈夫百岁篇》（孕 猿 猿 杂 猿 猿）：

摇摇一十香风绽藕花，弟兄如玉父娘夸。平明趁伴争毬子，直到黄昏不忆家。

二十容颜似玉珪，出门骑马乱东西。终日不解忧衣食，锦帛看如脚下泥。

三十堂堂六艺全，纵非亲友亦相怜。紫藤花下倾杯处，

醉引笙歌美少年。

四十看看欲下坡，近来朋友半消磨。无人解到思量处，只道春光没有多。

五十强谋几事成，一身何足料前程。红颜已向愁中改，白发那堪镜里生。

六十驱驱未肯休，几时应得暂优游。儿孙稍似堪分付，不用闲忧且自愁。

七十三更眼不交，只忧闲事未能抛。无端老去令人笑，衰病相牵似拔茅。

八十谁能料此身，忘前失后少精神。门前借问非时鬼，梦里相逢是故人。

九十残年实可悲，欲将言语泪先垂。三魂六魄今何在，霹雳头边耳不知。

百岁归原起不来，暮风扫雪石松哀。人生不作非虚计，万古空留一土堆。

《十恩德》是把父母养育之恩分成 10 个阶段来歌唱的一种民间曲词，由 10 章组成。这是那个时期比较流行的劝孝歌辞。敦煌写本《十恩德》歌辞，其内容都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歌颂，如杂 源 愿等抄本中的《十恩德》：

第一怀躬守护恩

摇摇说着起不舒，慈亲身重力全无，起坐要人扶。如伴病，喘息粗，红颜渐觉焦枯。报恩十月莫相辜，佛且劝门徒。

第二临产□爱恩

摇摇今日说向君，苦哉母肠似刀分，禁扇不忍闻。如刀割，血成盆，性命只恐难存。劝君问取释迦尊，慈母报无门。

第三生子忘忧恩

摇摇说者鼻头酸，阿娘肚肠似刀剐，寸寸断肠肝。闻音乐，无心欢，任他罗绮千般。乞求母子面相看，只愿早平安。

第四咽苦吐甘恩

摇摇今日各须知，可怜父母自家饥，贪喂一孤儿。为男女，母饥羸，纵食酒肉不肥。大须孝顺寄将归，甘旨莫教亏。

第五乳饷养育恩

摇摇抬举近三年，血成白乳与儿餐，犹恐怕饥寒。闻啼哭，坐不安，肠肚计难翻。任他笙歌百万般，偷奏岂须看。

第六回干就湿恩

摇摇干处与儿眠，不嫌污秽与腥羶，慈母卧湿毡。专须缚，怕磨研，不离孤儿体边。记之父母苦忧怜，恩德过于天。

第七洗濯不净恩

摇摇除母更教谁，三冬十月洗孤儿，十指被风吹。慈乌乌，绕林飞，衔食报母未归。枝头大有百般飞，不孝应也虚。

第八造作恶业恩

摇摇为男女作姻，杀个猪羊屈闲人，须肉会诸亲。倚早保，下精神，阿娘不为己身。由他造业自难陈，为男为女受沉沦。

第九远行忆念恩

摇摇此事实难宣，既为父母宿因缘，肠肚悉均牵。放儿去，任征边，阿娘魂魄于先。儿身未出到门前，母意过山关。

第十怨憎怜悯恩

摇摇流泪数千行，爱别离苦断心肠，忆念似寻常。十恩德，说一场，人闻争不悲伤。善男善女审思量，莫教辜负阿耶娘。

以上所说《五更转》、《十二时》、《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等分时联章体曲子词，显然是一种民间流行的曲辞，

与至今尚流行于民间之“叹五更”、“绣金匾”、“四季相思”之类的民歌颇相似。其共同的特点是：以曲见胜，通俗易记，比喻生动，而思想感情却往往低沉。

敦煌曲子词的研究

众所周知，1908年夏月，伯希和曾在北京将所携部分敦煌文献展示给中国学者观览。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蒋斧、董康、王仁俊等才接触到敦煌文献。是年秋季，罗振玉立即就伯希和所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写了一份提要——《鸣沙山石室秘录》，刊入《国粹学报》。同时，又与其他同志一道影印拍照敦煌文献十余种，编为《敦煌石室遗书》一书，由董康的诵芬室刊行，从而揭开了我国学者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序幕。但遗憾的是，最早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这批清末民初学者，由于受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学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敦煌曲子词给予应有的重视。

1908年夏月，北京部分学者及官员在六国饭店宴请伯希和。就在这次招待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希望伯希和回国后，将敦煌文献“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伯希和随即表示：“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下之公器，其希望摄影誊写者，自可照办”。伯希和回法国后，即寄给罗振玉一些敦煌文献的照片，其中就有《云谣集杂曲子》，这是敦煌本《云谣集》在国内的首次亮相。但罗氏只将其中的典籍、类书、地志、图经、阴阳书、星占书等几类写本加以整理，以《鸣沙石室佚书》为名于1908年印行。对于其中的《云谣集杂曲子》却未予关注。

最早对敦煌曲子词予以关注、介绍和辑录的，当推王国维。1914年，王国维在《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①②}中云：“上虞罗氏藏唐写本春秋后语，有背记凡八条。……未有词三阙，前二阙

不著调名，观其句法，知为《望江南》，后一阙则《菩萨蛮》也”。这是国内首次对敦煌曲子词的介绍，遗憾的是王氏未能将这三首曲子词辑录发表。直到 1904 年，王国维才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⑪3}一文中，刊布和介绍了敦煌本《春秋后语》卷背所抄《望江南》（文中误题为《西江月》）圆首、《菩萨蛮》员首及《云谣集杂曲子》中的《凤归云》圆首、《天仙子》员首，共 3 首敦煌曲子词。同时，王国维在文中还说：“伦敦博物馆藏唐人书写（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这是敦煌本《云谣集》的名称第一次见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上，也是对《云谣集》辑录研究的开端。

1906 年冬，伯希和又从巴黎给罗振玉寄来敦煌写本《云谣集》残卷，有 1 首作品，罗氏即将此收入他正编印的《敦煌零拾》之中。同期，董康在英国伦敦旅游时，得录杂·P.2565 号《云谣集》，此卷题曰“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但此写本也是一残卷，仅存 1 首。朱祖谋得到董康抄本后，即与罗振玉《敦煌零拾》中的巴黎本相互参校，于 1908 年刻入《彊村丛书》之中。随后，刘半农（复）于 1913 年将其游学巴黎时抄录的敦煌文献汇刻为《敦煌掇琐》，其中就有孕·P.2565 号《云谣集》残卷和其他一些敦煌曲子词。刘半农所录的孕·P.2565 号卷子亦题曰“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但该残卷仅存 1 首。朱祖谋便取刘半农抄本以校董康所抄斯坦因劫卷，除开头《凤归云》圆首重出外，其余 1 首皆为杂·P.2565 号所阙，二本相合，正符“共 30 首”之数。至此，《云谣集》全帙才得以确定，朱祖谋遂嘱龙沐勋和杨铁夫二人参校写定，准备补刻入《彊村丛书》。但由于时逢淞沪战火，而朱氏也旋即去世。到了 1924 年，龙沐勋辑《彊村遗书》，才将敦煌本《云谣集》的两个残卷合校刻为了一本，《云谣集》全本才得以面世。

前已述及，罗振玉在整理刊布敦煌文献之初，将主要精力集

中在经、史、子、集上，但不可否认，他对敦煌曲子词的整理刊布也倾注了一定的心血。如他于 1910 年编印的《敦煌零拾》，就是一部较早记录敦煌文学的资料专辑，除收录伯希和寄赠的《云谣集》残卷 1 首外，还辑录了“小曲三种”，即《渔歌子》、《长相思》和《雀踏枝》；“俚曲三种”，即《叹五更》、《天下传孝十二时》和《禅门十二时》。此外还有“佛曲三种”等。

1915 年，王重民编成《敦煌曲子词集》，由于此间（1915—1917 年）王重民正寓居美国，国内又值战争时期，故该书直到 1927 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收词 110 首（1935 年修订再版时增加至 120 首），它是敦煌文献发现后的第一部较为详备的曲子词集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人。据《敦煌曲子词集·叙录》称，该书“辑自敦煌所出残卷，凡伯希和劫走者十七卷，斯坦因劫走者十一卷，上虞罗氏藏三卷，日人藏影片一卷，都三十有二卷”。其上卷所收皆为长短句曲子词，凡 11 首（内 1 首残）；中卷所收为《云谣集杂曲子》，凡 1 首；下卷所收为大曲，凡 1 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搜罗到如此多的原卷，已是相当难得的了。该书的出版，“一方面给我们拓展了文学的领域，一方面给了我们许多研究文学史的启示和印证”。

1935 年，任二北编《敦煌曲校录》出版，共收词 120 首。该书将所收作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称“普通杂曲”，收录 120 调 120 首，又失调名 1 首，共 121 首；第二类为“定格联章”，收录 120 调 120 首，又失调名 1 首，共 121 首；第三类为“大曲”，收录 120 调 120 首，又失调名 1 首，共 121 首。该书所收作品的数量，比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要多 10 首，“较之王集，体类既全，篇幅遂广”。在作品的分类方面，该书不仅明确分出“杂曲”与“大曲”两种体式，而且在杂曲中又分出“普通杂曲”与“定格联章”两种体式，这是对敦煌曲体式研究的一大贡献。但就其作品的性质来看，正如作者在《敦煌曲初探》中以“敦

“敦煌曲”为概念，并以“考订唐代‘音乐文艺’之目的”相一致，《敦煌曲校录》所收作品也以“敦煌曲”为名，作者还在当时及后来的一系列论著中阐释，所谓“敦煌曲”乃兼指敦煌所发现的各种音乐文学品种，而并不仅限于“曲子词”一体。任二北先生甚至反对用“曲子词”或“词”的概念来指称这些作品，而学术界对《校录》所收作品性质的认识也存在分歧，甚至否认其中有些作品属于“曲”的性质。但不论分歧如何，都不可否认《敦煌曲初探》及《敦煌曲校录》的出版是敦煌曲子词整理刊布的重要成果，具有非常珍贵的文献参考价值。

1954年，香港的饶宗颐 and 法国的戴密微二位学者合著的《敦煌曲》一书，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出版。该书中文部分由饶宗颐撰写的《引论：敦煌曲与敦煌词之起源》和《本编》两部分组成，其中《引论》为理论探讨，《本编》为作品校录。《引论》部分除“弁言”、“结语”外，共有三篇：上篇为“敦煌曲之探究”，中篇论“词与佛曲之关系”，下篇考“词之异名及长短句之成立”。后面还附有“词与乐府关系之演变表”及“敦煌曲系年”。《本编》由四部分组成，即甲、新增曲子资料；乙、《云谣集杂曲子》及其他英法所藏杂曲卷子；丙、新获之佛曲及歌辞；丁、联章佛曲集目。后面附有“敦煌曲韵谱”、“索引”及“敦煌曲图版”等资料。在《敦煌曲》一书中，饶宗颐共校录敦煌曲辞 175 首，戴密微则选取其中的 17 首译成法文，这是敦煌曲子词整理研究中由中外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力作，在敦煌学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国的国门还未打开，国内学者几乎看不到本书，再加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的敦煌学研究几乎中断，也无人能够对此进行介绍，因此国内学者知者寥寥无几，在国内产生影响是以后的事了。^{⑪④}

但不可否认，《敦煌曲》的作者不仅大量接触了英法等国所

藏敦煌原卷，并将翻拍的许多珍贵影片制成图版予以附录，这在当时几乎没有图版本，缩微胶卷也不普及的历史背景下，更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饶宗颐先生皆用中文手写体抄录，随文校注，也十分有利于保存敦煌写卷原貌。圆多年后的员怨年，饶宗颐先生在《敦煌曲续论》^⑮一书“小引”中还记其事曰：“《敦煌曲》于员怨年，由法京科学中心印行，为中、法文本，余撰写导论，戴密微教授加以法译。其书限于体例，当时用力者有二事，一为增补新获曲子，一为校订任氏《校录》擅改之处，俾复原状”。

另外，《敦煌曲》一书也与任二北先生的《敦煌曲校录》一样，使用“敦煌曲”这一概念，虽然《敦煌曲·引论》对“敦煌曲”与“词”的关系、联系进行了阐述，但其“本编”所校录的作品却并不限于“曲子词”一体，也未对所录作品的性质进行辨明考订，因此，《敦煌曲·本编》所录实际上就是一部“敦煌歌辞”选集。

从员怨年开始，任半塘（二北）在《敦煌曲校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开始着手编集《敦煌歌辞总编》，至员愿年完稿，员愿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它是二十世纪搜罗最为广博而带有集大成意义的一部“敦煌歌辞”总集。全书共由苑卷组成，卷员为“杂曲·云谣集杂曲子”，订为猿猿首；卷圆为“杂曲·只曲”，收录作品员苑首；卷猿为“杂曲·普通联章”，收录作品远组猿怨首；卷源为“杂曲·重句联章”，收录作品员怨组员猿首；卷缘为“杂曲·定格联章”，收录作品猿套猿猿首；卷远为“杂曲·长篇定格联章”，收录作品员套员源首；卷苑为“大曲”，收录作品缘套圆首；最后为“补遗”，补录作品圆首。全书共收录作品约员猿首，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分类也更为科学。就该书所收作品的性质而论，虽然不完全是“曲子词”一体，而且其中有些作品是否属于“歌辞”也还存在

争议，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曲子词”作品，是敦煌曲子词整理刊布的集大成著作，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敦煌歌辞总编》收辞约 1500 首，并有详细的校记和解说，是目前这方面搜罗最广、用力最勤的巨著。任先生称此书“合歌辞与理论为一编”，“坚决肃清‘宋帽唐头’之‘唐词’意义，而尊重历史，用‘唐曲子’及‘唐大曲’两种名义代之”。因此，《敦煌歌辞总编》也是词曲理论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但不可否认，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该书所收辞作，在校勘方面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项楚先生在阅读本书过程中，便将发现的问题“随手记在书眉上。后来疑问渐多，便想到像《敦煌歌辞总编》这样重要的巨著，钻研者一定不少，假如把我的浅见贡献出来，供研读《总编》的学者参考，或许不无毫末之助。因此便将写在书眉上的点滴心得，整理成一篇较长的文章，投寄给一家刊物。现在又把这篇文章补充整理成一本小书。”^{①⑥}这就是 1982 年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敦煌歌辞总编匡补》，该书从卷二开始，对《敦煌歌辞总编》所收的 1500 首歌辞进行了比较详实的匡补。对有疑问歌辞，先写出原句，下面并注明在《总编》中的顺序号，然后以校释、楚按两种方式进行匡补，引用了许多资料，不仅有助于研读《敦煌歌辞总编》，而且对整个敦煌歌辞的整理、校注、研究亦具有重要价值。为什么《匡补》从卷二开始呢？这是因为卷一所收为《云谣集》，已经多人研讨，问题也已基本解决，故项楚先生对此再没有着墨。

而关于敦煌曲子词的定义，李正宇先生又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敦煌曲子”是一种融文学、音乐和舞蹈为一体的综合性文艺品种，它由词、曲、舞三大要素合成，通过演出，供人观听，是一种表演艺术。词，就是“敦煌曲子”的歌词，今人泛称为“敦煌曲子词”或“敦煌歌辞”。曲，就是“敦煌曲子”

的声腔。记录这些声腔的文献，今人泛称为“敦煌曲谱”。舞，就是“敦煌曲子”的舞容。记录这些及其节律拍段的文献，今人泛称为“敦煌舞谱”。敦煌曲子的这三个成分，各各发挥其特有的作用：词以抒其意，曲以咏其声，舞以形其容。三者又结合在一起，互为补充，互为烘托，发挥感人心志，悦人耳听，娱人目观的整体作用。

这种综合性的“曲子”，唐五代时期曾在我国各地广泛流行，并非敦煌所仅有者。但是由于其他地区留下来的资料残缺散乱，隐晦不明，后人从中难以获得完整的信息并形成立体的认识，因而“曲子”这种综合艺术形式在后世学者脑海里似存非存，模糊朦胧。另一方面，由于“曲子”的三个构成部分之一的“词”，传世资料独多，其后更独立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体裁，于是进一步模糊了“曲子”的完整概念。实际上，“敦煌曲子”由于具有不拘场地、道具简单、易于表演等特点，它流行的范围更广，也更普及。上自宫廷，下至民间，举凡国家庆典、节日游乐，乃至私人筵宴都可随时表演，因而它的教化和娱乐作用也必然更为广泛。^⑪

另外，台湾学者林牧仪的《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⑫共校录敦煌曲子词 员远首。全书共三编：上编为《云谣集杂曲子》，凡猿园首；中编为“普通杂曲子”，收 员远首；下编为“新增及残缺曲子”，收 圆远首。关于该书的收录范围，区分标准，作者在“前言”中说：“综观学者整理敦煌曲辞，其方式要有二端：一则从简，只校《云谣集》三十首；二则求全，单只曲子、定格联章及大曲并收，内容方面亦普通曲辞、佛曲兼采……是故本书欲兼取二者之长：取材方面，仅以‘曲子词’为限，而尽量求全，除《云谣集》外，凡合于传统所谓‘词’之性质者，悉为博取兼收，而于定格联章、大曲、佛曲等，则一概不采”。由此可知，《敦煌曲子词斟证初编》所收作品仅限于曲子词一体。另

外，该书还附有“诸本辑校曲子词对照表”、“词牌及原卷号码对照表”、“斯卷伯卷所录曲子词表”以及大量原卷图版，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

此外，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①⑨}沈英民《敦煌云谣集新校订》、^{①②①}周绍良《补敦煌曲子词》^{①②②}也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

八、科学技术的珍宝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科技史资料，如数学方面有算术、算经；物理学方面有力学、计量学；化学方面有冶炼、炼丹术；天文学方面有历史、星图、天文图；造纸与印刷术的资料也极为珍贵。此外，还有医学、建筑、纺织、酿酒、熬糖以及矿业开发与利用、兵器、手工业等技术史方面的材料。它们对我国科技史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学术海洋中的一颗颗珍宝，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下面仅就天文学与印刷术两项略加介绍。

丰富的天文学资料

天文学资料包括历日与星图两个方面。敦煌遗书中的历日写卷已知有 100 余件，且均比《会天历》为早，最早的为北魏历日，最晚的为北宋历日。

吐蕃占领以前，敦煌一直使用唐王朝的历书；吐蕃占领敦煌后，象征王权的中原历书也无法颁行到那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既不符合汉人用干支纪年、月、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敦煌地区便出现了当地自编的历书。张议潮收复沙州后，由于敦煌地区自编历书已成习惯，民间仍继续使用自编历书，并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

敦煌历日大部分为敦煌地区自编，只有三件例外。一件是唐中和二年（~~唐~~）“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它是由成都流落到敦煌的私撰历日，只残存三行文字。另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魏~~）和十二年历。这件历书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年代最久的一件，也是现知惟一的北魏历书实物。第三件是《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唐~~）印本历日》，此历存二月廿日至年末（中有残缺），是现存敦煌历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

敦煌地区自编的历日有~~多~~件，现知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唐~~）戊子岁具注历日》，是一个只存源月~~至~~远月~~至~~员的断片，最晚者为孕·~~魏~~《宋淳化四年（~~宋~~）癸巳岁历日》。此外还有孕·~~魏~~《唐元和四年己丑岁（~~唐~~）具注历日》、孕·~~魏~~《唐光启四年戊申岁（~~唐~~）具注历日》、孕·~~魏~~《唐景福元年壬子岁（~~唐~~）具注历日》、杂·~~魏~~《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唐~~）具注历日》、孕·~~魏~~《后周显德六年己未岁（~~宋~~）具注历日并序》、孕·~~魏~~《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宋~~）具注历日并序》、孕·~~魏~~《宋端拱二年己丑岁（~~宋~~）具注历日》等。

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历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别；闰月也不一致，比中原历或早或晚一二月。但纪年干支却同中原历十分一致，表明中国由来已久的干支纪岁法并未因地方自编历日而中断。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来自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国历法是从敦煌历开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历日中都有特定的术语，如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汉（星期二）、滴（星期三）、温没斯（星期四）、那颉（星期五）、鸡缓（星期六）。一般来说，敦煌历要在正月一日注上星期几，如孕·~~魏~~《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在正月一日顶端注“那颉日受岁”，意即这天是星期五，以后只在星期日那天注一“蜜”字。个别历日只在当年正月初一注上星期几，以下不注而由此推算。至于

这些名称究竟来自哪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所注的星期日除偶有抄误外，基本正确无误。

敦煌历日在我国历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代历书如何演进发展，以前因实物太少而很难了解其发展轨迹。我国原有古历日，除西陲简牘载有少许汉代历谱外，以宋理宗宝祐四年（1254）的《会天历》为最古，清代学者钱大昕孜孜访求数十年才得到，被学界视为秘宝。敦煌历日的发现，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天文学知识的探讨。吐鲁番出土的《唐显庆三年具注历日》和《唐仪凤四年具注历日》，虽然其内容比较丰富，但也只是同敦煌发现的简本历日大体相仿。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的繁本历日，其内容更为丰富，基本上奠定了宋至清代历日的格局。敦煌历日所存的繁、简两种形制，恰好反映了古历由简到繁的演进过程。

在敦煌文献中，还有两幅精美的古代星图，一幅是《全天星图》，现藏英国图书馆；另一幅是《紫微垣星图》，现藏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画在敦博图048号《唐人写地志》残卷的背面。其中《全天星图》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525颗星），也是最古老的一幅星图，早就引起了中外科技史专家的重视。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教授首先研究了这幅星图，认为在所有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星图中，这是最古老的一种，并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天文部分中选用了两幅局部黑白照片。《全天星图》卷首已残，无标题，内容为气象杂占，星图居于卷中，卷末题“其解梦及电经一卷”，其旁绘一执弓射箭的“电神”。中国学者通过对这幅星图及整个写本绘画、书法、电神服饰和文字中的避讳等进行考察研究，推断该星图的抄绘年代在公元754—755年间。^⑫

《全天星图》从12月月开始画起，根据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分成12段，利用类似麦卡托（1569—1631）

年)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在欧洲,麦卡托投影是由荷兰数学家兼地理学家雷梅尔(麦卡托即雷梅尔的拉丁语名字)首创的。他在1607年刊印了第一幅“麦卡托投影”航海图。敦煌唐代星图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天文学家使用圆筒投影的时间要比麦卡托早七八百年。可见敦煌星图在画法上是相当进步的,即使现在星图的画法仍然采用这种方法,所不同的只是把南极附近的星再画在一张星图上。

我们称这幅星图为《全天星图》，是因为它囊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当时看不到的南极及其附近恒星自然不在其中，这是它同现代《全天星图》的不同之处。

《紫微垣星图》原件高 猿厘米，残长 圆缘厘米。向达教授在敦煌从事考古发掘时从民间发现，这卷文书的正面为《唐人写地志》残卷，背面有《占云气书》一卷，残存的《观云章》和《占气章》有彩绘的云气图形，图的下面附有作为说明的占辞，卷末有图无文，在《占云气书》的前面有一幅紫微宫图，即《紫微垣星图》。据向达教授研究，《唐人写地志》残卷撰于天宝初年（八世纪中叶），但抄写年代可能要晚些。背面星图和《占云气书》的抄写年代比正面还要晚，字体近于五代（十世纪）写本。

《紫微垣星图》也是彩绘，画在两个同心圆上。在紫微垣近间阖门处，标注“紫微宫”三字；垣的东西两侧分别注“东蕃”和“西蕃”，意即“蕃卫”；内圆（即紫微垣）画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垣的前后面都没有缺口作为垣门。图中的星点用红、黑两种不同颜色，外圆直径四厘米。根据其中传舍、八谷和文昌等星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为北纬34°左右，相当于西安、洛阳等地。

除此之外，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天文学资料，如孕·图卷是

一卷重要的天文著作，残存内容包括四部分：即星占的残余部分；《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玄像诗》；日月旁气占。孕·猿·怨卷内也有一《玄像诗》。所谓《玄像诗》，就是以韵文诗歌的形式来介绍全天星官，这样便于背诵记忆。它反映了古人记忆星官的一个重要阶段，使我们得以明白古代这类作品的演进和发展过程。

雕版印刷术的实证

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中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东传朝鲜、日本，南传越南等国，向西则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入埃及和欧洲各国，并进而传遍全世界，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没有实物为证，再加上年代久远，史籍记载缺乏，对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代，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些印本书。在这些宝贵文献中，雕版印刷产生的过程，从原始传拓本到整版开雕的印本都有留存，其中有些还附有纪年题记，这就为我国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和演变，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例证资料。从文献记载及敦煌所出拓本、印本书卷来看，雕版印刷起源于捶拓，而刻石及石经的出现导致了捶拓方法的兴起和演变。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三种初唐和中唐时期的捶拓本，即伯希和编号孕·猿·怨唐太宗书刘琨《温泉赋》，孕·猿·怨唐欧阳询书《化

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孕失号元和会昌间柳公权书《金刚经》。这些捶拓本的问世，使我们看到了原始拓本的情况，为研究雕版印刷的产生提供了实物证据。

捶拓方法的广泛使用，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敦煌遗书中的雕版印刷品及文字记载，为研究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及原委，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唐咸通九年（~~原卷~~）《金刚经》

原卷为斯坦因劫去，翟理斯目录编为 ~~原卷~~ 号，斯坦因原编为 ~~孕·四四~~ 号，《斯坦因劫经录》中未曾著录。此卷首尾完整，由七张纸粘接而成，每张长 ~~苑四四~~ 厘米，阔 ~~猿四~~ 厘米，全长约 ~~缘四~~ 厘米。卷首有一幅释迦牟尼说法图，其余是《金刚经》全文。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年月题记一行，这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这件印刷品的时代，早于被认为是欧洲最早印刷品的 ~~员四~~ 年德国《圣克利斯道夫》木板画像约 ~~缘四~~ 多年，因而被誉为“世界印刷史和版画艺术的冠冕”。此卷不仅年代早，而且已是一卷完整而又正规的书籍。王玠可说是现知最早的自己出资印书人。

（二）曹元忠舍资雕造的印刷品

公元 ~~怨源~~—~~怨源~~ 年，曹氏政权在曹元忠执政时期达到了鼎盛。曹元忠及其夫人浚阳翟氏十分佞佛，除在莫高、榆林诸石窟中大规模开窟造像外，还舍资雕版印刷佛像、佛经。敦煌遗书中就发现了一些曹氏舍资雕造的印刷品，如：

（~~员~~）观音像：翟理斯编号为 ~~原卷~~，孕·~~缘四~~ 内有缘份。图为观音立莲台上，右手提净瓶，左臂上曲作说法印，周身有飘带飞扬。右榜题“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左榜题：“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题记为“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版，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

凶渠顺化，痼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祐”。“于是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匠人雷延美”。

(圆) 毗沙门像：翟理斯编号为愿_四，孕_源源内有愿份。孕_猿怨号残存下半部（题记全）。其图左榜题“大圣毗沙门天王”。题记为“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祐。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

以上的观音像和毗沙门像，都是曹元忠等发愿出资，由雷延美雕造的。开运四年七月十五日为公元怨_源年愿月源日。

(猿) 木刻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巴黎本孕_源孕_源和伦敦本翟理斯编愿_四源号均为此经。其题记为“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雕版押衙雷延美”。此经刻印时间为公元怨_源年远月源日。

由以上曹元忠舍资雕造的印刷品实例，可以得知以下重要情况：雷延美是现知最早存姓名于印刷品实物中的刻印工匠；“雕版”、“匠人”、“雕版押衙”、“印版”、“雕此印版”、“请匠人雕此印版”等雕版印刷专门术语和有关词句，在印刷品实物中均为首见；曹元忠在短期内大量印造经像，并在衙署内开办木刻印刷工场。这个工场是现在已知的世界上第一家印刷工场。它对促进当时敦煌地区印刷业的发展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 《大随求陀罗尼》

此卷子极为著名，现存二本：伦敦藏本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有著录。巴黎藏本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之“戊录”七页有题记。此件上图下文，右上榜题“施主李知顺”，左上榜

题“王文沼雕刻”。题记最后为“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版毕手记”。此“手记”时间明确，即公元984年愿月愿日。王文沼是继雷延美之后，在敦煌汉文遗书中留下名字的第二位刻字工匠。“雕刻”、“雕版毕手记”也是印刷史上的宝贵记录。

（四）木刻印本历日

敦煌汉文遗书中所发现的木刻印本历日有两件，一件为“丁酉年具注历日”，翟理斯编号为愿四四号。此丁酉，翟理斯定为愿元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可信。上有墨笔题记：“四月廿六日都头守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为答报魏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

另一件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翟理斯编号为愿四四号。上有“中和二年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的明确题记，即公元892年。此卷虽然只残存三行，但刻印时间、地点、刻印书籍铺的题名俱全，是非常珍贵的印刷史资料。

（五）木刻印本韵书

现存木刻印本韵书主要有孕·愿四四号孕·愿四四号孕·愿四四号孕·愿四四号《大唐刊谬补阙切韵》。据周祖谟先生《唐五代韵书集存》著录分析，这四号印本并非一版，而是包括六种不同的刻版。

（六）文字记录“京中李家印”

敦煌遗书孕·愿四四号正面为“阴阳书”写本残卷，其尾题有“咸通二年岁次辛巳十二月二十五日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范景询二人写记”。背面为“新集备急灸经一卷”，书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咸通二年为公元861年。

孕·愿四四号《崔氏夫人要女文》（杂·愿四四号同文抄本首题《崔氏夫人训女文》）抄本，尾题“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背题有“辛巳”、“壬午”、“癸未”记年，“辛巳”最早亦为公元861年。

从以上有关雕版印刷术的实物和文字资料中，可以窥见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代和原委。尤其是《金刚经》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日期的印刷品，其正文前有一幅题为《祇树给孤独园》的图，画着释迦牟尼在祇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与正文接成一长卷。从画面看，这幅佛说法图特别精细，人像衣褶简劲，面容逼真。释迦佛之慈祥，须菩提之古老苍劲，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图画之后为《金刚经》本文，经文每行约 25 字，字体古朴纯简，多存真趣。

《金刚经》的正文和图画都雕刻得浑朴凝重，精美异常，墨色浓厚匀称，清晰显明。这一切都表明是印刷术发明已久，技术已臻熟练，绝不是印刷术发明初期的作品。如果没有一二百年的发展过程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的，从而为研究我国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实物依据。

最近，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邓文宽先生通过对俄藏 DX 国图 4 号写卷的研究，将我国发现的有确切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品的年代提前了 100 年。

俄藏 DX 国图 4 号写卷的图版刊布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 5 册上。刊布时仅题为“具注历”，未标明确切年代。

原件是一块雕印历日的小残片，上、下、前、后均已残损，考定起来特别困难。邓文宽先生的考证程序大致如下：（员）凭借右上角“天德乾”等四个“月神方位日期”注记，获知其下面的十八至二十九日具注历日属于五月；（圆）凭借左下角“除、满、平、定”四个“建除十二神”与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确认残历一至九日属于六月，从而推知上栏中间“大”字及其上面的半个残字的完整内容是“六月大”。由于知道了六月大、朔日庚辰，五月二十九天是个小月，从而推出五、六、七共三个月

的月朔；（獠）凭借残历左上角的“白”、“赤”二字，推知此历六月九宫图为“六白中宫”，进而推出本历正月九宫图为“二黑中宫”，从而找出其纪年地支为孟年（巳、亥、寅、申），缩小了残历的年限范围；（源）以五至七月的朔日同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巳、亥、寅、申年对照，在从公元 841—846 年的可能范围内，发现与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 834 年）完全一致；（缘）残历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三日有两次“蜜”日（星期日）注，此二日合西历公元 834 年的 苑月 缘日和 苑月 缘日，查《日曜表》，全是星期日，从而可将残历的绝对年代加以确定，即公元 834 年。^⑫

但是，要完全确定印刷术的发明年代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印刷术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方法，而是由印章、捶拓等逐渐演变而来的，很难说出中间的截然界限。另外，印刷术是由人民大众逐渐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它最初只流行于人民群众中间，随后为佛教徒所采用，最后才为统治阶级政府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因此，要确指一个具体的年、月、日是不可能的。

虽然很难确指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但从敦煌遗书《金刚经》等实物来看，印刷术至迟产生在《金刚经》雕刻之前二百年左右，即唐代初期。到了唐代后期，版刻已相当发达并逐渐普及。

九、有待发掘的医学宝库

——敦煌医学概述

摇摇敦煌石窟中有许多医学方面的内容，尤其在敦煌遗书中，有许多珍贵的医药文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整理，可以丰富祖国医学的内容，填补一些领域的空白。有些甚至可以古为今用，在现代医学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隋唐本草学的新发现

“本草学”为古代的药物学，其学由来已久。现知最早的本草书为《神农本草经》，它名为古代神农氏所作，疑为汉晋间张机、华佗辈所为，计收药~~猿象~~种，以应周天之数。梁陶弘景复增汉魏以来名医所用药~~猿象~~种，并为之注，名曰《本草集注》。

《神农本草经》三卷，《本草集注》七卷，宋代以后均成亡佚之册。敦煌遗书发现之前，唐本草已属罕见，更不要说六朝本草了。

据目前研究可知，敦煌遗书中有远种古本草残卷，重要的有三种，即梁陶弘景《本草集注》、唐李勣、苏敬《新修本草》、唐孟诜《食疗本草》。

敦煌本《本草集注》，原卷被橘瑞超于~~贞观~~原年从敦煌劫往日本。此卷前佚数行，后均完好。卷后题“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书题后又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题记，可知其为开元写本。

《本草集注》为梁以前本草学总集，有“本草正典”之称，至初唐仍然是“名医继轨，更相祖述，罕能厘正。”敦煌残卷为其首卷，前为弘景序文，后为诸病主药，序中述及他“祖世以来，务敦方药”，“不限贵贱，皆摩踵救之”。同时，又吸收了劳动人民的医药知识，“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术，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他根据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有名无实七类，对产地、采集、炮制、煎服法、真伪鉴别等均有详细论述，如采药时间：“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者，……春宁宜早，秋宁宜晚，其华、实、茎、叶乃各随其成熟耳”；炮制及煎服法方面，凡丸散药“先切细暴燥乃捣之，有各捣者，有合捣者……其湿润药，如天门冬、干地黄辈，皆先切曝独捣令扁碎，……若

逢阴雨，亦以微火烘之，即燥，小停冷乃捣之”，其论至今仍在沿用。他还指出部分药物的解毒法及服药食忌例，如“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这一宝贵经验，至今仍用于临床。

《食疗本草》残卷被斯坦因劫往英国，编号为杂·四四四《新唐书·艺文志》有“孟诜《食疗本草》三卷”的记载。《证类本草》载：“《食疗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又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旧二百二十七条，凡三卷”。原书久佚，《证类本草》中存有其文，《本草纲目》引其药类种，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食品疗法专著。敦煌本《食疗本草》前残后缺，王国维、唐兰等据《证类本草》校考为《食疗本草》残卷。残卷共载药类种，每药都载有主治、配方、服法，后面还附有食忌、采集时月、炮制方法等，其中不少论述至今仍在临床使用。同时，该残卷对唐代外国药物的传入也有部分反映，如“石蜜，寒，右心腹胀热，口干渴，波斯者良”。

《新修本草》残卷被伯希和、斯坦因劫往法、英两国，编号为孕·猿四四和杂·源猿源《新修本草》是唐显庆四年（远元年）由国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药典，它收药类种，是李勣、苏敬等人在《神农本草集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比欧洲最早的纽伦堡药典（员缘年）将近早九百年。该书由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组成，这种图文对照的写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该书两《唐书》有著录，但中土久佚，日本尚存十余卷（卷三至五、卷十二至十五、卷十七至二十），清代傅云龙已将其模刻收入他的《纂喜庐丛书》中。敦煌本《新修本草》，据王重民先生考证为卷十、卷十七和十九两个残段，其中卷十残卷存药物猿种，可补日本传本所缺。此卷朱墨杂书，背有“乾封二年（远年）”字样，说明该书距颁发仅八年时间。

另外，孕·猿四四号《无名本草》残卷，也是很重要的本草学

著作，已有学者对其进行探讨。

丰富的医经

据目前所知，敦煌遗书中的医经残卷有十余种，主要有《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断及《五脏论》、《新集备急灸经》等。

敦煌所出《内经》残卷，主要见于孕·~~魏~~范和孕·~~魏~~范孕·~~魏~~范残卷的内容，散见于《素问·三部九候论》、《素问·脉要精微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之《伤寒例》、《辨脉法》；《脉经》卷一之《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卷二之《平三关病候并治宜第三》等。现存的《黄帝内经素问》是唐宝应元年（~~苑~~）由王冰编次注释的，敦煌所出《内经》残卷却有武周新字，可知其书写年代当在武则天时期，即在王冰编次之前，因此，可利用敦煌遗书校勘王本，以正其缺讹。

敦煌所出《伤寒论》残卷，主要见于杂·~~魏~~范和杂·~~魏~~范杂·~~魏~~范的内容与《伤寒论》辨脉法篇大致相同。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汉代问世以来，历经兵火战乱而散佚。晋代王叔和曾对其进行编次整理，宋朝林亿等人经过整理，分编为《伤寒论》、《金匱要略方论》、《金匱玉函经》三书。金人成无己首次为《伤寒论》系统作注，成《注解伤寒论》一书。但宋本已散佚，现存的则是明清刻本。据有的学者研究，敦煌本《伤寒论》是宋代整理编次前的《伤寒论》写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伤寒论》原卷抄写本，与传世本《伤寒论》相异者约~~苑~~余处。它的某些内容是今本所缺，或较今本为优，可用来校勘今本《金匱玉函经》、《伤寒论》及《注解伤寒论》。

敦煌所出《脉经》残卷，主要见于孕·~~魏~~范孕·~~魏~~范和杂·~~魏~~范孕·~~魏~~范残卷共~~魏~~行，每行~~魏~~—~~魏~~字不等，该卷的

部分内容亦见于《素问》、《灵枢》、《难经》、《脉经》中。写卷不但对我们研究中医的脉学理论很有启发和帮助，而且其中谈到的一些诊法、医方，都是宝贵的文献资料，对于医史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孕·猿苑写本卷首有“《玄感脉经》一卷”题记，内容由三部分组成，首论三部九候脉法、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平脉早晏法；次为《脉类形状》，内容与《脉经》卷一之“持脉轻重法第六”、“平脉视人大小长短男女逆顺法第五”及“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等相似；最后为《阴阳逆乘伏》，仅存一行。杂·缘五原中的“《平脉略例》一卷”，有类《脉经》卷一之“持脉轻重法第六”、“平脉早晏法第二”、“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第四”、“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阴阳逆顺第七”等篇的内容。此外还有论寸、关、尺三部脉象及主病的条文。

敦煌所出《五脏论》残卷，为斯坦因劫往英国，编号为杂·缘五原，卷首有书题“《五脏论》一卷，张仲景撰”。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五脏与五官五体、人与自然相应、药性歌赋及鉴定炮制要点，为一本学医的基础读物。

残卷墨笔抄写，共愿袁行，约员源园余字。文中提及的东晋和南北朝一些医家及其著述，如葛洪、陶弘景、徐之才等，均是张仲景之后的人，但未提及孙思邈和《千金方》。据此推测，残卷可能是隋或初唐时的著作，托名张仲景以自重之。

敦煌写本《五脏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五脏论》写本，它汇集了隋唐以前医药学界的一些精萃，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国内外民间的一些医药经验。它以脏象为中心，并论及整体观念、病因病理、脏腑辨证、药物鉴定、常见病症的药疗等，是我国珍贵的中医药学文献。

敦煌所出《新集备急灸经》残卷，被斯坦因劫往伦敦，编号为杂·圆五缘。其卷首有“《新集备急灸经》一卷，京中李家于东市印”，卷末有“咸通二年……写记”题记，可知此乃唐人写

本。我国的针灸著作，以前所见最早的是宋、元以后的刻本，敦煌写本是现能见到最早的原本针灸著作。它前有小序，说明本书系汇集诸家灸经，为偏远州县及交通不便之村坊草野疗治疾病参考。中为人体正面明堂图的上半身，并标注穴位名称，主治及施灸壮数等说明文字，很有实用价值。

杂·远志也为一灸经残卷，它画有人体明堂图，并标明穴位名称、主治及灸法，但无书题及著者。

《敦煌古藏医灸法》残卷，据学者考证为八世纪中期的著作，比汉文《新集备急灸经》早近一个世纪，是现存最早的灸方专书。此外，敦煌遗书中还有一部古藏医临床手册——《藏医杂疗方》，其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对诊断、药物炮制、病因病理、疗法等均有叙述。

珍贵的医方

敦煌遗书中的医方残卷，据目前所知约数十种，其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的治疗。有的医方对药物的组成、炮制、服法和禁忌等都有详细的叙述，如孕·圆缘和孕·圆元是唐人医方残卷，此两个残卷字体相同，据罗振玉考证原为一卷，后断裂为二，内有武周新字，知为唐武则天时写本。此卷中治《孩子两三岁至五六岁患赤白脓血热痢黄连散方》就很详细：“黄连十二分，乌梅肉八分，阿胶七分，犀角末七分，黄柏八分，茜根六分，黄芩六分，龙骨八分。右捣筛为散，两三岁已（以）米饮服半钱许，二（日）再服，稍稍加至一钱；四五岁已（以）上量大小以意加服之，二（日）并再服，忌食猪鱼生冷油脂蒜面等”。

敦煌医方最珍贵的价值是它在现代医学中仍能发挥其作用。如孕·圆缘残卷背面有《染须及发方法》医方，其中有“天宝七载正月十三日”题记，可知为唐朝写本。这个医方约一百

多字，对药物和医染方法均有明确记述，说明用针砂、矾石、没石子等炮制的药方，可以染白须、白发为黑色，其中有用“玉门矾石一钱”，“夜间欲卧时，即取黄矾汁轻刷须发”之语。药方中提到了四种医染过程，程序也较复杂。医方最后写道，经染治后头发“得三载大黑效”，即染治后三年的头发都是黑的。这个将白发染黑和催生黑发的中医医方，说明早在唐代，我国就已经能医治白发病了。

这个古老的医方科学吗？据用现代医学手段对其药理分析证明，该药方中有一种中药，具有明显的可使头发黑色素细胞活性增强的效用，同时，所用药的含铅量比现在普通使用的化学染剂低得多，因此，已有医疗工作者将此配方用于临床。

除了现成的医方外，医学研究工作者还利用敦煌遗书中的医药文献，重新组合配方，其中“萎胃灵 员号”就是由甘肃中医学院王道坤先生根据敦煌遗书医方配制而成的药剂。“萎胃灵 员号”有益气通络、和胃生新的功效，经两年多对 源园多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观察治疗，有效率较高。

经过临床实践和多次的观察治疗，敦煌卷子中的医方配剂对黄疸、痢疾、胃痛腹痛等数种急重症和慢性疑难症都有很好的疗效。目前，医学工作者已能运用敦煌医方治疗肝炎、痢疾、慢性胃炎、急性胃肠炎、急性胰腺炎等多种疾病。

近年来，敦煌医学的研究更趋于深入，如赵健雄教授以其专著《敦煌医粹》和 员猿篇论文，于 员怨怨年 源月在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获世界传统医药突出贡献国际奖。该成果新发掘出一批 员园世纪前的传统医学文献，同时还反映了 愿世纪前藏医及汉藏、中印医药交流的一些情况。此外，在临床采用敦煌残医方治疗疾病的敦煌气功摄生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疗效，并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参阅王永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载《文史知识》~~1985~~缘年第~~12~~远期。

②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③《旧唐书》卷~~138~~源《食货志》。

④《唐六典》卷~~13~~猿“县令之职”条。

⑤参阅王永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载《文史知识》~~1985~~缘年第~~12~~远期。

⑥详见刘进宝《常何与隋末唐初政治》，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源期。

⑦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⑧柴剑虹《读敦煌写卷 黄仕强传 札记》，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⑨参阅陈国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1~~员期。

⑩详见姜伯勤《突地考》，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1~~员期。

⑪参阅袁德领《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书简介》，载《敦煌研究》~~1985~~年~~1~~员期。

⑫参阅方广钊《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载《文史知识》~~1985~~年~~10~~园期。

⑬参阅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0~~园期。

⑭参阅方广钊《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载《文史知识》~~1985~~年~~10~~园期。

⑮参阅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0~~园期。

⑯《资治通鉴》卷~~185~~源隋炀帝大业六年。

⑰参阅谭蝉雪《敦煌道经题记综述》，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袁辑《敦煌道教文献专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

⑱参阅姜亮夫《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1~~员期。

①⑨参阅刘屹《敦煌十卷本 老子化胡经 残卷新探》，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圆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②⑩参阅万毅《敦煌道教文献 本际经 录文及解说》，载《道家文化研究》第 员辑《敦煌道教文献专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员愿年出版。

③⑪七种景教文献的录文及详论，参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④⑫参阅（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 员愿年版。

⑤⑬参阅陈增辉《敦煌景教文献 志玄安乐经 考释》，见《员愿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

⑥⑭载《九州学刊》源卷 源期，敦煌学专期（员愿年 源月）。

⑦⑮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猿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⑧⑯敦煌发现的三种摩尼教经典录文及详论，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 员愿年版。

⑨⑰《国学季刊》第 员卷第 圆号。

⑩⑱载《文史》圆辑，中华书局 员愿出版。

⑪⑲《通典》卷 源《职官二十二》。

⑫⑳《摩尼教及其东渐》员员页。

⑬㉑中华书局 员愿年出版。

⑭㉒甘肃人民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⑮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⑯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员愿年出版。

⑰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⑱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员愿年出版。

⑲㉗录文见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 猿—猿页。

⑳㉘录文见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猿辑，第 员—员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徭状初探》，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第 源—源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员愿年出版。

③⑨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 5 卷第 1 期，汉译本见杨联陞《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第 1 辑。

④⑩《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汉译本第 1 卷第 1 页。

④⑪载《文物》1983 年 1 期，又见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④⑫载台湾《民主潮》第 1 卷第 1 期，又见同氏《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年 1 月出版。

④⑬参阅林聪明《谈敦煌学研究上的一些障碍问题》，载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1983 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俵状初探》，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83 年出版。

④⑭参阅谢重光《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载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第 1 卷第 1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④⑮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册第 1 卷第 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④⑯见《大正藏》第 1 卷第 1 页。

④⑰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见《大正藏》第 1 卷第 1 页。

④⑱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见《大正藏》第 1 卷第 1 页。

④⑲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见《大正藏》第 1 卷第 1 页。

④⑳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册第 1 卷第 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④㉑本件文书的定名及录文，见邓文宽先生《敦煌文献 河西都僧统悟真处分常住榜 管窥》，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④㉒参阅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第 1 卷第 1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出版。

④㉓· 1983 年《河西都僧统悟真处分常住榜》。

④㉔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册第 1 卷第 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④㉕〔元〕德辉重编《敕修百丈清规》卷 远《大众章·病僧念诵》，见

《大正藏》第 182 册，第 157 页。

⑤6 《百丈清规证义记》卷 缘“估唱”，见《续藏经》第 182 册第 157 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年出版。

⑤7 《禅苑清规》卷 苑《亡僧》，见藏经书院版《续藏经》第 182 册第 157 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年出版。

⑤8 《百丈清规证义记》卷 缘“估唱”。

⑤9 《敕修百丈清规》卷 苑“板帐式”。

⑥0 参阅张弓《唐五代的僧侣地主及僧尼私财的传承方式》，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5 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⑥1 参阅荣新江《关于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的几个问题》，载《敦煌研究》1982 年 1 期；郑炳林《读敦煌文书 S·1732 后唐清泰三年六月沙州係司教授福集等状 札记》，载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其中郑炳林文将本件文书的卷号 S·1732 误为 S·1731。

⑥2 参阅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载《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⑥3 参阅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册，第 151—152 页；谭蝉雪《敦煌岁时掇琐》，载《九州学刊》缘卷 1 期（1982 年 1 月）。

⑥4 参阅张弓《中古盂兰盆节的民族化衍变》，载《历史研究》1985 年 1 期；谭蝉雪《敦煌岁时掇琐》，载《九州学刊》缘卷 1 期（1982 年 1 月）。

⑥5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係状初探》，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82 年出版。

⑥6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载《敦煌学辑刊》1985 年 1 期合刊。

⑥7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57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出版。

⑥8 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157 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年出版。

⑥9 参阅白文固《南北朝隋唐僧官制度探究》，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 1 期，又见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32—198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⑦①参阅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第 员源—员缘页，青海人民出版社 员圆园年出版。

⑦②见唐耕耦《敦煌研究拾遗补缺二则》，载《敦煌研究》员圆年 源期。

⑦③参阅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载《敦煌学辑刊》员圆年 员 圆期合刊。

⑦④参阅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一）——兼论 僚司》，载《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 员圆年 出版。

⑦⑤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僚状初 探》，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员圆年 出版。

⑦⑥《敕修百丈清规》卷 苑“板帐式”。

⑦⑦见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 猿卷《敦煌吐鲁番社 会经济资料（下）》，日本法藏馆 员圆年版。

⑦⑧载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猿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圆年版。

⑦⑨载《敦煌研究》员圆年 猿期。

⑦⑩图版、录文见〔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 员卷，日本 法藏馆 员圆年版。

⑦⑪〔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 猿，中华书局 员圆 年出版。下同。

⑦⑫《唐六典》卷 猿

⑦⑬〔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 员《职官一·总序》，中 华书局 员圆年出版。下同。

⑦⑭参阅向群《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官文书“行判”的几个问题》， 载《敦煌研究》员圆年 猿期。

⑦⑮图版、录文见〔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 员卷，日本 法藏馆 员圆年出版。

⑦⑯参阅向群《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官文书“行判”的几个问题》， 载《敦煌研究》员圆年 猿期。

⑦⑰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怨册第 缘—苑页，文物出版社 员圆年出

版。

⑧7 《唐六典》卷 猿园

⑧8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猿园页，中华书局 员怨怨年出版。

⑧9 《唐六典》卷 猿园

⑨0 陈垣《史讳举例》员愿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员怨怨年出版。

⑨1 参阅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载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猿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怨怨年出版。

⑨2 《唐律疏议笺解》猿远—猿苑页，中华书局 员怨怨年出版。

⑨3 《小说月报》圆卷 猿期。

⑨4 员怨圆年 员月朴社出版。

⑨5 商务印书馆 员怨愿年 愿月出版。

⑨6 白化文《变文与俗讲》，载《文史知识》员怨愿年 愿期。

⑨7 姜伯勤《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的唱导法匠》，见姜伯勤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 猿卷—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员怨怨年出版。

⑨8 参阅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变文》（张鸿勋先生执笔），甘肃人民出版社 员怨怨年出版。

⑨9 白化文《什么是变文》，见《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怨年出版。

⑩0 《史记》卷 远《伍子胥列传》。

⑩1 参阅张锡厚《论敦煌变文从宗教到文学的转变》，载《文学评论丛刊》第 员辑。

⑩2 参阅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载《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 员怨怨年出版。

⑩3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 远章《变文》，商务印书馆 员怨愿年出版。

⑩4 张锡厚《敦煌诗歌考论》，载《敦煌学辑刊》员怨怨年 圆期。

⑩5 参阅项楚《敦煌诗歌导论》绪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员怨怨出版。

⑩6 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圆卷）认为这是属于金山国时期的，请读者参阅。

⑩7 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员苑—员愿页，新文丰出版公司 员怨怨年出版。

⑩8 参阅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圆页，新文丰出版公司 员怨怨年出版。

⑩参阅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圆蒙一圆原~~页；李正宇《敦煌出土的四首特型诗及其破解》，载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员苑~~年出版。

⑪参阅张晶《关于词的起源》，载《文史知识》~~员苑~~年 愿期。

⑫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商务印书馆 ~~员缘~~年出版。

⑬《观堂集林》卷 ~~圆~~

⑭《东方杂志》第 ~~员苑~~卷 愿号。

⑮参阅刘尊明《敦煌曲子词整理研究的百年历程》，载《文献》~~员怨~~年 员期。

⑯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员怨~~年出版。

⑰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自序（林聪明主编“敦煌丛刊二集”之三）。

⑱参阅李正宇《论敦煌曲子》，载中国唐代学会主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出版社 ~~员怨~~年出版。

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员怨~~年。

⑳台北石门图书公司 ~~员苑~~年。

㉑台北正中书局 ~~员苑~~年。

㉒载《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员怨~~年出版。

㉓马世长《敦煌星图的年代》，载《~~员怨~~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 ~~员苑~~年出版。

㉔参阅苏雅《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唐大和八年甲寅岁（~~愿~~）具注历日》，载《中国文物报》~~圆~~年 圆月 圆日。

【主要参考资料】

邓文宽先生《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载《文史知识》~~员怨~~年 愿期。

王进玉先生《敦煌石窟中的古代科技成就》，载《科学》~~员怨~~年 源期。

舒学先生《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怨~~年版。

第五章

敦煌学研究遍天下

——敦煌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概况

敦煌学产生九十多年来，已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发展，并由此兴起了一股敦煌热，如研究热、展览热、教学热、应用热、著述热等等。于是，美国有了“敦煌广播公司”，日本有了以敦煌图案制作和服的公司，香港则有了由五家敦煌酒楼组成的敦煌集团。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敦煌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敦煌学成了世界上惟一以地名学命名的国际显学，敦煌莫高窟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①。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敦煌学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初步发展

敦煌学的产生，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了。九十年来，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回顾九十年的历程，可将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从 1909 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敦煌学的产生、创业及其初步发展阶段；八十年代后则是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②。下面先就第一阶段的情况加以探讨。

从史的角度考察敦煌学之产生

我们把 1900 年定为中国敦煌学的起点，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敦煌。事实上，早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学者就已注意到千佛洞，并作了记载。

敦煌虽地处祖国西陲，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早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例如：清代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灏，就写过《游千佛洞》等诗，对敦煌艺术推崇备至：“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颠”。这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事，比藏经洞的发现要早一百多年。嘉庆年间，著名西北史地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并对敦煌的历史和碑刻进行了研究和记录。在其《西域水道记》中，收录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还论及了莫高窟的创建历史，一向为人们所重视。道光年间，许乃谷任敦煌县令时（1841—1843），也曾至莫高窟巡礼，写了《千佛岩歌并序》，描述了莫高窟当时的景况，并叙述了莫高窟的碑石和有关历史。

1900 年藏经洞被发现后，1905 年，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通过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了藏经洞发现的一些文物。他在《语石》卷一《吐蕃一则》中说：“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余年前，土壁倾圮，豁然开朗，始显于世。中藏碑版经象甚夥。”汪宗瀚“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③他还在其《缘督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情况，并曾建议将藏经洞发现的全部遗书运至兰州保管。

1906 年秋，法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曾在北京给罗振玉、蒋伯斧、王国维等人看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并送给罗振玉

一些敦煌遗书照片，罗据此编成《敦煌石室遗书》一书，并撰写《鸣沙山石室秘录》，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刊布和大规模研究与介绍的开始。正是在罗振玉等人的大力奔走呼吁下，清政府学部才于 1909 年将劫余遗书 1000 余卷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

1909 年，陈垣先生依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 1000 余卷，编成《敦煌劫余录》一书，这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遗书的目录书。陈寅恪先生 1918 年为其作序曰：此书乃“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并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使用了敦煌学这一名词。1924 年，向达先生修订《唐代俗讲考》^④时，也沿用了这一名词，说“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由此可知，当时学术界所谓之敦煌学，仅仅是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而言，并不包含其他。

四十年代初，在政界、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进言、奔走呼吁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而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和大规模研究。1942 年出版的史岩先生《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此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文集》前言中明确指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两个方面。

随着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敦煌学理论和敦煌史地在敦煌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已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而使敦煌学的体系更加完备，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的学科了。

圆媛草创阶段（~~员圆媛~~—~~员圆媛~~年）

~~员圆媛~~年愿—怨月，罗振玉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紧接着，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蒋伯斧的《沙州文录》等相继出版。我国敦煌学研究史的第一页，就这样在~~员圆媛~~年揭开了。

敦煌学的帷幕拉开以后，我国学者整理刊布的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书籍和学术论文便接踵而至。主要有：罗振玉的《鸣沙石室遗书》及《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罗福苣的《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李翊灼的《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韦庄的秦妇吟》；刘师培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序跋。

在这一阶段中，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方法是考证文献本身，其形式是为某一文献作跋或提要。文献的来源主要是伯希和盗劫的敦煌卷子，也有少数斯坦因劫卷。刊布和研究的主要是四部书，尤其是经部和子部。

这一阶段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草创时期，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卷子本身，还未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评述，更未涉及敦煌石窟艺术。虽然如此，仍然是敦煌学研究史上一个很有成绩的阶段，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王仁俊、董康、李翊灼、陈垣等第一代敦煌学家，为开创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猿媛艰苦创业（~~员圆媛~~—~~员圆媛~~年）

~~员圆媛~~—~~员圆媛~~年，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在遗书研究方面，由于刘复、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学者相继去巴黎或伦敦转录和拍摄敦煌文献，从而得到了一大批敦煌资料。再加上北京图书馆所藏遗

书的利用，遂编辑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专集，如刘复《敦煌掇琐》、陈垣《敦煌劫余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金祖同《流沙遗珍》、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序录》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掇琐》和《敦煌劫余录》。《敦煌掇琐》共收敦煌文献 150 余种，是刘复在巴黎图书馆根据原卷抄录的，其“上集是文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史的材料”。《敦煌劫余录》汇集了北京图书馆藏 150 余种卷的有关情况，详记每卷的起讫、纸数、行数和品次，在附记内还移录有题记和卷子的残缺情况。王重民先生曾评价说：“这样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⑤。

这一阶段的敦煌遗书研究，由于使用了较多的资料，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很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在归义军史研究方面，有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等文；又如唐代民间文学的研究，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著都设专章或专节论述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民间文学作品，包括歌辞、白话诗、变文、话本、赋、词文等。向达的《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论唐代佛曲》、《唐代俗讲考》，对唐代民间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孙楷第的《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和《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是有关唐代变文研究的两篇重要文章^⑥。

本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敦煌艺术的研究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1925 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一文，是国内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该文不但对敦煌艺术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而且还将伯希和《敦煌图录》六集 160 个洞窟的壁画，简明扼要地加以介绍，使国人对千佛洞的内容和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日本敦煌学者神田喜一郎在《敦煌学五十年》

中说：“~~1945~~年贺昌群在《东方杂志》第~~四十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极为通俗的论文《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敦煌艺术）这才成为注目的课题”。

四十年代初，向达、阎文儒、谢稚柳、何正璜等到敦煌考察，他们不仅勘查了大部分洞窟，而且还抄录过碑文题记，对洞窟壁画的内容、建窟年代进行了考证。何正璜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就是最早的一份内容总录。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出版于五十年代），记录了~~源~~缘个洞窟的形制、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内容。其他如卫聚贤《敦煌石室》、史岩《敦煌千佛洞概述》、《敦煌石室画像题识》等，都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重要著作。

在美术界，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都先后到敦煌石窟临摹壁画，并撰文介绍敦煌石窟艺术。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两批：一批是王子云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美术工作者，他们临摹的壁画，曾在重庆沙坪坝举行过展览。第二批就是张大千。~~1945~~年，张大千率领子、侄、夫人等来到敦煌，为了系统、科学地了解 and 整理敦煌文物，他清理了~~猿~~怨个洞窟，按从南到北的顺序给洞窟编了号。还花费大量时间对莫高窟中许多有价值的壁画进行了临摹复原。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艺术，他曾将其临摹的壁画在成都、重庆、上海举行过展览，并撰文介绍，出版了《敦煌临摹白描画》三集，对敦煌艺术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

~~195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所长常书鸿又从内地征聘了一批自愿到敦煌的美术工作者，如史岩、李浴、董希文、苏莹辉、段文杰、孙儒侗、史苇湘、李承仙、霍熙亮等。他们继张大千之后，开展了临摹工作。~~1956~~年~~12~~月，在南京举办了敦煌艺展，展出了他们的临摹品数百种，并发表了一些有关敦煌艺术的研究文章，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与普及做出了极大贡

献^⑦。

本阶段的另一特点是重视敦煌学宏观研究。陈寅恪先生首先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此外，还有傅芸子的《敦煌学三十年》、傅振伦的《敦煌艺术论略》、常书鸿的《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姜亮夫的《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价值》等，都是从宏观上探讨敦煌学的文章。

源援初步发展（~~1949—1959~~年）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关心敦煌文化及其研究。~~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将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受中央文化部直接领导，使石窟得到了妥善保护。~~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国家拨出巨款作为修复和保护敦煌文物之用。~~1951~~年，又通过国际交流，得到了伦敦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1952~~年，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3~~年，国家又拨出巨款，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维修和加固，使之面貌焕然一新。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保护以及敦煌文学研究，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代表了国际最高研究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学者向达、梁思成、周一良、阎文儒、宿白、常任侠、史岩、李浴、段文杰、史苇湘、阴法鲁等，对敦煌艺术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他们或对敦煌史地进行了考察，或对莫高窟进行了详细探讨，或编著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学术著作。如阎文儒的《敦煌史地杂考》、《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宿白的《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向达的《敦煌艺术概论》，周一良的《敦煌壁画与佛经》，王逊的《敦煌壁画和宗教艺术反映现实生活问题》，金维诺的《敦煌佛本生图的内容和形式》、《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段文杰的《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

点体会》，阴法鲁的《从敦煌壁画谈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潘絮兹的《敦煌莫高窟艺术》等。

在本阶段的敦煌艺术研究中，临摹工作占很大的比重。壁画的临摹，决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一项艰巨的艺术劳动。临摹的过程也就是研究过程，临摹一幅壁画或一身彩塑，必须做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能表现原作的精神和艺术水平。本阶段共临摹了近千平方米的壁画，~~猿~~多身彩塑，其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先后在印度、缅甸、捷克、波兰、日本等国和北京、上海、兰州等地举行了大小 ~~四~~余次展览，对宣扬祖国古代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学习民族艺术遗产，推陈出新，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研究、临摹的同时，还出版了《敦煌画库》、《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等画册，对敦煌艺术的宣传、普及起了积极的作用^⑧。

在遗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资料专集和研究专著，如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员缘~~）、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员缘~~）、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员缘~~）、《敦煌曲校录》（~~员缘~~）、姜亮夫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员缘~~）、王重民等的《敦煌变文集》（~~员缘~~）、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员缘~~）、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员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敦煌资料》（~~员缘~~）、王重民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员缘~~）等。

《敦煌曲子词集》是我国第一部专科性文献集，它将同类作品辑录在一起，加以校注，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方便。但该书只收词 ~~员~~首，很不完备。任二北沿用这一体例，又编校了《敦煌曲校录》，收词 ~~缘~~首，分为普通杂曲、定格联章和大曲三类。

~~员缘~~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发起，向达主持，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参加，在广泛摄、抄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变文资料的基

基础上，过录了 15 个写本，作了认真的整理，选编 28 种，编成了《敦煌变文集》一书，于 1957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变文集》是当时我国学者对变文写卷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整理成果，也是收集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变文总集，对推动我国变文及民间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现在看来，它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敦煌资料》第一辑是一部综合性的敦煌文献集。它辑录了社会经济方面的许多原卷录文，并采用了通行的价格低廉的排印本，因此它流通的范围比较广，为大部分敦煌文献研究者所喜爱，更成了敦煌经济文书和唐代经济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对推动我国敦煌文献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编辑时间短促，在录文的准确性以及文献的时间、性质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以《敦煌变文集》为根据，对变文中的难词加以考证和疏解的。该书对敦煌语言文学、汉语方言俗语以及汉语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我国开展敦煌文献研究以来，我们自己编著的较完全、较准确、较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它收录了北京、巴黎、伦敦及其他一些公私收藏的敦煌卷子目录，详记了每个卷子的标题、编号，在很多标题下，还记录了卷子的内容提要，有些还描述了卷子本身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从而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是此前六十年我国敦煌文献研究工作中成绩的反映和经验教训的总结。王重民先生为此书写的后记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重要文章。当然，该书仍有一些缺点和不足，如对少数文献的性质以及标题的确定不大准确，甚至出现错误等等。

除以上专著外，这一阶段还发表了大量研究敦煌遗书的论文，研究的方面与前一阶段大致相同，在归义军史、唐代民间文

学、唐地志、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综观“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在许多方面，如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等，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科学考察结硕果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我国大批的珍贵文物被外国“探险家”、“考察家”窃去，造成了我国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而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某些领域落后了。这种落后的状况，是由于人民的觉醒，以及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团结奋斗，尤其是两次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才改变的。

员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其成就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一些形形色色的外国考察家，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频繁出现在我国西北地区。他们把我国的许多珍贵文物和学术资料，无条件的捆载而去，而在艺术宝库和文化遗址中留下来的却是斑斑伤痕和残毁弃余。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员圆年组建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情况却比较特殊，斯文·赫定的主观意图和其他考察家基本一致，但客观效果却相差极大。因此，对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有关情况加以探讨，当是很有意义的。

（员）考察团的组建

提到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要谈到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员缘—员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就立志于探险。员年 月 日，即在他 岁时，瑞典探险家诺登瑟德乘坐“威加”号船探险归来，回到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全城张灯结彩，欢迎这位探险英雄的归来。斯文·赫定说：“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在南岸高处望见全城的景况，使我受了重大刺激，我终身都要记着那一天，我一生的事业便从此决定了。城中各处都满了春雷一般的欢呼。我心中想到：‘将来我也要这样回来’。”^⑨从此他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旅行家去从事探险活动。因此，他大量阅读有关北极探险的图书，甚至画出了他所知道的各探险队的路线图，并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等待着探险机会的到来。

1889年，斯文·赫定 16 岁时从中学毕业了。他说：“我将离校的时候，校长问我愿否到里海沿岸的巴库去担任半年的教职，教一个程度很低的小孩。他父亲是诺贝尔兄弟所雇的总工程师。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想不知等到何时，才有人来供给我赴北极去探险，现在既有机会到亚洲游历，也是不可轻易错过的，我便受了命运的驱使，前往亚洲”^⑩。

1890 年年底斯文·赫定返家后，先后进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斯德哥尔摩高等学校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地理等专业。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当时正在柏林大学任教，斯文·赫定受业于他，这对其以后专门从事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1891 年瑞典政府派往伊朗、土耳其的使臣需要一位兼通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翻译官，斯文·赫定由于其卓越的才能而被选中。在出使任务已经完成，即将回国之前，他给瑞典国王打电报，要求允许他从波斯起程东行，到亚洲内地进行游历和探险活动。瑞典国王鄂斯加很快表示赞成，并提供了赫定需要的全部费用。从此，斯文·赫定就踏上探险之路。

斯文·赫定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探险和游历共有 16 次，足迹遍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内蒙等地，特别是他多次深入我国新疆、西藏等人迹罕至的沙漠、荒原地带，他的许多著作，对研究我国新疆、西藏等地的地理、考古、历史等学科方面

的问题，是十分宝贵的资料^⑪。

下面仅就他 1906 年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有关情况加以介绍。

1906 年 8 月 10 日，德国列维佐夫（德皇威廉二世助理官）、弗洛尔曼（德国空军卸任军官）在斯德哥尔摩拜访了斯文·赫定，他们代表当时世界著名飞机设计师容克邀请斯文·赫定访问德国。赫定应邀前往与容克相见，容克请他协助开辟从德国经由前苏联飞抵北京的航线，并愿意提供飞机供斯文·赫定考察中亚之用，且承担一切经费。于是赫定提出了一个庞大的飞行计划，即经柏林——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蒙古——北京，以平均每小时 150 公里的速度飞行，全程需飞行 100 小时。为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考察。斯文·赫定还提出，在考察航线后返国时，再经北京——新疆——前苏联中亚——伊朗——土耳其进行科学考察。1906 年，容克的公司财政困难，被德国政府接收，上述计划遂告搁浅。但是出乎意料，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愿意资助赫定的考察拟议，于是斯文·赫定着手筹建考察团^⑫。

1906 年 10 月 15 日，斯文·赫定应邀飞往柏林，与汉莎公司商谈有关探险组织、成员、装备、经费等具体问题。10 月 20 日，双方达成协议：第一，探险队用瑞典的名义，受瑞典驻华使馆的庇护。第二，汉莎公司选派飞行员、气象专家、摄影师参加，瑞典选派两名科学家参加。第三，探险队负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与北京之间设立四个航空加油站并附设无线电台、气象测候所。第四，探险队第一步的任务是：组织驼队沿既定路线考察，选择合适的地点作航空加油站；派驼队为航空加油站运送汽油；由探险队组织从柏林首航。

1906 年 12 月 15 日，赫定到达北京后，立即拜访了瑞典驻华代理大使和德国驻华大使，他们十分赞赏赫定的探险计划，并许以全力相助。12 月 20 日，赫定在瑞典著名考古、地质学家安德

森教授陪同下，拜访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翁表示支持，并建议赫定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赫定表示同意。翁还建议赫定给中国外交部打报告，请求官方应允。随后，赫定拜访了外交部总长顾维钧，顾看了探险计划后指出：中国政府毫无疑问地同意驼队探险，但航空探险却会被军方阻止。为了取得军方谅解，赫定又于 1920 年 1 月 10 日拜访了北洋政府的航空部长，部长对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极有兴趣，希望能允许中国官员参加试飞，并提醒赫定在驼队探险结束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阻力。1920 年 1 月 14 日，赫定又拜访了其知心朋友、外交部次长（即副部长）王荫泰，他向赫定透露，政府已批准了探险计划。过了两天，外交部果然将批准驼队探险的报告转到瑞典使馆，内容大致如下：

据贵国大使及您本人所提交的探险计划，中瑞两国的科学家、航空专家拟赴甘肃、新疆两省进行考古调查。第一步探索将乘骆驼于 1920 年初离开北京，并在沿途为下一步使用飞机探索做可行性研究，您表示不从事违法活动。鉴于中国政府一贯鼓励考古调查，中国政府同意并支持第一步的探险计划，并已令地方当局予以保护和帮助。

1920 年 1 月 14 日，驻扎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接见了赫定，应允从各个方面支持驼队探险，并给新疆军阀杨增新打电报，通知他探险队抵达的时间和探险的目的。过了几天，张作霖将电报抄本、介绍信转给赫定^⑬。

得到张作霖的支持后，赫定又与中国的外交、军事、运输等部门分别协商解决有关考察团的护照、持枪证、货物运输等事宜。外交部同意每个团员可持长枪一支、短枪一支和 10 发子弹，考察团可以带 2 只猎枪。运输部门特拨两节货车和一节客车供考察团从北京到包头旅行。

赫定与北洋军阀政府的不平等协议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

正处在北伐高潮中的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了。猿月 缘日晚，北京学术界集会，反对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考察，呼吁禁止外国人进行考古发掘，掠夺珍贵文物，禁止外国人在中国领空飞行。并指出，中国的古生物、考古、地质等资料应由中国人自己研究，这些资料属中国财产，应由中国的博物馆收藏。为了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许多报纸都报道了有关消息，从而激起了民愤。与此同时，北京学术界发起签名活动，揭露西方探险家的目的是掠夺中国考古及其他学科的材料，应绝对禁止西方探险家涉足中国。面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腐朽的北洋军阀政府却完全置之不顾，反而全力支持赫定。外交部次长王荫泰甚至对赫定说，不要理睬学术界的反应，您已经获准出发，除了政府，没有任何机构能阻止您。既然已办好各种手续，就不必等待。^⑭

面对动荡的中国局势和复杂的社会情况，赫定明白，要使考察团顺利成行，就不能与中国同行发生冲突，造成隔阂。因此，他便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与中国学术界进行磋商。

中国学术界为了加强团结，共同抗议政府的无条件批准，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地质调查所等在京的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正是慑于学术团体协会的威力，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王荫泰致函赫定说，假如学术团体协会极力反对，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有可能收回 员月 员日签署的同意考察的文件。

经过四十多天的频繁接触和多次会谈、磋商，双方于 员月 缘年 源月 圆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签字仪式，与会者有赫定、周肇祥、马衡、黄文弼、刘半农、徐炳昶等。周肇祥、斯文·赫定分别代表中瑞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至此，终于达成了一项包括 缘条内容的新协议：决定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组

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名称中谨慎地避开了“探险”字样；设中国及外国团长，参加的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禁止将文物带到海外，采集品留在中国；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不得以任何借口，毁损有关历史、美术等建筑物；本协议办法之解释，应以中文为准。“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⑮协议的签订，使中国学术界异常振奋。有的学者认为“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签订这样一个协议，可以看成中国学术界成熟并形成一种社会力量的标志”。^⑯对此人们奔走呼告，《大公报》和《世界日报》详细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汇集舆论反映，指出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防止文物被“巧取豪夺，潜运境外”。刘半农径直以“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垮台了”的词句率直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事后《大公报》曾这样写道：“尤有一精采之处，即该协议之解释，须以中文为准，开我国与外国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斯文·赫定的这次考察活动，从主观上看具有殖民主义意图，因为考察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在新疆的航空权，这种单方面的航空权显然是不平等的，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但当中国学术团体与赫定制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后，斯文·赫定及其德国团员并没有放弃新疆航空权的企图。这正如赫定自己所说：“我在少年时就在这里（新疆）的森林、山脉岭和沙漠过了这许多幸福的年代。但是还有许多地方，是我从没能到过的，因此我想，只能用飞机诱出它的秘密来了”^⑰。

考察团到达新疆后，斯文·赫定从新疆的有关官员处得知，“在一年之前，北京的外交部给（杨）省长说明我的志愿，并且说，政府本身已反驳了这飞行计划。政府方面却让杨增新立定他的主意，要看在新疆的利益方面怎样好便怎样办”^⑱。

黄文弼及其他中国团员得知这种情况后，为了捍卫国家权益，向新疆当局多次力争，不能同意斯文·赫定的要求。据黄文弼先生的考察日记记载，~~源~~1935年猿月 愿日黄先生“又至樊（厅长）处往拜，谈论关于本团外国人拟在新疆飞行甚久”^①。猿月 愿日，“赫定到樊厅长处交涉飞机事项，樊未允诺。赫又提出杨宇霆有承认之意，盖欲以杨宇霆吓将军也，可笑之甚。樊说，我们新疆与当地情形不同，外交财政，不过照例报部而已，就令大元帅命令，也有时不承认也。就是说，即使大元帅认可，也不行。词婉而意重，樊真不愧为外交家也”^②。

虽然如此，但德国团员并不死心，并试图以行贿手段打通关节。猿月 愿日，黄文弼“至徐（炳昶）先生处，惊悉德人活动进行飞行事甚力，杨将军意颇动摇，意料于中牵线者为包尔汉。为系铃解铃之计，乃同徐先生至包处，藉考人种为名，便谈及飞行事。渠态度亦佳，并云德人贿赂各事”^③。

正是由于黄文弼等先生的努力，更坚定了杨增新省长的决心。源月 愿日，斯文·赫定又见杨将军，“进说飞行事，被拒绝”。^④斯文·赫定自己也承认，“从政治的根源上说，省长却以为不得打消我的企图，中国内部的环境是很明显地要这样办的”^⑤。但他并不死心，“复活节那天我和杨增新开了两点钟谈判……包尔汉也在场，却是徐教授翻译。我们对于我的飞行计划再做一次谈判，杨增新很逻辑和平静地给我解释他打消提议在政治上的原因”^⑥。“这样我们飞行的计划就要束之高阁了”^⑦。

关于新疆航空权的谈判失败后，斯文·赫定说：“中国方面既不允许我们飞行，那我却没有理由把所有在新疆的飞行家保留着，要带他们中之四人回柏林去，在我的团里的五个德国人都在各气象候所任事”^⑧。对此，黄文弼先生也记其事曰：“连日德人回德声浪颇高，然不足以吓吾辈也，徐先生有电致理事会报告，而将军亦有电至外交部矣”^⑨。然而，赫定毕竟是一个学者型的考察

家，新疆飞行之交涉失败后，他虽然很不高兴，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考察，只将汉莎航空公司愿人遣回德国，又从其他渠道筹措考察经费了。

（圆）考察团的成就

这次中瑞西北科学考察，中国方面共有 员人，由北大教务长徐炳昶教授任团长，再就是负责地质工作的袁复礼、担任地质和古生物工作的丁道衡、负责地图工作的詹蕃勋、承担考古工作的黄文弼等科学家。另外还有摄影龚元忠和承担气象观测工作的四位学生：崔鹤峰、马叶谦、刘衍淮、李宪之。

欧洲团员共有 员人，除赫定任团长外，瑞典尚有四人，即队长兰理训、本团医生郝默尔、研究地质并负责作图的那林、研究考古学的贝格满；丹麦 员人，即副队长哈士纶；德国 员人，即本团气象主任郝德、本团会计米纶威、本团电影员李伯冷和汉莎航空公司愿人：钱默满、海德、韩普尔、马学尔、华志、狄德满、马森伯、冯考尔。此外尚有瑞典人生瑞恒，随本团照料事务，但不列其名于团员中。

关于新疆航空权的交涉失败后，汉莎航空公司愿人便离团归国，考察团遂又增加了研究地磁学的瑞典人安博尔。由于工作需要，团中又任用了新疆的气象实习生张广福、赵玉春、翟绍武、赵克勤等人，至于团中所用的听差、厨役、采集人、牵骆驼的人则随时雇用，多少不等。

员年 缘月 怨日，考察队从北京出发，一个多月后捷报首次传来：我国年轻的地质学者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其“成分必在八九十分以上”，“尤适于近代矿业之发展”。中国团员极为兴奋：“这里或将成为北方的汉冶萍吧！”对矿石的化验结果证实，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铌稀土的铁矿床之一，现已发现有 苑种元素和 员种矿物，我国的大型钢铁企业、稀土生产科研基地——“包钢”，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1957年10月，考察团的又一条消息轰动了全世界，袁复礼教授在新疆挖到 苑具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法国一家报纸甚至渲染说：“七个活恐龙在新疆发现”。四年中，袁复礼教授在乌鲁木齐以东博格达山至天山北孚远一带挖出大量爬行动物化石，较完整的有 苑具，其中有 苑个新种，古脊椎动物学家将其命名为：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水龙兽、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龙。另外还发掘到一具宁夏结节绘龙化石。这是当时我国发现恐龙化石最多、最完整的一次。

在此之前，只有外国人在中国零星发现过几块白垩纪恐龙化石，大批爬行动物化石只在南非的卡鲁地区发现过。这次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短时间内竟发现这样多的二三迭纪古爬行动物化石，比过去的发现提前了一亿多年，这怎能不使全世界的学者为之震惊呢？这些发现使中国的古脊椎动物研究跃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建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发现之下”^②。考察团中国团长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中也说：西北科学考察团“最重要的发现，则为袁希渊（复礼）在新疆……所得之恐龙化石。此化石……在亚洲尚属第一次发现，并可以推倒从前地质学家在天山东段无动物化石的断定。瑞典有一地质学家对赫定博士说，你们费巨款，作考察，即使止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

西北科学考察团另一项震惊中外的考察成果是一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发现，它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考察团发掘的地区，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即东经 100°至 105°，北纬 38°至 40°间。在额济纳河下游，在一名叫黑城的废墟。在此废墟东南方有汉代遗址，据推测此地可能就是张掖郡的居延县城，所以沿额济纳河广大地区出土的简牍，统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地区，是汉代重要的军事边防区，在汉武帝开发河西及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经过二千年的风风雨雨已无法得知其具体情况了。黄文弼先生根据其实地考察及丰富的历史、考古、民族、地理知识推测：“古代安置烽墩，即以塞，人民悉沿塞居住。汉筑居延塞，以处居延人民，故在烽墩附近发现了汉代瓦片”^{②③}。并对居延塞与遮虏障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自肃州以东，若金塔、天仓、额济纳等之烽墩，皆谓之遮虏障。跨甘、肃二州境地，在甘州者为居延境（即今额济纳境内）地，故称居延塞；在肃州者为内地边境，故称遮虏障。《通典》于张掖、甘州著居延塞，于酒泉、肃州著遮虏障，实皆为一类，因地而分耳”^{③④}。“居延县者，以安处所获居延人而置”，“至于居延县城在何处，尚未发现，余颇疑黑城即是，黑城西有一小城疑即居延县城”^{③⑤}。

震惊世界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黄文弼先生在此考察时，就已经找到了几枚汉简。民国廿年五月四日，黄文弼先生偕助手庄永成在黑城考察并画图后，又从一土堡内“拾汉瓦片数块，复在西北隅高坡上以手刨之，见一木简，上有汉文字迹，惜近漫灭，以笔画形势度之，其为汉晋木简无疑。若是，则此一带为汉晋旧障，无可疑者也。”^{③⑥}。这时已到了晚上九点，他们不得不返回营地。第二天，他们二人又在昨日所掘之处及其附近发掘，从上午九点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所掘地面东西十一英尺，南北十二英尺，深三英尺。上为浮沙土，尺余抵红泥冲积层地面，下为黑灰土，木简即出于其中。……计所得残木简三根。一为庄（永成）掘出，上有阿本二字，余模糊。余皆为余掘出，一为双行字十余，字迹为土所淹，不易辨识，仿佛为‘七足下闻子口必为书翰以通旁经’者。后寻许久，方觅见另一简，有数字，但已模糊，尚有无字木片数段”。并根据其考察推断说：“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决不止此也。详考字迹，与斯坦因等

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物”^③。

黄文弼先生发现这几枚汉简后，再未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发掘，而是转入其他地区考察了。居延汉简的大批发掘及其重大学术价值的发现，是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率我国采集员靳士贵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古成就。1928年10月16日贝格曼找到了一枚汉简，不久又发现了大批简牍。考察团在居延地区共发掘汉简区，主要的有甲区。出土文物多达1000包，其中有木简者100包^④。这批汉简按照协议于1929年10月运至北京，由北京大学教授兼故宫博物院文物馆副馆长马衡及贺昌群、余逊、劳干等分别作了部分考释，贝格曼博士也因研究这批简牍携眷在北京住了两年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的沦陷使这批国宝面临被毁劫的厄运。沈仲璋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辗转运往香港，以后又被运到美国，现存台湾。劳干先生研究这批汉简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于1950年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同时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58年至1960年，甘肃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又在原简发掘处破城子一带发掘了汉简两万多枚。到目前为止，居延汉简已出土三万多枚了。^⑤

考察团还有一项成果，即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古活动。

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第一个进入新疆的考古学者。他考察的重点是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古代遗址。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察，除了南部东段外，几乎都踏查遍了。他重点调查和发掘的地区有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阗、于阗、皮山、叶城、巴楚等地，发现遗址极多，采集也非常丰富。

吐鲁番地区，由于发现了大批的吐鲁番文书而闻名于全世界，并和敦煌文书的发现、研究一样，形成了吐鲁番学。古代人类在吐鲁番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交河、高昌和柳中。吐鲁番文书主要发现于高昌故城附近的哈拉和卓（二堡）和阿斯塔那（三堡）。高昌故城，维吾尔语称作“亦都护城”。据《高昌王世勋之碑》

称：“亦都护者，其国王号也”。当地维吾尔族有这样一个传说：古代维吾尔国的国王派遣一名叫哈拉和卓的大将去征服高昌，哈拉和卓勇敢善战，率大兵包围了高昌王城，高昌国王亦都护塔克洋努士在重兵威胁下，派人与他讲和，哈拉和卓提出，要亦都护将公主嫁给他当妻子才可以停战。高昌国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答应了这一要求。三年以后，哈拉和卓被高昌国人处死，并将其尸体扔在井里，后来，哈拉和卓的家人找见了尸体，并计划用骆驼运回故国安葬，但当骆驼行至阿斯塔那后就不走了。于是，他的家人就把哈拉和卓安葬在阿斯塔那。由于哈拉和卓生前驻扎过二堡，为了纪念他，便把二堡称为“哈拉和卓”。“阿斯塔那”，维吾尔语是“首府”的意思。首府，本来是指亦都护城。但自元代以后，高昌故城废弃，首府移至故城西三堡，三堡也就叫阿斯塔那了。^{③⑥}

黄文弼先生于 1935 年和 1936 年两次考查了吐鲁番地区，根据其考察日记记载，1935 年 7 月 10 日，“今日闻说胜金口有碑 1 方，雇人引导，骑马前去，胜金口在北，距此约 7 里，石碑在大道东山麓，刻于一岩石上，为民族古文字”。^{③⑦} 1936 年 1 月 1 日，“上午余到胜金口，锥拓摩岩石刻，彼等在土峪沟路北发掘古坟院，出砖 1 方，一为章和七年平远府参军；一为河西王通事舍人”。^{③⑧} 1936 年 1 月 1 日，“余复带引导及汗木多往查石碑，碑在鲁克沁东北，使力克普沟口。……有一土墩，甚高峻，四周有像遗迹，已毁。塔中有弄，上书红字，有贞元年号及‘僧辨真画’等字。知为唐代之物。……转西过沟，山上有破房遗址及碑刻字者三四。有一石上脛‘国力年安’疑即‘王国万年’之联写，旁有龙字，下疑为朔字，想为唐代人所书”。^{③⑨}

黄文弼先生不仅详细考察了吐鲁番地区，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尤其是他发掘的大量墓表，对高昌史的研究有极大的价值。他根据这些墓表及其他材料排列出了麴氏王朝

世系、年代和官制，使高昌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黄文弼先生对交河故城的考察及研究，更具有重大的意义。交河故城是汉代车师王前庭所在地，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黄文弼先生在故城西部干河床岸上的古墓区里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出土了完整陶器~~愿~~四百余件，墓表~~愿~~四百余方，以及其他大量随葬品。其中有唐乾封元年（~~愿~~公元698年）刘士恭的墓表一方，墓表上书：“卒于赤山之南原礼也。东则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长岸”。

由于黄先生采用了科学的考古方法，对发掘地域划分明确，内部层次清楚，编号记录严密，从而判明，沟北区和沟西区包含了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文化。沟北区应在汉通西域以前，从出土陶器特点，可以看到既受依兰文化的影响，也受汉文化的影响。沟西区据所出墓志的年代多为公元六至七世纪，其形制特点主要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黄文弼先生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了东西文化两期推进说，即公元前二世纪至前五世纪为东西文化向新疆的第一期推进，西方文化主要通过西北荒漠进入新疆，中原文化对新疆也有影响；公元前一世纪至三世纪为东西文化的第二期推进，汉文化由于汉通西域而大量涌入新疆，西方文化由波斯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南部。由此，他以自己的研究有力地驳斥了新疆文化完全来自西方的论调”^④。早在《高昌陶集·序》中黄先生就指出：“新疆文化关于宗教方面，如艺术、语言、文字，受西方文化最深，凡关于政治方面、与农垦有关之货币及工艺品，受东方文化最巨”。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与爱国热忱。

正是由于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黄先生被视为我国吐鲁番学的奠基者之一，这从其有关吐鲁番的著作中就可得到证明。他在《吐鲁番考古记》一书中指出：“由于吐鲁番位置之特殊，反映其政治和文化之多

方面的发展。在历史上无论汉人、匈奴人、突厥人、西藏人、回鹘人、蒙古人，挟其政治和军事力量西进，而印度人、大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罗马人、或土耳其人，拥有宗教或宗教艺术东来，莫不以吐鲁番为焦点。而留其残迹”。再加上这里气候干燥，适宜保存地下文物，故其“不特为研究我民族之重要地点，亦且为研究亚洲历史可珍贵之宝库”。黄先生还对吐鲁番考古发掘所得文物、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在《高昌》一书里，公布了墓砖目录，发现墓砖的经过及新疆发现古物概要。在《高昌砖集》中，对其所获 1000 余块墓砖分类刊布，并对 1000 余块砖文进行了考释。《高昌陶集》一书，不仅详载吐鲁番发掘报告、所获器物介绍及研究，而且还在所获 1000 多件陶器中择出精品 1000 余件，经过分类排列，影印出版。《吐鲁番考古记》一书，详细介绍了有关古文书写本及绘画情况，还附有大量图版和地图。以上诸书，全面系统地公布了黄先生在吐鲁番考古发掘所得文献文物及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吐鲁番学研究。

举世闻名的罗布泊地区，以前仅有少数几个外国学者考察过，黄文弼于 1926 年春踏上了这个地区，从而第一次印上了中国学者的足迹。他最富有成果的发现是一座西汉烽燧台遗址，出土了一批西汉简牘。这是汉通西域后最早的一批简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黄文弼先生在新疆三年多的考察，获采集品 1000 余箱，于 1929 年秋取道前苏联西伯利亚返回北平。在北京大学为先生举办的报告会上，代理校长陈大齐教授说：“黄先生此行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辛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沈兼士教授指出：“我国的科学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材、经济及环境均有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机关渐注意考古及民俗学之研究，但在六

七年前，只有北大同人注意及此，不但开通风气而已，今果有伟大成就”。

考察结束后，黄文弼先生即在北大国学研究所从事采集品的整理研究，~~1927~~1926年出版了《高昌砖集》，~~1928~~1927年出版了《高昌陶集》。~~1928~~1926 1927年他又多次入疆，根据罗布泊沿岸的考古发现，论证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对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罗布淖尔水道变迁等，对该地区诸古国的兴衰及丝绸之路等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并出版了《罗布淖尔考古记》（~~1928~~1926年）、《吐鲁番考古记》（~~1928~~1926年）、《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28~~1926年）、《西北史地论丛》（~~1928~~1926年）、《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28~~1926年）、《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1928~~1926年）、《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8~~1926年）等。

另外，考察团在德国专家赫德博士领导下的气象观测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全部观测记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和高空探测资料两大本（德文），成为此后二十余年间中亚气象权威性的资料。

（猿 考察团的影响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其组织的初衷及主观愿望看，的确具有殖民主义的倾向，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西北的开发。正是由于这次考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遂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家刮目相看。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由于在古生物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考察团中国团长徐炳昶教授，也因出色地组织领导工作获得了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中国政府为了表彰考察团的功绩，特为该团发行纪念邮票一套，这是我国为学术界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斯文·赫定博士在其叙述这次考察的日记——《长征记》序言中写道：“至于中国的学者和学生……我在这里只须提明，他们的合作使我一月一月地愈是觉得，怎样地不可少与怎样地贵重”。“中欧间的这种善意地、友谊地合作在我看来，是

一种真实愉快的源泉；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有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

以上仅仅叙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些具体成绩，而其最重要的影响则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正如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中说，在一切具体成绩之外，“还有二件很好的结果，深应注意：第一，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对于工作的强固意志及丰富能力，并不像欧洲近视眼的外交家所说：‘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京’！第二，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我国人并无盲目排外的意思，如为夸大狂所蒙蔽之欧美人所宣称。这两件证明实足在精神界开一种一纪元”。当考察团到达包头的第一天晚上聚餐时，斯文·赫定曾讲演说：“我们将要证明，白种和黄种能够和好地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科学是处在国界和各民族之间的偏见之上的。破坏的倾轧或近视的国家主义我都不能忍耐，是在我旅行团的，大家都是朋友，中国人同欧洲人享受同等的权利。不过中国人是在家乡里，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中，我们却是外来宾客。我希望，各人各尽他自己的义务，因为如果考察团每个分子都拿出本事做事，那我们所得结果将要有益于人类的”。^{④①}中国科学家在政治上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但在科学考察上，中外团员却配合得很好。斯文·赫定曾说：“最后还得感谢北京的‘反对派’——中国学者们，他们由我的敌人转成我的朋友和合作者”。^{④②}“我们在一起工作如手足一样，没有丝毫的嫉妒、齟齬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际和种族，惟一的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④③}

这次考察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绩，也与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分不开的。斯文·赫定也不得不承认：“考查团始终欣幸中国政府有力的保护”。^{④④}当考察团第一阶段工作结束，徐炳昶教授东归以后，《东方杂志》的主编曾通过鲁迅先生向徐炳昶约稿，请其将前一阶段的考察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

来，以便于中国学术界了解西北。

这次学术考察，推动了中国学术界认识西北、研究西北、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的热潮，自此以后，我国科学家不断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发掘、研究。尤其是直接促使了丝绸之路学的发展与兴盛，促使了中国吐鲁番学的产生和发展，并在间接方面促使了我国敦煌学、简牍学等各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我国学术界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圆援敦煌考古促进了敦煌学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抗战后方的建设，需对有关历史遗迹及边疆史地进行考察了解。员怨源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便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这次考察由辛树帜任团长，史语所派劳干、石璋如参加，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请西南联大向达教授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考察团考察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其中考古工作仅限于甘肃和宁夏地区的一部分。

员怨源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又组织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⑤这次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目的，除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外，主要是为当时的西北建设服务，以考察“所得供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因此，除了历史考古组外，还有地理组、地质组、矿产组、动物组、植物组等。其中有历史考古和美术工作者向达、夏鼐、阎文儒、谢稚柳、何正璜、傅振伦等先生，他们在敦煌的考察，打开了敦煌史地研究这一领域。

早在员怨源年，向达先生就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约，经北京大学同意，赴河西入敦煌，考察莫高窟。因当时尚未

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石窟的保管工作无人过问，任人破坏盗劫。莫高窟的荒芜景象，使这位毕生致力于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十分痛心。他根据考察所得及其见闻，于 1944 年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文章首先提出敦煌千佛洞应收归国有，交与学术机关管理，勿轻意剥离壁画，并希望此建议得到学人的支持，造成声势，促使国家重视。最后建议加强对河西问题的研究，主张在河西设立一工作站，从事历史、考古、地理、地质以及人类学等各部门的探讨研究。正是由于向达先生的呼吁，再加上政界、学界同人的努力，于是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

向达先生曾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议在河西设立工作站。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分给历史考古组十万经费（总经费五十万），傅孟真等先生便商议用此款在河西设立一工作站，由向达先生主持筹备，并准备派夏鼐先生前往协助。随后便由向达、夏鼐、阎文儒三位先生组成历史考古组，由向达任组长，夏鼐任副组长，于 1944 年春赴河西，五月到敦煌，一直考察发掘到年底，1945 年初返回。

现将在敦煌境内的主要考察成就简述如下：

1944—1945 年，向达先生就对敦煌境内的古长城及关隘等作了考察，他在《西征小记》中说：“余于三十一年十月九日午抵敦煌，下午即去千佛洞，住其间者凡九阅月。中于同年十月中旬至南湖一访阳关遗址，三十二年三月旬往游大方盘、小方盘，探玉关之胜迹，访河仓之旧城。其年四月复自敦煌至南湖，由南湖北行越中戈壁以至西湖，再访玉关，然后东行以归敦煌。五月至安西，礼万佛峡诸窟，历时一周，复返千佛洞。”

1944 年 12 月 1 日至 1945 年 1 月 1 日，夏鼐、阎文儒先生在敦煌驻军的一位营长陪同下，又对敦煌汉长城进行了考察与发掘。1945 年 1 月 1 日，他们赴古董滩考察，“滩在沙丘中，时露绳纹或刀削纹

陶片、小榆荚钱和五铢钱，以及碎铁片等等。沙丘常因风吹而迁移，当地居民常拾到零星古物，所以叫古董滩，或叫古铜滩。”^{④6}

小方盘城就是汉代的玉门关。关城方形如盘，故叫小方盘城。“城垣每面二十六公尺二寸，高七公尺五寸。垣顶每面长二十四公尺八寸，宽三公尺八寸。开西、北二门，……城垣版筑，每层板痕约一公寸。”^{④7}

向达先生在《两关杂考》中指出，阳关即今南湖古董滩西之西寿昌城，玉门关即南湖北之小方盘城。癸丑月 缘日夏鼐先生率队对关城北疏勒河南土丘中的汉代垃圾堆（斯坦因编第 源号墩）进行了发掘。他们用一天的时间，共掘得野麻绳、残木片、碎毡片、麻布片、白绢片、木栲等物，还有一些残木简，其中第三简有“酒泉玉门都尉护众侯畸兼行丞事谓天（？）忌以次（？）马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夜（？）口传（？）行（？）从事如律令”等文字，由此简更可证明为玉门关城址无疑。

癸丑月 苑日，考察队发掘了大方盘城。掘出长方形石刻一块，上有“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甲辰造乐生”等字，还有五铢钱、陶片及白绿残绢片等。这次发掘所获，最重要的是泰始十一年刻石，由此刻石得知，晋时敦煌仍隶属于中央政府，并可以推证大方盘城兴废的时间和用途。

大方盘城即河仓城。杂缘源《敦煌录》说：“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当时至大方盘城虽无确定的里数，但根据考察队来往路程推测，与《敦煌录》所记里数相符合。又大方盘城城墙上下，有排列整齐的洞穴，“以今日关外清时军粮储藏的仓库遗迹来看，后墙为通风起见，也砌成洞穴，大方盘城的用途，可能是军储的遗址，与《敦煌录》所记的用途也相同。”从以上种种情况可知，“大方盘城的建筑，最晚当在泰始十一年（源缘年），或者是汉时的边城。城的用途，可能为军储的遗址，就是《敦煌录》中所记的河仓城了。”^{④8}

敦煌附近除了古城遗址外，还有许多古墓，如罗盈达墓志铭、阴善雄墓志铭、索法律窟名等，均记其葬地。如能找到这些墓葬，乃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重大收获。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说：“三十一年冬始至敦煌，即闻人言佛爷庙至千佛洞中途戈壁上有砾石堆甚多，疑是古代墓葬遗址。其后数次往观，则自佛爷庙以东此种砾石堆累累皆是，迤东以至于新店子，长达三四十里。大都中为砾石堆成之小阜，高者及丈，低则几与地平，为数三五不等。”“就其形式观之，与斯坦因、黄仲良（文弼）诸人在高昌所发掘之六朝以及隋、唐古墓绝相类似，则其为古代之墓葬群，盖无可疑也。”向达先生的这种推论，被 1959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发掘完全证实。

1959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夏鼐、向达、阎文儒先生在敦煌城东约九公里的老爷庙发掘了一唐代墓葬，内容比较丰富。这个墓葬的墓门内两侧站立着一对高 1.5 米的武士像，他们都高举着一只手，另一只手叉在腰间，威风凛凛，表示门禁的森严。武士像的雕塑艺术也很精良，脸部的表情威严而生动，可以和千佛洞盛唐洞窟中的武士像相媲美。在武士像稍后的右首，站立着一对骆驼，高达 1.5 米，各有一个驼夫牵引着。再向后便是放置木棺的平台，台前排立着大批的小陶俑，共 100 件。其中骑士俑 10 件跨着骏马，好像一队骑兵，排立在平台前的左边。旁边的空隙放置一匹大陶马，马首向外，姿态生动，其旁站立着三个马夫俑，作牵马的姿势。这些马夫和驼夫，都身穿大翻领的狭袖短大衣，足穿长统的黑靴子。其中的两个不仅穿胡服，而且高鼻圆目，发辫盘在头上，可能血统也是胡人。此外，还有带金箔的铜片、开元通宝钱、玻璃细条和玻璃珠等。从其内容判断，它是盛唐时代的墓葬。^{④9}

这次西北科学考察结束后，考察队成员利用历史考古所得，撰写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向达先生的《两关杂考》、《莫高、榆

林二窟杂考》、《罗叔言 补唐书张义潮传 补正》、《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夏鼐先生的《新获之敦煌汉简》、《玉门关发掘新获的汉简》、《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等，都是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大大丰富了敦煌学和西北史地学的研究内容，推动了敦煌学的向前发展。

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四十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同时，历经磨难的敦煌石窟艺术也才得到了保护、临摹和研究。那么，敦煌艺术研究所是怎样成立的呢？

员援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书

提起敦煌艺术研究所，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于右任先生。员援年甘新公路正式通车，时年 员猿岁的于右任先生即由重庆来西北考察。员月 圆日抵西安，旋过兰州，趋敦煌。员月 缘日，恰值中秋节，于先生到了莫高窟。这时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在洞窟临摹壁画，于先生当晚即在张大千的临时住所过中秋节，同到者有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曹汉章、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张公亮、任子宜、李祥麟、王会文等。席间，大家的话题自然谈到敦煌和敦煌艺术，认为敦煌文物多年来不断遭到外人的劫夺，目前大量艺术珍品得不到妥善管理保护，许多洞窟濒于坍塌；由于气候恶劣，有的壁画大块脱落，而有关方面却对敦煌国宝漠然视之。在座诸人无不痛惜。在以后几天的参观考察中，于先生对敦煌艺术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它濒临毁灭的危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敦煌纪事诗》曰：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佛残龕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敦煌之行结束后，于先生又考察了河西走廊，复到兰州、西宁。~~民国~~年~~九月~~月~~二十~~日，完成了对西北的考察。~~民国~~日离开西安，返回重庆。在兰州时，于先生曾谓莫高窟是中国的骄傲，更是甘肃的骄傲，应珍视！在他考察敦煌后，深感现状岌岌可危。因此返回重庆后，就立即在政界、学术界大声呼吁，希望重视、保护敦煌艺术宝藏。于先生作为政府高级官员，亲自撰写《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并送达国民党政府，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鼓励学人研究敦煌艺术。这一建议书发表于当时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四~~卷~~九~~期（~~民国~~年~~九月~~月~~二十~~日出版），建议书说：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分塑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

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画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这个建议经过讨论，决定交当时的教育部负责筹办。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在对日作战激烈阶段，财政支出紧张，故答复须待次年始能成立。

圆援向达先生的大声疾呼

于右任先生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其建议在当时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敦煌艺术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人民的关心。1944年缘月，围绕过去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的事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各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国民党统治下发生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关，人们就敦煌石窟历次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1944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先生应研究院之约，参加历史考古组赴敦煌等地考察。向达先生在敦煌详细考察了千佛洞、榆林窟及阳关、玉门关等名胜古迹。通过考察，更认识到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价值，看到了千佛洞所经历的劫难及其被毁灭的危险，立即在莫高窟写了《论敦煌千

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以“方回”为笔名，在重庆《大公报》~~1944~~年~~10~~月~~10~~日至~~10~~日发表。向达先生在文中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政府重视祖国文化遗产，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保护敦煌文物。向达先生说：

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么？

向达先生作为著名学者，他的呼吁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与响应。有的学者就是看到了他的呼吁后，才知道了敦煌宝藏，才下决心去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如潘絮兹先生读了向达先生的文章后说，它“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怦然心动了。……下决心要到敦煌去，那怕只看上一眼，死也瞑目。”^⑤从而历经艰险，到了敦煌，加入了敦煌艺术研究的行列。

猿援贺昌群先生的积极响应

贺昌群先生是著名敦煌学专家。早在三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就形成了一股敦煌热，而在我国却注意者寥寥。为此，昌群先生大声呼吁国人重视敦煌学，他说：“我们只要在这中间抓住一鳞半爪，也可以牵引起许多新问题。至于敦煌石室中所发现的古文书，以及多种语言的手写经卷的研究，那真是沃野千里，只待人开拓。西洋的东方学者以及日本人，现在已经去得远了，我国学术界目前似尚无暇及此！”^⑥他不仅对民族文化事业忧心忡忡，并且身体力行，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等敦煌学论文，还翻译了斯坦因的《敦煌取经记》。~~1944~~

年五月，向达先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有关莫高窟的文章时，昌群先生正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他随即在《大公报》~~1944年~~五月~~九日~~发表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一文作为响应，指出：“历史上一个没有历史记载的民族，无论如何强大于一时，终必至于灭亡”。“一个不知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未有能昌盛的。”从历史的高度，强烈呼吁国家拨款和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敦煌千佛洞。

昌群先生在文中说：

我们十分赞成他（向达）这番建议，我们希望政府也同样尊重这个建议。他的话已经言尽意至，本不用再加申说，但我们为了更加促起政府的注意，知此事为千百年国家文物之所系，非一二人之私言，所以愿借报章的地位，希望舆论界亦加以赞成，使其能比较普遍地为国人所了解，不但对于敦煌千佛洞如此，便是别的有关国家文化学术的古物遗迹，亦应同样具有这种意义去保护和管理。

.....

保存古物的机关，我们本有古物保管委员会，不过该会原只保管古物，遗迹之保管不在其职责之内，加之经费拮据，人才零落，恐难负推广之责。傅孟真先生建议应由教育部会同内政部设立一保管机关如委员会之类。我们以为若此委员会之职责能包括管理全国规模较大或价值最高的遗迹，如千佛洞、云冈、龙门以及房山石经寺、嘉祥武梁祠、大同与蓟县的辽金建筑等，那末，傅先生的建议我们极端赞成，但在抗战期中，此事必难实现。若单为敦煌千佛洞而由政府组织一委员会，则政府在百忙中，未必能迅速办到，而目前千佛洞壁画之遭劫，已迫不及待，照方回先生在千佛洞目睹情形看来，一年四季的游览者和那班学画的人，正在进行剥

离壁画的工作，“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真是何等痛心的事。在政府未决定统一管理之前，我们以为目下对于敦煌千佛洞的当务之急，应由政府（教育部会同内政部）迅速指定纯粹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院负保管之责，保管费当另由政府酌拨。此事之实现愈早，千佛洞之劫运或犹可挽救于万一。总之，千佛洞的应归国家管理，当已不成问题，我们万分希望政府与社会人士早日促其实现，岂仅是学术界之幸而已。

源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正是由于政界、学术界于右任、向达、贺昌群诸先生的诚恳建议和大声疾呼，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与赞成，国民党政府始决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春，于右任的建议送达政府研究后，决定次年成立研究所。1945年秋，即开始了筹划事宜，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找到常书鸿，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后来监察院参事陈凌云也对常书鸿说：“于右任建议教育部准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想让你去当筹委会副主任。筹委会主任由陕甘宁监察使的人担任。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回去报告。”^⑫常书鸿先生接受了这一邀请，开始筹划研究所的成立工作。

开始筹划时，常书鸿先生要让教育部指派几位专长历史考古和摄影临摹工作的同志，但教育部负责人回答说：“我不能给你找到这些人，看来你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到当地（兰州）去解决。”这样，常书鸿先生便只身从重庆珊瑚坝机场乘飞机来到了西北高原古城——兰州。

常书鸿到兰州后，首先拜访负责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

官员们。“开始，这些当地的绅士名流对我还算热情，他们齐声赞许我不辞辛苦，前来从事敦煌艺术的研究保护工作。后来有人提出把所址设在兰州的意见，我说：‘设在兰州，远离敦煌二三千公里，还搞什么研究和保护工作呢？’这一来，他们嬉笑的脸上立即挂上了一层冰霜。结果，对于我提出的工作要求，如配备绘画考古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购置图书参考资料、绘画物品和摄影器材等一个也没有解决。”^③

常书鸿一人毫无办法，一天天在兰州消磨时光。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碰见了一位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学生龚祥礼。他俩一见如故，龚祥礼欣然应允随同常书鸿前往敦煌，并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后来，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凑了一个文书，还指派了天水师范学校的校长李赞庭为秘书。最后又在省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中招聘了一位名叫辛普德的会计。

1944年 4月 15日清晨，常书鸿一行 远人，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敦煌之行。经过一个月的艰难旅行，于 4月 15日下午到达安西。4月 15日，终于到达目的地——敦煌。这时教育部正式宣布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由高一涵、常书鸿、郑通和、窦景椿等组成，任命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常书鸿为副主任。经过筹委会委员近一年的奔走张罗，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 1944年 4月 15日正式成立，直属教育部，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并从重庆征聘来了 40余位自愿到敦煌的专业人员，开始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临摹和研究。

四、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进程。整整十年间，

除台、港地区外，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被迫中止，而国外许多国家的敦煌学研究却进展很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生机。到了八十年代，发展异常迅速，可谓进入了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

支援研究队伍日渐壮大

“文化大革命”前，专门研究敦煌学的机构，全国只有一个，即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也比较少，专职研究人员更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适应敦煌学大发展的需要，全国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群众学术团体，并加强了人才培养。

（一）创办了许多研究机构

目前研究力量最强、图书资料最全的当推敦煌研究院。1980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为了适应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1980年1月15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决定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成立敦煌研究院，并将研究院确定为地级学术研究单位。院本部设在兰州，成为研究中心、资料中心和生活基地。下设美术、历史考古、遗书、石窟保护研究所和音乐舞蹈研究室，以及编辑出版部、资料中心、学术委员会、生活接待部等。院长由国内外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担任。1981年又由樊锦诗先生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全院有研究、保护人员140余人，并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敦煌研究院实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中心。出版有院刊《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从1980年开始试刊，试刊两期后于1981年10月正式创刊，并从总第12期（1982年春）开始改为季刊。现已成为世界重要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发表园地。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1981

年，筹建中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就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作为重点机构筹建。由于北京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其强大的研究力量，再加上地处首都，便于国际交流，其研究成果非常显著，除出版许多个人专著外，还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五辑。已成为敦煌研究院之外最强大的敦煌学研究机构。

北京图书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资料中心”：1984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学会就提出在北京图书馆设立北京资料中心，并于1984年5月与北京图书馆进行了磋商。北京图书馆表示同意，决定在该馆善本部设立资料中心筹备组。经过两年多的筹建，资料中心于1986年试行开放。1988年10月，北京图书馆资料中心正式成立。同时还举办了“敦煌吐鲁番资料展览”，展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20件。

该中心利用地处北京的有利条件，系统地搜集、整理、入藏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编辑出版有关目录和论著。同时还举办敦煌学讲座，为敦煌学界提供阅览和咨询。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1982年11月，由历史系几位同志发起，组织了“敦煌学研究小组”。小组成立后，即开始了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并于1984年10月编辑出版了《兰州大学学报·敦煌学专刊》（即《敦煌学辑刊》第一辑）。1986年，成立了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1988年，兰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后，敦煌学研究室便划归历史研究所。1989年又在敦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所。研究所除创办《敦煌学辑刊》外，还出版了一批个人论著。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八十年代初，西北师范大学为了组织和调动有关方面的学术力量，进一步推动本校的敦煌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于1981年由历史、中文、地理、美术、音乐等系和图书馆共同筹建敦煌学研究所。1984年11月15日，经甘肃

省教育厅批准，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并确定为系级科研单位。研究所出版了一批个人论著，于 1980 年、1981 年编辑出版了两期《西北师大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并组织翻译了《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2 年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敦煌学课题组，1981 年正式组建敦煌小组，最初设在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后转归隋唐室领导。1982 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文献室，1983 年撤销。其间共同合作编辑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985 年 12 月，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该中心为院属非实体性研究机构，挂靠在历史研究所开展工作。“中心”现有科研人员 100 多人，专业涉及历史、宗教、文学、语言、民族等敦煌学的多个学科领域。主任为张弓，副主任为方广钐、李锦绣，学术秘书黄正建。

杭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1981 年成立的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由于有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著名敦煌学家，从而使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敦煌学研究力量比较强，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论著，并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即语言文学研究。为了全面整理敦煌文献，加强敦煌学研究，杭州大学于 1983 年成立了敦煌学研究中心。“中心”为人文学院直属机构，挂靠在古籍研究所，目前的主要工作是编纂《敦煌文献合集》。

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由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于 1956 年创立的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其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由唐长孺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4 册）、《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两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受学术界的重视。另外，该室 1982 年创办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至 1985 年已出 15 期，载有不少

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文学研究室：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建立之初就注重敦煌文学研究，1984年主办了全国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创办了《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并编辑出版了《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为了适应敦煌学的发展，1985年又在文学研究所内成立了敦煌文学研究室，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合编《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

除以上专门研究机构外，其他一些有关研究机构也把敦煌学作为重点或主要研究方向，如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古文献研究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藏族研究所等。

此外，兰州商学院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室、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组、湖北大学敦煌学研究组也曾开展了一些活动。

（四）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早在1983年，教育部就已深感敦煌学虽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群，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学科发展都需要有所加强和促进。1983年10月，教育部派人到甘肃作了调查。1984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期间，教育部顾问周林同志邀请到会专家座谈了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情况及建立学会的设想。12月，教育部在南京又邀请了部分学者进行酝酿。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表示了组织起来促进研究工作的愿望。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艺术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进行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此基础上，教育部本着促进团结、促进联合、促进科学研究的宗旨进行学会的筹备工作。1985年11月11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羨林教授主持。会议商定：参加筹备会议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国家文物局

古文献研究室、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为发起单位，由北京大学牵头。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为赞助单位。由发起单位向全国有关单位和研究者发出倡议，并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指定专人成立秘书组，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具体由兰州大学、敦煌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负责。1984年 8月 15日，由季羨林教授主持，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 1984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于 1984年 8月 15日在兰州举行，以便在 8月 20日日本召开的第 10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大会之前闭幕，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

1984年 8月 1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及 1984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香港的近 1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并聘请李一氓、周林、姜亮夫、王仲荦、金宝祥等 10名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担任顾问。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与会全体代表用投票的办法，于 8月 15日选举了学会理事。第一届理事会推选季羨林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沙比提、黄文焕、宁可为副会长，由宁可兼任秘书长，张广达、齐陈骏、穆舜英为副秘书长，金维诺、张锡厚、王永兴、沙知为常务理事。

1985年 8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学会于 8月 15日下午举行了会员代表会议，进行第一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季羨林、段文杰、宁可、朱雷、柴剑虹、荣新江等 10人为第二届理事。第二届理事会推选季羨林为会长，宁可、段文杰、铁列吾汗、唐长

孺、黄文焕为副会长，由宁可兼任秘书长，张广达、齐陈骏、穆舜英、柴剑虹为副秘书长。

1985年换届选举后，仍由季羨林先生任会长，柴剑虹先生任秘书长。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语言文学研究一直比较活跃，成果也比较突出。因此，在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就积极筹备成立语言文学分会，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于1985年12月1-3日在杭州召开了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姜亮夫为会长，周绍良、蒋礼鸿为副会长，张金泉任秘书长，柴剑虹、颜廷亮任副秘书长。并决定分会的会址设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由于工作需要特在甘肃分设办事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于1985年更名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

此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舞蹈与音乐委员会于1985年12月成立；科技史委员会与西域艺术委员会于1985年成立；体育卫生委员会于1985年成立。

除了以上全国性的团体外，还有一些省或地区也成立了学术团体。如浙江省敦煌学会于1985年在杭州成立；甘肃敦煌学学会于1985年在兰州成立；酒泉地区敦煌学学习研究会于1985年在甘肃酒泉成立。

（猿 人才的培养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很少，据1985年初教育部的调查估计，老中青合计约一百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约四五十人，研究队伍的状况为倒三角形（即老年学者多，中年学者次之，青年研究者少）。为此，季羨林教授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在大学里设置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的专业，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此外还可

以举办各种类型的、期限不同的讲习班。

为了培养敦煌学人才，早在 1953 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为唐史研究生开设了“敦煌文书研究”的课程，并有部分三年级学生选修；同年，兰州大学历史系也邀请段文杰、周丕显先生为该系进修班开设了“敦煌学”课程；八十年代初，项楚先生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敦煌文学”选修课，高国藩先生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敦煌民俗学”选修课。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基础上，1983 年敦煌学术讨论会期间，参加会议的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了有关高校开设“敦煌、吐鲁番学”课程的问题。大家认为，目前还不好在哪个大学开设敦煌、吐鲁番学专业，而应该广泛地做普及工作。尤其是地处西北的高校，更应做好普及工作。通过普及，使学生对“敦煌、吐鲁番学”的内涵、以及敦煌吐鲁番学与自己所学专业的密切关系有较深入的了解，从而为在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人才打下基础。

这次会议之后，一些高校，尤其是甘肃的高校，如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水师专、甘肃教育学院等，都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为了加强人才培养，在兰州大学建立了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博士点及硕士点；在西北师范大学建立了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硕士点。另外，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由朱雷、陈国灿、姜伯勤、荣新江教授招收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博士生；在四川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由项楚教授招收研究敦煌文献的博士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由张锡厚教授招收敦煌文学研究

方向的博士生；在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的汉语史专业，由张涌泉教授招收研究敦煌文献的博士生。

除了开设课程，招收硕士、博士生外，杭州大学、武汉大学还分别举办了几期研究班，对在职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

通过这些途径，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人才，尤其是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青年研究人员，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引起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瞩目。

现在，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已经扩展到三百多人以上，老一辈学者继续在努力工作，仍起着带头引路作用。中青年学者则大大增强了，尤其是中年学者，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代表了全国或国际先进水平；年轻后备军队伍也大有发展，并在老、中年学者的引导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原来研究队伍中的倒三角形状态已经改变。

圆援学术活动日益频繁

八十年代后敦煌学蓬勃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学术活动的频繁和对外联系的加强。现将主要的学术活动介绍如下：

敦煌文学座谈会：为了推动敦煌文学研究工作，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于 愿愿年 苑月 愿日至 愿月 缘日，在兰州和敦煌召开了敦煌文学座谈会。座谈会就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当前和今后的任务、应当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是我国敦煌文学乃至整个敦煌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学术盛会，对敦煌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会议收到的论文选编为《敦煌学论集》一书，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 愿愿年出版。

愿愿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我国敦煌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次盛会。由于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近三年的筹办，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共收到论文和资料共 愿缘篇，参加会议的 愿多位专家和学者，按照所提交的论文内容和

所从事的专业，分别编为历史、遗书、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六个小组，对收到的论文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已由敦煌文物研究所选编为《~~敦煌~~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二编四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敦煌~~年出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敦煌~~年~~元月~~月~~元~~—~~元~~日，在杭州召开了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会议就如何开创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等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收到的论文选编为《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一书，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唐史研究与教学座谈会：这次会议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与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于~~敦煌~~年~~元月~~月~~元~~—~~元~~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会议代表交流了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和唐史的研究与教学情况，商议了今后的发展规划，着重围绕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教学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敦煌~~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文化厅和新疆大学联合举办的“~~敦煌~~年全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于~~元月~~月~~元~~—~~元~~日在乌鲁木齐举行。这次会议是~~敦煌~~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共收到论文~~元~~篇，内容相当广泛丰富，有历史、考古、文献目录、民族、宗教、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方面。这次会议的主要特点是中青年学者增多，并提交了一批很有质量的论文，有的达到了世界水平；另一特点是首次邀请了日本、美国、印度等外国学者参加了会议，是中外学术交流的一个很好开端和尝试。会议收到的论文经过选编，已在《中国史研究》和《敦煌学辑刊》~~敦煌~~年第~~元~~期发表。

语言文学分会~~敦煌~~年年会：由语言文学分会、甘肃省社会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酒泉师范、酒泉教育学院、《阳关》编辑部和酒泉敦煌学学习研究会联合发起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 1982 年年会，于 1982 年 10 月 1—3 日在酒泉举行。会议就敦煌语言文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收到论文 100 多篇，已选编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为了交流学术成果，把国际敦煌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敦煌研究院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于 1983 年 10 月 1—3 日在敦煌学的故乡——莫高窟举行了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应邀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共 100 余人，其中有来自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原联邦德国、印度以及香港地区的学者。

会议收到学术论文 100 篇，由敦煌研究院编辑为《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分为《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两编，汉英两种版本，由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4 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 1984 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于 1984 年 10 月 1—3 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外来宾共 100 余人，分别来自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印度、瑞典、挪威、原联邦德国等。尤其值得一书的是，我国台湾省也有两名代表参加会议，致使海峡两岸学者沟通了信息，互相取长补短。长此下去，必定会促进我国敦煌学的大发展。

这次学术讨论会具有显明的特点：首先，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学术水平有了提高，如历史学方面王永兴对交采、和采的区分；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陈践、王尧对吐蕃职官制度的勾画；音乐舞蹈方面彭松对敦煌舞谱破解等等。其次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如姜伯勤用艺术遗存来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宗教问题；张鸿勋把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放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去考察；叶栋将敦煌曲与敦煌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等，都为敦煌学的研究

开拓了新领域。再次是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某些总结性成果，如李正宇对敦煌河渠泉泽的研究；荣新江对归义军的研究；赵和平对书仪卷子的研究；邓文宽对历书的研究等等。

会议共收到论文 140 篇，其内容涉及到历史、考古、文献目录、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宗教、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科技等各个方面。经学会选编，一部分作为《敦煌学辑刊》1985 年两期专号出版；另一部分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影印出版。

1985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敦煌研究院组织的“1985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8 月 1—5 日在莫高窟举行。这既是在敦煌学发祥地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盛会，也是甘肃省举办的“纪念丝绸之路 1400 年”活动的项目之一。

参加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共 140 余人，其中我国大陆和台湾 100 余人，其余来自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等地区和国家。他们之中既有 80 高龄的常书鸿、潘重规、藤枝晃等老先生，也有大量老、中、青年学者。讨论会分为石窟艺术、石窟考古、史地·遗书·宗教和语言·文学·民俗四个组进行了学术讨论，交流了学术成果，并对大家关注而有兴趣的莫高窟早期洞窟断代和敦煌地区宋代与西夏之间的回鹘政权进行了专题讨论。

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收到论文 140 余篇，在会上宣读了 80 篇。许多论文都很有质量，如在归义军和沙州回鹘的历史、敦煌早期洞窟的断代和敦煌的佛学研究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见解和成果。会议收到的论文，敦煌研究院选编为《1985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三册），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这次学术会议于 1985 年 8 月在北京房山举行。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日本、法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

等国的 愿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 苑篇。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北京图书馆举办的“敦煌遗书展”、房山云居寺及所藏石经等。论文选编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学术会议：由敦煌研究院、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和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国际学术会议，于 愿年 愿月在敦煌市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等 愿个国家和地区的 愿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了论文 愿余篇，内容涉及文物遗址的保护、环境监测、工程地质等问题。

敦煌遗书档案国际研讨会：由国家档案局、甘肃省档案局联合举办的敦煌遗书档案国际研讨会，于 愿年 愿月在敦煌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了会议。

愿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这次学术研讨会于 愿年 愿月在敦煌举行，来自中、美、日、英、俄、德、加、印、韩、瑞士、西班牙、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 愿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 愿多篇。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莫高窟、榆林窟、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敦煌研究院院庆五十周年成果展览等。会议论文已由敦煌研究院选编为《愿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四卷），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海峡两岸敦煌文学研讨会：由四川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海峡两岸敦煌文学研讨会”于 愿年 愿月在成都举行，中国大陆和台湾、澳门地区的 愿多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虽然这是一次专业性的研讨会，但它展示了成果，交流了看法，促进了海峡两岸学术界的联系。会议收到的论文，已由项楚教授主编为《敦煌文

学论集》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敦煌研究院、甘肃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协办的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于 1985年 8月在兰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印度、日本、韩国的学者约 150人出席了会议。

1986年中国敦煌学研讨会：由杭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敦煌学研讨会于 1986年 8月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包括台湾、澳门）、日本等国的七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浙江敦煌学研究成果展和王国维故居。

学术活动还包括中外交流，前苏联（俄罗斯）、韩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学者都曾来我国进行敦煌学学术交流。如 1985年 9月 8日至 10月 14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晃教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了敦煌学课程，全国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者也参加了听讲。这次讲课的记录已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整理编印为《敦煌学导论》；1985年前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孟列夫来中国学习，并到北京、敦煌、兰州等地进行了学术交流；1986年 8月，由金文经博士率领的韩国民间学术团体敦煌学代表团一行 15人来我国北京、西安、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在兰州期间，与兰州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进行了座谈，并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联系，推动敦煌学的研究。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文化发展及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国外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

中国学者也多次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艺术展览。如 1986年 9月，我国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法国巴黎举行了敦煌壁画展览，取得了巨大成绩，引起了国外中国学界、尤其是敦煌学界的高度重视。同时在法国国立科研中心敦煌文献研究组的主持下，中法敦煌学者联合举行了敦煌学讨论会。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史苇湘、李永宁、施萍亭四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并提交了高质量

的论文。中法学者讨论会的论文已汇编为《敦煌壁画与写本》一书在巴黎出版；~~1981年~~愿一愿月，第三十一届国际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会议在日本东京、京都举行，会议特设“敦煌吐鲁番研究组”，由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藤枝晃主持，我国武汉大学唐长孺、朱雷教授应邀赴会。这是我国敦煌学家首次赴国外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此后，我国学者赴国外或海外开会、讲学、考察、合作研究的国家和人数日益增多，反映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援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早在 ~~1956年~~愿年，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就已出现了复苏的苗头，这就是以王重民先生生前的校辑稿为基础而完成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署名“舒学”），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同时在《文物资料丛刊》上发表。紧接着，《文物》编辑部又约组了一批敦煌学稿件，在《文物》~~愿年~~愿期刊出。随后又创办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专门刊物，为逐渐增多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开辟了广阔的发表园地。

（员）资料的整理与刊布

目录乃学问之门径，文革后，许多单位都公布了各自所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除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外，秦明智《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和目录》^④，曹怀玉《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经卷录》^⑤，荣恩奇《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⑥，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⑦，刘国展、李桂英《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⑧，张玉范《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⑨，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藏敦煌经卷录》^⑩，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补录》^⑪，杨铭《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目录》^⑫，方广钊、徐永明《浙

江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⑤3}，方广钊、徐忆农《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⑤4}，方广钊、查永玲《浙江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⑤5}，邵惠莉、卿阁《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简介》^{⑤6}，方广钊《中国散藏敦煌遗书目录（一）》^{⑤7}等，都公布了各单位所藏的敦煌遗书目录，并作了简明的提要介绍。由于这些目录的编制者大都是本单位的研究或资料人员，有条件接触、翻阅、查检敦煌写卷，因此编制的目录比较完整、详细，提要说明也比较准确，基本上反映了各单位的收藏情况，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在论著目录方面，主要有刘进宝《敦煌学论著目录（1949—1999）》^{⑤8}和卢善焕、师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目录索引（1949—1999）》^{⑤9}。另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都有每年的论著目录，这些目录虽然各有优劣，但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信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在敦煌学目录研究方面，首推白化文、杨宝玉《敦煌学目录初探》^{⑥1}一书。该书由国内篇和国外篇两部分构成，其中国内篇对我国各个时期的敦煌目录工作进行了评述，重点讨论了《敦煌劫余录》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编制。国外篇对英、法、俄、日各国的敦煌目录工作进行了探讨，并对国外所出藏文文书和艺术品目录作了简介。是目前惟一的一部敦煌学目录著作，是敦煌目录编制及其研究的一大成果。

另外，荣新江《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 编写刍议》^{⑥1}，指出了敦煌学目录编制的缺点，即体例不一、收录不全、缺少考证、辨伪不精。因此建议立即着手编纂《中国所藏敦煌写本联合目录》。师勤《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宝藏 校补》^{⑥2}对两书进行了互校，是敦煌目录的基础性工作，对研究者很有参考价值。郭锋《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的一个综合统计》^{⑥3}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和总结个人欧洲访书见闻，认为敦煌遗书的总数

为源四四余件。方广锠《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⑦是了解北京图书馆藏卷的最新、最重要文章，向学界公布了一些前所未闻的重要情况，很值得一读。

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于敦煌吐鲁番学来说，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敦煌吐鲁番学者就非常重视资料的整理与刊布。

在以往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更重视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其特征是一方面继续向纵深的专门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总括性的大部头资料集不断问世，交相辉映，愈推愈密。如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⑧，校辑整理出王梵志诗猿元首，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的出版是敦煌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的可喜收获。在此基础上，项楚又搜集了一些新发现和公布的资料，并作了精细校注，完成了《王梵志诗校注》^⑨一书，使王梵志诗的整理、研究更趋完善；任半塘（任二北）在《敦煌曲校录》的基础上，又不断搜集整理，编著了员四多万字的《敦煌歌辞总编》，于员四九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辞猿四四首，是目前所见收辞最多、品种最全、范围最广的歌辞总编，体现了半个多世纪敦煌歌辞的研究成果。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⑩，收录了《敦煌变文集》出版后新发现的变文猿篇，既有录文，又有原件照片，后面还附有俗字表，是近年敦煌变文整理刊布的新成果；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⑪是敦煌变文校注方面的集大成著作；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⑫是国内外关于敦煌莫高窟研究的最全面、最实用的权威性总录。它收录的洞窟齐全，内容完整，体例统一，定名和断代都比较合理，并编制有索引以备查检，使用方便。在此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又重编为《敦煌石窟内容总

录》^⑧，内容包括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敦煌研究院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⑨收录了今人所见的所有汉文题记。它除了注明洞窟的时代外，还在不同时代的题记之前，详细说明每条题记的文体类别、所在位置、题写形式、地色、尺寸及资料来源等。书后列有别体字简表，并附有莫高窟供养人姓名索引。该书可视为《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姊妹篇。它们的出版，使莫高窟资料的整理逐渐趋于完备，是几十年来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刊布的重要成果。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⑩是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整理、刊布的集大成著作。编者从英、法、俄、日等国及我国收藏的敦煌文献中，将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辑出，按类编排，分成五辑，用原件的照片与录文对照，兼附前人研究原件的论著出处，图文并茂，极便于敦煌学者之利用。徐自强、李富华等编的《敦煌大藏经》^⑪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佛经写本为主，并补充英、法等国已公布的资料。全书按《开元释教录》的顺序，校勘记说明收录写本与《中华大藏经》、《大正藏》的互见情况。全书共 近四万余字，近 4 册。前 3 册为汉文佛典，后 1 册为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吐蕃文等佛教典籍，另有一册“敦煌大藏经总目录”，附于全书之末。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早已流散在世界各地，其中北京、巴黎、伦敦、圣彼得堡为四大收藏中心。如何将其公开出版，尤其是在敦煌学的故乡——中国影印出版，则是国际敦煌学界的一件大事。为此，中国学术界作了积极努力，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两方四家，在伦敦议定合作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以下简称《文献》）。《文献》为

愿开本，从 1954 年开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15 卷，现已出版 15 卷，其中第 1—15 卷收英国图书馆已公布写本中全部汉文非佛经文书。第 16—18 卷则首次刊布了该馆所藏 20 世纪 10 年代至 1949 年之间的非佛教文书；英国博物馆东方古物部所藏敦煌写本、敦煌绢纸绘画上的供养人题名题记；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汉文佛经以外的文书。该书图版均据原件拍摄，清晰可辨，照片附比例尺，可显示原文书尺寸规格。正在编辑出版的第 19 卷为全书总目并编有多种索引。

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即将全部面世之际，俄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3 年 10 月中旬，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团访问了前苏联，与前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就合作出版藏于列宁格勒的中国敦煌、吐鲁番与黑城文献进行了会谈。随后，前苏联有关方面又到上海进行了访问商谈。1954 年夏，双方达成协议，合作影印出版藏于列宁格勒的全部敦煌、吐鲁番与黑城文献。目前，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的多年筹划合作，作为《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重要组成部分的《俄藏敦煌文献》已从 1954 年开始出版。该书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写本的大型完整图录集。书前有孟列夫撰《前言》，对俄藏敦煌文献有概括介绍。每册前还有彩色图版若干，展示最有价值和朱笔较多的文献。共有 100 册，目前已出版 15 余册。

在《俄藏敦煌文献》的出版过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积极联系，与法国国立图书馆合编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作为《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80 年开始出版。全书包括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全部汉文和非汉文敦煌西域文献的图版，补拍以前出版物中的缺号卷子和模糊不清的照片，并给予新的定名，目前已出版了 15 多册。

为了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尽快整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制定了规模宏大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出版规划。该《集成》既包括俄、法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也包括国内各单位及私人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已经出版，其他各单位的收藏也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从已出各辑《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可知，其有如下特点：

第一，相对完备。尽力搜求、辑集，将敦煌地区出现的各种文字资料和艺术资料，尽可能完整地反映出来，使其成为一部总汇式的集成文献。

第二，力求存真。敦煌吐鲁番文书具有文献和文物两重价值，这就要求对文献的印制必须逼真，其大小、长短、形状、色彩、字迹、残损自不必说，即使是纸质、卷轴、包封等也不宜忽略。

第三，定名准确。

第四、编排合理。由于本集成是一套大型的资料用书，中心目的是给学术界提供一份全面可信的原始资料，因而，文字部分如前言、凡例、目录、题解、索引等等，均需说明性质，意在方便使用；图版部分则按序排列，重在实用，兼及欣赏。做到图文结合，以发挥资料用书的最佳效果。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已出《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各册，在文献定名、分类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如《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一书，其编纂者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和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由于没有吸收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专门研究者参加，其编纂工作就出现了一些定名分类错误，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完全采用，有些已被近年的研究成果所否定的旧说也在文献中偶有出现。为了弥补以上失误，上海古籍出版社采纳学术界意见，已吸收了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专门

研究者，参加编纂工作。这样，必将使《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更加完善，质量更加提高。

除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外，由国家图书馆（前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也开始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敦煌遗书约 员圆园园 余号，包括四个部分：（员）劫余录部分，即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所著录的部分，计 愿愿 号。（圆）详目续编部分。员圆园 年前后，从解京的敦煌遗书中又整理出 员圆园 号比较完整的遗书，定名为《敦煌石窟写经详目续编》。（猿）残卷部分。解京的敦煌遗书经过上述两次整理编目的残存部分，总计近 源圆园 号。（源）新字号部分。指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外，图书馆于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收藏的敦煌遗书。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包括以上四个部分，并全部重新拍摄。拍摄所据的原件，已经过专家进一步修复整理，未经修复时所制缩微胶卷中存在的遗书背面漏拍，以及首尾残破，皱折叠压或墨迹深浅不一，难以辨认等问题，得以避免。从而使本书的图版更加完整、清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 愿开本，每册约 源圆页，在正文图版之后，编有叙录，新旧编码对照表等，全套约 员圆园 册，现已出版 缘册，其余部分将陆续推出。

此外，《甘肃藏敦煌文献》也已由甘肃藏敦煌文献编委会、甘肃省文物局等单位编纂完毕，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甘肃藏敦煌文献》全面系统地刊布了甘肃全省各单位收藏的敦煌遗书 苑圆 余号，真实完整地展示了甘藏敦煌文献的全貌。

《甘肃藏敦煌文献》共 远卷，第 员卷为《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上）》；第 圆卷为《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下）》和《酒泉市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 猿卷包括《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文

献》、《西北师范大学藏敦煌文献》、《永登县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中医学院藏敦煌文献》和《张掖市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源卷为《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第缘卷为《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下）》；第远卷包括《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定西县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和《高台县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在各地刊布敦煌原卷图版的良好基础上，敦煌文献的整理更趋于专精，即分类校注。这一方面的典范当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该《丛刊》由周绍良主编，共源卷源册，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员怨缘—员怨愿年出版。即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辑校》，张锡厚《敦煌赋汇》，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方广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王素、李方《敦煌 论语集解 校证》，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

《丛刊》所收每篇文献基本包括四项内容，即定性、定名、定年；原件录文；题解或说明；校勘记。每辑之后附有“主要论著参考书目”和该辑所用敦煌文献“卷号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丛刊》每辑的校录者，都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专家（起码也是他校辑的这一方面的专家），是国内从事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如敦煌天文历法文献的整理研究，既属于天文学史的内容，又需要敦煌文献和隋唐五代史的专业素养，因此国际上能够全面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极少。而《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的作者邓文宽先生，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至北京天文台古天文组工作。其后又在北京大学师从张广达、王永兴先生学习敦煌文献与隋唐五代史，员怨愿年获硕士学位后，即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今中国文物研究所）从事敦煌天文历法文献的研究，已发

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正是由于邓文宽先生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和学术素养，自然是承担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丛刊》其他各辑的作者也大致如此，从而也就保证了辑校工作的质量。

正在进行的《敦煌文献合集》，则是以专精和全面相结合的一项工程。《敦煌文献合集》由杭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持，拟全部校录敦煌汉文卷子中的所有非佛经内容，即经（包括小学，即语言文字学）、史（包括社会经济文书）、子（包括禅宗语录、天文历法、医卜星相等）、集（包括变文、愿文、忏悔文等成篇的文章），不仅收录传统的经史子集内容，还分别把敦煌文献中十分繁杂的内容归入经、史、子、集四大类中，每一大类再分若干小类，以便读者集中阅读。

（圆）研究更趋深入，高质量成果不断问世

敦煌学蓬勃发展的另一标志，便是大批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问世，尤其是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之《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武汉大学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及《二编》，厦门大学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以及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姜亮夫《莫高窟年表》，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概论》，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以及《敦煌吐鲁番研究》（年刊，已出四卷），荣新江主编《唐研

究》(年刊,已出五卷)等,都是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代表了敦煌学研究的国际水平。

在专题研究方面,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在石窟艺术、语言文学和传统的四部书研究方面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代表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就是在以前研究相当薄弱的某些方面,如经济、宗教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下面仅以经济方面的研究为例,略加叙述。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五代社会经济是治唐史的重点。由于均田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唐史学界最关注的课题之一。尤其是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一批有关田制的实证材料,使均田制的研究更趋活跃。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均田制新探》^⑧,该书侧重于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实证材料,同时也尽量发掘传世的文献资料,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对均田制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实施状况进行了细致探讨,是近年来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均田制的代表性成果,很值得史学界重视。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⑨和武建国《均田制研究》^⑩两部专著,也运用敦煌文书,对均田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自的独到见解。

除以上三部专著外,还发表了大批的论文,其中邓文宽《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⑪一文,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的关系。宋家钰《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问题研究》^⑫,引用史籍记载结合敦煌资料,对唐代户籍登记土地的原因和作用、户籍所载土地的来源、公田和私田、永业田和口分田等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⑬指出,贵族品官受永业田制和百亩之田——应受田、已受田制都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两类私田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表现为,在

每一户原有土地基础上，封建国家收取退田和补给欠田。杨际平《列宁格勒所藏天宝年间敦煌田簿研究》^⑩通过对俄藏有关田簿的探讨，指出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下的土地还授并未正常进行。韩国磐《唐代籍帐残卷证明唐代造籍均田之勤》^⑪，论证了唐代前期施行均田制时编造籍帐之勤。指出唐代户籍、土地和租庸调制互为因果，唐前期编造籍帐之勤，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实行均田制的努力。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一些独特的记载，与均田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敦煌户籍残卷中存在许多有关“自田”的记载，尤其是在各户分段登记土地的四至中，“东自田”、“西自田”、“北自田”、“南自田”的记载更多。在这里，“自田”的含义是什么？日本学者较早的看法是：“自田”系指户主的另外一段受田，因二段受田相邻，故互为自田。自从五十年代西川正夫发表《关于敦煌发现的唐代户籍残卷所见“自田”》^⑫一文，提出“自田”是均田制范围以外本户户主的私有土地这一论点以后，争论就展开了。

韩国磐《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文件中略谈有关唐代均田制的几个问题》^⑬一文认为，这些“自田”的意义，可能即指自己另一段的已受田，因彼此挨邻，在登记国家受地时彼此得到反映。对此，侯绍庄《“自田”考释》^⑭一文提出了相反意见。他认为，唐代敦煌户籍残卷中的“自田”，并不指各段受田彼此间的关系，而是指均田外归各户所有的私田。这些私田只是由于同政府受地相邻，在乡里登记受地时得到反映，其他因与受地不相挨邻，没有反映出来的应该更多。所以，均田制的范围，并不包括这些属于个人所有的私地，仅仅是国家直接控制的那部分官田。这种归个人所有的私地，虽无法得知其具体数量，但比起国家掌握的官地肯定要多得多。杨际平《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⑮一文，通过对敦煌户籍资料所载各户田亩四至，各户

相互间田亩相邻情况的考察，也得出了与侯绍庄相似的结论，认为敦煌户籍田亩四至中的所谓“自田”，多数表现为确有私田的存在。并认为均田制下存在独立于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田，唐代法律上也承认私田的存在。胡如雷《也说“自田”兼论与唐代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⑧一文，通过大量的敦煌资料和有关史籍，并以列表统计的方式，详细研究了敦煌户籍残卷上“自田”的情况后指出，“自田”全是均田制范围以外的私田。

对此，朱雷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⑨一文中，运用综合研究的方式，即不仅将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相结合，而且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史籍文献相结合，从而指出，在均田制的实施过程中，并不触动旧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即或是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也不曾触动，手实、户籍中有关已受土地的登录，既包括通过均田令授予的土地，也登录了个人的私有土地。因此，唐代户籍中所记录的已受田数，应是该户所有的土地数，并不存在户籍中的已受田是通过均田令所授予，而个人私有土地则另行登录的现象。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相邻一块为“自田”却又往往找不到时，其原因可能有三：（员）记载错误；（圆）记载原无误，但与之相邻之一侧，未必只是一户，但原则照例只记一户，因而难于找到；（猿）那就因为土地田亩每段未必形成规整如一，因有多种形状，故亦难于作图表示。

虽然目前还不能说这就是定论，但将文书与史籍相结合，比单独利用文书，就相对地站在了一个更高的点上，给我们以更进一步的启发。

在财政制度研究方面，杨际平《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吐蕃时期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研究》^⑩一文，以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汉文卷子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会计史上由“入减出等余”的三柱结算法向“旧管、新收、支出、结余”四柱结

算法发展演变的情况，认为《吐蕃巳年（公元 783 年）七月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是我国现存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韩国磐《也谈四柱结算法》^⑨主要研究了五代时期有关四柱结帐法的敦煌文书，与前述杨际平文互相补充。唐耕耦《乙巳年（公元 855 年）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稿残卷试释》^⑩指出，所谓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类似现在的收支决算报告，综合而具体地记载了一年或二、三年的收入和支出以及现在数，是为了向有关部门报告而编制的收支决算书。唐耕耦《北图新一四四六号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⑪拼合、校注、公布了北京图书馆新编 1446 号残卷，并从另一角度探讨了会计史上四柱结算法的有关情况。

关于唐代的籍帐、手实制度，宋家钰《唐代手实初探》^⑫一文，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史籍文献，详细探讨了唐代手实的内容和特征，即手实均以户主名义呈报，其主要内容是家口、年纪和田地。户主在手实上要保证所报内容属实，出土手实文书的末尾大都有“若后虚妄，求受重罪”，“如后有人纠告，隐漏一口，求受违敕之罪”一类的保证词。民户的手实，均是官方按户籍法规定的时期责令民户申报，由里正收集。申报时间，一般与造籍的年月一致，因为手实是为造户籍而报的。朱雷《唐代“手实”制度杂识》^⑬指出，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手实由各户户主申报，而里正等胥吏在制定过程中，也起很大作用，但手实并非由户主任意申报，而首先取决于“团貌”，“团貌”后制定“簿”，“以付手实”。

朱雷《唐“籍坊”考》^⑭一文，在日本学者池田温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的“籍坊”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籍坊”是保存户籍的机构，同时还具有记载、调查、核对户籍等事项的职能。在《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吐鲁番、敦煌两地出土“点籍样”文书的考察》^⑮一文中，朱雷先生指出，“点籍”制度是唐代传统的、制度化的管理户籍办法之外的一种临时性的检籍措施，

它可能始于武周圣历年间，并针对“点籍样”一名，详细论证了史籍上的“输籍定样”、“明堂图样”、“钱样”等例中的“样”，即式样、标准，“点”为“简点”及“检点”，乃检查核对之意。点籍样为点籍之标准。并进而研究了点籍样与户籍之密切关系，认为“点籍样”应是对户籍进行简点之后所作出的定簿。陈国灿《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⑩和《吐鲁番旧出武周勘检田籍簿考释》^⑪两文，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其目的就在于检查各类籍外占田和对客户田土的荫庇，使土地所出，利归官府，而不致流入私家。

总之，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总结性或突破性的成果，如段文杰对莫高窟艺术的研究，张广达对于阗的研究，王永兴对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宁可、郝春文对社邑文书的研究，朱雷对计帐制的研究，施萍婷对文献目录的编制，周一良、赵和平对书仪卷子的研究，周绍良对变文的研究，贺世哲对供养人题记的研究，姜伯勤对寺户的研究，郭在贻、项楚、张涌泉、黄征、许建平对语言校勘的研究，陈国灿对文书的缀合整理，白化文对目录学的研究，张锡厚对唐集的研究，柴剑虹对舞谱的整理与研究，李正宇对敦煌史地的研究，郝春文对僧人生活的研究，叶栋、席臻贯对曲谱的破译，邓文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张鸿勋对讲唱文学的研究，荣新江对归义军史和文献目录的研究，黄盛璋对地理文书的研究，方广锬对佛经目录的研究，王尧、陈践对吐蕃文书的研究，马德对莫高窟史的研究，谭蝉雪、高国藩对民俗的研究，程喜霖对烽堠和过所的研究，刘俊文对法制文书的研究，等等，都是自成体系，并已经发表了系列或总结性研究成果，有些甚至代表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獭）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

综上所述，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许多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不可讳言，仍存在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加强。

第一，尽快编出《中国敦煌遗书联合目录》

由于敦煌遗书收藏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及高等院校，因此目前还很难比较详细、确切地说明具体收藏单位和数量。就是国内的收藏情况，虽然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西北师大历史系、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西北师大敦煌所等单位已公布了有关收藏情况，但许多单位和个人还秘而不宣。目前的迫切课题，应是呼吁各收藏单位及个人尽快公布收藏情况，然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联合攻关，编出《中国敦煌遗书联合目录》，摸清家底，以推动敦煌学的发展。

第二，加强信息联络工作

信息是一切学术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对于新兴的敦煌学来说更是如此。目前应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学术团体及学者的联系，以便相互交流，了解各自的研究现状与计划，以免花费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国内各单位及学者之间也应加强联络，互通信息。由于目前各单位科研经费都比较紧张，出差开会、查阅资料等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鉴于这种情况，应着重办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力争每年多出几期，及时发行，使其真正起到“通讯”的作用，成为敦煌学研究者了解信息和互相联络的纽带。

在办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的基础上，积极创办《敦煌学研究年鉴》，编著《敦煌学研究备览》等集资料、信息、学术为一体的工具书。

第三，加强宣传、普及工作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但有一点却与其“显学”的地位不相适应，即专门研究者以外的文学、史学、艺术工作者和文科研究生、大学生等，都对敦煌学比较陌生，更不要说一般群众了。

因此，目前应加强敦煌学的宣传、普及工作，编著通俗性的普及读物，报纸杂志开辟专栏，使敦煌学尽快从学术界走向全社会。

第四，加强敦煌学评论工作

学术研究总是不断继往开来、向前发展的。在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学者们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主客观条件，如治学经验、写作态度、学术基础、资料占有等方面的局限，因而也就难免在各自的研究论著中若隐若现、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来。因此，就需要加强真正的敦煌学评论工作。这种评论不应当是同仁、师生之间的吹捧，也不应是不同学术观点和派别之间各守门户。而应当是建立在求实、求真、信任、理解的基础上，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高屋建瓴的眼光对研究工作进行褒善扬长、纠偏指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指导和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并进而使敦煌学研究走向更加理论化和成熟化。

五、台港地区的敦煌学

五十年来，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敦煌学教学与人才培养

早在六十年代，台湾的一些高校就开设了敦煌学课程。1962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首先开设“敦煌艺术”。1965年，台北政治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所，也开设了“敦煌变文研究”。随后，许多大学都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就从事培养专门研究敦煌学的硕士和博士。现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的罗宗涛教授，就是1962—1964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其毕业论文为《敦煌讲经变文研究》，1965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邱镇京是六十年代末中

国文化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其论文题目为《敦煌变文研究》，~~198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改名为《敦煌变文述论》出版，由高明教授指导。另一硕士研究生为徐矗明，论文题目是《敦煌壁画研究》，由苏莹辉、罗寄梅两位教授指导。

以上台湾地区的敦煌学教学情况，仅仅是昙花一现。台湾地区有计划地敦煌学教学工作始于 ~~1984~~ 年代。~~1984~~ 年，潘重规教授应张其昀先生之聘，回台北任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研究所所长后，才积极倡导敦煌学教学与研究。~~1984~~ 年，首先在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开设“敦煌学研究”课程，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潘先生即在开场白中说：“正常的课程，是餐厅挂牌的名菜；敦煌学就像一从未列入正式菜单的课程，只能说是一群好事之徒，登山涉水，在荒凉的原野中，临时张罗的野餐。这份野餐，可能是粗劣而不堪入口的，但也可能是从未尝到的奇珍异味”。在当时那种既无教材，又乏材料的拓荒期，经过潘重规先生的积极努力，不仅将中国文化大学充实为一研究敦煌学的园地，而且也开创了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⑩

目前，台湾敦煌学界的泰斗就是潘重规先生。潘先生字石禅，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东北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教授。~~1984~~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 ~~1984~~ 年开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兼中文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其敦煌学著作主要有：《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云谣集新书》、《龙龕手鑑新编》等十多种及论文八十多篇。^⑪

潘先生除了在自己的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外，对敦煌学的贡献，值得一书的还有两事：一是创办了《敦煌学》杂志。《敦煌学》于 ~~1984~~ 年由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创办，为不定期刊物。从 ~~1984~~ 年第 ~~1~~ 期开始，改由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敦煌学会主办，现由台湾嘉义中正大学敦煌学会负责。《敦煌学》现已出版

圆期，主要刊登台湾、香港地区及部分海外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侧重于敦煌文献研究。近年来，由于海峡两岸敦煌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敦煌学》杂志也刊登一些大陆学者的论文。另外，该刊每期后面附载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提供了大量信息，值得参考。

另一是培养了大批学者。目前活跃于台湾敦煌学界的学者，如郑阿财、林聪明、王三庆、朱凤玉等，都是潘重规先生培养的博士生，一些更年青的研究者，也都是由潘先生的这些学生培养的。

郑阿财生于 1936 年，1959 年毕业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1961 年在校获硕士学位，1964 年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中兴大学，从 1968 年起任嘉义中正大学教授，论著有《敦煌孝道文学研究》、《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敦煌文献与文学》等，并负责《敦煌学》刊物的编辑工作。

林聪明生于 1935 年，1958 年毕业于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系，1960 年在校获硕士学位，1963 年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东吴大学，从 1968 年起任逢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论著有《敦煌俗文学研究》、《敦煌文书学》等。他主编的《敦煌学导论丛刊》及《敦煌丛刊二集》在敦煌学界影响较大，尤其在两岸敦煌学的交流方面起了桥梁作用。

王三庆生于 1933 年，毕业于台北中国文化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现任成功大学教授。论著有《敦煌类书》、《敦煌古本类书 语对 研究》等。

朱凤玉生于 1933 年，1956 年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1959 年在校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台湾德明商专、中国文化大学，从 1969 年起任教于嘉义师范学院，论著有《王梵志诗研究》、《敦煌写本碎金研究》等。

1985 年，为纪念潘重规先生九十寿辰，由潘先生的高足郑

阿财、王三庆等发起，在海内外广泛征集论文，编为《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由文津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收入了柳存仁、陈祚龙、吴其昱、冉云华、苏莹辉、邱燮友、金荣华、高明士及大陆学者程毅中、白化文、李正宇、张鸿勋、冯志文、高国藩、张锡厚、柴剑虹、赵和平、邓文宽、荣新江、张涌泉、郝春文、马德、杨富学、刘进宝等人的论文共 160 篇，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台湾敦煌学研究的重心在文学方面，这主要是因为潘先生是从事语言文学研究的，他培养的学生当然也是以研究语言文学见长。由此可见，一个人，尤其是一位学术大师，可以带动一门学科的发展。

台湾地区另一敦煌学大家是苏莹辉先生。苏先生 1924 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6 年到莫高窟工作，抗战胜利后任职南京中央图书馆。1950 年去台湾后任职于台北中央博物馆，1951 年至 1953 年任马来西亚大学汉学系教授。从 1954 年起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顾问。他出版了许多敦煌学论著，如《敦煌学概要》、《敦煌论集》、《敦煌论集续编》、《敦煌文史艺术论丛》、《瓜沙史事丛考》等。

台湾从史学角度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很少，除苏莹辉先生外，主要是高明士教授。高明士生于 1924 年，1946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1 年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明士教授以隋唐史研究而著称，除著有隋唐史论著外，还发表了《唐代敦煌的教育》、《试释唐永徽职员令残卷的试经规定》、《从英藏悦王团扇补亡律断片论唐贞观捕亡律之存在问题》等。由其主编的《隋唐文化研究丛书·历史篇》4 册，已由文津出版社于 1989 年推出。包括《通鉴及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章群）、《隋代政治与对外政策》（刘健明）、《唐代贡举制度》（高明士）、《隋唐时期农业》（张泽咸）、《唐代人物与政

治》(王寿南)、《唐代宰相与政治》(王吉林)、《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韩国磐)、《唐代的经济社会》(陈国灿)、《唐代法制研究》(刘俊文)、《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邱添生)。

除以上介绍外,中正大学的谢海平、蔡荣婷、林仁昱、洪艺芳,台湾铭传管理学院的汪娟,高雄师范大学的王忠林等,也在敦煌学方面发表了一些论著,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现在台湾许多大学都招收有关敦煌学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从而培养了一大批敦煌学研究者。

圆缘研究机构及学术活动

台湾的敦煌学研究中心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员愿年,在张晓峰先生的积极倡导下,设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并提出了下列计划:敦煌文库;敦煌画室;敦煌展览;编印敦煌丛书;编印敦煌学报;复印敦煌图片。员愿年,中文研究所成立了一个敦煌学会,由潘重规和金荣华领衔为指导教授,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邀请国内外专家举行敦煌学报告及座谈会,如吴其昱、苏莹辉、日本的金冈照光等都曾应邀到会讲学;购置了斯坦因和伯希和两套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敦煌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从事整理资料和理论研究工作。

八十年代以来,台港地区举办了几次很有影响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如员愿年愿月员猿日,由台湾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研究中心主持举办了“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法、日、美、澳、韩、香港及台湾学者 远人,由法国科研中心教授吴其昱、陈祚龙、东京大学教授金冈照光分别担任主持人,主讲者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韩国檀国大学教授金荣华、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黄永武、文化大学教授潘重规、师大教授邱燮友等。会议共收到论文 猿篇,全部由《汉学研究》

1991年 源卷 1期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发表。其中一些很有特色，如吴其昱的《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对苏藏敦煌写本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黄永武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一文，谈了他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的情况；林聪明的《敦煌汉文文书解读要点试论》一文，对敦煌写本的外形、内容等都作了详细探讨。会议还展出了台湾收藏的 140余卷敦煌写本。

1991年 远月 15—16日，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协助，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在香港联合举办了“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学者共 14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其中中国大陆学者 100人，如季羨林、段文杰、周一良、周绍良、宁可、王兴兴、朱雷、姜伯勤等；台湾学者 10人，即潘重规、黄永武、苏莹辉、林聪明；香港 10人，即饶宗颐、王静芬、时学颜。这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敦煌学者的第一次聚会，相互沟通了信息，交流了成果，对推动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

远月 15日上午，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会议厅举行了开幕式，由中文大学校长马临博士主持，中国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羨林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饶宗颐分别致辞。

会议共收到论文 140篇，已选编为《敦煌文薈》上册（饶宗颐主编），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于 1992年出版。有些论文很有特色，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的《敦煌吐鲁番学的意义》、周绍良的《敦煌文学概论》、林聪明的《丹麦哥本哈根藏敦煌文书概况》、日本池田温的《1909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朱雷的《唐代的“乡帐”与“计帐”制度研究》、宁可的《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法国远东学院戴仁的《散藏于欧

洲图书馆之中亚出土汉文抄本及版刻本》等。

为配合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上海博物馆还联合举办了“敦煌吐鲁番文物展览”，展品共 猿园件，其中 猿园件为上海博物馆藏品，苑件为香港各界藏品。

员怨愿年 苑月，由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主办，汉学研究中心协办，在台北召开了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台湾、香港地区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前苏联等国的学者，如柳存仁、竺沙雅章、车柱环、饶宗颐、潘重规、苏莹辉、金荣华、孟列夫、陈祚龙、吴其昱等。会议宣读论文 猿园篇，内容涉及世界各地敦煌文献收藏及研究状况、儒学、宗教、壁画、语言文字等方面。其中的大部分论文编为《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汉学研究中心于 员怨愿年出版。

员怨愿年 猿月，由中正大学中文系主办，在嘉义召开了“全国敦煌学研讨会”，参加会议者主要是台湾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且以嘉义中正大学为中心，以语言文学研究为主，会议共收到论文 员万篇，由中正大学中文系编为《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发行。

员怨愿年 愿月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十四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设有敦煌学组，由饶宗颐教授主持。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及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丹麦等国的 圆缘位学者提交了论文，内容涉及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敦煌写本新资料的介绍，利用敦煌写本研究唐史、民俗、语言、佛教、石窟艺术等方面。

此外，台湾的 员怨愿年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研讨会，员怨愿年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研讨会，员怨愿年第三届国际唐代学术研讨会，员怨愿年第四届国际唐代学术研讨会均设有敦煌组。

獭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

台湾地区收藏的敦煌文书不多，现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獭件，编为獭源号，其来源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从北平、上海等地收购的，已确知者有许承尧、袁克文、张继等人的旧藏，獭源年设在南京的中央图书馆迁台时运到台湾的。这批文书除獭源为吐蕃文佛经外，其余均为汉文写本。内容除獭源为道经外，其他都是佛教经典、文书。写本中有题记的獭源件，其中有年代的獭源件。关于这批文书的具体情况，潘重规先生《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①有详细著录。獭源年台北石门图书公司出版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将写本全部影印刊出。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有獭源余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有少量卷子。另外，台湾私人收藏敦煌卷子的有吴兴蒋谷孙、上虞丁念先、敦煌窦景椿、长沙罗寄梅、南海黄君璧数人，但数量不多。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些材料可知，我国台湾省藏敦煌遗书约獭源余卷。香港则基本上没有。

台港地区的敦煌学论文，除了主要在《敦煌学》上发表外，台北出版的《大陆杂志》也是刊载台港地区敦煌学论文的主要园地。另外，台湾出版的《学术季刊》、《民主中国》、《文史哲学报》、《考铨月刊》、《幼狮学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香港出版的《新亚学报》、《东方文化》等刊物，也发表有关敦煌学的文章。

在文献目录整理方面，首推潘重规、金荣华主编的《伦敦藏汉文敦煌卷子目录提要》。这部工具书由张其昀教授拨獭源万元（台币）专款作为经费，从獭源年獭源月至獭源年獭源月完成了初稿，随后又编了索引。

该《目录提要》是在翟理斯、刘铭恕二目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编排体例依据《四库全书提要》，以写卷内容分为经、史、

子、集四部，其中佛经因卷帙浩繁，依佛教《大藏经》的目次，另成一类，置于最后。

其著录方式，首列书名、卷数、作者、斯氏编号；其次为翟目所录原卷之长度、纸色；再次标明写卷内容之完整或残缺。然后为卷中文字之起句、讫句及其卷中题记，并作必要的说明。如果同一卷中还有其他资料，也都一一注明。最后附有人名、地名、寺名、年号、非汉文卷子等索引，从各种角度提供了有关资料，以便学界利用。

另外，黄永武编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一书也很有特色。该书以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为基础，并补充了《总目索引》出版后的一些新发现，如补充了杂₂₂卷号以后₂₂卷号敦煌无名断片新标目和₂₂卷号以后的新目录。此外还补充了苏联和日本的敦煌写本目录。黄永武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一文中说：“孟列夫氏之目录二册，出版于西元₁₉₂₆及₁₉₂₇年，较王书为晚出，固非王氏所及见，今特译为中文，一并补入《敦煌遗书最新目录》。至于王书散录中所列中央图书馆藏卷目录，现‘敦煌卷子’已印出，亦可覆实对勘。尚有日本大学所藏目录，亦已印成正续二册，与王书散录不同，均予校订，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中之缺憾，补正而完美。”

除了以上工具书外，潘重规教授主持的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还出版了两种刊物，即《敦煌学丛刊》和《敦煌学》。《敦煌学丛刊》已出三部：《敦煌俗字谱》、《敦煌俗字索引》、《龙龕手镜新编》。《敦煌学》原由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主编，从第₁辑（₁₉₅₄年₁₂月）起，改由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敦煌学会主编，现在主要由嘉义中正大学的郑阿财教授主持。

愿年代以来台湾敦煌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敦煌宝藏》和《敦煌丛刊初集》的编辑出版。

《敦煌宝藏》从₁₉₅₄年开始编辑，由黄永武主编，新文丰出

版公司于 1980—1982 年陆续出版。从黄永武教授的编辑例言可知，“本书编集之资料范围，是拟将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卷子之微卷摄影图片约 10 万张，及画本、刺绣、壁画、塑像等图片千余帧，尽量收集，细心汇编成书。”为使所收资料真实，“凡摹本均不收列，损泐不清处，为保存原貌，不旁注，不校改。”其取材范围，“先以敦煌所藏汉文写本刻本为主，汉文写本间偶有非汉文资料，则一并附存。有关绘本、幢幡、壁画、塑像等美术品附载于各册之前，另行编号，以备参检。”该书的编排顺序，则“依搜集敦煌微卷之先后为序，英、法、中在前，其他各国在后，各卷子之次序，仍沿用斯坦因、伯希和之编号，此编号已为国际通用，故不归类重编。”至于北京所藏卷子，“则沿用《敦煌劫余录》所著录之体例，按经归类，按品次第，一仍旧贯，以便查检，其余则依所出版目录为顺序。”

《敦煌宝藏》共 10 册，每 1 册为一辑。其中第 1 册为斯坦因劫经录，即 杂 1—杂 200 号；第 2 册为北京图书馆藏卷，即北图 1—愿 100 号；第 3 册为伯希和劫经录，即 孕 1—孕 200 号；第 4 册为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撰之散录，即散 1—愿 100 号；第 5 册亦为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撰之欣赏篇，即 孕 1—孕 200 号，又苏联列宁格勒藏 1—愿 100 号。

《敦煌宝藏》工程浩大，收录齐全，是敦煌遗书发现后的第一次最全面整理，对推动敦煌学研究有着极大的作用。遗憾的是，该书未收汉文以外的卷子。黄永武教授曾在序言中说：“至于吐蕃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希伯莱文等资料，待汉文资料编成后，再斟酌辑印。”目前，汉文资料已出版十余年了，还未见其他民族文字的写卷材料问世，我们希望尽快编印汉文以外的敦煌资料，以适应国际敦煌学大发展的需要。

在《敦煌宝藏》编辑结束，正在陆续出版之际，黄永武教授

在新文丰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赞助下，又编辑了一套大型敦煌学研究丛书——《敦煌丛刊初集》，于 1983 年 12 月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敦煌丛刊初集》的编辑缘起及目的，正如该书的出版说明所说：“敦煌资料之研究，乃当今国际汉学界之显学，随着本公司《敦煌宝藏》之辑印，更掀起广泛研究之热潮。非仅各方学术会议恒以敦煌学为重点，而各大学之纷纷开设‘敦煌学’课程，尤为目下已蔚成之风尚。本公司为迎合潮流所趋，提供研究所需，促进文化复兴，特编辑民国以来中外重要之敦煌学工具书或经典之作，均为坊间绝版或难以购得之珍贵典籍，荟萃于一编，以利学术研讨之展开，兹先辑敦煌丛刊初集。”

《敦煌丛刊初集》共 15 册，即

第 1 册：翟理斯编《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附黄永武撰《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和《敦煌六百无名断片的新标目》。

第 2 册：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附黄永武撰《刘铭恕 斯坦因劫经录 之订补》。

第 3 册：陈垣编《敦煌劫余录》。

第 4 册：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金祖同辑《流沙遗珍》；李证刚《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

第 5 册：罗振玉辑《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

第 6 册：常钧《敦煌杂抄》、《敦煌随笔》；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存古学会编《石室秘宝》。

第 7 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

第 8 册：孟列夫主编《苏俄所劫敦煌卷子目录》。

第 9 册：羽田亨辑《敦煌遗书》；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敦煌秘籍留真新编》。

第 10 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第 15 册：刘复《敦煌掇琐》。

第 16 册：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为了促进敦煌学的发展，1980年代初，新文丰出版公司又邀请东吴大学（现调入逢甲大学）林聪明教授主编《敦煌丛刊二集》。关于《二集》的主旨和内容，林聪明教授在序言中说：“新文丰出版公司以宏扬敦煌学为己任，历年来不惜耗费巨资，大量编印相关资料。先后出版《敦煌宝藏》、《敦煌丛刊初集》等丛书，……为因应敦煌学研究日新月异的趋势，因委托余筹编《敦煌丛刊二集》，收录当代中国学者的专著或论文集，从客观的角度呈现研究成果，供学界参考，希望此类丛刊的辑印，能有助于敦煌学的发展”。

《敦煌丛刊二集》从 1982 年开始出版，计划出版 15 种。现已出版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概论》、张锡厚《敦煌本唐集研究》、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说》、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饶宗颐《敦煌曲续论》、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杜斗城《北凉佛教研究》、荣新江《鸣沙集》、刘进宝《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左景权《敦煌文史学述》，其他各册也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为了给初治敦煌学者提供一套全面系统的入门书，林聪明教授还主编了《敦煌学导论丛刊》。该《丛刊》的编辑目的和主要内容正如林聪明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新文丰出版公司董事长高本钊先生致力宏扬中国文化，近数年来尤全力支持敦煌学的研究。……今更不遗余力，欲大量出版当代敦煌学者的研究成果，供世人参考，俾有助于斯学的发展。余得知其用心，感佩其热诚，乃代为筹编《敦煌学导论丛刊》，邀请海内外中国学者，就其精研范围，以中文分类撰写导论，……本丛刊的问世，期能使初治敦煌学者得窥其门径，专研有成者亦可助于会通，从而促进

敦煌学的普及与发达，此诚为全体作者共同的愿望”。

《敦煌学导论丛刊》从 1985 年开始出版，目前已出版 15 册，即林聪明《敦煌文书学》、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及其他》、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论》、季羨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张鸿勋《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项楚《敦煌诗歌导论》、陈祚龙《敦煌文物散论》、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谭蝉雪《敦煌岁时文化导论》，其他各册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此外，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⑪、邝士元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83—1989）》^⑫、萧登福著《敦煌俗文学论丛》^⑬、谢海平著《讲史性之变文研究》^⑭、罗宗涛著《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⑮等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香港地区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以饶宗颐教授为代表。饶宗颐，号选堂，又号固庵。曾任教于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若干所大学，并在法国、日本、台湾等地的科研中心研究敦煌学，是国际著名的敦煌学家。

饶宗颐先生选编的《敦煌书法丛刊》共 10 册，由东京二玄社于 1983 年出版。该丛刊从法藏敦煌文献中选出具有书法价值的写本、拓本 100 余种，按原本大小尺寸影印，分类编排。对所收每种文献都有解说，阐明其书法、史料价值。丛刊所收各种文献图版清晰，对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牒状》所收孕 100 号《后唐清泰三年沙州係司教授福集等状》，其中的朱笔在黑白照片中无法辨认，故录文多有错讹者，而《牒状》所收为彩色图版，清晰可辨。

由于《敦煌书法丛刊》为日文版，且价格昂贵，在国内不易找到，也不便于国人参考利用。1988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又请

饶宗颐教授重编，以《法藏敦煌书苑精华》为名，分为愿册，出版了中文版。中文版与日文版的图版完全相同，解说部分则参照日文版出版后的研究成果有所补充。

1986年愿月，在香港召开了第猿届亚洲北非研究国际会议，其中“敦煌研究”组由饶宗颐教授主持。乘此机会，由饶宗颐教授主持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诚明馆内宣告成立。

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虽然仍在草创阶段，但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主要为饶宗颐教授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该丛刊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目前已出版了愿种，即饶宗颐编《敦煌琵琶谱》，饶宗颐主编《敦煌琵琶谱论文集》，饶宗颐主编，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导论》，黄征《敦煌语文丛说》，饶宗颐主编《敦煌文薮》，赵和平编著《敦煌甘棠集研究》，饶宗颐、李伟国合著《敦煌吐鲁番写本文选研究》，邓文宽、荣新江合编《敦煌本坛经及其他》。

另外，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支持下，饶宗颐教授还主编了三期《九州学刊》“敦煌学专辑”，即第四卷第四期（1986年春季）、第五卷第四期（1987年夏季）、第六卷第四期（1988年春季）。三期专号共发表论文约源篇，作者以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为主。

为了表彰饶宗颐先生的学术贡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于1986年出版了《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收入中、日、英、法学者的研究论文猿篇，其中有季羨林、川口久雄、石泰安、艾丽白研究敦煌学的论文。

1986年，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曾宪通主编的

《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集共收有关文章 23 篇，并有“饶宗颐先生学术、艺术活动年表简编”和“饶宗颐学术研讨会综述”。其中收有施萍婷、樊锦诗、荣新江、金文京等学者有关敦煌学的论文。

从台湾地区的敦煌学研究状况，可以得出如下信息：

第一，大量翻印大陆著作。以前大都是自主翻印，并改动书名，有时连作者名字也删去，如《敦煌古籍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频繁及加入世界版权贸易组织，基本上都是通过版权贸易的方式购买大陆版权，在台湾出版发行中文繁体字版，如《敦煌文学作品选》、《敦煌学述论》等。

第二，大量出版大陆学者著作，除前述《敦煌学导论丛刊》、《敦煌丛刊二集》以大陆学者的著作为主外，还有柴剑虹《西域文史论稿》、张锡厚《王绩集》、蒋冀骋《敦煌文书校读研究》等。

第三，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和大陆学者的联系。从 1985 年开始，凡是大陆举办的重要敦煌学会议，基本上都有台湾学者参加。而大陆社会科学学者赴台则一直得不到台湾当局的同意。1989 年 8 月，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李正宇、梁蔚英三位敦煌学家访台，是大陆学术机构以公开身份访问台湾的破天荒事件。在台期间，大陆三位敦煌学专家除了与台敦煌学专家广泛接触外，还出席了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等举办的“敦煌学座谈会暨潘重规教授受赠敦煌研究院荣誉院士典礼”。台湾学者公开接受大陆研究机构的聘任，并在台北举行了公开受聘典礼，这又是一次破天荒事件。^{①⑥} 海峡两岸社会科学界的互访交流，敦煌学无意中先行了一步。

此后，两岸敦煌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台湾许多敦煌学专家，如潘重规、郑阿财、王三庆、林聪明、罗宗涛、朱凤玉、谢

海平等都多次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大陆学者也以各种方式赴台访学、研究、参加会议，如李正宇、项楚、荣新江、郝春文等曾去台湾讲学、从事研究工作或参加学术会议。

第四，采取各种形式，赞助出版事业。除前述《伦敦藏汉文敦煌卷子目录提要》由张其昀教授拨款 缘万元台币外，还有各种基金会。如台湾的民间团体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就是专门出资印刷台湾的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王云五先生在《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丛书》序中说：“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在其奖助之各种文化事业中，有研究论文奖助办法一种，系就国内（台湾）大学、研究所之博士、硕士论文，择优出资代为印刷。每种以八百部为度，除以五十部赠有关研究所，并由嘉新基金会保存二百五十部外，余五百部悉数赠予撰著论文之博士、硕士，供其自由处分。”这些论文比较专精，质量也较高，“惟是题材或涉专门，或不避偏僻，除足备各科专家参考外，不易吸引多数读者；因而印刷成书，流行大都不广。无论何国之出版家，为保障成本，除附加特殊条件外，多不愿接受印行。所谓特殊条件，或由撰人负担部分成本，或由撰人承购印本若干，或由撰人提供全部印刷费，出版家仅代为发行。……嘉新文化基金会为使此类精心之作得以问世，经决议创行上述奖助办法。”这种民间资助的办法，对敦煌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很有好处，如蔡主宾的硕士论文《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就是由该基金会出版的。

第五，出版速度快。台湾的敦煌学著作出版很快。一般情况下，博士或硕士论文通过答辩后 猿-远个月即可出版。如郑阿财于 员愿年 愿月 员原日口试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其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同月由石门图书公司出版；又如《敦煌学》第十辑为《张晓峰先生逝世纪念专辑》，张晓峰于 员愿年 愿月 圆元日逝世，其纪念专辑便于同年 员元月出版了。其速度之快，的确令人惊叹。

六、法国的敦煌学研究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几十年来，在敦煌学机构的建立、著作的出版以及敦煌学者的培养方面，都受到了国际敦煌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⑪

援主要的敦煌学家及其著述

法国之有敦煌学，始于 1890 年邦宁（1854—1932 年）的敦煌之行。1890 年，法国考察家邦宁、法国驻印度支那公使副助理从北京出发，取道甘肃、青海、新疆，前往俄属中亚旅行，是年 10 月途经敦煌，参观了千佛洞，拓制了莫高窟保存的碑刻。1900 年，他的游记《从北京到俄属土耳其斯坦旅行记》在法国《地理》杂志上发表，获自敦煌的碑铭拓片则交给沙畹考释、整理。

沙畹（1858—1938 年）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学大师，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前驱者。法国敦煌学大师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

沙畹研究了邦宁带回法国的碑拓后，便据这批资料整理成《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一书，于 1904 年在巴黎出版。该书包括《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唐姜行本纪功碑》、《唐李府君修功德记》、《唐李氏再修功德记》、《元莫高窟六体文字刻石》、《元重修皇庆寺记》等碑铭的译注，并附有图版。这些图版都是早期的拓本，损坏较少，故比较珍贵。

法国之收藏大量的敦煌写本，则始于沙畹的高足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伯希和于 1908 年到了敦煌，运用欺骗盗窃之手段

劫走了大量敦煌写本。他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重要的论文多经冯承钧先生汉译，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员-怨编中。

马伯乐（~~员愿猿-员怨猿年~~）是与伯希和并驾齐驱的法国敦煌学研究者。在他所有的论著中（~~员圆种~~），属于敦煌学方面的很少，但由于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敦煌学研究著作，是迄今为止关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资料惟一公开发表的录文、翻译与考释，所以马伯乐一直被认为是法国杰出的敦煌学家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戴密微、谢和耐、苏远鸣、吴其昱等人。

戴密微（~~员愿源-员怨怨年~~）是法国当代敦煌学的代表人物，有的法国学者甚至还将他誉为“法国敦煌学之父”。

戴密微的敦煌学研究侧重于佛学，旁及敦煌变文俗讲。他的敦煌学代表作，乃世界敦煌学名著《吐蕃僧诤记》^⑪，其内容是关于“中印僧侣于八世纪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有关禅的大辩论会”的史料。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孕源~~源~~《大乘顿悟正理决》的译注，分析了八世纪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汉僧摩诃（即大乘和尚）与印度僧侣莲花戒有关禅的一次大辩论。第二部分是史料疏义，主要研究了有关唐蕃关系的一批敦煌汉文写本。该书对唐史、吐蕃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戴密微还发表了《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敦煌学近作》、《唐代的入冥故事——黄仕强传》^⑫等，并与香港学者饶宗颐合著有《敦煌曲》一书。

员~~愿~~^猿年 员月 员日，在戴密微的倡导下，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与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了第源~~源~~联合研究组，即“敦煌文献研究组”，聘请戴密微指导。该组的宗旨主要有两项：一是

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另一项是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及有关资料的研究，其中包括影印发表一批重要文书。该组已出版了三集《敦煌学论文集》（今后还要陆续刊行），形成了目前惟一的一套西文敦煌学论著专集。

该组中包括苏远鸣、谢和耐、隋丽玫、华梅雪、杰尼、康德谟、戴仁、童丕等十余人。为了克服在汉文史料方面的困难，这个组不仅包括侯锦郎和吴其昱两位法籍华裔学者，左景权和陈祚龙两位旅法华人，而且还聘请饶宗颐、潘重规、苏莹辉等港台学者为客座研究员或合作者。法国对敦煌汉文写本的研究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归功于戴密微先生所创立的这个研究组的努力和推动。

谢和耐是戴密微的弟子和事业的继承人。现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被奉为现代法国研究中国的代表人物。其敦煌学著作主要有《菏泽神会禅师语录》、《菏泽神会禅师传》、《从敦煌写本中的契约看中国九至十世纪的专卖制度》、《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一项缓税请牒》、《有关敦煌旅行中租骆驼的敦煌写本》等，其代表作则是195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②0}一书。该书根据汉文典籍、大藏经和敦煌文书探讨了从南北朝到五代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梁户、社邑等都作了深入研究，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的惟一一部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苏远鸣也是戴密微的弟子，现任法国科研中心敦煌资料研究组主任。他主要从事道教和佛教研究，曾与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合著《道教研究》四集，还有《一卷敦煌壁画题识集》、《敦煌写本中的十二日历》、《法国对敦煌汉文写本的研究》、《对敦煌石窟中某些瑞相的描述》等。

梅弘理是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佛教哲学和还愿文，发表有《慧思的生平和著作》、《天台智者大师愿文

阿弥陀部分的研究》、《佛法东流传的最古老文本》等。

艾丽白小姐是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民间文学、六朝以来的小说和绘画，发表有《敦煌汉文写本中的鸟形押》、《论某些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伟”一词》等。

戴仁是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主要研究敦煌文书中的纸张、字体等，发表有《敦煌的册子卷》、《敦煌写本中的圆梦术》、《对标有时间的敦煌汉文写本的纸张和字体的研究》、《论已断代的敦煌写本之纸张和字体》、《研究敦煌文书的方法论》、《敦煌和吐鲁番写本中出现的武后俗字》、《敦煌的经折装写本》等。

法国科研中心敦煌资料组的华裔学者饶宗颐、吴其昱、侯锦郎、左景权对于推动法国的敦煌文献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吴其昱祖籍江苏，现已加入法籍。其敦煌学著作颇多，发表有《敦煌写本中的珠英集残卷》、《敦煌本故陈子昂集残卷的研究》、《甘棠集与刘邺传研究》、《有关唐代和十世纪奴婢的敦煌写本》等。他还把许多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著作译为汉文在《敦煌学》上发表。目前正在研究有关大秦景教的问题。

侯锦郎是由我国台湾省赴法的，现已加入法籍。其主攻方向是佛像、医学和绘画，发表了《论唐代的相面术》、《敦煌龙兴寺的宝藏》、《敦煌写本中的印沙佛仪礼》等。

左景权是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祖籍湖南，是左宗棠的孙系，目前尚未加入法籍。他利用较长的时间编好了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的初稿，并发表有《伯希和敦煌写本第XXXX号再整理》、《敦煌写本一瞥》、《佛说生经残卷的研究》等。

祖籍我国湖北的旅法学者陈祚龙也是由台湾赴法的，目前尚未加入法籍。他是一位多产的敦煌学者，出版了《悟真的生平与著作》、《敦煌文物随笔》、《敦煌学海探珠》、《敦煌资料考屑》、《敦煌学园零拾》等专著。

圆媛对敦煌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伯希和于 员愿年返回法国后，即着手编写所获敦煌写本目录。员愿年完成了目录初稿，共著录了 员缘个汉文卷子，即从 圆四号—猿猿号、又从 源四—源四号。

伯希和的这个目录，在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是我们参考巴黎敦煌遗书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但该目录有三个缺点：第一，他的编目工作比较潦草，对于他主观上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为了避免麻烦，就没有著录；第二，伯希和虽然是欧洲很著名的汉学家，但对于阅读和认识我国四部书的知识和能力还是有限的，因此把一部分书名没有正确反映出来；第三，始终没有编出完整的目录。因此，王重民先生 员源年到巴黎后，就开始编《伯希和劫经录》，该目收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

王重民所编《伯希和劫经录》也有许多空缺处，并有许多笼统称之为“残佛经”、“残道经”之类的地方。员缘—员缘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谢和耐与吴其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编写了 圆四—圆四号汉文写本目录，这一工作于 员缘年获得了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的年度奖。但这卷目录在出版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拖了十多年才于 员远年出版。其内容提要是经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隋丽玫、吉娜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魏普贤补充和修订的。该目录每卷著录书名，并记明纸数、高广幅度、行款等，凡近代学者有关著述，亦附载于当卷之下。最后还附有索引多种及题记书影多帧。

《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目录》第二卷（圆四—猿四号）已由左景权和隋丽玫编写。由苏远鸣等人编写的第三卷（猿四—猿四号）已于 员愿年先于第二卷问世。第四卷（猿四—源四号）和第五卷（分两册，收 源四—源四号）也是由苏远鸣等人所编，并分别于 员愿年、员缘年出版。第六卷

将收入伯希和藏文写本背面的汉文文书和集美博物馆等处收藏的零散写卷。该目录比其他敦煌写本目录的著录都详细，除一般目录的编号、标题、内容、作者、尺寸、纸质等外，它还指出敦煌文献在通行印本中（如《大藏经》、《道藏》、《四部丛刊》等）的出处，并列出了有关该写本的研究文献出处。同时还有几个不同的索引，便于读者使用。

法国陆续出版了一套《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第一卷是吴其昱整理的《七世纪末未刊布过的道教经文（本际经）》，~~1934~~1934年出版；第二卷是饶宗颐与戴密微合作整理、编辑的《敦煌曲》，~~1935~~1935年出版；第三卷是哈密顿整理的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1936~~1936年出版；第四卷是饶宗颐的《敦煌白画》，~~1937~~1937年出版；第五卷是由麦克唐纳夫人和今枝由郎等影印发表的《敦煌藏文文书集》；第六卷是哈密顿的博士论文《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1938~~1938年出版。

伯希和劫往法国的敦煌文物，曾以《伯希和考察团档案第 1 卷——敦煌石窟》为名，于 ~~1939~~1939—1940 年分为 2 卷出版，共收图 ~~140~~140 幅。~~1940~~1940 年伯希和病逝后，由韩百诗主持其遗著的出版工作，拟出版伯希和新疆和敦煌考察所获文物 10 卷，其中 5 卷都是有关敦煌的，已出版了《敦煌织物》、《敦煌的幡幢和绘画》（风格研究、肖像研究各 1 卷）。~~1948~~1948 年韩百诗逝世后，伯希和档案由旺迪埃—尼古拉负责出版。

在敦煌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方面，法国近年来最大的成绩是《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刊布。伯希和在敦煌时，曾对石窟的外景、建筑风格、经变画及故事画的内容和史实，特别是当时尚能辨认出的洞中题识（包括汉文、回鹘文、藏文、婆罗谜文、西夏文和蒙古文等）以及历代游人的题记都作了详细抄录。九十多年来，一方面，由于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伯希和当年记录下的许多壁画内容和题识已不复存在或辨认不清；另一方面，伯氏的记

录是对敦煌石窟所作的最早和最系统的记录，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如归义军张氏政权第二任统治者张淮深全家于公元849年暴死，其原因何在？继任者又为谁？长期以来不得其解。在《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末尾，张淮深之弟张淮□，被议潮婿李明振题为“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西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1905年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一卷亦载其录文，而“张淮□”为“张淮鼎。”据有的学者研究，淮深为议谭子，淮鼎为议潮子，淮鼎为了和淮深争权夺利，便发动兵变，杀死了淮深，并继任了归义军节度使。千载坠史，终于明了。

正因为伯希和笔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从1905年开始，法国方面便陆续刊布出版。全部笔记共出六卷，每卷包括三个部分，即经过整理后的笔记刊本、笔记手稿真迹图版和当时拍摄的图片。这套丛刊是作为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5卷而刊布的，由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和莫尼克·玛雅尔夫人负责，并由她们作序和前言。第1卷（伯编第1—猿号洞）于1905年出版；第2卷（猿—苑号洞）和第3卷（苑—15号洞）于1906年出版；第4卷（15—19号洞）于1907年出版；第5卷（19—25号洞）于1908年出版。第6卷及全套笔记的索引已于1909年出版。目前笔记刊本部分已由耿昇、唐健宾翻译，定名为《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此外，法国还以各种形式出版纪念文集。如1929年戴密微80周岁，自法兰西学院退休，法国曾出版《汉学论丛》以庆祝其80寿辰；1930年戴密微81寿诞，法国又出版《汉学论丛》第二册以资庆祝；香港1930年出版的《敦煌学》第一辑即为《戴密微先生八秩大庆祝寿专号》；1938年缘月14日，戴密微于巴黎逝世，法国曾出版《敦煌研究文集》以资纪念。

1939年是伯希和诞生50周年，巴黎国立图书馆于10月10—11日举办了以“伯希和百周年寿诞和中亚宝藏”为题的展览，展出了伯希和从中亚携回的大量文物，还出版了《中亚宝藏》一书，主要是介绍伯希和的生平及其发掘物。同时，第15届联合研究组于10月10—11日，在巴黎召开了有世界各国学者参加的“五一十世纪高地亚洲写本和碑铭题识国际讨论会”，由于其重点是敦煌文书、题识和艺术，所以又通称为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法国、芬兰、日本、以色列、土耳其、原联邦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加拿大、英国、马来西亚、原民主德国、波兰等国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共100人。法国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主席、法兰西学院教授石泰安被选为大会主席，会议的具体工作则由敦煌文献研究组负责人苏远鸣主持。讨论会的文件和论文已于1940年作为《亚细亚学报》第12卷第1—2期的特刊号发表。^①

援对其他民族文字写卷的研究

敦煌遗书除了汉文写卷外，还有许多民族文字的卷子，如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佉卢文、梵文、回鹘文、突厥文等文字的文献，其史料价值并不逊于汉文文献，就西域、中亚史研究而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汉文文献。而法国在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很有加以介绍的必要。

伯希和劫卷中有大批的藏文卷子，原来估计有1000号，故伯希和把前两千个号空出来以备编藏文目录。现在看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因为在拉露小姐极不完整的目录中就已经编到1000号，目前仍在其他文种的写本中不断“发现”新的藏文卷子。据《敦煌藏文文书选》导言说，巴黎藏敦煌藏文写本有1000余卷，其中100卷是用两种或三种语言写成的。

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方面，法国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巴科。他曾受伯希和委托编写过敦煌写本目录，并与杜散、托玛斯通力合作，经过 员缘年之久，于 员怨年年在巴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⑫一书，首次发表了一批敦煌藏文历史文书。巴科还于 员缘年发表了《八世纪五位回鹘使节对高地亚洲北部的考察》一文，公布了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 员愿号，即《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大震动，各国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对这卷藏文卷子中出现的一些北方民族的名称进行了考证和注释。

在敦煌藏文写本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则是拉露小姐。她的主要功绩是编写出版了三卷《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 员卷（员—愿号）出版于 员怨年；第 圆卷（愿—员愿号）出版于 员缘年；第 猿卷（员愿—圆愿号）出版于 员怨年。该目录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有全面的反映，如藏文佛经方面，对每一经文的外观，像纸张大小、颜色、新旧、抄写者的字体是楷书还是草书、墨汁颜色、有无红色字夹杂在字行中间，以及纸张的厚薄与软硬等，都有详细的记述。编者还特别注意了经文的主要内容，如“缘起”、“唯识”、“空性”、“到彼岸”、“禅定”、“十力”、“行为”等佛学中的关键词。此外，对于经文有无修改处，拼音有何特点，标点符号是否与后世通用者相符合等，目录也有一定的反映。现在看来，该目录还有不少错误和遗漏之处，但目前仍是研究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必不可缺的工具书。

在 员怨年出版的《敦煌藏文本罗摩衍那故事》一书中，作者巴尔比将伯希和所获敦煌藏文写本《罗摩衍那》作了拉丁转写和法文译注，并刊出了图版。它与英国托马斯所刊斯坦因敦煌藏文中的四件写本一起，构成了今天所见全部敦煌藏文《罗摩衍那》古抄本。

法国当代研究敦煌藏文写本的代表人物是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石泰安。他于 1951—1952 年曾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考察，后又在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工作。1953 和 1954 年曾两次对喜马拉雅山麓进行考察。其关于敦煌藏文写本的名著是《西藏的文明》和《汉藏走廊古部族》，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如《有关吐蕃苯教殡葬仪轨的一卷古文书》、《神圣赞普名号考》、《敦煌藏文写本综述》、《敦煌藏文写本中的某些新发现》等。

石泰安八十年代的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成果，主要反映于 1981—1982 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中发表的系列文章《古代吐蕃文献汇编》第 1—9 集。公布并研究了一大批敦煌藏文写本，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由布隆多夫人领导的法兰西学院西藏学研究中心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配合，正陆续影印发表一批重要的敦煌藏文写本，作为《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研究丛书》陆续出版。在石泰安教授指导、今枝由郎协助下，麦克唐纳夫人和布隆多夫人已选编影印出版了两卷《敦煌藏文文书选》，若按其全名，应作：《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并以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文献补充者》。第 1 卷出版于 1982 年，共 25 个编号，140 页；第 2 卷出版于 1984 年，共 15 个编号，100 页。据编者宣布，今后还将继续编选出版，一共计划出五大卷。该书的出版，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得到了敦煌学界、藏学界的高度赞扬。石泰安教授在序言中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能接触到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的学者们才能得以对此进行长期和详细的研究。所以，大部分文献都是由巴科、托玛斯和拉露等人翻译和发表的。但不少译文都未附原写本的影印件。因此，除了专程去亲自查阅之外，无法考察其解读是否正确。”为了使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工作能取得迅速进展，为了避免由于年代久远或反复使用而使写本遭到可能的损坏，当务之急就是出版和发行这批资料。”编选目的

“首先是为了使这些写本容易被人所接受，以便发现和澄清西藏文明中的那些不为人所知或很少为人所知的方面。所以，我们优先选择了非佛教文书，同时也选择了一些对佛教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书。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好将其中那些已经发表过影印件的文书删去。”^{①②}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的王尧、陈践先生已从此两册中选编译注了部分文书，编为《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于1984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57年，为了纪念拉露小姐诞辰，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西藏学论文集》（即《拉露纪念文集》），麦克唐纳夫人在集中发表了14万字的长文《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碑文、文书和符号考释，兼论松赞干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一般又通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该文在巴科等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史，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布隆多夫人撰文称此著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作用。法国近年来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大都是围绕此著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

在回鹘文研究方面，首推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哈密顿。他继承了沙畹等人的传统，成了当代世界著名的回鹘突厥史专家。1958年出版的《五代回鹘史料》^{①④}一书，使用了许多敦煌汉文写本，此书成了沙畹《西突厥史料》的姊妹篇。1961年出版的《敦煌本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译注》，是他研究敦煌回鹘文书的主要著作。1963年在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上作了《敦煌石窟中的古突厥文写本》的发言，总结了法国研究突厥回鹘文写本的状况。尤其是1965年出版的二卷本巨著《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刊布了已发现的敦煌回鹘文写本，是近几年有关此方面研究的最大成绩。

在于阗文研究方面，早在三十年代，伯希和就有所探讨，所

著《于阗塞语中的几个西域地名》一文，讨论了于阗文《沙州纪行》的若干地名。这件于阗文文书就是著名的“钢和泰藏卷”，可能出自敦煌，因收藏者钢和泰而得名。二十年代钢和泰在北京大学讲授梵文（后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故得收藏之便。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哈密顿便着手研究敦煌于阗文文献，发表了《关于钢和泰藏卷的研究》、《十世纪于阗突厥语中的不稳定鼻音》、《十世纪的仲云族》、《~~钢和泰~~一员四十年于阗王》、《论九至十世纪于阗年代学》等文，几乎涉及到了所有重要的于阗文历史文书。

在粟特文文献研究方面，伯希和很早就有所注意，并与高梯奥合作研究，发表了《粟特文汉文双语文书》、《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研究》等。其中《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研究》是作为《伯希和考察团档案》之一种，于 ~~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由巴黎保罗·古蒂纳东方书店出版。它对伯希和在敦煌所获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进行了全面整理，包括粟特文的拉丁字母转写、词汇及全部图版等。收入《伯希和考察团档案》的还有《粟特语语法试编》、《十世纪梵藏对照词汇表》、《粟特语文献》、《粟特语吠桑檀罗本生故事研究》等。

《粟特语语法试编》是由邦旺尼斯特整理完成的高梯奥遗著，它主要是根据敦煌佛教粟特语资料，对粟特语语法进行了首次阐述，是敦煌粟特语佛教文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由邦旺尼斯特编著的《粟特语文献》一书，将高梯奥所刊个别写本之外的所有伯希和所获敦煌粟特语文献作了外貌概述、拉丁转写、法文译注和词汇索引，是敦煌粟特语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著作。《粟特语吠桑檀罗本生故事研究》是邦旺尼斯特的另一著作，它是对高梯奥 ~~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所刊伯希和与斯坦因敦煌所获粟特语吠桑檀罗本生故事的修订再刊，同时还有对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的法文新译和对《粟特语文献》一书的订正。

1905年，伯希和研究了著名的《粟特古书简》，首次指出第二封粟特文书信涉及洛阳被焚事件，并认为年代属于公元二世纪中叶。

1939年出版的邦旺尼斯特《粟特语研究论集》，是作者有关粟特语文献等方面的论文、札记和书评的选集，其中收有多篇研究敦煌粟特语写本的文章。

综上所述，法国所藏敦煌粟特文文献的主要研究者为高梯奥和邦旺尼斯特，他们都发表了许多有关敦煌粟特文文献的研究著作。此外，戴密微早年也曾对此有所研究。八十年代初，哈密顿还从敦煌藏文文献 孕 员 愿 和 员 愿 中发现了用粟特文拼写的汉语数词一至十。

七、敦煌学研究在日本

九十多年来，日本一直比较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现将其主要的研究方面和成果，简要地介绍给读者。^⑫

员 援 二次大战前的研究概况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 员 愿 年。当 员 愿 年伯希和在北京时，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拜见了他并观赏了敦煌写本，随后便以《敦煌石窟中的典籍》为题，在北京日侨杂志《燕尘》第 员 期（员 愿 年 员 月 员 日出版）上介绍了伯希和的收获。同时将这一消息传回日本，员 月 员 日，大阪、东京两地《朝日新闻》上同时刊出题为《敦煌石室发见物》的文章，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是日本对敦煌文献的最早报道，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当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虎次郎）得知这一消息

后，立即致函罗振玉加以证实，并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不久，罗振玉给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人寄去了一大批从伯希和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还有罗振玉于 1904 年 1 月发表的两篇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这些情况立即引起了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工作。1905 年 1 月 15—16 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和狩野从北京获得的敦煌遗书、雕刻和绘画等照片。内藤湖南等人，还分别发表演讲，介绍对写本照片的研究情况。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亚探险与伯希和敦煌之行”为题，介绍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绍了《老子化胡经》；桑原鹭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羽田亨就《摩尼经》残卷作了解说；内藤湖南讲解了《西州志》残卷。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1904 年，任职北京大学的藤田丰八，在北京发表了《慧超传笺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日本的第一部整理敦煌文献的专著。与此同时，日本大谷探险队获取的文物也陆续运到日本京都，从而更加促使了日本，尤其是京都“敦煌热”的上升。

1904 年，敦煌劫余残卷运抵北京，内藤湖南得知消息后，随即提出了访书北京的计划。1905 年 1 月，京都帝国大学派出了内藤、狩野、小川三位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青陵两位讲师组成的访华团来到北京。五人在北京逗留近二个月，1 月 15 日返国。次年 1 月 15—16 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位先生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事后，由内藤湖南执笔，写出了《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展览号》，刊载于 1905 年 1 月 15 日的《朝日新闻》上，对此行及调查结果作了详细解说。

北京访书归来后，内藤湖南等人认识到，要想扩展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必须对收藏于欧洲诸国的敦煌、新疆收集品作进一步

的调查了解。1930年，京大派狩野到巴黎和伦敦调查伯希和、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写本，他抄回了许多珍贵资料；同时，东大也派泷精一到欧洲调查绘画资料；1931年，内藤湖南率弟子石滨纯太郎前往巴黎、柏林等地调查伯希和收藏品；矢吹庆辉也曾两次前往伦敦，拍摄了许多斯坦因劫去的古写经；1932年，那波利贞前往法、德两国留学，调查欧洲之敦煌写本。他在欧洲二年，以巴黎为主并先后去过柏林和伦敦，调查敦煌写本收藏及著录研究情况，抄写了大量有史料价值的文书，这对以后日本学术界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敦煌学研究者就是用这种“搜宝式”的方法搜集了许多敦煌资料，为此后的敦煌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1930年到1936年，日本学者大规模的欧洲访书活动，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从敦煌学的兴起到二战结束前，是他们搜集资料和探索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布，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在佛教文献方面，矢吹庆辉先后出版了《三阶教之研究》、《鸣沙余韵》及《解说》，整理研究了大批斯坦因劫去的佛典写本，尤其是在藏外佚经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铃木大拙、宇井伯寿等人，则利用敦煌新发现的禅宗典籍，如《六祖坛经》、《神会和尚语录》、《楞伽师资记》等，开始对禅宗深入研究；在中国古籍方面，小岛祐马将其收集的子部书，汇集为《沙州诸子二十六种》（1935）。神田喜一郎编辑了《敦煌秘籍留真》（1936）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1937），刊布了大批古籍写本的珍贵照片；在历史方面，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题，涉及到了不少新问题。那波利贞发表了一系列唐代社会和敦煌寺院经济的文章，其中重要的几篇，如《梁户考》、《唐代社邑研究》、

《中晚唐时代敦煌地方佛教寺院碾础经营》、《从敦煌发现文书看中晚唐时代佛教寺院之钱谷布帛类贷借营利事业之经营实况》等文，收入了 1939 年出版的《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仁井田陞对敦煌法制文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39 年以《唐令拾遗》一书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46 年出版《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50 年出版《中国身份法史》，为日本中国法制史和敦煌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绘画方面，松本荣一对大量的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进行了分类研究，出版了巨著《敦煌画之研究·图像篇》及《附图篇》，为敦煌绘画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战后至七十年代的研究概况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处于低潮，没有特别重要的论著发表，只是时有零散的文章问世。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龙谷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长期以来不知去向的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吐鲁番文书；第二，经山本达郎和榎一雄的努力，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汉、藏文写本的缩微胶卷运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处。不久，又通过交换关系，获得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第三，我们的文化宝库敦煌千佛洞对外开放，各国的敦煌学者能够亲临其境进行考察，如画家福田丰四郎就是大谷探险队以后五十年第一个亲访敦煌的日本人；第四，中国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苏联孟列夫主编《亚洲民族研究所收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的出版，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美不胜收的新材料。于是，在 1956 年 1 月，由石滨纯太郎、羽田亨等人发起，在龙谷大学成立了以石滨为首的“西域文化研究会”，汇集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新找到的大谷文书和各类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6—1966 年间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六卷七册），这一

成果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与此同时，由文部省资助，铃木俊主持，在东京由东洋文库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以新获得的斯坦因文书胶片为主，并网罗其他各种收集品，着手编纂《（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陆续完成了菊池英夫、池田温合编的第一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公文书》（1959），土肥义和编的第二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寺院文书》（1960），吉冈义丰编的第三卷《道教之部》（1962）和金冈照光编的第四卷《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及解说》（1965）。这些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一阶段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不仅研究敦煌遗书，而且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1957年，长广敏雄发表了《最近敦煌石窟的研究》，冈崎敬则在五十年代亲访敦煌千佛洞后，便以其考察见闻为基础写成《大谷探险队和敦煌千佛洞》一文，还有他的《中国考古之旅》和北川桃雄的《敦煌纪行》等，都从不同侧面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了探索。1958年，当我国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访日时，日本的《佛教艺术》发行了《敦煌佛教美术特集》，刊载了藤枝晃、日比野丈夫、水野清一、桶口隆康和冈崎敬等人的文章，其中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艺术》，是一篇优秀的研究著作。此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者还对千佛洞石窟进行了编年研究，如福田敏男的《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笔记》等。

战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以文书为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涌现出了一批专家，如五十年代有仁井田陞、山本达郎和冢本善隆等人；六十年代有藤枝晃、西村元佑、竺沙雅章和上山大俊等人。这一阶段，冢本善隆对敦煌佛教史的概说，牧田谛亮对中国伪经的研究，柳田圣山对禅宗典籍的深入分析等等，在佛教领域内继续发扬了日本学者的特长；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北朝

隋唐史方面，以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最为著名，该书出版于 1931—1932 年间，是他研究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结果，被称为“建筑在古文书研究上的顶峰”。除此之外，有关田制和赋役制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如山本达郎对 646 年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复原和分析，填补了北朝均田赋税制的某些空白。又如铃木俊、山本达郎、西村元佑、西嶋定生、日野开三郎、堀敏一、池田温等人对唐代均田制的施行，以及租田、户税、差科等问题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唐代经济史的内容。其成果除散见于各种杂志外，还集中收入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54）、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1956）、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研究》三卷（1957—1958）、堀敏一《均田制研究》（1958）、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58）等著作中。此外，菊池英夫从零散的唐代军事文书中，找出了从行军制到镇军制的兵制转变过程；在西北史地方面，尤其是瓜沙归义军史的研究中，藤枝晃继早年发表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1931—1932）之后，又在京都《东方学报》上陆续刊出《敦煌的僧尼籍》（1933）、《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1934）、《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935）、《敦煌历日谱》（1936）等长篇论文，基本理清了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的脉络。其中《敦煌的僧尼籍》一文，根据敦煌文书提出，敦煌曾是一个特殊的佛教都市，这种把佛教史同社会经济史结合起来研究，是当时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倾向。另外，上山大俊通过对吐蕃统治前后佛教高僧昙旷和法成的详细研究，大大丰富了敦煌佛教史的内容。而竺沙雅章对敦煌的僧官制、寺户制和结社活动的探讨，展示了中晚唐以降敦煌佛教社会的真相，其成果已收入作者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0）。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如入矢义高对王梵志诗、敦煌变文俗语词及敦煌曲子词等，都有比较精辟的研究。金冈照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敦煌变文的文章，川口久雄则独

辟蹊径，把敦煌文学与日本文学加以比较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猿媛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情况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巴黎收藏的伯希和写本缩微胶片的公开出售，再加上世界各国敦煌写本或绘画藏品的陆续出版，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即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两方面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北京、伦敦、巴黎藏卷及其他一些藏卷的全部公开，使得力图在某一种文献上集成成的著作得以产生。如 猿媛和 猿媛年出版的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和《图录编》，就是敦煌道教文献的集成著作。猿媛年出版的兜本正亨编《敦煌法华经目录》，则是专门整理《妙法莲花经》的结果。猿媛年出版的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分概观和录文两部分。概观是对中国古代籍帐的全面研究，已由龚泽銑译为汉文，中华书局于 猿媛年出版。它探讨了籍帐制度的形成、发展、完成和崩溃，对户籍、土地、劳役、赋税等制度进行了比较详细地研究，尤其对敦煌户籍与差科簿的整理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录文部分共收录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籍帐、差科簿等文书 猿媛多件，它不但附有多幅图版及研究文献目录，而且在文书的汇集、缀合、校录方面较前人为优，是 猿媛年代敦煌文献与唐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猿媛—猿媛年出版的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研究》，汇集了作者关于中国佛教史方面的研究论文。猿媛年出版的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也是作者的论文集，其中有《敦煌的僧官制度》、《关于敦煌的寺户》、《敦煌出土“社”文书的研究》三篇论文的修订本。这三篇论文在敦煌僧官、寺院经济及社文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猿媛年出版的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之研究》，对敦煌文书中的禅宗文献进行了全面校订。猿媛年出版的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

集录》一书，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写本文献中的跋文题记汇编起来，共 1000 余条，按时代录文，并附有编号、图版、录文出处和有关参考文献，是敦煌写本题记资料的集大成著作，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1967 年出版的福井文雅《般若心经的历史的研究》一书，对已知各地收藏敦煌写本中的《般若心经》及各种注疏做了详细的调查、分类、注记，并对该经的名称和各种写本内容的异同，以及《般若心经》在中日历史上的变迁过程，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专精的研究方面，正在陆续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丛刊可视为典范。该丛刊经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委员会推荐，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由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第一卷为《法制文书》，由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编，已于 1975—1976 年出版，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唐代律、令、格、式、判的残卷；第二卷为《籍帐》，由山本达郎和土肥义和合编，出版于 1976—1978 年。这是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基础上，经补充修订而成的籍帐、户口田地簿及差科簿文书写本的集大成者；第三卷为《券契》，由山本达郎和池田温合编，已于 1976 年出版；正在编辑印刷中的第四卷准备刊布社文书。收入该丛刊的每一件文书，都有精心的录文和清晰的照片，并有详细的英文解说。每一卷前，有对这一类文书的综合性和总结性研究论著，卷后还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由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继续发现及各收藏单位的陆续公布，该丛刊还不能说是对某一类文书的最终结集，但至少可以说是对前人的整理研究作了一次很好的总结。

在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如上山大俊、山口瑞凤、木村隆德、冲本克己、原田觉等人，对中原汉地禅宗传入吐蕃的历史，利用汉、藏文写卷内容，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青年敦煌学者

协会”和“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的成立。1954年11月，日本关西地区（京都、大阪）的五位对敦煌学感兴趣的青年学者，即森安孝夫、熊本裕、高田时雄、武内绍人、古田丰，组成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他们五位虽然专攻方向不同，但在利用敦煌文献上却是一致的。再加上他们在英、法、美的留学研修，已分别在回鹘、于阗、汉、藏和粟特文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约定每月聚会一次，共同探讨上述各种语言所写文书的格式和一些双语文书、碑铭等问题，并准备合作刊布汉、藏、粟特文、蒙文本《善恶因果经》。这种集体的综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学的发展方向。

同时，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也于1954年11月在龙谷大学成立。他们也由五位青年学者组成，即白须净真、关尾史郎、片山章雄、町田隆吉、荒川正晴。据称，该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以吐鲁番出土的各种资料为研究对象，围绕会员各自的研究课题，对文书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研讨。为了发表本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促进相互之间，尤其是与中国同行的交流，研究会还创办了《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该《会报》具有“通讯”的性质，出版周期很短，是了解日本吐鲁番文书研究的重要窗口。

从1954年开始编纂，由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的《讲座敦煌》，是一套使“全世界东洋学界瞠目”的多卷本巨著，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家。邓建吾、吴其昱、左景权、周一良、陈祚龙也应邀参加撰写个别篇章。全套《讲座敦煌》由冢本善隆、榎一雄、入矢义高、秋山光和监修，金冈照光、池田温、福井文雅任编辑委员，各分卷还设有主编。原计划出版15卷，后因时间过长，分卷及执笔者均有变动，最终合并为10卷，至1969年全部出版，即《敦煌的自然与现状》、《敦煌的历史》、《敦煌的社会》、《敦煌与中国道教》、《敦煌汉文文献》、《敦煌胡语文献》、

《敦煌与中国佛教》、《敦煌佛典与禅》、《敦煌的文学文献》。

《讲座敦煌》的每一卷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个别题目构成，分别由研究这个题目的专家执笔写作。如第二卷《敦煌的历史》共分 16 章：(1) 汉魏时代的敦煌，由榎一雄执笔；(2) 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由佐藤智水执笔；(3) 隋唐时期的河西与敦煌，由菊池英夫执笔；(4) 吐蕃时期的敦煌，由山口瑞凤执笔；(5)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由土肥义和执笔；(6) 回鹘与敦煌，由森安孝夫执笔；(7) 西夏统治时期，由中岛敏执笔；(8) 元代敦煌，由大岛立子执笔；(9) 明清时期的敦煌，由松村润执笔；(10) 从考古学上看敦煌（上、下），由冈崎敬和大岛立子执笔。因为由众人执笔写成，有些篇章不免流于泛论，但大多数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好文章，既能增加人们关于敦煌学各方面的知识，又标志着某些方面的研究水平，还给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信息。

八、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

国外的敦煌学研究，以法国和日本最为活跃。此外，其他国家也有可称道之处，现择要介绍如下。

苏联俄罗斯

俄罗斯藏有较多的敦煌遗书，也有部分文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前苏联发表的敦煌学论著多属概述性质，如贾科诺娃的《敦煌的佛教古迹》、《敦煌所出中国绢织物》等。

前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是从 1957 年建立敦煌研究组开始的。在前苏联创建敦煌研究组的过程中，我国学者郑振铎、梁希彦、鲍正鹄等曾给予协助。这个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的敦煌研究组，最初的成员主要有孟列夫、斯皮林等人，后

来人员逐渐增多，又加入了丘古耶夫斯基等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敦煌文献编目，于 1944 年和 1946 年出版了两卷《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

该目录第一册由孟列夫(即缅希科夫)主编，沃罗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娅、古列维奇、孟列夫、斯皮林、史更良编撰。第二册由孟列夫主编，沃罗比耶娃—捷霞托夫斯卡娅、左义林、马尔蒂诺夫、孟列夫、斯米尔诺夫编撰。因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于 1931—1935 年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故 1944 和 1946 年出版的两册目录亦名为《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又根据目前的变化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简称《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1944 年敦煌研究组改称敦煌写本研究组，由孟列夫主持，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中国研究室领导。目前俄罗斯研究敦煌学的主要有两人，即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孟列夫，1909 年生于列宁格勒。193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文科，1936 年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37 年以《双恩记》为答辩博士学位论文。1938 年到 1940 年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副研究员，1940 年至 1945 年为研究员，1945 年任教授。现为中俄双方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俄方主编。

从 1937 年开始，孟列夫就研究俄藏敦煌文献，并任列宁格勒分所敦煌研究小组组长，1945 年后为远东文献研究班长。已发表论著 150 种左右，有关敦煌研究的重要论著除《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俄藏敦煌文献》外，还有《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维摩诘所说经讲经文》、《维摩碎金》、《十吉祥变文研究》、《妙法莲华经变文研究》等，详目请参阅孟列夫编《前苏联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①26}

丘古耶夫斯基，~~1905~~1905年生于中国，~~1925~~192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1925~~1925年回前苏联。~~1925~~1925年后为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后又转入敦煌写本 연구组。从~~1925~~1925年开始，专门致力于敦煌世俗文书的研究。~~1925~~1925年春因病去世。主要论著有《敦煌所出借贷文书》、《有关敦煌粟特人聚落的新史料》、《敦煌寺院经济文书》、《有关敦煌寺院经济中直接生产者特征的资料》、《敦煌寺院社邑》、《敦煌寺院的农奴》、《敦煌所出汉文法律文书》，《八一十世纪的敦煌》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汉文文书》的编辑出版。

丘古耶夫斯基在多年研究敦煌世俗文书的基础上，编著了《敦煌汉文文书》。其第一册经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批准，编入《东方文献》丛书，已于~~1925~~1925年由前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包括图录、录文、译文、研究和附录等部分，共~~1925~~1925页。其中图版~~1925~~1925页。

《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共收文书~~1925~~1925件，其中籍帐文书~~1925~~1925件，赋役与租佃关系文书~~1925~~1925件，寺院文书~~1925~~1925件，贷粮文书~~1925~~1925件。但到目前还未见第二册及以后各册的出版。第一册的汉译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圆媛英 国

英国的敦煌遗书收藏情况前已述及。斯坦因在中国西北考察后，即发表了《沙漠契丹废址记》、《西域考古图记》、《千佛洞》、《亚洲腹地考古记》、《在中亚的古道上》等著作，对其考察发现进行了介绍与研究。

早在~~1925~~1925年，霍恩宁就编辑出版了《新疆出土佛教文献丛残》一书，其中刊布了部分斯坦因收集的敦煌佛教文献。

英国对敦煌遗书的编目者主要是翟林奈。翟林奈即以前翻译的小翟理斯、翟理斯。他~~1925~~1925年出生于中国，~~1925~~1925年进入英国

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负责管理中文图书。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文书入藏该馆后，翟林奈便开始从事汉文写本的编目、研究，并将其一生都献给了这一工作。

翟林奈的《敦煌六世纪》一书出版于 1890 年，其副题就为“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的汉文写本简记”。该书对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敦煌所获汉文写本的外观和内容作了介绍，是当时了解英藏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翟林奈的主要贡献是编了《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该目录出版于 1896 年，它对 1890 年以前的敦煌文献分 缘类作了著录，即佛教文献、道教典籍、摩尼教经、世俗文书和印本。此书著录详细，既有编号、名称、卷数、品第、汉文题记并英译等，又有书法、纸色、质地、长度等，是了解英藏敦煌遗书的重要工具书。其与刘铭恕编《斯坦因劫经录》分别完成，各有特色，可相互参照。

1896 年，格林斯泰德又出版了《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题名索引》一书，对翟林奈《目录》的每条题名按拉丁字母顺序重新排列，并指出《大藏经》、《道藏》出处和翟目编号，是使用翟目的一部工具书。

英国研究敦煌于阗文献的学者主要是贝利。贝利生于 1868 年，1890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1892 年起任剑桥大学教授，1895 年起兼英国学术院院士。他的《于阗文献选刊》一书出版于 1895 年，该书刊布了斯坦因所获的三件于阗文写本，是英国研究敦煌于阗文的早期著作。《于阗语佛教文献集》出版于 1896 年（1895 年又出版了修订本），该书收录了敦煌、和田出土的于阗文佛教文献 36 种。而贝利研究于阗文献的集大成著作是《于阗语文献集》，该书共 7 册，于 1896—1898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作者所见全部于阗文献作了拉丁字母转写，有些还附有英文译注。是贝利毕生研究于阗语资料的集中体现，也是整理敦煌于阗语文献的集大成著作。从第一册到第七册，出

版时间长达 源年。

研究藏文文献的学者主要是托马斯。托马斯生于 员苑年，~~员苑年~~ 员苑年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员苑年~~ 员苑年任牛津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斯坦因所获敦煌藏文写本的整理与研究。他的三卷本著作《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出版于 ~~员苑年~~ 员苑年，其中刊布了部分敦煌藏文文献，是英国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早期著作。托马斯的另一著作《东北藏区的古代民间文学》，译介了 远篇英藏敦煌藏文文学作品，是研究吐蕃时代藏族文学与宗教的原始资料。

此外，托马斯还曾编写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藏文文献目录草稿，并合撰有《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等。

在敦煌粟特文文献研究方面，麦肯吉的《粟特语 佛说善恶因果经》一书，在法国高梯奥和伯希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本《佛说善恶因果经》做了新的转写和英文译注。而《英国图书馆所藏粟特语佛教文献》，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斯坦因敦煌所获文献中的六种主要的粟特语佛典重新予以刊布，同时还刊出了所有文献图版，是敦煌粟特语佛教文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首推魏礼所编《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一书。该书由两部分组成，即英国博物馆藏品目录和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藏品目录，共著录 ~~缘~~ 缘余件，是研究敦煌绢纸绘画的重要工具书。韦陀的《西域美术》一书，其副题即为“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收集品”，它选印了现藏于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中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绘画品、染织品及其他考古遗物的精品，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资料集。

翟林奈、魏礼之后，英国研究敦煌汉籍的代表人物是崔维泽。崔维泽又译为杜希德、特维切特，他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英国学术院院士。其主攻方向是隋唐史，~~员苑年~~ 员苑年出版的《唐

代财政制度》一书，大量利用了敦煌写本和前人有关研究成果。同时发表了《敦煌发现唐水部式残卷》、《敦煌唐格残卷札记》等文。他还与费正清共同主编了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七十年代后，英国的敦煌学研究一度沉寂。进入八十年代后半期又开始复苏。除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辑《英藏敦煌文献》外，还在英国图书馆设立了“国际敦煌学计划”，定期编印会报，赠送世界各国学者和有关研究机构；邀请各国学者赴英研究、编目、讲学。1985年还成功地举办了“二十世纪初叶敦煌写本伪卷”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英、中、日、法、俄罗斯、美、丹麦、瑞士等国和台湾地区的学者。这次会议不仅其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推动英国的敦煌学研究更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猎爱美国

美国收藏的敦煌遗书与文物不多，其研究工作也一般。

早在1909年，华尔纳就在纽约出版了《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一书。该书记载了作者1908年秋至1909年春西行敦煌的游记，其中有在莫高窟剥取壁画和盗走菩萨塑像的经过。该书中译本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华尔纳第二次来敦煌时，曾于1911年率考察团调查过安西万佛峡石窟（即榆林窟），回美国后，华尔纳便于1912年出版了《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该书是第一部研究榆林窟的专著，同时还公布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1934年由台湾高雄佛教文化出版处出版的《敦煌韵文集》一书，其作者是美国巴宙。该书所录多为《敦煌变文集》、《敦煌曲校录》等书未收的敦煌诗词及佛曲俚词。

由阎波尔斯基译著的《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一书，1972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除敦煌本《六祖坛经》的

汉文原文校录、英文翻译及注释外，还有长篇导言，对慧能的生平及《六祖坛经》的产生及内容进行了概述。

太史文所著《十王经与中世纪中国佛教的炼狱观念之形成》一书，于 1989 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敦煌本《十王经》进行了英译，并探讨了《十王经》在中古中国宗教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总之，美国的敦煌学研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既没有专门研究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刊物等。其专门研究人员更少。现在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教授。梅维恒生于 1928 年，1950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53 年起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他长期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于 1957 年完成了《伍子胥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张议潮变文》的译注，作为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发表。1964 年又加以修订，以《敦煌俗文学》为书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曾到伦敦、巴黎、列宁格勒、北京等地阅读过敦煌卷子。于 1965 年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和《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两本专著。1983 年又出版了《唐五代变文对晚期中国文学的贡献》。

与以前相比，美国近年对敦煌学的研究相对升温，其标志是 1983 年 5 月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东亚佛教艺术中的天国图像”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美国首次举办的以佛教艺术为专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的学者约有 100 人，在美国学术界影响很大。会议的召开，表明美国人开始注重佛教艺术，尤其注重以敦煌为代表的佛教石窟艺术。虽然会议的名称为“东亚佛教艺术中的天国图像”，但在会上宣读的 15 篇论文中，有 5 篇是专门探讨敦煌壁画的。另有 2 篇论文或涉及敦煌，或与敦煌艺术有明显的比较性。

伴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美国社会对敦煌艺术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强，或出版画册，或到敦煌参观考察。长此以往，必将会推

动美国的敦煌学研究。

源援韩国

韩国的敦煌学研究起步较晚。1969年，韩国学者李秀雄参加了在台湾召开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后，就开始筹组韩国敦煌学会。1971年该会正式成立，由檀国大学教授车柱环任会长，李秀雄任秘书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教授金荣华任顾问。该会重视加强与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与中国学者的合作，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锡厚研究员为该会副会长，翻译出版了张锡厚的《敦煌文学》一书。李秀雄还参加了在敦煌召开的“198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目前，韩国敦煌学者除进行研究工作外，还积极联系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敦煌学著作，并筹备举行敦煌学国际研讨会。

此外，德国、印度、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匈牙利、比利时、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对敦煌学有所研究。如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致力于敦煌文化的研究，已发表了一批论著；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有 1500 余件敦煌遗书，已由彼得森撰写了目录，阿斯木森出版了《于阗语普贤行愿赞研究》；匈牙利藏学家乌瑞专门研究敦煌藏文文书，著有《吐蕃王朝大事记中的一些年代问题》、《吐蕃统治结束以后河西和于阗诸国政府中藏文的应用》等，目前正在编辑《藏语历史文献集成》；捷克驻日本大使哈尼捷卡夫妇，曾在 1976 年发表过《有关敦煌变文的若干问题》一文；挪威的柯诺夫著有《贤劫经塞语文本》一书；德国的赖歇尔特著有《英国博物馆所藏粟特语写本残卷》；比利时的瓦雷·普散编有《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等。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5年 10月十一届全体会议将中国六大文化遗存列入“世界遗产清单”。这六项文化遗存是：泰山、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猿人洞。

②关于敦煌学史的阶段划分，参阅颜廷亮《我国敦煌学研究史概说》，载《社科纵横》1992年 1期。

③叶昌炽《语石》第 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5年 10月出版。

④为节省篇幅，本章所引论著出处，尽量不作注释说明。读者请参阅刘进宝编《敦煌学论著目录 1900—1984》，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所刊 1984年以后每年论著目录索引。

⑤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

⑥详见王永兴《我国敦煌文献（汉文）研究概述》。

⑦参阅段文杰《五十年来我国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之概况》。

⑧参阅段文杰《五十年来我国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之概况》。

⑨斯文·赫定著、孙中宽译《我的探险生涯》1页，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1934年 10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印行。

⑩斯文·赫定著、孙中宽译《我的探险生涯》1页，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1934年 10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印行。

⑪参阅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出版。

⑫参阅林世田《斯文·赫定与中亚探险》，载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集》，1985年 10月印行。

⑬参阅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6年 1期。

⑭参阅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6年 1期。

⑮杨镰《斯文·赫定的探索活动及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6年 1期。

⑯杨镰《斯文·赫定的探索活动及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6年 1期。

⑰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长征记》1页，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

一，~~1957年~~ ~~1957年~~西北科学考查团印行。

⑮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长征记》~~1957年~~，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1957年~~ ~~1957年~~西北科学考查团印行。

⑯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8—1930年~~）》~~1957年~~页，文物出版社 ~~1957年~~出版。

⑰《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⑱《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⑲《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⑳斯文·赫定《长征记》~~1957年~~页。

㉑斯文·赫定《长征记》~~1957年~~页。

㉒斯文·赫定《长征记》~~1957年~~页。

㉓斯文·赫定《长征记》~~1957年~~页。

㉔《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㉕转引自徐恒、王忱《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28年~~纪念》，载《人民日报》~~1957年~~ ~~1957年~~月 ~~1957年~~日。

㉖《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㉗《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1957年~~页。

㉘《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㉙《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㉚《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㉛参阅林剑鸣编译《简牍概述》~~1957年~~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7年~~出版。

㉜参阅徐恒、王忱《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28年~~纪念》。

㉝参阅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1957年~~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57年~~出版。

㉞《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㉟《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页。

㊱《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57年~~—~~1957年~~页。

㊲黄烈《大漠风尘觅学问——黄文弼先生的治学道路》，载《文史知识》~~1957年~~ ~~1957年~~月。

㊳斯文·赫定《长征记》~~1957年~~页。

④②斯文·赫定《长征记·序》。

④③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序》。

④④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序》。

④⑤参阅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983—1989~~）》第④⑤—④⑥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

④⑥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源期。

④⑦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

④⑧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

④⑨参阅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载《考古通讯》~~1983~~年圆期。

④⑩潘絮兹《敦煌的回忆》，载《文汇报增刊》~~1984~~年远期。

④⑪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

④⑫转引自常书鸿《铁马响叮当》，载《文化史料丛刊》第⑤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④⑬常书鸿《铁马响叮当》。

④⑭《~~1984~~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④⑮《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源期。

④⑯《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⑤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④⑰《敦煌研究》~~1985~~年圆—猿期。

④⑱《敦煌研究》~~1985~~年圆期。

④⑲《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⑤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④⑳《敦煌研究》~~1985~~年⑤期。

④㉑《敦煌研究》~~1985~~年猿期。

④㉒《敦煌研究》~~1985~~年⑤期。

④㉓《敦煌研究》~~1985~~年源期。

④㉔《敦煌研究》~~1985~~年源期。

④㉕《敦煌学辑刊》~~1985~~年⑤期。

④㉖《敦煌学辑刊》~~1985~~年圆期。

④㉗《敦煌学辑刊》~~1985~~年圆期。

- ⑥8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
- ⑥9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1983年。
- ⑦0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
- ⑦1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3年 1期。
- ⑦2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3年 1期。
- ⑦3 《敦煌学辑刊》1985年 1期。
- ⑦4 《敦煌学辑刊》1985年 1期。
- ⑦5 中华书局 1985年出版。
- ⑦6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⑦7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⑦8 中华书局 1985年出版。
- ⑦9 文物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⑧0 文物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⑧1 文物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⑧2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年出版第 1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85年出版 1—5辑。
- ⑧3 星星出版公司、台湾前景出版社 1985—1986年出版。
- ⑧4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⑧5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⑧6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⑧7 《中国文化》第二辑。
- ⑧8 《中国史研究》1985年 1期。
- ⑧9 《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 1期。
- ⑨0 《敦煌学辑刊》1985年 1期。
- ⑨1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⑨2 《史学杂志》第 129编第 1号。
- ⑨3 《历史研究》1985年 1期。
- ⑨4 《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 1期。
- ⑨5 《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 1期。
- ⑨6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5年 1期。
- ⑨7 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辑。

- ⑨8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⑨9 《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⑩0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⑩1 《九州学刊》缘卷 源期，1986年 缘月。
- ⑩2 《魏晋隋唐史论集》第 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
- ⑩3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缘期。
- ⑩4 《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 缘期。
- ⑩5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⑩6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⑩7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⑩8 参阅郑阿财《试论两岸的“敦煌学”教学》，载《隋唐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 1986年 源月发行。
- ⑩9 详见朱凤玉、郑阿财编《潘重规教授敦煌论著目录》，载《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湾文津出版社 1987年出版。
- ⑪0 载 1986年《新亚学报》第 愿卷 圆期，1986年《敦煌学》第 圆期又有增订。
- ⑪1 1986年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86年 源月出版增订本，著录 1986—1987年中日学者的论著近 1000条。
- ⑪2 1986年 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 ⑪3 1986年 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 ⑪4 1986年 嘉新文化基金会出版。
- ⑪5 1986年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 ⑪6 参阅李正宇《访台琐记》，载《丝绸之路》1986年 圆期。
- ⑪7 参阅黄振华《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6年 圆期；耿昇《法国敦煌学研究概况》，载《西北民族文丛》1986年第 猿辑。
- ⑪8 汉译本由耿昇翻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⑪9 汉译均载《敦煌译丛》，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⑪0 汉译本由耿昇翻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版。
- ⑪1 详见耿昇《1986年巴黎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概况》，载《敦煌研究》试刊第 圆期。

⑫② 汉译本由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⑫③ 见《敦煌吐蕃文献选》附录。

⑫④ 汉译本由耿昇、穆根来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⑫⑤ 参阅荣昱《日本敦煌学研究简介》，载《文史知识》1985 年 8 期；那向芹《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 年 9 期。

⑫⑥ 《中华文史论丛》第 3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附录一】

《敦煌学述论》 后记

《敦煌学述论》即将发排付梓了。在当今图书发行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甘肃教育出版社能够赔钱出版本书，我的内心是特别激动的。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既无权、又无钱的无名小卒来说，对甘肃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徐明珏先生、副总编辑张祚羌先生积极促使、支持本书的出版，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也从内心深表敬意。

本书的酝酿，已好几年了。由于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也时时注意有关动态和研究状况。深感敦煌学研究中，既缺乏高质量的、全面系统的《敦煌学概论》，也没有为一般群众了解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因此，早就想写普及敦煌学的小册子——《敦煌学讲话》或《敦煌学基础知识问答》，并于 1982 年向张祚羌和徐明珏先生谈了这个打算，他们表示支持。这个计划也得到了社会有关人士的赞许，《兰州晚报》为此于 1983 年 1 月开设了“通俗敦煌学”专栏。但由于我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再加上与金宝祥教授等合著《隋史新探》，这个计划便暂时搁置了下来。1984 年初，《隋史新探》与《甘肃古代史》交付出版社后，又开始了《敦煌学讲话》的撰写。1985 年底，我正式向张祚羌、徐明珏先生提出了这个计划，他们表示尽力支持，并认为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全面系统的敦煌学专著，因此建议我写一本比较全面、系统，能够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与动态的《敦煌

学》。其后，经过两年的积极撰写，三易其稿，完成了目前的这本《敦煌学述论》。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但又是科学家辛勤劳动的结晶。学术是不断继往开来，向前发展的。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上攀登的，对于新兴的敦煌学来说更是如此。本书取名为《敦煌学述论》，就包含着这层意思，也就是说，本书既有自己的一点研究心得，也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将其提炼、综合后，加以通俗地叙述。当然，对于采用别人的研究成果，绝不敢掠人之美，而是尽量采用各种方式加以注释说明。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敦煌学研究有所裨益，尤其对初学者来说，如果能起到一点入门作用，那就是笔者的最大欣慰。也希望学术界尽快推出高质量的《敦煌学概论》，那就达到了抛出这块引玉之砖的目的。当然，我仍要一如既往，加倍努力，如有机会修订再版，将使之更臻完善。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许多师长与学兄的支持与帮助。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厚安先生与责任编辑张祚羌先生细心审阅了书稿，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使本书避免了许多错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颜廷亮先生及我的学兄魏明孔、李并成、王锬、张先堂、王永曾、伏俊连也看了部分书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在此谨致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还需说明，本书的撰写出版，得到了西北师范大学科研处与敦煌学研究所的殷切关怀与帮助，尤其是科研处领导对这一课题十分重视、关心，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从而使本书最终得以完稿出版，在此谨致谢忱。

刘进宝

1995年 源月 源日

【附录二】

台湾版序言

拙著《敦煌学述论》有幸能由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中文繁体字版，我对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促进两岸学术交流、支持敦煌学事业发展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敬佩。

敦煌资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敦煌学是一门显学。海峡两岸在敦煌学研究许多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台湾地区在敦煌学研究及其人才培养方面，已做出了卓越贡献。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大陆学者的敦煌学著作，使两岸敦煌学者的交流与联系日益密切，为敦煌学的繁荣及国际化做了积极的工作。

中国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近十年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进入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尤其值得庆贺的是，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交流与协作日益密切。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二年在北京举行的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和一九九〇年在敦煌举行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有台湾地区的学者参加。一九九二年九月，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李正宇、梁尉英三位敦煌学家获准访台，与台湾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与接触，潘重规教授还受聘为敦煌研究院荣誉院士。

本书是一本学术性的普及读物，尽量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敦煌学的各个方面及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叙述，极便于初学者。它对于敦煌学研究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为敦煌学研究，既需要高水平的专题研究之作，也需要向一般读者全面介绍、普及敦煌学的通俗读物。从而使敦煌学尽快从学术界走向全社会。

本书得以在台湾出版，是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柴剑虹先生推荐和联系的。在此，我对柴剑虹先生奖掖后进、扶持后学，对敦煌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的撰写及出版，还得到了甘肃省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与资助。省教委科研管理部门的程耀荣先生，对本书的撰写出版，非常关心，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刘进宝

1996年 9月于兰州

后 记

《敦煌学通论》即将出版，它是在原《敦煌学述论》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因此确切地说，本书实际上是《敦煌学述论》的增订本或修订本。

1985年，承甘肃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白玉岱先生、副总编辑黄强先生之不弃，决定重印拙作《敦煌学述论》，并建议我增补修订，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书稿完成后，考虑到发行等各方面的原因，出版社建议改用《敦煌学通论》这一书名。为了尊重历史，我便将 1985年 5月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述论》后记和 1985年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台湾版序言作为附录收入，以反映本书的前后变化情况。

1985年底，拙稿《敦煌学述论》出版后，我陆续听到了学术界一些前辈及同志们的意见，如季羨林、池田温、朱雷、陈国灿、项楚、张锡厚、柴剑虹、邓文宽等先生，或予以鼓励，或指出不足，希望修订再版。尤其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对拙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不仅无私地推荐拙作在台湾和韩国出版，而且还为修订本写了序言。柴先生的无私帮助和鼓励，使我非常感动，也永远铭记在心。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见闻不广，再加上时间紧迫，本书肯定还有许多不足、缺点，甚至错误之处。对于这些缺点、错误，我一如既往地欢迎学界前辈和同志们予以指

正、批评。我也会加倍努力，如有机会再次修订出版，将使之更加完善，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敦煌学通论》。

刘进宝

二〇二〇年 庚子 月 日于西北师大

【校后记】

本书稿 二〇一八年 月 交稿，原定于 二〇二〇年 月 出版，但由于出版社出版计划的调整，本书的出版推迟了两年有余。由于校样早已排好，不便做较多的增改，故近两年敦煌学的发展变化未能涉及，请读者谅解。

本书的最后完成出版，得到了西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特予说明并表示感谢。

二〇二二年 月 日